

15 至 20 世纪长江流域经济、社会与文化变迁书系 陈锋主编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武汉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托项目

武汉现代化进程研究

主编 冯天瑜 陈 锋

武汉大学出版社

本书编委会

主任：李子诚

副主任：张安涛 童惟一 王昌藩

委员：冯天瑜 陈 锋 孙汉平 喻宗汉

周鑫伟 施经建 冯占军

目 录

导言：武汉早期现代化刍议	1
（作者：冯天瑜）	
一、明清时期汉口的发展历程	6
（作者：陈 锋）	
二、汉口：近代前夜的社会保障	18
（作者：张建民 周 荣）	
三、近代前夜汉口商人的文化生活：1800—1840	41
——以《汉口丛谈》为中心的考察	
（作者：张 岩）	
四、汉口模式与中国商业近代化	58
（作者：任 放）	
五、晚清武汉经济发展及其特征	67
（作者：李卫东）	
六、晚清武汉社会的变迁	74
（作者：李卫东）	
七、晚清汉口的对外开放	86
（作者：蔡国斌）	
八、近代汉口开放与武汉城市功能转换	115
（作者：张笃勤）	
九、交通现代化与武汉城市经济演变	122
（作者：张笃勤）	
十、张之洞与武汉近代化	133
（作者：何晓明）	
十一、近代化、权威主义与张之洞效应	149
（作者：任 放）	
十二、辛亥革命与近代武汉及湖北工业	155
（作者：徐凯希）	

十三、抗日战争爆发前的武汉及湖北工业	164
(作者:徐凯希)	
十四、民国年间汉口棉花市场	172
(作者:徐凯希)	
十五、民国年间武汉经济地位下降原因述论	180
(作者:彭敦文)	
十六、武汉旅游发展的近代化历程	191
(作者:王国华)	
十七、两次世纪之交武汉对外开放之比较	258
(作者:李宪生)	
十八、武汉人的形象	278
——对武汉人自我形象的实证分析	
(作者:罗教讲)	
十九、武汉现代化现状:比较、评价与对策	300
(作者:周长城 陈 群)	
余论:新世纪武汉展望	323
(作者:陈 锋)	
附录:国外学者笔下的汉口	328
汉口 (英)菲尔德维克	328
(译者:姚伟均)	
十九世纪汉口的贸易 (美)罗威廉	351
(译者:朱丹 江榕,校者:彭雨新 鲁西奇)	
十九世纪汉口的市民 (美)罗威廉	386
(译者:罗杜芳,校者:鲁西奇)	
在汉口的外国人权益 (日)井上博治	430
(译者:杨华,校者:李少军)	

导言：武汉早期现代化刍议

我们面对的“武汉现代化”议题，跨越时段颇长，并且涉及到几种社会形态，为避免泛泛，这篇短文从“早期”现代化入手。而“武汉早期现代化”可从一般、特殊、个别三个级次展开讨论，也即从现代化、中国早期现代化、武汉早期现代化逐层辨析。至于对“武汉现代化”的全面观照，则可从本书全篇获得。

（一）

发生在近几个世纪的现代化，是继人猿揖别、农业萌生之后人类史上的第三次跃进，这是一个多侧面、全方位的社会转型过程，涉及到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观念文化相综合的结构—功能变革。现代化包括经济领域的工业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社会领域的城市化、观念领域的理性化等内涵，它们又交融互摄，彼此渗透，呈现多元一体的共生互动状态。

就现代化的物质基石——经济领域的工业化而言，约指由自然经济主导的农业文明向商品经济主导的工业文明演进。其显著标志是，有生命动力系统（人力、畜力）为无生命动力系统（矿物燃料、水力、核能）所代替，机械生产取代手工劳作，人类获得财富的手段由驯化利用天然物为主，变为加工改造天然原料为主，“高效率”和“标准化”成为经济生活的准则。这一系列深刻变化的动力之一，来自科学技术革命；反之，工业化过程又为科技革命提供源头活水、用武之地与无尽资源。因此，工业化与科技革命是互为因果的。它们互相间的生成次序，颇类似鸡生蛋、蛋生鸡孰先孰后，难以断论。

与经济领域的工业化相为表里，在现代化进程中，政治领域发生“专制—人治体制”向“民主—法治体制”转化；社会领域发生静态的、彼此隔绝的“乡村式社会”向动态的、被种种资讯手段联系起来的“城市式社会”转化；观念领域发生“神本”向“人本”、“信仰”向“理性”的转化；教育则从少数特权阶层的专利变为大众共享。总之，近几百年来的现代化进程，使我们这个星球的状貌和人类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发生空前巨大的变革。而且，这种变革赢得一种持续的加速度，并在地理空间上不断拓展（由西欧扩散到世界各地），在文明的现代性上愈益向深度进军（如当前正从工业化转向后工业化或称信息化）。

(二)

时至今日，现代化已是一个遍布全球的，但各区间又极不平衡的发展过程。这种发展的不平衡性，首先根源于早期现代化生成史的特色：它不是在全球各地纷然并起的，而是在某一角落率先勃兴，渐次弥散开来的，因此，其间有先行者与后起者之分，原创者与学习者之别。后起者中则有快速追进者与迟缓跟随者的差异，而迟缓者又可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转变为快速者。

早期现代化，即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需要一系列内外条件的集合，除前述的科技革命外，关键条件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与发展。而西欧的某些地段十分难得地最早集合了这些条件。以 15、16 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和世界性远航开其端绪，现代化过程在西南欧（意大利等）首先启动，而其正式展开则是产业革命和政治革命于 18 世纪在西北欧（英国、尼德兰、法国等）陆续发生。生成于西欧的工业文明伴随着殖民扩张，延及到土著尚处石器时代的北美与澳洲，又与中南美、中东、南亚、东亚一系列悠久的古典文明发生剧烈的冲撞与融会。世界历史以统一市场的形成为契机，从分散走向整体，五洲四海的国家与民族，或主动或被动，或从被动转为主动，先后汇入波澜壮阔的现代化大潮之中。

对于西欧而言，发端于 15、16 世纪之交的现代化是从中世纪母胎内自然孕育而成的，故可称之为“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对于所有其他地区（如中欧的德国，东欧的俄国，中东的土耳其，东亚的日本、中国等等）而言，现代化是在西欧现代文明的威逼和示范之下发生的，故可称之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当然，言其“外生”，并非说西欧以外国度的固有文明与现代化无关，而是指那些国度本土固有文明尚未发育到自生现代化的程度，现代性与传统性不兼容，其现代化启动的直接导因是外来现代文明的强烈刺激，而那些国度的固有文明则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着深刻而久远的阻滞或推进作用。

(三)

自 19 世纪中叶以降的百余年间，中国演绎着“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坎坷历程，经历了现代转型从迂回迟缓期到快速急进期的变更。

中国具有悠久而灿烂的文明传统，其成熟的农本经济、强固的君主专制政体、完备的典章文物，到宋代达到烂熟程度，明清承其绪，在固有轨迹上又有所更张，自明中叶到清中叶，其经济、文化领域已出现某些近代性因子，但就整体而言，传统社会并无解体迹象，全体国人仍习惯性地徘徊在中古故道，并自外于 18 世纪以降的世界现代化进程，一个生动表现，便是 1793 年清朝乾隆皇帝接见已实现工业

革命的英国使臣时，却自诩“天朝”“无所不有”，拒绝与“外夷”通商、建交，显出一种“集体孤独症”，丧失了早期现代化起步的一次机遇。这种情形迁延至19世纪中叶，当以英国为首的西方殖民主义在侵略中东、南亚以后，终于把矛头指向东亚时，中国朝野还沉迷于中古旧梦。西方列强的暴力来袭，强行打破了清朝封闭的国门。拉开中国现代化进程序幕的启动力，来自于西洋人炮舰的轰击、机织布的涌入和鸦片的毒害。

作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中国的早期现代化具有区别于“早发内生型现代化”的一系列特征。

其一，由于中国现代转型是在巨大的国际压力下启动的，西方殖民主义的军事威胁，使中国面临旷古未遇的国防危机，故中国早期现代化首先是对这种危局的防御性反应。如果说，早发自生型现代化国家的工业化，是从较易实现原始积累、赢得利润的轻工业起始的，那么，中国的工业化努力则开端于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兴建的第一批现代化工厂，如1865年李鸿章设于南京的“金陵机器制造局”，1865年李鸿章设于上海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1866年左宗棠设于福州的“马尾船政局”，1867年崇厚设于天津的“北洋机器制造局”，莫不是制造枪炮、弹药、舰只的军工厂。武汉的早期现代化机器工业也全是这种“兵工洋务”的产物，19世纪90年代张之洞在武汉建立的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便主要为“强兵”而设，枪炮厂自不待言，张之洞设铁厂，也是出于这种认识：“今日之铁，明日之械”，“今日之铁，明日之轨。”（铁轨，指卢汉铁路，而修此铁路的主要目的又是运兵。）后来建立的“纱布丝麻四局”等轻纺工业，虽号称“求富”，但其利润也主要用于填补铁厂、兵工厂的巨大财政亏空。

其二，中国早期现代化是在自身社会条件远未成熟的情形下，因外力逼迫，由政府自上而下发动的，故这是一种“强政府、弱社会”的现代转型。因为中国是在文化的现代性与传统性不兼容的情形下开始实施现代化的，故而需要依仗超经济的强制手段，中央及地方政府的作用异常突出。晚清的早期现代化，在中央是由奕訢、文祥等较早与洋人打交道的亲贵主持的，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得到掌握朝中实权的慈禧太后的支持；地方上，则由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权倾一时的封疆大吏实际操办，继起者则有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上海、天津、武汉之所以成为晚清现代工商业的三鼎足，除三地特定的区位优势、西洋势力的渗入等因素外，与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的坐镇直接相关。中国的早期现代化与军政强人的活动关系密切，以至人存事兴，人亡事衰，现代化进程不断发生大起大落以至中断。这是政府大力干预的现代化所要付出的代价。张之洞离鄂，武汉在全国的地位渐降，张氏本人有此预言，以后的历史进程也证实了这一点。武汉早期现代化的成败得失与慈禧太后支持下的洋务运动后期巨擘张之洞干系甚深，人们为此盛赞张氏的功勋，但张氏在武汉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巨大个人作用，正埋藏着武汉早期现代

化坎坷性的伏笔。这是我们在考察这段重要史事时应予特别关注的。

其三，早期现代化的题中必备之义——民族资本的成长，一直受到帝国主义势力的挤压和官府的制约，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一段时间得到较舒畅地发展，纺织、面粉、火柴、香烟、日用百货等轻纺工业有长足进步，但从近现代大时段观之，民族资本处境堪称艰难困顿。武汉著名商号“曹祥泰”的日用百货制造业，20世纪初曾兴盛一时，抗日战争则跌入低谷；裕大华集团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颇有拓展，之后却饱经磨难，屡遭挫折；号称“地皮大王”，自称“创造了汉口”的刘歆生，其房地产事业于清末民初势头甚健，不久即一再败绩，地产大部分典卖；创办震寰纱厂的刘鹄臣兄弟，创办一纱厂的李紫云，轧花业巨头周文轩，建立民营机器厂的周仲宣，商界名人贺衡夫、周苍柏等，也都是企业初创有成，一度颇具规模，终因战乱、天灾、政治变故或自身经营不善而一蹶不振，甚至全然倒闭。这与同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日本相较，形成明显差异。日本的民族资本，如住友、三井、三菱等财团，自江户时代兴起，经明治时代大发展，直到今天，二三百年来蓬勃运行，遂成威震全球的大企业集团。现代文明需要一种稳定的、渐进的积淀过程方能形成大气候，而中国及武汉缺乏这样一种现代文明的长时段积淀过程，许多民族企业都是“断尾蜻蜓”，武汉的民族资本家没有一位成为彪炳经济史史册的大人物。这是我们回首中国及武汉早期现代化历程时的一种深切感受。这种遗憾的造成，固然导因于战乱频仍等等客观条件，但也与国家政策一再出现大幅度摆动，造成对民族资本的惨重杀伤直接相关。前车之鉴不可忘却。

（四）

武汉的早期现代化，晚于广东、上海、天津，早于多数内地城市，故就时序言之，在全国处在中上级次。自19世纪60年代开埠、洋商设厂，中经张之洞督鄂18年（1889~1907年）的洋务兴革，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武汉后来居上，发展成为超过广州，与天津争胜，直追上海的全国最大的现代工商文教中心之一。建于武汉的汉阳铁厂，不仅是中国，而且是整个亚洲第一家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早于日本第一家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八幡制铁所7年；建于汉阳的湖北枪炮厂是仅次于上海江南机器局的大型兵工厂，成为近现代中国陆军装备（如七九式步枪，俗称“汉阳造”）的主要生产基地；建于武昌的“纱布丝麻四局”则是仅次于上海的现代化纺织工厂系列。以汉口为起点的卢汉铁路，是纵贯中国南北的第一条铁路。武汉还成为华中最重要的文教中心，以武汉为出发点的湖北留日学生数量，曾高居各省榜首。以武汉为主要基地的湖北新军，是晚清军制改革的模范，是屡次“秋操”的冠军得主。武汉的对外贸易额“驾乎津门（天津），直追沪上（上海）”则显示了20世纪初叶武汉在全国的翘楚地位。武汉的早期现代化在19、20世纪之

交成就斐然，颇耸动中外视听，成为现代化“后发优势”的一个例证，而其间包蕴的种种弊端，又制约着武汉的进程。在此后近一个世纪，武汉的现代化建设又续有发展，其规模与水平非张之洞督鄂时可比，但就在全国的地位而言，20世纪初叶以后的武汉则要发出“不如昔时”之叹。

重温武汉的昔日辉煌，窥探其中奥秘，对今日武汉建设具有启迪意味。19、20世纪之交的历史证明，武汉的区位优势提供了这座城市成为中国乃至东亚最重要的国际都会的可能性。而且，这种可能性不仅曾被历史所证明，也为高瞻远瞩的前景观察家所预言。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对武汉的未来寄予厚望。联合国在20世纪末叶的一份未来世界十大城市名单上，列有中国的上海与武汉。美国未来学家麦金利·康韦预测，武汉是21世纪世界十大超级城市之一，并将其排在第二位。这种于武汉的青眼有加，既是对武汉历史的肯认，更是对武汉前景的看好，它立足于武汉自然地理及人文地理条件的综合考察，具有向现实转化的可行性。当然，美好前景不会自行降临，机会只在有准备的人们那里变成现实。武汉在21世纪雄风振起，尚需武汉人的智慧与勤奋，其中包括对武汉现代化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以及由此推导出的既富于想像力又切实可行的发展方略的制定。

1960年在日本箱根举行的“日本和现代化”国际学术会议，至今被视作关于现代化研究的一次里程碑。这次会议为现代化确定的标准中，第一条便是“人口相对高度地集中于城市和整个社会不断上升的城市向心趋势”。可见，城市化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和核心指标。作为现代都会的武汉，在近140年间，大量吸收周边县区的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小知识分子，形成华中地区“城市向心趋势”的最大典型。其城市化路向与上海、天津、广州等滨海都会有异有同，仅从“城市化”这一意义言之，武汉市的现代化研究，便具有特殊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在中国现代化进入快速发展期，武汉现代化建设面临极佳机遇的今天，反顾武汉早期现代化的曲折历程，可以看到先贤筚路蓝缕的创业艰辛，洞察文明现代转型的种种不可抗拒的规律，从而为今后进行现代化建设提供宝贵而真切的经验教训。如果本书能在这方面作出些微贡献，编者不胜欣幸之至。

2001年10月1日（辛巳年中秋）撰于武汉大学寓所

一、明清时期汉口的发展历程

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已经证实，武汉的历史源远流长，其城市（城堡、城邑）的源头可以追溯到 3 500 多年前的盘龙城时代^①。明代中期以降，随着汉口镇的兴起，最终形成了武昌、汉阳、汉口鼎足而立的武汉三镇格局。同时，因商而盛的汉口镇的出现，也使武汉具备了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多位一体的综合城市功能。

明清以来，汉口商业繁剧，既聚集各路商帮，又中转各色货物，汉口不但成为长江中游最大的市镇，亦服膺全国四大名镇之名。“汉口”几成为武汉的代名词。以汉口为中心的武汉在全国的地位和知名度从而大为提升。概观汉口在明清时期的历史发展，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发展阶段：一是明代中期至汉口开埠，它是传统商业市镇的兴起与鼎盛时期；二是汉口开埠至张之洞督鄂，它是早期现代化的萌动时期；三是张之洞督鄂至清朝灭亡，它是早期现代化的发展时期。这是从武汉的早期现代化着眼进行的大致区分。兹分而述之。

（一）汉口商业巨镇的兴起与发展

明初的汉口一带，还是无人居住的芦苇荒滩。明宪宗成化年间，汉水主河道在龟山之北形成，并由此入江。汉水故道淤塞，主河道移至龟山之北后，原先的汉阳一分为二，形成南、北两岸，南岸一侧仍称汉阳，北岸一侧则称之为“汉口”。嘉靖年间，汉口的人口增多，已有城镇居民区“坊”的出现，汉水口南岸有崇信坊，北岸则有居仁、由义、循礼、大智四坊。汉口也在此时正式设镇，并设置有汉口巡检司对市镇进行管理^②。这标志着汉口镇的形成和粗具规模^③。万历年间，湖广地

① 参见皮明庥、欧阳植梁主编：《武汉史稿》，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7～34 页。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8～20 页。

② 按：汉口巡检司最初设置在汉水南岸的崇信坊，康熙年间始由南岸移至北岸。雍正五年，随着市镇规模的扩大，又将汉口巡检司分成仁义、礼智二分司。

③ 据乾隆《汉阳府志》卷 12，《汉阳县·乡镇》记载，嘉靖二十四年，汉口已有居民 1 395 户。

区的漕粮均在汉口交兑，同时，运销湖广的淮盐也以汉口为转运口岸。漕粮与淮盐的大额转运，以及随之而来的商人集中、物资集散、贸易频繁，使汉口的商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迅速发展，汉口成为“商船四集，货物纷华，风景颇称繁庶”的新的贸易中心^①。

虽说汉口“肇于明中叶，盛于启、正（天启、崇祯）之际”^②，但明末清初的社会动乱不可能不对汉口的发展造成影响，汉口真正成为商业巨镇，是在“康乾盛世”时期，是与清代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天下四聚”之说，也在这一时期盛行。《广阳杂记》云：“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然东海之滨，苏州而外，更有芜湖、扬州、江宁、杭州以分其势，西则惟汉口耳。”^③汉口在天下四聚中的地位尤其重要。汉口在这一时期的繁盛程度，从“汉口镇火”的侧面记述中亦可见一斑：“汉口镇为湖北冲要之地，商贾毕集，帆樯满江，南方一大都会也。毕秋帆尚书镇楚时，尝失火烧粮船一百余艘，客商船三四千只，火两日不息。嘉庆十五年四月十日，镇上又失火，延烧三日三夜，约计商民店户八万余家，不能扑灭。”^④毕沅督楚，时在乾隆末年，“汉口镇火”所描述的是乾嘉年间的情况。乾隆初年的情况则有如下描述：

楚北汉口一镇，尤通省市价之所视为消长，而人心之所因为动静者也。户口二十余万，五方杂处，百艺俱全，人类不一，日销米谷不下数千。所幸地当孔道，云贵川陕粤西湖南，处处相通，本省湖河，帆樯相属。……查该镇盐、当、米、木、花布、药材六行最大，各省会馆亦多，商有商总，客有客长，皆能经理各行各省之事。^⑤

从这里的描述来看，是时汉口的人口、商业、交通以及物价对周边地区的影响

① 乾隆《汉阳府志》卷12，《汉阳县·乡镇》。

② 康熙《汉阳府志》卷1，《舆地志》。

③ 刘献廷：《广阳杂记》卷4，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93页。按：在该卷中，刘献廷多处记载了他的所见所闻。其记渡船之方便云：“汉阳渡船最小，俗名双飞燕。……最捷而稳，且其值甚寡，一人不过小钱二文，值银不及一厘。即独买一舟，亦不过数文。故谚云：行遍天下路，惟有武昌好过渡。”其记风景云：“汉口三元庵后有亭，曰快轩，轩后高柳数百株，平野空阔，渺然无际，西往汉阳诸山，苍翠欲滴。苏州江南风景秀丽，然输此平远矣。”其记洪山寺云：“洪山寺建于武昌东门外蛇山之麓。为明楚王所建。道场宏丽，为天下第一。照墙有碧琉璃交龙，壮丽晃耀。墙宇高峻，如都门西山诸梵刹制。”其记晴川阁云：“自铁门关西上，为龟山首，有楼巍然，曰晴川，与黄鹤对峙。……楼临江东向，轩豁开爽，远胜黄鹤。”

④ 钱泳：《履园丛话》卷14，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81～382页。

⑤ 晏斯盛：《请设商社疏》，见《皇朝经世文编》卷40，《户政》。

都十分显著。所谓的汉口“六大行”也在这里被首次提出,而且“商有商总,客有客长,皆能经理各行各业之事”,各行业间的管理臻于完善,这是值得注意的。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用了“六行最大”一词,“六行”之外,也还有其他的行业,“六大行”或后来的“八大行”之说,不过是概指。汉口的行业与商品种类繁多,章学诚的《湖北通志检存稿·食货考》对乾隆时期汉口丰富的商品描述甚详,已有学者作过细致的引述,可以参见^①。章氏所记述的汉口的主要商品有食盐、粮食、竹木、纺织品、药材、山珍、海味、干鲜果品、糖、香料、茶、酒、毛皮、纸张、文具,以及铜、铁、锡、石膏等矿产品,煤、炭等燃料,还有烟草、鱼类、金银珠宝等类,有具体名称者达230多种。

明清时期汉口的兴盛,是以商业贸易为起始的。这首先得益于它的区位优势,时人有所谓“九省通衢”、“九省之会”、“七省要道”、“八达之衢”等代称或习称。在汉口未名之前,明代人已注意到湖北的区位优势:“大江以南,荆楚当其上游……其地跨有江汉,武昌为都会。郢襄上通秦梁德黄,下临吴越,襟顾巴蜀,屏捍云贵郴桂。通五岭,入八闽。其民寡于积聚,多行贾四方。四方之贾,亦云集焉。”^②嘉靖年间正式设立汉口镇后,汉口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条件,得以快速发展。即如方志所称:汉口“当江汉交汇之处,水道之便无他埠可拟。循大江而东,可通皖赣吴越诸名区,以直达上海。循大江而南,可越洞庭入沅湘,以通两广云贵。又西上荆宜而入三峡,可通巴蜀,以上溯金沙江……所谓九省之会也”^③。“汉口镇,古名夏口,为九省通衢,夙称烦剧。”^④从此,湖北的大区位优势更彰显于汉口一地。此外,湖北及邻省的经济的发展,也促成并加快了汉口的商业繁荣。

如上所述,明清时期汉口的商业贸易是以粮食、食盐、棉花、棉布、茶叶、药材、竹木等为主干的。以粮食而论,是时,湖北及周边的湖南、四川等省的粮食产量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出现了“湖广熟,天下足”的谚语。湖北、湖南、四川等省所产之米粮下销江南、闽广各省,都要通过汉口转运,“粮食之行,不舍昼夜”^⑤。汉口成为米粮流转中心。以食盐而论,湖北、湖南一贯食淮盐,淮盐由仪征进入长

① 参见张建民:《湖北通史·明清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46~448页。

② 张翰:《松窗梦语》卷4,《商贾纪》。

③ 民国《夏口县志》卷12,《商务志》。更早的方志,如乾隆《汉阳府志》卷12亦称:“汉口一镇耳,而九州之货备至焉,其何故哉?盖以其所处之地势使然耳。武汉当九州之腹心,四方之孔道,贾迁有无者,皆于此相对代焉。故明盛于江夏之金沙洲,河徙而渐移于汉阳之汉口,至本朝而尽徙之。今之盛甲天下矣。夫汉镇非都会,非郡邑,而火烟数十里,行户数千家,典铺数十座,船舶数千万,九州诸大名镇皆让焉。非镇之有能也,势则使然耳。”

④ 民国《湖北通志》卷5,《舆地志》。

⑤ 晏斯盛:《请设商社疏》,见《皇朝经世文编》卷40,《户政》。

江运至汉口，再由汉口分运湖北、湖南各府州县^①，汉口是淮盐的重要转销口岸。以《淮鹺备要》所载两淮行湖广引数777 200引，每引重量364斤计，每年由汉口转销的食盐大致在3亿斤左右，而回空盐船又载各色货物下行，从而形成循环往复的转运贸易体系。应该说，粮食、食盐等大额贸易，是汉口进一步鼎盛的重要因素。没有疑问，明清时期汉口的商业繁荣以及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使汉口成为内陆特大型的市镇和全国性的商品市场。这也就是康熙时的著名学者刘献廷所说的：“汉口不特为楚省咽喉，而云贵、四川、湖南、广西、陕西、河南、江西之货，皆于此焉转输，虽欲不雄天下，不可得也。”^②

尽管如此，明清时期（鸦片战争前）的汉口还只是一个典型的商业性市镇，与国外也基本上没有商业往来，是时的汉口或武汉尚不具备近代意义上的城市内涵和特质。

（二）汉口开埠：早期现代化的契机

从武汉城市的现代化进程以及国际性城市着眼，1661年的汉口开埠^③，是一个重要的界标。汉口开埠后，英国最先与汉口通商，外国各路商人也“立即趋之若鹜”^④，美国、法国、德国、丹麦、荷兰、西班牙、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日本、瑞士、秘鲁等国后来到汉通商^⑤。与此同时，外国商人也开始在汉口开办原料加工厂，如威廉·乌克斯在《茶叶全书》中所说：“1861年汉口开放为对外通商口岸，俄人乃（于1863年）在此建立其砖茶工厂。”^⑥据统计，至张之洞督鄂前，外商在汉口开办的原料加工厂有如下数家：

① 参见陈锋：《清代盐政与盐税》表9，《汉口至各地转运分销里程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② 刘献廷：《广阳杂记》卷4，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93页。

③ 1858年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天津条约》中增辟的11个通商口岸中即有汉口，但汉口的正式开埠则是在1861年。参见陈均、任放著：《世纪末的兴衰——张之洞与晚清湖北经济》，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68页。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5～36页。

④ 姚贤镐编：《中国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85页。

⑤ 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8页。按：1861年汉口开埠前，挪威、瑞典曾援引《五口通商》条文，于1847年在汉口开展商务活动。又据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称：“约在1850年，俄商开始在汉口购茶，于是汉口成为中国最佳之红茶中心市场。俄人最初在此购买者为功夫茶，但不久即改购中国久已与蒙古贸易之砖茶。”见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10～111页。如是，俄国在汉口的商业活动，也是在汉口开埠之前。

⑥ 见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11页。

同治元年（1863年）俄商开办的顺丰砖茶厂；
同治五年（1866年）俄商开办的新泰砖茶厂；
同治十一年（1872年）英商开办的汉口砖茶厂；
同治十三年（1874年）俄商开办的阜昌砖茶厂；
光绪元年（1875年）英商开办的金银冶炼厂；
光绪二年（1876年）英商开办的汉口压革厂；
光绪二年（1876年）英商开办的隆茂打包厂；
光绪六年（1880年）英商开办的平和打包厂；
光绪十三年（1887年）德商开办的美最时蛋厂；
光绪十三年（1887年）德商开办的礼和蛋厂；
光绪十五年（1889年）德商开办的元亨蛋厂。^①

这些原材料加工厂的开办，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汉口对外贸易的发展。如俄商开办的顺丰、新泰、阜昌三大茶厂，其生产的砖茶销往俄国和内蒙古等地，在19世纪90年代以前，共有资本银400万两，拥有15架蒸汽动力砖茶机，7架茶饼机，数千名中国雇工，年产值近5000万两，具有相当的规模。茶工业规模的扩大，刺激了茶贸易的增长，据统计，1874年汉口出口砖茶83402担，1877年增长为144756担，1878年增加到152339担^②。

汉口开埠后，“洋行”的出现也值得注意。1862年，被称为“洋行之王”的英商怡和洋行（渣甸洋行）在汉口设立分行，最初主要经营轮船业，后扩大经营进出口贸易等业务。据《武汉市志·对外经济贸易志》记载，怡和洋行内部设有船头、银行、保险、进出口4部。其中，船头部下设轮船、趸船、码头、堆栈4个办事处，办理各有关航运业务；银行部开办“有利银行”，专门办理货物信托等业务；保险部经营各类水火保险业务；进出口部经营茶、棉花、棉纱、牛羊皮、五金机械等业务。怡和洋行之外，美、德、法、俄等国也在汉口设立有洋行。洋行经营的范围非常广泛，对汉口的发展有较大的影响。以怡和洋行的航运业而论，其拥有客货轮20多艘，行驶汉申、汉宜、申宜、宜渝等航线，在长江流域运输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以汉口为中心的长江航运业的发展，又促进了货物的流通和进出口贸易的增长。

可以认为，汉口开埠后，外商的涌入、洋行的设立，以及与外贸密切相关的外

^① 参见陈钧、任放著：《世纪末的兴衰——张之洞与晚清湖北经济》，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8页。

^② 参见罗福慧：《湖北通史·晚清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5页。李宪生：《两次世纪之交武汉的对外开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7页。

资企业的兴办，都促使汉口渐次由内陆型的封闭式城市向开放型的国际性城市迈进。

以下两表，正可以看出，从汉口开埠至张之洞督鄂这一段时间中，在国际贸易方面，汉口的贸易额及其在四大贸易商埠（上海、汉口、广州、天津）中的地位^①。

1867~1889年汉口直接对外贸易额与位次

表 1 1867~1872年为（上海）银两，1873年后为海关两

年份	全国进出口总额（两）	%	汉口进出口额（两）	占总额%	位次
1867	126 696 809	100	522 342	0. 41	4
1868	127 066 570	100	1 398 115	0. 89	4
1869	128 632 943	100	1 266 253	0. 83	4
1870	120 917 526	100	2 290 335	1. 69	3
1871	133 950 789	100	3 675 409	2. 36	3
1872	143 510 664	100	4 075 196	2. 52	3
1873	138 609 437	100	4 421 536	2. 86	3
1874	133 954 156	100	5 258 811	3. 96	3
1875	138 906 756	100	5 761 239	4. 15	3
1876	153 241 410	100	7 271 451	4. 75	4
1877	143 511 725	100	4 780 725	3. 33	3
1878	140 360 345	100	6 469 802	4. 61	3
1879	157 077 750	100	7 161 360	4. 52	3
1880	519 523 290	100	7 672 117	4. 82	3
1881	165 336 609	100	5 316 356	3. 22	3
1882	146 841 089	100	6 387 278	3. 86	3
1883	145 151 331	100	7 680 670	4. 56	3
1884	141 477 962	100	6 016 367	4. 14	3
1885	154 412 594	100	7 533 095	5. 32	3
1886	166 517 048	100	7 127 473	4. 62	3
1887	190 356 344	100	3 534 121	2. 13	4
1888	219 227 710	100	4 143 138	2. 18	4
1889	210 208 738	100	5 581 695	2. 55	4

^① 参见《武汉市志·对外经济贸易志》，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86~87、94~95 页。

从表 1 可见，在这一段时期内，汉口的直接对外贸易，大多数年份位居第三，已经是一个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但从占全国的比例来看，份额很小，浮动于 0.41%~5.32% 之间，既不能与上海相比（同期上海占 47.85%~63.63%），也与位居第二的广州有较大的差距（同期广州占 10.50%~13.39%）。这种直接对外贸易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地势使然。

汉口在这一时期的间接对外贸易，则如下表：

1865~1889 年汉口间接对外贸易额与位次
表 2 1865~1872 年为（上海）两，1873 年后为海关两

年 份	汉申津穗进出口总额（两）	%	汉口进出口额（两）	占总额 %	位次
1865	96 062 331	100	23 245 273	24.20	2
1866	109 947 343	100	30 911 218	28.11	2
1867	107 546 557	100	30 537 026	28.39	2
1868	118 141 066	100	30 410 181	25.79	2
1869	115 599 973	100	31 049 674	26.86	2
1870	113 729 983	100	33 766 249	29.69	2
1871	138 583 592	100	39 524 205	28.52	2
1872	133 597 566	100	36 092 343	27.02	2
1873	118 022 106	100	36 339 577	30.79	2
1874	111 577 189	100	33 161 565	29.72	2
1875	119 669 205	100	32 955 514	27.54	2
1876	137 244 179	100	33 580 934	24.47	2
1877	125 793 283	100	29 396 672	23.37	2
1878	122 761 948	100	29 488 544	24.02	2
1879	137 836 085	100	36 194 494	26.26	2
1880	148 919 738	100	42 285 209	28.39	2
1881	152 952 772	100	41 599 591	27.20	2
1882	135 912 918	100	34 342 894	25.27	2
1883	125 717 592	100	35 354 885	28.12	2
1884	124 500 863	100	33 871 881	27.21	2
1885	143 557 587	100	38 247 658	26.04	2
1886	150 815 700	100	34 191 477	22.67	3
1887	152 037 522	100	33 888 944	22.29	3
1888	163 950 365	100	35 590 882	21.71	3
1889	168 677 013	100	37 610 898	22.30	3

如上,在这一时期,汉口的间接对外贸易基本上位居第二,仅次于上海,每年的间接进出口贸易额大致在2 300万两至4 200万两之间。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汉口的对外贸易是以埠际转口的间接贸易为特色的。

上述可见,汉口开埠后,武汉的早期现代化开始启动,在对外贸易方面,尤其是间接对外贸易,走在了全国开放性城市的前列。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武汉的早期现代化还只是初始性的,在许多方面还存在着不足及滞后现象。汉口开埠后,没有很快出现像上海开埠后那样令人瞩目的变化,开埠后的20多年间,近代工业格局迟迟不能形成。到1989年张之洞督鄂前,洋务派在全国各地,包括上海、天津、福州、南京等沿海沿江城市,甚至诸如西安、兰州、长沙、济南、昆明、太原等内地尚未开埠的城市,创办的军事企业达20个,武汉没有一个。同期,洋务派在各地所办的学堂也达20所,武汉也没有一所^①。这正标示着武汉早期现代化在启动阶段的弱势以及发展的不平衡。

从历史的长时段考察,张之洞督鄂期间,武汉的早期现代化开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武汉的城市转型开始进入关键时期。

(三) 张之洞督鄂与武汉早期现代化的快速发展

1889年张之洞的督鄂,是武汉历史发展的又一个重要界标。苏云峰所谓“张氏抵鄂之年,应为湖北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起点”^②,虽是就湖北而言,实则依武汉立论。

张之洞督鄂期间(1889~1907年),武汉的早期现代化进程明显加快,国际性城市的轮廓开始显现。其主要表现可以概括为以下数端。

第一,武汉的传统商业优势进一步发挥,并由内贸型的商业重镇一跃而为国内屈指可数的国际贸易商埠。从传统商业方面来看,以汉口的米谷年均流量为例,张之洞督鄂前的1881~1890年为67 362担,1891~1900年即增长为507 630担,1901~1910年更增长为1 073 185担^③,增长幅度明显,成为国内最大的米谷集散中心^④。从国际贸易商埠方面来看,汉口的直接对外贸易,在张之洞督鄂前,汉口在全国四大商埠(上海、武汉、广州、天津)中虽已位列第三,但进出口额只有数

① 参见李宪生:《两次世纪之交武汉的对外开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8页。

② 苏云峰:《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 1860~1916·湖北省》,台湾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981年。

③ 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37页。

④ 日本学者根岸佑在《清国商业综览》中亦称:“从汉口沿长江而下至上海、华南、华北,以及逆汉水而上至陕西、甘肃,调出大量米谷来看,无疑汉口集散的米谷数量要比上海、芜湖多。”

十万两、数百万两不等，到 1903 年已突破 1 200 万两，1905 年更突破 3 500 万两；汉口的间接对外贸易亦然，张之洞督鄂前，间接贸易进出口最高数字是 1880 年的 4 200 余万两，而 1899 年达到 6 700 余万两，1904 年已突破 1 亿两大关。无论是直接贸易还是间接贸易，都有了数倍的增长。以至有人声称：“汉口商务在光绪三十一二年间（1905 年、1906 年），其茂盛较之京沪犹驾而上之。”^① 武汉对外贸易的发展，与此一时期外商的大举进入也有密切的关系。据统计，1892 年在汉的洋行数为 45 个，人数为 374 人，1901 年洋行数为 76 个，人数为 990 人，1905 年洋行数达到 114 个，人数达到 2 151 人。除洋行外，还有许多外国商号。1905 年，汉口洋行和外国商号最多时达 250 家，其中日商居首，有 74 家，英商 57 家，德商 54 家，美商 22 家，法商 20 家，俄商 8 家，丹商 5 家，比商、印商各 3 家，瑞商 2 家，葡商、菲商各 1 家。^②

第二，武汉的近代民族工业起步，并得到迅速发展；城市的经济功能，由商业独秀到工商并重。张之洞先后创办汉阳铁厂（1890 年）、湖北枪炮厂（1890 年）、大冶铁矿（1890 年）、湖北织布局（1890 年）、汉阳铁厂机器厂（1892 年）、汉阳铁厂钢轨厂（1893 年）、湖北缫丝局（1894 年）、湖北纺纱局（1894 年）、湖北制麻局（1898 年）等近代企业，占同期全国新建官办与官商合办企业的 24%，为全国之冠^③。同时，张之洞倡办实业，亦促进了民办企业的发展。1897 年民族资本家宋炜臣兴办的汉口燮昌火柴厂，年产火柴 1 亿盒，是全国最大的火柴厂。据统计，至 1911 年，武汉有较大型的官办、民办企业 28 家，资本额达 1 724 万元，在全国各大城市中居第二位。

第三，张之洞改书院、兴学堂、倡游学，使武汉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近代教育体制。传统的书院教学以研习儒家经籍为主，张之洞致力于书院改制，相继对江汉书院、经心书院、两湖书院的课程作出较大调整，各有侧重，以“造真材，济时用”为宗旨。在兴办新式学堂方面，其创办的算学学堂（1891 年）、矿务学堂（1892 年）、自强学堂（1893 年）、湖北武备学堂（1897 年）、湖北农务学堂（1898 年）、湖北工艺学堂（1898 年）、湖北师范学堂（1902 年）、两湖总师范学堂（1904 年）、女子师范学堂（1906 年）等等，则涵盖了普通教育、军事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等层面。在“游学”方面，湖北是晚清派出留学生最多的省份之一。到 1905 年，仅留日学生就达 1 700 余人，居全国之冠。张之洞督鄂期间，湖北武汉已成为新式教育的中心和国人瞩目之区。一如端方在光绪三十年（1904 年）所奏：“近日

① 《民立报》，1911 年 3 月 4 日。

② 皮明麻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27～128 页。略有订正。

③ 参见罗福慧：《湖北通史·晚清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27～230 页。

中外教育家，往往因过鄂看视学堂，半皆许为完备。比较别省所立，未有逾于此者。”^①

第四，外国银行在汉设立的分支机构增多，国内银行开始出现，武汉成为内陆地区的金融中心。汉口开埠之前，武汉尚无现代意义上的金融机构，1861年英国汇隆银行在汉口设立分支机构，开外国银行在武汉开设分行之先河。此后以迄张之洞督鄂前，先后有英国麦加利银行（1863年）、英国汇丰银行（1866年）、英国有利银行（1866年）、法国法兰西银行（1876年）、英国丽如银行（1877年）、英国阿加刺银行（1880年）等在汉口开设分行。张之洞督鄂期间，随着汉口工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除了传统的英国银行外，德国的德华银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俄国的道胜银行、日本的正金银行等也纷纷来汉设立分行。同时，中国通商银行（1897年）、中国银行（1905年）、大清银行（1906年）、浙江兴业银行（1906年）等也在汉口开业。这些现代性的金融机构与传统的钱庄、票号、钱铺等民间金融机构共同构筑起武汉的金融大厦，成为武汉工商业发展的重要支撑^②。

第五，交通运输业空前发展，奠定了武汉现代交通运输的基础。张之洞由广东移督湖广的直接原因就是卢汉（卢沟桥至武汉）铁路的修建，所以张之洞对修建铁路用力甚勤。在张之洞的督办下，1906年，汉口至北京正阳门全长1200余公里的卢汉铁路通车，并改称京汉铁路。京汉铁路的贯通，不但使武汉的货物流通更加畅快，而且使武汉的地位更加凸显。一如孙中山所说：“武汉者……中国本部铁路系统之中心，而中国最重要之商业中心也。……汉口更为中国中部、西部之贸易中心，又为中国茶之大市场。湖北、湖南、四川、贵州四省，及河南、陕西、甘肃之各一部，均恃汉口以为与世界交通惟一之港。至于中国铁路既经开发之日，则武汉将更形重要，确为世界最大都市中之一矣。所以为武汉将来立计划，必须定一规模，略如纽约、伦敦之大。”^③ 铁路之外，此一时期的水路交通运输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1863年美国旗昌轮船公司的“惊异号”进入汉口港，开辟沪汉航线后^④，英、法、德、日等国的轮船公司也以汉口为中心，开辟长江航线，经营轮运。1905年，日本大阪商船会社又开辟了汉口至神户、大阪的直达航线，使汉口港成为国际港。至清末，由汉口驶向国外的轮船，已可直达德国的汉堡、不来梅，荷兰的鹿特

① 《光绪朝东华录》（五），第5165页。

② 另据已有的研究，20世纪初，武汉的金融业进入兴盛时期，至1925年，武汉的本国银行发展为32家，与当时的140家钱庄和15家外国银行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保险公司和信托公司等机构也相继设立。金融机构不仅数量多，而且有的本国银行成为管辖行或区域行，金融活动和资金流通的领域日益扩大。参见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金融历史研究室编：《近代中国的金融市场》，中国金融出版社1989年版，第102页。

③ 孙文：《建国方略》，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07页。

④ 参见罗福慧：《湖北通史·晚清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6页。

丹,埃及的塞得港,法国的马赛,比利时的安特卫普,意大利的热诺瓦等。而1875年招商局在汉口设立轮船公司,则标志着民族轮船运输业在汉口的立足。以轮运为主导的水路开辟,使长江航道变成黄金水道,也使武汉自古以来的水运优势跃上一个新的台阶。

无疑,张之洞督鄂期间,武汉商业、工业、教育、金融、交通等方面的迅速发展,是武汉城市现代化的重要标示,也使武汉的国际性城市进程经历了一个关键时段。

(四) 结 语

明清时期,特别是张之洞督鄂时期,武汉形成了她的风骚独领的特色——由商业名重天下到全方位综合发展。由此,武汉也铸就了她的历史辉煌。

考察历史,我们所能得到的启示是什么呢?

就其要者,可以归结为三:

第一,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武汉地处华中腹地,素有“九省通衢”之称,在古代与近代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凭借汉水、长江之利,可以内进外出、通江达海,成为商业贸易的集散地。这就是《汉口小志·商业志》已经指出的:“汉口贸易年见繁盛,盖以运输便利也,此地为中国全国之中心,水路四通八达……中国内地商务实以此地为要冲。”1949年出版的《武汉概况》也明白表述:“汉口为国内主要的物资集散城市,向有九省通衢的称号,湖北、湖南、江西、河南、四川、甘肃、陕西、云南、贵州物产,都集中于汉口而为分配,九省需要物质亦经汉口取给。商圈的广大,国内很难找出第二处。”可以认为,明清时期商业的繁盛,主要是凭藉了这种条件。汉口开埠至张之洞督鄂期间商贸的扩大与国际性商埠的形成,也与此息息相关(另一方面,当时的国际贸易以间接性贸易为主、以直接性贸易为辅,也是限于地势)。

第二,张之洞有能力、有魄力,得到清廷的信任和支持,能干他想干的事。换句话说,没有张之洞也就没有晚清武汉及湖北的发展。用“人来政兴”概括是贴切的^①。1861年武汉开埠,是一个历史的契机,但武汉开埠后,却没有像上海、广州、天津、南京那样发生显著的变化。到1889年张之洞督鄂前,武汉竟没有创办一家官办企业(1884年,湖北总督卞宝箴筹建湖北机器局,但胎死腹中),也没有兴办一所近代性的学堂,即使是有传统优势的商业也无法与后来比拟。这显然不是历史厚此薄彼,而是主政者使然。实际上,关乎此点,时人已经注意到:“武昌无

^① 赵德馨、周秀鸾:《张之洞与湖北经济的崛起》,见《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中华书局1999年版。

疑将成为中国极重要的城市之一，因为自从张之洞调任湖广以后，已将他原来打算在广州进行的一些庞大建设计划全部移到了武昌。”^① 近代武汉的发展滞后与经济的第一次腾飞视主政者为转移。

第三，制度创新是关键。所谓的全国范围的“晚清新政”或湖北一区的“湖北新政”都有一个制度创新问题。新的事业或社会经济的新发展，必须要有新的政治机制予以保证。张之洞任职两广时，即已筹谋“效西法图富强”的新政，只是没有督鄂时的力度大。据统计，张之洞督鄂期间，设置各类新机构 36 个，其中 25% 是按清廷的指示而设，75% 是出于工作需要而设^②。明确标示出张之洞的自主性和创新性。从新设机构的性质来说，属于教育、文化的机构 3 个，属于财政金融的机构 5 个，属于军警司法的机构 6 个，属于农工商及交通管理一类的机构最多，达 23 个。也明确标示出张之洞兴办实业的努力。有些机构的设置，在全国具有示范性，如 1902 年为推广新学制而设立的“学务处”，比清廷的有关规定早了一年多。新机构的设置，既是张之洞锐意创新的标志，也是张之洞推行“新政”的重要手段。

^① 《捷报》，1890 年 7 月 11 日。

^② 罗福惠：《湖北通史·民国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00 页。

二、汉口：近代前夜的社会保障

中国传统社会有无近代化及近代化的时限问题目前学术界尚颇有争论，但不可否认，明清以来的汉口在经济和社会变迁方面确有许多不同于“传统”之处：这里在明弘治时已是“千穰万舶之所归，货宝奇珍之所聚，洵为九州名镇”^①；清代中叶更盛为“天下四聚”之一^②；咸丰朝被增辟为对外通商口岸后，贸易额激增为“清国要港之二”，被艳称为“东方芝加哥”^③。以此，明清以来汉口工商业的发展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并涌现了一批有分量的成果^④。但是，似乎很少有人思考这样的问题：汉口经济“高速”增长中所产生的社会问题是如何解决的？换言之，汉口在几百年的经济发展中是依靠什么样的社会保障机制来维持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基本稳定的？本文将在这方面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社会保障一词虽来自于西方，但我国自先秦时就已有了社会保障的思想和实践。只不过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与传统的社会保障不可同日而语，现代社会保障大体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优抚、社会福利及社区服务等内容，它是一个以法律为依据的完备保障体系。古代的社会保障主要基于人民基本生活问题的解决，社会救济是它的核心内容。但是即使当代号称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也是以保障人们的基本生活为出发点的^⑤。汉口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中城市化水平较高、近代化步伐较快的城市，在传统的社会保障网络中也蕴含了现代社会保障的某些雏形。汉

① 范锴：《汉口丛谈》卷3。

② 刘献廷：《广阳杂记》卷4。

③ 民国《夏口县志》卷12，《商务志》。

④ 主要如：吴量恺：《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石莹：《清代前期汉口的商品市场》，《武汉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清代前期汉口的币材市场与宝武局铸钱》，《湖北大学学报》1993年第5期；郭其耀：《武汉最早的外商工厂——俄商砖茶厂》，《武汉工商经济史料》第二辑；范植清：《鸦片战争前汉口镇商业资本的发展》，《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任放：《传统市镇近代化刍论——以汉口为个案的研究》，《人文论丛》2000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杜七红：《茶叶与清代汉口市场》，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9年）等。

⑤ 关于现代社会保障与传统社会保障的关系问题，作者另有专文论述，此处不展开。

口的社会保障模式可以作为同代中国较发达地区特别是城市社区社会保障模式的一个代表。本文在借用现代社会保障理论的同时,主要运用历史的实证的研究方法,以史料为依据,忠实地再现汉口传统社会保障的原貌,探究传统城市社区社会保障的特点。

(一) 汉口近代化中的社会问题

1. 灾害引发的社会问题

由于自然的和人为的原因,明清两朝,武汉地区灾害频繁,这些灾害不仅直接破坏汉口的商业和城市,还造成诸如人民失所、贫困、饥饿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成为汉口发展的障碍,也对汉口的社会保障事业提出了迫切的要求。现分述如下:

(1) 水灾

汉口“襟江汉汇流,经途八达”的地理位置无疑是它赖以兴盛的基础,但恰恰也是这样的地理位置为它埋下了被水灾困扰的隐患。汉口城市兴起和发展的历史也是一部防灾抗灾的历史。我们今天所通称的汉口肇始于明成化初年的水灾,这次水灾造成汉水入江口改道,使汉水以南崇信坊一带当时被称作“汉口”的市区残破^①,而使汉水以北地区获得了发展机遇。对此唐裔潢《风水论》叙述得非常明白:“明成化初,水通前道,故河遂淤,于是汉口有兴机矣。盖汉口初一芦洲耳,洪武间,未有民居。至天顺间,始有民人张添爵等祖父在此筑基盖屋,嘉靖四年丈量,上岸有张添爵房屋六百三十间,下岸有徐文高等屋六百五十一间,汉口渐盛。”^②不过此时汉水北岸地带地势低洼,“汉水经其南,湖水绕其北,大江横其东”,“每值夏秋水涨,四面巨浸”^③,汉口市镇的扩展只能在地势较高的有限地区,直到崇祯八年(1635年)“袁公堤”的修建才基本解决了该区湖水南侵的问题,商业和市镇得以快速发展,出现“民居鳞比,十倍于前”的情形。与快速的经济发

展相比,汉口的堤防水利建设明显处于滞后状态,明清两朝,汉口足以载入史册的水利工程仅袁公堤、张公堤两项,即使素为人称道的袁公堤也“岁加修筑,终未完固,水势若虐,即虑汎溢云”^④。由明至清几百年间,汉口始终没有摆脱水患的困扰,兹根据民国《夏口县志》的记载将明天顺至清宣统间汉口地区的水灾情况列表如下:

① 关于明代汉口市区的范围,清人王葆心有较详的考证,参见王葆心:《续汉口丛谈》卷1。

②③④ 范锺:《汉口丛谈》卷1。

表 1 明清汉口的水灾及社会后果

被灾年份	灾况及社会后果	被灾年份	灾况及社会后果
明天顺七年	大雨，庐舍漂没，民皆依山露宿	康熙四十四年	水
成化三年	江水决口堤岸迄汉阳长八百五十丈有奇	康熙四十八年	水
同化七年	水	康熙五十三年	水旱灾
同化十四年	汉水溢入汉阳城，漂溺田庐	康熙五十四年	水
弘治七年	大水	康熙五十五年	水
弘治十五年	大水	康熙五十九年	水
正德二年	水，田鼠害稼，饥	雍正四年	大水
嘉靖六年	大水	雍正五年	春大雨兼旬，江水溢灾
隆庆五年	大水	乾隆七年	水灾
万历十九年	大水	乾隆二十九年	水
万历二十年	大水	乾隆三十二年	水
万历二十一年	大水	乾隆三十四年	水
万历二十七年	大水	乾隆四十七年	水
万历三十年	大水	乾隆五十三年	大水
万历三十五年	大水	乾隆五十六年	水
万历三十九年	水	道光十一年	大水
崇祯二年	大水	道光二十一年	大水
崇祯五年	大水庐舍田畜漂溺殆尽	道光二十八年	大水
清顺治二年	大水谷种石价贵至四两	道光二十九年	大水较乾隆戊申尚大五尺
顺治六年	水	同治九年	大水
顺治十一年	汉水决于沙阳湖	光绪四年	大水
顺治十五年	水	光绪十五年	八月大雨至九月二十六日止，县境俱成泽国，无薪为炊
康熙二年	大水	光绪二十一年	襄河水涨，人民之溺毙者无数
康熙七年	水	光绪三十四年	襄河水涨，停泊河船损失无数，人民亦多溺毙
康熙三十五年	大水		

资料来源：民国《夏口县志》卷 20，《祥异志》。

(2) 火灾

“楚介南服，火德居望。而汉镇又适当五达之衢，黔庐赭壁，何时蔑有？”^① 明清时期，火灾也一直威胁着汉口。民国《夏口县志》记录了自明弘治朝至清光绪朝的较大火灾 16 次，清人王葆心在列举了明万历至清乾隆的十几次火灾后说“至近百年，则无论乱世平世，火灾已成恒事，有不胜列举者”^②。由于汉口市镇完全是在商人的自由竞争中形成和逐步扩大的，市区建设毫无规划可言（晚清外国的租界除外），市廛密集，又有竹篱茅棚错杂其间，因此每当火灾发生，极易蔓延到更大的区域，形成更大的灾情。正如王葆心所言，“汉口市廛始盛于明，其火灾之多且巨亦肇于明”。现选择其中记录较详的几次，将灾情灾况及火灾所造成的社会后果列表如下，借此窥测汉口火灾的危害程度：

表 2 明清汉口的火灾及社会后果

被灾年份	灾况及社会后果
万历三十六年	“此次火灾，直由今山头西上，至东门以迄南门，其巨可想。复继以巨浸”，致使“万户鳞集山居，民复疫病……市镇屋舍倾圮无数，流离饿殍以数万计”
康熙二十六年	江口火，烧回龙寺，四官殿庙宇及房屋计数千家，焚溺人民何止千百
乾隆三十年	汉口粮艘火，湖南粮舟停泊盐店，火延烧十三艘
乾隆三十一年	由义坊火延及大智坊之杨林口至无人居之处方止，毙于水火者甚众
乾隆三十三年	江口复失慎，延烧南岸湖南粮船及红船客舟甚多，死者至惨
嘉庆十五年	延烧殆数万家，街市中截，弥望尽成焦土……其时遍地皆小鼠，长不盈咫，或白昼游行，见人亦不甚畏避
咸丰乙卯年	官兵与粤贼战汉口，自七月十五日至二十五日，均用火攻，居民罹此劫，是巨灾之又一也
同治五年	汉口镇火，一月凡六次
光绪十一年	汉口大码头火，是时风疾，火猛焚，北岸房屋约三百家，河船凡七十余只，并延烧南岸人家无算
光绪二十四年	汉口大火，延烧数千家，人畜焚死无算
光绪二十五年	汉口复大火，延烧计千余家
宣统三年	清军在汉口华界纵火，自张美之巷起至五显庙一带，凡四昼夜。统计华界房屋，烧去十成之九，汉镇精华，至此殆尽

资料来源：民国《夏口县志》卷 20，《祥异志》；民国《汉口小志》，《轶闻志》；范锺：《汉口丛谈》卷 1；王葆心：《续汉口丛谈》卷 1，《再续汉口丛谈》卷 1。

① 范锺：《汉口丛谈》卷 2。

② 王葆心：《再续汉口丛谈》卷 1。

(3) 其他灾害

除了水火二灾之外，风、冬、旱、疫、饥等灾害也不断侵扰汉口，造成社会问题。民国《夏口县志》共载有明清两代除水火之外较大的自然灾害近 50 次。现选择对汉口城市生活造成较大危害的若干灾害列表如下：

除此之外，迭起的兵祸也是汉口社会问题的一大根源，如论者所言，“汉郡襟江汉汇流……迭为战场，唐宋则朱粲、杨太；元则徐寿辉、陈友谅；明则刘六、周清、张献忠辈剽掠，没以肆其虐，世愈近，祸愈烈……”仅咸丰年间，在与太平军的战斗中死乱，“获与旌恤祠祀者，盖以一万计”^①。

表 3 明清汉口的其他自然灾害及社会危害

受灾年份	灾况及社会后果
明景泰四年	疫
天顺二年	自五月至九月不雨，人相食
天顺五年	十二月，地震
天顺六年	大雪，冰厚三尺
正德三年	大旱，饥，夏秋不雨，井泉竭
万历十六年	大旱，饥民采木皮以食，死者甚众
崇祯十四年	飞蝗蔽天，民大饥，谷贵石价白金一两
清顺治五年	昼晦，大风拔木，倾庐舍
顺治九年	自四月不雨至八月，民大饥，米石二两
康熙八年	大风拔木坏屋，江河溺死者无算
康熙二十九年	旱，饥
康熙四十七年	水、旱、虫、鼠四灾
嘉庆五年	岁饥
嘉庆十九年	岁饥
道光十二年	大疫，死者无算，有治沿途倒毙者，有阖门不起，货财充斥而尚待族邻故旧收埋者，自春徂夏，几半年，届秋始止
光绪十二年	大雪，平地六七尺，河港坚冰，上可通车，人畜及往来商旅冻毙于途者，尸骸相枕藉
光绪二十八年	黄沙蔽天，汉口大疫，人民死者不可胜计
宣统元年	汉口鼠疫，死者甚多

资料来源：民国《夏口县志》卷 20，《祥异志》。

① 光绪《汉阳府忠节全录》，《修汉阳府忠节祠记》。

2. 城市化中的社会问题

汉口自明中叶以来，城市人口和城区面积一直呈扩大趋势，特别是咸丰十一年开埠之后，城市化的步伐加快，与此同时，汉口的城市社会问题也日益凸现出来：

（1）贫富分化加剧

汉口的富商巨贾以奢侈的生活装点了城市的繁华：“服饰宴会，务为豪侈，歌馆舞台、茶寮酒肆之间，怡游者车水马龙，昼夜无有止息。”^①而背后的“隐情”为，“中产之家，勉强徇俗，惟务外饰，内鲜积藏，甚有典春衣而为之者，亦习俗使然也”^②。中产之家尚且如此，低收入水平的城市居民的生活状况可想而知。明清时期汉口社会各阶层的分布和演变的总体情况我们虽然不得而知，但《汉口小志》提供了晚清和民国初年汉口的职业构成情况，可以作为我们进一步认识城市的贫富分化问题的参照：

表 4 清末民初汉口的职业构成情况表

职业	人数（人）	职业	人数（人）	职业	人数（人）
政界	135	矿师	28	石工	384
军界	196	儒士	571	道士	195
警界	224	医士	401	僧侣	220
法界	97	种植	704	苦力	3 671
学界	205	畜牧	57	废疾	98
报界	33	挑水夫	820	土泥工	1 914
绅界	293	佣工	9 256	窑工	44
商界	30 990	使役	500	各实业工人	2 221
水手	324	厨役	3 203	小贸	9 464
划夫	1 479	美术	737	小艺	4 625
车夫	2 157	地理星卜	177	船业	251
轿夫	671	术士	47	洋伙	749
码头夫	7 914	教士	101	渔业	588
律师	20	机匠	640	乞丐	494
馆幕	60	金工	1 801	公差	487
司事	572	木工	3 507	优伶	109

资料来源：民国《汉口小志》，《户口志》。说明：另有无业者 4 579 人。

① 民国《湖北通志》卷 21。

② 民国《夏口县志》卷 2，《风土志》。

从表中的情况看,除了商界、绅界和军、警、法界的部分人可列入“资产者”行列之外,汉口城市人口的大部分是中产以下者,特别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工人、苦力、佣工和小商人等都是在贫困线上挣扎的阶层。根据苏云峰的研究,清末民初汉口普通工人的月工资水平极低,而同期铜钱贬值 18%~20%,米、盐等基本生活资料价格与日上涨,“因此即令一个单身工人,尚难维持这个水准(基本生活费支出),至必须维持家眷的则更加困难了”。光绪十九年(1893年),一位叫德金生的英国人描述了武汉工人的情况:“这些工人很可怜,因为他们瘦到只有皮包着骨头,50人里面也找不出一个体格康健的人。”^①至于中小商业者,在厘金开征之后,经常由于无力负担而发生抗税斗争,许多人因此而破产^②,这说明中小商人的生活境况并不乐观。一些贫穷无着的市民靠收集大酒馆的剩菜和捡地上的烟头加工出售来维持生活,进而形成了有汉口特色的“收杂菜业”和“捡烟头业”^③。

(2) 无业人口增加

无业人口包括乞丐、残疾、失业贫户等,素为汉口的城市社会问题,所谓“汉市殷盛,惰民流丐于此者滋多”。《汉口竹枝词》经常以无业人口为题材,诸如“乞丐盈街”、“紧闭帘栊防恶丐”及“三叉路口乞人拦,追索钱文不放宽,开发一人群丐集,施钱容易脱身难”^④等诗句真实再现了汉口街头的景象。形成汉口无业人群的渠道多种多样,除了本市的贫困和失业者外,外地流入的饥民也是汉口无业人员的重要来源之一,如嘉庆时,有淮河流域“逃荒者以十百计,乞食武汉间,内有无赖子,恃饥民之名,率妇女横逆汉口,市廛不胜其扰”^⑤。而每次水、火、兵灾所酿成的游民更是未可胜计,前述宣统辛亥年(1911年)的一次兵火,就烧去汉口商店民房数万家,使十余万人无家可归^⑥。晚清后,汉口的无业人口队伍中又增加了新失业的书吏差役、被裁士兵及被禁行业如禁馆的失业者。因此,汉口到底有多少无业人口和有多少游民混迹其间确实无法统计和估计,兹将时人对清末民初武汉无业及贫户人口的估计列表如下,以供参考:

① 苏云峰:《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 1860~1916·湖北省》,台湾近代史研究所 1981 年版,第 485~490 页。

② 参见罗福惠:《湖北通史·晚清卷》第一章,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③ 涂翔争:《汉口琐意》,《湖北文献》第 33 期,第 77~78 页。参见前揭苏云峰:《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 1860~1916·湖北省》,第 538 页。

④ 湖北省地方文献丛书《武汉竹枝词》,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⑤ 范锺:《汉口丛谈》卷 5。

⑥ 王葆心:《续汉口丛谈》卷 1。

表 5 武汉无业及贫户人口估计（1913 年）

无 业 者	人 口 数	户 数
残疾人口	——	
乞食人口	——	
极贫户	20 000 人	7 000 户
次贫户	30 000 人	6 000 户
失业书吏差役	5 000 人	
被裁士兵	5 000 人	
烟馆失业者	10 000 人	
官商办工厂停工失业工人	——	
合计	约 70 000 人	

资料来源：《时报》民国 2 年 1 月 10 日，转自苏云峰：《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 1860～1916·湖北省》，台湾近代史研究所 1981 年版，第 511 页。

大量的无业人口、贫户和游民充斥汉口，所形成的社会问题相当严重，成为社会正常运转的一大隐患。

（二）汉口社会保障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1. 政府的应急措施与富人的善举

汉口的商业地位与其行政地位极不相称，在明清的大部分时间里，它只不过是汉阳县所辖的一个市镇而已。在官方的社会保障体系中，汉口的社会救济事宜由汉阳县主理。官府既有的保障体系包括仓储、官办慈善机构及临时的救助措施等。

仓储制度是明清两朝较为完备的财政经济制度之一，官办的预备仓、常平仓以及官府倡办的社仓、义仓是比较常见的几种仓储形式，其主要功能有平糶、借贷、赈济等几项。汉阳县预备仓“在县治西南，明洪武初建，清康熙年间改建，每年额余谷二百五十石贮仓备赈”；便民仓“在大禹庙西南，明成化七年建”；常平仓“在城内建中坊西，雍正七年以通判旧署改建”，“常平额谷九万七千二百九十七石九斗一合五勺”；永绥仓“在署内后山隙地，光绪四年各县林瑞枝建”；社仓有新旧社仓，旧社仓“康熙间分设各坊，知县陈尧钦建”，新社仓“凡二十七”^①。

① 民国《湖北通志》卷 48，《经政六》。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仓储体系一般在王朝鼎盛、仓谷充足的时候才能正常发挥作用,就其赈济功能而言,也只有在各类自然灾害发生时才临时开仓赈济或设粥厂使饥民就食。考《续文献通考》和光绪《大清会典事例》有关湖广仓储的记载可知,明清两朝两湖地方官对朝廷仓政推行比较得力的是明洪武时期和清康、雍、乾三代。清中后期,汉阳县上述各仓储除常平仓外悉皆废弃。常平仓“道光二十九年清查存谷六千一百石,咸丰二年被掠,六年清查无存”。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汉口设厅,阳夏分治时的情况是“汉阳县仓储时已无存,无从分拨,分治后亦未另建仓廩”^①。

明清官办的慈善机构主要包括养济院、漏泽园、普济堂、棲流所、育婴敬节堂等,是政府设立的专门用来收养鳏寡孤独贫病流寓等社会弱者的机构,它们是统治者标榜其“仁政”和“爱民”思想的重要恤政之一,最高统治者经常为此颁布诏令。“明洪武二年,令天下置养济院以处孤贫废疾者”;“宣德二年令天下设惠民药局给与贫病者,设养济院以待民生无养、死无葬者”;“顺治四年,令天下立漏泽园”^②。盛世时期许多谕令具体到了州县一级,与汉阳、汉口有关的主要有以下几条:“乾隆元年,谕各省府州县皆有养济院以收养贫民……又议准湖北省孤贫口粮每岁给银一两八钱,布花银三钱,共银二两一钱”;同年“议准各省会及通都大郡概设普济堂,养赡老疾无依之人”;“乾隆四年议准:湖北省汉阳县育婴堂一所,每日所需息捐二项银两实不敷用,在司库商捐银内动给银三万两为育婴生息动用”;“乾隆六年议准湖北省汉口镇普济堂动用商捐生息银”;“乾隆十年覆准,孝子节妇中有食贫守志难以存立之人,或至饥寒失所,较之泛常孤贫尤宜矜恤”^③。皇帝的这些诏令在基层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推行。汉阳县在西阳坊设普济堂,“额养孤贫二十六名,共银五十四两六钱”;在县署西北建恤孤局,“道光十一年大水圯,知府沈兰生、知县史礼贤重修”,后又移于西门外,“咸丰兵毁后即旧址重建为孤贫院”。该县的育婴堂始建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由知府张廷庆、知县梁瑛募建,乾隆皇帝下达谕令后,正常运转了一段时间,始因经费问题停废。同治八年(1869年)时的知府钟谦钧又重新倡建,并在育婴堂后建敬节堂,设义塾。此外,汉口还有普济堂一座,“在大智坊,乾隆二年知府胡学建成”^④。

官府的救济体系能否发生作用,除了受财力限制之外,还与地方官的才干和能力有莫大的关系。如果地方官平庸软弱,即使身逢盛世,完备的救济设施也不一定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反之,如果地方官贤能敬业,即使财政困难,他也能有效地调

① 民国《湖北通志》卷48,《经政六》。

② 民国《湖北通志》卷49,《经政七》。

③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269,卷270《户部·蠲恤》。

④ 民国《湖北通志》卷49,《经政七》。

动各方面的力量,将社会救济事业办得有声有色。因此,在传统社会中,官方社会保障体系的运转和发挥作用常常表现为以地方官为核心而推行的各项政策或实施的应急措施所带来的效果。汉口也不例外,以火灾的防患为例,汉口多火灾,“人共知其为竹篱茅舍己之所致,而终莫敢有建议毁易者。盖凡民可与乐成,而难与虑始。自非有实心任事之监司,主持其上,奉行惟谨之守令劝勉于下,求其能任德任怨也,戛戛难之”,但当程衡为守宪之时,“毅然下诛茅之禁,檄行郡县,易以瓦甍”,在太守、邑侯、县尉及镇司等官员的配合下,终于在“旬月之内,向之黄茅白苇,一望而百堵皆兴”。时人叹曰:“苟非循良素著,何以得此于民哉?”“天佑南国,萃此吉人!”^①再以育婴敬节堂为例,晚清特别是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官办的各类善堂纷纷废弃,但在汉阳知府钟谦钧的极力倡导之下,汉阳的育婴敬节堂却呈复兴的趋势,“兵燹后善堂规模式廓者,曰敬节育婴堂……其敬节章程有内堂外堂之分,内堂九十六间,青年节妇居之,月有饷;外堂则孤贫老妇,月助钱四百文,以三百口为率”^②。其规模超过了盛世之时。但钟守升迁广东之后,其堂事又渐衰。类此有作为而对汉镇社会救济有所贡献的地方官史籍中常有记载。如顺治时的总督佟鼎,“见善如不及,一民饥曰我饥之,一民寒曰我寒之,一民失所曰我失所之”^③。顺治时知县金渐皋,“性仁慈,遇歉岁捐俸以赈饥民。其修学课士于贫而有行者,增给膏火”^④;道光年间裕泰为总督时,楚省灾害频繁,“其时裕泰官楚督者十年,为民事之章数十上”,道光二十年(1840年),对濒江各属流入江汉之流民,“裕督禁止截留,即汉口设厂收养,秋冬间,全活十余万人”。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又“筹捐收养江汉等处被水棚民”^⑤。晚清时的名督张之洞也在汉口的社会救济事业留下了声名。如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他在硚口居仁门创设劝工院,被称为“硚口贫民大工厂”,成为民国时贫民工厂的前身;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前后,水患荒灾叠见,他实施“以工代赈”的办法,奏请清廷拨银15万两,招少壮灾民数万,筑汉口官堤30余里,称为“张公堤”。凡此种种,俱为人所共知。

在民间会馆、善堂等组织出现之前,一些富人义士的善举在社会救助中起了很大的作用。邬光德父子是志书中经常被提及的名字,“汉口有父子两世行义者,莫如邬光德父子。……雍正五年岁歉,流民四集。光德建席棚百间,使得棲息,出粟以取官赈。曹庄濒水,捐筑长堤数百丈,设义渡、建石桥、置义冢。隆冬施衣煮粥,以拯贫民。又捐田二十石,银数万两,为普济、育婴二堂费。汉口镇市廛稠

① 范锺:《汉口丛谈》卷2;王葆心:《续汉口丛谈》卷1。

② 光绪《汉阳县志》卷2,《营建略》。

③ 范锺:《汉口丛谈》卷2。

④ 光绪《汉阳县志》卷3,《人物略》。

⑤ 王葆心:《续汉口丛谈》卷2。

密，一失火，则蔓延不止。光德买民房当冲者拆为火巷，今大兴巷、大享巷是也”，“子明适，能继父志……岁歉，屡捐余为粥”^①。一些外地客居汉口的绅士、商人也多行义举。据《扬州府志》记载，扬州人李茂“尝客居汉口，人烟稠密，多迫于火灾，茂赎民舍若干楹，辟巷里许，名曰永宁。全活甚众……”永宁巷因此而得名^②；《抚州志》载，金谿人谢梦兰，“客汉镇，见下关荒冢累累，积骸遍野，惻然以二千金倡捐，置义山葬之，复立庙于八角亭，风棺廓祭葬事，设人经理，自是客死者无暴露之患。复修波源桥路十余里，费千金”^③。总之，这些为富“能”仁的绅士或商人在地方救济系统中的作用不可低估，因为一方面，他们全面介于地方的救助活动，可以补政府救济的不足，另一方面，像邬光德这样的殷实的“慈善世家”，往往成为官办慈善机构的直接经费来源。

2. 会馆、公所的兴起及社会保障功能

汉口因商业而兴盛，外来人口构成了市民社会的主体，叶调元有竹枝词云：“茶庵直上通硃口，后市前街屋似鳞。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④这首词十分形象地展示了汉口外来人口高密度集结的社区特点。另据统计，“在十九世纪这一时期中，外来户约增至占总户口的70%~80%，而堪称汉阳本籍在汉口营业的土著户则不过20%~30%左右”^⑤。这些来汉经商的客籍户，脱离了所生所长的原籍乡土社区，也就失去了原宗族共同体或乡土共同体的庇护，如何应付关系复杂的商业经营和激烈的商业竞争以维护自身的利益，成为大多数客籍商人共同关心的问题。这正是会馆兴起的内在需要。汉口会馆始于明末^⑥，到康熙中期政局稳定之后，会馆、公所的建立更是相竞成风，直到晚清其势头一直不减。据民国《夏口县志》记载，民国初年汉口有年代可考的馆、所共计123所，其“未详建设年代者”还有56所^⑦。会馆的职能范围和社会影响也日益扩大，几乎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个方面，而会馆的社会保障功能也正是伴随会馆的兴起和发展过程不

① 王葆心：《再续汉口丛谈》卷1。

② 《扬州府志》卷52，《人物》，王葆心：《再续汉口丛谈》卷3。

③ 光绪《抚州志》卷68，《人物志》，王葆心：《再续汉口丛谈》卷3。

④ 湖北地方古籍文献丛书《武汉竹枝词》，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⑤ 彭雨新、江溶：《十九世纪汉口商业行会的发展及其积极意义》，人大复印资料《经济史》，1995年第4期。

⑥ 张建民：《湖北通史·明清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71页。另，前揭《十九世纪汉口商业行会的发展及其积极意义》一文称：“汉口米业公所建于1687年（康熙十七年），是汉口第一个行会（也许是全国第一个）”；而民国《夏口县志·建置志》所列有年代可考的行会最早的是设于清顺治十三年药材行帮公所——三皇殿。

⑦ 民国《夏口县志》卷5，《建置志》。

断进步和走向完善的。

任何事物的兴起,除了内在的需要之外,尚须一定的契机或导火线。会馆也不例外,促使会馆产生的“引发事件”总是与社会救助联系在一起的,通常表现为对客居异地的同乡的一些偶发的救助行为,诸如对死者的施棺、义埋、运柩回乡;对生者的施诊、赠食、给寒衣等等。汉口会馆、公所的组织形式虽出现于明末清初,但在正式组织出现之前,一定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这种同乡间的相互扶持与救助频繁出现,并相沿成习。因为旅居他乡的人,时常会碰到生、老、病、死的威胁,当他们自身无法解决时,其救助义务自然会落到同乡的身上,罗威廉教授在《汉口》一书中有一章专门论述“乡籍在一个城市外来客民中的意义”,他指出,同乡人有着相同的乡音乡俗,以及相互可以牵连的远亲近戚或世代友谊的关系,甚至原不相识的人,只要是他乡相遇的同籍,便有一见如故的缘分。因此,凡遇到某些困难特别是营业亏损、金钱损失的时候,总会首先想到同乡人的可能帮助^①。许多会馆的成立,其初衷就是为了解决同乡的基本生活救助问题,如康熙年间由山西、陕西商人创立于循礼房的“山陕西会馆”,其宗旨即为“结合团体,维持公益”,清乾隆年间设立的“咸宁会馆”,“以联络同乡,维持公益为宗旨”;同治年间由湖南同乡捐建的“太平会馆”,其目的是为了“旅汉同乡维持公益,及会议本籍事件”;光绪时始建的“四明公所”也以慈善为目的^②。这种情况还可以在同期其他城市的会馆中得到印证:孔令奇注意到,清前期“苏州的许多行会都把举办慈善做为第一要务,甚至有的行会成立之初的目的就是为了互助”,如漆作业“众友为谋发扬互助精诚,并推行慈善事业起见……兴建集德公所”;梳桩公所“如遇有病无力医治伙友,由公所延医诊治给药,设或身后无着,给开衣食棺木,暂葬义冢”^③;清人杨荫杭在谈到上海的会馆时称“其始不过曰联乡谊、营慈善而已”^④。

清中叶后,汉口的客商纷纷成立商帮,兴建会馆、公所,一个商人如果不是某一会馆的成员已很难在汉口立足,此时“汉口成了数以百计的同乡会商业活动的集中舞台”^⑤。对于大多数会馆来说对同乡的救助不再是其主要目的,但这些同乡会馆一般都将联络乡谊、互相扶助作为基本职能之一。如“清康熙七年,徽属六邑仕商合组”的“新安公所”,其性质为“集合同乡,联络感情,力谋桑梓商业公益之所”;清康熙年间成立的“福建会馆”,其性质为“维持帮规,提倡实业,并举办慈

① 引自前揭《十九世纪汉口商业行会的发展及其积极意义》一文对原书该章内容的转述。

② 民国《夏口县志》卷5,《建置志》。

③ 引自孔令奇:《试论清前期苏州的手工业行会》,《社会科学战线》(长春),1994年第6期。

④ 杨荫杭:《上海商帮贸易之大势》,《商务官报》1906年8月14日。

⑤ 前揭《十九世纪汉口商业行会的发展及其积极意义》。

善诸端。为闽人自治自立之公团”；乾嘉年间由湖南辰州府属沅陵县商人发起成立的“伏波宫”（辰州公所），其宗旨为“联络乡谊，讲求商业，提倡本籍一切事宜”。同光时由黄冈、麻城、黄安三邑商人修竣的“帝王宫”（黄帮冈麻安三邑会馆）其目的为“冈麻安三邑旅汉同人联络、研究商务之所”^①。值得一提的是，会馆、公所对同乡的救助活动，已不限于上文所说的“奉生送死”诸端，而扩大到了更广的领域，如投资兴办义学，教育同籍客居者后代、资助“寒士”就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康熙时徽州商帮曾建“新安书院”^②；同治时，咸宁侨汉商人集资兴建淦川公所，后又改建为钟台书院，“诱诸巨商，凑贖购产，征租供给膏奖，择同邑旅汉之俊秀者，月而课之”^③；又民国初年，湖南宝庆会馆办有宝庆小学，还资助湖南会馆开办了旅鄂湖南中学（校址在武昌）^④。总之，同乡会馆在汉口的兴起和商业活动的组织化，使得客居汉口的外籍商民的基本生活保障问题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它已不再停留在那种由贵人偶发善心的“恩赐”行为上，而成为同乡商业组织的一项责任和义务。

随着会馆、公所的发展，在同乡会馆的基础上，出现了以行业为主体的行会组织。同乡会馆的社会救助功能就自然拓展到同业会馆中，这种拓展有时可能并没有扩大救助的范围，因为同乡同业的现象非常普遍，如湖北咸宁县在汉的七个茶叶商店因全销本地产品而结成行会，湖北黄陂人在汉口除按籍贯外又按行业结成行会^⑤。对这些行会来说，救济同业者与救济同乡是等义的。还有那些以本地特产或手工业品（如江浙的丝织品）销售为业的行会，其主体部分也是同乡同籍者，其中的少数外籍成员在与同籍成员的商业竞争中当然会处于不利地位，但当他们陷入困境，生活没有着落时，行会的固有的救助功能自然不会弃之不顾，主体部分的同籍行会成员也愿意对他们伸出援助之手。与同乡会馆相比，同业会馆的入会标准毕竟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不以乡籍为入会条件，只要生产或经营同一产品即可加入同业组织。这就导致了以业缘关系为主体的一批行会组织的产生。何柄棣先生认为，湖北在乾隆前后，行会、会馆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出现了跨地域的同业组织。如汉口杂货业在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由河内、武陟、温、孟四县经营西货、京货商号组成覃怀中州会馆，稍后又有专营南京一带杂货及海味的上元会馆^⑥。前引民国《夏口县志》所记载的有创立时间和沿革情况可考的123家会馆、公所中，至少有38家属于同业行会组织，如油业公所、烟帮公所、豆芽公所、皮货零剪公会等等，

①② 民国《夏口县志》卷5，《建置志》。

③ 王葆心：《再续汉口丛谈》卷1。

④ 《武汉文史资料》第15辑，第185页。

⑤ 参见前揭《十九世纪汉口商业行会的发展及其积极意义》。

⑥ 何柄棣：《中国会馆史论》，转引自前揭张建民：《湖北通史·明清卷》，第482页。

在 56 家无创立时间可考的会馆、公所中有厨业公所、米业公所、石灰公所等 10 家属于同业性组织。与同乡组织不同，这些以业缘为主体的同业组织成立的初衷主要是为了平息行业竞争，保护同业利益。但与同乡组织一样，它们也常常将加强同业间的联系，救助同业贫困者和参与社会公益事业作为一项基本职能。此时，会馆章程中“联络乡谊”的措词变成了“联络感情”。如道光十一年（1831 年）由熊允兴、罗长发等七人捐资兴建的“沙坊公所”，其性质为“五金矿沙业联络感情，整顿帮规会议之所”。光绪年间成立的“山货公所”也提出“研究商务，联合感情”的结会宗旨^①。罗威廉教授对汉口的行会进行了深入地研究，他将汉口行会的功能归结为四个方面，即：文化功能、商业功能、组织功能和群体服务功能。其中，群体服务功能“既包括对行会成员的服务，也包括对全部市民的服务”^②。可见，会馆和公所由同乡组织发展为同业组织，其救助功能并没有因此而减弱。救助对象由同乡发展到同行业的弱者，是汉口社会保障事业的又一进步。

汉口的行会以同乡、同业会员为主要的救助对象，但对组织之外的社会弱者和贫困现象也绝非袖手旁观，而是非常积极地投入慈善、公益事业。会馆、公所组织参与社会救助活动是与特定的时空密切相关的。特定的时间指汉口遭受前述各类灾害的特殊情况下，一些有力的会馆或会馆中有力的中坚商人，一般会自觉地参与救济活动。如嘉庆十五年，汉口大智坊发生火灾，“延烧房屋凡四百三十一家”，“由鹺商徐福曜等按户分给席棚，计共捐银三千二百两”；光绪十五年，“南皮张文襄公初督鄂时”，武汉地区水灾、风灾并发，当时“蒿目流亡，移民乏策”，全赖“武汉殷富绅商捐助”，“调查所搭席棚已达三万七千有奇”^③。特定的空间是指行会一般能对会馆和公所所在地附近的居民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有时这种帮助是与行会自身的利益相关联的，例如一些会馆为了防火的需要而出钱改建公所周围的街道，也有一些会馆通过赈济周围的贫民来树立自身的形象。但不管怎样，这些行为在客观上起到了社会救助和保障的作用。而且在清代特别是在晚清，行会关注社会公益的行为呈增长和扩大的趋势，并逐步走上正规化、制度化的轨道。罗威廉教授为我们揭示了这一过程：“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盐业公所（当时还是非正式的）建立了这座城市的第一所善堂，为贫困的街邻们提供食物，它标志着地方行会将慈善活动从会员推及邻近地区居民的行为走上制度化的轨道。他们的行为在三十至四十年代被其他的商业团体所模仿，特别是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近一百所善会、善堂出现在这座城市并正常运转，成为汉口城市生活的一道风景。”“从关心行会成员发展到进

① 民国《夏口县志》卷 5，《建置志》。

② William T. Rowe, *Hankow: 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89*,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289.

③ 民国《夏口县志》卷 20，《祥异志》。

而帮助行会所在地附近的居民是很小的一步，但也是意义非凡的一步”；不仅如此，行会还将他们“保护人”的身份日益延伸到整个城市^①。

通过以上的考察，我们不难看出，会馆、公所等行会组织，从接济同乡到抚助同业会员，从关心近邻到举办社会公益，在汉口的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中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

3. 善堂、善会的普及及社会保障的制度化

如果说汉口的会馆、公所只为同乡同业者提供了基本生活保障，那么善堂、善会则开始关注整个城市社区的社会保障问题；如果说行会的主要职能是商业功能，社会救助行为只是它的“副产品”，那么善堂、善会则直接针对社会问题，以社会救济和援助为主要目标。如前文所言，汉口善堂、善会等慈善组织的广泛兴起是晚清的事情，它标志着汉口社会保障事业的制度化。关于汉口善堂、善会的数量，民国时的几种记载略有差异，民国四年徐焕斗修《汉口小志》载有善堂、善会 30 处^②，而民国九年侯祖畚修《夏口县志》载有善堂、善会 45 处^③，参照其名称和地点可以看出，两者并非完全重复，而是互相交叉。稍晚的《武汉指南》所载汉口善堂达 90 余处^④，故此，清末民初，汉口的善会、善堂约在 90 处左右。为了进一步探讨汉口善会、善堂的分布、功能和特点，现依据民国《夏口县志》的记载，将汉口的主要善会、善堂列表如下：

表 6 汉口的主要善堂善会

名称	开办时间	坐落地点	名称	开办时间	坐落地点
自新堂	道光初年	后湖宝林庵侧	普化堂	光绪丙戌年	书巷
普善堂	道光二十七年	小江家垸	乐善堂	光绪甲申年	苗家码头
培德堂	咸丰七年	堡垣循礼门内	依善堂	光绪丙午年	横堤正街
从善堂	咸丰八年	杨干总巷	广济堂	光绪丁酉年	存仁巷内
道心堂	同治四年	白布街	慈善堂	光绪己卯年	仁里巷正堤
愿善堂	同治四年	送驾墩	宝善堂	光绪乙亥年	大火路堤外

① William T. Rowe, *Hankou: 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89*,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318~319.

② 民国《汉口小志》，《义举志》。

③ 民国《夏口县志》卷 5，《建置志》。

④ 周荣亚等编：《武汉指南》第四编，《公共处所》，民国 22 年版。

续表

名称	开办时间	坐落地点	名称	开办时间	坐落地点
公善局	同治五年	六渡桥	圣化堂	光绪庚子年	利济巷内
从仁堂	同治六年	旌德会馆正堤	化善堂	光绪戊戌年	尚义巷
复善堂	同治十年	利济巷堤街上首	保安堂	宣统元年	礄口正街
敦仁堂	同治甲戌年	苗家码头巷内	普济堂	民国二年	礄口外五甲
普安堂	同治丁卯年	至公巷	医心堂	民国二年	美人街
仁善堂	同治己巳年	大通巷中路	同德堂	民国七年	居仁门堤街
善实堂	同治壬申年	张美之巷	奠安堂		小关帝庙
安善堂	同治癸亥年	五彩正街老岸巷	万安堂		新沟正街
敦实堂	同治癸亥年	存仁巷内	义德堂		文家垵
培心堂	同治年间	洪益巷内	德善堂		貌儿湖
道生堂	同治年间	大董家巷内	普乐堂		蔡家沟
永安堂	同治年间	大夹街	友仁义社		华景街
卫生堂	光绪元年	仁里巷内	同善社		绍兴会馆后
镇安堂	光绪元年	存仁巷内	补济堂	同治四年	大智坊
慈济堂	光绪四年	花布街	惠滋堂	同治丁卯年	至公巷
真善堂	光绪初年	广益桥	济生堂	光绪壬午年	土垆闸口
仁济堂	光绪十五年	关圣庙正街			

资料来源：民国《夏口县志》卷5，《建置志·善堂》。

汉口民间善堂、善会的这种发展势头与传统官方慈善机构的命运形成鲜明的对比。以官办普济堂为例，据民国时的方志记载，“汉阳县普济堂，在西阳坊，久圯”；“夏口厅普济堂，在大智坊，乾隆二年知府胡学成建，今废”^①。到晚清，其“常经费由公家开支者仅官育婴敬节局一处，然款项支绌，已不及商办育婴敬节局之完备焉”^②。在其他方面民办善堂、善会也处处表现出与官办慈善机构的不同。从分布来看，上表各善堂、善会的坐落地点显示，商办的慈善组织上至礄口，下至日租界，覆盖了整个汉口城区，而尤以人口稠密的汉正街、花楼街一带为多，基本形成了慈善事业的“网络型”分布，与官办慈善机构分布的“点缀型”明显不同。

① 民国《湖北通志》卷49，《经政七》。

② 民国《汉口小志》，《义举志》。

此外,在救助功能方面两者也表现出了不同之处,一般而言,官办的慈善机构不外乎普济堂、养济院、育婴堂、敬节局等几项,每一机构所履行的慈善职能各有侧重,而商办的新型慈善组织则多为综合性慈善机构,一般履行综合性慈善职能。诚如《汉口丛谈》所言,“居斯地者,半多商贾致富,书奇风雅勿尚,故会馆公所之名、野墅琳宫之号、楹贴榜额之文,悉皆从俗,未能雅驯”^①。勃兴于晚清的汉口善会、善堂也不例外,多以“善”、“仁”、“济”、“德”、“道”、“惠”、“安”等字汇命名,直抒其慈善宗旨,其所行善举,“或则施棺送诊,或则抚恤孤嫠,或则收埋白骨,或则设船救生,或则惜字宣讲,或则兴学种痘,凡一切济众福民之事”都在其功能范围之内^②。与其慈善职能相对应,各善堂一般又下设“荒冢局”、“救生局”、“牛痘局”、“水龙局”、“义学”等下属机构。例如同治五年(1866年)创设、坐落于熊家巷的“培心堂”,“规模尤为阔大”,“光绪七年就八角亭遗址扩充义塾、粥厂各善局”,“光绪三十一年设初等小学及半日学堂,继设高等小学一堂,蒙学四堂”^③;又如与培心堂同年创设、位于六渡桥的“公善局”,所兴办的善举不断增加,并改名为“济生善堂”,“其规模之大,为诸善堂之冠”,职能范围包括办义学、收埋白骨、停放棺木、红船救生诸端,所修的马路被称为“济生路”,所建的住宅区被称为“济生里”^④。以下举例说明善堂、善会的救济效果。

育婴恤嫠。汉口善堂举办的育婴敬节善举较有成效的当推回生堂。“清光绪十四年戊子,由张明齐发起,曾春山、毛润泉诸人赞成,始仅办育婴局于得胜街之回生堂”,三年之后,又“购地于存仁巷堤街,计二百一方一尺五寸,培土兴修,遂得创建育婴敬节总局”。共有“各节妇号舍计六十四间,共支钱二万有余。复由绅董余福田捐款扩充至八十间,各节妇按月给钱一串二百文,节妇之子按月每名给钱六百文,其育婴乳妇按月每人给钱一串文”。此外,还设学舍,“延师专教节妇之子”。由于其常年经费,有“局董随时劝募”,故到辛亥起义时,该局一直运转正常。而位于硚口的官办育婴敬节局,“当起义数月,官局无人照料,赖张明齐之力,各节妇不至失所”。于是经官方批准,“改官局为上局,改总局为下局,均由商办,并照会张明齐经理上、下两局,由是上局各节妇每月口食亦如下局”。后来张明齐又力加劝募,将上局节妇号舍“扩增至一百零四间,正厅设学校以训节妇之子”,下局又增建“相对之房屋八栋,名曰明德里”,“由是两局遂稍有根据”^⑤。

船局救生。道光至民国初年,敦本堂、衡善堂、益善堂、永安堂、敦实堂、济

① 范锺:《汉口丛谈》卷2。

② 民国《汉口小志》,《义举志》。

③ 民国《夏口县志》卷5,《建置志》。

④ 参见李权时、皮明庥主编:《武汉通览》,武汉出版社1988年版,第441页。

⑤ 民国《夏口县志》卷,《建置志》。

生堂、普化堂等善堂都备有救生红船，在江汉两水分段游弋，营救遇险者或打捞、掩埋遇难者。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敦本堂和敦实堂的救生局。敦本堂救生局本部在汉阳，因汉阳旧有之官设救生船，“奉行仅为具文，不愜輿情”，“道光三年，鹺商姚必达、胡元等公设敦本堂救生船局，请于郡守，得自行经理，官吏不过而问，与旧设官船无与”。在道光三年（1823年）至道光十九年（1839年）这17年中，“活人四千一百三十二；收浮尸六千九百五十五”。道光十九年（1839年）又“分局江夏之金口、淮山，增设救生船只”。光绪二年（1876年），为杜绝“局内私擅之权”，又改进管理办法，“改为局外绅士轮年稽查”，使船局的救生活动得以为继^①。敦实堂救生局始于清同治年间，由邑绅戚席臣、周芸青、刘步瀛、刘晋侯等倡设，该局有“红船两艘，常年上下游弋，遇险护救”，又“于关圣祠、五显庙、接驾嘴、打扣巷四处各设义渡二只，以渡行人，又设护划二十只，分泊于各险要之处，专司救护行船”，在管理上，也是“设局于汉阳南岸，专理其事”^②。

水龙救火。“汉口居人稠密，二水奔湍，祝融风涛，其灾非他处可比”^③。关于汉口火灾的危害性已如前述，防火救火成为汉口商民共同关注的问题。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人们只能利用简陋的水缸等工具储水以救火，当时较大的商号或会馆、公所等场所常年备有储水缸、太平桶等以济急用。如礞口正街的保安善堂、至公巷河街的船帮公所，就有太平桶的设置^④。但是，这些古老的办法，缓不济急，杯水车薪，往往不能及时扑灭火种而蔓延成灾。在现代消防产生之前，建水龙以防救火灾是较先进的方法，“置水龙星奔扑救，诚法良意美也。考汉口水龙之设，创自清嘉庆年间”。不过，这批水龙被毁于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中。农民革命被镇压后，各善会、善堂自然成为新建水龙的主要承担者。时有郡守“倡率绅商集资复置水龙，分布城镇各善堂善局，绅商士民闻风兴起，相率举办，或由独立仔肩，或由众情集腋，均能恤灾捍患，踊跃从公”^⑤。一时水龙局“数以百计”，光绪年间，水龙局改称“笆斗会”，民国时期救火机构又先后有水龙会、救火会、保安会、公益联合会、义勇消防队等。救火会、保安会等属各善堂管辖，按地段分管防火救火，遇火警则急奔抢救^⑥。民国《夏口县志》和民国的《武汉指南》详细登录了各救火会、保安会的分布地点，此处不一一列举^⑦。需要指出的是，“自近兴办保安会后，改水龙为水袋，救灾实便于前，旧日水龙大半湮没”了^⑧。

① 光绪《汉阳县志》卷2，《营建略》。

②⑤⑧ 民国《夏口县志》卷5，《建置志》。

③ 范锺：《汉口丛谈》卷4。

④ 参见金溥临：《武汉救火队拾摭》，《武汉文史资料》1985年第二辑，第138页。

⑥ 参见《武汉市志·民政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18页。

⑦ 参见前揭《武汉指南》第四编，《公共处所》。

施棺收埋。清至民国,汉口街头的露毙、水上浮尸以及贫穷无以安葬者,多由善堂收验,埋于义冢。例如崇善堂在汉镇沙包处有义冢^①,公善局在六渡桥堤外设有萧家院义冢,一度曾规定“汉地居民,无论大小人口棺木,凡无力葬埋者,均可暂厝于其间,随时安葬于汉阳义冢之内”。归化堂、普化堂均在汉口设有义冢^②。前述各善堂的救生局,除抢救生者外,有一项重要的职能,即“捞获浮尸送堂者,当即棺殓葬于该堂义地”。当时在施棺收埋方面力度较大,成效显著,为人所称道的还有自新堂施送棺板局、同善堂挑培荒冢局、敦本堂等慈善机构。如前所述,敦本堂在道光三年(1823年)后的十七年中在汉阳共收埋浮尸近七千具。自新堂始于道光初年,时“生员付培霖、甘伟烈等公立施送棺板局,曰自新堂。凡有路毙男女,由地保验无伤痕别故,报堂复审,给棺掩埋”,仅光绪十七年(1891年)至二十七年(1901年)间,“凡收埋路毙尸身三万一千有奇,历置义地三十四处”;同善堂在太平天国的战乱后,“收水陆死乱之尸骸二千余丛,葬宏仁亭侧”^③。民国初年,汉口的10多家善堂和红十字会等机构仍收埋浮尸和施送棺板,辛亥阳夏之战,汉口红十字会和各善堂收埋尸首约7000具^④。

救灾解困。每逢水、旱、兵、火、疫等灾害发生,汉口各善堂都以极高的责任感投入紧张的施救工作。道光辛卯、壬辰两年湖北连遭水灾,灾民“荡析离居,就赈汉皋,继以疫”,面对灾情,敦本堂、同善堂等同时进行了救灾活动,敦本堂“局事竭力拯救,送医药,司棺板。病赖以更生者无算,殁不至于藁葬者四万有奇”,同善堂也在大别山麓救援“支席就赈”之灾民,出现了“敦本堂送药施棺,日不暇给;同善堂竭力协助”的联合行动,两善堂因此而“声名益著”^⑤。光绪七年(1881年),夏口培心堂施粥给流入城市的灾民;光绪十五年(1889年)冬春,灾民每日往善堂食粥者达3.7万人。清末汉口和江夏的镇安、圣化、宝善、安善、仁济、普安、惠济、敬德、衡善等善堂都开展了为贫民送诊送药的活动^⑥。

宣统二年(1910年),汉口各善堂又联合起来,组成了“汉口慈善机构善堂联合会”,辛亥革命后又改为“汉口慈善会”,袁文藻在《慈善会序》中详述了慈善会的筹建经过,并对该会筹建初期的善举进行了小结,该会除了向津、直等外省灾区募解衣物、豆麦等救灾物资外,在本省区的主要贡献为:

“仙桃镇兵灾,则募放钱一千串。两湖水兵各灾,复制送两湖寒衣约一万

① 自各国来汉通商后,因沙包民地多为外人购买,义冢“颇被侵袭”,同治四年,郡守钟谦钧置梅子山五里墩义冢,始将沙包义冢迁葬。

② 民国《夏口县志》卷5,《建置志》。

③⑤ 光绪《汉阳县志》卷2,《营建略》。

④⑥ 参见《武汉市志·民政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19页。

七千件；散放捐款十余万金。他如江宽轮船遭难，捞起尸身百余具；凤阳小轮失慎，捞起尸身数具，均用棺收殓，拍照招领。复于十一月间推举干事，督同医士多名，携带各种药品，分赴松滋、广济、石首、蕲春各县，治疫活人无算，此皆昭昭在人耳目者。至于每年收养孤儿数十名；每月发给孤贫口食；一月收养残废百余名；每日送诊施药不下数百号；每年施送棺板不下数千具；设立小学两堂，学生约百数十人；收埋浮棺已达万余具；设立救生局，添置红船五只；以及赈济被火棚户、资送落魄穷民、办理武汉冬赈，种种慈善，总期功归实济，款不虚糜。宜乎会务日兴，善名洋溢”^①。

相对于当时动荡的社会局面和日趋严重的社会问题而言，汉口善堂、善会的这些善举无异于杯水车薪，我们不能对其社会救助的效果给予过高地评价。但是社会的动荡不安是由多种复杂的原因造成的，若仅从社会保障的角度而言，在这样灾难深重、人人无暇相顾甚至无暇自顾的时代，城市社会的这些慈善机构能主动关注社会问题并积极进行有一定成效的社会救助活动无疑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们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筑起了一道社会保障的防线，使这个社会不致成为一个完全无助的瘫痪的社会，特别是在政府已无能为力情况下，他们作为一名“替补队员”上场，并发挥了主力的作用。

晚清的汉口，除了绅商创办的善堂之外，尚有外国教会和其他组织设立的慈善机构从事社会救助活动。如1880年意大利天主教嘉诺撒仁爱修女会创办的汉口天主教堂医院设有专门的“贫民病房”为穷人治病，并劝病人“爱天主、爱教会、爱教宗、爱天上的圣美、爱一切人”^②。1888年前后，循道会在汉口先后设立了训育书院和孤儿院，对所收盲人和孤儿进行“救济和职业培训”^③。但是对外国人慈善机构的救助作用更不应作过高估价，因为，一方面，社会救济事业不是教会等的主要目的，只是用以吸收信徒的一种辅助手段，更有甚者，一些外国人披着慈善的外衣从事间谍活动，如光绪中叶，日本人在汉口河街开设的乐善堂，貌似带有慈善性质的药店，其实是日本在华的情报机构^④。另一方面，中国人对外国慈善机构一般抱有怀疑与抗拒的态度。外国慈善机构的可取之处在于它们不单以消极的救济为务，而偏重于精神与谋生能力训练等积极的一面。

① 袁文藻：《慈善会序》，民国《夏口县志》卷5，《建置志》。

② 陈剑函：《汉口天主教堂医院的变迁》，《武汉文史资料》1986年第2辑，第168页。

③ 苏云峰：《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1860~1916·湖北省》，台湾近代史研究所1981年版，第156页。

④ 张笃勤：《汉口乐善堂——日本在华情报机构》，《武汉文史资料》1991年第4期，第216页。

（三）汉口社会保障事业的特点与启示

以上我们将汉口的社会保障体系放在明清这个长时段中进行了考察，汉口社会保障事业的主要特点已十分明了，但相信也有未被人注意和思考过的地方。在此，特从三个方面对本文进行小结，以期更好地认识汉口社会保障的特点，并从中得到某些启示。

1. 城市社区与社会保障

汉口是一个以外来人口为主体的城市社区，同时具备了高人口数量、高人口密度、高人口异质性三个特点，即使以现代的眼光来衡量，也具备很强的现代城市社区的特点。在传统社会中它与世代聚族而居的农村社区截然不同，与同代兴起的市镇社区也明显有别。这样的社区在两湖地区是仅有的，即使在市镇密集的江南地区也不多见。城市社区的形成与发展是人类文明巨大创造力的表现，但是大量的异质人口汇集到一处，也必然会产生不同于传统社区的社会问题，正如滕尼斯和杜尔凯姆等一些西方社会学家所指出的那样：都市化不仅意味着人口的集中和人口密度的增大，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社会体系（或文化体系）对个人的影响力降低，社会秩序和社会治安缺乏稳定，社会动乱与变异的社会行为日益滋生^①。汉口在城市发展中所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及其保障模式，事实上为我们认识传统社会城市社区的社会保障问题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范式。从某种意义上说，汉口社会保障事业的兴起和发展正是城市社会问题出现和深化的标志。从明清的长时段看，与苏州等江南城市一样^②，汉口的社会救济和慈善事业经历了由官营向民营、由个别富人的义举向有组织的团体行为转变的过程，这也正是汉口城市功能日益增强，城市社会问题日益复杂化的表现。在汉口城市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中，也体现出了与传统社区社会保障方式密切联系的一面，汇集于汉口的外来人口，一般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农村或城镇社区中，他们脱离了原来的社区，也就脱离了原来血缘、地缘共同体的保障体系，在新的社区，这些外来人口产生了强烈的寻求庇护和寻找安全感的愿望和需要，原社区中的血缘、地缘救助模式就自然成为他们依恋和寻求的对象。明清时期汉口同乡会馆、公所的大量涌现，可以理解为传统社区的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障模式在城市社区的重建。但是，在城市社区中，外来人口毕竟是以利益关系联结在一起的，随着商品交换和利益关系的发展，又表现了对传统保障模式的突破和创新的

① 参见蔡勇美、郭文雄：《都市社会学》，台湾远流图书公司1984年版，第110页。

② 参见王卫平：《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民间慈善事业》，《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1期。

一面，以谋求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同业行会开始出现，社会认同和救助的范围逐渐扩大，并进而出现以关心整个城市社会问题为己任的善堂、善会等慈善组织。不同目的的救济行为和各种类型的救助组织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汉口复杂的城市社会保障体系。

2. 商品经济与社会保障

马克斯·韦伯注意到，在中国传统城市中，政治和军事功能是首要的。也许大多数城市都被韦伯言中，但汉口确是一个例外。与韦伯所强调的政治和军事功能相比，汉口是一个“纯”商业城市，可以说，汉口城市的兴起、社会问题的产生和社会保障事业的开展都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可见，传统时代汉口的社会保障事业又为我们透视传统社会商品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窗口。汉口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商业发展，商业在这座城市是人人竞相经营的主业，而不是为人不齿的“贱业”，富商巨贾拥有对这座城市的各项社会事务包括社会保障事业的发言权，在这一点上，汉口城市社会更接近于施坚雅的“中心地方”理论模式和近年流行的“市民社会”的特点。至少，在社会救助和保障事业上这一特点非常明显。如方志所言：“汉口义举甚多，无论大小，均由绅商集货筹办，成效显著。”^①与大多数传统城市不同，工商业者和工商业组织一开始就是这座城市社会保障事业的主角，且在长期的救助实践中基本形成了一套自我稳定的内在机制：商品交换意味着竞争，竞争必然带来贫富两极分化，激烈的竞争状态的长期维持，有赖于一套对竞争中失败者进行救助的内在机制，只有这套机制正常发挥作用，竞争的社会才能基本保持稳定状态。汉口社会保障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正是这种内在机制起作用的表现。回顾汉口的建置沿革史我们不难发现，在这座城市发展的大部分时间里，只有一两个巡检司在这里代表官方行使维护社会治安的职能，而整个社会秩序基本稳定（战乱和灾害的波及除外），光绪年间阳夏分治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应付洋人，及时处理所谓“华洋交涉，地方紧要事件”^②。可见，在晚清以前的大部分时间里，若排除因其他复杂社会原因造成的社会动荡、改朝换代或自然灾害等因素，汉口这座商业城市在商人和商业组织的主导下，基本处于稳定的发展状态。这其中，社会保障体系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正如我们在前文所考察的那样，明清以降，汉口的工商业行会组织和慈善组织日益发展和完善起来，不仅机构数量多，规模大，覆盖面广，而且财力有所保障，活动基本能够正常开展，一直到民国和近代，这些组织仍在社会事务中发挥着主导作用。1950年人民政府对武汉善堂、会馆公所财产和事业进行清理

① 民国《汉口小志》，《义举志》。

② 张之洞：《阳夏分治原奏稿》，民国《夏口县志》卷1，《舆地志》。

时,尚有房屋 1 574 栋,占地面积 87 526 平方米;地皮 25 479 平方米;学校 31 所,在校生 1.5 万余名^①。

3. 近代化与社会保障

现代社会保障学通常将市场经济称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将社会保障称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稳定机制,在明清的汉口,这两种机制同时登上了历史舞台。但回过头来反思这段历史,我们认为当时的“动力机制”和“稳定机制”都没有完成其应有的历史使命。但这也不完全是这两种机制本身的问题,主要是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造成的,在一个动荡不堪的年代,任何经济、社会建设的成就都不可能巩固和持久。我们应该正视传统时代汉口商品经济发展的成就,特别是汉口开埠和张之洞督鄂之后,汉口在机器工业、银行体系、商业发展和城市公共事业等各方面都呈现出近代化的势头,这正是“动力机制”在这座城市起作用的结果,但是这些成绩是在社会动荡的“间歇期”中取得的,因而它的生命力也只能是昙花一现,新的社会动荡立即止住了它的发展势头并毁坏了既有的成果。如前所述,汉口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民间社会保障体系,不可谓不完善,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根本不可能主动地发挥“稳定机制”的作用,而只能是在灾害和战乱之后从事补救工作,众多不能由保障体系左右和控制的力量源源不断地制造出几乎相同的社会灾难:饥民、流丐、浮尸、疾疫等等,若不从根本上清除它的源头,而只是被动地填堵,即使是十全十美的社会保障体系,也难以填平社会问题的深沟巨壑。因而,对汉口社会保障体系的成效的评价只能说是“杯水车薪”,但是我们不能因此简单地将汉口的社会保障体系定性为软弱无力,事实上,由于当时的时势所迫,汉口社会保障体系一直所致力于解决的主要不是经济近代化中固有的社会问题,而是在竭力医治战争和社会动荡的创伤,旧创未愈,新创又起。如果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如果能将主要精力放在保障经济发展上,汉口的社会保障体系将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稳定机制”的作用。这也许是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现代化建设中应该着重吸取历史教训的地方,历史启示我们,一方面要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局面,另一方面应该重视现代化建设中的社会问题,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步伐。

^① 《武汉市志·民政志》,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16 页。

三、近代前夜汉口商人的文化 生活：1800~1840

——以《汉口丛谈》为中心的考察

汉口镇形成于明成化年间的汉水改道。借助九省通衢的地利之便，从商起步，以商闻名。如果说在明清时期，汉口已逐渐成为一个“万家灯火彻宵明”的商业都市，汉口商人，无疑是这个都市中最引人注目的群体。需要指出的是，与俗称四海为家的安徽商人为“徽商”、山西商人为“晋商”等不同，本文“汉口商人”中的汉口，仅是一个单纯的地名符号，用来指代“在汉口经商”的各地商人。由于汉口居民流动性极大，外地商人众多，“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①、“瓦屋竹楼千万户，本乡人少异乡多”^②。19世纪上半叶，在汉口经商的商人大多数仍为客寓此地或定居此地二三代的商人后裔。

时值今日，汉口仍以其鲜明的平民性城市特点著称，这与其古往今来浓郁的商业性历史积淀不无关系，与居民世代经商，或大量本地、外地商人寓居的历史氛围不无关系。这种关系使人们容易联想到古代大商人奢侈、艳俗，小商人节俭、自利的众生相。

然而，在查阅史籍尤其以范锴《汉口丛谈》为代表的清人笔记过程中，笔者发现清代中期的汉口商人，在经商之外的文化生活却具有浓厚的土人化特征。他们广结天下英俊，寄情山水诗赋，感怀伤时，吟风咏志，在社会生活中也能急人所急，乐善好施，品量人物，抑恶扬善，成为传统基层社会中具有一定代表性的非官方导向力量。当然，与真正的土人相比，这些商人的弱点是显而易见的，将其置身于近代转型前夜的特定历史环境予以审视，对考察近代开埠前夜汉口商业发展的人文土壤很有裨益。长期以来，学界对汉口商人这个群体及其生活状态的研究十分薄弱。本文在此抛砖引玉，希望有助于对汉口城市近代化发展进程的研究。

① 叶调元：《汉口竹枝词》卷1。据原注：诗中“一分民，亦别处落籍者”。见徐明庭辑校：《湖北地方古籍文献丛书——武汉竹枝词》，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② 徐志：《汉口竹枝词》。见前引《武汉竹枝词》。

（一）汉口商人的交游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从交友对象观察研究对象，是治人物史者常用的一种方法。从范锺所著《汉口丛谈》来看，嘉道时期，汉口商人的交游十分广泛，尤喜结交才学出众的士宦，不论尊卑，不分畛域，表现出较为洒脱的交友心态。概括言之，商人们的交游对象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

1. 情趣相投的商人或商人后裔

由于范锺本是汉口盐商，其朋友圈中除少数从事他业的商人（如江夏潘国祚兄弟为药商外^①）外，大多数商人均为盐商或商人后裔。

如方岩夫……“以先业在汉，时来寓馆，余获订交，相与考研经史，讨论往还，无十日违也”。

巴莲舫，“风雅好交，为汉上盐鹺中第一”。其“好学多艺，工隶书，兼善技勇，业鹺汉上，爱才好客，四方著名之士道经汉口者，无不相推侨札之好”。

鲍筠庄，歙人。“以鹺业客汉，雅好诗咏。每于春季花时，必高会吟朋，觞歌竟日”。

洪旗林，字少弓，“业鹺汉上阅世矣，遂著邑籍”。

丹徒包云舫，“以业鹺客汉。性慷慨，能急人难，故手致数万金，亦时得得失”。

丹徒包包山，“高才博学，工诗善书，业鹺汉口，风雅爱客”。

巴树蕃字硕民，一字鞠农，歙人。理禺筭（指治盐业）客汉久，广交游，自搢绅以及闾巷，无不如其名者，尤能急人之急，以故有“小孟尝”之目。

……………

清朝前期，由于食盐专卖的官府垄断制度，汉口成为淮盐在湖广口岸的最大转运中枢。大小盐商依靠特权、利用产销的地区差价就可轻松获取厚利，轻易致富。所谓“一包盐赚几厘钱，积少成多累万千。若是客帮无倒账，盐行生意是神仙”^②。有稳定的生意和经济基础做后盾，汉口盐商们的确过着类似“神仙”的生活。但这种腐朽的盐业管理体制严重影响了人民生活和国家财政收入，其恶果在嘉道年间已开始显现，并促成了道光十一年两淮盐区的票盐改革。以范锺等人为代表的汉口商人生逢其时，感觉尤其明显，这从他们对往昔盐商盛况的屡屡追忆可见一斑：

① 范锺：《汉口丛谈》卷2。见江浦等：《汉口丛谈校释》，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② 叶调元：《汉口竹枝词》卷1，见前引《武汉竹枝词》。

昔年汉上盐鹺盛时，竞重风雅。四方往来名士，无不流连文酒；并筑梵宫琳宇，上下五六处，为公燕（宴）所。镜槛晶窗，洞房杳窈，咸具竹石花药之胜。且半临后湖，可舒远眺。白云漾空，绿荫如幄，斜阳返映，影动于琉璃屏户间，宛若身在画中。每当雅集，相与覃研诗词，品论书画。时或舞扇歌裙，浅斟低唱，大有觴咏升平之乐。前辈风流，犹可想见。数十载来，已成《广陵散》绝。盈亏之怅，其何能已？^①

鹺务中有如此风雅领袖，藉以歌咏太平，真是不可多觐……今则反是，渐形衰薄，何哉？^②

作为既得利益者的盐商，在感叹“衰薄”现状时似乎尚未意识到他们的好景已经不长。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在节奏缓慢的传统社会，这种危机也的确还不至于立刻危及商人们的日常生活，因此嘉道年间的商人们依然可以继续他们惬意的生活，而暂无经济上的后顾之忧。

2. 有才学的幕客、士子和地方官吏

由于政治腐败和八股取士的狭隘性，清代中期以后科举选拔人才的方式已日趋腐朽，大量才华出众的士子难入仕途，便以教书或充当地方官员幕僚为生，同时长年累月继续准备科举考试。有一定品位的商人倾慕士子的才华，而一般士子大多生活清贫，与商人交游，也丰富了他们的生活内容，因而彼此欣赏，易于投缘。少数地方官吏在任职之余亦乐于结交名士。在《汉口丛谈》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常芝仙，“先籍芜湖，迁徙汉上，阅三世矣。少英敏，耽情文史，长工书画，晋唐宋元诸大家之法，无不神领意造。精于赏鉴，能历指其瑕疵，以定真贋……余亦何幸得此良朋！”^③

曹问林，歙贡生，性纯和，好学嗜诗，为岩夫外舅。尝馆于鲍筠庄汉上寓斋，宾主倡酬，殆无虚日，“新雨联吟”、“落枝倡和”之集，两翁皆与诗会，兴不少衰。

金手山，吴县人。“诗文敏贍，久困棘闱，偕江右陶香泉本忠，馆于宾谷先生幕中，均以翰墨见重。时过汉上，与余为莫逆之交，二君皆工长短句，以是诗会外，复增词社，邮筒倡和，浅斟低唱之兴，亦不减于柳屯田也”。

临洮（今甘肃省临洮县）陆秀山孝廉，“诗文瑰丽雄伟，硬语盘空，时有

① 范锴：《汉口丛谈》卷6。

② 范锴：《汉口丛谈》卷5。

③ 范锴：《汉口丛谈》卷3。

惊人之句。尝馆于素方伯署，与长洲顾剑峰日新，每过汉上，必偕余暨芝仙尊酒论文，清谈半日”。

黄心盒，歙人。“伟貌修髯，交游甚广，工作诗词，文思斐然。尝往来燕北、汴梁、三湘、吴下，所至公卿倒屣，争相延至，为江湖上客。而操觚染翰之士，亦无不愿交于心盒也”。

顾剑峰，长洲（今江苏省苏州市）贡生。“诗文闳肆，稿盈一二尺许，喜谈论古今，口若悬河。馆于秦观察署，时渡江来汉，偕作山水游”。

王子若，太仓州（今江苏省）诸生。善六法，尤工篆刻。庚午侨寓武昌，尝学诗于顾剑峰，翩翩年少，文酒兴豪。

天门熊两溟，“少贫力学，工古文辞，诗品峻洁，五言出入陶、谢、韦、柳间，著有《鹄山小隐诗文集》，以名进士愿就冷曹，官武昌教授，尝来汉上，多主常芝仙家，必邀余衔杯畅叙，抵掌倾谈，诗文外，不屑挂齿也”。

吴县黄谷原，山水苍秀，得宋元人秘法，复喜闭户吟讽，不以示人。薄宦楚鄂，性情疏散，颇得随遇而安之趣。

仁和蒋村炯，“少负文誉，综览群籍，勤于考证，由训导推升德安府（今湖北省安陆县）经历。壬午之春，以公来省，及夏返棹，过汉访余旅舍”^①。

.....

士农工商是传统中国社会四个主要的社会阶层，其中士为首，商为末。士志于道，“无恒产而有恒心”，耻于言利，而商志于利，为利而来，为利而往。二者的人生境界、理想追求本是格格不入的。但在汉口，这两个阶层却在共同的兴趣和娱乐盘桓中成为挚友，成为汉口商人生活中一项风雅的内容。

3. 僧侣

与僧、道交游，曾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其中以文人雅士尤甚。这也是儒释道三教能在中国士人的精神世界中得以共融的重要原因。大概与汉口寺庙众多有关，以范锴为代表的汉口商人们与僧侣交游也十分频繁。僧侣寺庙，成为时常点缀他们业余生活中的清静之壤、灵感泉源。大凡经常出入的寺庙，他们都与寺僧有较密切的交往。

如当时汉口宝树庵，屋不高敞，而僧房经舍，尚为幽洁。当琴僧练江寓居此地时，范锴偕友人吴澹江、毛洋溟访其地，在寺院厨房进餐后，听琴试茗，半日清

^① 参见范锴：《汉口丛谈》卷5。见江浦等：《汉口丛谈校释》，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谈。范锺因有“思入海山远，心清花木深”的诗句^①。

嘉庆十四年（1809年），一行人赴梅子山纳凉、看梅，与其僧唱和有加^②。

嘉庆十五年（1810年），湘潭诗僧竹轩，挈沙弥湘岚来汉，范锺父子与友人林琴庵、黄心盒、黄谷原等在天都庵纳凉，分韵赋诗，谷原写图以纪岁月，号称“一时雅集”。范锺有“阿师湘中来，山水穷毫发。坐谈暑渐忘，渺然神飞越”的诗句^③。

（二）主要活动场所

1. 会所

会所指会馆和公所。会馆是同乡旅外集合或寄住之地，公所是同业联合办事或聚会的场所。作为四通八达的商品集散地，汉口天下各方商贾云集，会馆、公所林立，外地居民甚至超过了土著，因此生活于雍乾时期的徐志有“石埭街道土埭坡，八马头临一带河。瓦屋竹楼千万户，本乡人少异乡多”^④的吟咏。为团结自保，加大声势，外地商贾在汉形成了各种帮派，号称徽州帮、湖南帮、宁波帮、四川帮、广东帮、江西福建帮、山西陕西帮、粮帮、药帮、船帮、钱帮等。这些帮派以会馆、会所为依托开展活动，形成强有力的团体力量，在汉口商业贸易的发展中曾发挥巨大作用，如组织、维护本行业发展，使各行商人住宿有所，储货有仓，加强同乡或同行业之间的团结，增强自保能力和凝聚力等^⑤。正因如此，各省商人对会所建设非常重视，不仅数量繁多^⑥，而且讲究排场，奢侈异常，比范锺稍晚的清人叶调元《汉口竹枝词》曰：

一镇商人各省通，各帮会馆竞豪雄。

石梁透白阳明院，瓷瓦描青万寿宫^⑦。

①③ 范锺：《汉口丛谈》卷2。

② 范锺：《汉口丛谈》卷5。

④ 徐志：《汉口竹枝词》，见前引《武汉竹枝词》，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⑤ 如汉口米行商人对公所的依赖，参见拙文：《清代汉口的粮食贸易》，载《江汉论坛》1993年第4期。

⑥ 按：据1920年《夏口县志》统计，汉口会馆、公所约有200处，其中确有建设年代的123所，年代不详者56所。见皮明麻等主编：《汉口五百年》，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⑦ 原诗注曰：阳明书院即绍兴会馆，梁柱均用白石，方大数抱，莹腻如玉，诚钜制也。江西万寿宫，瓦用淡瓷器，雅洁无尘，一新耳目。汉口会馆如林，之二者，如登泰山绝顶，“一览众山小”矣。见叶调元：《汉口竹枝词》卷1，见前引《武汉竹枝词》。

不重风雅、略带粗俗的商业会所名称及其建筑装饰，遍及汉口各地，对当地民风浸染产生深刻影响，也是汉口商人审美情趣、智识水平的真实反映。

2. 寺庙

汉口在会馆林立的同时，亦呈现庵、庙林立的局面。仅据笔者对《汉口丛谈》所列的不完全统计，各种庙、庵、阁、殿、寺、祠等已逾二百。这些祭祀之地大多建于明清时期，部分商人参与了建庙活动，如大王庙便为盐商所建，后成为盐政公所。大多寺庙在嘉道年间还在发挥作用，或被公所维修、利用，如天都庵成为盐政公所，西关帝庙成为山陕公所、九华庵成为豫章公所。经公所改造之后的寺庙经费来源固定充足，陈设极为华丽，在仍有寺院钟声禅韵特点的同时，成为本会所商人的聚谈之地。这种风气逐渐使汉口不少宗教场所具有了多种功能，一方面满足当地会所、百姓祭祀之用，另一方面成为人们交游活动的清静之处。气氛肃杀的庙堂，成为神、人共享的乐土。

如盐商公所所在地的天都庵，即是盐业中人纳凉的理想场地。所谓：

嘉木无烈日，习惯如夏虫。入世无冰心，焦死如秋莲。
我欲乘紫烟，逍遥游太空。浊氛不可近，冷然吹天风。

可见其巨木遮天，荫凉幽静之状。湖南诗僧竹轩来汉，范锴与一班友人即邀竹轩于天都庵纳凉，并赋诗、作画以纪其乐。范锴有诗云：

火云峙高雯，炎氛郁蓬勃。多君纤胜引，清凉到禅窟。
曲沼芰荷香，闲房僧髻发。轩窗一以启，湖光滑如笏。
白鸥浴汀沙，新蝉噪林樾。牧笛远而近，渔榔出复没。
阿师湘中来，山水穷毫发。坐谈暑渐忘，渺然神飞越。
饭出香积厨，蔬摘祇园蕨。酒破庐社戒，诗严金谷罚。
自古良会难，毋使坐瓢忽。笑指《雅集图》，譬同登宝筏。

其子范涛诗云：

寂寂精舍幽，花木远城郭。于此涤烦襟，炎蒸一时却。
僧来自潇湘，微颺动寥廓。谈禅得深味，遂践招提约。
静闻钟梵音，数声出斋阁。到门湖水多，鸥鹭乱飞掠。……

被豫章公所利用的九华庵（约在今汉口六渡桥附近），南昌人毛晓沧侨寓其中

数载，范锺等与之交厚，也常出入其中。道光元年（1821年）除夕，范锺一行过九华禅院，毛晓沧留饮，同用东坡《馈岁》、《守岁》、《别岁》诗韵三首，范锺有“执手君颜开，灯花笑佛座。残年纷俗累，有似蚁旋磨。到此得少休，流光一霎过。试问夜其何？寒鸡唱复和”的诗句。

其他寺庙，如果环境优雅，也成为人们争而趋之的胜地。如天宝庵（今汉口汉中路）僧敬贤，喜爱栽植花木。“大殿前地，颇疏散，左右杂树五六株，绿阴常覆，下种花草，春以罌粟，秋以丛菊为极盛。花时游人踵接，或就僧开竹里之厨，或呼童沽市中之酒，赏玩欢呼，殆无虚日。”道光二年（1822年）春，范锺携酒招同丁浣西、程耕云、毛晓沧、夏鹿田等友人，“小饮花前，各分赋二律”。范锺诗云：

“携酒寻兰若，看花照眼红。舞争飞蝶妙，艳夺剪绡工。
莫叹韶华改，须知色相空。吾侪行处乐，何必丽春风。”
“顿觉客愁散，能无醉一觚。钱春空对佛，迎夏尚多粮。
清磬声留坞，斜阳影转廊。纱笼添韵事，花亦爱诗囊。”

浣西句云：“春将拚一掷，我已淡千钟。”即景生情，中寓无限感叹。

晓沧句云：“看花来古刹，携酒恋残春。”“好花开半亩，新酿泻千壶。”

鹿田句云：“怀宝当呈佛，吟香籍悟禅。”“裹粮如去客，撒手买余春。”

江夏潘国祚《天都庵看芙蓉》诗云：“长堤雨过洗秋容，眼底繁花簇锦重。入寺漫劳歌竹叶，涉江今始采芙蓉。”

又如药师庵，“罌粟花亦最盛，间以蔷薇、月季。送春之候，浓露醉红，晚霞沉艳，舞风绚日，妍好百态，隔以花墙，扶以朱栏，颇占幽胜”。辛巳（道光元年，1821年）春暮，友人常芝仙约范锺看花庵中，曾写其景于扇面，“矮窗低磴，花影庭阴，宛然毕具，真不觉身入画中矣”^①。

值得注意的是范锺等商人在这些寺庙（会所）中“客愁”的吟咏与“悟禅”的追求，这是汉口商人在日常劳碌之后心理需求的自然流露。远离家乡，寄情寺院，借友人唱和的愉悦，遣异乡为客的乡愁。

3. 后湖堤畔

后湖，俗名黄花地，又名潇湘湖，“即废襄河故道，北距黄陂、孝感境三十余里，东西数十里，平畴旷野，弥望无垠”。今长堤街以外市区，统属后湖。其景色四季不同，情致各异，是汉口百姓最为衷情的户外胜地之一：

^① 范锺：《汉口丛谈》卷2。

春时丛树扶疏，芳草鲜美，覆云在地，流霭接天，浪翻麦陇之风，香浥菜畦之露。复有茶肆罗列，歌管纷喧，百鸟鸣笼，时花当户。于是士女出游，咸偃坐啜茗而留览焉。若于夏秋之交，楝风吹后，梅雨零余，江水汪洋，湖田汎溢。烟波千顷，荡暄日以熔金；杨柳万条，蘸漪纹而摇翠。比鸳鸯之棹，鸥侣相随；分鸶脰之滩，渔歌互答。或值炎威正炽，月影当流，驾舴艋之轻舟，拂蒲葵之小扇，碧筒酒醉，细葛衣轻，铺湘簟，枕桃笙，相与逗暑，彻夜达旦而归。群夸为吴兴之水晶宫，包山之销夏湾，不是过也。……殆夫冬日，水涸沙平，草衰霜陨，远山凝紫，枫叶染丹，则有弯弓健儿，跃马蹄而角射；短笛牧竖，跨牛背以横吹。此四时晦明之殊景，可以游目骋怀，为汉口之胜处也^①。

范锺与友人的踏春、闲步、郊游，常赴后湖，并留下很多即兴而作的诗句。

4. 园林

对大多数异乡富商而言，汉口只是客寓，并非故土，因而汉口商人在汉口的投资较为谨慎，没有出现同时期江淮盐商在扬州等地数量繁多、争奇斗艳的大规模园林。但追求享乐和资金雄厚的主客观条件，还是使园林这一传统社会中享乐艺术的产物，在汉口有所展露。

较突出者有豫省覃怀商人所建的豫成园^②，安徽盐商洪旗林所建的“谁园”，江苏盐商包山所建的“怡园”^③等。

豫成园在药王庙东厢，“轩窗明媚，花木扶疏，别饶幽致”，“程耕云为之作记于嘉庆十九年（1814年），德州刘松岚大观主讲覃怀书院，二十二年（1817年）初夏，以事来汉，小住园中，谓心盒曰：‘此来得程君作，不负楚游矣’”；“谁园”其名蕴含着主人达观之意，“轩窗窈窕，楼阁深沉”；怡园号称有十二景，规模最宏，“湖山石峭，花竹径纡，泉瀑交流，松桂夹道，亭馆池沼，结构都非尘境，绿波山房最为疏散，图书彝鼎，错陈其间，为汉上胜地”。范锺于庚辰（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与包山接识后，“不时招饮怡园，赠答篇什，率盈筐笥，几忘羁旅在异乡云”^④。每个园林建成，友人聚饮，并为其绘画赋诗题记，园林由此名声远播，成一时之盛，这当是传统商人士子特有的文化传播方式。

5. 茶肆青楼

茶肆是汉口商人频频聚首的场所。“余与心盒旅食汉皋，沦落不偶。每于夕阳

① 范锺：《汉口丛谈》卷1。

② 范锺：《汉口丛谈》卷2。

③④ 范锺：《汉口丛谈》卷5。

斜下，则相约白楼瀹茗，以遣客愁，故余有句云：几年同作江湖客，一半茶寮笑咏来”^①。

范锺等人常去的白楼在大观音阁（今硚口区和平剧场前后）后，属后湖一带。后湖的茶肆众多。“相传自涌心亭始。近若涌金泉、第五泉、翠萝、惠芳、习习亭、丽春轩之名为著，皆在下路（指长堤街下段）雷祖殿（今青莲巷里）三元殿（约在今长堤街、满春路交叉处，今仍有三元街之名）后。其余尚有数十处，弦歌喧耳，士女杂坐”。而后湖上路（指长堤街上段）茶肆则“以白楼为最著”。白楼环境幽雅、景色怡人：

编槿为篱，积石成径。中构小楼，作东西两箱。轩窗豁达，槛曲廊回之内，皆设小座，以供茗坐。外复四植杨柳，绿阴垂幄，翠浥襟带间，又筑堤以高之，大水不没，可通游人往来。楼外远山几抹，隐隐青露。朝云暮霞，眩人眼目。若于盛夏，湖水平堤，夕阳初落，烟波淼渺，灯影上下映射水间，渔榔远近，响应沙渚，消暑者接踵而至，絺衣挂树，凉风袭人，七碗生香，适然歌咏。凭眺之胜，以斯楼为第一^②。

范锺在汉几年，一半时间掷于各处茶寮的诗句自然有些夸张，但以此说明他们对茶肆的青睐，则是恰如其分的。

青楼妓馆，是汉口商人活动较多的另一场所。嘉道时期汉口青楼有官私之别，更有下等“歪妓”（指私娼）聚集之处，其“席篷作屋，竹片为床，卖笑倚门，招摇论价，人而禽兽，即眼前地狱也”^③。这是与汉口商业发达相伴生的畸形社会现象。范锺等人自视清雅，亦未能免俗，将“汉皋旅客奈愁何”，寄望于“呼朋买醉听清歌”，“青衫红粉古今愁，与君同是伤心侣”，出入青楼以遣羁旅客愁之事时有发生。但即使在一夫多妻、纳妾之风盛行的社会氛围里，这些四海为家的商人在流连青楼妓馆后仍要承受道德上的自责，范锺在《汉口丛谈》中记叙其事后，便有“要知青楼境界，即是眼前地狱，岂可轻入耶！……毋如余之少不检括，以致老大飘零也！”^④的忠告。

（三）社会活动的主要内容

在清代社会中，范锺与他周围的汉口商人虽不一定均为巨富，属于有闲、有钱

① 范锺：《汉口丛谈》卷1。

② 范锺：《汉口丛谈》卷1。

③④ 范锺：《汉口丛谈》卷6。

的中产以上阶层，当是肯定的。这些商人大多数远离家乡，客寓汉口，又性情风雅，感情细腻，因而常利用各种名目聚谈，高吟低唱，社会生活显得丰富多彩。饱尝羁旅之愁，亦多人生之乐。

汉口商人的社会活动有两个主要特点：

第一，关注自然环境变化，及时捕捉、欣赏四时美景。由于生活较为闲适，以范锺为代表的汉口商人对时令、节气变化非常敏感，并追随其变化安排各种活动，因而社会活动基本上是有规律可循的。以下几种为较具代表性的活动：

（1）踏春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是古人一年中最为重视的季节。初春在经历瑟瑟寒冬之后尤让人沐浴希望，心情舒畅，因而初春时节人们纷纷走出户外踏春，墨客骚人们更有感于春意萌动，留下了大量诗篇。汉口商人对初春踏春活动亦兴趣盎然，并吟诗唱和，抒发胸臆。

后湖和月湖的郭公堤（今江汉桥一带），是汉口人踏春的胜地。后湖风景四时不同，但“以看新绿为第一”^①。后湖分上湖（指原后湖西北部分，今长堤街上段观音阁至和平剧场一带）和下湖（指原后湖的东南部分，今江汉区满春路以下地方），踏春以下湖为盛。每年初春与友人们赴后湖、月湖踏春，欣赏“几抹远山轻染黛，千条新柳嫩含烟”的初春美景，是范锺等汉口商人流连忘返的一大乐事：

“软衬红罗艳点梅，能消几日翠成堆。官娘眉黛窥深浅，踏尽斜阳未肯回。”

“几叠遥岚几抹烟，迷濛翠映蔚蓝天。东风吹染离亭柳，照影春波亦黯然。”^②

郭公堤更显热闹，“湖山明媚，桃柳鲜妍。亭园寺庙等建筑相望，一到春日，红绿缤纷，灿如云锦……汉上士女，每值春来花放，挈侣渡河，淡抹浓妆，及时行乐”。

“湖堤同散步，烟霭望漫漫。雨过迷离色，风来料峭寒。

雏鹅浮碧水，嫩柳覆朱栏。此景堪图画，诗题有范宽。”

“踏青逢令节，平野望迷漫。花事穠多变，鸥盟淡不寒。

酿春山外雨，斗鸭水边栏。留我两闲客，江天放眼宽。”^③

① 范锺：《汉口丛谈》卷1。

② 范锺：《汉口丛谈》卷1。

③ 范锺：《汉口丛谈》卷3。文中“令节”指当日为花朝节。花朝也叫做百花生日。传说旧历二月十二日为花朝日。洛阳风俗以二月二日为花朝。唐人以二月十五日为花朝，《古今图书集成·花朝部杂录》：“《熙朝盛事》：二月十五日为花朝节。盖花朝月夕，世俗恒言二、八两月为春秋之中，故以二月半为花朝、八月半为月夕也。”

当然,踏春不仅仅是欣赏自然的春色,士女纷纭的盛况本身,在禁律众多的古代生活中也是一道难得的风景。所谓“大河南岸郭堤悠,柳绿莎青三月头。人面赛花还赛雪,广藤轿子揭帘游”^①的盛况,是一年之中其他节日无法比拟的。踏春,是古人与自然共同创造的一道风景,以至人们对此一旦有所耽搁,便会生出诸多遗憾,发出“几时重把袂,堤下踏青莎”^②的邀约。

(2) 纳凉

由于地理位置和大气压带等因素的影响,汉口夏季和初秋酷热,历有“火炉”城市之说,因而纳凉消夏便屡屡入了诗文,反成为商人雅士们的又一种社会活动。

炎炎夏秋之夜,对于一般百姓而言,厅堂院落甚至街衢里弄都是乘凉的好地方(汉口市民在街头乘凉、露宿之风迄今不绝),而富商们显然更钟情于荫凉、幽静的寺院、山林、茶寮、湖堤,谈禅论道,品茗纳凉。“赤日郁炎蒸,寻凉隔湖水。舍舟蹑云梯,振衣上梅子。远公(晋高僧慧远,此处指梅子山僧侣友人)若先知,淪茗早相俟。真香涤尘烦,微言参妙旨……”^③人还未到,僧侣们已做好迎接准备,可见双方友情是真摯的。而由于纳凉的关系,商人们与僧侣的交往往来以夏秋为多,这也是个有趣的现象。

盐政公所所在地的天都庵是范锴等人自己的会所,夏季纳凉最多(如前所述),郭公堤附近风景清幽,寺院众多,也是商人们时常伫足的地方。雨后湖边散步,“絺衣凉袭,浑忘夏半,疑是初秋”^④,湖边凉爽可见一斑。若在晴天,是又一种情景:“夕阳在山,云彩绚眩,变幻不可端倪,呼舟泛湖,叩舷互倡。复登卉木林僧舍,凉月浮空,秋声出树,顿觉胸次超然,二鼓始返。翌日,余赋五言四首纪其事。芝仙作《卉木林纳凉图》横卷,笔力遒劲,烟云欲飞,而佛屋灯青,阶级参错,荒山蟠木,夜影微茫,一老衲子陪三客坐于林月下啜茗,清谈之状,一一毕具。”^⑤地段较好的茶楼如前述白楼,一到傍晚“消暑者接踵而至,絺衣挂树,凉风袭人”,自然亦是纳凉胜地。

(3) 赏花酌月

花、月以其美好的意境,在古人意识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李白“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名句,是花前月下孤清心境的典型反映,亦十分符合汉口商人“寂寥羁旅,春思全无”的沦落之感。因此赏花时举杯

① 徐志:《汉口竹枝词》,见前引徐明庭辑校:《湖北地方古籍文献丛书——武汉竹枝词》。

② 李以笃:《准提庵(今汉口六渡桥附近)逢祝山史汪静公步后湖饮即事》,见范锴:《汉口丛谈》卷2。

③ 林琴庵:《梅子山纳凉》,见范锴:《汉口丛谈》卷5。

④ 范锴:《汉口丛谈》卷1。

⑤ 范锴:《汉口丛谈》卷3。

邀月，赏月时不忘吟花，赏花酌月是汉口商人生活的另一美事。

除较为集中的寺院（如前述天宝庵、药师庵盛况）等地外，赏花吟月之地还以湖边、楼阁饮酒为盛。如范锺等人在白楼赏月所作“水调歌头”：

千里楚江客，瞥见岁时催。十年月夕花朝，能几共衔杯？片片碧云流尽，又早蟾宫开镜，清景满楼台。人在水精阙，定不远蓬莱。倚朱栏，挥玉麈，醉新醅。天涯照我鬓丝，如许那胜怀。何处锦屏香阁？何处利鞮名鞅？对此亦徘徊。风外试吹笛，黄鹤合飞来^①。

其他如黄昏夜半湖上泛舟，“从教净洗箏琶耳，来听渔歌月上时”；“红灯照市人沽酒，明月吹箫夜放船”等活动就更为频繁了。

（4）冬日赏雪

商人们一年四季的交游，大约以冬日较为沉寂。但即便如此，一逢下雪，便又是友朋聚会的良辰。例如辛巳年（道光元年，1821年）春初的一场大雪后，谁园主人洪旂林折柬相邀，范锺同程浩亭、常芝仙等登谁园问青阁赏雪。“琉璃璐霰，纷飞于梅香竹影间，酿玉弦丝，歌郎一曲，迨夜分始散。”其诗云：

访戴谁园路，同云望杳漫。雪深迷径曲，梅瘦傲春寒。

灯影明高阁，歌声绕画栏。胜游良不易，莫却酒杯宽^②。

春夏秋冬四季美景，与士商的诗画应和互为渲染，提升了汉口商人的生活韵律、生活品位和文化素养，毕竟这比竞奢斗靡的思想意识和恶俗更具有积极的文化内涵。

第二，所有重大节日都是汉口商人社会活动的高潮。全身心投入、关注各个节日，与古人日常生活内容较为单调密切相关，与汉口商人“每逢佳节倍思亲”的客旅心境也是不可分割的。更重要的是，商人友朋圈内大都醉心于唱和，人们能在共同的兴趣中互相切磋诗艺、沟通情感，获得精神上的极大满足，因而节日对他们来说，不过如四时变化一样，提供了更丰富的审美对象，而其过节内容，除物质准备上大致随俗之外，友朋往来的诗画酬答仍是主题。正因如此，他们留下了众多关于汉口节日的记叙，成为近代前夜汉口社会文化生活的真实写照。由于篇幅所限，现仅举数例。

① 范锺：《汉口丛谈》卷1。“月夕花朝”，见前注。

② 范锺：《汉口丛谈》卷5。

(1) 除夕(农历腊月三十)

道光元年(1821年)除夕,范锴过九华禅院(今汉口六渡桥),毛晓沧留饮,同用东坡《馈岁》、《守岁》、《别岁》诗韵三首。其中一首云:

我诗一钱腊,君酒得相佐。少壮不复还,造物居奇货。
夜半庵中来,雪珠如豆大。甘为访戴人,不学袁安卧。
执手君颜开,灯花笑佛座。残年纷俗累,有似蚁旋磨。
到此得少休,流光一霎过。试问夜其何?寒鸡唱复和^①。

(2) 元宵节(正月十五)

“汉镇于元夕前后,灯市颇盛,刻翠镂花,裁云缀鸟,极为斗工争巧,半属武昌渡江而来者。耕云有诗云:上元将近月波澄,人集江头语沸腾。竹马鳌山争上市,梅花风里卖春灯。”^②

又己巳(嘉庆十四年正月十五,1809年)上元(农历正月十五日为上元节)后一日,(林琴庵)招集梅子山看梅,同用杨铁崖《花游曲韵》,邀同心盒、白舫登黄鹤楼,偈饮崇府山之霭园^③。

(3) 修禊(农历三月上旬的巳日,到水边嬉戏采兰,以驱不祥,称为修禊。曹魏以后,确定为三月三日)

大概由于较具情致,汉口商人十分重视这个节日,经常于三月三日外出游历、宴集聚会。

修禊欣逢天气清,招提临水快相迎。
峰峦历历窗间出,士女遥遥柳外行。
丝竹远过王逸少,风流谁继谢宣城。
酒阑屋角花飞尽,却怪东君太薄情。^④

“是岁上巳雨中(嘉庆十四年,1809年),(夏)芳原招同心盒、谷原及予子涛修禊于烟鬟阁。出所藏书画,共为赏玩。……觴咏竟日,备极清娱。”^⑤

(4) 端午节(五月初五日)

“余于丁卯[嘉庆十二年(1807年)],曾同黄心盒、方岩夫午日观竞渡,是日

①② 范锴:《汉口丛谈》卷2。

③ 范锴:《汉口丛谈》卷5。

④ 潘国祚:《上巳宴集天都庵》,见范锴:《汉口丛谈》卷2。招提,寺院的别称。

⑤ 范锴:《汉口丛谈》卷4。

士女出游甚众，舳舻舳舳，半载管弦，拇战钩藏，风吹喧笑，盈于江口。窃见歌郎韵卿，隐约于邻舟翠箔间”。范锴因作《梦江南》词云：

空江阔，竞渡吊沉湘。片片彩旗翻浪出，冬冬画鼓曳风长。看夺锦标强。
伊人见，宛在水中央。妒煞绿波留扇影，憎他翠箔隔衣香。两桨为谁忙？

（5）中秋赏月（八月十五日）

“游女如云汉水隈，衣香人影故徘徊。宵行多露依知畏，贪看秋光踏月来。”
“镜合刀还此夜嘉，离鸾别鹤满天涯。人生毕竟团圆好，虔煮心香礼月华。”
“秋色平分月色赊，嫦娥窃药有夫家。今宵多少宜男信，一路锣声听送瓜。”^①

（6）重九（九月初九日）

李以笃重九后，郜凌玉业师同弟霏玉、侄山期诸子，集汉口慧莲庵（今汉口汉中路），时有《吴越游》：

扬帆西去复淹留，令节清宵取次幽。少我篱边迟送酒，从公泽畔赋悲秋。
心情岁月花龛老，兄弟东南竹箭流。更喜客星皆旧侣，相逢不醉为谁愁。

（四）结 语

综上所述，从近代前夜清代汉口商人的社会生活，我们有以下几点粗浅印象：
清代中期以降，汉口商人虽有世俗的一面，但亦非常注重精神生活。

范锴本人显然已注意到了汉口商人的世俗性特点，说：“居此地者，半多商贾致富，书奇风雅勿尚，故会馆公所之名，野墅琳宫之号，楹帖榜额之文，悉皆从俗，未能雅驯。”^②但从他与同行、文士的交游情况来看，他们又具有传统士人的某些特点：自然率性，不刻意追求豪奢浮夸；关注民风，忠实于民俗；感情细腻，及时欣赏自然变化，有着较积极的人生态度。这种风尚与明清以来商人文化素养普遍较高有关，也与汉口五方杂处，受到其他地区商人文化氛围的影响有密切联系，例如鼎盛之时的淮扬盐商，便大都风雅好客，与文人交游，“邗上时花二月中，商

① 周乔龄：《中秋夜汉口竹枝词》，见范锴：《汉口丛谈》卷1。

② 范锴：《汉口丛谈》卷2。

翁大半学诗翁”^①，贾而好儒，文风极盛。汉口盐商大多来自江淮一带，同乡同业，潜移默化的影响不可低估。

同时，由于久居汉口，客寓商人亦渐生乡土情结，能乐善好施，褒奖公益，以扶贫恤孤、济民水火为义举。如汉口水火频仍，常常成灾。“新安程子云携其宗人楚峦，倡捐芦席千万，遇火灾，则给被灾之户构舍栖息，造巨舰二，放乎中流，每日挽救渡生……”^②；胡晓岚，江都人，侨寓汉口多年，年已八十，“平居敦笃善行，老而弥切，江汉相距一水，往来帆樯如织，每遇暴风，往往有沉溺之患，虽有官设救生船只，江面辽阔，不能遍及。老人心焉悯之，于施救事宜，筹之已久。……倡议于晴川阁设局置船，为救生会所。自癸未迄今，仅三载，赖以救活者甚众，此善之大者。他如修桥梁，振贫乏，施药饵，见善靡弗为，为之靡弗力。又尝手书《梓潼帝君阴骘文》，勒石于晴川阁，俾登眺者读之，油然而生为善之念”^③。巴树蕃，“理禺筭，客汉久，广交游，自搢绅以及闾巷，无不知其名者，尤能急人之急，以故有‘小孟尝’之目”^④……

但是，与真正的士子相比，商人这种精神生活的层次还不太高。如对波及汉口、影响清朝政局的一件大事——嘉庆元年川楚白莲教起义，商人们态度鲜明，是完全的敌对和仇视：“嘉庆初元蜂蚁屯，一夜惊波飞霹雳。云车风马围周遭，贼心胆寒空营逃。汉口人家百万户，幸免赤立膏霜刀。”^⑤一方面把起义者看成是抱头鼠窜的无能之辈，另一方面又认为他们是杀人不眨眼的魔鬼，对汉口百万户人家都构成威胁。而同时期赴四川官军中做顾问的安徽士子包世臣，途经武汉时看到、想到更多的是动乱之余百姓的疾苦：“……兵燹有遗黎，缓欠本纡忽。何必问追征，两税知力竭。割鸡饲化鹰，杞人五内热。唯睹麦欣欣，同忧颜暂活。”^⑥“汉川雨彻宵，晨发苦泥泞……准灾两税缓，否则旧欠并。欠课输固当，饿莩不遑更。大臣计盈绌，先在恤民命。怆我乐水怀，不觉涕横进”^⑦，认为在镇压起义的同时，应减轻赋税，与民休息，以免官逼民反，迫使更多的百姓加入叛乱阵营。同一时期商人片面的谩骂和士子深切的忧患形成鲜明对比，二者思想水平的差距，一望可知。商人关注更多的是自己的既得利益，而真正的士子则对百姓民生寄予更多同情。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境界，惟士惟能。

① 林苏门：《维扬竹枝词》，见《扬州风土词萃》。参见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

② 范锴：《汉口丛谈》卷4。

③④ 范锴：《汉口丛谈》卷5。

⑤ 范锴：《汉口丛谈》卷1。

⑥ 包世臣：《早发汉阳县》。《包世臣全集·管情三义》卷4，黄山书社1997年版。

⑦ 包世臣：《杨家嘴却寄舫斋承宣》。《包世臣全集·管情三义》卷4，黄山书社1997年版。

嘉道社会，是清朝国势江河日下的转折时期，也是中国近代转型的前夜。这一时期，国内政治腐败、经济凋敝、流民蚁集，外国势力也通过罪恶的鸦片贸易向中国发起了进攻。与汉口商人同时期的经世士子们，敏察时变，已对当时社会各种黑暗的现象展开犀利的批判，如上面提及的包世臣对兵政、河工、盐政、漕运“四大政”以及稍后的龚自珍、魏源对整个时政的批判等，已在社会各界掀起波澜。相形之下，汉口商人们则仍沉浸在中古时期的生活意境中吟风弄月、感时伤怀，因而所作诗文虽然十分讲究用典和技巧，但艺境不阔，视野不宽，价值有限。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汉口商人的属性使然。客寓外乡谋求商利的生活，使汉口商人常有孤独流离之感，因而贾而好儒，诗赋主题之一便旨在寻求个人情绪的宣泄。同时，由于嘉道时期的汉口商业大多仍是传统商业的延续，其间有些是利用垄断特权，有些是利用家族、帮会优势，外人一般难以插手，竞争性不大，因而入行既久，商人们可轻松维持日常经营，不需花费太多心思。更重要的是，他们在交往中存在着排斥诗文之外其他因素干扰的主观意向，对“抵掌倾谈，诗文外，不屑挂齿也”^①的风度十分赞赏。这种“为诗文而诗文”的精神在太平盛世诚然可以是一种境界，但对于本已远离社会现实的中产商人来说，这种意识只能使他们离现实更远：不仅对国计民生思考甚少，对与他们休戚相关的商业经营也十分淡然。将这种过于恬淡的状态，放入内忧外患迫在眉睫的特定时代背景之下，便可发现近代前夜汉口商人的社会生活，固然诗情画意、丰富多彩，却缺少时代精神的灵魂，游离于社会发展之外。道光年间，以盐商为代表的汉口商人大势已去，走向衰落，诚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总体而言，与不少低俗、奢靡的富商相比，清代中期汉口商人文化生活仍具有一定的士人化特征。从他们对前人的追忆、比照来看，这种特征在汉口显然已源远流长。乾隆初年，“鹤关为汉上寓公，其风心雅兴……文酒歌声，迭主坛垞。同时元白门笔尤超越，领袖诗盟，四方名士，萃集一时，可谓盛矣”^②；“昔年汉上盐鹾盛时，竞重风雅。四方往来名士，无不流连文酒……每当雅集，相与覃研诗词，品论书画。时或舞扇歌裙，浅斟低唱，大有觴咏升平之乐。前辈风流，犹可想见”^③；乾隆中期，“汉上人文”，已蔚然成风。“鹾务中有如此风雅领袖，藉以歌咏太平，真是不可多觐。昔风醇厚，事寓仁慈。以此例分，难梓更益。条单所有，恤贫周急，惠及穷黎寒峻，正复不少；加诸赈款援灾，争先首举；东南财赋，亦得藉以栽培，绝无毁炭雪中，积花锦上之念存于方寸。是以世享丰腴，代传书礼，天心善善，十倍于人。其报施之厚，自丝缕不爽也”^④。斛咏唱酬、恤贫周急，这种风雅、

①④ 范锴：《汉口丛谈》卷5。

② 范锴：《汉口丛谈》卷3。

③ 范锴：《汉口丛谈》卷6。

好义的传统一脉相承至清代中期。

但由于所处社会背景的巨大变化，不仅清代中期的商人们已有“今则反是，渐形衰薄”的感受，在内忧外患蠢蠢欲动的时局下，这种淡雅悠闲的生活方式着实显得有些落伍、腐朽，缺乏应对时变的必要思想准备。正因如此，这种文化生活方式及其成就虽渊源有自，却缺乏深厚的社会基础，缺乏广泛的影响力、感召力，前辈纵然风流，却易被世所遗忘，以至道光年间的汉口“已少识其（鹤关等人）姓氏。所有著述，亦莫觐阅”。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和汉口开埠，汉口中产商人们的古典情怀便成为绝响。至清朝后期，汉口的亭台楼阁名胜犹在，但商人的文化风尚却一去不复返：

名园栽得好花枝，供奉财翁玩四时。
可惜主人都太俗，不能饮酒不能诗。^⑤

“不能饮酒不能诗”的财主们逐渐成为商人主流，一个真正“平民性”的商业都市——汉口逐渐成形。

^⑤ 叶调元：《汉口竹枝词》卷5。见前引：《武汉竹枝词》。

四、汉口模式与中国商业近代化

（一）问题的提出

在谈及中国近代化问题时，人们的视线主要集中于中国的工业化。以英国经验为基础的近代化模式被称为英国模式。这种模式代表了传统经济向近代经济的成功转变，这个转变即“工业革命”或“产业革命”。因此，英国模式的核心，也就是工业革命所体现的经济变革。迪安（Philis Dean）、诺斯（Douglas North）等人认为，工业革命是一个组织变革和技术变革相互影响的过程。雷格莱（Edward Anthony Wrigley）指出，近代工业化实际上是一个从“发达的有机经济”（advanced organic economy）向“以矿物能为能源基础的经济”（mineral-based energy economy）的转变。他进而强调，“要成功地摆脱有机经济所受的制约，一个国家不仅需要那种一般意义的资本主义化，以达到近代化；而且也需要下述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化，即越来越多地从矿藏中、而非从农业产品中获得原料，尤其是能够开发大批能源储备，而非依赖各种过去提供生产所需热能与动力的可再生能源。英国经济正是在上述两种意义上资本主义化了”。最新研究成果表明，尽管英国模式对于研究世界范围内的近代化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并与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相吻合，但由于英国经验的特殊性，故以此作为一种具体的发展模式，英国模式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即使在欧洲也是如此^①。由是引出如下思考：既然英国模式不是惟一的近代化发展道路，那么，是否存在没有发生工业革命，但却发生了以商业革命为主导的近代化？这种商业近代化模式在英国以外的国家或地区是如何生成的？中国是否存在可以解剖的商业近代化的历史文本？

笔者认为，中国存在以商业革命为主导的近代化模式，汉口模式堪称典型。

（二）汉口模式的历史诠释：重要性及特殊性

所谓汉口模式，是指汉口在其传统商业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借助外部因素，成功地完成了向近代的转型。汉口模式的核心，不是通常所说的工业革命，而是中国版本的商业革命。

关于中国经济史上的商业革命，最权威的声音来自斯波义信。在他看来，宋

^① 李伯重：《英国模式、江南道路与资本主义萌芽》，载《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

代就已出现商业革命。宋代是中华帝国 2000 年历史的分水岭,这一分水岭姑且表达为“中世”。在活力和创造性方面,宋代较之西欧史的经验更具特色。因为,无论西欧还是中国,其 19 世纪社会的共同祖型(原型)可以追溯到 12 世纪。中国的 12 世纪,可以说已经达到相当成熟完备的程度,而西欧至 19 世纪才知道有这样的社会文化,其时西欧尚处于萌芽状态。在中国,商业和城市的发达,都未能直接培育出城市共同体和市民法、商法等近代合理的经营制度,那时,它们被寄生于随着时代进步而缓慢渐进式的社会发展;另一方面,商人把自己的身份目标定在跻身于士绅阶层。但是,8~13 世纪的中国取得了很大的经济增长,从而带来了社会和文化方面的重要变化。总之,可用一句话概括为:与其说是“纯农业文明”,不如说是“都市化文明”含有更多的固有特征,这是延续至 19 世纪中国社会的最大特色。斯波义信指出,宋代的各种革命(商业革命、都市革命、交通革命、农业革命)在规模和深度上呈现出初期的态势,远不及后来的 16 世纪、19 世纪的变革,但宋代的变化成为后世变革的“祖型”,这是相沿未变的^①。沿着斯波义信的思路,笔者认为在宋代——清代的中国经济史的变迁过程中,有过三次商业革命:第一次,宋代商业革命,以坊市制的崩溃和市场化程度加深为标志;第二次,明清商业革命,以市镇经济的繁盛为标志;第三次,清末商业革命,以通商口岸为核心的近代化商业群落的出现为标志。从英国模式反观中国的近代化,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的近代化走的是一条商业化的道路。传统商业的自我发展,为中国近代化提供了最重要的历史资源^②。这就是中国版本的近代化。汉口模式正是这种中国文本的典范。

① [日]斯波义信著,方健、何忠礼译:《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65~66 页。

② 刘石吉指出,无论从人口或商业机能来看,明清江南专业市镇的繁庶在许多方面超过了传统行政中心的县城甚至府城。此种商业机能凌驾行政机能的转变现象,正可说明中国近代都市化过程中“城”与“镇”的渐次分化,以及“非行政机能”(Non-Administrative Function)的渐次强化。在近代以前,这些市镇中有的已经发展至接近现代人文地理学者所定义的“充分成长的城市”(Full-fledged City)。有些著名市镇的中央性(Centrality)机能极为显著,不但是其周边乡村地区货品的主要供应者,而且也逐渐成为新思想的传播媒介。面对近代西方商业势力冲击的这些传统市镇,不但没有扑倒沉沦,而且在清末更是踵事增华,在传统高度的经济韧性中,增添了不少的“现代”气息。从明清以来江南市镇的形成发展与机能演变的史实中,使我们可以再度肯定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Secular Trends)。(参见刘氏《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专业市镇》(下),载《食货》1978 年第 8 卷第 8 期。)樊树志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传统农业社会的历史就是乡村不断城市化的历史。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大批市镇的形成过程,就是一个乡村的城市化过程。(参见樊氏《市镇与乡村的城市化》,载《学术月刊》1987 年第 1 期。)王瑞成的表述更加清晰,他认为宋代至明清时期,在以手工业和农村商品经济为内容的商业化条件下,中国城市化走了一条独特的市镇化道路。这表明,中国独立的城市化还处在较低的层次,必须在经济领域寻求更大突破才有可能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但是,这一突破还没有实现,中国独立城市化的进程就结束了。(参见王氏《近世转型时期的城市化——中国城市史学基本问题初探》,载《史学理论研究》1996 年第 4 期。)许檀指出,明清时期城乡网络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国近代市场体系的形成并非始于开埠之后,至少从明代已经起步,到清代中叶已具有相当规模,并卓有成效。(参见许氏《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及其意义》,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 年第 2 期。)乔志强、陈亚平试图从城市化与近代化的双重角度确认明清市镇的历史地位,他们深刻论证了江南市镇原生型城市化及其近代际遇,认为明清时期江南市镇已经出现了城市化发展趋势。这种城市化是建立在商业贸易和商品化农业、手工业基础之上,在大中城市市场带动下萌生的。市镇与大中城市以及乡村家庭化生产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江南发达的水运系统维持和加强着这种关系。这是一种自然演进的原生型城市化。以近代工商业为龙头的近代城市化模式和这种原生型城市化的结合,离散了旧有的城镇乡村之间的联系。新的城市化模式既使一些城镇迅速发展,又造成城市结构失调,城乡差别加大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是一种二元结构的城市化模式。(参见乔氏、陈氏《江南市镇原生型城市化及其近代际遇》,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 年第 2 期。)

斯波义信对汉口模式的发展道路有过精当的描述,称:“1465年,因湖北省汉水下游的航路改变而产生了名曰汉口的小市,1497年升格为镇,此后被常设为镇。19世纪初发展成为拥有100万人口,控制由两湖的全部、江西、河南、陕西的各一部组成的商业圈——‘长江中游大地区’——的中枢首府;而且成长为集地区首府、大城市、地方城市三重商圈的交易功能于一体,各种功能兼而备之的商业中心。这一地域的成长,一定程度上仰赖于地域内特产化商品的输出和经过汉口的商品交易,而控制流通大宗商品的山西、新安、江西、广东、宁波等有实力的外来客帮商人集团。新安、江浙商人主要控制米的经销,江南商人主营木材,广东、山陕商人则为茶,而山陕商人则掌握着金融业;与此相对而言,当地商人则经营省内外的木材,控制交通业及本地产的米、茶等专营项目。当初的汉口,由客帮确立其垄断性的霸主地位;但在19世纪中叶,与力求摆脱当时产生的政治、财政危机的动向相呼应,促进超越地方主义的地区整合潮流应运而生。汉口市的客帮、本帮超越派别利益,形成了同业行会联合体,并被当局赋予实质性的市政运营的主动权,向包括全地区范围内自治的目标迈出了划时代的前进步伐。”^①有研究者指出,“湖北近代社会结构的改组与经济形态的变更,首先是经由贸易——市场这一渠道开始的。汉口卓越的商业地位,是其被列强辟为通商口岸的原因之一。湖北地区倾向于近代化的一系列震动、变迁及努力,正是以汉口开埠为契机的”^②。

如前所述,明清市镇的繁盛是中国经济史上的第二次商业革命。汉口镇的兴起,是这次商业革命的重要成果,同时又可视作这次商业革命的重要标志。如果说,汉口自明代成化年间因汉水改道而肇始,经过170余年的磨砺迈入清代,属于汉口商业的发育期;那么,清代前期200余年的风雨兼程,则可视为汉口商业的成熟期。近400年的商业发展,为汉口商业近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至汉口开埠前夕,这时的汉口虽然只是一个市镇,其经济发展水平尤其是商业名气却超过府县,与省会齐名^③。清乾隆《汉阳县志》卷6《城池》载:“汉口镇,在城北三里,分居仁、由义、循义、大智四坊。当江汉二水之冲,七省要道,五方杂处,由额公嗣至艾家嘴长十五里,陆居则蜂房蚁垤,舟居则鱼鳞鹰阵……”清同治《续辑汉阳县志》卷首载汉阳县事王庭楨序称:“闻昔兹邑,汉皋最为殷阜,地当八达之衢,舟

① [日]斯波义信著,方健、何忠礼译:《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9~30页。

② 陈钧、任放著:《世纪末的兴衰——张之洞与晚清湖北经济》,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页。

③ 近人吕寅东编纂《夏口县志》卷2《商务志》指出,乾隆时期,汉口巡检司已由汉水南岸移到北岸,“而今之汉口乃为市场之所集矣”,标志着汉口市场最终定型。另据《嘉庆重修一统志》卷338《汉阳府·关隘》称,汉口“当往来要道,居民填溢,商贾辐辏,为楚中第一繁盛处”。

楫所萃，上自三巴、两粤、南楚，下迄江淮，西则密迩荆襄，商船连檣，几于遏云碍日。”上引史料说明汉口的商业辐射力极强，市场发育状况和贸易吞吐机制均属上乘。清代湖北巡抚晏斯盛认为：“查该镇（指汉口——引者注）盐、当、米、木、花布、药材六行最大，各省会馆亦多，商有商总，客有客长，皆能经理各行各业之事。”^①如果对比清代文人叶调元《汉口竹枝词》所谓“四坊为界市廛稠，生意都为获利谋，只为工商帮口异，强分上下八行头”^②，那么，可以大体推断出商人们热衷的行当为金融、典当、粮食、木材、药材、服装面料、纸张、杂货各业。时人称：“汉口不特为楚省咽喉，而云贵、四川、湖南、广西、陕西、河南、江西之货，皆于此焉转输。虽欲不雄天下，不可得也。”^③这表明，拥有水运优势的汉口镇，是周边广阔的经济腹地商品交换的中介市场。有研究者指出，“广大市镇初级市场的发达，形成了前现代化的市场网络，有力地促进了地方和区域的商业一体化”^④。这种以广大市镇为经济中心地的高度发达的市场网络和商业机制，就是明清时期商业革命的主要内容。明清商业革命有三大特征：

其一，这种商业革命不是政府行为，而是自发地顺应商品经济的规律发生并向社会经济生活的纵深地带拓展的。从历史的长时段看，中国传统的市镇发展大体上经历了秦汉的定期市、魏晋隋唐的草市、宋元的草市镇、明清市镇这几个重要阶段。宋代坊市制的崩溃，为明清市镇的脱颖而出扫除了制度障碍。宋代以降商品经济的发展，又为明清商品经济更上一层楼奠定了基础。宋代，江汉平原广泛筑堤围垸，出现垸田这一特殊的土地利用形式，使汛期常遭水淹的江汉平原成为主要农业区。迨至明清时期，由于两湖平原及鄱阳湖平原的深度开发，农业耕作制度及技术的进步，区域间人口频繁且大量的流动，农民们数个世纪的辛勤劳作，水利工程的兴修等，导致长江中游地区尤其是两湖平原的农业生产有了长足发展，余粮率稳步上升。“湖广熟，天下足”的民谚，说明两湖地区的粮食已成为全国范围长距离贩运贸易的重要商品。在粮食商品化的带动下，两湖地区农业生产的商品化程度得以加深。经济作物（棉花、茶树、梧桐、烟草等）的广泛种植，也为农业经济结构的变动尤其是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创造了契机。在农业生产逐渐商品化之际，传统手工业的发展及城乡居民的多种需求，跨区域的人口流动，使长江中游地区的商品流通日益活跃。据章学诚所著《湖北通志检存稿》统计，清代前期湖北市场的商品流通十分可观，商品种类多达 18 类 230 余种。

① 晏斯盛：《请设商社疏》，载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 40，《户政》。

② 叶氏点到的八大行，系指银钱、典当、铜铅、油腊、绸缎布匹、杂货、药材、纸张。

③ 刘献廷：《广阳杂记》卷 4。

④ 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 1 卷（1800～1949），三联书店 1995 年版，第 36 页。

其二，宛如中国的经济中心在宋代发生了由北至南的转移一样，到明清时期，中国传统的商业中心也出现了由府州县城向市镇一级中心地的位移。明清商业革命的最具革命性的意义在于，中国自古以来的政治中心与商业中心合一的格局被打破，出现了政治中心与商业中心剥离的现象，广大市镇如雨后春笋涌现，取代传统政治中心——府州县城成为商品经济的中心舞台。府州县城仍然保持着政治中心与商业中心链接的态势，但其商业机能却因贴近政治中心而大为逊色。反观广大市镇，因处于边缘社会之地位^①，实际上处于一种权力的半真空状态，这种没有效率的社会控制局面极大地促进了市镇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在区域内及区域间形成了各种专业市镇及长距离贩运市场，有力地加快了基层社会的商品化，从而为中国商业的近代转型创造了必要条件。从历史时段上看，长江中游地区市镇经济发展的三个关键时期分别是：唐宋时期、明代及清前期、晚清时期。唐宋时期是市镇从传统草市及军镇体系中脱胎而出的时期，明代及清前期是市镇获得商业独立地位后不断扩展的时期，尤其是随着明清易代的硝烟散尽，市镇的经济地位迅速上升，开始取代县城成为新的商品经济增长点。少数大型市镇甚至超越府州县城成为区域经济中心，这一超常现象似可从清初四大商镇的排名中窥见一斑。清同治《江夏县志》称，武昌兼为府城及县城，“水陆交通，百货云集。元暨明初，汇于金沙洲。崇祯间，鹦鹉洲没于江，更汇于坛角。舟车络绎，熙来熙往，号称极盛。兵燹以后，开濠清野，市廛丘墟，而一二操奇计赢者，乃散寄于乡镇。故邑自抱布贩木，仍守旧业外，其余不过经纪无缺焉”。在经济实力上，明代的汉口镇尚不足与武昌匹敌，迨至清初，它一跃而为超级市镇，把武昌抛在了后面。晚清时期，市镇在中西文化交汇、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初步接轨的背景下步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其三，中国的市民文化在宋代的基础上臻于成熟，并且由府州县城向市镇渗透，形成以市镇聚落为依托的市民文化。市民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与商业人口的增长密不可分。以长江中游为例，按人口规模划分，大体上可分为小型市镇、中型市镇、大型市镇、超级市镇4种。人口在数百户左右甚至更少者，为小型市镇。这种小型市镇在一府一县占绝大多数，是明清长江中游市镇分布之常态。人口少至千户、多至数千户者，为中型市镇。人口在一万户以上、十万户以下者，为大型市镇。在十万户以上者，为超级市镇，如景德镇、汉口镇，人口均有数十万之多。市镇人口中，商人、铺户、小贩当然属于商业人口，市镇吃商品粮的定居居民，市镇中从事手工业的作坊主及工匠，各种手工艺人，以致到市镇购物、消费、游玩的各类人员，也应视为商业人口。在清代前期汉口镇的人口构成中，以商人、小贩为主干的流动或非流动人口占绝大多数。清乾隆《汉阳府志》卷16称：“又云汉口一

^① 参见任放：《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研究》，武汉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2001年博士学位论文。

镇，五方杂处，商贾辐辏，俱以贸易为业，不事耕种。”叶调元《汉口竹枝词》亦云：“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以茶馆为代表的服务业是中国传统市镇的商业标识，其荣枯程度与茶叶的营销好坏成正比。此外，茶馆的多寡也从一个独特角度体现出市镇经济的成熟与否乃至文化品味之高低。从消费角度看，汉口茶馆的兴盛典型地体现了汉口自身浓郁的市民口味，饮茶已成为清代前期汉口镇的一大民俗。清代前期，汉口的茶馆颇多。诚如叶调元在竹枝词中所云“无数茶坊列市廛，早晨开店夜深关”。这些茶馆多集中在汉口后湖一带，多达数十家，以白楼、第五泉、涌金泉、翠香、惠芳、习习亭、丽春轩等处最为著名。大量的行商孤旅、平民百姓抬脚走进茶馆，品茗谈笑间暂时忘却生计之烦累、路途之劳顿。更有文人骚客相约成行，以茶入诗的风气颇为浓厚。值得注意的是，汉口女子逛茶馆已是一种日常消费行为，“后湖时有妇女结伴闲步，倦即偈坐茶寮，唤烟呼茗，不以为嫌也”^①，活脱脱的一幅适情写意的市井民俗图。汉口模式所体现的独特而浓郁的市民格调，由明清以降，传承不坠，直到今日当我们徜徉于汉口繁华的都市街头，扑鼻而来的正是这种历史悠久、愈来愈浓的市民文化。

对汉口模式的历史诠释，实际上就是对明清时期中国版本的商业革命的个案分析。不仅如此，汉口模式对中国商业近代化的意义十分重大。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传统市镇都迈入了近代化的门槛。由于历史机缘的不同，相当多的传统市镇在近代化的背景下趋于式微。笔者在查阅数百部方志时发现，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绝大多数在晚清时期无甚变化，依然保持着传统的故态。大量的清同治、光绪年间修纂的方志，令人感受不到丝毫近代气息。在中国传统的四大商镇中，只有汉口镇依托自身的商业实力，在外部因素的刺激下，完成了近代转型。在此基础上，汉口镇又以商业优势拉动武汉地区的经济发展，使武汉市成为华中地区最大的经济中心，并跻身全国著名的大都市之列。在这个意义上讲，汉口模式是研究中国版本的商业革命及商业近代化的重要文本，同时也表明，汉口模式有其特殊性，不具有普遍意义。这一点，与英国模式何其相似耳？！

关于汉口模式的特殊性，有研究者指出：汉口之所以能够由一个传统市镇蜕变为具有近代色彩的工商业大都市，离不开各种条件的铺垫，包括不可多得商业流通渠道是汉口市镇生命力长盛不衰的地理条件，汉口辟为通商口岸为汉口市镇经济近代化提供了制度保证，俄国商人力量对汉口市场的强力浸透是汉口市镇经济近代化的催化剂，旧式的钱庄票号为汉口市镇经济近代化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资金援助。当然，汉口市镇经济并非在所有方面都实现了近代转型，从而呈现出新旧杂陈的面目。但其具有近代色彩的部分仍然相当醒目，可以概括为：机器工业的出现是汉口市镇经济近代化的典型体现，全新的海关制度成为汉口商业贸易近代化的象征，银

① 范锴：《汉口丛谈》卷2。

行系统的诞生使汉口金融市场发生了质的变化，人口急剧膨胀是汉口升格为近代大都市的重要指标，汉口服务业尤其是近代公用事业（电灯、自来水等）的发达是汉口市镇近代化的显著标志，买办扮演了汉口市镇经济近代化的关键角色，商会的成立是汉口商人组织在机制上实现近代转型的重大举措，汉口成为近代中国仅次于上海的商业大都市，有“东方芝加哥”之美誉^①。需要强调的是，尽管汉口镇在开埠后的四五十年间相继出现了近百家外资企业和中国人创办的企业，行业涉及造船业、榨油业、火柴业、服装业、面粉业、食品加工业、木材加工业、机械制造业、砖瓦业、肥皂业、玻璃业、棉织业、烟草业、造纸业、化工行业、制革业、水泥业、碾米业、制药业、制茶业、建筑业、印刷业、麻织业以及水电等公用事业，但大多数属于小规模经营，资金有限，雇工人数超过千人者尚少^②。更重要的是，英国模式的以煤铁重工业为主导的两大部类生产格局在汉口并未出现，汉口近代工业格局以轻工业为重，重工业畸少畸弱。这种轻工业畸多畸强、重工业畸少畸弱的工业格局一直延续至今日。只能说，机器工业使汉口市镇经济在技术层面上出现了突破，但远不足以导致一场英国式的工业革命。历史的事实表明，汉口经济近代化的动力来自商业化，而非工业化。

（三）汉口模式与中国商业近代化：一个多样性的历史命题

由于历史机缘、地理及人文环境、区域经济水平等条件的制约，中国商业近代化便成为一个多样性的历史命题。存在着北京模式、上海模式、天津模式、重庆模式、南京模式、苏州模式、广州模式、福州模式、九江模式、汉口模式等多种商业近代化道路。没有一个统一的静态的模式，因为每一种模式都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商业近代化模式。这体现了中国历史的复杂性和丰富多彩。在这一背景下谈论汉口模式与中国商业近代化的关系，可以引出如下思考：

汉口模式表明，中国近代化的基础及动力不在工业领域，而在商业领域。这是异于英国模式的中国版本的近代化。李伯重在研究江南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时，认为明清江南工业的发展属于斯密型成长。换言之，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推动了江南工业的发展，而这种推动作用的大小和持续时间的长短又主要取决于市场的变化。确切地说，明清江南工业的发展主要是受中国国内贸易的推动。在此方面，江南所处的地位似乎比英国更为有利。按照安吉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

^① 任放、杜七红：《传统市镇近代化刍论——以汉口为个案的研究》，载《人文论丛》2000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② 陈钧、任放著：《世纪末的兴衰——张之洞与晚清湖北经济》第2章，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的测算,在1700~1820年间,中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GDP中所占的比重从23.1%提高到了32.4%,年增长率达0.85%;而整个欧洲的GDP在世界GDP中所占的比重仅从23.3%提高到了26.6%,年增长率为0.21%。这表明,在明清时期,中国国内市场不仅在绝对规模上,而且在扩大的速度上,都是惊人的。与英国相比,至少在绝对规模上,明清中国国内市场比英国及其殖民地所形成的大英帝国市场要更大。不仅如此,由于明清江南是大一统的明清帝国的一部分,而且在这个帝国中占有最佳交通位置,因而江南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从巨大的中国国内市场获得地区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好处。这比近代早期的英国必须用战争来捞取海外殖民地市场的经济利益,成本要低得多。此外,明清时期东亚地区国际贸易的发展,导致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贸易圈的形成,江南正处于这个贸易圈的中心。如果没有西方的入侵,江南的早期工业化只有很小的可能性会发展成为近代工业化。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斯密动力无法导致工业革命。在此意义上说,由于缺乏煤铁资源,江南不可能出现能源革命以及材料革命,因此当然也不可能发展到近代工业化^①。江南尚且如此,更何况经济水平落后于江南的其他地区?以湖北为例,汉口开埠前,从乡间到城镇构成了一个传统手工业生产网,其中手工棉纺织业是主体。与江南一样,湖北传统工业的发展属于斯密型成长,无法导致近代工业化。有研究者指出,即使1889年张之洞督鄂之后出现了“湖北新政”,但在湖北广袤的农村里,自然经济的主导地位并未动摇。如果说,“湖北新政”以其近代化的崭新气质跃上了清末湖北社会经济的第一个层面,那么,农村中的自然经济则以其古典的苍老姿态端坐于清末湖北社会经济的第二个层面。这种经济板块,典型地体现了传统与近代化的冲撞、调和、矛盾、共生的多重关系^②。

正是由于中国近代化的基础及动力不在工业领域而在商业领域,所以当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之后,潮水般涌入中国市场的机制棉纱、棉布便逐渐瓦解了中国传统的纺织结合的农民家庭棉纺织手工业:首先割断了纺与织的有机统一,后来伴随着机器织布厂的建立,又在开风气之先的地区将手工棉纺织业排挤出历史的中心舞台。但是,明清时期形成的传统商业网络及市场机制基本上未受到冲击,并保持原有的活力,成为洋货输入与土货输出的最主要的商品流通渠道。不同的是,这时形成了二元商品流通渠道:一是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商品流通渠道,以洋货进口及土货出口为贸易大宗;二是未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商品流通渠道,以土货的国内贸易为主。西方列强利用了中国传统的商业化的成果,这一方面便利了西方资本主义对中

① 李伯重著:《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00~1850年)》,第11章《代结论——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化:明清江南工业的发展前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② 陈钧、任放著:《世纪末的兴衰——张之洞与晚清湖北经济》,第2章《近代工业框架的耸立》,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国的掠夺，另一方面又使得中国部分地区的传统商业能够抓住历史机遇，实现近代转型。汉口镇就是最佳例证。

汉口模式是中国商业近代化诸种模式之一，它为我们研究此课题提供了历史文本。汉口近代化的动力是商业化而非工业化，此与上海模式等有重大区别。历史昭示我们，一个国家在实现近代化（或现代化）的过程中，应该注重发挥区域优势，不可按固定模式硬套，不要追求大而全的经济格局，有的区域可以走商业化的道路，有的区域可以走工业化的道路，有的区域可以突出文化教育，有的区域可以加强农业生产，如此则可形成区域规模经济，然后在全国统一的大市场条件下，实现优势互补，获得最大经济效益，使综合国力上一个新台阶。在此基础上，实现民族复兴，跻身世界强国之列。

五、晚清武汉经济发展及其特征

从总体上来看，历史上的武汉主要是作为一个建立在传统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封建城市，武汉三镇也因此根据各自的特点独立存在，互不隶属。1861年以后武汉开始向近代转型，三镇逐渐趋于一体，由一个区域中心变为一个全国瞩目的近代大都市，是长江流域乃至全国知名的“开风气之先”的地区。经济结构及其发展程度不仅是社会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而且它任何局部的变化都有可能引起整个社会结构的变迁。考察近代武汉的发展，我们发现晚清武汉“城市的经济功能与作用比以往大大增强，它已成为决定城市地位、命运的另一个先导因素”^①。为了正确地理解武汉在近代的崛起，我们有必要从经济的角度入手，考察武汉地区开埠后经济功能的变化，并由此揭示近代武汉社会变迁的内在动因。

（一）

商贸方面，武汉地区一直是长江中游的商业中心。明中叶以来，在南方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刺激下，汉口迅速发展起来，成为一个“商船四集，货物纷华，风景颇称繁庶”的大市镇^②，号称“楚中第一繁盛处”，位居四大名镇之首。根据章学诚：《湖北通志检存稿·食货志》的记载，当时汉口市场上的商品来自全国各地，品种涉及当时所有的经济部门，共18大类，具体有名称者达230余种。其中纺织品最多，有60多种，盐、粮、茶、酒等日常生活物资约50余种^③。显然，汉口市场属于以经营日用物资为主的普通消费品市场。作为一个全国性市场，其功能主要是中转批发。1861年3月，英国官方及商界代表威利司、韦伯等人带着刚刚迫使清政府签订的《北京条约》和《天津条约》抵达汉口，与湖广总督官文议定通商事宜，不久英国单方面宣布汉口通商。英国及其他资本主义列强的渗入，使武汉及周边地区的经济发生重大变迁，这一切首先是从贸易开始。1862年英国怡和

^① 章开沅、罗福惠：《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2页。

^② 乾隆《汉阳府志》卷12。

^③ 章学诚《湖北通志检存稿》。

洋行和德国礼和洋行首先在汉口设立分行。随后,其他列强也接踵而来。到20世纪初,仅汉口就有16个国家分别开设了140余家洋行^①。这些洋行利用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经济特权在武汉从事大规模贸易活动。“洋货匹头进口逐年增长。”^②武汉地区传统以米、布、盐、木材为大宗商品的贸易结构开始崩溃。而以洋纱、洋布和茶叶为交换主体的新型市场体系开始建立。一方面洋货贸易形成了一股新的商品潮,另一方面大批土货也成为汉口对外的抢手货。尽管武汉开埠在时间上并不早,但它的商业贸易很快跃居国内各商埠的前列。就直接对外贸易出口而言,1880~1888年的贸易总值为55 321 698海关两,年均值为6 146 855海关两,超过了同时期的牛庄、天津、烟台、厦门等商埠,仅次于上海^③。此后武汉商业发展更为迅速,进出口贸易额每年以200万海关两的速度增长。1899年,汉口的贸易净值达90 879 032海关两,创1861年以来最高纪录^④,商业贸易方面达到巅峰,成为近代中国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通商口岸,号称“东方芝加哥”。

清末武汉地区除了贸易额急剧增长外,还发生了其他变化。首先,旧有贸易结构发生变化,武汉市场的职能与地位也随之调整。开埠后,以洋纱、洋布为代表的外国商品成为武汉地区贸易的重要内容。“综计每岁货价,多至四千余万金,最少年份,亦有三千余万金。”^⑤另一方面,土货也因对外贸易而交易量大增,其中茶叶表现最为突出,“每逢茶节,江舟袞袞,行贾济济,问其何事,莫不曰载茶。问其何往,莫不曰到汉口”^⑥。上海之英美茶商各路糜集武汉。汉口沿江码头,茶叶山积。自开埠到辛亥革命时,茶叶一直是汉口出口的第一大宗。无论是棉制品进口,还是茶叶出口,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着密切关系。武汉市场也由原来一个全国性商品市场变为了一个国际性的商品市场,并纳入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世界市场的任何波动都将对它产生重大影响。

其次,与开埠前汉口贸易主要是自发产生,受政治影响甚小不同,清末武汉地区的贸易受地方行政大员的高度重视,他们通过行政手段对市场施加了很大影响。如张之洞督鄂期间,积极推行“商战”方针,亲自制定了一系列商品产销的政策,以从洋商手中夺回“利权”。为此他相继设立了汉口商务局、商会公所以及两湖劝

①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湖北简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24页。

② 《江汉关贸易报告》,《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第1辑),湖北省贸易志编辑室编。

③ 陈钧、任放著:《世纪末的兴衰——张之洞与晚清湖北经济》,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72页。

④ 《Hankow Decennial Report for the Years 1899》,《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湖北省贸易志编辑室编。

⑤ 《湖北商务报》第11、14、15册,《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湖北省贸易志编辑室编。

⑥ 皮明麻:《武汉城市发展的轨迹》,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79页。

业所,认为这样“既可兴商务,亦可勉工艺”,“以期抵制漏后,免为洋商挟制”^①。张之洞还极力主张减免税厘,在对外修约谈判中极力减少西方侵略者的贸易特权,并几次阻止洋商在租界外设立趸船,通过种种手段提高土货竞争力。为联络商情,宣传商学,1899年张之洞在汉口创办《商务报》。1902年,张之洞在武昌兰陵街设立两湖劝业场,陈列和销售武汉及湖北其他地方的工农业产品。1909年,继任两湖总督的陈夔龙又在武昌文昌门组织了规模更大的武汉劝业奖进会,除展销湖北和武汉的产品外,还设有直隶、湖南、上海、宁波展馆以及汉阳兵工厂等7个特别陈列室。张之洞和他的继任者的行为无疑有助于武汉近代商人集团的兴起,我们也发现,在大规模的对外贸易中,武汉商人开始在整体上觉醒,出现了一股实业救国、商务兴邦的社会思想。1908年,武昌湖南会馆召开特别大会,议定将汉口湖南会馆改为商学会。大会通过宣言,提出六点主张,要求大家“知商战之烈而谋挽救”,提倡研究商情,“取外国成绩,变通用之”,“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由此看来,商业在近代武汉已成为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商业对武汉社会变迁的影响也随之越来越大。

(二)

与大规模贸易相对应,开埠后武汉地区近代金融业发展起来,其组成包括三个方面:外国银行,钱庄、票号、钱铺、当铺等传统银钱业,官钱局和中国银行。

武汉地区金融近代化是从外国银行设立开始的。1863年夏,英国麦加利银行派专人来汉口,租屋营业。1865年,该行在汉口英租界正式开业。汇隆、汇川、汇丰等银行也相继在汉口设立分行。此后随之而来的还有德国德华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俄国道胜银行、日本正金银行、美国花旗银行、比利时银行等。在各银行中汇丰银行资本最为雄厚。外国银行的业务,涉及贷存、汇兑、投资,同时承办中国政府的借贷及关税、外汇收入的保管业务,并且直接插手进出口贸易。

明清之际,伴随国内贸易发展,武汉地区就有不少旧式银钱机构——钱庄、票号存在。关于近代外国银行与钱庄和票号的关系,一般观点认为票号与钱庄“根本无法同外国银行竞争。在外国银行的挤压下……多数面临破产边缘”^②。然而在武汉情况却并非那么简单。开埠以来,特别是开埠初期,武汉市钱庄、票号不但没有减少,相反迅速发展。原来一些小钱庄,在商业发展的刺激下,也“开始发挥比较重要的职能”,资本由几百两银子增至2 000到8 000两,“对任何与它们有业务往

① 《张文襄公全集》卷47。

②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湖北简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29页。

来的,有地位的商贩开发期票”^①。到19世纪70年代末,汉口资本较大的钱庄便发展到40余家。虽然在19世纪80年代末,由于茶叶贸易波折,汉口大钱庄减至24家,但又增设了许多小钱庄,“几乎为10年前钱庄数目的十倍”^②。钱庄和票号在武汉商务中的作用几乎与英国的银行同样重要。根据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汉口公论新报》记载“本镇八大行生意,去岁获利者推钱业为最”^③。这表明旧有钱庄票号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和对环境的适应性。

汉口开埠后,面对外国银行对汉口传统金融业的冲击,旧有的钱庄票号一方面试图进行抵制,另一方面则开始积极适应外部环境变迁,发生了一些醒目的变化。最明显的就是它们趋附于外国银行,并逐渐买办化。为开拓在汉业务,外国银行在其压制中国钱业效果不明显的情况下,转为拉拢,借武汉地区的金融力量谋求发展。如在1866年金融风波中,“汉口外国银行的洋行,几乎没有一家不千方百计设法使自己走在别人前面。他们争着纵容自己的买办和钱庄勾结起来,以钱庄作为获得赊销洋货乃至周转投机的头寸的工具。在他们纵容下,买办的投机活动达到毁灭性程度”^④。而钱庄票号对银行这种行为则表现出较为灵活的接纳态度,“银钱市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中国商人对外国银行的信任日增”^⑤。

外国银行与旧式银钱业的相互认同,反应了开埠后武汉贸易变迁的特征及需求。首先,由于钱庄与中国传统商业联系紧密,又具有调节商品流通和资金周转的功能,符合西方列强在内地推销商品、开拓口岸和市场的需要。另一方面钱庄也假手银行强大的资本扩大自己的金融活动,以博取利益,二者有着内在的利益联系。另外旧式银钱业的买办化也与大批买办商人积极投资钱庄有关,如东方汇理银行的买办刘歆生,开设阜昌钱庄;先后任德华、道胜银行的买办刘子散开设广大钱庄;买办商人莫兰生开设了怡和、怡和永、怡和生三家钱庄。买办在钱业里举足轻重,一方面说明钱庄在买办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武汉地区买办经济实力雄厚,开始染指金融业。这也是他们由买办商人向民族资产阶级过渡的一个重要途径。

由于商业的迅猛发展,市场货币缺乏。张之洞为此先后设立铜钱局和银元局,制造铜钱和银元,保证市场货币供应总量充足,进一步活跃了市场。为了方便交易,湖北官钱局还发行纸币,在省内各商埠及湖南、江西某些地区流通,同时开展

①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三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76页。

② 《Decennial Reports 1882~1891》(汉口)。

③ 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市分行金融研究所编:《武汉钱庄史料》。

④ 汪敬虞:《19世纪外国在华银行势力扩张及其对中国通商口岸金融市场的控制》,《历史研究》1963年第5期。

⑤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三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74页。

存贷款业务，起到了地区银行的作用。与此同时，中国通商银行、中国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四民银行等国内知名银行都在武汉设立了分支机构。

不同性质和层次的金融机构在武汉构成了一个多层次的近代金融体系，可以满足商业贸易中各种不同的需求，为武汉近代商贸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支持，这也是武汉在晚清时经济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

与开埠前相比，开埠后武汉地区近代企业的产生和发展是经济变迁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它最初是由外国侵略者创办的。早在开埠以前俄商就在恰克图从晋商手中购买湖北羊楼峒茶。开埠后，俄商开始直接来汉口贩茶，并在羊楼峒设立制造砖茶的作坊。为提高效率，1863年俄商在汉口创办顺丰砖茶厂，使用机器生产。这是武汉地区第一个近代企业。随后，各国商人纷纷在汉口设厂。1908年投产的汉口英美烟草公司，为辛亥革命前最大的外资企业，采用最新机器，“每天生产纸烟一千万枝”。

考察列强在武汉地区开设的工厂，除了少数从事轻工业制造和公用事业外，多数是为掠夺性贸易服务的原料加工业。根据统计，外商在汉经营的12家主要的近代工厂中，加工工业占38%^①，占绝对优势。其中又以俄商开办的砖茶厂最为有名。从1863年至1877年，汉口顺丰、新泰、阜昌3个俄商茶行创办了4个机器砖茶厂。1878年发展为6个。根据时人回忆，19世纪70年代汉口俄商茶厂有蒸汽动力砖茶机15台，茶饼压机7台，还有锅炉、电机等设备^②，十分先进。另外英国隆茂洋行于1876年设打包厂，使用水压机作业。1887年开办的德商美最时蛋厂、礼和蛋厂均采用蒸汽打蛋机和德式真空干燥法、美式喷雾干燥法生产，“在开工季节每天用蛋三万至四万枚”^③，技术力量十分雄厚。正是在这种前提下武汉的蛋加工和茶业一直在全国独占鳌头，使武汉地区的工业一开始就站在一个高起点上。

武汉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起步较晚。1895年以前，尚无一家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较大的手工工场，也只有武昌的鼎升恒、谦益恒两家榨油厂，资金不过2万元，工人也只有59人。甲午战争后筹办民族工业以拯救民族危机成为一股潮流，清政府碍于形势也宣布允许民间办厂。在这种背景下，武汉地区出现了由民族资本创办的、采用机械生产的两家近代工厂——兴商砖茶厂和美盛榨油厂。1905年到

① 陈钧、任放著：《世纪末的兴衰——张之洞与晚清湖北经济》，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7页。

② 郭其耀：《武汉最早的外商工厂——俄商砖茶厂》，《武汉工商经济史料》（第二辑）。

③ 贺觉非、冯天瑜：《辛亥武昌首义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页。

1907年是武汉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一个高潮。由于日俄战争的刺激和抵制美货运动的推动,大批工厂建设起来,业务包括面粉、榨油、烟草、碾米、水泥、水电、机器制造等。其中既济水电公司和全国第二大机械厂“扬子机器公司”都是这一时期建立的。至辛亥革命前武汉地区规模较大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厂有40余家。根据对其中30多家的统计,计有工人约8000人,资本额为10465980元^①。

武汉地区近代工业,发源有以下几种:(1)由传统手工业发展而来。如周恒顺机器厂,其源头可追溯到明末周天顺炉坊。1866年该厂开始用新法铸造,后又陆续添置机器,几经改造扩充,至1905年已拥有20匹马力的蒸汽原动机和一批先进的机床,产品包括蒸汽机、轮船、起重机等。生产的打包机还广被洋行采用,享誉海内外。(2)大商人投资兴办。如1897年,商人宋炜臣创办燮昌火柴厂,拥有排梗机38部,工人1400人,月产双狮牌火柴150箱。开办当年,即获利18万两,“蜚声汉皋”。后又创办既济水电公司、富池口铜煤矿、五丰铜矿公司等近代企业。(3)买办资本转变为民族资本。如著名大买办刘歆生创办的歆生记铁厂、歆生填土公司、普润毛革厂等。承办汉阳铁厂的盛宣怀,更是闻名全国的大买办。

综观武汉近代工业,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发展主要是通过购买机器的方式来实现技术变革,并没有典型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经历了工业革命那样的技术突破和经济格局的解构。因此它的发展速度虽然很快,但也潜伏着不少问题。比如缺乏全面的技术和人才支持,不同的工厂技术与规模参差不齐,还没形成统一协作的经济格局,发展十分不稳定等。

除了洋商和民族资产阶级开办的工厂外,谈到武汉近代经济变迁,我们不能不提到张之洞于“湖北新政”期间在武汉地区创办的一系列军事和民用企业。需要指出的是,在近代武汉社会经济变迁中,政治因素的影响力越来越明显。张之洞以手中的权力和个人胆识,从西方移植了最新的生产技术,使武汉近代化的进程大大加快。尽管有着种种弊端,但它的结果依然推动了整个民族资本的发展。

总观武汉地区近代社会经济变迁,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印象:武汉近代经济繁荣首先体现在商业上,商业资本积累迅速。这既是对传统经济的继承,又是近代新经济格局的结果。“商人资本的存在和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前提。”^②资本的原始积累达到一定程度,使得像刘歆生、宋炜臣、刘子敬那样的大商人将眼光转到实业建设方面,兴办了一批颇有影响的近代企业。而张之洞的“湖北新政”更是建立了相对完整的近代工业体系,进一步刺激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变迁无疑对旧的社会结构产生影响,并产生新的时代精神。近代武汉,先进的生产力作为一股具有革命意味的物质力量扎

^① 贺觉非、冯天瑜:《辛亥武昌首义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65页。

根落户，其价值与影响是多方面的，它所产生的和即将产生的现实效应将远远超出经济的范畴。近代武汉有“开风气之先”的美誉，表示晚清武汉社会经济变迁不仅在客观上造成了一场划时代的巨变的物质基础，而且为新的思想启蒙运动提供了物质条件。正是由于武汉近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使武汉在近代中国的社会巨变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自辛亥革命开始，无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大革命，还是抗日战争，武汉都是一个令人瞩目的城市。这也说明经济基础的变化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力量。

六、晚清武汉社会的变迁

1861年，汉口开埠通商，武汉社会开始近代化转型。开埠后，传统经济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近代商业贸易很快跃居国内各商埠前列，成为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通商口岸，号称“东方芝加哥”。1889年，张之洞督鄂，开始“湖北新政”，大规模举办洋务事业，在武汉建立了相对完整的近代工业体系，进一步促进了武汉地区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和区域经济结构的变化。

经济发展是社会变迁的重要推动力量，随着近代商贸的发展和具有革新意味的近代工业体系的建立，晚清武汉给我们留下了一幅规模宏大的近代化历史画卷。近代化是一种宏观的社会变迁。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社会结构、体制、组织、准则、人们的社会关系、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念、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都要发生改变，社会整体由此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逐步过渡。

（一）地理环境和市政建设的变迁

城市作为一个人口高度集中的空间系统，其规模、布局、规划管理、基础设施和环境质量同它的经济发展程度息息相关。城市的空间地域结构，也是由城市职能上的分化带动城市形态上的分化而形成的。这种分化持续不断，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一直处在变动之中，它不仅是社会生产力长期发展的结果，同时又对社会变迁产生作用。

历史上，受传统经济与政治影响，武汉三镇彼此分隔，“城”和“市”的功能还没有有机地结合起来。开埠后，新经济因素开始渗入。1889年起，张之洞又大力推行“湖北新政”。在这两方面力量的促动下，武汉城市环境有了很大变化。

首先，作为华中地区对外通商的主要口岸，汉口“九省通衢”的含义有所变化。开埠以前“九省通衢”主要指旧式航运业而言。开埠后，新式轮船运输、铁路运输以及电讯业都有很大的发展。

1862年，美国旗昌轮船公司首开长江近代航运之端。由于太平军与清军激战，上海、汉口之间旧式运输几乎完全中断，旗昌轮船公司遂获暴利。在利益驱使下，太古、日清等轮船公司纷纷开辟长江航线。为争夺利权，1897年，湖南绅士王先谦和湖北绅士吴锦章先后稟请举办内河航运。在张之洞的批准下，湘、鄂两省以官

商合办的形式设立了湘鄂善后轮船局,内河小轮船航运业迅速发展起来。形成一个以汉口为中心,长江为主干,通达汉水及洞庭湖、鄱阳湖两大水系的庞大交通网。1910年,进出汉口港的轮船达四千余次,载货量达五百吨左右,^①1905年,卢汉铁路通车,河南、河北与湖北联为一体,铁路运输成为武汉与其他地区往来的另一种重要的交通方式。

与传统社会相比,近代意义的交通概念已不仅仅是人员和普通物质的空间移动,还包括信息的传递和交流。开埠以后,列强在武汉设立租界,将他们国家的邮政事业带到武汉,开展所谓“客邮”业务。为沟通信息,汉口江汉关也曾试办近代邮政,1880年,海关书信局改名“海关拨驷达(POST)”。由于海关为外人掌握,这一邮政机构也由外国人经营。1896年,在张之洞等人的奏请下,光绪帝同意开办国家邮政局,次年2月,汉口邮政总局开办。1907年邮传部正式从海关手里接管邮政,汉口邮政总局的业务也进一步扩大到汇兑、包裹、新闻纸、货样等。总局在各地设有分局,主要的街道都设有邮筒,投递及时,邮资也很便宜,于商民十分有利。汉口邮政总局管辖范围包括湘、鄂、豫、陕等地,邮件通达国际,1908年投递量已达58万余件^②,使武汉成为华中地区的邮政枢纽。

开埠以后商业迅速发展,为及时获得信息,武汉商人多次稟请架设电报。1885年,汉口电报局设立,经过多年经营,到20世纪初,武汉已成为国内重要的电报中心,远至欧洲、日本的电报也能在数小时内到达。1899年,汉口电报局开始试办电话,分别在汉口和武昌设电信局。1904年,刘歆生组建汉口商办电话公司,进一步将三镇电话业务统一起来。新式交通使旧有的地理环境概念发生转变,不同地区的空间感变小。电报、电话的发展使武汉商人能迅速获得商情,对国际市场的任何变化都可及时作出应对,武汉已真正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

城市学认为:城市的空间形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运输工具和交通条件。^③开埠前,与河运经济相适应,汉口城区集中于汉水沿岸至大江口这一狭长地区。街道狭窄,房屋狭小、阴暗。开埠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和长江航运的发展,加上卢汉铁路通车后南北交通格局的改变,武汉城市布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开埠后,在汉口形成了一个上起武汉关,下至黄浦路租界区的租界区。租界内各种公用设施、建筑与道路井然有序。不仅改变了旧的城市格局,而且以它的优越性吸引和刺激了近代武汉市政的发展。同时铁路运输也带动玉带门、大智门等新区发展起来。在武昌,大量文教机构的设立使其文化中心的特色更加突出。为了弥补商务发展的不

① 张孝波:《最近汉口工商业一斑》第2章第1节,宣统三年刊。

② 《Decennial Reports, 1902~1911》(汉口),第356页。

③ [英]范登堡:《城市发展阶段说》,《城市化与城市社会学》,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第95页。

足，张之洞还在武昌设立两湖劝业所，以博览会的形式促进商品交流，同时自开武昌为商埠，使武昌的商业也发展起来。

在经济发展的刺激下，武汉三镇特别是汉口迅速发展。1898年张之洞奏改夏口镇为夏口厅，与汉阳县分治。辖区突破以前四坊二里的格局，面积空前扩大。城区的发展，掀起了市政建设的热潮。大商人刘歆生将铁路与租界之间大片洼地填高20英尺，以与租界平齐，并在此基础上修建了许多新的街区。新街区受租界影响，当街的都是高级优质的铺面楼房。正如海关报告所指出的：“在所有这些街道旁，许多洋式的房子跟着建造起来了。”^①

开埠之后，武汉地区的贸易额迅速增加，大量近代企业设立。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汉口外资企业约35家左右，民族企业也有100多家。此外还有张之洞兴办的一系列规模宏大的近代企业。与开埠前商行沿河而设不同，近代企业分布于三镇，考虑的是地价、交通等问题。表现出武汉由一个单纯封建贩运经济中心向近代生产贸易综合型城市转化的特征。从张之洞奏稿中出现的“武汉”一词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武汉三镇一体化已基本得到社会认同。历史上武昌、汉口、汉阳各有隶属，正是近代经济的变迁使它们趋向一体。不用说民族资产阶级兴办的企业遍及大江两岸、汉水南北，仅看张之洞的洋务企业就分布于三镇之中。以汉阳铁厂为例，它设在汉阳，管理者住在武昌，其产品通过汉口销售，甚至它的派生物矿渣和煤渣也被运到汉口填充后湖，为汉口免遭水患，扩大市区作出了贡献。正是这种内在的割不断的联系使得三镇合而为一，并由此从开埠前功能单一的封建性城市向近代大都市转化。

在都市发展过程中，自来水、电灯等公共市政事业也迅速发展。1906年汉口商人宋炜臣等人集资三百万元创设“既济水电公司”。分设电厂和水厂，其“水质优良，供不应求”^②。此外由于道路的兴建，人力车成为重要的代步工具，在租界还出现了汽车。汉口和武昌已有轮渡通行。种种迹象表明，开埠后的武汉无论是在城市布局还是在市政建设上，都已粗具规模。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它反映了晚清武汉社会转型的种种迹象。

晚清武汉城市环境变迁主要得益于近代经济的发展。首先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经济，他们为倾销商品，掠夺原料，在武汉建立了大批洋行、银行和工厂，客观上引进了资本主义先进的生产力。租界作为列强侵略的产物，不仅扩大了城市的区域并成为城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体现了西方近代城市规划、设计、管理的理念，进而成为一个样板和模式，推动武汉由传统地域中心向近代多功能城市转换。

① 《Decennial Reports, 1901~1911》(汉口)，第363页。

② 《夏口县志·实业志》。

其次是张之洞在武汉地区推行的洋务运动。张之洞不仅在建铁路、修堤防等方面加强了武汉的基础建设,而且“湖北新政”中兴建的近代企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武汉三镇旧的封建商业和消费性城市特征,有助于它转变为一个近代综合型城市。

另外,武汉近代民族工商业也是推动武汉城市环境变化的重要力量。近代城市经济的发展使武汉地区的大商人、买办、民族资本家有能力和支持大规模城市建设。后湖长堤(张公堤)修筑时,资金困难,大商人刘歆生一人即认白银50万两,占所需费用的一半。^① 他们的商业行为在客观上也促进了市政建设的发展。

上述三种经济力量从不同方面对武汉近代城市的建设起了推动作用。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三者的动力都不足。首先西方殖民经济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是畸形的。租界在转型初期确实起了垂范和样板的作用,但随着城市的发展,这个作用越来越小,而且由于租界具有种种特权,因此也就割裂了城市的主权,随着民族经济的发展,这种矛盾愈来愈严重,并进而发展成为一种不稳定因素。洋务运动对武汉城市建设影响非常大,但由于其本身具有很强的封建性,其手段往往是超经济的。如张之洞直接插手汉口事务,就造成“汉口建设计划与工程多直接来自总督经过江汉关道而施行,绅商建议,亦每多透过江汉关道转达总督核准”,而未经汉口政务机关夏口厅的局面。^② 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对武汉城市发展影响最为直接,但是由于近代民族工商业发展程度在整体上依然较低,虽然商人和资本家集团有着要求参与市政管理和掌握城市发展的强烈愿望,并组织了“汉口自治公所”及“汉口市政会”等组织,但力量有限。前者仅为一立法机构,且以夏口同知为法定监督人,^③ 后者为商人与警察联合组织,所讲求的也仅以警政为限。他们从切身利益出发要求更多的权力,这种要求随着时势的发展,最终将转化为一股巨大的社会力量。

(二) 社会教育和文化的变迁

文化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它总是受制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摩尔根说,人类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包含一种不同的文化,并代表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④。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也写道:“‘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

① 董明藏:《汉口地皮大王刘歆生》,《武汉文史资料》1985年第2期。

② 苏云峰:《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 1860~1916·湖北省》,台湾近代史研究所1981年版,第535页。

③ 《时报》,宣统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④ 摩尔根:《古代社会》上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9页。

自己出丑。”^① 脱离社会基础，社会思想就会失去内容和意义。利益归根结底是思想的现实基础，思想反映并表现利益。近代武汉社会经济的变化和发展对社会文化的变迁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社会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汇集，它浸润在社会群体之中，隐藏在人们的社会行为背后，因此，它不是外显的，文化发展的指标也因而成为一个复杂的问题。一般来说，文化发展标准应包括社会历史发展的水平与社会制度范围内精神过程的强烈程度，由于社会文化总是“首先是体现在教育制度里，体现在他的民主性，可接受性和他的总方针中”^②，因此我们首先把教育作为衡量晚清武汉社会文化的一个标准。

开埠以前，武汉地区的教育制度和内容与它所处的封建经济及其政治文化相适应，主要功能是传统文化的传承和扩展教化。是一个上层社会全面贯彻其政治、思想、文化规范与下层社会接受、适应这些规范的过程。在整体上缺乏活力与生机，对社会变迁影响不大。当然，在明清之际，在资本主义萌芽刺激下，汉口商业发展，人们的社会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耕读传家的观念受商业功利主义的冲击，早期市民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道德观念。也正是有了这样一个社会基础，汉口十分轻松地适应了开埠后的变化。

开埠后，西方的商人和传教士络绎不绝地来到武汉，伴随他们而来的除了枪炮和商品外，还有西方的观念与思想。西方文明的镢入自然会在各方面产生反应，导致社会脱离旧有的状态。而不久以后张之洞的“湖北新政”更是加快了这一进程，并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武汉地区近代教育最初产生于教会。1871年，美国圣公会在武昌开办文华书院，1885年英国传教士在武昌设立博文书院，这是武汉地区较早的两所教会学校。但大规模的近代教育，肇始于1889年的“湖北新政”。

在兴办洋务过程中，张之洞迫切感受到人才的重要，“尝谓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为了与其庞大的实业建设相适应，在“中体西用”的宗旨下，开始在武汉营建近代教育体系。一批具有近代色彩的新学校如两湖书院、方言学堂、武备高等学堂、农业学堂、工业学堂、军医学堂、省师范学堂等纷纷建立。与此同时，张之洞还大量派学生出国。截至1904年，湖北派往欧美各国的留学生达83人，派往日本的学生总数达289人，占全国第一位。^③

在张之洞“新政”的影响和带动下，民间办学也兴盛起来。1901年民立选端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3页。

② 苏联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学与社会发展问题》，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9页。

③ 皮明麻：《武昌起义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页。

学堂设立,次年私立日新预备中学堂亦在武昌马家巷设立。1909年时象晋筹款在武昌棋盘街租民房开办滋兰女学堂,是为武汉私立女学的开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近代工商业经济的发展,新型工商业人才教育受到社会关注。1905年工业传习所在昙华林购民房开办,以学习制粉条和练习印刷为主要教学内容。1909年,萃升恒行栈在汉口小夹街创办汉口理化实验学堂,传授近代理化知识。几年间,仅武昌就办起各类学堂十数所。^①这些学堂均为民间投资创办,显然与近代武汉地区资本主义发展有着内在的联系。

武汉地区近代报刊肇始于西方侵略者,早期影响较大的报纸有《汉口时报》(英文,1866年)和《阐道新篇》(1872年)等。甲午战争以后,“外患日亟,国人竞讲新学,津、汉、沪、广诸埠,报馆云兴”^②,武汉报业开始发展起来。1905年4月创刊的《湖北官报》,在张之洞的大力推行下,发行量曾高达二万余份。与官报相比,民间报刊则更显生机。辛亥革命前民间报纸多达数十种,其中开办较长、影响较大的有《楚报》(1904年)、《湖北学报》(1903年)、《大江日报》(1911年)等。这些报纸的创办者各有不同,办报目的、风格也各不一样,呈现出一片繁荣的社会文化景观。

近代传媒的出现使社会信息内容与来源民间化,整个社会思想文化领域更加活跃。封建正统文化的垄断地位被打破,先进思想和革新力量从旧的社会观念中脱颖而出,并逐渐成为社会主流思潮。通过报刊,社会各阶层的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尽管清政府阻止人民议政,武汉地区多次发生“报案”,但这并未阻止报纸对政事的评头论足。显示出关心政治,参与社会生活已经成为近代武汉市民的一种需求。这种需求广泛存在于社会各个阶层,因此报纸也兼顾各个层次,用浅显近乎于白话的语言表达信息。在这种情况下,都市通俗文化迅速浮升,文化更贴近市民。1908年《江汉时报》开始登载胡石庵用文言文翻译的法国侦探小说《梅花秘密》,其他报纸也纷纷开辟诸如《妇婴医学》、《杂志要件》、《词曲小说》等专栏或副刊,“凡中西要闻、轶闻近事、名人词章诗曲,广为搜采登载,以为茶后酒余,消闲之助”^③。这有助于改变传统精英文化的独占局面。在人们的思想观念里,伦理纲常的权威性和封建统治的合法性都开始动摇。

社会经济发展促使社会结构进一步分化,加上近代传媒的发展和新式学堂的建立,社会意识形态结构不断趋于丰富和多元化,各种新观念不断产生,新旧价值观、中外价值观相互的碰撞与冲突加剧。表现在社会心理层面上,则是相对剥夺感的产生与对社会不满情绪的蔓延。特别是青年学生,身处武汉这个政治中心,看着列强兵舰的出入,读着埃及、印度等国的历史,更加感受到民族的危机和政治的腐

^① 《湖北通志》卷60,《学校志·学堂》。

^{②③} 《武汉市志·新闻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页、215页。

败。民主革命的观念由此深入人心。在当时,“学校里很多禁书都流行着”,学生写作文时,不仅不避清帝名讳,而且大呼其名以泄愤,“学校当局也无可如何”。^①

另外,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给社会消费提供了新的物质基础,使得社会民风民俗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开埠后,新经济的发展,使社会出现一股趋新、崇洋之风,有钱人模仿租界的洋人建洋房、修跑马场,跳舞、逛夜总会、跑马成为一部分人新的生活内容。西方工业文明在武汉人古朴的生活习俗里打开了缺口,激发了市民追求新生活方式的愿望,世俗观念也开始与传统背离。趋新崇洋固然有负面的影响,但同时也有利于近代西方物质文明在武汉扎根。市民对西方生活方式的追求推动了近代工业的发展,张之洞就曾指出,“华民所需外洋之物,必应悉行仿制”^②,武汉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也必须以市民的消费需要为前提。另外,西方文明的传入也有利于破除传统迷信和陋习,在新观念的影响下,反对缠足和鸦片成为一股社会运动。在晚清立宪运动中,近代工商界人士也把移风易俗、改良社会风尚作为自治的重要内容之一。

总的来说,开埠以后武汉地区的社会文化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急剧发展。文化知识的内容,传承方式和传播手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旧式教育的简单经验传承已为近代化教育所取代,教育的普及率不断提高,知识内容不断更新,西方的思想与文化通过学校和其他媒体对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并促进新的市民文化的形成。社会观念的变革,增强了趋新的主观能动作用,对社会风尚形成有力的冲击,引起旧有道德规范、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的急剧变化,使人们对旧的文化产生普遍怀疑。这种状况必将导致新文化对旧文化的批判,并进一步促进社会的变迁。

(三) 社会阶层、群体与组织的变迁

在传统社会,社会经济生活简单,居民彼此之间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目标,其社会生活的基本特征是相对和谐与封闭的。而在近代,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日益专门化,简单的共同利益不再存在,家庭和宗族的纽带作用也日益减小。在社会生产中,一方面人们的相互依赖性大大加强,但同时由于经济活动在空间和实践上的集中,使各种摩擦和冲突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这就迫使各种共同行动规范的制定与实施,否则正常的经济活动秩序就无法维持。社会愈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越多,范围也越广泛,从而需要更多的人进行有组织的努力,成立各种社会团体成为现实需要。对于城市居民来说,脱离组织而生活显然是困难

^① 李建侯:《武昌首义前后忆事八则》,《辛亥革命回忆录》(二),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79~82页。

^② 《张文襄公全集》,卷27。

的，因而在城市生活中，社会组织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武汉作为一个以商业而闻名的城市，其商人集团的构成和组织形态最先引起我们的注意。

开埠前，汉口就有一些商人组织，如山西、安徽等会馆，铜器业的江南、江北公所，银炉坊帮的“太清宫”等。但是由于商品经济还处在初级阶段，这些组织依然有很强的传统性，各种“义举”和慈善活动基本源于传统的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地方观念和宗法色彩浓厚。

开埠以后，武汉地区商业贸易激增。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和对外贸易发展，一个新的商人买办集团出现了。在近代，买办是最早接触西方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阶层，在长期同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他们逐渐熟悉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从而具备了经营新式企业的技术、能力和社会联系。另外，通过对外贸易等商业活动的积累，他们手中握有数量可观的资金，因此有能力投资创办近代企业。他们中的很多人如刘歆生等通过投资近代企业等方式转化为民族资本家。

除了买办外，传统商人面对开埠后新的贸易格局也在不断发展变化。清末武汉出现了不同于牙行的近代贸易组织——“八大行”，各行垄断一部分商品贸易，并为其其他商人提供信用保证、代办运送等服务。此外按地域，众多商人还分为湖北帮、宁波帮、山西—陕西帮、徽州帮、广东帮等组织，以地域和血亲关系组成纽带，按自己的优势和特色经营。据统计，清末武汉各种行业组织有二百多个^①。其中著名的有华商总会、汉口商会、武昌商会等。商会的出现，表明武汉地区近代商人的主体性开始确立，这一现象体现了武汉地区民族资产阶级日趋壮大和成熟。他们力量的膨胀要求相应的社会结构与之相适应，势必导致旧社会结构的变迁。在商会、会馆、公所的组织下，武汉商人的力量聚集起来，讲求商战、爱国御侮成为时代潮流。在现实斗争方面，1904年，汉口华商团结一致，与德国礼和、瑞记银行断绝贸易往来。1905年，汉口金融业拒用麦加利银行的票据。1909年，商人们成立商办铁路协会，更将矛头直指西方列强和清王朝。

经济的发展导致社会结构新的变化，商人及近代民族资本家主体意识的觉醒和社会地位的提高使传统“士、农、工、商”的社会观念遭到前所未有的怀疑和动摇。

在中国旧的传统社会里，士为社会的领导阶层。由于经济地位和文化方面的原因，传统士绅高居四民之首，并通过其影响维系社会秩序的稳定。汉口开埠后，由于社会经济的变迁，传统士绅的社会与经济基础遭到很大的削弱，其出路也日渐艰难。著名的维新派志士唐才常在两湖书院读书时曾说，从各地来汉求取功名的人很多，“大半亏欠伙食，典尽衣服，不能言归者。其齷齪之状，廉耻之失，不可胜言”。并由此敏锐地认识到：“经解、词章、八股皆成赘瘤。”人才必出自学校，与

^① 皮明麻：《辛亥革命与近代思想》，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55页。

地格致之学必须提倡，否则都是无用之人。^①对此，张之洞感受同样深刻，督鄂期间大力创办近代文教事业，培养新式人才。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变迁，一个新的知识分子群体逐渐形成。

同传统士人相比，新知识群头脑中装的是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对社会发展有着深刻的理性认识，他们所处的环境和对中外大势的了解更使他们充满民族的危机意识。他们希望社会变革，并由此找到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出路，然而旧的社会不可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往往结成社会团体并藉此表达自己的愿望。

作为“湖北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从1896年起，张之洞开始编练新军。新军招募的对象是能识字略通文理的青壮年，“命题考试，衡文以定去取”。由于科举已经废除，广大士人因仕途断绝纷纷投考新军，使得“秀才当兵”成为普遍现象。为促进新军近代化，张之洞与他的继任者还先后办了一批军事学堂。学堂建成，趋者甚众。如武备学堂成立之初，招生仅120名，报考者竟至4000之多。近代军事学堂的兴办，提高了新军的文化素质。1900年以后，不少留学生和国内其他学堂的毕业生也纷纷进入新军，带来更多的近代知识和先进思想。著名的留日学生吴禄贞、蓝天蔚等，都曾在新军中产生过重大影响。由于知识层次高，加上张之洞治军严谨，湖北新军成为仅次于北洋六镇的强兵劲旅。1905年2月，清练兵大臣铁良检阅全国军队，湖北新军的成绩名列前茅，铁良由此赞叹，武汉诚“天下武学之渊藪”。到1907年，湖北新军共计16104名，其中知识分子几逾三分之一，这在当时是十分罕见的。

与传统军队相比，湖北新军不仅在装备与建制上不可同日而语，更重要的是，其思想亦十分近代化。由于士兵文化程度高，加之当时近代传媒的发展，各种进步书刊在兵营中流传，“士兵识字，读后自然增加对革命之认识，知道瓜分之祸迫于眉睫，人民生活悲惨万分，无一不是清朝统治的恶果。因而有志之士，亟欲组织团体，进行革命活动”^②。湖北新军，这一社会变迁后的历史产物，一经出现，就历史地为资产阶级的革命准备了批判的武器。辛亥革命以后，有人将武昌首义归结为张之洞不经意“种豆得瓜”的结果，其评价颇有道理。这也反映出近代社会变迁是一场宏观的社会运动，其结果往往出于当事人意外。

与其他军队相比，新军具有很强的开放性，与社会联系紧密，这既有助于它接受社会变迁的影响，同时又对社会各集团相互的交流产生反作用。表现最明显的就是新知识群与新军的密切联系，而帮助它们联系在一起的则是近代武汉地区众多的

^① 苏云峰：《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 1860～1916·湖北省》，台湾近代史研究所1981年版，第460页。

^② 温楚珩：《辛亥革命实践记》，《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1页。

革命团体。

现代政治理论认为：在社会近代化过程中，由于经济、阶级、行业的变迁，“许多社会力量中所产生的觉悟、内聚力、组织和活动增强”引起各种新的集团意识。^① 武汉开埠后，伴随传统社会阶层的没落，新的阶级力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出现了，同时在社会上还产生了新知识群和新军两大社会阶层。他们通过代表他们的各种社会组织，相互联络，发表自己阶层的社会意愿，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随着他们力量的壮大，必然要求有新的社会结构来适应并满足他们的要求和愿望。另外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在武汉，资产阶级力量虽然很强，在社会成员中比例亦很大，但多为商人，阶级特征也不是十分鲜明，这反映武汉资本主义的发展依然处于一个较低阶段。同时商人集团与新知识群的关系也十分松散。由此我们便可以理解为什么辛亥首义一举取得成功，但成功后不久，旧势力很快复辟，武汉在民国初期又成为保守势力的大本营了。

（四）结 语

综观晚清武汉近代变迁，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由于开埠前汉口商品经济发展程度较高而且发展十分稳定，对这一地区的文化与风俗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并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商人集团。武汉地区在近代社会变迁中表现出非常强的适应性，开埠后，旧的资本主义萌芽并未在外国经济侵略下夭折，相反还顺应了新的经济格局。正是有着这种商品经济的传统，使得开埠以后资本主义的各种观念与思想容易被市民接受并形成广泛的社会基础，在变革中少有旧势力的抗拒，而且革命一旦爆发，群众率相呼应。

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也认识到在整体上民族资本主义的力量依然较弱。其原因除了封建力量的阻挠外，更重要地在于一个独立国家所应具有的保护民族经济的保护机制被打破。近代武汉，列强凭借不平等条约圈占租界，驻扎军队，享有治外法权和免税等特别待遇，民族资产阶级同外商进行的是不平等竞争。张之洞在督鄂期间运用政府力量，大力举办洋务事业，曾一度使这一问题有所缓和，但从总体上看，一个地方总督的权力运作范围与效率毕竟有限，这就迫使他超负荷地支撑着规模宏大的“新政”事业。近代经济的发展需要国家对其进行保护，而晚清“中央政府在思想上和政治上都不能建立和保证一个有法律、商业和教育等制度的体制，而如果没有这个体制，近代企业就不能繁荣发展”^②。在这种情况下，晚清政府成为

① [美] 塞缪尔·P. 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40 页。

② [美] 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51 页。

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重要障碍。由此看来,1911年爆发的辛亥首义是近代武汉社会变迁的结果。

其次,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推动了武汉社会各个阶层力量的消长。以商人集团为主体的民族资产阶级形成,其主体意识开始确立。另外伴随“湖北新政”的实施,在武汉地区出现了新知识群和新军两个新的阶层,各种社会力量猛增并呈多样化趋势。与传统社会社会结构简单,不需要高度发达的政治制度相对应,旧的清政府地方管理机构十分落后,汉口也一直没有一个有效的市政机构对整个社会进行管理。现代政治学认为:“随着社会成员的日趋庞大,社会结构日益复杂和社会活动的愈加多样化,实现并维持高水平的共同性就更加依赖于政治体制。”“如果社会要成为一个共同体的话,那么每个集团的力量应通过政治体制而发挥,而政治体制则对这种力量进行调节,缓和并重加引导,以便使一种社会力量的支配地位与其他许多社会力量协同一致。”^①清末武汉社会阶层及群体日益复杂化,而清政府无力进行调适,只是一味地进行压制。尽管后来也颁布了一些“新政”政策,但为时已晚。新的力量不断成长,而旧的结构又不能适应,最终冲突的结果往往是剧烈的社会革命。

再次,开埠后,随着社会文化经济的变迁,武汉近代教育与大众传媒迅速发展。一般来说,社会文化变迁是对传统的行为模式、道德规范和生活习惯的一种叛离。没有对旧传统的批判和叛离,社会就无法实现近代化。在旧的传统社会,由于各个社会区域基本上是封闭、孤立的,社会的风俗与传统、道德和理想原封不动地由上一代传给下一代,表现在教育方面则是对传统经验的传承而非创新。“社会的资讯数量极小,个人的濡化活动的范围也很窄。”^②开埠以后,西方人带着不同的文化来了,同时由于报纸杂志及电报电话的出现,社会资讯空前扩大,传播频率也空前加快。作为一个重要的传播主体,教育着重传播经过筛选的,具有普及性和标准化的知识和信息,其社会性特征很强,往往产生一致的社会行动。张之洞在武汉举办近代教育的宗旨虽然是“中体西用”,但发展的结果是西学的广泛传播和革命排满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同时这种文教事业集于一隅的文化格局,使社会成员在政治上日趋成熟,增加了人们对于社会发展和变革的欲望和期待。然而腐朽衰亡的清政府是不可能满足这种要求的,为此人们只能投身政治活动,并最终选择暴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现代化理论认为“对一种公认的观念作小小的修正,也会危及那种花大力气才得到的确定性。技术发明一旦诉诸改变劳动条件,就有必要重新安排社会秩序,这

① [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9~12页。

② 朱增朴:《文化传播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74页。

也会对稳定性提出挑战”^①。晚清武汉社会由于西方的侵入，带来异质文化，使得社会环境、经济、文化和阶级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迁。旧有的社会结构日渐解体，新的社会力量不断壮大，旧有的政治体制已难以适应。其间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旧的统治力量曾力图挽救，并开始了有限的近代化活动，力图维护传统社会，使它免受全面的变革。然而其努力却加快了社会变迁的进程，其军事和行政改革及近代大企业的建立为社会变迁提供了动力，也提供了途径，最终导致了一场社会革命。

① [美] C.E. 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84 页。

七、晚清汉口的对外开放

（一）汉口的开埠

在鸦片战争后的 10 年，沿海的开放之风尚未能吹拂到武汉三镇。武汉仍然是中国内陆的一个颇具繁荣景象的封建城市，与中国以外的国际社会少有联系。虽然也偶有外商在武汉从事商品贸易，但微不足道。地方政府则穷于应付日益加深的社会危机。

综观鸦片战争前后之武汉三镇，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 战乱频仍，在整个 19 世纪 50 年代，太平军与清军在武汉地区反复交战，人民流离失所，社会经济遭到巨大破坏，处于停滞甚至倒退之中。

2. 为了应付鸦片战争的赔款以及战争的消耗，封建官府的盘剥愈益沉重，加重了武汉人民的负担，民众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也日益下降，从而导致社会动荡，民变蜂起。

3. 武汉三镇的社会机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中国沿海的五口通商带来的巨变在武汉仍难寻踪影，武汉仍然没有建立起与国际社会的直接联系，战乱过后，地方当局致力于恢复以往的统治秩序，但是这些措施都是封建旧秩序的修复，而没有给武汉城市带来新的机遇，武汉继续作为中国内陆的一个封建城市而存在。因此武汉城市社会结构和城市文明在鸦片战争后 20 年内没有转换和发展，仍然停滞在危机重重的封建旧制度之中，而缺乏走向近代社会和近代化的驱动力。这种依然故态的原型封建市镇只是在灾难性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所带来的汉口开埠，才发生转机。

鸦片战争的炮火打开了中国封闭已久的大门。东南沿海的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首先向西方列强开放。透过这些通商口岸，清帝国开始被纳入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在外力的强制牵引之下而改变。这些改变在以上被迫开放的通商口岸尤其显著。以上海为例，“正是由于对外开埠，上海的经济卷入了世界资本的大市场，租界的出现为中外资本在上海的投入创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加上西方先进的技术的投入更为上海的发展提供了生产力技术上的条件。这样，开埠以后的近代经济就冲击了它发展的起点”。

五口通商之后，列强满以为在中国开辟了广大的市场。然而，一方面是列强极

力向中国渗透，另一方面中国固有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也为自己的生存而进行着殊死的抵抗。五口通商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商品倾销并不如他们所预料般的顺利。在城市，洋货遭遇了传统行会的抗拒和竞争而销路不畅；在农村，古老而顽强的自然经济也根本不理睬洋人们极力推销的洋布、洋纱。在 19 世纪 40 年代后半期，各通商口岸相继出现了洋货积压、贸易停滞、价格跌落的现象。以当时在列强对华贸易中独占鳌头的英国为例，自 1846 年起，英国对外贸易的进口货值接连下跌，有时略有回升，但直到 1854 年仍未能恢复到 1845 年的水平。这一现实打破了洋人们“发了疯似的”占领中国新市场的美梦。^①

西方列强的目标是要彻底打开整个中国市场，而不仅仅是五个通商口岸。他们把对华贸易的不畅，归咎于通商口岸太少。1849 年英国曼彻斯特商会便向英国政府提出：“除非我们从事买卖的范围能扩展到我们现在局限的通商口岸以外去，我们对华贸易永远也不会得到充分的发展。”^②次年，商会更明确提出：对华贸易受阻的原因在于“把商业严格局限在五个通商口岸”，要彻底改变局势，就得把“商业向五个通商口岸以外的地方进逼”^③。这样，地处中国内陆腹地，“东连吴会、西接巴蜀、南扼湘黔、北通秦豫，水陆四达，运输便捷”的“九省通衢”武汉就成为西方列强的首选目标。如果能将势力伸展到武汉，列强即可控扼长江中游及中南腹地。事实上，西方列强对武汉也一直比较关注。早在 1842 年，英国海军舰长柯林逊就率舰自吴淞口上溯汉口。布拉克也率英舰一艘，从汉口经三峡入四川。1847 年，挪威等国援引五口通商章程，在汉经营商务。

在英国商界的压力之下，英国政府制定了入侵中国内地、内河，扩大中国贸易市场的方针政策。1854 年英政府指示：要“争取广泛地进入中华帝国内地及沿海各领域。如果这一点办不到，则争取扬子江的自由航行，并进入沿江两岸直到南京为止”^④。1857 年又指示侵华总头目额尔金：修订与中国订立的条约，“允许英国人进入各大内河沿岸的城市”，“概括要求准许在扬子江航行及与扬子江两岸通商的权利”。美国也积极窥视长江，“（咸丰）四年，美（国）麦莲至上海，要求赴扬子江一带贸易”^⑤。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西方列强不惜发动侵略战争，以武力迫使清政府开放中国内地。

1856 年，英、法以“亚罗号”事件为借口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再次

① 萨金特：《中英商务与外交》，第 106 页。转引自陈诗启著：《中国近代海关史问题初探》，中国展望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74 页。

②③ 《曼彻斯特市商会议事录》，1849～1858 年卷。转引自陈诗启著：《中国近代海关史问题初探》，中国展望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75 页。

④⑤ 转引自陈诗启著：《中国近代海关史问题初探》，中国展望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75 页。

惨遭败绩。1858年6月26日,清政府被迫与英国、法国签订了《天津条约》,其中规定中国增辟潮州、琼州、台南、淡水、登州、天津、牛庄、镇江、南京、九江、汉口等11个通商口岸,并准许外国商人“持照前往内地各处游历、通商”。中英《天津条约》第10款特别规定:“长江一带各口,英商船只俱可通商。”因当时长江中下游尚处在太平军控制之下,故作了一定限制:“惟现在长江上下游均有贼匪,除镇江一年后立口通商外,其余俟地方平靖,大英钦差大臣与大清特派之大学士尚书会议,准将自汉口溯流至海各地,选择不逾三口,准为英船出进货物通商之区。”^①

据此,在清军与太平军的战事尚未停息之前,外国商人根本无权进入长江通商。但英国早已迫不及待。1858年11月8日,英国特使额尔金(Elgin J.B.)在上海与清政府代表桂良、花沙纳、何桂清等签订《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十款》,其中规定贩卖鸦片为合法贸易,一切进出口商品除交纳海关税及子口税外,免征其他一切内地税。签约当天,额尔金就率“狂怒号”、“报应号”巡洋舰及“迎风号”、“鸽号”、“驱逐号”炮艇,从上海闯入长江,溯流而上航行600英里,通过镇江、南京、安庆、九江而达汉口,以便选择最好的新贸易口岸。沿途他们勘察航道、水文、气象,制作了精密的航道图。12月6日,抛锚汉口江面,窥视武汉三镇全貌。10日,额尔金会见湖广总督官文。随后,额尔金率舰队折返上海。“额尔金在议定上海税则的同时安排长江勘察这一绝招,使人不难看出英中在贸易扩张方面的共同利益具有多么大的力量。”^②

额尔金返沪后,即决定选择汉口、九江为通商口岸。由于当时长江中下游许多地方仍在太平军控制之中,直至1860年(咸丰十年)11月,英国公使普鲁斯(Sir F.W.A.Bruce)向恭亲王奕訢提出开放汉口、九江两口,并在上海或镇江纳税的要求。奕訢对此予以同意,“惟所请在上海或镇江纳税一节,臣等于该处近日情形,未能遥测,令其与上海海关同商酌”^③。并听由英国公使与江海关(即上海海关)商议拟定必要的章程。

1861年2月11日,受额尔金的派遣,英国海军中将贺布(Sir J.Hope)与参赞巴夏礼(Sir H.S.Parkes)率火轮及兵舰四艘、士兵数百人由上海启程赴镇江、九江、汉口,办理通商事宜。同行的还有上海英商代表团及随员、翻译40余人。船只分两批先后抵达汉口。3月7日,英国官员威利斯,通事曾学时、杨光谦及上海宝顺洋行(即颠地行)行主韦伯等四五十人,乘英轮船先行驶抵汉口。次日,威利斯偕同随员会见湖广总督官文,声称来汉是为了查看地势,立行通商,并在汉口

①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97页。

② [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27页。

③ 转引自陈诗启著:《中国近代海关史问题初探》,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年版,第76页。

托都司李大桂代觅栈房一所，每年议给房主租价银四百两。留下翻译及随员各 1 名驻汉，其余人员于 10 日返上海。这次立行通商和立栈揭开了汉口实际开埠的序幕，为“英人立汉口市埠之始”^①。3 月 11 日，贺布与巴夏礼驶抵武汉，会见官文，声称来汉是按《天津条约》来查办九江、汉口开港事宜，至九江，口岸诸务未定，先来汉口查看地势，建造栈房，商定开埠事宜，并通报金执尔（W.R.Ginrell）为英国驻汉领事官。3 月 20 日，巴夏礼与清政府地方当局签订了《英国汉口租地原约》，划定汉口英租界。4 月 27 日，上海英国领事署宣布“汉口、九江辟为商埠，设置领事”。不久英国首任驻汉领事金执尔抵达汉口，设置领事馆，汉口正式开埠通商。

汉口开埠后，俄、美、法、德、丹麦、荷兰、西班牙、比利时、意大利、日本以及其他与清廷订有通商条约的国家，根据“最惠国待遇”条款，先后到汉口通商和设立领事馆。

汉口的开埠设关，给武汉的发展以巨大影响。开埠使汉口直接卷入世界商品经济的漩涡，也使武汉直接进入世界文明的进程。“不是 1840 年而是 1858 年对武汉地区产生了直接的、广泛的、深刻的影响。这影响首先在经济层面落下了身影，然后波及到军事、政治、文化诸层面。1858 年标志着湖北地区通过汉口辟为商埠而开始接受近代文明，这种方式既充满屈辱，同时又激发出一股鲜明的崛起欲求。1858 年既是陷阱，又是阶梯。”^②

（二）从闭锁到开放

如果把汉口的开埠置于晚清对外开放的整体格局中予以考察，可以发现汉口的开埠是晚清对外开放的必然结果。在鸦片战争以前，“清王朝妄自尊大，不了解自身在世界的位置，更不愿知道中国以外的世界；既不知己，又不知彼，却盲目地坚持闭关锁国的政策，以为至尊的天朝是永远攻不破的”。马克思说“与外界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然而 1840 年的鸦片战争毫不留情地摧垮了中华帝国的千古尊严，清帝国关闭的城门被西方列强的大炮轰开，中国与外界隔绝的状态终于为英国的暴力打破，虽然只是局部的打破。“大炮下的被迫开放，是伴随着屈辱的开放。”^③以第一次鸦片战争为开端，来自西方的工业文明作为一种整体水平已经超前的文明形态，以入侵者的姿态首先从军事上，既而从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

① 皮明麻等：《武汉近代（辛亥革命前）经济史料》，武汉地方志编纂办公室印行，第 3 页。

② 引自陈钧、任放著：《世纪末的兴衰——张之洞与晚清湖北经济》，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9 页。

③ 冯天瑜等著：《中华开放史》，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559 页。

给中国人以当头棒喝，宣布东方农耕文明优势地位及封闭状态的历史性终结。^①

在战争前，中国合法的对外通商口岸只有广州一口，且实行极其严格的限制，由十三行垄断办理对外贸易。战争后，通商口岸由一口增至五口，但其意义却不在于此，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清政府闭关政策的终结以及开放时代的来临。正是透过这些通商口岸，西方文明源源不断地灌输进来。但应该注意到，这时的开放还是极其有限的，通商口岸仍然局限于东南沿海。战争的失败所带来的冲击，自东向西、自沿海向内地迅速削弱，以至于无。清统治集团对战争的认识也还是沿袭传统的看法，认为英人“志在通商”，因“其国中经费全资商税”，应付之法与以往中原王朝对付北方游牧政权常用的办法无异，“驭夷之道，不外羁縻”，羁縻之法在于给钱给物抚绥之，允其通商以笼络之。当时的一般官僚包括林则徐在内，都认为洋人如同过去的蛮夷，在经济上有求于中国，离不开中国，而中国则无求于人。显然，此时的满清政府及其官僚集团并未意识到五口通商的真正意义之所在，没有意识到开放时代的到来，而仅将其视为再一次满足“蛮夷”与“上国”通商的要求。他们的思想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他们的对外交往，是被迫和被动的交往。

当时的洋人们又是怎样看待清政府的呢？他们奇怪地看到，中国“国运不昌却自命高人一等，知识贫乏却自命不凡……说他们没有物质力量，却又奇特地掌握着国民的生计，说它缺乏西方的标准知识，却又毋庸置疑地十分节俭、勤劳，安于现状和陈腐的学识”。西方国家“几乎在每一方面都和这一国家的文明不同”^②。清政府无论在政治、军事，还是财政等方面都是腐败的。“文武各事之行，尽属于虚。执法者唯利是视，理财者自便身家。在上即有所见，亦如未见。远情不能上达，上令不能远行。以上各情，局外常论：中国似此懦弱，若不致外有探伺之患，即内与外来往者，连闻此说，难免无藐上作乱之失。”清政府的对外政策则是“居官者初视洋人以夷，待之如狗”，“条约所允，地方常有违背”^③。

正是由于清政府用传统的眼光、传统的办法来看待和处理对外交往的问题，使得清政府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面对新的事态几乎没有作出什么实际的反应，全然无所作为。他们视西方列强为“肢体之患”、“肘腋之忧”，而视太平军、捻军为心头之患。第二次鸦片战争再一次让清政府体面扫地，也迫使它重新审视自己的对外政策。从这时起，中国终于开始睁大眼睛看世界了，开始向西方学习了，开始正视洋人这股势力了。1858年的《天津条约》增辟通商口岸11个，这是在西方列强强制下的新一轮开放。西方殖民势力藉此从南方推进到北方，从东部推进到中西部，其势力伸展到华北、东北、长江沿线，使中国内陆的广大地区开始向西方国家开

① 冯天瑜等著：《中华开放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8页。

② 转引自陈诗启著：《中国近代海关史问题初探》，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年版，第88页。

③ 赫德：《局外旁观论》，《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0。

放。1860年的《北京条约》规定各国有权在北京派驻公使，这一规定让咸丰帝很不自在，认为此举“为患最巨”，无异于使朝廷“为外夷所监守”。尽管如此，满清王朝仍然不得不与这些“外夷”打交道，同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已不可避免。

为此，清廷于1861年1月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訢、桂良、文祥奉派为总理衙门大臣，负责办理对外交涉事务。总理衙门的设立，反映出清朝统治者决定放弃闭关政策。清廷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如奕訢所称“办理外交之事，非恐决裂，即涉迁就，势本难以两全。两害相形，则取其轻，实未敢因避迁就之讥，致蹈决裂之害”^①。也就是说，为了避免“决裂”，宁可一切“迁就”。而所谓“迁就”则是清廷“抚夷”政策的隐晦表达。总理衙门的设立及外务活动的开展，意味着近代意义的开放逐渐转化为国策并且日渐制度化。^②然而，这一过程仍然步履艰难，那些较具开放意识，主张学习西方科技、办铁路、开矿务以立富强之基的官员们常常遭到顽固势力的攻讦。

汉口的开埠正是在上述背景之下实现的。汉口正式开埠于1861年4月，正值清总理衙门设立后不久。汉口的对外开放似乎是一个偶然的历史事件，只是因为西方列强的胁迫，才以不平等条约的形式确定下来。但综观晚清对外开放的整个历史进程，可以清楚地看到，汉口的开埠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西方列强第二轮强制开放中的重要一环。因为晚清的开放从总体上来说，是在武力之下的被迫开放。晚清的闭锁状态由于西方列强的武力而打破，晚清的开放也由于列强的武力胁迫而逐渐扩大。随着西方列强控制程度的加深，晚清的开放亦随之不断深化。也就是说，西方列强绝不仅仅满足于打开晚清封闭的国门，它必然要将其势力渗透到中国的各个角落，它必然要求全中国向其开放。

当然，晚清的通商口岸也并非全都是被迫开放的。随着开放的逐步扩大，随着开放之风愈益强劲，清政府也意识到开放潮流之不可逆转，遂也有主动开放之举。

在汉口开埠30余年之后，清廷为增加贸易税收，自动开放的商埠逐渐增多。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11月28日，湖广总督张之洞因兴建粤汉铁路的需要，奏请清廷准许，“开武昌城北十里滨江之地为通商口岸”，并通告汉口各国领事：武昌从即日起对外开放。中国自动开放的商埠，除不得设租界外，订有通商条约的国家的商人可按照通商条约之条款享受一切权益。

汉口及以后武昌的开埠使武汉从闭锁走向了开放，使武汉的城市发展道路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在经济上，汉口开埠以后，西方国家竞相在武汉地区建工厂、设银行、兴航运、办洋行，汉口被迅速卷入国际市场，开始冲破原有市场的地区性封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第55页。

② 冯天瑜等著：《中华开放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3页。

闭,由一个内地商品集散地发展成为内连腹地、外达海洋的近代都市,武汉市场的伸展能力得到了极大扩张。商业和贸易得到了飞速发展。近代工业也开始在武汉出现和发展壮大。

在政治上,开埠使西方势力插足武汉并左右武汉政局,武汉的对外交往和交涉日益增多。开埠也促使武汉地方政府进行若干内政改革,张之洞日后在武汉所推行的新政改革固然是奉清政府之命而为,也是因为武汉的政治必须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与开埠后发生巨大变化的经济文化相适应。开埠还促成了阳夏(汉阳、汉口)分治,最终形成了武汉行政上的三镇鼎立。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初八日,张之洞在《汉口请设专官折》中说:“自咸丰年间创开通商口岸以来,华洋杂处,事益纷繁。近年俄、法、英、德、日本各国展拓租界,交涉之事愈形棘手。且奉旨开办卢汉、粤汉南北两铁路,现在北路早已兴工,南路亦正勘路,纷杂万端,将来告成,汉口尤为南北各省来往要冲,市面愈盛,即交涉愈多。乃汉阳县与汉口中隔汉水,遇有要事,奔驰不遑。”^①夏口厅的设置,使汉口有了与汉阳平行的行政建制,形成了独立建置。它提升和健全了武汉的城市机制,顺应了武汉城市发展的需要。

在文化上,武汉开始了学习西方文明的历程。随着经济的、政治的近代转化,武汉文化的开放也在艰难曲折中渐创实绩。开埠之后,西方文明也飘洋过海来到武汉。冯天瑜先生指出:“西方人在中国兴办的若干文教事业,无论其主观动机如何,也无论其作为强制性的文化移植曾经引起中国人怎样的反应,但在客观上对中国近世的社会开放所起的推动作用无庸忽视。”^②但中国人对西方的学习,主要是介绍、学习、消化西学,是“对西方文化的科技层面开放,西方文化的制度层面和观念层面则被‘变器不变道’的藩篱所阻隔”^③。

(三) 汉口租界的建立与展拓

租界是西方列强在中国的一种特殊领地,是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一种象征。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在列强的武力之下实现的,“大炮下的强制开放,丧失的首先是主权。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胜利者必然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实施殖民计划。租界是强制开放计划的一项内容,当然也是其重要的一步。人员的入住、资本的投入,都是以最大限度地、更为方便地搜括中华民族的财富为目的。租界行政的建立,更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可靠保证。租界意味着中国殖民化程度的加深以及中国领土主权完整的被破坏。尽管租界为人们展现了西方文明,然而这个文明却是建筑在中国人

^① 转引自皮明麻著:《一位总督一座城市一场革命》,武汉出版社2001年版,第81页。

^{②③} 冯天瑜等著:《中华开放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4页。

民血汗之上的”^①。

外国租界的建立始于鸦片战争之后。1842年的《南京条约》中有准许英商带着在五口寄居的规定,《虎门条约》又准许英人在五口租地建屋,永久居住。于是,西方列强就利用这些条款,相继在各个口岸建立“租界”。1845年,英国胁迫上海道员宫慕久用告示的形式,公布《上海租地章程》,将“洋泾浜以北、李家庄以南之地”,计约830亩划为英国居留地。这是西方列强在中国建立的第一个租界。此例一开,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起而效尤,纷纷强划租界。这些租界均设立在通商口岸。对于西方国家来说,其初衷是建立一个据点,取得在中国经商的方便,并进而谋求其他方面的特权。对于清政府来说,则反映出清政府传统的行政控制政策的结果,即为避免华夷杂处勾结生事,或造成内外纠纷,故允设立租界限制洋人的活动范围,以减弱其影响。列强各国在中国设立租界,高潮是在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是鸦片战争的产物。

租界在最初建立时,中国对租界内的行政、司法等还保持有若干权利。但随着列强在租界的地位的日益巩固和加强,中国在租界里保持有的权利逐渐被侵犯、排斥和否认,租界逐渐成为独立于中国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之外的特殊地区,成为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在中国进行半殖民地统治的反动堡垒。

为了把武汉变成永久性的经营据点,列强在强迫汉口开埠通商的同时,又积极谋求建立起他们在武汉的“独立王国”——租界。英国在强划租界中再次充当了急先锋。1861年3月英国海军中将贺布与驻华参赞巴夏礼在要求汉口开埠的同时,即提出了建立汉口英租界的要求,并就划定租界问题与湖广总督官文接洽。3月20日,巴夏礼与湖北布政使唐训方订立《英国汉口租地原约》,划定汉口英租界。将汉口闹市区黄陂街以下,从花楼街往东8丈起,到甘露寺江边卡东角为止长250丈,宽110丈,合458余亩的地基划为英国租界区,当即立石为标。租约规定“将此地永租与英国官宪,分为英国商民建造栈房居住之所”,“管办此地,一切事宜全归英国”。^②而英国只需于每年四月向汉阳县每亩缴纳地丁银1钱1分7厘(共53两6钱2分5厘)、漕米每亩2升8合4勺(共13石1升5合7勺,折银39两零4分7厘1毫),两项共缴纳银92两6钱7分2厘1毫。汉口英租界是武汉近代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租界。


1894年甲午战争后,法、俄、德、日等国又相继在汉口开辟出租界。1895年10月3日,德国借口参与俄、法迫使日本归还辽东半岛有功,胁迫清廷允许其在汉口设立租界。中德立约规定:自汉口通济门沿江官地界外起,至李家冢止,共宽

① 冯天瑜等著:《中华开放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61页。

② 《英德俄法日等国强租、展拓汉口租界之条约》,武汉大学历史系近代史教研室编:《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9月版。

300 丈，深 120 丈，总面积 600 亩，每年缴纳地丁银、漕米银共 121 两作为租金。

1898 年 5 月，德国数次与江汉关监督瞿廷韶面商，要求将通济门外原留出的空地及后段空地（计深 120 丈，前宽 12 丈，后宽 25 丈）一并让予德国；德国则将租界北面江边之地退还中国。瞿廷韶考虑胶案未了，恐再生事端，勉强答应了这一要求。双方于 7 月 11 日修订界址，画押存案。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俄、法两国以迫使日本归还辽东半岛有功，向清政府要求在汉口共同择定一个地区，建立它们的租界。俄、法两国商定：俄占这一地区的三分之二，法占这一地区的三分之一，并分别与清政府订约。1896 年 5 月 21 日，沙俄与清廷缔结《俄国汉口租界条约》。租界占地 414 亩 6 分 5 厘，上至合作路起（当时叫界限路）与英租界相邻，下到黄陂路与黄兴路之间；北枕中山大道，南抵江边。其中，沿黄陂路折经洞庭街下行，抵车站路再折至沿江大道，形成一条“”形边界线与法租界相连。年租银 83 两 8 钱。设界之初，租界内的华人地产只准俄国人按限价（每平方米银 10 两）租赁，大多数华人业主迟迟不肯交出房约地契。俄领事多次严催汉阳府督办，但业主拒不听命。俄领事又与湖北汉黄德道、江汉关监督瞿廷韶重订条款，一次将地价、房屋拆迁、重建费交汉阳县，由汉阳县强制各业户交契，并议定先从江岸一带起，陆续办理永租手续。

同年，湖广总督张之洞遵上谕，委派湖北汉黄德道、江汉关监督瞿廷韶会同法国驻汉口、九江通商事务领事在汉口查勘划定法租界。“法、俄租界现议在长江西岸汉口镇英租界以下沿江至通济门（原汉口城的城门，在今一元路口）为止，计长 288 丈，以三分之二由英租界下设为俄界，由俄界而下设为法界。此指大路（相当于今洞庭街）之外至江岸而言，是为前界，计长 96 丈。由大路至江岸，南首计深 37 丈，北首计深 17 丈。其大路之内，西南自俄界起，东北抵城垣官地为止，计长 117 丈。由大路至城垣官地为止，南首深 106 丈，北首深 43 丈 5 尺。均已勘定，监立界石。”6 月 2 日，双方签订《汉口法租界租约》。法国划定租界总面积 187 亩，每年缴地丁银、漕米银共 37 两 8 钱。

1898 年 7 月 16 日，日本驻华大使吉野敦促清廷履行《马关条约》，并胁迫签订《汉口日本专管租界条约》。瞿廷韶奉总理衙门之命，与汉阳知府钱守恂，会同日本驻沪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议定汉口日租界界址：从通济门外德租界北首起，沿江下行 100 丈，至夔昌小路（今郝梦龄路），东起江边，西至平和街（今中山大道），面积 247 亩半。每年地丁银和漕米银 50 两，由日本领事馆向汉阳县交纳。条约规定：凡界内华人的房屋土地，在与日本办理租、卖时，不得抬高价格。租界内准许殷实华人居住经商，无身价之华人一律不准居留。条约还规定，“此次所定日本租界过于窄狭，将来商户盈满，则当临时酌妥情况，仍在丹水池迤下之地（原日租界以下），由日本领事官随时与江汉关监督商酌，购买妥定地基，以便日后设立

工厂……总以铁路为主”。

英国目睹日、德、法、俄等国在汉口相继开辟租界的形势，寻找各种借口，要求拓展其租界范围。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在英租界当局一再要求后，由湖北汉黄德道、江汉关监督瞿廷韶与英国驻汉口领事霍必澜签订《英国汉口新增租地条款》，规定“英租界后至城垣（今中山大道）留出官地5丈止，南至一马路（今江汉路）向城垣直线起，北至俄租界（今合作路）止，所有四址以内，全行租与英国政府归入租界”。新增租地为337亩5厘，每年应纳地丁漕米银，按37年前的原价计算，共银67两4钱5分2厘，仍由英国领事交给汉阳县查收。^①

经此次展拓后，英国租界南起于太平街（今江汉路临江一段），北至界限路（今合作路），西到城垣附近，总面积达795亩多，而其租金不过是每年缴纳地丁漕米银160两1钱3分4厘1毫，甚至还抵不上当时“租界”内一栋楼房的年租金。

1901年，英租界又有所扩展。当时，汉口的“地皮大王”、买办刘歆生，在与英租界毗连的今江汉路中段贱价收购有一块地皮。当八国联军占据北京、天津之际，英租界工部局总办米勒私下与刘歆生达成协议：工部局负责将租界内的垃圾、煤渣无偿供给以填平地皮，以改善租界西侧（今扬子街一带）水塘、荒坟地区的治安、交通管理等；刘则自愿将填平地皮的一部分，包括后花楼街南口至中山大道和整个扬子街地段，纳入英租界，由工部局在此修筑两条马路，剩下的地皮产权仍归原主。英国当局为纪念买办刘歆生献地皮“有功”，将其中一条马路命名为歆生街（即今江汉路的胜利街口至中山大道一段，另一条马路即扬子街）。道路建成后，英工部局立即派遣巡捕站岗，收取捐税，使之无形中归入英租界。至此，英国租界范围比原址扩大了1/3。

法、日等国在辛丑条约后，又要求在汉口扩展租界。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11月，法国当局借口“商人为数日增”、“法界之上设有铁道车栈”、“英国展界后筑有新路，直抵该车栈”，要求扩充租界“使近车栈”，“以便由车栈彼此筑路通达江滨”。清政府为满足其要求，于12日由湖北汉黄德道、江汉关监督岑馥庄与法国驻汉口领事玛玺理签订《汉口法国租界展拓新界条款》。自官地西距铁路60丈为止，一律照前约增缴地丁、漕米银两。另旧地城墙的地基3丈，墙内5丈、墙外5丈加城壕6丈，共宽19丈，也一并展拓给法租界，地丁银两分文不取。但法国领事仍以法租界只及英租界1/4、不及德租界一半为由，要求江汉关监督允许法国租界继续向铁路延伸。张之洞指出，“铁路所经及两旁之地，必须全归中国管理，断不容旁落；60丈之界断断不准逾越”，命江汉关监督坚持原议不变。法国展拓的新界范围是：南自俄租界下（今黄陂路下首），北从德租界毗连处（今一元路），各引一直线合185米，伸向城垣（今中山大道）外，至距京汉铁路60丈的官地为止，

① 徐焕斗：《汉口小志》下卷，“附外国人居留地”，1915年版，第11～13页。

所有城垣内外基地未计亩数（后人推算为 305 亩），均划归法租界。至此，法国租界总面积达 492 亩，其地丁、漕米银每亩与 40 多年前英国租界相同。由此，法国租界遂由今中山大道伟英里门前，扩展至离铁路 60 丈处。而现今的长清里、德兴里、庆平里、三德里、海寿里、海寿街、复兴街（今中山大道一段）、如寿里以及车站路和黄兴路的大段，都先后变为新的法租界范围之内。

1906 年日本驻汉口领事与江汉关监督交涉，要求把大智门外毗连租界的空地 1 000 余亩照约租让，由于湖广总督张之洞抵制，总理衙门未予批准。

1907 年（光绪三十二年）日本租界当局根据原约规定，提出扩展租界要求。2 月 9 日，由湖北汉黄德道、江汉关监督桑宝与日本驻汉口兼九江领事水野幸吉签订《日本添拓汉口租界条约》，议定从原日本租界址起，“向北扩展 150 丈止，东西线照原界对齐”^①。于是日本租界以原定的北边界线（今抚顺路），向北延伸至今刘家祺路以北麻阳街下太古码头以南处，新增面积 375.25 亩。新旧租界加在一起，南起于营口路，北至一字街，东临长江，西抵中山大道，地形呈长方形，面积共约 622.75 亩，仅次于英国租界面积，居汉口五国租界的第二位。

英、德、俄、法、日等国在汉口划定和展拓租界的具体情况如下表：^②

国别	设界时间	租界面积	扩展时间	扩展面积	总面积
英国	1861 年 3 月	458.33 亩	1898 年	337.05 亩	795.4 亩
德国	1895 年 10 月	600 亩			600 亩
俄国	1896 年 5 月	414.65 亩			414.65 亩
法国	1896 年 6 月	187 亩	1902 年	约 305 亩	492 亩
日本	1898 年 7 月	247.5 亩	1907 年	约 375.25 亩	622.75 亩

甲午战争后，在法、俄、德、日等国在汉口强索和展拓租界的同时，比利时也趁机而入。1897 年 5 月 27 日，清廷为修筑芦汉铁路向比利时兴亚公司借款 1.2 亿法郎（折合清库平银 3 750 万两），并由比国派员监督筑造铁路及经理铁路营业。^③ 1898 年（光绪二十四年）合同生效后，比国铁路员工陆续来到汉口，比利时政府趁修筑芦汉铁路在汉口征地的机会，令驻汉领事以解决比筑路工人住房为由，通过法商立兴洋行在日租界以北的华业公司地界到刘家庙火车站铁路两侧，仅以每亩地

① 徐焕斗：《汉口小志》下卷，“附外国人居留地”，1915 年版，第 22～23 页。

② 资料来源：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59 页。

③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1 册，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709～712 页。

银 10 两的价格,私购民地 36 000 余平方丈(约合 600 亩),并在江边修筑了码头和堤岸。随即向清总理衙门要求在汉口划定“比国租界”。张之洞认为“比国工人只可由铁路公司造屋借与居住,不能准予立界”。相隔四年以后(1902 年),比国公使数次向外务部函催。张之洞认为,比国原购地段,扼南北铁路咽喉,对于中国管理铁路主权及京汉、粤汉两路交接之码头大有妨碍,坚决不允许。此后比国领事在法国的支持下又多次要挟。张之洞只好同意在滨江一带划地 16 000 余平方丈作为比利时租界。但比国公使又认为所划地界太过狭小,藉口东、北方向远离铁路数十丈,要求“通融加宽”。张之洞、赵尔巽皆考虑,若允许其加宽逼近铁路,有碍铁路主权和沿线军事设防,且日领事也会趁机要求拓宽租界。为避免日领事馆卷入拓界之争,江汉关道与比利时领事周旋数年,终未允扩界。卢汉铁路修成后,比国员工陆续返国,比利时索要租界的理由也逐步减少。

1907 年,张之洞为“永保利权”,建议集资赎回比国所占的土地,但因铁路通车后,地价猛涨,比国领事每亩要价 1 363 两,全部基地议定价银 817 800 两。张之洞决定付给比方赎金,“息借华洋商款垫付,以杜翻悔”,赎回全部土地,再向湖北官钱局另行筹款归还商款。比国领事馆从这项土地投机中获取了巨额利润。

汉口开埠以后,英、美、法、俄等国货船纷纷来汉贸易。为此,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通知湖广总督官文,凡外国商船前来通商,必须先在汉口设领事馆,或请别国在汉领事馆代理。否则,一概不准。因此,各国纷纷在汉建领事馆。西方列强先后在汉建立的总领事馆或领事馆计有:英国、美国、俄国、法国、葡萄牙、荷兰、日本、德国、比利时、意大利、丹麦、瑞典、挪威、墨西哥、芬兰等 15 个领事馆。此外,奥地利、西班牙、瑞士、刚果、菲律宾等国分别由上述有关领事馆代理领事馆事务。

外国驻汉口的第一个领事馆是英国领事馆。它始建于 1861 年 3 月底,共有 3 栋楼房,面积 16 320 平方尺。设在英租界六码头界限路(今合作路)口以南,1899 年升为总领事馆。

俄国领事馆于 1862 年 1 月设立,1902 年,在俄租界领事街(今洞庭小路)北侧新建二层砖木结构领事馆 9 栋楼房,占地面积 2 819 平方米。

法国领事馆设于 1862 年 11 月,1865 年在洞庭街 10 号地基建造法式二层砖墙青瓦房 1 栋,1891 年被大水冲毁。1895 年由法籍工程师韩贝设计,在该租界吕钦使街(今洞庭街 98 号)建成呈四方形十分别致的领事馆大楼。

德国领事馆设在该租界江岸街(今沿江大道一元路口以北),1895 年由韩贝工程师设计兴建,为二层砖木结构,建筑面积 3 202 平方米,屋顶装有一只镏金鹰国徽,头朝武昌湖广总督署。

日本领事馆设于 1891 年,即《马关条约》签订之前。那时,日本在汉口“除一个卖眼药商店外,绝无商人”,旋因“居留民稀少而停顿”。1898 年日租界划定

后，日本商人、特务、间谍、浪人不断涌入，又在法租界重设领事馆并升格为总领事馆。不久，迁至日租界山崎街东口（原在今沿江大道山海关路口以北，后迁该路口以南）。

除以上 5 个辟有租界的国家外，还有 10 个未辟租界的国家在汉口设有领事馆。

美国领事馆设于 1861 年 5 月，最初的地址在汉阳，它是外国驻汉口的第二个领事馆；1905 年在俄租界威尔逊路东口（今沿江大道车站路口）以南，新建成一座三层砖木结构的“巴洛克”式领事馆大楼。

比利时领事馆设在法租界福煦将军街（今洞庭街蔡锷路东南）。荷兰领事馆原设在英租界五码头宝顺街（今天津路）以南与英领事馆隔街相望，后迁至法租界吕钦使街威尔逊路东口与福煦将军街东口之间。

葡萄牙领事馆设在法租界威尔逊路以北与美国领事馆隔街相望。瑞典领事馆原设在英租界四码头华昌街（青岛路）以南，后迁俄租界一德街边领事街（今沿江大道洞庭小路）以南。

挪威领事馆原设在英租界江边 23 号，后迁德租界中街与寿街（今胜利街与四维路）以南交界处。

丹麦领事馆设在汉江街的宝街（今沿江大道的五福路）口以北。意大利领事馆设于 1861 年，开初由驻上海领事兼，地址在德租界江汉街的寝街（今沿江大道的六合路）口以南。

瑞士领事馆设在英租界四码头华昌街。其他如西班牙、奥地利和墨西哥三个国家委派有领事，但未设领事馆；秘鲁、巴西和刚果（系比利时兼管）三个国家既未委派领事也未设领事馆。瑞士虽设有领事馆，但未委派领事，由美国领事代办。当时汉口，共有 16 国派出总领事、副领事或代领事。

互设领事馆是现代外交、现代国际交往中正常的行动，各国在汉口设立领事馆有其积极的一面，不应一概视为对中国的侵略。但是在积弱不振的近代中国，有些资本主义强国往往为了侵略和扩张而将领事馆插入汉口这样的腹部地区，甚至怀着搜集情报、网罗谍报人员的目的，从事非正当的活动。同时，又以不平等条约为据，实行领事裁判权，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主权。这一点也是不可否认的。

租界的建立给武汉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第一，租界作为武汉的一个“独立王国”，由西方殖民者主宰，列强在汉的领事馆和租界当局成为武汉地方政府的太上皇，他们依仗政治特权和军警，干扰内政，插手武汉政局，培植其代理人。租界的面积虽然不大，但租界的势力及其影响远远超出了租界的范围而达于整个城市，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控制着整个城市的政权。

租界建立后，洋人们即大兴土木，营造其在汉的根据地。起初，惧夷畏夷的武汉地方政府，对近在咫尺的洋人们还抱有抵制的心理，不愿过多地与他们交往，只

是被动地应付。然而，随着洋人们势力的不断加强，地方官员们也逐渐与这些“外夷”打得火热。时人记载：“英夷国洋鬼子装载洋烟布缎、金银财宝，倏入中原，戾业武昌、汉阳，出重价买基地，求大木，起高楼，艨艟巨舰，泳江浮海，两国货物交通往来，与武昌都督献酬交酢，同湖广百姓胶膝通商，病国病民之举若此，清朝大位可胜料哉！”^①

不仅如此，租界内外的外国银行、洋行、工厂、轮船公司还控制着武汉和华中的经济命脉。日本甚至利用租界为据点，大肆开展间谍活动，搜集情报，为阴谋侵华作准备。

第二，汉口租界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了解西方的窗口。租界的建立使西方列强在汉口有了一块根据地，西方文明在这里很快生根发芽，蓬勃发展。外国人在租界中铺路、建房、设厂、开店、工作、生活。体现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各类机器、各种设施被移植到这里，宽敞的马路、明亮的橱窗、电灯、电话、电报、煤气、自来水、自鸣钟、洒水车、脚踏车、汽车、花园、洋房等等，这些实实在在的西方文化，与汉口原有的器物、设施形成鲜明对比，为那些无缘涉足西方的人们提供了一个了解西方的窗口。在西方物质文明输入的同时，体现西方制度文明的选举制度、司法制度、交通管理、卫生管理等制度也被移植进来，体现西方人精神风貌、审美情趣的种种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也被移植到这里，诸如赛马、戏剧、舞会等等，租界开辟以后，逐渐繁盛起来，并成为汉口的中心区域。租界的市政管理、文明程度，与以前迥异。通过租界展现出来的西方文明、租界与华界的巨大差距，极大地刺激着汉口人民，推动着汉口学习西方的步伐。

第三，租界深刻地影响着武汉的发展进程，对武汉人民的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经过事先精心勘查而划定的汉口英租界，体现出英国人的现代都市眼光。租界选择在汉口旧城区下首滨江地段上。当时这里人烟稀少，地势开阔，不仅可以开拓街道，营造高楼，而且有滨江之便。可以依靠长江的黄金水道发展航运和商贸。1865年，英方耗资20万两，在滨江修了一道堤防，以后居民住宅和商业公司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近20个不同国籍的商人云集于这个外国人惟一的群落，从事商业活动。经过连年的建设，租界面貌一新。一个外国人曾经这样描述当时汉口的租界状况：“在汉口，其变化之大，更是令人惊叹。……新近设立了俄、法、德租界，几年前还是稻田和肮脏小屋杂处之地，现在铺设了马路，竖起了高大的住宅。这些新租界与英国租界一起使汉口有了长达两英里，联成一气的河街。”

目睹租界市政的巨大变化，湖北地方当局决定借鉴租界市政规划，对汉口老城

^① 李汝昭：《镜山野史》，《太平天国》（三），第13～14页。转引自皮明庥：《武汉通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341页。

区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造。这项工作取得了一定成功。《海关十年报告》指出：“（汉口）街道正在被拓宽，所有新建筑都必须从原线后退三尺，像在租界一样。”^①

汉口的近代邮政最早也出现在租界。1872年英国领事馆创办了“汉口英领事邮政代办所”。此后，德租界于1895年开设德国邮政分局，1899年法国和日本分别在租界内开设一等邮局、郵便局。正是这些外国“客邮”催生了武汉的近代邮政。

在城市交通方面，租界亦开风气之先。1888年，第一辆人力车出现在汉口租界中。至1911年，武汉三镇已有人力车3300辆。武汉的第一辆汽车于1903年由英国驻汉领事购进。到1910年时，武汉共有汽车20部，全部集中在租界。

武汉三镇人们的日常生活用电也始于汉口租界。1861年汉口开埠不久，英商便集资创立了“汉口电灯公司”，专供英租界内用电。汉口绅商有鉴于此，积极筹办水电事业。1906年，宋炜臣创办“既济水电公司”，使武汉人民也用上了电灯。电灯的出现，给人民生活带来了一大变革，大大提高了人们时间的利用率。

租界在带来文明的同时，又带来了资本主义的腐朽生活方式，使租界成为烟、赌、嫖泛滥的花花世界，成为罪恶的渊藪，腐蚀着武汉人民的生活。

第四，租界的设立，使汉口形成了新的商业区。租界相对安定的环境，为近代企业的创办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直接导致了商务的兴盛和航运的发展，汉口华界的服务性行业和进出口贸易也相应发展，汉口的商埠功能进一步扩大。

开埠以后，英、俄、法、德、日等国相继在汉水入江口以东滨江一带开辟租界，在租界内开设洋行、工厂、银行，修建洋房、码头、马路；一批为逃脱中国封建统治的买办、官僚、商人也托庇于租界，在租界附近聚居、投资设厂；一大批为租界新区提供生活服务的第三产业也随之兴起。基于以上背景，汉口租界及相邻的华界地带由一片荒凉之地很快发展为“危楼杰阁，车马殷阗，万里航船，街尾碇泊”^②的新兴商业区。

（四）经贸扩展的表征：江汉关的设置

汉口开埠之后，并没有立即设立海关。当时，湖广总督官文力主在汉口设关，而署理总税务司赫德竭力反对长江内河新置海关，从而使汉口从开埠到立关经历了一个短暂的居间期。

1861年巴夏礼来汉筹办通商事宜时，即传递了某些关于立关问题的信息。巴

① 《海关十年报告》（1893~1902），李策译自英文本。

② 转引自王永年：《晚清汉口对外贸易的发展与传统商业的演变》，《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6期，第158页。

夏礼拜晤官文时称：“货物出口入口，税课俱在上海、镇江完纳，九江、汉口概不征税……楚北无须添设关卡，以节糜费。每年亦无报解之款，仅须酌派明干大员，与该国领事馆筹办日行事宜。”^① 这已表明英国打算在汉口开埠后将不设新关，汉口与外国的商务将由外国领事与地方官会同管理。由于汉口开埠通商对于湖北地方当局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湖广总督官文自身对此亦不熟悉，他向清廷汇报说：“此次英船至楚，上岸入城……奴才以礼相待，遇事剖以情理，英官欢喜相从……如有因地制宜，应行酌量变通之处，不在条约所载者，仍由奴才随时奏请训示，或咨商总办通商事务大臣，分别办理。”^② 对巴夏礼的安排基本上未置异辞。

1861年3月，英国单方公布了巴夏礼拟定的《长江各口通商暂订章程》。根据这个章程的规定，凡持有入江江照的英国商船，可通航至汉口为止；只要在上海完纳关税，就可在镇江以上汉口以下随意装卸货物，不用请给准单，不用随纳税饷。^③ 据此，当然也无须在汉口、九江、镇江三处新设海关。赫德对此亦表示支持。他在《长江一带通商论》中称：

洋船载货由长江行走者，不准沿途上下货物，只准在镇江、九江、汉口起货下货，自须在该三处设关收税。若在镇江起下，即在镇江完税，九江、汉口二处，亦一律办理。向来茶叶多由广东出口，而粤海关征税，重货即系茶叶。现因在汉口开港，所有出茶叶地面，均离汉口甚近，将来茶叶不到粤海关，即由汉口置买，装载洋船出口。且洋货入内地，大半均由上海进口完税，即由中国人运至内地各处。惟因镇江、九江、汉口开港，将来洋船载洋货，不至上海，直至各港口卖销。

惟镇江以上，巡查缉私，防堵偷漏甚难。因镇江至九江、九江至汉口，各有数百里，两岸均有村庄卖买。该商已过镇江，不至九江，已过九江，不至汉口，在中途随意可以起下货物，无人稽查，无关收税。倘有船在沿途起货下货，中国应照例拿办，但在镇江以上无人稽查，奸商即能随意走私。如有人稽查及巡船缉私，因中国风蓬船赶不上有意走私火船，恐难禁止缉拿。当中国安静时，长江一带防堵走私已属不易，况现在各处贼匪滋扰，更不能设船查拿。不但新设三关，徒糜经费，无税可收，而粤海出口税，上海进口税，亦日见其少。若再指明在该三处只准通商，外国官员，即应与该三处有权力之人酌定章程，以保护本国之人。现在该三处就近有权力之人，即系贼匪，伪称太平天国。若外国与伊等酌定章程，是亦以官员相待，则伊等更觉气高胆大，而蔓延

①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5，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790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5，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789～2790页。

③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55～156页。

之势，更难了结。^①

因此，赫德提出惟一可行的办法是按照巴夏礼的《长江各口通商暂订章程》，在上海征纳税饷，镇江以上、汉口以下，作为上海的内口，毋庸设虚立之关。否则，“若在三口设关征税，商人以利为心，一定想法，不到关而起货。若该三处无关征税，该商人因此三处，原系有大买卖之区，必愿将货物运至该三处售卖，而不愿在沿途有小卖买处起卸。”赫德此论，得到了清廷的首肯，这样便否决了长江设关的可能性。

《长江各口通商暂订章程》确认了汉口对外贸易由外国领事和地方官员协同监理的独特的管理方式。新开放的长江贸易税在上海或镇江征收。但长江贸易立刻增加了关税管理的问题。由于领事和地方官对外货入汉没有征税权，更无监督盘查权，这种管理上的弊端很快被外商和中国私商抓住。英美商人获得领事馆的特许，让租来运输茶叶到长江下游的中国船悬挂他们的旗帜。这一促进合法贸易的让步，立即被肆无忌惮的外国走私者所利用，他们“悬挂英国旗以逃避本地关卡课税……又伪装本地船只以逃避海关课税”^②。更有甚者，一些英商还利用这个章程，把武器和粮食供给太平军。为此，与太平军势不两立的清政府拒绝批准这项章程。

湖广总督官文鉴于走私之风日炽，“自洋人到汉口通商，两湖厘税均无”的状况，主张在汉口设关，请求总理衙门就税则和稽查问题迅速议决。他就此上奏朝廷称：

自今春二月以来，所到洋货皆于汉口各行中以货易货，并不交进口货物清单，亦不报出口货物数目，以致毫无稽查。其应完子口税虽有上海来文，而该领事一概龃龉置之不理。且有内地商船借插英旗影射偷漏，甚至将违禁货物如钢铁、米粮等类装载下船，内地商人分赴湖南、湖北购买茶叶等货物，动称洋商雇伙，抗不完纳厘金。惟有于汉口设关，明定章程，设立行栈，收票发票，稽查盘验，由商贩自行贩运到汉镇入行售卖，照海关章程将内地各货出口正税及子口税一并于汉口完纳，其进口洋货运至汉口仅照章点验方许售销，以符一税不二税之约。并禁止华洋行伙往山乡镇市自行采办。如此出入货物既有可稽查，而税课亦有攸归矣。^③

①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8，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931～2932页。

② [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89～290页。

③ 民国《湖北通志》卷50，《经政志八·榷税》，第1366页。

咸丰十一年四月（1861年6月）官文为英美在汉通商各事再次上奏清廷：

窃查各国来汉通商，事属创始，前奉颁行章程，于各国出口货物税则，在汉镇交纳等因。正在详议办理章程，旋准办理各口税务大臣薛焕来咨：经英国巴夏礼续议新章，其出口税则，或在汉口，或归上海，尚在未定。暂照所议新章，税物出口，候议妥再行咨照办理。而楚北自二月以来，皖逆上窜，长江南北，贼踪不时出没。洋船来往其间，难保无奸民渔利，代为逆匪置货，尤应严密防维。复经奴才将应完出口税则，并作何稽查，咨请总理各国通商事务大臣迅速议覆，以便遵办各在案。^①

巴夏礼拟定的《长江各口通商暂订章程》出笼之后，湖广总督官文与江西巡抚毓科于1861年9月相继上奏，一针见血地指出：

“凡进出口货物均归上海稽查纳税，实有心取巧，预萌偷漏之端。”“自洋人入江以来，进出口税均在上海交纳，其入内地卖洋货，买土货，既未议征子税，而洋人复不令地方官抽厘，汉口九江领事，又均不服稽查。”“洋商往返贸易，凡有洋货进口售卖内地，内货出口贩运外洋者……皆于汉口各行中暗中以货易货，运载上船，并不交进口货物清单，亦不报出口货物数目，以至毫无稽查。”

“若如英使所谓出口货仍至上海纳税，则迢迢长江千余里，随处皆可上货下货，任其自便，实存欺蔽之明验也。”“汉口为九省通衢，行运甚广，百货丛集。其中茶叶、大黄、桐油等货，尤为出口大宗，奸商倚托影射，甚至将停运之货接济贼匪，违禁之物潜行夹带。自汉口至镇江，途经千余里，其中处处可以私售，汉口既无盘验，上海镇江无凭稽查。若经由长江出口，则上海亦无从查知，不特税课竟归无著，抑且将来流弊无穷。”

因此官文奏请“拟将汉口、九江应征之税，改归汉口、九江征收”，建议在汉口、九江设关征税，添设监督，赶建衙署，以便稽查。这是解决长江通商的关键问题。但赫德则称“长江地方辽阔，江面尚未平靖，稽查难周。如长江进口洋货，税不在上海征收，则洋商避汉口、九江之有关，必于无关之处绕越卸货，则进口之正税漏矣。如长江出口土货，税不在上海征收，则洋商避汉口、九江之有关必如无关之处偷载上船，则出口之正税又漏矣”^②。

①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8，第2875页。

② 民国《湖北通志》卷50，《经政志八·榷税》，第1366页。

恭亲王奕訢收到官文等的奏折后也承认《长江通商暂订章程》“尚有未尽严密之处”，而收税一节亦未议及，为了消除官文和毓科的不满，总理衙门“再四筹商”，将《长江通商暂订章程》加以修改，定名《长江通商暂行章程》，并奏请“长江应收进出口正税及土货复进口税，现今均在上海完交”，饬令江苏巡抚将上海代收长江各税，每届三月一结之期，分别拨归湖北和江西两省，以示搪塞。后见太平军屡次攻取两湖地区，为了防止因财政亏空而出现政局动荡，1861年11月总理衙门方议准了官文的设关之请。

1861年11月11日（咸丰十一年十月九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议准官文奏请汉口设关收纳洋税一摺。

至汉口地方据该督奏称必须设关，自应准其建立，查验出进各货。惟该督奏请由京简派监督一节，臣等查江苏、上海口系苏松太道管理，浙江宁波口系宁绍台道管理。汉口本非海关可比，且进出正税均在上海征收。汉口关仅征子税，又盘验货物等事，应即由汉黄德道管理，毋庸由京派往。其汉口建关一切事宜，即由该督督同汉黄德道妥议章程，实力办理。所有建关经费及应设书吏人役工食等项，既系仅收子税，则均力求撙节。^①

1862年1月1日，江汉关正式建立。江汉关最初设于夏口县汉口河街，即汉口镇英国租界花楼外滨江。江汉关监督署则初设于汉口镇青龙巷，其任务是稽查来往船只及进出口货物。为便于管理，将“汉黄德道”移驻汉口，称“汉黄德道兼督税务江汉关署”，简称江汉关。第一任海关监督是湖北分巡道郑兰，狄妥玛作为海关代理，1863年1月1日升任税务司。考虑到江汉关的重要性不如沿海各关，进出口正税仍在上海完纳，江汉关最初只负责盘验货物，征收子口税，1863年1月1日正式对外征收正税。

江汉关在其设置上与沿海各关有些区别，但从江汉关各种组织机构的运转情况来看，两者是没有差异的。与沿海各关一样，江汉关也推行海关双轨运行体制，即由清廷任命、以地方官兼理的海关监督与总税务司任命的外籍税务司共同承担对海关的管理。只是沿海的各税务监督是由皇帝钦命，而江汉关税务监督则由湖广总督选拔。江汉关监督与税务司两者不仅权力来源不同，职权范畴有异，最初也不是合署办公。1862年1月1日江汉关设立后，官文委派湖北分巡汉黄德道郑兰为第一任监督，督理江汉关及通商事宜。其具体职责是负责税款的保管及其支拨，每年四季按税务司报告收纳税银，并通告本省行政首长，转报中央政府，听候中央政府命令拨解各项税银。除此之外并无他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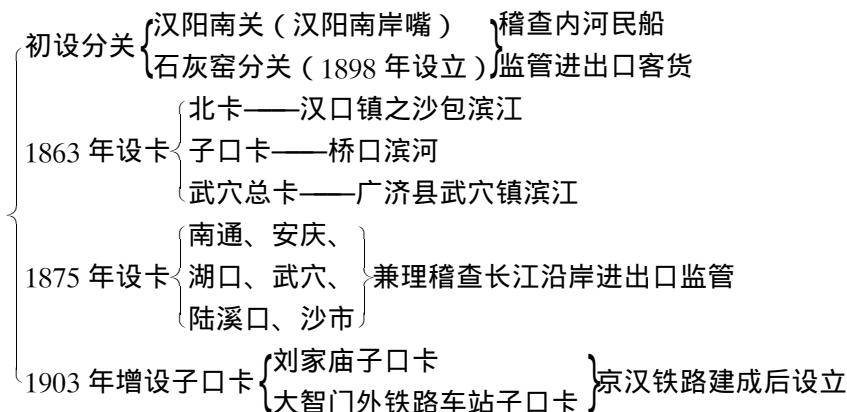
^① 民国《湖北通志》卷50，《经政志八·榷税》，第1366页。

江汉关建立后，其内部分支机构随着进出口贸易业务的发展，在长江中下游沿岸各埠和铁路沿线不断增设、调整分卡或子口卡。起初，江汉关下辖有二关三卡。江汉关署设在汉口镇（后改夏口厅）青龙巷；大关设立在汉口镇英国租界花楼外滨江总汇税务；汉阳南关设立在汉阳县南岸嘴滨河，稽查内河民船；北卡设立在汉口镇租界十八段之下沙包滨江；子口卡设立在汉口镇襄河上游桥口滨河；武穴总卡设立在广济县武穴镇滨江。以上二关三卡，除两关外，各卡仅武穴由税务司派有西人签子手，随同委员会同盐厘各局专司稽查，其余只派书役验票查私以杜偷漏。^①

1876 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后，湖北境内的宜昌被辟为通商口岸，武穴、陆溪口、沙市辟为外国轮船暂时停泊之所。为了协助对新开口岸的管理，海关总税务司决定增派税务司一人或副税务司一人驻汉口来往稽查襄办。从此，江汉关税务司开始兼理省内沿长江六处关卡事务。1898 年又设立石灰窑分关，监管订有专章的船舶装卸货物，主要为监管载运水泥厂物料进口、水泥出口及大冶铁砂出口至日本的轮船。

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因京汉铁路告竣，江汉关又分别在刘家庙铁路车站之侧以及大智门外铁路车站之侧添设了二子口卡。

兹将清末江汉关先后设立的分支关卡分列如下以醒眉目：



江汉关在机构设置和内部管理上借鉴和采用了西方国家海关的模式。其负责人称“税务司”，下设副税务司、帮办，按工作性质，分为内勤与外勤。内勤设秘书、税务、总务、会计等，外勤设验估、监察、缉私、江务、港务等。这些机构高级以上职员均由英、美、法等籍人充任，中国人只能担任文书、杂役之类的工作。江汉关与沿海地区各关的不同之处在于，作为海关，名义上的最高长官“海关监督”一

^① 参见民国《湖北通志》卷 50，《经政志八·榷税》，第 1366 页。

职，不是由清政府任命，而是由湖广总督选拔任用。江汉关各个方面的工作，实际只听命于英籍总税务司赫德，独立于中国各级政府之外，税务司成为江汉关政务的实际主持人。税务司与监督还各有自己的一套组织系统。关署监督下置总务课长一员，税务兼计核课长一员，部派会计主任一员。汉阳南关、分关及武穴总卡各级委员一人。

江汉关由税务司担任管理海关的实际职能，这也是西方列强不断强化对海关控制的一个缩影。税务司受总税务司委派，直接对总税务司负责。其具体职能包括：（1）统辖关务，在不妨碍商贸发达的前提下征收关税；（2）管理训练属员，总司外人帮办和华员的业务和语言训练；（3）应无条约国或无领事的缔约国的请托，代理领事和通商公证人之职；（4）兼理航道、港务、气象观测、邮政、港口、外洋进口船舶的检疫、引水及本地产品参加国际博览会等。

税务司之下设置七课。它们是总务、验估、秘书、会计、稽查、港务、江务。它们的具体职能是：总务课输货物进出口、轮船结关、进口税、吨税及堤工捐之征收、缉私案之处理；验估课负责货物之查验、鉴定，货价估值、税则号列之审核；稽查课掌握缉私、船务、巡缉、结关、供应、庶务、管理关产；港务课自理与港务有关的事宜；秘书课保存全关文件档案，负责文件收发登记、拟稿、缮写、打字、译电、人事统计等工作；会计课输关务方面的收支，工资核算、发放，各种关税经费造具会计报表；江务课管理长江中段、下段及江上之助航设备。

从江汉关设立以来，海关主权就由外籍人操纵。1862年，代理总税务司赫德派英人狄妥玛为江汉关负责人，翌年任命为税务司。此后，税务司一职就一直由外国人把持。不仅如此，税务司以下的高级职员如帮办、外勤也是由英、美、法籍人员担任，只有文书、杂役才派中国人充任。1908年税务学堂设立后，从该校毕业的中国学生才能出任核税员、办事员一类的职务。海关美其名曰“外人帮办税务”，实际上中国人不能主宰。

随着外国人不断强化对海关的控制，江汉关逐步走向半殖民地化。在此过程中，也输入了西方先进的海关管理方式。可以说江汉关是武汉税收行政管理机制和经济运行机制向近代转型的一座路标。与传统的关卡相比，江汉关几乎是一个全新的系统。

众所周知，海关是监督对外贸易、管理税务的国家行政机构。但是中国近代的海关是在半殖民地社会产生和成长的，又是由外籍税务司管理的，这就决定了它和其他国家的海关具有根本不同的特点。管理包罗万象的职务内和职务外的业务是其特点之一。中国海关除了根据条约规定管理税务以外，还担负了许多和海关业务没有任何联系的近代化设施的建设和管理任务。江汉关自成立以后，其职能也在不断扩展。

在闭关自守时期，清代海关税款的征收由中央政府规定各海关每年应缴国库的

税收总额，此外多征的税款或贿赂上司，或落入海关监督和税吏们的腰包。这种落后的税款管理办法弊病丛生，既败坏了海关衙门的作风，为行贿、舞弊、敲诈打开了方便之门，又掣肘着外贸的发展。五口通商之后，沿海洋关采取新的税收管理办法，其自身费用采取提成制，每年从所征税款中按一定比例分成，留作本关关务开支，其余上缴国库。税务监督和税务司从货物入关到税款的呈纳以及后来的汇总、分流、入库整个流程各司其职，互相制约。江汉关成立后，也采用了这种管理办法。

江汉关税务设于咸丰十一年，以汉黄德道兼署监督税务。在立关之初，江汉关不征收出入的正税，行政经费由上海方面拨归，每月经费 700 两。1861 年官文曾上奏清廷，请求将汉口、九江应征之税改归汉口、九江征收，但清廷仅准其设关征收子口税和进行稽查。1862 年，官文再次上奏清廷，他说“奴才详加参核，并揆地方情形，诸多窒碍。倘一意遵行，流弊无极”，“盖其中有专为上海计，而未为三口计者，有专为洋商获益计，而不为内地税饷计者。照章办理，则长江无可立之关，无可征之税，并无可查之货”。“即如赫德所称，长江之税，不由上海代征，而归于九江、汉口自行征税，则洋船皆绕无关之处偷越，则偷漏多矣等语。查汉口、九江直抵镇江，江面数千里，虽多支港湖汊，均不能驶出外洋，该船从何绕越？若谓上海为外洋进长江总口，则置狼山、福山于不问，洋船出海入江，听其自由，岂必欲迁至上海纳税后，再进长江而至汉口？”^①

在地方大员的坚决反对之下，清政府制定了《长江通商统共章程》，规定不论在何口贸易，“均照条约及该口章程办理”。这样，经总税务司批准，自 1863 年 1 月 1 日起，所有在汉口报关的货物一律由江汉关征收关税。

同治二年（1863 年）五月，总税务司核准各关经费，以关口之大小，税务之繁简，拟定经费的多寡。当时全国各关一年税收六七百万两，经费按关税 10% 提取，应为 72.02 万两。此后，李泰国以各关经费入不敷出，走私偷漏难于稽查为由，提出各关经费依所征关税值百抽十，至多不能超过值百抽十五。按这个规定，1875 年 1 月江汉关年终税款 145 万两，每月经费从 5 000 两增到 1 万两。税款使用的分成制刺激着各关提高自己的办事效率，一个关进出货物愈多，它所获得的提成总额就会愈大，这有利于各关添置关产，改善货物存放条件，从而吸引进出口商。

在税收管理上，江汉关把税款的征收、储存、汇寄予以分割，相互牵制，同时又合为一体。“各洋关查货征税，向归税务司经理，而由监督受其成”，即由税务司负责关税的征收，海关监督执掌税款的保管。凡商人纳税时，先由商人开具报单，呈请税务司派员验货。验货毕，由税务司将已验明的报单交帮办计税，再交文书签

^① 参见陈诗启著：《中国近代海关史问题初探》，中国展望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81～82 页。

发给验单，交商人收执。商人赴银号照数纳税，由银号收税后换给收税单。商人将收税单交关换取放行单，所验之货方可放行。收税单由税务司分别汇送监督存查，彼此重复核对，不致有误。税务司所司者报单、货物收税单，而不是税银；银号所见者为验单、税银，而不是货物；监督所见者为收税单，不见货物税银，各司其事而事归一体。对于税收报告，税务司按季分送海关监督和总税务司，总税务司报请总理衙门。这种严格的税收征收和保管制度，有效地防止了税收征管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弊端。

江汉关自 1862 年 5 月起对中国民船征收出口税和船钞。所谓船钞也就是外国的吨税。1843 年 10 月订立的《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明确规定，“凡英国进口商船，应查照船牌，开明可载若干，定输税之多寡。计每吨输银五钱”，《虎门条约》还规定，“凡英国之小船，倘已逾一百五十吨者，即作大洋船论，每吨输钞五钱”。

江汉关对过境外船、洋货征收正税始于 1863 年。江汉关所征收的各项税钞银两均系尽征尽解无定额，关税收入的多少，随汉口进出口贸易总额的多少而变动。据《湖北通志》载，江汉关的税收来源主要有以下几种：

曰正税。凡洋货进口、土货出口均按税则（5%）科征，内有洋货办足值百抽五、免税之货完纳增收一项，前奉部饬提出另行列收报解。

曰半税。凡土货复进口者征之。

曰子口税。凡洋货运入内地或土货出关运内地者照税则折半（2.5%）征收，概免沿途厘金。

曰船钞。照章征收，以三成解外务部，七成解税务司。

曰三联单罚款。光绪二十九年江汉关监督与税务司议定章程，凡洋商请领三联单购运土货，倘逾限未经转运，即照该货应完出口正税银数加两倍半罚缴，每结罚款由税务局送关如数解部。

曰罚款。系各商漏税及变价充公之数。同治二年奏明按十年计算，以三成解京，以三成归监督充赏，以四成归税务司充赏。

曰洋药进口正税。计大土每箱完税三十六两，小土每箱完厘八十两。凡洋药进口、出入关栈，必须报完税厘，方准出栈，故每结收数均以土商报运之数核算。

曰红茶补厘。凡红茶出口，查验厘捐局斤票，不符者照茶税章程补征。

曰火油池捐。系洋商在汉口设立火油池按斤重捐出之款。

曰护照费。光绪三十年外务部定章，官员往来各口岸，请领护照，每张收费三两，以四成解外务部，以四成解度支部，以二成留关供支。

曰小轮船牌费。凡行驶内港小轮，赴关领牌。初次纳银十两，每年换领新

牌纳费二两，以一半解外务部，一半存关供支。

日船牌费。凡华商挂旗船均应照纳，按三成均摊，以一成归税务司，一成解部，一成归监督办公。^①

江汉关所征税款，“向按西历纪年每足三个月为一结，详请奏报征收各项税钞数目一次，年凡四结。动支款项则四结一报，仍造具四柱清册逐款开列，以昭明晰”^②。

江汉关为了保证各项税款的征收，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如关于征收子口税，江汉关规定，在大江之南鹦鹉洲设总卡一处，抽派汉阳南关委员经理；在襄河桥口以上府关设总卡一处，另派员驻扎；大江之北沙包，以本关北卡为总卡，由北卡委员书差经理。再如江汉关颁布的《平汉铁路代收江汉关关税暂行办法》规定：一切货物及包裹，不分本路联运，凡由汉口起运或达汉口者，一律由海关自行收税，平汉粤汉两路联运代收税款，以货物到达站点为标准，如由平汉路各站起运者，由粤汉路代收，如由粤汉路各站起运，由平汉路代收，每月终了15日内铁路将上月代收税款缴送江汉关税务司签收。如三路联运，代收税款须俟有关铁路拨到本路后再行转解海关。江汉关每天所收税款，一概缴入英国汇丰银行。

江汉关新的税收项目的拟定和管理措施的引入，革除了旧式海关名目繁多的关税摊派，改变了税收管理结构单一的状况，并有效地防止了敲诈勒索、营私舞弊、中饱私囊等弊端。江汉关亦由此获得了较为稳定的税收来源。据统计，自1863年至1885年，江汉关的税收总额一般都在100~200万海关两左右，1886年至1911年的大多数年份关税总额都超过200万海关两，其中1910年达到了3 216 939海关两。^③

稽查货物、制止走私是海关的另一项重要职能。1862年长江一带开埠通商后，江汉关查获3艘外轮贩运私盐3 638包。江汉关具体负责稽查的是总插子手，下面还有插子手、验货员等。总插子手和插子手都是外国人，共计19人。中国人则只能担任验货员、巡役。验货员又分成两等：第一等7人，第二等5人。巡役共有12人。根据1867年江汉关巡船巡丁章程的规定，税务司和总插子手各有巡船一艘，船漆成白色，供插子手使用的船只呈黑色，另外配有驳船5艘，每艘配备水手3~5人。所有巡船挂“江汉关巡查”字样，一等验货员戴大帽，身穿蓝羽绫马褂，配带银牌一场块，上面刻有“汉关”二字。二等验货员也戴大帽，身着前后有圆圈的号衣。水手着青呢号衣，扣子上刻有“汉关”二字。

①② 民国《湖北通志》卷50，《经政志八·榷税》，第1367页。

③ 《武汉市志·对外经济贸易志》，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1996年版，第225~226页。

为了严行稽查,1863年1月22日江汉关监督会同湖北盐法道及总办厘局在广济武穴设总卡,由江汉关专委洋人插子手、通事等带炮船、巡船稽查上下江轮船、风篷船、洋船、华艇、宁波船、夹板船及内地各种船只。这些船只如过武穴,均应赴卡报验,船只运货上江,携带的江照江单,查明货照相符立即放行,倘有不遵,盘查拒捕及插用洋旗并无各样单照,则沿途拦截,援例施罚。

从走私方式看,主要有插洋旗闯关,申报不实,以多报少,伪报货物品名价或沿途擅自起卸、夹带违禁物品等。走私的主要物品有铜钱、生铁、瓷器、土布、木料以及船员、水手、旅客夹带珍珠、高丽人参、金针、刺参、燕窝、洋杂货等。关于走私的处置,江汉关没有成文的定则,完全由税务司按事之轻重酌情论处。根据其成例,凡在进出口轮船内查获的私货,如系客商自带,为数不多,非故意瞒税者,将原物发还;如所带数量过多,或准其减价买回,或照应纳税额加一倍或两三倍罚金,发还原货;如系因舞弊行贿即将货物予以充公;若由惯带私货之人,或在某房、水手等处查获者,多予充公,其情节轻微者亦准其买回。船上账房、买办等代友人购买的零星物件则不予过问,如价值较大,又有意藏匿,进口时藏在货舱内,不载入进口舱单,除将货物充公外,偶有另罚船主500两以下之罚金。至于报验货物,有货色、价值、数量不符者,经查明系误报或假报,视情节之轻重及应纳税款之多少,处以1至3倍的罚款,最多不超过5倍。如商人对货价以多报少,经关查验不符而商人不服,则可照该商原报价,由海关买回再行拍卖。至于违禁物品,不论多少一律充公。

江汉关在稽查货物、制止走私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绩。据统计,自1877年至1902年江汉关共查获私盐7163担,1896年查获了走私出口制钱25万文。

货运管理亦是江汉关的一项重要职能。江汉关在建关初期即订有专章,规定大洋船、内江轮船,只准在大江龟山头之北,甘露寺之南停泊,离西岸在一里路之限内起载货物。其他划艇等项船只,只准在汉水南岸嘴停泊起载货物。轮船进口必须下碇于江汉关理船厅所指定的地点,在进港48小时之内,由该管领事向海关申报,办理查验征税手续,无领事者,由船主自行申报。轮船出口开往他埠,应向海关申报办理船只出口手续,俟结关后,始得开行。货物起卸、存储要在规定的时间、地点进行,申请在规定的时间内和例假日办理的,应向海关请领准单。洋商从内地运土货至汉口转运出口外洋的,须按《洋商赴内地采买土货暂行章程》办理。该章程对洋商领取切结、三联单的有效期、延期、核销,途经各卡的申报、查验、改装,以及违章处罚,均作了详细的规定。

为了便利轮船运输,在开关之初,江汉关准许船主或其代理人把收货人尚未前来提取的进口货物起岸储存,由海关监管。1868年后,发展成为一种常年保结制度,大大减少了轮船在港口停泊的时间,加速了轮船的航行次数。

此外,江汉关还包揽了港务、航道、引水、气象、邮政、检疫、管理报关行等

其他业务。兹分列如次：

港务：江汉关一建立就插手汉口港务管理，对汉口港船只停泊界限、移泊、载运军火、油类及易燃物品，船舶管理、航道保护等都有详细规定。

航道：1866年江汉关开始着手对汉口航道进行筹划，并先后在长江中下游设置灯船、浮筒、标桩。1906年在九江设巡江司，专司测量水道、设置水尺，印发航船布告、水道水量通告，检查沿江标志事宜。

引水：1869年总税务司将《引水总章》发到江汉关，将引水监督权明文划归海关。

气象：1869年11月起，江汉关开始办理气象测候工作。

邮政：1866年，清政府开办海关邮政，江汉关又开始兼理邮政业务。1878年12月江汉关创办汉口邮政分局。1897年清政府创办国家邮政，是年2月汉口成立邮政总局，但仍由海关代管，邮务长之职由江汉关外籍人员兼任。至1908年始汉口邮政才完全脱离海关。

检疫：1902年汉口对进出口货物开始检疫，由江汉关管理并制定检疫规则。

报关行管理：随着中外贸易规模的扩大，专门“为客经理货物出入，完纳关税之事物，又或为之介绍船舶，介绍仓栈以计客商之便宜”的报关行也“应时势而产生”。这些报关行必须在江汉关注册，并接受江汉关的管理。

从总体上说，江汉关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以及它在开拓武汉这个华中大商埠内边腹地、外达海洋的贡献来看，都可列入武汉近代化的先驱之列。它既是中国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也是中国从闭关走向开放的载体。

（五）汉口经贸的飞速发展

汉口开埠以后，西方各国洋行以汉口作为吸纳内地农副产品、工矿原料的中转站，临时堆栈，大批洋行争先恐后地在这里建立本行的分支机构。华中、西南、西北、华北地区丰富的工业原料、半成品也通过汉口源源不断地运往上海，然后转运各大洲；西方各国的舶来品一般下卸上海，再通过汉口输往内陆城镇和乡村。汉口实际上充当了中国对外贸易“二传手”的角色，汉口经贸由此飞速发展，并成为我国重要的进出口口岸城市，在全国对外贸易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作为一个深居内陆的口岸城市，汉口之所以能够创造外贸勃兴的奇迹，主要是由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条件促成的。从地理位置来看，汉口位于长江中游，是控扼中国东西、南北的要冲；它坐落在富庶的江汉平原，毗邻的湖南、江西、四川、安徽、河南等省盛产大米、茶叶、麦、棉花、芝麻、桐油、豆油、皮革、花生等农副产品，可资提供充足的出口货源和广阔的腹地市场。从交通条件来看，传统交通以水运为主，汉口水道之便，无他埠可比，“循大江而东可通皖、赣、

吴越诸名区以直达上海；循大江而南，可越洞庭入沅湘以通两广云贵；又西上荆宜而入三峡可通巴蜀，以上溯金沙江；至于遵汉水而西，经安陆、襄阳、郢阳诸府，纵贯全鄂以抵汉中，又沿汉水之支流白河、丹江二水以入宛洛，所谓九省之会矣^①。京汉铁路开通以后，汉口交通更显便捷，大大加强了与豫冀两省的联系，发达的交通网络使汉口外贸的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19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对外开放的格局迅速改观，镇江、九江、汉口、宜昌、沙市、重庆、岳州等城市相继开埠，长江干线成为中国重要的开放走廊并迅速发展为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商业、贸易区。汉口因居于这个开放走廊的中点，承东启西，得天独厚，很快后来居上，成为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商埠。除了优越的地理区位之外，开埠以后的汉口在商业、贸易领域方面能取得长足进步，也与汉口原有的商业发展基础有关。

开埠为汉口经贸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契机。然而在开埠之初，由于没有设立海关，武汉的对外贸易处于混乱和无序状态。洋商们乘乱而贸然闯关、浑水摸鱼，一时间外贸汹涌而入，违禁品招摇过市。

江汉关的设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既是中国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也是中国从闭关走向开放的载体。江汉关设立后，引入了沿海先进的对外贸易管理制度，使武汉获得了衡量对外贸易发展的尺度。汉口与外界的交往纳入正轨，它所蕴藏的贸易潜能逐渐得到发挥。这些管理制度规范着中外商人的商业行为，也为外商深入内地开展贸易提供了组织保证。在江汉关的主持下，长江沿江兴建了不少助航设施。1891年江汉关在武昌、黄州等地设灯塔10座。1900年在下游设灯船41处，浮筒18处，标桩6具。为了加强对航道设施的管理，1906年根据总税务司的要求，江汉关在九江设立巡江司，专司测量水道、检查沿江标志事宜，并任命奚理满为巡江事务长。航道设施的改进，使深入内港的船只越来越多，汉口在全国各开放口岸中的地位日渐重要。而税收管理的规范化以及办事效率的提高也加快了货物吐纳的进程。汉口深居内地，与处于沿海的上海、广州相比，在地理位置上无疑居劣势。从船只入港总数来看，汉口虽然与上海、广州相比有较大的差距，但其增长势头之猛却是其他口岸无法企及的。1903年在汉口注册的内港船只仅38艘，到1910年已增加到82艘。汉口开埠后，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商。

虽然江汉关对于武汉乃至湖北市场的开拓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由于失去自主权以及受到协定关税的影响，江汉关的建立未能有效地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也不能有效地抵制列强的掠夺。江汉关大权的旁落，使得江汉关更多地成为殖民主义者侵略与掠夺的工具。在征收关税、查私和检验方面，江汉关的重点放在中国商人及出口货物上，并以种种借口进行刁难、勒索。根据1858年《天津条约》

^① 《夏口县志·商务》，1920年版，第2页。

的规定,洋货进口运往内地及土货出口(限洋商承运),除缴纳值百抽五的进出口税外,可向海关再缴纳“子口半税”(2.5%)即可“遍运天下”,不再缴纳常关关税和厘金等内地税。而华商则须“逢关纳税,遇卡抽厘”。中外商人在贸易上一开始就不是处于同一个起点上。除此之外,洋人们控制之下的海关,对中国商人的进口货物检验严格,估价偏高,还常常无故刁难,动辄扣押及罚款,由于外勤人员多是欧美人,语言不通,问题更为突出。这样就造成中国商人的货物运销周期长、价格高,很难在市场上有竞争力。与此相反,外国商人的大量进口货物则享受着许多额外优待,洋商的一些进口商品往往免予征税或者允许其先行销售,后缴关税;江汉关对外商和外商的报关货物,有时不进行严格的检验,甚至听其所报。因此,以多报少,以高报低的现象普遍存在。更为严重的是,江汉关对外商的走私行为大开方便之门。建关之初,外商经常在其他商品中夹带毒品、武器、伪钞等。

汉口的对外贸易以埠际转口的间接贸易为主,这是汉口对外贸易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开埠初期,汉口进口的外国货主要从上海间接转运内地。1868~1894年的26年间,在江汉关申报的进口外国货年均4.39万关两,而包括上海等地间接运入的外国货的净进口总额年均1 091万关两;同期直接出口货值年均503.7万关两,而包括间接出口在内的出口总值年均3 534.7万关两。从汉口对外贸易占全国的比重来看,其直接进出口总值约占全国的3%左右。1900年以前,直接进出口总额徘徊在600万关两左右,1903年达到1 251万关两,之后逐步攀升。1900年以前,国货出口总额占进出口总额的80%以上,以后由于进口额剧增,而出口增长缓慢,比重发生变化。1901年出口额占进出口总额的61.8%,1904年占35.8%,出超转为入超。1870年至1886年,汉口的直接贸易额次于上海、广州,居第三位。1886年以后的大多数年份落后于天津,位居第四,只有1891年、1900年、1908年、1909年四年位居第三。

从绝对贸易量看,1867年,汉口的间接外贸额(包括经它埠转口进口的洋货、土货和经它埠转口出口的土货)达3 000万关两,而同年的直接贸易额(经江汉关直接进出口的贸易)仅为50万关两,两者相差60倍。1910年,汉口间接贸易额为1.35亿关两。同年直接贸易额增为3 700万关两。从汉口进出口额在全国所处的地位来看,汉口的间接贸易额除个别年份外,在全国外贸大埠中均高居第二,仅次于上海,同时期汉口的直接外贸额大多数年份却落居全国第四位。不仅无法与上海相比,而且经常远远落后于广州和天津。对于汉口贸易的这一结构性特点,当年的《国风报》有一篇文章颇具洞见:“上海者,为中国贸易之总汇;汉口者,为内地贸易之中枢,扬子江流域其它各港,皆不过此两地之附庸而已。”^①

从汉口的进出口商品结构来看,外国进口货物中,鸦片占有重要地位,此外,

^① 《国风报》23号,第4页。转引自《近代武汉城市史》,第122页。

还有棉织品、煤油、食糖、海味品等。出口方面，则以茶叶、牛皮、生丝、生漆、烟叶等为主。

如前所述，汉口所处的地理位置促进了汉口经贸的发展。与此同时，它又深刻地影响和制约着汉口的对外贸易。与沿海的上海、广州等口岸城市相比，汉口无论在地理位置、资金融通、港口建设、对外船运以及信息传播、风气开通等方面都处于劣势，发展直接型对外贸易受到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许多外国洋行对在汉口开拓直接贸易只能望而却步。相对于广大内地而言，汉口的经济发展水平，地理位置又明显占有上风，它具有功能巨大的吞吐优势，成为中国内陆联系沿海及至国际市场的桥梁。对此，《汉口商业月刊》称“汉口一埠用内地之枢纽……盖其不处海滨，外国航轮，无由直达，只司集中土货，运沪出口，收纳洋货，散销内地，最为相宜”^①。

在汉口的对外贸易获得巨大发展的同时，汉口的内贸也突飞猛进。辛亥革命前汉口有盐行、茶行、药材行、粮食行、棉花行、油行、什货行、纸行等八大商业行帮，下分130多个行业，商家7000户。外省在汉会馆179所，银行、钱庄、票号林立，外国洋行100多家。汉口成为华中物资集散地，也成为通江达海的外贸港。1882年一位外国商人描述汉口市场“对于外国制造的杂货，如玩具、铅笔、工具、图画、装饰品、伞、利器、假珠宝、肥皂等的需要，也不断增加，这些货物已成为一般商店的商品”^②。

总之，自开埠之后，汉口经贸飞速发展，并逐渐摆脱了内陆商品循环的狭小圈子，成为中外商货的交汇之所，崛起为清末举足轻重的贸易大港。正如日本驻汉口总领事水野幸吉当年所述：与武昌、汉阳鼎立之汉口者，贸易年额1.3亿万两，夙超天津，近凌广东，今也位于清代要港之二，将进而摩上海之垒，使观察者艳称为东方芝加哥。^③

① 《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第5辑，第27页。

②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79页。

③ [日]水野幸吉：《汉口》，第1页。转引自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0页。

八、近代汉口开放与武汉城市功能转换

武汉三镇处华中腹心，当江汉之汇，水运四通八达，很久以来就是长江中上游地区农副产品、手工业品的交换转运中心。明清汉口成为湖广漕粮交兑地及淮盐分销总岸之后，商品经济更趋发达，交换范围几乎遍及全国。不过，古代武汉商品经济虽称发达，但是由于当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全国统一市场尚未形成，从经济功能上看，还只是一个封建消费性城市和以农副产品交换转运见长的封闭性区域终端市场。近代汉口及沿江城市的对外开放，轮船、火车汽车等现代化交通工具的兴起，长江流域经济现代化的启动，打破了自然经济的封闭性，也使武汉城市的传统区位优势 and 单一的经济功能发生了重大变化。

依照《南京条约》，长江龙口城市——上海首先于 1843 年 11 月正式对外开放。由于它在与国内的往来中，地处中国绵长的南北海岸线与万里长江形成的 T 形交汇点上，买舟北上，可直达鲁冀辽东；浮海南下，可抵浙闽粤台诸省滨海名城；溯江西进，可通过长江流域各省。在与国外的联系中，由于它位于太平洋西环航线要冲，借助轮船，与亚洲及欧美各国的海上交通十分便捷。因此，上海开埠后成为倍受外国商人青睐的江海港城，贸易迅速增长，10 年后即取代广州成为全国贸易中心。继上海之后，一批沿江城市先后对外开放：60 年代镇江、九江、汉口，70 年代芜湖、宜昌，90 年代南京、沙市、岳州、重庆。如果算上允许外国起下货物的大通、安庆、湖口、武穴、陆溪口，及允许外轮搭客上下的芦泾港、天星桥、江阴、仪征、黄石港、黄州、荆河口、新堤等处，到 20 世纪前后，凡稍有商业价值的沿江城镇，几乎全部向外敞开了大门。与沿江城镇开放同步，长江轮船航线不断延伸。清末民初，在上海至重庆绵长数千里江面上，中外轮船首尾相望，络绎不绝。据统计，镇江以上长江各口按普通章程进出的中外轮船吨位，1895 年 9 843 千吨，1900 年上升为 15 746 千吨，到 1908 年，增至 33 759 千吨^①。此尚未将在长江干支流内港航线营运的地方性中小轮运业的船只包括在内。在此背景下，沿江各地的进出口贸易，越来越多地直接与上海连通起来。据 1936 年统计，长江流域 15 个通商口岸，包括温州、宁波、杭州、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九江、汉口、岳

^① 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第 356 页。

州、长沙、沙市、宜昌、万县、重庆等，全部与上海有着直接的贸易往来。其中，距上海最远的重庆，向上海进出口货值也分别占本埠进出口总值的 83.6% 和 51%。^① 沿江城镇的开放，上海经济凝聚力、辐射力的增强，和长江流域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形成，使汉口建立在封闭性区域市场基础之上的经济优势遭到削弱，华中地区农副产品总汇的垄断地位被打破。以土货交易看，19 世纪 60 年代以前，汉口是长江中上游最大的货物集散中心和终端市场，某一货物运来汉口，再由汉口返销外地城乡，就完成了它的整个流通过程。近代长江开放，上海成为全国贸易中心之后，长江流域货物“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运来汉口的一部分货物也在对国外出口的刺激下转运上海。再以洋货分销为例，1876 年以前，汉口是九江以上惟一的开放城市，同时也是惟一的洋货分销站。此后，由于宜昌、重庆等城市的开放，汉口的洋货转销地位也开始下降。如 1877 年宜昌开埠后，外国轮船公司在该地开办渝宜行，从事宜昌、重庆间的货物转运，使汉口转运的川货减少，整个贸易“繁盛亦减几成”。再如，1890 年由汉口宜昌运往四川的洋货值为 4 815 900 余海关两，次年因重庆开关，入川洋货可直接从上海运来，使汉口、宜昌两地输川洋货值下降到 2 989 500 余海关两，子口税也减少了约 60 000 海关两。^② 汉口传统地位的动摇还表现在，开埠以后，尽管贸易额不断上升，但在长江各口贸易总额中的比重却不断下降。1865 年，沿江有上海、镇江、九江、汉口 4 个对外通商口岸，其中，汉口贸易值占四口贸易总值的近 30%。到 1894 年，沿江通商口岸因陆续增辟芜湖、宜昌、重庆，总数达到 7 个，汉口在其贸易总值中的比重降为 22% 强。20 世纪前后，更因沙市、岳州、万县开埠，沿江通商口岸增加为 10 个，汉口在其贸易总额中的比重再降到 20% 以下。与此同时，上海由于贸易额不断上升，在长江流域各通商口岸贸易总额中的比重增高，1935 年达到 72%，对长江流域经济的辐射力不断扩大。到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整个长江流域都被纳入上海商业网络之中。在此过程中，汉口成为上海经济向西辐射的转播站，对上海的依赖不断加深。1936 年，汉口向上海进出口货物分别占本埠进出口货值的 59.3% 和 78.8%，贸易总额在全国与上海往来的城市中名列第一。在加强与东部的联系中，武汉由华中地区的老大变成长江流域的老二。然而，在新的经济格局中，武汉并未就此衰落下去，不但成为全国性都市，而且成为国际知名的“东方芝加哥”，城市功能也由单一转向多元。

（一）商业都会

中世纪的武汉，虽号称商业巨镇，但主要从事农副产品的交换，市场兴衰以农

① 《中国埠际贸易统计》，转见《近代上海城市研究》，第 149、151 页。

② 《江西近代贸易史资料》，第 54 页。

业丰歉为转移。汉口开埠后,外国人在这里取得了居住经商的特权。他们设立洋行,雇用买办,大力推销洋货和收购中国的土特产品,并以现代化交通工具轮船把汉口与国外资本主义市场连通起来,从而刺激了汉口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以汉口间接对外贸易值而言,据海关统计,1861年汉口开埠的后8个月中,为银9 779 909两,1865年增加到银23 245 274两,到1905年上升为111 043 046海关两。1928年是汉口间接对外贸易值最高的年份,达到311 662 254海关两。^①在全国4大贸易港口中,汉口的间接对外贸易仅次于上海,居广州、天津之前。对外贸易的持续增加,不仅促使外国人在汉口的洋行商店越开越多,1911年有洋行130多家,1923年商店达425户,同时也带动了民族新式商业的发展。据统计,汉口由中国人开办的商店,1914年为13 003个,从业人员40 454人。1929年,商店15 192个,资本额34 272 724元,从业人员70 215人。到1934年,武汉三镇有商户28 028家。其中,产生了像宋炜臣、刘歆生、刘子敬等拥资百万的富商大贾。商业贸易的发展,不仅仅表现在量的增加,而且在商品种类、经营方式、资本构成、流通渠道、市场网络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单就商品种类来说,外国涌入的大量机器产品,既有日常生活用品,也有机械及工业原料。其中每一类别所包含的具体商品更是千差万别,不胜枚举,与汉口开埠前所经营的清一色的农副产品形成强烈反差。商业贸易发展还从两方面有力地推动着武汉城市现代化的进程。对内方面,它导致了现代市政建设的出现,市区的扩大及空间结构的改变,不断刷新着武汉城市的面貌。对外方面,借助于轮船、火车和电讯设备,它沟通各省联系海外,从而使武汉成为一个立足全国面向世界的现代化商业都会。

(二) 金融 中心

伴随着商业贸易的发展变化,武汉的金融业开始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新式行业。开埠之前,汉口的金融机构,一是票号,二为钱庄。前者从事公私汇兑,不向外放款。后者从事银钱兑换和存放款业务,但资本较小,融资数量和范围都有限。开埠之后,大批量远距离的货物贸易呼唤着新式资金流通方式为其服务。1863年,英籍麦加利银行来汉租屋营业,二年后正式设立支行。以此为开端,俄、德、法、日、美等国纷纷来汉开设银行。到1922年,先后来汉的外国银行达20家。本国在汉开办的第一家银行是1897年成立的中国通商银行汉口分行。到1911年,中国籍银行发展到8家。此间,为适应新的环境,汉口钱庄在银行的影响下,也逐渐改变经营方式及服务对象,在新的金融体系中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汉口金融业的变化,不仅表现在机构、经营方式、投资对象上,而且作为流通载体的货币,形态

^① 《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一),第283~284页。

也为之一变。1893年,湖广总督张之洞鉴于“银元大小轻重均有定式,取携甚便,尤利行远,商民便之。……湖北汉口、沙市一带向来亦多行用”,^①奏准援广东成案,在武昌开铸银元。1896年,张之洞又奏准设立湖北官钱局,次年开始发行纸币。打破了银两制钱的一统天下,迈开了湖北货币现代化的步伐。20世纪前后,武汉与上海、天津、广州并称中国四大金融中心,业务量仅次于上海,银根松紧直接左右鄂、湘、赣、川数省的资金和商品流通。如1908年10月,汉口“三怡”钱庄倒闭,不仅牵累武汉钱庄、行号,工厂纷纷停业,倒账损失400多万两,而且引发了长江中游地区经济上的大地震,资金周转失灵,货物流通呆滞。另一方面,武汉金融因依恃上海调拨资金,所以汇兑市价又以上海为转移。如1924年,上海发生金融恐慌,钱庄相继歇业。连带所及,武汉金融颠覆。由于申汇催迫、市场钱价三钱破头,拆息暗盘高达一两以上。商品流通受阻,大批铺店倒闭。对此,时人总结原因说:“汉口金融市场,虽占数省之中心,而枢纽则在上海,上海一紧,则汉口之根本动摇。”^②

(三) 交通枢纽

武汉自古号称九省通衢,与各地联系主要依赖木船运输。近代汉口开埠后,交通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自1861年春美国琼记洋行“火箭”号轮船开辟沪汉航线,到抗日战争前夕,先后计有英、美、日、德、法5个国家17家洋行和轮船公司来汉经营轮船运输业,投入营运船只100多艘,总吨位15万多吨。航运利权的外溢,刺激了中国民族轮运业的兴起,1873年1月,中国第一家轮运企业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正式成立,7月首航沪汉线,并在汉口设立分局。1896年,汉口创办厚记轮船公司,以小轮两艘从事武昌至汉口过江轮渡。这是武汉地方轮运业的开端,也是长江上最早出现的轮渡。到1937年,武汉有湖北省属公私轮运公司200多家,拥有各种轮驳300多艘。外埠轮船公司来汉营运的90多家,在汉设有分支机构的有40多家。此间,从汉口为始发港的航线达50余条,通航里程5000公里,形成了东达上海、西抵重庆、北到樊城郢县、南迄常德湘潭的轮运网络。除轮运业外,就是铁路的开通。1906年4月,京汉铁路通车后,将武汉对北方货物的吸收由郑州以南扩展到豫冀两省交界地带。粤汉铁路湖北段于1907年5月开工。1917年2月武昌至蒲圻通车。1918年9月又延至长沙,通车里程370公里。1936年,几经挫折历时近30年的粤汉铁路终于全线通车。至此,由武汉乘火车,北可直抵京津,南可径达广州。汽车作为交通运输工具在社会经济中发挥作用,始于20世纪20年

^① 《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680页。

^② 《武汉银行史料》,第74页。

代。到 1936 年底,湖北省实际通车的公路有 3 400 公里,各种汽车 957 台。形成了以武汉为中心,东至武穴,西至巴东,南达湘赣,北通陕豫的公路运输网。现代化交通常与邮电通讯并提。武汉最早的有线电报始于 1884 年上海电报局的南京汉口线。次年汉口电报局成立。到 1897 年,湖北沿江 2 000 余里均有了电报线路。西北及西南山区,不久亦有电报可通。1890 年,武汉已能与全国 17 省市通报。1936 年,湖北电报线路发展到 5 000 公里,电报机增加到 100 余台。在汉口、沙市、宜昌等地并设有无线电。以上电报往返,均以武汉为总汇。武汉电话始于 1900 年汉口、武昌分别设立电话局。到 1936 年,以武汉为中枢的湖北长途电话线长 10 000 多公里,连通全省 60 余县。武汉新式邮政始于 1866 年江汉关兼理邮政业务。1872 年,汉口英国租界首设邮局。1897 年 2 月,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汉口设立邮政总局,管理湖北、湖南、河南三省邮务。到 1907 年 9 月张之洞离任时,湖北大部分地区都已通邮。1929 年 10 月,武汉与上海间民用飞机开航,到 1935 年,从武汉乘飞机可去上海、重庆、成都、西安、昆明等大城市。借助于现代化交通、通讯工具,武汉在清末已与亚洲、欧洲、美洲许多国家有了轮船电讯往来。

(四) 工业基地

1874 年前后,俄国商人在汉口创办顺丰砖茶厂,以机器压制砖茶,这是武汉最早的近代工业。以此为开端,英、德、日等国商人先后来汉开办以加工业为主的各种近代工厂。到 1911 年,外资在汉工厂达到 30 多家,总投资约 1 500 多万元。行业包括:制茶、榨油、冷冻、面粉、烟酒、冶炼、电力、机械、修理、工程建设、蛋品加工、棉花打包等。其中一些工厂,规模相当大。如俄商投资的砖茶厂,甲午战争后发展为四家,资本额数百万两,年产茶约 40 万担。另如英商和记蛋厂,创办于 20 世纪初,拥有宽敞坚固的厂房,雇工达 2 000 多人。1935 年该厂年产量达到 7 000 吨,占当时汉口蛋品产量的一半,并在平汉铁路沿线的驻马店、信阳、开封,汉水流域的安陆、沙洋、岳口、仙桃、长江埠,以及粤汉线的靖港、长沙等地,分设蛋庄达 108 个。中国自己创办的近代工业,是在洋务派官僚张之洞倡导下起步的。1889 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针对外国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为了自强自立,先后在武汉建成了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湖北丝麻四局等一批大型工厂。其中如汉阳铁厂,机器购自英国,包括 10 个分厂,招雇工人 3 000 多名,聘用外国工程技术人员 60 余人。一昼夜出铁五六十吨。在当时,它不仅是全国而且是亚洲规模最大的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技术装备与钢铁工业发达的欧洲相比,也在先进行列。其产品不仅行销国内,还出口到美国、日本及南洋群岛。如湖北枪炮厂,全套机器由德国厂商按当时最新式样设计铸造,能够生产枪弹、炮弹和新式步枪及克虏伯新型快炮。该厂有工人 1 200 多名,1895 年,月产枪 500 枝、枪弹 10 余万发、

炮弹7 000余枚,并铸造克虏伯大炮。此后,该厂生产能力还有提高。湖北枪炮厂与江南机器局、天津机器局相比,规模不相上下,在技术装备上则居领先地位。轻工业方面,湖北织布局于1893年建成投产后,雇工2 500多人,有织布机1 000张,提花机1 000张,日产棉纱100担,棉布1 800尺。湖北纺纱局1897年建成投产时,有工人1 600名,纱锭50 000枚,日产棉纱5 500公斤。以上两局,在国内纺织行业中,都是数一数二的大厂。受洋商和官府的影响,一部分商人和手工业者在甲午战争后开始投资近代工业。到清末,民办近代企业发展到100余家。其中像由宋炜臣1897年创办的燮昌火柴厂,资金42万元,拥有排梗机38部,月产火柴150箱,行销华中各省,是民族资产阶级工业中的佼佼者。20世纪以后,武汉与上海、天津鼎足而立,成为中国三大工业基地之一。30年代是武汉城市经济繁荣时期,工业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据1936年8月统计,湖北省有工厂554家,资本总额6 146万元,年产值2亿多元。在上述三项统计中,武汉均占90%左右。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从1931年“9.18”事变到1937年“3.13”上海抗战,短短6年中,东北沦陷,华北变色,上海失守,中国几大工业基地先后落入魔掌,更无形中突出了武汉的工业地位,使武汉在1938年10月沦陷前,一度成为中国工业中心。

近代武汉由一个单一的区域性农副产品市场,发展成为一座多功能的现代化城市,对华中城乡经济产生了两重作用。汉口开埠后,对外贸易要求腹地农村提供源源不断的农副产品,从而促进了农村商品经济的活跃。在湖北的一些山区:“犁锄之夫半辍业以居货为事。山林园圃之所出又与昔异。贸易者益熙攘道路间,无时休息。”19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汉口销往俄国的砖茶逐年增多,以羊楼洞为中心的鄂南茶区日趋兴旺,不仅各省商人纷纷来此设庄,连来汉俄商也前往设庄办厂,购制砖茶。当时设庄范围,东起通山,西迄临湘,南达通城,北至咸宁。方圆数百里内,舟车往返,川流不息,背负肩挑,前后踵接。在茶叶产销两旺的烘托下,僻处深山的羊楼洞小镇迅速崛起,最盛时,街道20多条,人口二三万,商店林立,市声如潮。就连该区素称闭塞的崇阳县,也是每值茶季“各处贩客云集,舟车肩挑,水陆如织”。为加工包装茶叶服务的“木工、锡工、竹工、漆工,筛茶之男工,拣茶之女工,日夜歌笑市中,声成雷、汗成雨”^①。在推动华中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武汉经济辐射力的强大在一定程度上也抑制了腹地内城镇的发展。如咸宁县,物产丰富,“俗尚商贸”,明清以来,各地城市几乎无处不有咸宁帮踪迹。晚清以后,因“县北邻武汉,轮轨畅通,人民需要各种物品,恒径赴武汉购取,故本县各

^① 同治《崇阳县志》卷4。

市镇商务，素不景气”^①。不仅如此，在东自九江，西到重庆，北起郑州，南止长沙的广阔区域内，除武汉外没有第二座大城市出现，这不能不归于武汉经济的强力辐射结果。这一历史现象启示我们，从当代整个长江流域经济发展着眼，武汉的经济振兴和特大城市功能的发挥，固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针对目前城市人口增长过速和市区机械性扩张太快的现实，武汉以后的发展，必须改变传统的大而全追求，注重在产业结构配置、市区职能划分以及整个城市功能设计上做文章。这样，既便于充分发挥武汉特大城市的功用，又利于在华中培育与武汉功能互补并能发挥各自优长的大中城市。

^① 《湖北县政概况》（一），第120页。

九、交通现代化与武汉城市经济演变

(一)

明清两代，武昌先后是湖广省和湖北省的驻地。汉阳一直是府县治所。由于中国古代城市政治、经济中心两兼，所以武汉同时也是当时湖北的经济中心。明末清初以后，汉口镇崛起，形成武汉三镇鼎立的格局。在清初文人学士的笔下，当时的汉口真是繁华已极。潘耒《咏汉口词》：“朱甍十里山光掩，画鹢千樯水道遮。北货南珍藏作窟，吴商蜀客到如家。”可谓舟船如织，货物山积，商旅如云。吴湛的诗，更把汉口形容为“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宵明”的不夜港。另一诗人查慎行的《咏汉口诗》，简直就是一幅汉口的《清明上河图》：

巨镇水陆通，弹丸压楚境。
南行控巴蜀，西去连鄢郢。
人言杂五方，商贾富兼并。
纷纷隶名藩，一一旗号整。
骈骈驴尾接，得得马蹄骋。
僇僇人摩肩，蹙蹙豚缩颈。
群鸡叫咿喔，巨犬力顽犷。
鱼虾腥就岸，药料香过岭。
黄浦包官盐，青箬笼苦茗。
东西水关固，上下楼阁延。
市声朝喧喧，烟色昼暝暝。
一气十万家，焉能辨庐井。
两江合流处，相峙足成鼎。
舟车此辐辏，翻觉城郭冷。

生动逼真的描绘，读后令人如临其境。到了鸦片战争前夕，汉口的封建商品经济发

展到鼎盛阶段，街市的繁华，风俗的奢靡，只要浏览一下范锴的《汉口丛谈》、叶调元的《汉口竹枝词》，便会留下深刻印象。

城市经济的繁荣，离不开经济腹地的支撑，而联系城市与腹地的纽带当然是交通运输。事实证明，武汉城市的发育，首先得益于畅达的水道交通。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今武汉一带江面就是楚国舟师屯泊之所。鄂君启舟节的发现，说明这里又是商船往来的通道。明清以来，武汉更以畅达的水运荣膺九省通衢美称。以武汉为始发点，顺流东下，可通皖、赣、江、浙诸各区，北转大运河可上京津，出海南下可达广州。溯江西上过沙市、宜昌，穿三峡，入四川，上驶金沙江，南向越洞庭湖接湘资沅澧四水，连通云贵两广。北走浮汉水经安陆、襄樊可入河南陕西，前往山西甘肃。至于湖北省内的水道，从清嘉庆修《汉阳县志》所述淮盐分销路线可知，更是随处可通。道路交通虽远不及水运敏捷，但起源亦很早。春秋战国时代，“千乘之国”的楚国，道路四达，连通今天的武汉地区。入清以后，武昌城成为湖北省会及湖广总督驻地，以此为中心的驿运道路四通八达，密如蛛网。由北京通往南方的几条官马大道，广东官道、桂林官道、云南官道，穿越湖北地区。其中桂林官道的北段，即由武昌北上，经孝感、广水、信阳、许昌、郑州、保定至北京，走向大体与今天的京广铁路武昌至北京段吻合。通往邻省干线，有以下几条。自汉口经安陆、随县、宜城、保康、房县竹山、竹溪入陕西安康进抵汉中，称汉中大道。由汉口取道云梦、安陆、随县、枣阳、襄阳、河南淅川，接秦楚大道到达西安，北路因从商州翻越秦岭，故称秦岭大道。由汉口出发，沿长江路，西向可抵成都，东去可达南京。从汉阳往北往西均有驿路，可通河南、湖南、四川。由武昌将台驿出发，往东往南，亦有与安徽、江西、湖南相通的驿路。如：由鄂城（时为武昌县）、黄冈、蕲水、蕲州、广济、黄梅等县入安徽宿松、太湖、潜山县可达安徽省会怀宁；沿去安徽的驿路至黄梅县南下涉江入江西德化县，再取道德安、建昌两县抵江西省会南昌；过咸宁、蒲圻经湖南临湘、巴陵、湘阴，可到湖南省城善化。

正是畅达的水陆交通，使地当江汉之汇的汉口，“五都之市震心眩目，四海九州之物，不踵而走，殊形异物，来自远方者，旁溢露积”，“繁盛极矣”^①。

近代以前的武汉城市虽有了长足发展，但它只是作为华中地区农副产品集散地或全国性商品流通市场而擅盛名，经济功能是单一的。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之一便是运输工具及管理方式的原始落后，束缚了它的手脚。因为以帆船牛车为标志的传统交通运输，是建立在封建商品经济之上并与之相适应的，它要走完中世纪的崎岖小路，迈向现代化的康庄大道，还有待于武汉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的转换。

① 《章学诚遗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248页。

(二)

1861年,汉口被迫辟为对外开放通商口岸。外国轮船的往来,改变了长江孤帆远影的古典景观,催生了湖北交通运输现代化的新芽。1861年春美国琼记洋行“火箭”号轮船开辟沪汉航线。同年下半年,美国旗昌洋行以“惊异”号轮船投入沪汉线运营。当时,由于太平天国与清廷血战方酣,长江民船航运基本停顿。外国轮船凭籍体坚航速及炮火掩护,往来长江,乘机赚取超额利润。据说上海至汉口货物,每吨运费索银二十五两,客票每位七十五两,加上下水拖带帆船的收入,外国轮船两趟水即可收回全部成本。随后,旗昌又增添轮船投入运营。在1867~1872年的5年间,旗昌共获利润338万两,相当于该公司原有资本总额的2.7倍。旗昌所获惊人利润,使其他外国公司馋涎欲滴,争先恐后来汉开办航运业。英商宝顺洋行、怡和洋行,德商美最时洋行接踵而至。在激烈的同业竞争中,旗昌依靠中国买办的大力帮助,以降价手段笼络货主,争夺货源,挤走了怡和、琼记,收并了宝顺的船产,独占长江航运。此后在外资与外资、中国与外国的竞争中,各家公司虽时有胜败,但总的趋势是,航行于长江的外国轮船越来越多。到抗日战争前夕,先后计有英、美、日、德、法5个国家17家洋行和轮船公司来汉经营轮船运输业,投入运营船只达100多艘,总吨位15万多吨。

航运利权的外溢,刺激了中国民族轮运业的兴起。1873年1月由李鸿章创办的中国第一家轮船企业——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正式成立,7月首航沪汉线,并在汉口设立分局。该局凭藉清政府给予的优惠条件,成为外资轮船公司的竞争对手,并在19世纪70年代一度挤垮称霸长江的旗昌公司,只是随后又遭英商太古、怡和轮船公司的排挤,渐处劣势。1896年,湖北商人在汉口创办厚记轮船公司,以小轮两艘从事武昌至汉口间过江轮渡,这是武汉地方轮运业的开端,也是长江上最早出现的轮渡。1897年7月,湖南绅士王先谦和湖北绅士吴锦章创办两湖轮船局,分南北两局,北局设汉口,南局设长沙。该局拥有资本10万两,轮船4艘。次年4月开航。北局以楚宝、楚威两船,南局以湘泰、湘庆两船定期对驶汉湘线上。1899年12月,汉川人吴心九在汉口设立泰安公司,资本3000两,以安泰、安济两只小蒸汽船航行于汉口至仙桃镇之间,运送旅客。同年,汉口人姚冠卿开办春和公司,资本2000两,以紫云、飞云两只小蒸汽船投入运营。泰安、春和公司的开办,开国人轮船航行汉水之先河。到辛亥革命前夕,民族资本在汉口经营轮船航运业的公司计18家,有小轮70艘左右。民国成立以后,在创办实业的热潮中,武汉民族航运业发展很快。1913年,在汉口附近运营的轮船公司有11家,共有小轮船37艘,航线主要有汉口至武昌、仙桃镇、武穴、咸宁等4条。1930年左右,武汉拥有轮渡及内河运营的小型轮船100多艘,内河航线延长到7000多公里。到1937年底,

武汉地方航业公司发展为 222 家,拥有各种轮船 913 艘。除本地航业公司外,外埠中国轮船公司来汉营业的也不少,到抗战爆发时,计有 90 多家。在汉设有分支机构的达 44 家。此间,以汉口为始发港的航线多达 50 余条,通航里程 5 000 公里。形成了东达上海,西抵重庆,北到樊城、郢县,南迄常德、湘潭的轮船运输网络。

交通运输现代化,除轮运业兴起外,就是铁路的修筑。1893 年初,大冶矿山铁路竣工,该路从铁山到石灰窑码头,全长约 50 里,是湖北最早的铁路。大冶矿所产铁砂,先通过该路运至石灰窑码头,再装船溯江运来汉阳铁厂。随后该路还兼营客货。1906 年 4 月,京汉铁路通车,该路全长 1 200 多公里,在湖北境内设有车站 20 个,其中如汉口北郊的玉带门、大智门、江岸,以及鄂北的孝感、广水,均称大站。1907 年 5 月,粤汉铁路湖北段开工。1917 年 2 月,武昌至蒲圻通车,1918 年 9 月,又延至长沙。通车路程共达 370 公里。1936 年,几经挫折历时近 30 年的粤汉铁路终于全线通车。至此,由武汉乘火车,北可直抵京津,南可径达广州。

交通运输现代化的另一重要内容,是新式公路的修通和汽车运输的发展。自 1909 年武汉富豪刘子敬等人购置私人汽车,到 1912 年,武汉约有汽车 20 辆。1916 年,汉口开始出现出租汽车商行。1930 年,车行增为 49 家,汽车 130 辆,到 1931 年夏汉口大水前夕,车行又发展为 54 家。不过,当时除了汉口邮局从 1919 年以自备汽车运送邮件外,其他为社会服务者均系出租汽车。因租金昂贵,汽车多用作官僚富商家宴游之具。汽车作为现代交通运输工具在社会经济中发挥作用,始于湖北商营长途汽车公司的创办。1923 年 11 月,商营襄沙长途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开始修筑襄(阳)沙(市)公路,并于次年 4 月竣工通车。以此肇端,襄花(老河口至花园)、武豹(武昌至豹子獬)等长途汽车公司先后成立。到 1935 年,湖北先后开办了 14 家商营长途汽车公司。1935 年 7 月,湖北建设厅为加强公路运输管理,将此前为接管商营汽车公司而分设的四局一处,即襄沙路、襄花路、汉宜路、鄂东路四个管理局,及省会公共汽车管理处,合并为湖北省公路管理局,统一管理全省公路客货运输。到 1936 年底,全省共有公路 4 000 公里,实际通车的约有 3 400 公里^①,各种汽车 957 台,形成了以武汉为中心,东至武穴,西至巴东,南达湘赣,北通陕西的公路运输网。1938 年 9 月,湖北境内干支公路达到 4 500 公里,其中包括汴粤、京川、洛韶三条七省联络干线。汴粤线自武昌北通开封,南达南雄。京川线由汉口过宜昌,经巴东、建始、恩施至利川,北接陕京干线,东入合肥。沿洛韶线,北上洛阳,南下韶关。汽车运输发展成为湖北武汉现代化运输中的骨干力量。

^① 《湖北省建设厅交通类档案》,1940 年 6 月。转见《湖北近代农村副业资料选辑》第 260 页。

广义的现代化交通还应包括邮电通讯。武汉最早的有线电报始于 1884 年上海电报局敷设的南京汉口线。次年,汉口电报局成立。此后,凡电线所到之处,均设电报局经理业务。1886 年汉口至武昌渡江电线接通,随后又敷设了汉口至沙市、宜昌线。1890 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为了鄂北治安、商务及汉水防洪预报,将汉口沙市线延长到襄阳。1893 年,沙市电报局将电线由荆门州接到钟祥。到 1897 年,湖北沿江 2 000 余里均敷设了电报线路。西北及西南山区,随后亦有电报可通。与省外的电报联系,除前述汉口南京线连通上海外,到 1890 年,已与 17 省市通报。1897 年,敷设武昌长沙线,1907 年又接通四川、云南。至此,形成沪汉、京汉、川汉、粤汉、湘汉五条主干线。1915 年全省有电报局 46 处,干线 2 731 公里,连同支线全长 3 690 公里。到 1936 年,电报线路发展到 5 000 公里,电报机增加到 100 余台。在汉口、宜昌、沙市等地还设有无线电台。以上电报往返,均以武汉为总汇。武汉电话始于 1900 年汉口、武昌分别设立电话官局。1902 年二局改归商办。1907 年,汉口与武昌间的电话线路已由一对增至七对。到 1936 年,湖北长途电话线长 1 万余公里,连通 60 余县。武汉市电话线,与沙市、宜昌一起共计 3 万多公里。关于新式邮政的创办。1866 年清廷开办海关邮政,江汉关开始兼理邮政业务。1872 年,英国驻汉领事在英租界首设邮局。到 1891 年,在其管辖的湖北、江西、湖南、陕西、河南等地设支局 27 处。外人在中国开办邮局的行动,引起洋务派官僚张之洞的关注。他在奏准于沿江沿海各省遍设邮局之后,率先于 1897 年 2 月设立汉口邮政总局,管理湖北、湖南、河南三省邮务。同年 7 月,又在沿江城镇武昌、沙市、宜昌、武穴设立二等支局。到 1907 年 9 月张之洞离鄂时,全省大部分地区都已通邮。在清末的基础之上,民国以后湖北邮政继续发展。到 1917 年,全省邮局除总局一处外,已有一等局 52 处,三等局 15 处,代办所 307 处,邮政网络遍及全省各地。其中邮政最为发达的汉口,邮政支局、所,1920 年达到 134 处。邮政服务项目,最初只有普通邮件、挂号邮件及小件包裹,从 1898 年 1 月起,开始在武汉三镇办理汇兑业务。当时邮政业务相当兴旺。1908 年,仅汉口一地,就投递信件 50 多万件,其他邮件 84 672 件,合计达 58 万多件。1911 年 10 月武昌首义,汉口被南下清军焚烧惨重,几成瓦砾之区。但汉口邮局在这年的邮件仍达 1 850 万件!较前四年增加 34 倍。1912 年,汉口尽管创伤未复,但邮局前 10 个月内就收发邮件 2 400 万件。此外,由邮局投递的报刊,也由原来的 6 种增为 16 种。邮送的印刷品达到 450 万件^①。1936 年,湖北以武汉为中心,邮路扩展到 2 万多公里,邮件每年达 3 000 多万件。1929 年 9 月,武汉开办民用飞机航班,乘飞机从这里可往上海、重庆、成都、昆明等地。

^① 苏云峰:《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 1860~1916·湖北省》,台湾近代史研究所 1981 年版,第 452 页。

交通运输的现代化导致了武汉城市经济一系列变化。

第一是商路的改变。上海未开放以前,长江不通轮船,木帆船往来长江,风吹浪打,艰险备尝。武汉少量土特产品出洋,或是南下广州,或是北往恰克图。南行路线,一是由洞庭湖入湘江,过灵渠转入广东。一是东下长江,至江西湖口转入鄱阳湖,再溯赣江南下,越大庾岭前往广州。北上路线是晋商贩茶入俄所走路线。19世纪60年代以前,晋商贩茶前往俄国,先由汉口溯汉水北至樊城,再畜驮车运到西安府。于至东西二路,西路经甘肃新疆进入俄境;东路过山西经张家口前往恰克图。长江轮运业务的兴起和京汉铁路的开通,彻底改变了汉口商品的来源去向。以南路来说,上海开埠后中国对外贸易大港逐渐由广州移到上海。汉口出口货物弃远就近,东运沪上。汉口开放后,外轮长驱直入汉口港装卸货物,从而改变了汉口货物南下广州的局面。以湖北红茶出口为例“1861年,红茶从广州港出口为247 014担,而汉口港仅出口8 000担。1862年,红茶从汉口港装船出口外洋为216 351担,同时广州港降为199 919担。1863年,从汉口港输出为272 922担,而从广州输出减为133 328担”^①。汉口港与广州港的出口量适成反比。再以北路为例,1861年俄国茶商来到汉口后,由于使用轮船,运货走江海水路。即先由汉口东出上海,至上海后,或直接海运至海参崴,或北上天津,溯白河而至通州。再改用骆驼翻山越岭,横穿八百里戈壁沙漠,经张家口前往恰克图。此间,在羊楼洞设庄的山西茶商,在继续利用汉水路线的同时,也走长江一路。他们扬帆东下,至镇江北转京杭运河,抵通州起旱路,用畜力驮运过张家口而达恰克图。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为华茶输入欧俄带来极大便利。19世纪90年代,俄国义勇舰队加入商运行列,开设了汉口与俄国敖得萨港之间的定期航班。每届茶季,俄国运茶轮船前后踵接,相望于途。1896年,由汉口直接运往敖得萨的茶达124 566担。到1902年,增加到126 889担,价值银1 942 588两^②。随着轮船海运的扩大,中国西伯利亚铁路及中国京汉京绥铁路通车,汉水输俄商路日见萎缩,终于成为历史陈迹。汉口商路,到1936年,形成以下五大干线:东干线以长江沟通皖、赣、江、浙各地,南干线分为三支线,一泛洞庭湖出湘江前往长沙、衡阳、桂林,二溯沅江通镇远、贵阳,三藉粤汉铁路南驶广州。西干线分二支线,一是沿长江西进,经万县、重庆,通成都、打箭炉、察木多、拉萨,二是由重庆取道叙州进入云南大理、腾越。北干线沿京汉铁路走周家口、开封、洛阳、郑州、道口、清化、北京、天津,旁通潞安、太原、临清。西北干线分四支线,一遵汉水通往樊城、老河口、汉中。二循唐河至赊旗、唐市。三浮丹江过紫荆关、龙驹寨进抵西安。四由西安前往兰州、迪

① 《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一),第253页。

② 《国民日报汇编》第二集,《汉口茶》。

化、宁夏、蒙古^①。

第二是腹地城镇的兴衰。湖北襄阳，濒临汉水，又当南北交通要道，汉唐以来，一直是鄂北军事重镇和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商务素称发达”。京汉、陇海铁路通车后，陕南货物改走陇海线，豫南、鄂北物产改赴京汉线，水陆交通优势皆失，市面零落，“商业远不如前”^②。再如安陆县，清代为德安府驻地，所产府布经山陕布号庄客之手行销陕、甘、新三省，为出口商品大宗。每年出口货值银一二百万两。铁路未通以前，府布运往西北，一走南阳至洛阳、潼关旱路，一从老河口入汉水前往汉中。自京汉铁路通车后，运输改道，安陆县府布由花园车站起运郑州，再转陇海铁路运往陕西。于是，铁路沿线的孝感、云梦、汉口等处，成为布号庄客驻地，安陆府布生意顿减。与襄阳、安陆的衰落恰成对照的是武穴。武穴镇明代称青林埠，当时只是一个渔村渡口，仅有几家供往来行人歇脚的茅屋客舍，清乾隆年间市场粗具规模，贸易以食盐、谷米为主。近代长江对外开放后，武穴被辟为中外轮船停靠点，外国洋行日见增多，他省商人接踵而来。加上清政府将其规定为鄂东淮盐分销口岸，因而商务日盛，声誉鹊起。清末民初，武穴已成为鄂东经济中心，沟通鄂、皖、赣三省毗连地区十多个县的商品交流。后因抗日战争爆发，长江航道梗塞，商旅断绝，武穴市场惨落，从此一蹶不振。沙市经济的几番涨落，更能体现现代交通对它的深刻影响。沙市古名沙头、沙津或江津，历史上曾是长江中游两湖平原水运巨港。“明末极盛，百货充仞，万航鳞集”，“舟车辐辏，繁盛甲宇内”^③。清代以后，汉口的崛起使之相形逊色。1876年4月，宜昌开埠，商务骤兴，更使它处于东西夹缝中，举步维艰。1895年，沙市被正式辟为开放口岸后，因擅长江轮船之利，又仆而复起，跻身沿江大港之列。

第三是经济腹地的伸缩。交通运输的现代化大大缩短了武汉与外地的空间距离，加快了货物流通、资金周转及商务信息传递的速度。如汉口茶运往俄国，原来驼队由天津到恰克图，费时16个月，后改铁路运往俄国，7个星期已足，节省时间近10倍。再如汉口与日本的往来，在日籍大阪商公司1905年5月开通汉口与神户、大阪直航后，也比原来由上海转船便捷了许多。至于铁路通车，作用更为明显。如京汉铁路通车以前，汉口对河南货物的吸纳，仅限于郑州以南地区，但是，“从来天津商圈之内奄有河南北部者，铁道完成以后，忽自入于汉口之商圈”^④。货物来源的扩大，意味着商品流通量的增加。1906年到1910年，汉口贸易总值逐年上升，从1.22亿余万关两增加为1.69亿多万关两。1911年出版的《最近汉口工

① 《全国商埠考察记》。

② 《湖北县政概况》（四），第1099页。

③ 刘献廷：《广阳杂记》卷4，中华书局1957年版。

④ [日]水野幸吉：《汉口》，第90页。

商业一斑》，指出，“观近年汉口贸易额增进之数，较前几年大一倍，伟然占全国通商口岸之第二位，皆此铁路之力”。其中原因是“适值京汉铁路初通，生产之圈限，以倍数增加，故贸易额亦以倍数进”。新式邮电的开办，比旧式的驿递或信行不知要快多少倍。以电报为例，1911年夏，从欧洲经北京到汉口的电报，27%可在2小时内到达，38%可在3小时内到达，仅有3%需要5小时。从日本到汉口的电报更为迅速，29%在1小时内送达，28%需要2小时，22%需要3小时^①。立体化的现代交通，不仅使武汉九省通衢的优势得到进一步发挥，成为整个长江流域的货物集散地，而且，由于在地理上得“中”独厚，与其他几个大城市形成的中心市场距离大致相等，在相同的运输半径内，与周围几省省会城市相比，武汉可以获得更多的消费市场和物产基地。如以武汉为圆心，500公里为半径，武汉可以涵盖长沙、九江、南昌、安庆、南京、开封、郑州、洛阳。以750公里为半径，它可以包容福州、杭州、苏州、上海、济南、西安、重庆等。在相同半径内，联系这么多经济发达的大中城市，这对包括上海、北京在内的其他大城市来说，是难以做到的。因此，清末时期的汉口市场被日本人称为“清代十八省四百余州之中心点”。下面，让我们以汉口市场集散量最大的几种物产的来源销路，来观察一下武汉经济的辐射范围。

1. 盐。封建社会厉行食盐官卖，清代汉口被指定为湖北、湖南两省淮纲运销总岸。当时由江苏仪征捆载出口的大量淮盐，溯江西上，先集于汉口，然后发卖湖北、湖南各府州县。每年分发两湖引额77万多引。侨寓汉口的丹徒商人包云舫，皖江商人姚小山，均以业鹺致富，家财万金。因运输需要量大，武汉沿江两岸，盐船屯蚁聚，千百成群，使诗人发出“通津十里住盐艘，怪底河中水不流”的咏叹！^②

2. 茶。汉口处华中茶区腹心，每年集散鄂湘皖赣川陕等省茶，均在几十万担以上。茶叶出口在19世纪80年代后赶超上海、福州，年平均约占全国茶叶出口的近60%，成为近代中国著名茶市。汉口茶市以两湖所产“汉口茶”最多，约占总量70%，安徽祁门、江西宁州所产“九江茶”次之，约占总量的25%左右。汉口开埠后，外国商人竞相来汉购茶，英俄两国成为最大买主^③。

3. 棉。汉口是湖北、湖南、河南、陕西等几省棉花市场总汇，20世纪20年代后替代茶叶成为汉口市场农产品第一出口大宗，盛时每年贸易额约在200万担之多。除去汉口本地市民及纱厂销纳七八十万担外，余皆销往上海、广州、青岛

① 苏云峰：《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 1860~1916·湖北省》，台湾近代史研究所1981年版，第446页。

② 参见张笃勤：《明清武汉的淮盐市场与城市经济》，《盐业史研究》1999年第2期。

③ 参见张笃勤：《近代汉口茶叶对外贸易》，《武汉城市发展轨迹》论文集。

等地。

4. 竹木。武汉竹木市场起源很早，明代中期已具规模，清代发展到极盛。竹木码头三镇皆有，其中以汉阳鹦鹉洲最大。洲上居民上万人，设行数百家。汉阳滨江一带，码头林立，竹木成山，逶迤不绝者达 20 余里。因此，清人姚鼎有“巨木如山写蜀材”的描绘。武汉竹木，主要产自湖北、湖南、四川、贵州，水道运来，销往长江下游一带。京汉铁路通车后，一部分装火车运销华北地区。

在交通运输现代化的过程中，武汉的经济吸聚力和辐射力虽然有了很大增强，但就其经济腹地及物产来源说，也不是一味的获得，而是有得有失。例如，随着陇海铁路的部分通车并不断延长，原由郑州沿京汉铁路南运汉口的货物，大部分沿陇海路东出连云港。上海与重庆轮船直航后，原来运汉的川、滇货物，却往往经而不驻，直接东运上海。上海运往内地的商品，有的也不再在汉口分销，而直接运往内地。粤汉铁路开通后，给武汉交通带来更大便利，香港、广东、广西的货物可直发武昌。与此同时，因湖南货物可沿粤汉路南下，倒使汉口流失一大货源。再加上轮船运输上，湘江冬季枯水时节，江轮稍大者不能出入，长江黄石港水运加价，更促使湖南货物弃北就南。于此，使我联想到，清末民初以后，汉口贸易虽有发展，并呈上升趋势，但它在全国贸易中所占比重及在全国四大港口中的地位却不断下降，这表明，随着交通工具的更新，运输网络的发达，货物流通渠道的分散，武汉的传统区位优势逐渐减弱。它作为一个内陆港口城市，只能主要承担国内商品流通的任务，在国际贸易上难以与广州、上海、天津等沿海城市争锋。假如这一看法没错，那么，近年来在探讨扩大武汉对外贸易中，有人以汉口近代贸易曾居全国第二的史实，提出把武汉建成全国一流贸易大港的主张，便值得推敲。依我看来，在交通运输高度发达，货物分流趋向日益明显的今天，历史上形成的交通运输格局早已彻底改观，武汉要想在贸易发展上重温旧梦，已不可能。要制定一个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的武汉贸易发展战略规划，必须在正确总结历史经验的前提下，依据当代新的实际情况进行周详论证。

（三）

交通运输的现代化过程，同时也是武汉城市的现代化过程。这不仅因为，从总体说，现代化交通运输是现代化城市赖以运作的动脉，所谓武汉城市的现代化本身就包含交通运输的现代化。而且，就分开看，交通运输现代化的程度高低又直接影响武汉城市现代化的节拍快慢。二者可以说是休戚与共的。随着交通运输的现代化和新式工商企业的创办，武汉由一个传统的中国内陆商业都会逐渐转变为具有现代化工商、金融、交通中心的多功能国际名埠，经济凝聚力和辐射力大大增强。

交通运输现代化及武汉城市功能转换，对湖北及华中地区产生了深刻影响。首

先,沿江地区经济中心开始移向条件优越的港口城市,与原来的政治中心分离。如黄州府治在黄冈,经济中心在武穴。湖北省会在武昌,经济中心在汉口。荆州府治在江陵,经济中心在沙市。惟有宜昌是个例外,它因地理所限,港城一体,既是鄂西重镇,又是峡江咽喉,得以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两兼。这一貌似细微的变化,实际蕴含着重要意义,它暗示着这些新兴的港口城市在性质及功能上均已与原来的城市大不相同,中国封建城市政治经济中心重合的传统模式已被打破。其次,加速了腹地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和农副产品的商品化。汉口开埠后,对外贸易日见扩大,要求腹地农村提供源源不断的农副产品。这不但提高了原有农副产品的商品化程度,而且刺激了商品化农作物品种的增加和种植面积的扩大,从而促进了农副产品经济的活跃。这种变化,即使在湖北的一些山区也有明显反映。19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汉口销往俄国的砖茶逐年增多,以羊楼洞为中心的鄂南茶区日趋兴旺,不仅各省商人纷纷来此设庄,连来汉俄商也前往设庄办厂,购制砖茶。当时设庄范围,东起通山,西迄临湘,南达通城,北至咸宁,方圆数百里内,舟车往返,川流不息,背负肩挑,前后踵接。在茶叶产销两旺的烘托下,僻处深山的羊楼洞小镇迅速崛起,最盛时,街道20多条,人口二三万,商店林立,市面繁华。就连该区内素称闭塞的崇阳县也是每值茶季“各处贩客云集,舟车肩挑,水陆如织”。为加工包装茶叶服务的“木工、锡工、竹工、漆工,筛茶之男工,拣茶之女工,日夜歌笑市中,声成雷、汗成雨”^①。农村出现的这种现象,必然瓦解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

从以上两点可以看出,建立在交通运输现代化基础上的近代武汉,对湖北城镇现代化及农村城市化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武汉城市凝聚力和辐射力的格外强大,又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腹地内城镇的发展。例如,在武汉周围虽有的地方因为特殊的机遇新兴了一些市镇,但同时原有的规模较大、声誉较高的市镇,像灵泉市、金口镇、刘家隔港等却先后衰落,甚至销声匿迹。即使在距离稍远的鄂南地区,武汉强大的吸引力也使其商务江河日下。如咸宁县,本来“俗尚商贾”,人多经商,明清以来的各地城市,几乎无处不有咸宁帮踪迹。该地物产丰富,晚清以后,交通十分发达,具有发展商业的潜力。但因“县北邻武汉,轮轨畅通,人民需要各种物品,恒逕赴武汉购取,故本县各市镇商务,素不景气”^②。不仅如此,在东自九江,西到重庆,北起郑州,南至长沙的武汉经济腹地内,没有大城市出现。在武汉经济辐射力最强的由武汉、荆沙、襄樊构成的三角区内,除一些较大的市镇外,连一座商业城市也没有。这不能不是武汉经济辐射力作用的结果。这一历史现象启示我们,倘从整个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着眼,在经过近年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武汉市区不断扩展,特大城市功能逐步得到发挥的今天,有必要适当控制

① 同治《崇阳县志》卷4。

② 《湖北县政概况》(一),第120页。

武汉城市人口的增长及城区的扩大，尤其是在企业结构配置、城市功能的设计上，要有明确的职能分工观念，改变传统的大而全追求，以利于在武汉外围培育既与武汉经济功能互补，又能各自发挥本身优势的大中城市。

交通运输现代化及武汉城市现代化，既预示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也符合世界现代化潮流，其进步意义是应该肯定的。只是，由于这一转化过程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是在近代外国武力屈服中国，强迫中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背景下进行的，所以就不能不使它涂上某种悲剧色彩。与外国往来的过程，同时就是中国利权外溢、西方势力控制中国政治经济命脉的过程。列强的军舰、租界及其对中国海关的控制，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外国的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使武汉所在的华中地区沦为世界各国廉价的原料市场和劳动力市场。所以，它给这一地区开创一线生机的同时，也给这里的人民带来了刻骨铭心的民族屈辱。这一沉痛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面对当代变幻莫测的国际风云，中国在对外开放中，坚持政治经济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多么重要。

十、张之洞与武汉近代化

19 世纪 60 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从器物层面开始了中国近代化的实际进程。作为洋务运动的“殿军”，1889 年至 1907 年，张之洞以其在湖北武汉地区的一系列建树，掀起了这一运动后期的一个高潮。^①就武汉的城市发展史来说，张之洞这一阶段的诸多作为，不仅奠定了其在华中乃至在全国近代化格局中的重要地位，而且为武汉日后的发展，规划了基本的框架。其深远影响，直到今天，依然存在。就此而论，“张之洞与武汉近代化”的课题，就不仅仅具有访古寻踪的意义，从中可能发掘出的更宝贵的历史遗产，对于当下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也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一）

清光绪十五年（1889 年）七月十二日，张之洞调补湖广总督。十一月二十五日，他抵达武昌，次日接篆视事。自此时起，直至 1907 年 9 月晋京入参军机，18 年间，除 1894 年、1902 年两度暂署两江外，张之洞一直总督湖广，驻节武昌。这在封疆大吏调动频仍的清代堪称罕见。这时的张氏，正值 50 至 70 岁之间，是成熟而又精力尚充沛的时段。他以湖北武汉为经邦济世、推行“新政”的舞台，开拓进取，励精图治，在近代化建设方面，取得了相当的实绩。当年张之洞为黄鹤楼草拟了一副楹联：

昔贤整顿乾坤，缔造先从江汉起；
今日交通文轨，登临不觉欧亚遥。

其开放的眼光、宏阔的抱负，正是近代化先驱人物的心声坦露。

梳理张之洞在武汉地区的近代化建设业绩，大略有如下诸端：

^① 学术界一般认为，1894 年的甲午战败即为洋务运动的终结。笔者却以为，张之洞 19 世纪 90 年代直至 20 世纪初年在湖北武汉的运作，不仅仍是这一运动的延续，而且是其相当精彩的篇章。这涉及到对洋务运动的总体认识问题，此处无法展开，容另文专述。

1. 近代机器工业的创始

督鄂伊始，张之洞便倾全力于近代机器工业的兴办。他排除万难，百折不回，终于在武汉建立起包括冶金、矿业、军工、纺织等行业的门类比较齐全的近代大工业体系。尽管其经营状况多不尽人意，但它毕竟打破了传统小生产方式的一统天下，奠定了民族近代工业的根基。

(1) 亚洲第一家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汉阳炼铁厂

还在总督两广期间，张之洞就已经开始谋划创办近代钢铁工业，筹集款项，向外商订购设备。正在进行之中，奉调至鄂。接任者李翰章为一守旧官僚，无意续办张之洞未竟之业。其弟李鸿章知道此事艰难重重，更是怀着“黄鹤楼上看翻船”的阴暗心理，力主其兄将这一烫手的山芋推给张之洞带到湖北，并称张之洞“抑扬铺张，欲结郢欢。即准拨款，恐难交卷，终要泻底。枢廷皆知其大言无实也”^①。

不管别人如何算计，张之洞坚定不移地实施自己的计划。1890年4月，海军衙门正式允准铁厂移鄂。5月，张之洞设立铁政局，委派“器端识远，心细才长，熟悉洋情”的湖北补用道蔡锡勇为总办，主持其事。

创业伊始，举步维艰。厂址的选定便颇费周折。按照惯例，大型钢铁企业的选址，或近煤矿，或近铁矿。而张之洞从方便督察及产品运销着眼，决定煤铁两不就，令于省城武昌附近择址而建。几经斟酌，张之洞决定在汉阳大别山（即龟山）麓建厂。在给海军衙门的电报中，他报告：

今择得汉阳大别山下有地一区，长六百丈，广百丈，宽绰有余，南枕山，北滨江，面临大江，运载极便，气局宏阔，亦无庐墓，与省城对岸，可以时常亲往督察，又近汉口，将来运销钢铁货亦便，惟须填筑地基九尺，则盛涨不淹，沿汉亦须增堤数尺耳，筑地虽贵，较之他处筑闸开河，所省尚多。^②

经费问题，也令人头痛。由于经验不足，张之洞原以为200万银两便可成事。海军衙门曾应允从铁路款项下支拨此数，但始终是一张空头支票，从未兑现。而实际建厂费用又远远超出200万银两之数。无奈之下，张之洞只得左右腾挪，四处借贷，甚至截留应缴部分款项，以敷急用。从以下奏折，可见其窘迫之状：

臣夙夜焦急，再四筹思，惟有向广东借拨之一法……铁厂本系由粤移鄂，武昌四成报效及银元余款又系臣在粤创办之举，每岁增常款数十万金，今为铁

① 《李文忠公全书》电稿12，光绪十六年正月初四日，致李翰章。

② 《张文襄公全集》卷235，电牍14，致海署。

厂仅借用五十万两，开炼钢铁，筹备军实，当务之急，无逾于此。李翰章公忠体国，轸念时艰，必能设法腾挪，迅速拨解济用，助成自强要举。^①

汉阳炼铁厂从创办到 1896 年交商承办，共耗银 568 万两，是晚清洋务企业中耗资最多的。其间铢集寸累的艰辛，并非人人都能理解。1893 年，就有人参劾张之洞，“乞留巨款，轻信人言，浪掷正供”。此参劾虽经两江总督刘坤一据实驳回，但张之洞对于讹传非议的愤愤之情，实难平复：

至于工作之繁重，外洋购料之周折，分设各厂之辽阔，华匠学制之艰难，亦皆凿凿有据之事，从来身居局外者既非身习其事，又未目击其难，往往以道路传闻之语悬揣苛求。凡有关西法时务之举，或则墨守旧法，以为不必办；或则言之甚易，视为不烦巨款而办，不需多日而成。此乃风气未开之故，亦无足深辩。^②

1891 年元月，汉阳炼铁厂正式破土动工。两年以后，所属炼生铁厂、炼贝色麻钢厂、炼熟铁厂、炼西门士钢厂、造铁货厂、造钢轨厂、鱼片钩钉厂陆续告竣。1894 年六月，高炉开炼，张之洞亲临铁厂视察一周。

汉阳炼铁厂的建成投产，比日本第一家近代钢铁联合企业八幡制铁所早 7 年。当时日本人的报道称其为“二十世纪中国之雄厂”，美国驻汉口领事称：“这企业是迄今日为止，中国以制造武器、钢轨、机器为目的的最进步的运动，因为这个工厂是完善无疵的，而且规模宏大，所以就是走马观花地参观一下，也要几个钟头。”^③《东方杂志》刊载西方人士的评论：

汉阳铁厂之崛起于中国，大有振衣千仞一览众山之势，证诸领事之报告，吾人预知其不可量矣。……呜呼！中国醒矣，此种种费祸，较之强兵劲旅，蹂躏老羸之军队尤可虑也。^④

（2）晚清先进的大型军工企业——湖北枪炮厂

近代军工企业是洋务运动的投资重点。中法之战中，张之洞亲身体验到购枪炮于西洋，处处受制于人的滋味，更坚定了“详筹时势，必须设厂自筹枪炮，方免受

① 《张文襄公全集》卷 35，奏议 35，《铁厂拟开两炉请饬广东借拨经费折》。

② 《张文襄公全集》卷 39，奏议 39，《查复煤铁枪炮各节并通盘筹画折》。

③ 中国史学会编：《洋务运动》第 8 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462 页。

④ 《东方杂志》1901 年 7 月，第 66 页。

制于人，庶为自强持久之计”^①的信念。他于1889年7月正式具奏在广州附近筹建枪炮厂，但寻即奉调至鄂。李鸿章见机立即插手，企图移厂至通州或天津，置于北洋控制之下。张之洞则坚持将其迁往湖北，他提出三条理由：第一，枪炮厂移鄂可就煤铁之便；第二，湖北为九省通衢，所出枪炮无论接济腹地各省或转运沿海，均极方便；第三，在鄂建厂可开内地闭塞风气，且于西路边防有利。^②总理海军衙门的奕訢惟恐淮系势力过于膨胀，倾向于张氏一边。枪炮厂移鄂，遂成定议。

1892年，湖北枪炮厂动工，两年后落成。初与汉阳炼铁厂合署办公，亦由蔡锡勇主持。1895年始行分离。1904年，张之洞奏称“枪炮厂内分厂林立，厂各有名，非枪炮二字所能包括，请改名为湖北兵工厂”^③。

枪炮厂的建设、生产，费用浩大。购买机械计银172万两，建筑厂房计银48万两，购买材料计银523万两。^④常年经费起初为36至37万两，后增至80余万两。^⑤更严重的是，枪炮厂全部产品由清政府无偿调拨，不能进入市场，没有销售收入，资金周转更显捉襟见肘。张之洞请求朝廷谕旨各省拨款，由鄂代造军械，未获效果，只得从税款、厘金等地方财政中挤用，又向官绅“劝捐”。特别困难时，动用铁厂经费和织布局股金，以救燃眉之急。甚至以高息向外资洋行借款，方才勉强维持。

湖北枪炮厂的建设，晚于沪、宁、津等地的洋务军工企业，但其设备、产品之先进，明显后来居上。张之洞“器必求精求新”，通过驻德公使许景澄订购当时最先进的小口径枪、新式快炮及炮弹、枪弹等成套设备，不惜一再追加贷款。张之洞的学生、辛亥志士吴禄贞称该厂“植中国军械专厂之初基”^⑥，是符合史实的。继张之洞总督湖广的陈夔龙到任后，前往工厂视察，“目睹其制度宏阔，成效昭然，窃叹为各行省所未有”^⑦。

（3）华中近代纺织工业的奠基——湖北布、纱、丝、麻四局

洋务运动为挽民族利权，开办了不少近代机器纺织企业，如左宗棠在兰州、李鸿章在上海，都有所建树。但在华中地区，直到19世纪80年代，近代纺织工业尚为一片空白。

1889年，张之洞调任湖广，原在广东订购的纺织机也移往湖北。1890年底，湖北织布官局在省城文昌门外破土兴建，两年后建成，装英国布机1000张，纱锭

① 《张文襄公全集》卷25，奏议25，《筹建枪炮厂折》。

② 《张文襄公全集》卷134，电牍13，《致海署天津李中堂》。

③ 张继煦：《张文襄公治鄂记》，第25页。

④ 王家桢：《湖北兵工厂调查报告》，《湖南实业杂志》第11期，第30页。

⑤ 张继煦：《张文襄公治鄂记》，第26页。

⑥ 《张文襄公荣哀录》卷1，《湖北请建专祠折》。

⑦ 《庸庵尚书奏议》卷9，第18页，宣统三年铅印本。

30 000 枚，雇工 2 500 人。产品投放市场，销路很好，“甚合华人之用，通行各省，购取者争先恐后，以故货不停留，利源日广”^①。正如织布官局门口张之洞的亲题楹联：“布衣兴国，蓝缕开疆。”华中地区的近代纺织工业从此奠基，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略分洋利”的目的。“自湖北设织布局以来，每年汉口一口进口之洋布，已较往年少来十四万匹。”^②

织布官局初见成效，张之洞又筹建纺纱官局。其目的一是抵制洋纱；二是为其他企业积累资金，“既能辅佐布局之不逮，兼可协助铁厂之需要”^③。他通过驻英公使薛福成，与英商谈判，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订购纺纱机。又集得商股 30 万两，官府拨款 30 万两，作购机开厂经费。

张之洞原计划建设南、北两个纱厂，共装锭 9 万枚。北纱厂首先兴建，1897 年建成投产，装锭 5 万枚，是为湖北纺纱官局。官局开工后，经营情况不错，1899 年一年即获利约 5 万金。^④南纱厂原定装锭 4 万枚，但因财力不足，无法兴建。这批纱锭后由张謇接手，建成南通大生纱厂。

湖北蚕桑业发达，但土法织造丝绸，品质低劣。张之洞认为，“惟民间素未见机器缂丝之法，无从下手，亟应官开其端，民效其法”^⑤。他派湖北候补道刘保林赴沪考察，并将鄂茧在沪试缂，结果十分满意。1894 年底，他在武昌望山门外购地设厂，次年湖北缂丝局建成投产，“织工三百人，每日制出上等品三十斤，普通品十八九斤”^⑥，“原料用湖北产、沔阳产最多，专用黄丝，其制品全部输于上海”^⑦。

除布、纱、丝局外，张之洞又在武昌平湖门外建湖北制麻局。购德国织机，聘日本技师，采用先进工艺，“由锅炉、引擎而去麻胶水，而纱麻为线，而织麻为布，各机层层接续”^⑧。1906 年，制麻局建成投产，雇工 450 余人，产品有麻纱、粗细麻布及麻袋。它的规模虽然不大，但实“为吾国机制麻业之滥觞”^⑨。

张之洞兴建的湖北布、纱、丝、麻四局，构成比较完整的近代纺织工业体系，这在中国近代纺织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武汉之所以成为华中最大的纺织工业中心，张之洞的首创之功，实不可没。

① 《申报》光绪二十年十月十三日。

② 张之洞：《劝学篇·外篇·农工商学第九》。

③ 《张文襄公全集》卷 35，奏议 35，《增设纺纱厂折》。

④ 《中外日报》1900 年 3 月 3 日。

⑤ 《张文襄公治鄂记》，第 31 页。

⑥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 956 页。

⑦ [日]水野幸吉：《汉口》，光绪三十四年六月。

⑧ 《张文襄公牍稿》卷 12。

⑨ 杨大金编：《现代中国实业志》上，第 200 页。

2. 铁路事业的开拓

张之洞由两广移督湖广，起直接原因的是与晚清铁路事业的开拓密切相关。清廷调张到湖北，本意即在委他以督办卢汉铁路的重任。

如同其他体现近代文明的新事物一样，铁路在中国的出现，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过程。1876年，英商在上海修建一条仅长十余公里的铁路，竟被地方政府出资购回后拆毁。1880年，直隶总督刘铭传建议以北京为中心修筑铁路干线，遭到顽固派极力反对而“诏罢其议”^①。中法战争以后，朝廷认识到铁路的重要军事、经济意义，总理衙门始将筑路列入议事日程。但在具体线路方面，意见不一。李鸿章主张立即修建津通铁路（天津经北京到通州），而张之洞认为修此路耗资大，利润少，且于军事方面作用不大。他提出立即修筑卢汉铁路（卢沟桥至汉口），并陈其有七利而无一害，如不近海口，敌不可资；广开商旅之利；促进煤铁开采；方便漕饷之运；有利军队调动，等等。

清廷采纳张之洞的意见，并于1889年调张就任湖广总督，以便于监修卢汉铁路南段（北段由直隶总督监修）。正当张之洞紧锣密鼓筹备路工之时，沙俄对我东北地区虎视眈眈。清廷迫于形势，改变计划，移卢汉铁路款先筑关东铁路，卢汉铁路的修筑便被搁置下来。

1895年，张之洞再次吁请修筑卢汉铁路。关于经费，他提出建立铁路总公司，“萃四方之商力，注卢汉一路”。但在实际运作中，困难重重，最后不得不向外商借款，于1898年与比利时签订协议，借款1.12亿法郎。比方在俄、法等国支持下，提出派人“调度经理”等附加条款，攫取了部分路权。

1898年至1902年，卢沟桥至保定、汉口至信阳段先后通车。1905年，卢汉铁路全线贯通，同时接通卢沟桥至北京一段，总长1200公里。清廷派张之洞与袁世凯共同验收，并改称京汉铁路。一个世纪以来，京汉铁路一直是我国腹地最重要的南北交通干道。张之洞为它的修建多方谋划，终于完成此“他人不愿为，且不能为”^②之大业，在中国铁路建设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卢汉铁路的开筑，刺激了全国铁路事业的拓展。粤、湘、鄂三省绅商提出由他们自行集股，修筑粤汉铁路。张之洞不相信绅商有此实力，主张官督商办。此时，盛宣怀通过驻美公使伍廷芳向美国合兴公司借款400万英镑修路。合兴公司不仅提出种种苛刻条件，而且一再违约。粤、湘、鄂三省绅商强烈不满，要求废除合同，收回路权，自办粤汉铁路。张之洞支持他们的要求，以675万美元的高价赎回路权。

^① 《清史稿》卷149，《交通》。

^② 《张文襄公治鄂记》，第3页。

1905年,张之洞奉旨督办粤汉铁路。原定粤、湘、鄂三省各自筹款筑路,后又改为向德、英、法三国银行团借款。此举激起大规模反抗浪潮。不待事态平息,张之洞便已去世。在遗折中,他写道:“此次粤汉铁路、鄂境川汉铁路关系繁重,必须官为主持,俾得早日观成,并准本省商民永远附股一半,为利用厚生之资,此尤臣弥留之际不能不披沥上陈者也。”^①

3. 民营工商业的振兴

张之洞督鄂期间,对于武汉的民营工商业,也着意扶助提携,对商人“一方面劝导,一方面奖进,而其要归,在期望商人破除旧习,具有世界之眼光,发挥商战之能力,俾能挽回利权,地方盖臻繁盛”^②。由于他实行比较开明的工商业政策,武汉迅速成为当时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民营产业中心与商埠。

张之洞与武汉民营巨头多有密切联系。他与巨商宋炜臣过从甚密,赏识宋的经营才干,多方提供便利,批准燮昌火柴厂获得10年专利权,在税收方面也予以优惠。1906年,宋联合他人,集资300万元,呈请开办汉口既济水电公司。张之洞立即批准,而且拨官款30万元助其股本。公司电厂于1908年建成送电,装机1500千瓦,当时居全国第三。水厂也于次年送水,汉口因而成为全国首先使用自来水的地区之一。

1900年,张之洞在武昌、汉口开设电话。1902年,电话局扩充,资金不足,他责成商人集股经营,由民资巨商刘歆生出任电话公司董事,这是全国商营电话的开端。

为了繁荣民营商业,张之洞还开办汉口商务公所,设立汉口商务局,劝设商务商会,创办两湖劝业场(类似今百货公司)。武汉三镇的商业取得长足进步。1896年至1905年,汉口内外贸易额增加一倍多。1906年,汉口进出口贸易占全国贸易额的12.04%,几乎接近上海的水平。^③其后几年间,汉口贸易年额1.3亿两银,“位于清代要港之二,将进而摩上海之垒,使观察者艳称为东方芝加哥”^④。

4. 新式教育的创设

张之洞本人是科举正途出身。19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他由清流党向洋务派的转变,逐渐萌发了改革传统教育的想法。督粤期间,他已将这种想法付诸实施,创办了广东水陆师学堂。移督湖广后,更是大举进行。十余年间,在武汉地区创立

① 《张文襄公全集》卷70,奏议70,《遗折》。

② 《张文襄公治鄂记》,第33页。

③ 《武汉市进出口商业解放前历史资料》,未刊稿。

④ [日]水野幸吉:《汉口》。

了比较完整的近代教育体系。今天的武汉是全国教育的重镇之一，无疑与张之洞当年的建树有着直接的关系。

清末新式学堂的建立，以 1862 年京师同文馆为其开端。洋务运动中，京、津、沪、宁等地陆续开办了少量培养军事、实业人才的学堂。但是，无论从新式学堂的数量、规模，还是从专业门类的配套，各级教育的衔接体制方面衡量，张之洞在湖北武汉地区的教育兴革，都堪称后来居上，领先全国。

（1）实业教育

在兴办洋务的过程中，张之洞深感“不讲农工商之学，则中国地虽广、民虽众，终无解于土满人满之讥矣”^①。19 世纪 90 年代以后，他于实业教育方面注力尤多。

1891 年，张之洞于铁政局附近设算学学堂，附列方言、商务两门。如学生愿兼习化学、矿学，可就近往铁政局见习。

1893 年，张之洞请立湖北自强学堂，称其宗旨为“讲求时务，融贯中西，研精器数，以期教育成材，上备国家任使”^②。学堂设于武昌城内铁政局旁，开方言、格致、算学、商务等课程。该学堂是今著名学府武汉大学的前身。

1898 年，又设立以培养外交人才为目标的湖北方言学堂。学生来源，先于自强学堂内选拔优秀者，后招取普通中学毕业生。学习历史、地理、公法、交涉等课程，分习英、法、德、俄、日语。学制 5 年。

同年，张之洞以“农务尤为中国之根本”，请开农务学堂。学堂先设于武昌大东门，后迁至武胜门外保集庵^③，以与试验农场相邻。学堂分农桑、畜牧、森林等科，学制 4 年。

开设农务学堂的同时，又设工艺学堂于江汉书院旧址。募日本教习，分理化、机器、制造、纺织、建筑各门。

此外，还开办了矿业学堂、工业学堂、驻东铁路学堂、军医学堂等，培养各类专业人才。

（2）普通教育

20 世纪初年开始，张之洞兴学的重心转移至普通教育。在他的倡导下，武汉地区形成了初等、中等、高等学堂成龙配套的教育体系，开全国风气之先。

张之洞认为，“初等小学为养正始基”^④。他于武昌城内分东西南北四区，设初等小学 43 所，城外设 17 所。经费由学务公所支拨。同时大力鼓励民间自办小学

① 《劝学篇·外篇·农工商学第九》。

② 《张文襄公奏稿》卷 21，《设立自强学堂片》。

③ 今湖北大学所在地。

④ 《奏定学堂章程》。

教育。

1904年,张之洞于武昌城内分东、西、南、北、中五路,各设高等小学堂一所,科目为修身、读经、中文、算术、历史、地理、图画、体操等。

1903年,张之洞以自强学堂为基础,开办文普通中学堂,设伦理、温经、中文、外语、数学、博物、理化、法制等12个科目。

1903年,在两湖书院基础上,建文高等学堂,又名两湖大学堂,以培养术德兼优的“通才”为目标。学习中西公共学四门,西学四门。学生在校学习4年后,派往东西洋游历一年,以广见闻。

(3) 师范教育

随着各类新式学堂的开办,师资问题日益突出。张之洞“查各国中小学教员咸取材于师范学堂,故认师范学堂为教师造端之地,关系至重”^①。他陆续开办了一批师范学堂。

1902年,张之洞在武昌宾阳门南开湖北师范学堂。除开设普通中学课程外,又有教育学、教授法、学校管理法等。这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最早的独立完备的师范学校。

1904年,张之洞拨银4.3万两巨资,将两湖文高等学堂改为两湖总师范学堂。计划招生1200名,号“千师范”,实际招生700名。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即为该学堂毕业生。

1904年,张之洞还创办了湖北敬节学堂,培养幼儿教师;创办湖北育婴学堂,培养婴儿保育员。

(4) 推行留学教育

张之洞督鄂期间,推行留学教育。他认为,“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②。在留学方向上,他认为“西洋不如东洋”。一则日本路近费省,二则易于考察控制,三则日语较欧美语言易于掌握,四则日人已对西学作了选择介绍,便于学习。他陆续派出大批学生赴日学习实业、师范、法律、警察、军事。据1907年统计,“留日学生全国各省共计5400多名,湖北所派学生即有1360余名,占了四分之一,所以湖北在当时有先进省之称”^③。

5. 编练新军

晚清持续不断的内忧外患,使张之洞体悟到,“练兵一事,鄙人身心性命之

① 《张文襄公全集》卷57,奏议57,《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

② 《劝学篇·外篇·游学第二》。

③ 陈青之:《中国教育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634页。

学^①。甲午战后，他屡陈奏章，主编练不同于绿营、防营的新式武装。1896年起，他开始大规模编练湖北新军，到1905年，编成陆军第八镇（兵员一万余人）暂编第二十一混成协（兵员近五千）。这是清末仅次于北洋六镇的最强大新军。除了武器装备的近代化之外，张之洞特别重视士兵的素质，要求多吸收“实能识字写字，并能略通文理之人”^②入伍。他手订湖北练兵要义，第一条就是“入营之兵必须有一半识字”^③。在此思想指导下，湖北新军成为各支新军中文化素质最高的部队。1905年，该军在黄陂募兵96人，其中竟有廪生12人，秀才24人。较高的文化素质使不少官兵具备接受新的社会政治思潮的知识基础，进而最终走上革命道路。湖北新军能够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这是重要的基础条件之一。

（二）

张之洞在湖北武汉地区推进近代化的业绩，是以他开放通达的文化思想、求强求富的政治抱负和清正廉洁的个人品质为基础的。

张之洞是晚清著名的封疆大吏。其本身的思想轨迹，经历了由清流健将向洋务殿军转变的清晰过程。这一转变，起始于1881年外放山西巡抚，“小试其端”于19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两广任内，完成并大展宏图于19世纪90年代后期，亦即他总督湖广的十余年间。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给中国带来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机。此后不久，张之洞上《吁请修备储才折》，这是甲午战后张之洞继续推进洋务事业的总纲性文件。他提出“中国安身立命之端”的九件应急办之事：练陆军，治海军，造铁路，设枪炮厂，开学堂，讲商务，讲求工政，多派游历人员，预备巡幸之所。显而易见，张之洞在武汉近代化方面的诸多举措，正是这一总纲的具体落实。虽然这时他还没有明确揭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标帜，但这一思想在他的头脑中已经呼之欲出了。1898年前后，张之洞开始将“中体西用”思想形诸笔墨。他在《两湖、经心两书院改照学堂办法片》中提出：“两书院分习之大旨，皆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既免迂陋无用之讥，亦杜离经叛道之弊。”^④我们今天有许多种理由来批评“中体西用”理论的似是而非，但是却不能抹杀它在排除习惯势力的阻挠、使近代化事业得以在守旧传统的一统天下中冲开一条缝隙的实际历史功绩。

① 《张文襄公全集》卷188，电牍67。

② 《张文襄公全集》卷62，奏议62。

③ 《张文襄公全集》卷57，奏议57。

④ 《张文襄公全集》卷29，奏议29。

张之洞极言“沧海横流，外侮洊至，不讲西学则势不行”^①。在《劝学篇》的《外篇》，他以改革传统教育为中心，全面阐述其“讲西学”的主张，涉及倡导游学，广开学堂，提倡专门之学，翻译西书东书，设报馆，变科举，讲习农工商学，改革兵学，研习矿学，修筑铁路等诸多方面。进入20世纪，清廷宣布实行“新政”。张之洞进一步强调“变中国旧法，从西法也，非泛泛改章整顿之谓也”。“欲救中国残局，惟有变西法一策”。1901年7月1日，张之洞上《遵旨筹议变法谨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折》，申言“整顿中法者所以为治之具也，采用西法者所以为富强之谋也”。次日再上《谨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基本内容大致同《劝学篇·外篇》论及范围，所不同者，《劝学篇》所论以改革教育为中心，更接近于狭义的文化“开新”，而此折多从行政立法着眼，更接近于广义的文化“开新”。

清末民初政论家张继熙这样评论张之洞：

公一生政治主张，在开利源以救中国之贫弱。而开利源，首在发展实业。故在鄂设施，皆本一贯之政策以进行。或疑公趋重官营事业，亦进夺民利。不知公主旨在夺外人之利，以塞漏卮而裕民生。^②

张之洞以系统联系的观点来看待工、农、商、交通诸业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的产业结构关系。他论道，“农之利在畅地产，工之利在用机器，商之利在速行程、省运费”，“然必将农、工、商三事合为一气贯通讲求，始能阜民兴利”^③。又说“农、工、商三事互相表里，互为钩贯。农瘠则病工，工钝则病商，工商聱瞽则病农。三者交病，不可为国矣”^④。张之洞还十分重视交通事业、特别是铁路在经济活动中的纽带作用，“有一事而可以开士农工商兵五学之门者乎？曰：有。铁路是已”。他形象地称铁路之于经济有如气脉之于人身，“气脉畅通而后有运动”^⑤，交通发展而后有经济振兴。

张之洞特别重视机器工业在发展经济中的头等重要地位。他否定当时影响很大的郑观应等人“以商立国论”，批评“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务立国，此皮毛之论，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⑥。“内兴农利，外增商业，皆非工不为功”^⑦。

① 《劝学篇·守约》。

② 《张文襄公治鄂记》，第28页。

③ 《张文襄公全集》卷35，奏议35。

④ 《劝学篇·外篇·农工商学第九》。

⑤ 《劝学篇·外篇·铁路第十二》。

⑥ 《张文襄公全集》卷37，奏议37。

⑦ 《劝学篇·外篇·农工商学第九》。

张之洞认识到,生产与流通的关系既有“工为体,商为用”的一面,又有“商为主,工为使也”的另一面。“二者相益,如环无端。”^① 所以他在优先考虑发展机器工业的同时,也力促商业的繁荣。20世纪武汉稳据华中商贸中心的地位,除天然的地理优势外,张之洞当年的大力奠基,也是关键因素。

清廷管学大臣张百熙曾称赞张之洞是“当今第一通晓学务之人”^②。张氏逝世后,四川总督赵尔巽奏请为之立祠,表彰“其生平精神所寄,尤在振兴教育,储养人才,以备国家缓急之需,而救当世空疏之习”^③。张之洞的教育思想,确有超迈时人之处。

张之洞在中国教育史上较早提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目标。1902年,他在《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中论道:“考日本教育,总义以德育、智育、体育为三大端,洵可谓体用兼赅,先后有序”。^④ 张之洞反对将学生培养成“高而不切”、“不知时务”的“陋儒”,引导学生关心天下忧乐,树立利国利民的襟怀抱负,以此作为德育的重要任务。“国家养士,岂仅望其能作文字乎?通晓经术,明于大义,博考史传,周悉利病,此为根柢。尤宜讨论本朝掌故,明悉当时事务,方为切实经济。”^⑤ 基于推行洋务的实践,张之洞对“智育”的理解较之传统观念,有了新的突破:

夫政刑兵食,国势邦交,士之智也;种宜土化,农具粪料,农之智也;机器之用,物化之学,工之智也;访新地,创新货,察人国之好恶,较各国之息耗,商之智也;船械营垒,测绘工程,兵之智也。此教养富强之实政也,非所谓奇技淫巧也。^⑥

依循时代发展对教育的新要求,张之洞比较科举与学堂的优劣长短:“科举文字每多剽窃,学堂功课课在实修;科举只凭一日之短长,学堂必尽累年之研究;科举但取词章,其品谊无从考见,学堂兼重行检,其心术尤可灼知。彼此相衡,难易迥别,人情莫不避难就易。”^⑦ 1905年7月,张之洞与袁世凯联衔奏请立停科举,大兴学堂。清政府采纳这一建议,宣布从1906年起,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科举制的终结,是君主专制制度行将就木的文化征象。张之洞促成了它的实现,有功

① 《劝学篇·外篇·农工商学第九》。

② 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年谱》卷8。

③ 见《张文襄公全集》卷首上。

④ 《张文襄公全集》卷57,奏议57。

⑤ 《张文襄公全集》卷204,《轩语》。

⑥ 《劝学篇·外篇·益智》。

⑦ 《张文襄公全集》卷61,奏议61,《请试边递减科举折》。

于历史。

督鄂十余年间，张之洞经手创办了数十所各级各类新式学堂。与此同时，在建立一种完备、系统的新式教育制度体系方面，他也进行了总体性的思考。1901年5月，他上《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就“兴学育才之大端”提出建议，其中包括学有定程，循序渐进，教科书官定颁发等学制方面的构想。他还分学校为蒙学、小学、中学、高等学堂与京师大学堂五级，各级入学年龄、修业年限都有明确规定。这一学制构想未及在全国推广，但是张之洞以此认识为基础，在武汉地区基本建立起区域新教育体系。

从个人品质方面检讨，张之洞的坚毅、勤勉、清正，也是他取得政治实绩的促成因素。

张之洞一向认为，“从来举大事者必须毅然担当，不计小利小害乃能成功”^①。他坦然表白：“平生有三不争：一不与俗人争利，二不与文士争名，三不与无谓争闲气。”^②“鄙人立身立朝之道，无台无阁，无湘无淮，无和无战。”他声明：“权贵不足畏，权贵之党亦不足畏。”对于政敌在背后的指指戳戳，他“知则知亦，管则不管也”^③。正因为具备这种素质，他才能勇于任事，敢为天下先，“力所能及者必应决计速行”^④，终于在“荆天棘地”中开辟出洋务事业的众多实绩。他总是将实现既定目标的坚定性与手段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因而能在“所办之事皆非政府意中欲办之事，所用之钱皆非本省固有之钱，所用之人皆非心悦诚服之人”的情形下，“所办各事亦颇有竟睹成功之者，真侥幸也”^⑤。

张之洞身膺疆吏重任，于职守兢兢业业。1900年在鄂督任内，“衰病日甚，心血耗尽，夜睡仅五六刻，午睡三四刻，且甚艰难，久成怔忡之症”^⑥。1905年，又患口疮，“将及一年，中医云系心劳肝火病在内，东医云系胃热牙虫病在外。……大率数日内公事顺畅、睡时较多则痛止，公事拂逆，睡时过少则痛巨”^⑦。与清末官场司空见惯的文恬武嬉、尸位素餐者流相比，张之洞确实担当得起“公忠体国，廉正无私”的称誉。有人曾评论张之洞“知利害不知是非”，他本人则声明：“所谓利者安在？我所讲究者乃公利，并非私利。私利不可讲，而公利则不可不讲。”^⑧张之洞居官40年，位及一品。无论督鄂还是入官京师，经手的资金何止千万。但

① 《张文襄公全集》卷7，奏议7。

② 《张文襄公全集》，《抱冰堂弟子记》。

③ 《张文襄公全集》卷214，书札1。

④ 《张文襄公全集》卷67，奏议67。

⑤ 《张文襄公全集》，《抱冰堂弟子记》。

⑥ 《张文襄公全集》卷165，电牍44。

⑦ 《张文襄公全集》卷85，电奏13。

⑧⑩ 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闻·公利私利》。

他始终清正廉洁，不事聚敛。即便按正常俸禄计，亦应属家道殷实。但是实际上，张之洞逝世后，“竟至囊橐萧然，无以为子孙后辈计”^①。

由于他讲公利，重事业，政绩昭然，口碑在民。1907年奉调入京后，湖北各界深表怀念。军界人士聚资在蛇山建抱冰堂，学界人士聚资在黄鹤山建风度楼，均表纪念之意。张之洞闻讯恳切阻止，但风度楼仍于1908年竣工，抱冰堂也于张氏死后建成。张之洞得知风度楼已成，又致电继任湖广总督陈夔龙，“此楼关系全省形势，不可以一人专之”，建议更名“奥略楼”。^②

（三）

张之洞是君主专制体制中的中坚分子。在历史潮流的涌动中，他因了所居的地位，发挥个体的能动性，自觉不自觉地地为武汉的近代化做了积极的工作，留下了珍贵的遗产，其中也包含了可资分析的教训。

专制政治的本质是“人治”。行政决策者个人的识见、品质和命运，通常能决定一个地区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速率和基本格局。张之洞之于湖北武汉的近代化发展，也是这样。1889年前，他在两广任内，许多建设项目本拟在粤进行。随着他移督湖广，这些项目也迁来武汉。从这一历史事实出发，我们不妨说，1889年张之洞个人仕途的变化，带来了武汉近代化事业的重大启动契机。可问题又正是出在这里。“人治”格局下的一时兴盛，必然随“治人”者个人的离去而风光不再。1907年张之洞入参军机，对其个人仕途来说，到达成功的顶峰，但他的离去，也使湖北武汉地区的近代化势头锐减，并终而陷入停顿。在大的时代背景下，如何使一个地区的社会与经济发展能在一种比较平稳、少受个人因素左右的情形下持续进行，张之洞没有考虑，也无从着手。这算不上他的过错。因为“时势比人强”，在20世纪初年的中国，还没有出现完成这一思考并实施对策的可能条件。但是我们今天再回首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却完全有必要在不苛求前人的同时，尽力从他们的作为和不作为当中，吸取有益的思想营养。

当然，从张之洞本人的认识和实践的层面上，我们也应该指出其利弊所在。

首先，相对于顽固守旧派，张之洞“中体西用”的洋务思想在当时确属开通一流。但是归根结底，“物曲虽博取，王制乃常宗”^②。“中体”对于“西用”的制约，也大大折扣了张之洞推进近代化事业的进步意义。张之洞督鄂近20年，在“激发

① 《张文襄公全集》卷201，电牍80。奥略楼于1957年因修建武汉长江大桥而拆除，抱冰堂现仍存武昌首义公园内。

② 《张文襄公全集》卷226，诗集3。

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旗帜下的兴革之举，涉及经济、教育、文化、军事诸多领域，但恰恰在政治这个至关重要的领域内，他无甚作为，乏善可陈。近代化是一个经济和社会进步的系统工程。19、20 世纪之交的十余年间，张之洞在推进武汉近代化方面作了许多实事，但是，就近代化的准确、全面的定义而论，张之洞的贡献又是有严重局限的。

其次，仅就经济领域内的兴革而言，张之洞本人不是本质意义上的近代企业家和近代经济学家，而是忠实于传统营垒、但颇具改革精神的行政官员。他的洋务事业的根本动机，乃是为摇摇欲坠的专制政治体制加固墙角，支撑危梁。就具体的经济行为来讲，也是服从于其守旧的政治目的。非经济的因素控制了经济运动的全过程，必然导致运动的畸形进程和非乐观结局。这反映在张之洞的经济思想和实践中，便是诸种反科学原则和反客观规律的行为的存在。他对于价值规律、经济管理原理及手段，或者仅知皮毛，或者一窍不通，全凭衙门式的训令实施指挥。如盲目订购机器，忽视原材料的供给保障，以行政力量强行干预企业资金的流动走向，等等。此外，官场习见的裙带之风、糜费侵蚀、排场应酬也处处可见。汉阳铁厂“每出一差，委员必十位八位，爵秩相等，并驾齐驱，以致事权不一，互相观望，仰窥帅（指张之洞——引注）意”^①。办厂所耗 500 余万两银，用于正途的不到一半，“余皆浮费，于公司毫无利益”^②。此类弊端，所在多有，也严重损害了管理的效能和事业的开展。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年，武汉迅速成为中国为数不多的近代大都市之一。张之洞逝后两年，在他“久任疆寄”的湖北省城武昌，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辛亥首义，中国近代历史从此掀开新的篇章。人们探讨“辛亥革命曷为成功于武昌乎”？答案正与张之洞有关：

抑知武汉所以成为重镇，实公（指张之洞——引注）二十年缔造之力也。其时工厂林立，江汉殷赆，一隅之地，足以耸动中外之视听。有官钱局、铸币厂，控制全省之金融，则起事不虞军用之缺乏。有枪炮厂可供战事之源源供给。成立新军，多富于知识思想，能了解革命之旨趣。而领导革命者，又多素所培植之学生也。精神上，物质上，皆比较彼时他省为优。以是之故，能成大功。虽为公所不及料，而事机凑泊，种豆得瓜。^③

① 《盛宣怀档案》，钟天纬致盛宣怀函。

② 徐珂：《清稗类钞》，第 17 册，第 12 页。

③ 《张文襄公治鄂记》，第 7 页。

“事机凑泊，种豆得瓜”这一段话，既注意了历史进程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又挑明了历史人物的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的关系，正可以帮助我们辩证法从辩证法角度，认识张之洞与武汉近代化之间奇特然而又是非常直接的关系。

十一、近代化、权威主义与张之洞效应

近代化不等于西化，它是全球性的历史命题。只不过西方某些国家因民族国家的建立、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社会的成熟，尤其是后来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而走在了其他国家的前面。各个民族应该找到适合本民族基本国情的近代化的现实道路，中国也不例外。实际上，西欧各国的近代化历程也不尽一致。许多学者对近代化的概念做过厘清，此不赘述。笔者认为，近代化是伴随传统产业结构向市场经济转型而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观念等方面的新质因素和社会变迁^①。从历史的长时段看，中国的近代化历程起于明代（抑或宋代）。近代化是明清以降中国历史的主线之一。国门洞开之后，这条主线又与西学东渐、产业升级、政治改革、民族复兴等重大命题联在一起，更显尖锐、沉重、矛盾和深刻。对近代化的研究实际上就是为中国现代化寻求尽可能多的历史资源，因为实现现代化是中国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惟一道路。现代化的切实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中国成为文明、民主、富强的东方强国。在这一背景下谈论“张之洞效应”，益发显得意义重大。

所谓“张之洞效应”是指在张之洞的赞襄与扶持下，清季湖北的近代化事业结出了丰硕成果，在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都有开风气之先的样板作用，这一切都与身为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密不可分。前此学者对此多有论述，可资借鉴^②。“张之

① 笔者对前近代、近代化的概念曾有界定，参见任放、杜七红：《传统市镇近代化刍论——以汉口为个案的研究》，载《人文论丛》2000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② 如苏云峰著：《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1860—1916·湖北省》，台湾近代史研究所1981年版。苏氏从社会史角度对汉口开埠后湖北社会经济的变迁作了全方位的勾勒，是研究湖北近代化历程的必读书。〔美〕周锡瑞著、杨慎之译：《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中华书局1982年版。周氏主要从政治变革层面探讨两湖地区近代化的相关问题，其视野及有关论点耐人寻味。陈钧、任放著：《世纪末的兴衰——张之洞与晚清湖北经济》，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这是迄今为止对“湖北新政”做了最为详尽研究的著作。皮明麻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是著全面论述了武汉城市近代化的历程，体例完整，内容详实。另有许多专题论文，对清季武汉地区的经济发展进行论述。如范植清：《鸦片战争前汉口镇商业资本的发展》，载《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有助于我们了解汉口近代化的商业基础。杜七红：《茶叶与清代汉口市场》，武汉大学1999年硕士论文，从一个特殊角度切入汉口市场发展史，做了扎实的研究。另有若干篇论文专门研究明清汉口城市化，可参阅王永年：《论晚清汉口城市的发展和演变》，载《江汉论坛》1988年第4期。宋平安：《明清时期汉口城市经济体系的形成与发展》，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陶建平：《明清时期汉口商业网络的形成及其影响》，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等。

洞效应”包括三个方面：其一，张之洞一手创办的近代化事业，史称“湖北新政”；其二，这些近代化事业的现实效应；其三，张之洞及其“湖北新政”的当代启示。

暂且不论张之洞的若干失误，仅列举他一手创办的众多近代化事业，就会令人惊叹不已——

在近代工业方面，他创办了中国近代首屈一指的设备最新、规模最大的兵工厂——湖北枪炮厂，亚洲第一家集开矿、采煤、炼铁为一体的大型近代化钢铁联合企业——汉阳铁厂，以“布衣兴国、蓝缕开疆”为创办宗旨的湖北织布、纺纱、缫丝、制麻四局，与重工业相拱卫的种类繁多的一批中小型近代企业。张之洞还是中国近代铁路交通的奠基人，因为他是力主修筑卢汉铁路的关键人物。

在近代商业方面，张之洞创办了汉口商务局、商务报、商务学堂、商会公所。尤其是1902年在汉口兰陵街设置的两湖劝业场，堪称近代商品交易会的典型。两湖劝业场分三个展厅：内品劝业场，专门陈列湖北的机器工业品及手工业品；外品商业场，陈列外省及外国出产的商品；天产内品场，陈列两湖地区的土特产及矿产。各种展品都标明价格，并邀请中外商人参观定购。

在近代文化教育事业方面，张之洞扬弃旧书院，创办新学堂，提倡实业教育，推广普通教育，倾心师范教育，开拓女子教育，强化军事教育，注重官员培训，鼓励社会办学。应该指出，张之洞虽然不是近代中国留学运动的开拓者，却是甲午战争后该运动最有力的推动者之一。他拟定的《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1903年）等有关留学的奏议，被清廷采纳并定为国策。在湖广总督任内，张之洞大量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考察，致使留学热成为湖北走向近代化的一个新浪潮。此外，张之洞在近代图书馆、报刊、编译、地图绘制等方面均有开拓之举。

在近代军事方面，张之洞将近代军事学堂的创办与军队近代化建设联系在一起，从而奠定了培养一支高素质军事指挥员和战斗员队伍的制度基础及智力基础。湖北新军创建于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从编制、训练到装备、技术，仿效德国和日本，完全体现了张之洞的建军思想，即“必须扫除故套，参用西法，参用各国洋弁教习，讲求枪炮理法，兼司营垒测绘，始可谓之为兵”^①。新军实行镇（师）协（旅）标（团）营、队（连）排、棚（班）的编制，装配新式后膛枪、克虏伯大炮，军官由军事学堂毕业生和留日士官生充任。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廷练兵大臣铁良检阅全国军队，湖北新军的成绩名列前茅。至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湖北新军的兵力共计16 104名，其中军官990名，士兵15 114名。

上述丰硕成果，产生了广泛的现实效应。有研究者称：“在湖北近代化的复杂过程中，最具实绩、最为醒目、最富时代意蕴的当推三大成果，即钢铁工业、纺织

^① 《张文襄公全集》卷46，《奏议》。

工业、军事工业及新军的编练。也就是说，在一系列的奇迹中，机器与新军构成了湖北近代化的主调。”这也正是张之洞效法西方“由炼铁而制器，由制器而练兵，用能扩充工商诸务”的重大决策所导致的成果^①。清末民初，武汉成为仅次于上海的经济最发达地区，被誉为“东方芝加哥”。毫无疑问，近代湖北经济变迁具有历史地理学的意义：由东往西，上海代表着中国近代经济发展水平的第一个高峰，武汉则是第二个高峰；从南向北，由广东引进的西方物质文明随张之洞北上督鄂而落实于荆楚大地。张之洞督鄂十八载，举办了不同部类不同层次的近代产业，既有重工业和轻工业，又有国防工业和民用工业。张之洞所办纺织厂的纱锭数一度占全国纱锭总数的一半以上。近人杨铨所著《五十年来中国之工业》称，“汉阳之铁政局，武昌之织布、纺纱、制麻、缫丝四局，规模之大，计划之周，数十年以后未有能步其后尘者”。彼时，中国号称有六大纺织都市，武汉在上海之后列第二，另有青岛、天津、无锡、南通。

在张之洞的不懈努力下，湖北教育改革也取得了明显的现实效应。伴随书院改制的完成，湖北学务处的建立^②，新式学堂的推广，课程设计的更新等举措，湖北传统教育基本上实现了近代转型。具体表现在：既有从幼稚园到高等学堂的普通教育系列，又有各级各类学堂的实业教育系列及师范教育系列；既有锐气夺人的游学教育，又有应时而生的仕学院；既有省级学校，又有府州县级学校，以及民间创办的各类学校；既有传统旧学和儒学导师，又有近代新学和外国教习。初步统计，至辛亥革命前夕，湖北各种近代学校多达1 318所^③，成果可谓丰硕。事实表明，张之洞的教育改革与振兴实业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有研究者指出，“张之洞对于教育改革有浓厚兴趣，他把它当做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手段”^④。

张之洞编练的湖北新军堪称中国军队近代化的成功案例。事实表明，正是这支原本用于捍卫旧体制的近代化军队，成为宣判旧体制死亡的行刑者。诚如时人所说，“有枪炮厂可供战事之源源供给，成立新军，多富于知识思想，能了解革命之旨趣……虽为公所不及料，而事机凑泊，种豆得瓜”^⑤。如果说，机器工业的举办为近代湖北的崛起在物质技术层面创造了条件，那么新军的成长，则为近代湖北的崛起在政治变革层面准备了锋利的工具。

① 参见陈钧、任放著：《世纪末的兴衰——张之洞与晚清湖北经济》，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145页。

② 湖北学务处建立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参见陈定远、刘镇豪：《清末民国时期湖北教育行政机构沿革》，载《湖北省志资料选编》第2辑，1983年12月版。

③ 《公论新报》1909年2月13日。

④ [美]周锡瑞著、杨慎之译：《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9页。

⑤ 张继煦：《张文襄公治鄂记》之《文襄督鄂之时代及其环境》。

“张之洞效应”引发我们对权威主义的历史反思。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权威主义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典型例证莫过于此。现代经济学告诉我们，权力对市场的深度介入必然妨碍商业活动的正常运行，而且容易产生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在亚当·斯密眼中，理想的市场经济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调控着市场机制。然而，历史的事实表明，对一些近代化启动较慢的“后发国家”而言，当本国在世界市场中处于劣势时，要想迅速完成近代化的转型，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国家权力的介入是必需的。较为开明的权威主义虽然也有致命伤，但对于那些“后发国家”排除各种阻力，完成传统产业的改造，早日过渡到市场经济阶段，力争减少经济转轨带来的风险和社会动荡，具有根本上的重要性。这方面的成功案例，当推日本明治维新。19世纪中叶，以弥勒、李斯特、罗雪尔等人为代表的德国历史学派强烈呼吁国家干预经济生活，以政府行为加快德国的近代化。历史学派的主张，对德国近代产业资本的迅速成长，并以此为基础跻身世界强国之列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近代权威主义的文化背景是儒家伦理。儒家伦理非常强调上下尊卑严格区分的等级秩序，重视礼制、正名，所谓“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①；“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②。这种观念对近代中国人仍然具有很大影响，其例证之一就是“洋务派”习惯于站在等级制与正名论的角度谈论经济管理，竭力把官权机制引入近代企业的运行轨道中。在这里，官权实际上是“礼”制的强化与象征。把官权引入商品经济，旨在以官权统驭人们的商品行为，重官权而抑商权，实施规范管理。李鸿章等“洋务派”如此，“改良派”也不例外。在中国早期工业化阶段，改良主义者对官权运作普遍表现出亲和姿态。郑观应的论点堪称代表。郑观应指出，消除商业上的弊病必须借助官权，“此其权之在上而必大为变通者也”^③。他鼓吹“官商之势合”^④，强调“以官护商，以商辅官”^⑤。尤其是在官督商办的管理体制上，郑观应与李鸿章等“洋务派”一拍即合。他对官督商办的诠释是，“使商受其利而官操其权，实为颠扑不破之道”^⑥。在论述商战问题时，他对官权运作的重要性予以充分肯定，称“第商务之战，既应藉官力为护持，而工艺之兴，尤必藉官权为振作”^⑦。这就清楚地表明了官权之于近代化的意义。

作为“洋务运动”的先锋人物，张之洞是官权运作的积极鼓吹者。他强调

① 《礼记·祭统》。

② 《论语·子路》。

③④ 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

⑤ 郑观应：《盛世危言·银行》。

⑥ 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卷12，《电报》。

⑦ 郑观应：《盛世危言·商战》。有关经济伦理的近代嬗变，参阅陈钧、任放著：《经济伦理与社会变迁》第2章，武汉出版社1996年版。

“《礼》之大义，亲亲、尊尊、贤贤”^①，强调“正权”，即“辨上下，定民志”^②，并且自觉地把这种正权、崇礼、严辨上下的道德律令引入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之中，把官权引入近代企业的管理行为之中。诚如他所谓“盖国家所宜与商民公之者利，所不能听商民专之者权”^③。对企业中的商民之权加以限制，视其为礼制之大防，反复申明“商民之权须有范围限制”，“权限必须分明”，尤其是“不许越分争权”一语^④，点明了商董不能逾越名分等级的限定去争抢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否则就会“纪纲不行，大乱四起”^⑤。显然，运用官权进行规范管理，旨在突出传统礼制的神圣不可侵犯及其君临一切的地位，反对生产经营活动中违礼僭越的行为，维护政府对近代企业的所有权，确保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和谐有序，使不同层次的经营管理者（官、商）各安其位、各守其分。这就可以使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去体味如下问题：为什么张之洞经办的大型企业（如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官局及湖北纺纱官局等）都采用官办的形式？为什么张之洞在提出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管理体制时，十分重视官权的调控与监督职能？从近代化的思潮尤其是近代权威主义的角度去审视这些问题，或许更能得出历史的真实答案^⑥。

中国近代权威主义自然有其历史局限性。但是，历史的合理性及客观性往往不能用简单的是与非加以评判。考察湖北新政，存在着双重移植：一是从广东移植到湖北，如枪炮厂、钢铁厂、纺织厂等；二是从国外大量购置机器。离开了官权运作，这双重移植难以实现。汉口开埠较之沿海地区要晚20年，以故传统积习深厚，张之洞认为只有采取官办的方式推行近代化事业，才有可能使大机器生产在湖北获得发展。他所强调的“官为商倡”、“官开其端，民效其法”的主张^⑦，是一种务实的策略。从张之洞的个人因素看，他是清王朝统治集团的一员，对官权的崇拜与捍卫是其政治立场的必然反映。张之洞为创办近代实业而确立的诸多具体的办厂原则，诸如求大求全、求精求新、讲求速度、“专就湖北铁、布、枪炮三厂通筹互济”^⑧等，也迫使他首先强调官办而非采取其他的经营形式。因为“若数端并举，事体宏钜，恐非一省之物力财力所易集事耳”^⑨——必须倚重官权的运作才能解决诸如庞大的资金筹措，机器的大量进口与更新，减免税厘以轻成本、广开销路，轻重

① 张之洞：《劝学篇·守约》。

② 张之洞：《劝学篇·序》。

③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68，《奏议》。

④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68，《奏议》；卷194，《电牍》。

⑤ 张之洞：《劝学篇·正权》。

⑥ 陈钧、任放：《张之洞经济伦理思想探真》，载《历史研究》1993年第4期。

⑦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908、952页。

⑧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788页。

⑨ 薛福成：《出使日记》卷3。

工业并举、自相挹注的实业格局的构架等关键问题。此外，与李鸿章相颉颃的宿愿以及对盛宣怀独揽汉阳铁厂的防范，直接影响到张之洞官办思想的确立^①。

总之，“张之洞效应”向我们揭示了这样一种思路：发展中国家在市场转型的初级阶段，应该借助权威主义切合市场化改革的那部分资源，进行经济结构的重大改组。

^① 陈钧、任放：《张之洞经济思想散论》，载《历史研究》1991年第5期。

十二、辛亥革命与近代武汉及湖北工业

1911年10月爆发的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一场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资本主义初步发展,各阶层群众要求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的背景下,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奋斗,一举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统治。辛亥革命扫荡了顽固阻挠中国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满族亲贵势力,废除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作为首义之区,集中了湖北主要工业的武汉三镇,却在战火中遭受严重破坏,导致湖北近代工业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恢复时期。

(一)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随即遭到清军的重兵反扑,武汉三镇战火纷飞。受到战火破坏和政体突变的影响,武汉工商业蒙受巨大创伤。10月30日,冯国璋下令炮轰汉口市区,纵火焚烧华界,用以摧毁民军的抵抗。大火三昼夜不息,烧毁民房商号数万家,昔日繁华市区大半变为瓦砾,损失达4800万元之巨。武汉三镇许多重要工厂或毁于炮火,或因战事被迫停工。其中汉阳兵工厂在阳夏保卫战中遭到严重破坏,部分厂房倒塌,机器设备半数荡然,无法开工。汉口四家机器碾米厂中则有三家毁于战火,仅宝善一家得以幸免。既济水电公司因输电线路毁坏殆尽,损失达150余万元。由于“纺织四局、汉阳铁厂以及官商办各大工厂现今多未开工,或未开全厂大工,以致失业者累累”^①。清军攻占汉口、汉阳期间,许多工商界头面人物因支持过民军,咸恐清军报复,遂“纷纷走避租界,及至津沪一带”^②。以致资金外流,工厂关闭,百业停滞。“汉水河口聚集之船舶不及往年十分之一。”^③

武昌起义后成立的湖北军政府,是中国第一个具有比较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性质的政权。面对武汉三镇工厂停产,市面萧条,满目疮痍的严重局面,

① 《时报》民国二年(1913)二月十四日。

② 《商业杂志》三卷二期,1928年5月。

③ 《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第300页。

湖北军政府陆续颁布施行了一系列维持实业、解民倒悬的政策。(1)裁减厘税,实行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湖北军政府成立伊始,即重申“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以“扫除苛政,收拾民心”为第一要义,宣布“豁免钱漕,裁彻厘税”,严令禁止任何人以治安为名私招军队,“藉此为敛钱之术”。同时明文规定:除盐、烟、酒、糖、土膏各税捐外,所有统捐局卡一律永远裁撤;各属杂捐,除地方所用者外,概行蠲免;除海关外,所有关税一律撤销,“凡货物于经过第一局完纳过境税或销场税一次”,在本省境内,不得再行征税,其税率概货本值百抽二。(2)维持实业,保护工业器具财产。1911年11月,湖北军政府内务司组成农工保存处机关,在枪林弹雨中,将原湖北劝业道所辖白沙洲造纸厂、湖北工业学堂、林蚕技师养成所、工艺传习所、布纱丝麻四局等一应器物财产,派员调查,注册查封,加以管理,约计保护财产不下数百万金。同时,派员前往萍乡煤矿调查,惟因“胶葛太多,先后电商江西、湖南两都督从长计议,妥筹办法”^①。(3)封存省内矿场,保护矿产资源。武昌起义胜利后,因政权更迭而造成权力真空,省内各矿场原有材料机件,多被当地不肖之徒窃散。各属厂商纷纷向军政府陈请,请求军政府派员查办,或请组设矿务公司,准由民间开采。为了保护矿业,湖北军政府内务司于1911年12月27日通飭各属,凡银、铜、铁、煤、硝磺各矿场所在地点,“皆责成该管知事严加封禁,妥为保护,勿任土匪窃据”^②。翌年1月,内务司派出调查员,前往矿场集中的大冶、兴国、通山各属,调查“各地矿场属公属私,股款有无外交纠葛,卷宗是否存在,并反正后散失机件,严令刻日缴还”^③。约计保存铁矿砂2万余吨,收回机器设备等项价值“百余万金左右”。嗣又附设矿务总局,任命段守仁为总理,直至实业司成立归并管理后,方予撤销。

湖北军政府维持实业,保护工商的措施,得到省内工商业者的积极响应,并促使其陆续转向支持革命。为了帮助军政府筹措军费,刘子敬、宋炜臣等32名商会董事共同发起国民捐,其《劝捐书》称:“古人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国民之苦于专制政体者久矣,今幸民军发轫,不数月而望风景从者,已达十有余省。”“故不论士农工商,均宜同心助力,乘此千载难逢时机,以争万世和平之幸福。有勇者当以身从戎,无勇者即应以财助饷。”此次劝捐,仅在武昌、汉口两地计募得款项十数万元。1912年2月南北和议告成,实现统一。湖北军政府新设实业、教育两部,投票公选部长。日本高等工业学校毕业生李四光得票最多,当选为实业部长。实业部章程规定,该部隶属鄂军政府,掌管全省农工商矿及一切实业行政事宜,部内设参事、秘书、庶务各室和农林、工商、矿务三科。同年3月,各省政府各部一律改司,以示中央与地方之别。湖北实业部改置为实业司,内设正副司长及顾问、参事、秘书、会计各室和农、林、工、商、矿五科。实行分科办事,科以下

①②③ 《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第300页。

设课，其中工科分设劝工、惠工、考工三课，矿科分设矿务、矿计二课。李四光、曹宝仁分任实业司正、副司长。二次革命爆发后，李四光、曹宝仁辞职，实业司进行调整，下设农、林、工、商、矿、总务六科。其中工科负责主管全省模范大工厂、制革场、红砖第一厂、湖北造砖厂等；矿科负责主管炭山湾煤矿官厂、陈家湾煤矿官厂、韩家山铜矿厂、硝磺总局与大兴矿务局等。

湖北实业司成立之初，专司督促各大工厂的复工事宜。“战事平息以来，汉口商业蹶而不能复振，资本家皆不敢卷土重来。幸有省城文武官员，在公人等，以维持大局为主义，纷纷集资作种种经营。”^①实业司拨款数万元，帮助湖北造砖厂、官纸印刷局等厂家开工生产，并对原有官办或官商合办工厂一律进行整理。为了尽快恢复生产，救济失业贫民，湖北军政府还责成各属慈善团体及绅商，仿效欧美办法，创办残疾人工厂、游民工厂及富强女子工艺所等，分别招收，学习工艺，自食其力。这批工厂虽然规模有限，资微利少，但对于安置移民，恢复地方经济，稳定社会秩序，均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荆沙一带原有荆州平民工厂和荆沙贫民工厂两处，嗣因前者亏损数万元，难以继续维持，将该厂并入荆沙贫民工厂，专收本地贫民入厂做工。内设织染、缝纫、印刷、雕刻各部。又因资金不足，仅留织染、缝纫二部。“现委旗绅平春庆充厂长，办理三年，岁有亏折，又拟招商股，扩充厂房。”^②

(二)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从此揭开了近代中国以国家政权为杠杆，直接推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孙中山在就职宣言中指出：“满清时代藉立宪之名，行敛财之实，杂捐苛细，民不聊生。此后国家经费，取给于民，必期合于理财学理，而尤在改良社会经济组织，使人民知有生之乐。”^③不久，孙中山又撰文指出：中国处在大规模的工业发展前夜。这些都表明了孙中山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宏愿。同年1月3日，南京临时政府各部宣告成立，张謇出任实业部总长。该部主管农工商矿渔林牧猎及度量衡事务。为了尽快恢复各地因战乱而受到破坏的工商业，实业部成立伊始，即颁布了一系列相关的文告和法令法规，通令各省设立实业司。对于首义之区，孙中山令饬实业部，通告汉口商民建筑市场，以重振商务，安定民生，“务使首义之区，变为模范之市”。各省实业司则须

① 《时报》1912年5月24日。

② 《湖北全省实业志》，1920年版，第54页。

③ 《辛亥革命史资料》，《近代史资料》，1961年第1号第3页，中华书局1961年版。

详细呈报筹办实业情形。“凡已经创办者或急需筹办者，或暂从缓办者，分别详细呈报本部，以便确定经济政策，总筹进行方法，国利民福，胥赖乎此。”^①

发展实业，振兴中华，是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多年为之奋斗的重要目标。作为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的高峰，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虽最终被袁世凯所窃取，然而这场推翻了两千多年君主专制政体的大革命，毕竟是一次巨大的历史性跃进，不能不对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辛亥革命后，由于皇权被打倒，封建专制制度被推翻，民主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长期蕴藏在人们心中的民主意识得到表现和迸发，要求变革的主张响彻中华大地。随着辛亥革命所唤起的爱国热情和民主精神得到进一步传播，大大增强了一般民众的爱国心和责任感。振兴实业，发展民族经济，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同认识。正如孙中山所说：“今共和初成，兴实业为救贫之药剂，为当今最重要之政策。”^② 由于南京临时政府废除了清王朝专制政体对于民间资本申请开办企业的若干限制和封建性专利垄断，发展实业的良好前景，使得民族资产阶级异常的兴奋和活跃，“建设新社会，以竞胜争存”成为时髦的用语。在革命胜利之初，政局尚未稳定，一些革命党人已开始专心从事于开发实业，南北各地都出现了兴办实业的热潮。在武汉，正值民国成立，呈请开矿者，不下数十起。1912年全省官民采矿已有30余种之多。在振兴实业之声浪弥漫全国的影响下，社会资金开始转投向工矿业。由于投资实业获利较多以及投资条件的改善，社会各阶层持有资金者渐知投资于实业。很多过去奔走于政界的官僚政客和军阀转而投身于实业界。

辛亥革命所激发的爱国热情，还为国货市场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由于南京临时政府的倡导和鼓励，湖北各地的工商业者竞相以“挽回利权，杜塞漏卮”为口号积极推销国货。广大民众则为爱国热情所激励，身体力行购用国货。爱国热情，振兴实业，提倡国货三者互为交融，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潮流。即使在袁世凯窃取大总统职位后，也不得不对南京临时政府所颁布的许多振兴实业，保护工商业的政策、法令和法规予以保留，尽量作出一些鼓励发展实业的姿态。同时相继颁布了一系列推进工商业发展的章程和条例：

1. 立法保护工商业。1912年末，北京政府工商部颁布《暂行工艺品奖励章程》13条，明确规定，凡发明或改良制造品，由工商部考验合格者，得享有5年专卖权利，或给予名誉上的奖励，授予奖状。此规定取消了旧时的建厂专办陋规，颇具意义。1912年3月，农商部颁布《暂订工厂通则》，规定了劳工最低年龄和最长工作时间，禁止童工夜间工作，女子生产优待，辅助工人教育，工厂卫生安全设备等内容。该通则虽未经国会通过，但实为中国第一部工厂法。1913年12月工商、农

① 《辛亥革命史资料》，《近代史资料》，1961年第1号第3页，中华书局1961年版。

② 《孙中山全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4页。

林两部合并，改称农商部后，又陆续颁布了《公司条例》、《公司保息条例》、《改订工业试验所章程》等一系列奖励和发展工商业的条例。

2. 完全开放矿业。1914年，农商部筹设矿务监督署，作为“矿业发达的枢机”。从同年3月起，北洋政府陆续颁行《矿业条例》和《矿业注册条例》，规定：凡“中华民国人民或中华民国法律成立之法人，得依本条例取得矿业权”。对于《大清矿务章程》中仍存在着的对民族资本开矿的种种限制，《矿业条例》予以了修订。规定对于第一类矿质，如金银铁煤等，无论是否拥有地面的所有权，应以呈请矿业权在先者，有优先取得矿业权之权。条例还降低了矿业税，由原来的值百抽十，降至按出产地平均市价，抽取千分之十至千分之十五。《矿业条例》还扩大了开矿区域，从清末规定的不得超过960亩，扩大到煤矿以270亩以上，10平方里以下；其他各矿以50亩以上，5平方里以下为限。这些规定扫除了民营采矿业发展的部分障碍，对民国初年湖北矿业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影响，省内呈请开矿者不断增多。

3. 制定“机制货物减税特典”。依照此项特典的规定，不论机制货物经由海关与否，缴纳一次正税，即给以特别运单，无论运往何处，一切出口税、沿岸贸易税、常关厘金及落地税，皆予免除。这样，机制工业品与普通国货相比，课税负担大为减轻，与进口货相比，亦减少了子口税负担。特典中还对机制面粉免除一切税厘，对汉冶萍公司、扬子机器制造公司等厂矿的制品，在一定年限内，免除一切税厘。

尽管因时局多有变故，且战事连绵，上述法规条例未能全部一一付诸实行，但这些法规条例的颁布，仍对此后湖北工业渐趋进步，改良发明者日渐增多不无影响。

(三)

辛亥革命时期，武汉三镇作为首义之地，遭到战火的严重破坏。大批建筑物和公用设施被摧毁，许多工厂被迫停工。南北议和后，修复被战火焚毁的市区已成为当务之急。1912年1月25日，汉口商务总会召开会议，筹议重建汉口市面办法，与会人士一致吁请当局尽快重建汉口。同月，汉口商务总会议董宋炜臣呈文黎元洪，提出建筑汉口新市场的六项办法。同年2月，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饬令实业部，通告汉口商民重建市区，并责成内务部筹划修复汉口事宜，委派李四光为“特派汉口建筑筹备员”。湖北军政府亦任命左德明为“汉口建筑筹备员”，选派工程师，成立建筑公司筹备处，参照西方城市建设和租界区市政，绘制出建设汉口的蓝图。

1912年4月9日，刚刚辞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应湖北都督黎元洪之邀前来武汉，凭吊辛亥烈士忠魂，抚慰战争疮痍，督促恢复建设。在汉期间，孙中山除

发表《共和与自由之真谛》的演讲，宣讲三民主义外，还在湖北地方官员及胡汉民、汪精卫的陪同下，巡视了武汉三镇，重点视察了几家大型厂矿。依据对国内外经济生活的认真考察，孙中山始终认为，西方的经济繁荣与中国贫穷之间的差异，很大程度在于使用机械动力与否，实现工业化是振兴中华的必由之路。因而在湖北布纱丝麻四局，孙中山详细询问了历年的经营情况，认为四局规模宏大，设备完好，因承租商人尚未确定而造成生产停顿，殊为可惜，应尽快确定承租人选，开工生产。在汉阳兵工厂，面对因清军炮轰造成部分厂房倒塌、机器设备半数荡然、无法开工的残破局面，孙中山指示陪同前往的鄂军将领：兵工厂关系军事国防，不能仰息外人，急需组织技术力量修复，能开工的部分，应尽快修复开工。嗣又与黎元洪商谈了扩建汉阳兵工厂和建筑武汉纪念桥之事。在汉期间，孙中山还畅游了奥略楼，面对浩浩长江，产生了振兴武汉经济的许多想法，这些想法收入了他潜心撰著的《建国方略》之中。

辛亥革命后，随着清王朝封建统治的覆灭，湖北原有的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企业，大都因政体改变和市面萧条等原因而陷入困境，产权和债务纠纷颇多。除汉阳兵工厂受到中央政府保护外，多数官办工厂受到驻扎军队和战事的影响，机器设备和厂房损失严重。其间虽经当局度数整理与招商承办，但充其量仅能做到时开时辍，大多处于不景气状态之中。

1. 湖北水泥厂。辛亥革命爆发后，正拟全面开工生产的湖北水泥厂，由于受到政局突变和市场需求骤减的影响，以致产品滞销，成本加重，明亏暗损已逾40万元。因无力偿还到期债款本息，“商得日本三菱公司同意缓还”。不料，因唐山启新水泥公司意欲乘机兼并该厂，三菱公司闻讯背约，催还债款，并派员来鄂要求封厂，遭到鄂省政府婉拒后，三菱公司又以自封之说相恫吓。1913年3月，因湖北水泥厂仍不能按时偿付日商第四期债款，三菱公司抛开湖北、吉林两省其他债务人，在上海、武汉两地控告湖北水泥厂，要求立即查封该厂所有财产，限一周内清偿欠款，逾期则应变卖财产偿还。同月，又有吉林省官钱号电函鄂省政府，告湖北水泥厂欠该号官银70余万两，请求封厂清资。此时，上海官署已予立案，因程祖福等人传唤不到，遂查封湖北水泥厂在沪股票、有价证券和账据。一月之内，日本驻汉口领事三次到湖北都督府询问此案，强求封厂。鄂省政府认为日方的要求“义正词严，无可拒驳，又恐滋生事端，有关国体，只得允如所请”。遂于同年3月25日派员将水泥厂查封。

湖北水泥厂被查封后，省内外舆论哗然。《捷报》自大冶报道：“湖北水泥厂被关闭使石灰窑各界感到非常失望。”^①汉口《震旦日报》则刊登《实业危哉水泥厂》一文，详细报道此案经过。省内各界保护实业，解救工厂的呼声四起，但因各方利

^① 《捷报》1913年5月3日。

益互相牵制，水泥厂股东仍无法筹到款项。鄂省政府及省议会有关收归官办或招商承办之说，也只能是徒托空言。此时，三菱公司登报拍卖水泥厂资财，并暗中购买省实业司要员，出资开设日华公司，欲假其手承买该厂产权。1913年末，程祖福为避免水泥厂落入日商之手，不得不经吉林省官银号中介，接受北洋保商银行的苛刻条件，以公司资财作抵，并将经营权托管，方获得20年长期贷款合同。嗣由农工商部为债务人作保，先将湖北水泥厂启封，交付保商银行，此后由该银行支款，偿清日商和吉林官银号的债务。此时，启新公司深恐湖北水泥厂产权再度落入外商之手，影响其南下经营的发展战略，经过反复权衡，于1914年借华丰实业社之名，以140万两银从保商银行获得该厂抵押品及托管权的转让。旋即派员南下主持厂务，改厂名为华记湖北水泥厂，调整人事和生产结构，聘用外国技师，添置磨机、空中运输索道等设备，使年生产能力扩大到4.5万吨。适逢粤汉铁路湖北段工程进入施工高峰期，加之其他方面的需求增加，水泥订货上升，该厂生产渐入佳境。

2. 布纱丝麻四局。自1902年招商承办，租给应昌公司后，布纱丝麻四局营业尚佳，颇有获利。不料20年租期未满，湖广总督瑞澂借该公司自以股票向本公司押款，办理不合，勒令于1911年解散，随即转由以张謇为首的大维公司承办。大维公司开工不及一月，武昌起义爆发，四局停工，“员司星散，机件耗散甚多”。^①鄂督黎元洪以四局经张之洞苦心筹办，所费几达千万，“鄂人赖以资生者不下数千户，若任听废弃，不独数千工人失业堪虞，即公家财产亦大受损失，故于军务倥偬之际，仍委费渠为监督，拨给官款，接续办理”^②。此时，应昌、大维两公司均以租期未满而要求续租，争执不已。黎元洪遂令武汉工商巨子集会汉口商务总会，“以四局为鄂省实业命脉，力主不租大维，亦不租应昌，由鄂人自行办理”^③。旋由与黎元洪关系甚密的德厚荣商号副经理徐荣廷代为出面承租。议定每年租金11万两银，租期10年。纱、布两项产品在武汉出售，概免厘税，如转运他埠，则在江汉关只完正税，沿途概免厘税，且仍存湖北官局名义。德厚荣商号通过徐荣廷取得四局承租权后，遂发起组成楚兴公司予以接办。公司董事会由刘象羲、徐荣廷、刘歆生、蒋霖林、周星棠等13人组成。拟招股130万两，实收78万两。公推刘象羲为总理，徐荣廷为总经理。经对厂务力加整顿，使得营业日见发达。“兹该经理徐君，以近日布匹销售甚旺，各工厂纷纷催购，每日出布无多，殊难敷用，故近来增开夜工，并延长时间，以资工作。”^④

3. 京汉铁路江岸机器厂。该厂创办于1901年，初为芦汉铁路修理火车头、车厢及路用配件所设，仅有40马力蒸汽机一部及各类工匠40余名，厂长是法国人。芦汉铁路通车前夕，因大批铁路器材运抵汉口，急需组装，该厂一度有工人300余

①②③ 《湖南实业杂志》1年2期，《中国实业录》第2~3页，1912年7月。

④ 《时报》1913年6月13日。

名,成为刘家庙一带最大的工厂,被称为“江岸机务大厂”。辛亥革命后,该厂由中国政府予以接管,但仍由法国人杜拉克担任厂长。由于连年的军阀混战,铁路军运频繁,进厂修理的车头、车厢骤增,且工期异常紧迫,然而工人收入却未见明显增长,生活异常艰辛。

1913年12月,袁世凯派遣陆军总长段祺瑞前来武汉,以“磋商要政”为名,胁迫黎元洪离汉赴京。12月10日,北京政府发布总统令,派段祺瑞权代湖北都督。湖北从此进入军阀统治时期。由于政府动荡,内乱不止,加上地方势力抬头等原因,湖北地方政府对于发展工矿事业,既无统筹规划,又无一定方针。原有官办工业愈呈萎缩,有的封闭,有的租让,厂房机器很多已残破不堪。张之洞昔日苦心经营的近代工厂,除汉阳兵工厂仍属国有外,多数因资金不足、经营乏术而改归民营,或另作他用。如武昌模范大工厂被改作被服厂,武昌造币厂被长期封存,后改作省农具制造厂,汉阳针钉厂则在长期关闭后,交由省立三中使用。

发轫于甲午战争前后的湖北民营工业,虽在武昌起义和阳夏战争中蒙受损失,但与民国初年官办工业日趋萎缩的状况相比,民营企业却因经营灵活而得到较快的恢复,在民国初年产业革命热潮的推动下,新厂竞相设立。

1. 织布业。民国初年“提倡实业,振兴国货之声浪,高唱入云,始有正式织布工厂之设立焉”^①。机器织布厂在全省各地迅速发展,尤以荆沙等地最为突出。“查湖北与江浙闽粤数省,同系织布之区。虽旧用木机劳力殊甚,然如长江上游所织之荆沙布,年年分销沙市或江口一带者,至少亦不下十四五万担,则内地一带织业之盛,销数之畅亦可想矣。”^②1913年,荆州人来敬臣与本地匹头商号合股,创办沙市第一家机器织布厂“西亚织布厂”,有织布机器50台,主要生产白土布、蚊帐布等产品。翌年,吴子敬创办沙市“云锦机器织布厂”,购进日本产“丰田”牌织布机28台,使用蒸汽机作为动力,生产各种白布、色布。在武汉三镇,1912年秋创办于硚口的“积兴织布厂”是辛亥革命后武汉新建的第一家机器织布厂,有铁木布机30台,生产花色布匹。到1913年,全省已有纺织印染厂120家,占全省工厂数的1/5,有职工7605人,比清末有了较大的增长。这一时期全省的手工业纺织业也有较快的发展,染织作坊增加到31家,工人约260人;棉织业38家,工人448人。此间创办的以手工织造为主的作坊和工场,使用的大多已是改良后的手拉脚踏织布机,其中铁木混合脚踏织机的比例明显上升。“初时出品尚不十分精美,市上普通称呼为爱国布、电光布无花纹,各种颜色具备,电光布花色甚为可观,妇人孺子及之乡客路均能畅销,业此者遂日臻发达。”^③

2. 针纺织业。汉口开埠之初,即有进口机制针织衫从广州、上海等地流入武

①③ 《湖北实业月刊》第1卷,第20号第91页,1924年10月。

② 《最近中国棉业调查录》,湖北省,第75页,1920年。

汉，初为少数上层人士所青睐，不久即为越来越多的民众所喜好，江汉关输入针织品总值逐年上升。1908年，德国吉兴公司“蝴蝶”牌手摇袜机开始在武汉销售，经销一年有余，售出300余台，武汉三镇始有织袜作坊。1912年，武汉、上海商人在汉口仿制德国袜机成功，月产量达到100余台，由于此种仿制袜机价廉物美，每日可产袜1打，深受商界和机户喜爱而迅速推广，湖北手工针织机由此而兴，并从武汉向省内各地扩展。如沙市第一家针织厂“大丰裕”袜厂投产于1913年，计有德制“蝴蝶”牌袜机5部，工人20余名。但此类作坊设备简陋，组织较为简单，均系独自经营，自为厂主。即使有合伙经营者，也仅设一名经理管理全部厂务，绝大多数是前店后场，同业相聚，形成了早期的专业市场，如汉口的袜子街。袜坊的工人主要是临时工和季节工，采用旺季雇工生产，淡季歇业停工，主要产品为10支、16支线袜。

3. 机器修造业。以机器为生产手段的新式工厂的产生和发展，必然需要相应的设备维修和配件供应。民国初年，随着使用机器部门的不断增多，全省民营机械修造业继续有所发展。不仅在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方面逐步提高，同时在修配、仿造甚至改造引进设备方面，不断有所创新。周恒顺机器厂仿制成功的25~30、50~60和80马力新型煤气机，不但可用白煤为燃料，还可用木炭、木柴、糠壳替代，满足了各种小型发电、碾米、榨油工厂的需要。1914年，该厂改名为“周恒顺农工路船机器制造厂”，为武汉轮渡公司制造小火轮10余艘，各种产品遍销江西、四川、甘肃、湖南等省。扬子机器厂亦于民国初年购置了大马力煤气机、发电机等设备，扩充了炼铁炉和厂房，修建了一条长达125英尺的滑道，专供造船之用。随着整个工厂规模的进一步扩大，生产能力明显提高，在此基础上，陆续完成了铁壳船、拖驳及拖轮、铁路桥梁、岔道及辙尖、钢铁结构工程及修理工程等大量订货。

机器工业取代手工业，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近代机器修造业的兴起，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古国而言，更具重要意义。辛亥革命前后，湖北近代工业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奠定了初步发展的基础。但相对于广大的农村地区而言，新式工业尚未能普及。手工业生产仍在全省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十三、抗日战争爆发前的武汉及湖北工业

湖北近代工业以武汉为主体，其发轫于清末，初创于光绪宣统年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得到较快的发展。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转嫁经济危机所造成的破坏，加紧了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侵略和剥削。湖北工业因而受到严重冲击，产品大量积压，许多厂矿被迫减工减产，加之1931年和1935年两次特大洪水袭击全省大部，损失异常惨重，湖北工业大受影响，“各业工厂中，出品减少者，占百分之九十八”^①。严峻的经济形势迫使湖北工矿企业奋起改革，谋求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图自保，企业的科学管理和生产经营合理化，日益受到工业企业管理人员的重视。

（一）

湖北民营工业以纺织业和面粉业规模最大，其中纺织工人约占全省工人总数的70%。但是在纺织业和面粉业内部，却仍存在着众多设备简陋的小厂，即或民生、一纱、震寰等大型纱厂，亦因资金和技术等方面的原因，处于设备落后、生产效率偏低状况之中。生产技术和企业管理方面的劣势，最终会转化为产品在市场上的劣势。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华日资纱厂每枚纱锭年产棉纱84.1公斤，湖北纱厂则仅为78.02公斤；上海日资纱厂每万锭用工最多为180人，武昌第一纱厂则为608人，沙市纱厂更达631人。由于纱锭单产和人工费用等因素，造成华资纱厂成本普遍居高不下。据棉业统计会调查，1934年以20支纱为标准，除原料费用外，其制造费和经营费，华资纱厂每包成本43.70元，日资纱厂仅为20.40元，相差1倍以上。其中工资、动力、机物料消耗，从低到高依次为：日资纱厂11.7元，华资纱厂19.5元，裕华纱厂27.21元，第一纱厂37.9元。面对严峻的经营形势，湖北工矿企业为摆脱困境，采取了一系列改进措施。

1. 改进设备，提高技术。面对在华日资纱厂的强大压力，湖北各华商纱厂为求生存，不得不竭力改进设备和生产技术，培养和训练技术力量，以提高生产水平和产品质量。裕华纱厂为了提高生产技术，将公司得力的技术人员改名换姓，以工

^① 国际贸易局：《武汉之工商业》，1933年，第26页。

业学校实习生的名义,派往日本仙台等地学习纺织技术,并将日本纱厂先进的浆纱机偷绘成图,带回国内仿造。鉴于日本各纱厂均已改用大牵伸细纱机,使生产效率大为提高,裕华纱厂决定如法改制,以利出品;同时决定改换高压电机以节省用煤,惟两项同时举办,非60万元不可。“兹拟将原动力暂时放弃,专心致力于大牵伸,其放弃原动力之决议,乃因目下搭烧柴煤尚为划算,故原动力可以缓议。至大牵伸利益,可加纱锭八千枚,不加房屋,不加马力,将来生产成本可冀减轻也。”^①到1936年,裕华纱厂细纱机已全部改装大牵伸,生产费用因而大为节约。“粗纱机减少后,空出了厂房,细纱机还可由原来的42 800锭子增加到50 000锭子;经添置开棉机及棉箱给棉机后,原棉的杂质、破籽大为减少,细纱机改大牵伸后,纱支色泽、条杆亦好,质量明显提高。通过这一改进,一举收到了降低成本、增加生产、提高质量等三方面的效果。”^②

2. 引进和培养人才。注重引进和培养人才是提高企业竞争力的重要保证。面对20世纪30年代初期国内外纺织业的激烈竞争,越来越多的有远见的企业家日益重视优秀人才的引进和培养。以敢于大胆使用人才和培养技术干部著称的裕华纱厂为例,为了渡过难关,苏汰余、张松樵等人极感引进人才、改进技术的迫切。苏汰余在股东会议上急呼:“纺织业值此难关,非锐意刷新,力图补救,殊不易立足也。”^③他力排某些守旧势力的阻挠,先后从南通纺织学校、上海恒丰纺织学校及西北工学院等处,引进了一大批专业人才,有的送出国门深造,有的则派往日本和津沪纺织厂参观学习。在这种重视人才的氛围下,楚兴纺织专科学校校长石凤翔出任大兴石家庄厂经理、大华西安厂经理,进而提升为裕大华三公司总经理,为企业的发展和更新作出了贡献。

3. 开拓市场,争取用户。中国棉纱、布市场一向是日本经济侵略中国的重点所在,兼并华商纱厂,独占中国棉制品市场份额,始终是日本工商界梦寐以求的目标。1931年长江大水后,日本棉纱从华北及沿海一带压向汉口,与沪汉华商纱厂争夺长江中上游的棉制品市场。日本棉纱的大举倾销,造成湖北各华商纱厂的极大困难,其中对占有汉口市场棉纱成交额45%的裕华纱厂影响最大。由于日商一再杀价倾销,汉口棉纱、布市场已被夺去大半。为了打退日商咄咄逼人的进攻,湖北工矿企业进行了艰苦的斗争。裕华等纱厂一方面同日商泰安纱厂展开针锋相对的市场竞争,一角、一分,毫不退让;另一方面则改进经营方式,积极开拓四川、河南、云南、陕西等地市场,采取设庄、请人代销、加大回佣、分成结算、产品加码加重等方式来刺激销售,疏通经销渠道。武汉各纱厂纷纷在四川设立分销处,为争取川省用户,第一纱厂将10支粗纱每小包重量从4.54公斤加重至4.99公斤,裕华纱厂更加重至5.22公斤。与此相仿,福新五厂等面粉厂家为了开拓省外面粉市

①②③ 《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史料》,第137~138页。

场,十分重视提高产品的质量,力求用稳定的质量来推动销售量的不断提高。该厂对原料选购、仓库保管等方面均作出严格规定,对于混有热坏麦粒、砂石、杂质的小麦,不惜雇工拣选,严格把关,保证出粉色泽白、韧性好,所产牡丹牌面粉因声誉颇高,远销省内外市场。

4. 适时改进经营方式。20世纪30年代初期,鉴于银行资本大量从工业部门中撤离,投向更有利的仓储押款等行业,湖北许多企业被迫从已经十分吃紧的资金中抽出一部分来,从购、销两方面进入流通。武汉各大纱厂、面粉厂除竞相派员前往棉花、小麦产区收购原料。第一纱厂还在武汉三镇设立了7个门市部,1935年售出棉纱12万余件,而同期通过商号售出者不到4万件。很多进入流通领域的产业资本,还在销售方面走向联合。如武汉仅存的4家机制砖瓦厂,共同开办了联合营业处。五大染厂中除美昌被申新四厂兼并外,其余4家也组成了联合营业处。裕华等纱厂在与日商的激烈竞争中,通过对日商泰安纱厂经营特点的认真分析,以及由主管人员亲自进行市场调查后,清醒地看到了企业自身的长处和短处,从而能够相机采取正确的对策。当了解到本厂所产棉纱存在着“搭头多、结头多、纱色不好”等缺陷,织户普遍反映泰安纱厂所出棉纱均用接头,标以红线,织户省工省时后,裕华纱厂随即加以改进,将搭头改为接头,改用红线作腰线,醒目易找,受到织户的欢迎。1935年秋,因霜降过早,山西棉花大多成为霜黄花。尽管其纤维、衣分等均属正常,惟因颜色发黄,市价较一般白花每担低出10元左右。裕华纱厂抓住时机,大量买进,织成12磅莲鱼牌细布,染成青、蓝深色,与用白花所织棉布别无二致,以6元至6.5元一匹的价格推向市场,同泰安纱厂的“世乐鸟”牌细布在本省市以外的市场上展开竞争,大获全胜。

5. 死中求生,弃旧图新。1933年3月29日,申新四厂工人在检修细纱车间机器时,不慎引起大火。纱厂木质车间从钢丝到成包全部焚毁,引起极大震动,损失惨重。在这突如其来的打击面前,李国伟提出“死中求生,出奇制胜”的复兴计划,并遍请上海各大机器厂派员来汉,修配烬余机件,更新主要零配件。经过一年多的时间,修出2万余纱锭及前后配套设备。经荣氏兄弟增资70余万元,向中国银行借款210万元,购入英国泼拉脱纱机2万锭,3000千瓦发电机及锅炉全套,另建钢筋水泥厂房,以防火灾。到1934年12月,该厂纱机已全部开出,此次火灾虽属大不幸,但经过复工过程中的一系列整改,企业却获得了新生。首先是将一批平素贪图安逸的老职员全部予以解雇,并铲除了车间封建把头势力,通过大规模招收和培训20岁以下的女工,职工队伍趋向年轻化和知识化,更易于接受新的操作方法,生产效率明显提高。复工后,该厂4万纱锭仅用工1200人,布厂用工300余人,而火灾前3万纱锭用工计达2000余人,布厂用工1200余人。同时,申新四厂在火灾之后,生产车间也呈现出新气象。机器排列成行,巷道四通八达,全部机器改为马达单独传动,一扫过去无轴皮带传动时的乌烟蔽天。所出32支彩四平莲

和 12 磅绿双喜轻质细布等优质产品，颇受市场的欢迎。在企业管理方面，该厂复工后制定了一整套规章制度，实行文明管理和科学管理。为了激励工人提高技术水平，厂方每年对挡车工、落纱工进行技术测验或操作竞赛，对成绩优秀者给予物质奖励或提前升级。在提高工人福利方面，计有膳食补贴、惠工宿舍、职工医院、职工消费合作社、职工储蓄所、职工子弟小学等。1936 年，该厂又陆续购进新旧布机 475 台，美昌漂染厂机器全套，添购蒸缸、轧丝光机、多滚洞轧花机、刮绒机等设备，建成第二布厂和染整厂，成为国内仅有的几家拥有纺织漂染的全能企业，大大增强了市场竞争能力。

6. 裁减冗员，提高效率。机构庞大，冗员充斥，滥用私人，效率低下，这是一般官办企业的典型特征。象鼻山铁矿是省建设厅属下规模最大的官矿。1931 年“九一八”事件后，省建设厅决定象鼻山铁矿所产矿石不再运销日本。为了维持该矿正常的经营活动，同时决定压缩象鼻山铁矿生产规模，主要采取了下列 3 项措施：（1）裁减冗员，更新那些服务长久、工作懒散的技术人员和行政人员。（2）改经理制为处长制，另行分科设组，理顺机构。（3）将原来由建设厅直接管理的营业权，划归象鼻山铁矿自主管理，扩大矿山的自主权。通过上述措施，象鼻山铁矿在失去日本的传统市场，改以供给国内市场为主的情况下，仍然能继续维持生产，并在提高效率的前提下，保证了矿山的生存和经营。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沙市纱厂。1933 年，毕业于湖南高级工业学校的肖松立，辞去申新四厂工程师一职，受聘担任沙市纱厂经理，上任伊始，决心调整该厂庞大臃肿的机构和人事。首先裁减冗员，改旧式工头负责制为职员负责制，将全厂职工人数从 1 400 余人减至 970 人，并对主要科室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选拔精通业务的人充实这些机构。其次，通过制定有关的规章制度来强化劳动纪律，并实行了奖惩分红制度。经过一系列整顿，沙市纱厂的经营状况大为改观，产品质量显著上升。该厂的荆州牌棉纱名扬鄂西北一带及西南各省，产品供不应求。1935 年，该厂对动力设备加以改进，使生产效率进一步提高。在 1936 年和 1937 年的两年中，不仅还清了 100 余万元欠款，还获纯利 150 余万元。此间，江浙一带许多华商纱厂因日纱倾销而相继停闭。沙市纱厂却能通过提高生产效率而照常开工。职工不但发放薪水，还可依照规定发放红奖，因而获得各方面的一致好评。

7. 加强管理，堵塞漏洞。湖北近代工业在其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中，除备受封建势力束缚外，同时作为传统农业社会中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也有一个被接受和磨合的过程。襄阳民众电厂创办于 1933 年，由于使用电灯照明在当地尚属首次，因而创办之初，开机送电等一切均属顺利，各机关、商店竞相安装电灯，营业收入尚属可观。但不久即发现电灯亮度不足，从电流表、电压表判断是有人偷电。于是，电厂员工全体出动，挨户检查，结果发现专署、县府和法院中皆有偷电户，驻军各长官家中，更是家家违章用电。该厂只能由厂长出面，前往各公馆衙门礼下求

情，陈明利害，以免电厂垮台。经过反复求情、宣传和严格检查，才陆续收回了电费差价，并使偷电现象大幅下降。到 1936 年为止，该厂连续 3 年盈利。

(二)

自 1935 年下半年起，席卷全球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趋于缓和，各国经济逐渐复苏。在国内经济形势渐趋好转，各项新的恢复经济措施陆续实施的形势下，湖北工矿企业生产逐步走出低谷而迅速复苏，进入了新一轮较快的发展时期，许多主要生产指标达到了 1949 年以前的最高水平（见表）。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新的兴办工厂热潮。1935~1936 年，全省新建工厂约有 120 家。到 1936 年 8 月，全省依照工厂法登记的工厂共有 554 家，其中民营 534 家，国营和省营 20 家，资本总额为 6 146 万元，年产值约为 2.03 亿元。在上述工厂总数、资本总额及年产值中，武汉均占有各项指标的 90% 左右，其余则主要分布于沙市、大冶、武穴、宜昌等地。

1936 年湖北省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产品名称	单 位	数 量	产品名称	单 位	数 量
棉 纱	吨	15 677.5	石 膏	吨	40 180
棉 布	万米	4 493	砖	万块	3 000
生 铁	吨	1 400	瓦	万片	480
铁矿石	吨	416 000	肥 皂	箱	660 000
发电量	万度	11 907	火 柴	件	107 600
原 煤	吨	490 200	硫 磺	吨	250
水 泥	吨	34 900	制 茶	吨	299
食 盐	吨	14 000	大 米	吨	203 617
卷 烟	条	113 389	面 粉	吨	162 677

综观抗日战争爆发前湖北工业的发展轨迹，尽管历经艰辛和曲折，但总的趋势仍是不断有所发展的。由于“救济工业”等一系列措施陆续推出，加上 1936~1937 年湖北农业连年丰收，城乡经济形势全面好转，湖北近代工业的整体水平终于达到旧中国的最高峰。

1. 抗战爆发前湖北工业的内部结构和布局

从全省工业行业的比重看，仍以纺织、食品工业的比重和规模最大，发展最快。如同任何使用机械的变革，必然首先并最迅速地在获利最大的领域出现一样，抗战前湖北工业中首先繁荣并始终占有绝对优势地位的，是向社会多数成员提供大宗日用生活必需品，且回收投资较快的纺织和食品行业。全省按工厂法登记的 554 家工厂，分属水电、冶炼、金属品、机器、电器、木材、土石品、化学、饮食、烟

草、纺织、服饰、文化、军火等 16 个行业。其中以纺织、烟草、饮食品和水电业规模最大，分别占工业资本总额的 23.62%、19.45%、11.74% 和 7.28%，纺织业实力明显居全省工业各行业之首。以纺织、食品、水电、机械、建材等行业为主体，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近代工业体系和布局。除武汉三镇集中了全省 80% 以上的工厂企业、工业资本和工业总产值外，其余主要分布在沙市、宜昌等地。

1937 年湖北全省工业统计①

单位：元

地 区	厂 数	资 本	工 人 数	年 产 值
汉 口	408	39 827 548	21 285	157 561 024
武 昌	58	5 886 800	15 990	23 429 273
汉 阳	50	1 533 200	6 568	7 549 740
广 济	10	82 000	75	45 000
江 陵	6	2 961 500	1 836	13 950 000
蒲 圻	5	300 000	5 000	500 000
大 冶	2	12 600	711	
光 化	2	110 000	19	1 600
宜 昌	1	400 000	39	135 000
应 城	1	800 000	8	15 000
沔 阳	1	800 000	8	15 000
襄 阳	1	39 000	10	12 000
荆 门	1	30 000	4	
宜 都	1	15 000	5	9 100
随 县	1	8 000	3	3 600
总 计	548	51 365 648	46 563	203 231 737

2. 民营工业的比重上升

湖北自汉口开埠后，由于对外贸易的迅猛发展，新式工业渐次开发。鉴于西力东渐，日本维新，张之洞等人认定发展实业，为自强之要图，于是延揽各国技师，创办各式工厂，“故斯时官办之工厂，尤极一时之盛”。但“规模已具，年有亏折，是办理人误以官法经商，非创办人之过也”^②。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历史条件，决定着国家政权必然扮演中国工业化组织者的重要角色。但这种历史的必然性，并

① 转引自《湖北省志》（工业）上，第 24～26 页。

② 《湖北全省实业志》卷 3，第 63 页，1920 年。

不意味或保证所有半殖民地国家的政权，都能领导工业化走向成功，湖北近代工业的发展历程证明了这一点。尽管在张之洞的主持下，清末湖北工业之盛，甲于全国，拥有当时规模最大的官办冶金、纺织企业——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湖北布纱丝麻四局，以及一批颇具规模的近代工厂，但因计划不周、经营失当、所用非人等原因，除纺织、兵工等厂外，这批官办工厂大多未能逃过亏蚀严重、无法维持的命运。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纺织、面粉业为代表的民营工业的长足发展，使民营工业成为这一时期湖北工业的主体。到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湖北以其适中之地位，丰富之土产，便利之交通，仍是国内工业投资的重点地区之一。许多在国内各行业处于领先地位的大型企业集团，均在湖北境内设有工厂（见表）。有的更是以武汉为主要基地向外发展，如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的情况即如此。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在湖北设有工厂的企业集团

行 业 名 称	工 厂 名 称
棉纺织业	申新第四纺织公司、裕大华纺织公司
面粉业	福新第五面粉公司
卷烟业	颐中烟草公司、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建材工业	启新洋灰公司湖北水泥厂
火柴业	大中华火柴公司汉口炎昌火柴厂
食品业	冠生园罐头食品公司

3. 采用机器生产的比例明显提高

没有一个工场手工业时代，是中国工业化迟缓的一个原因。但随着近代工业的逐步发展，很多传统手工业也有所发展，同时又有一批新的生产行业从国外引进，如火柴、制洋皂、西药、铅石印刷、搪瓷、织袜、毛巾、油漆、化妆品等，全都是原来中国所没有的，堪称近代工业。尽管这批新的生产行业在引进后，许多生产环节改用手工业生产，大多成为手工工厂，但却为采用机器生产留下了很大的空间。与此同时，以汉口为中心的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相应地带动了一批新的加工工业的出现，如肠衣、猪鬃等。在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这一时期越来越多的民族资本家采用改良生产技术和改革管理办法等措施，以提高产品质量和劳动生产率；并有越来越多的手工业工厂改用动力机器生产，如榨油厂改土榨为机器压制，手工织布改手织为机织，出现了一批使用动力铁机织布的工厂。应城膏盐业在使用柴油机代替畜力汲卤获得成功后，采用机器汲卤者日见增多。

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尽管湖北近代工业经过近七十年的曲折发展，已经具备了较为坚实的基础，并在传统农业社会重农抑商、重本抑末的氛围中越来越获得认

同，然而也应看到，湖北近代工业的整体水平依然不高，结构不尽合理，各部门之间、部门内各行业之间，直至行业内部各生产环节之间，发展十分不平衡。受到投资规模和回收投资时间长短的影响，抗战前的湖北工业，呈现出明显的重工业落后于轻工业，制造业落后于加工业的特点。

十四、民国年间汉口棉花市场

汉口是近代中国内地最大的棉花集散市场和消费市场。近代汉口棉花市场的发展和演变，无疑是中国近代区域经济研究中一个值得认真探究和总结的重要课题。

（一）

汉口地处长江、汉水交汇之区，“道通九省，冠盖辐辏”^①，清朝中叶即列国内四大商业名镇之首，“为楚中第一繁盛处”^②。近代汉口棉花市场的长足发展是湖北植棉业迅速崛起的直接反映，它大致以甲午战争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湖北是近代中国植棉业比较发达的省区之一，具有较长的植棉历史。自宋末元初棉花从下游的江浙地区传入，经过元、明二代的逐渐推广，到明中后期已得到比较广泛的种植。有清一代，湖北全省植棉区域扩大到七府四十余州县，“惟宜、施所属各州县有不能种此者。自荆州安陆以下则为出产之大宗。汉黄德三府尤盛”^③。由于棉花具有“比之蚕桑，无采养之劳，有必收之效；撝之台芒，免绩之工，得御寒之益，可谓不麻而布，不茧而絮”等优点^④，到鸦片战争前已取代丝麻，在民间纺织原料结构中占主导地位。然而，由于几千年传统自然经济的束缚，农业耕作技术粗放，生产水平落后，鸦片战争后鄂棉生产发展的整体速度仍十分缓慢。“彼时民智浅陋，交通亦不甚便利，并无大量的收获与输出。”^⑤特别是农村中耕织异常紧密的结合，造成棉花生产自给比例高而商品率低的特点。土布成为棉花主要的消费形态。手工纺织后剩余的棉花，大部分又只在墟集市场上流通，属于小生产者之间的余缺调剂，最后能够进入长途贩运的仅占整个棉产很少的一部分。

市场的水平是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志。甲午战争前鄂棉的产销情况不仅制约着棉花生产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同时由于“地方上棉花消费之额甚大，故产棉之地

①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72。

② 乾隆《大清一统志》卷261，《汉阳府·关隘》。

③ 民国《湖北通志》卷24，《舆地·物产》。

④ 王桢：《农书》卷25。

⑤ 伊炳骞：《鄂西棉产概况》，《沙市棉检》调查，第81页。

棉花，殊不易集中于大都市”的影响所至，区域性的棉花大市场迟迟未能形成。汉口市场虽很早就有关于棉花交易的记载，但直到 19 世纪 80 年代，每年的棉花流量仅在 20 万担左右。其中除邻近的黄冈、孝感等县所产部分外，江浙及进口棉花还占有相当的比例。“从前长江一带，多不种棉，故川湖处之销场，悉取资于滨海各埠。”^① 由于流通数额不大，直到 1891 年，棉花在汉口海关册上仍归入杂货类，未居重要地位。甲午战争后，随着帝国主义在华工业投资迅速扩张，中国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进一步解体，国内棉花流通市场发生显著变化。由于日本大量收购华棉，中国棉花出口量逐年增加，英、日二国相继在华兴建纱厂后，上海等通商口岸棉花需求量亦不断增长。与此同时，中国近代棉纺织工业在外国资本经济侵略的冲击下开始兴起。1890 年上海织布局投产，1892 年湖北织布官局开工，到 1900 年，国内中外纱厂已有纱锭 49.7 万枚，年用棉量超过 100 万担。甲午战争前后，这一系列新的情况，一方面使北棉南运、东棉西运的传统流向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刺激着国内棉花种植业进入了一个较快的发展时期，其中湖北植棉业的发展尤为显著。1895 年汉口棉花输出总值仅有 52 万关两，1912 年则达到 700 万关两，17 年中增加了 12 倍。1919 年汉口棉花输出第一次突破百万担大关，达到 116 万担。到 1925 年汉口棉花输出总值一项，已超过其他五种主要输出土货价值的总和，如下表所示：

1902~1929 年汉口六种主要输出土货价值总和 单位：百万关两

时间	茶	芝麻	棉花	桐油	生牛羊皮	大豆及制品
1902	9.7	2.6	2.1	3.0	3.3	3.3
1912	17.0	11.5	7.0	7.0	6.6	11.0
1925	8.9	1.1	50.5	21.6	6.4	3.3
1929	17.5	6.1	75.9	23.2	12.9	7.0

昔日“茶之汉口”、“芝麻之汉口”一跃变为“棉花之汉口”。造成甲午战争后汉口棉花市场迅速发展的直接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农村自然经济渐趋解体。甲午战争前，湖北农村基本上停留在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状态，农家植棉多为副业，很少与市场发生联系，“居乡者必兼农，为农者必兼织，广植木棉，农隙即率妇子昼夜纺绩。安土重迁，无远商行贾”^②。甲午战争后，随着机制棉纱销路日广，农村自然经济结构开始瓦解，采用洋纱织布者愈见增多，家庭手纺土纱的地位被逐步取代。大量棉花开始从千家万户的纺车上转

① 《论沪上新花市面》，《字林西报》光绪十五年九月初八日。

② 民国《湖北通志·风俗》。

移出来，城乡间纱花对流的速度明显加快，这就为产地棉花的大宗输出创造了条件，成为汉口棉花市场迅速发展的基本前提之一。

第二，新的、更大的销售市场的出现。商品流通是商品生产的起点。甲午战争前，湖北棉花的主要销路局限于内地市场，大多销往西南缺棉各省。到 19 世纪 80 年代末，受到廉价洋纱、洋布大量涌入内地市场的影响，鄂棉传统的西南市场已呈萎缩，“向来四川、湖南、陕西皆销湖北棉花，湘江沿汉岁运甚多，实为鄂民生计之大宗。近年洋花、洋纱、洋布南北盛行，鄂省花布销路顿稀，生计大减”。^①甲午战争后，上海等沿海城市棉纺工业蓬勃兴起，用棉量逐年增加，不得不仰仗内地产棉各省。1904 年汉口市场集散的 113.5 万担棉花中，除本地布纱二局留用 10.8 万担，运销四川 3.9 万担，销往湘、滇、黔三省 21.6 万担外，其余 77.2 万担全部运往上海和出口日本、德国。从上述数字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湖北外销棉花传统的西南市场，已逐渐被沿海及海外新的、更大的市场所取代。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内兴建纱厂热潮的兴起，汉口棉花市场更是急剧扩张，棉价扶摇直上，从战前每担最高不过 25 两银，猛增至 1918 年的 40 两银以上，“十年以前，湖北棉花出口无多，农家植棉，率以供给本地销路为度。近年棉花出口日多，大利所在，农家多以稻田、旱田改种棉花，从前素不产棉之地，亦以产棉闻矣”。^②

第三，陆地棉种的引入。“棉花一物，功用最普，允宜提倡，已收利权。其籽种之采取，尤关重要”。^③到 19 世纪末，湖北植棉虽有 600 余年历史，但棉花多为土种粗绒，纤维质硬短粗，不宜机纺。1892 年张之洞为解决布局原料来源，多用本省棉花，先后两次从美国购回陆地棉种，试植于省内主要产棉州县。1914 年张謇出任农商总长后，提倡“棉铁救国”，颁布奖励植棉条例，开办棉花试验场于武昌等地。湖北省实业厅亦于荆州、钟祥等地设立棉场，分任鄂西及汉水沿江一带棉花品种的改良与推广。1918 年全省细绒美棉产量已达 80 余万担。陆地棉种的引入不仅提高了鄂棉的单产，同时由于适宜机器纺织需要，从而大大提高了棉花的商品率，为汉口棉花贸易的发展创造了条件。1920 年，盛产美棉的襄阳县产棉 20.34 万担，除 850 万担留作本地自用外，其余全部下运汉口。

（二）

自然经济的解体和商品市场的扩大，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决定性条件。进入 20 年代中期后，在国内外市场需求量不断增加的刺激下，汉口棉花市场进入全盛

① 《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 29。

② 《中外经济周刊》第 110 号，第 1 页，1925 年 5 月。

③ 《农商公报》第 81 期，《政事》第 10 页，1921 年 4 月。

时期。棉花流转量常年保持在 200 万担左右。1923~1929 年的 7 年中,除 1927 年因沪汉交通一度中断,棉花外运略有减少外,每年输出棉花均在 100 万担以上。其中 1926、1928 两年分别达到 190 万担和 240 万担之多,占同期全国各口岸棉花输出总额的 40% 以上,列国内三大棉花集散市场之首,“其兴盛可知”。由于棉花的大宗输出和优越的地理位置,汉口棉花市场的集散范围和市场结构都发生了定向性的变化,形成了以汉口为中心的华中地区棉花集散网络,其集纳范围遍及湘鄂豫陕晋五省。湖北全省棉花此间“除留各地被絮衣花之用,约年需 50 万担及极少数自宜昌运销四川,一部分自沙市迳运上海外,均行运汉口”^①(见下表)。运输工具则“自产地之肩挑驮载以至集散市场之轮船火车,色色俱备”^②。汉口市场输出的棉花中,以下运上海者为最多,九江、青岛等地次之,直接出口者以日本为大宗,香港、美国等地次之。

产 区	产地集散市场	数量(万担)
举水流域	宋埠 中馆驿 仓子埠 新州 李家集	20
平汉沿线	孝感 花园 广水 应城 云梦	5
汉水流域	老河口 樊城 襄阳 沙洋 岳口 仙桃 分水咀 历山 蔡店	100
长江沿线	当阳 公安 监利 嘉鱼 鄂城 华容 大冶 圻春 龙坪	80
省外产地	洛阳 灵宝 新野 唐河 津市 巨子口 常德 澧县 渭北 渭南	5~8

商品流通的数量决定着市场的规模。汉口棉花市场初设于打扣巷附近,其后逐渐扩展到集家咀、大夹街一带。20 年代初,因襄阳、枣阳等地棉花大量运汉,交易重心逐渐转移到大水巷至清源巷沿河一带,并形成专业性大市场,市场结构日趋完整,仅较大规模的棉花堆栈就有 30 余家。依据市场职能,作为汉口八大商业行业之一的棉花行业,大致可分为以下四个部分。

进口商——即由产地运棉来汉销售的花号。此类商人依据籍贯关系分别隶属于号业公会和进口业公会。前者包括里河、樊城、枣阳、新野、岳口、沙洋、随州及山西、陕西等帮,计有 170 余家;后者仅有黄帮,共有 60 余家,“其家数虽不多,然其营业范围却系甚巨”^③。进口商必须熟谙产地情况,故以此为业者,以本省人为多。

出口商——有申帮、黄帮及洋商之分。申帮即专营贩运棉花出口的上海及江浙等地旅汉棉商,总号多设于上海,1929 年共有 34 家。黄帮则是湖北本省产地贩运

① 梁庆椿:《鄂棉产销研究》,1944 年。

② 《湖北之棉花》第 117 页,1938 年。

③ 胡邦宪、张履鸾:《汉口棉花贸易调查记》,1934 年。

号家兼营出口业者。洋商中以日商势力最大,组织有日本人棉花业公会。出口棉商实力相差悬殊,资本雄厚者达数十万元,如宏庆升、怡生永、集永亨等;资本少者仅数千元。合伙性质者占六成。进口商主要是从汉沪两地衡制及价格差异中牟利。

花行——即买卖双方之中间人,属牙行性质。较早开设的花行有谢和大、裕泰、唐永大等家,1929年发展到40余家。资本多者3万两,“最小者竟不足千两,仅能代客买卖,收取口钱而已”^①。由于运汉棉花大多须经花行介绍方能脱手,因而一些信誉较好的花行都有较为固定的客户。如日新花行专为湖南第一纱厂采购,振兴花行则多为震寰纱厂办货。

打包业——棉花体轻物大,土包运输,运费既昂,复易散失。沙市打包厂建立前,湖北棉花运沪均须在汉口打包后,方能运出。早期在汉开办的平和(1903年)隆茂(1916年)利华(1920年)三家机器打包厂,除利华系中英合办外,其余均为英商所设,垄断之术,层出不穷。直到1930年华商穗丰打包公司在汉成立,情况始有改观。该厂设备完善,经营得法,加之厂址靠近江边,营业颇为发达。各打包厂都附设有棉花堆栈,代作押汇和保险业务,货主只需将棉花存入堆栈,即可持栈单向银行或银号押款,手续颇为简单。号商中经常向上海、中国等银行抵押贷款者占78.7%之多。

由于没有摆脱旧的生产基础,汉口棉花市场更多的保留着前资本主义商业的一些特点。棉花行业中封建残余色彩十分突出:交易留难,扣除银息,倒账之多,颇骇人听闻。花行原为避免买卖双方纠纷所设,然因业者过多,良莠不齐,“同行暗争日趋剧烈,为本身生活计,生意滥做”^②,相互拆台,纠纷反而更加增多。至于掺假恶习,更是公开之秘密,“且其掺假之术,精妙绝伦,积习甚深,已成积重难返之趋势”^③。

汉口是外国资本掠夺华中地区农副产品及工矿原料的主要基地。在汉口棉花市场上,外国资本不仅垄断着棉花的直接对外贸易,同时还极力控制国内贸易,其实力“常非华商所能敌”^④。外国洋行中经营棉花最著名者,英商有安利、怡和,日商有日信、东棉、吉田、瀛华等家,其中以日商实力最为雄厚。汉口全部棉花出口商家中,日商竟占去六成,大小28家日本洋行“殆无不兼营此贸易者”^⑤。日本洋行还在沙市、老河口、樊城、蔡店等集散市场遍设分店或轧花厂,每逢新棉上市即派员前往购买,或委托中国商人代其收花。所购棉花运抵汉口后,直接运入日信打包厂,除供汉口日资泰安纱厂所用部分外,其余机包一概由日清轮船公司承载,分运日本及上海、青岛等地的日资纱厂,俨然自成体系。其输出额最多时,几占汉口

① 陈绍博:《汉口棉业概况》,《实业部月刊》第1卷第8期。

② 梁庆椿:《鄂棉产销研究》,1944年。

③ 胡邦宪、张履鸾:《汉口棉花贸易调查记》,1934年。

④⑤ 胡邦宪、张履鸾:《汉口棉花贸易调查记》,1934年。

棉花输出总额的三成以上。

商业依赖城市的发展，而城市的发展也要以商业为条件。近代汉口棉花市场的长足发展，不仅成为推动鄂棉商品化的强劲因素，同时也对汉口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在客观上促进了汉口城市近代化的历史进程。

1. 推动民族工业的发展。 商业资本投入工业部门是中国民族工业产生过程中的突出特点。1897年武昌官纱局投产后的20年中，武汉棉纺工业没有大的发展，再无新厂设立。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汉口棉花市场的不断拓展，武汉以其适中的地位，丰富的棉产，便利的交通，成为兴办纱厂的理想地点。在国内抵制外货，兴办实业浪潮的推动下，一些商人开始投资兴建纱厂。1920年，李紫云、刘季五等集股创办武汉第一纱厂。两年后，刘季五等人又另组震寰纱厂。到1925年华商纱厂已发展到5家，成为全省民族工业的重心所在。武汉华商五大纱厂共有纱锭23万余枚，加上日资泰安纱厂的3.2万枚，年用棉量最多时达70余万担（见下表），几占汉口市场棉花流转额的1/3。流通与生产的结合，使武汉跨入国内五大棉纺工业城市的行列。

厂 名	第一	裕华	震寰	民生	申新	泰安
投产时间	1920	1922	1922	1902	1922	1924
纱锭数	50 000	30 000	26 300	89 714	36 000	32 000
日用棉（担）	750	210	180	315	300	172
年用棉（万担）	26	8	7	12	11	7

2. 传统商业组织的演变。 商人组织的发展直接反映着市场的兴衰。汉口商业三百种，商户上万家，行帮林立，陋规甚多。由于棉花贸易的长足发展，集散范围不断扩大，棉花市场上商贩云集，行客之间、行东与店员之间时有冲突发生，商人同业组织的完善势在必行。早期的同业组织多以地域关系来划分，组织松散，弊病甚多。1930年，汉口棉花同业组织依据商会组织法进行了调整（见下表）。在同业公会内部，一律改为委员制，事权统一，除负责制定帮规，传递消息，解决事端，对外交涉及维持会员营业利益外，还有制裁会员经营中非法行为等权力。传统商业组织的演变，对于突破地域界限，减少封建积习，促进贸易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名 称	主 席	会 址
棉花行业同业公会	王焕府	大夹街五桂巷
棉花号业同业公会	张星垣	药王庙堤街
棉花进口业同业公会	杨显卿	帝王宫
棉花出口业同业公会	罗伯良	扬子街钦一里

同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历程一样，甲午战争后汉口棉花市场的迅速发展，并不是农村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结果，而是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所引起的，是建立在封建政权直接控制下的农民个体经济基础之上的。进入 20 世纪 30 年代后，受到自然灾害、棉种退化和世界性经济危机等方面的影响，棉花市场每况愈下，输出量明显低于 20 年代中后期的水平（见下表 单位：千关担）。

年 份	1929	1930	1931	1932	1933	1934	1935
输出量	1188	809	315	197	514	665	499

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主要原因可以概括为如下四端：

第一，频繁的自然灾害。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近代鄂棉主要产区大多集中在江河两岸及滨湖地带，水高田低，极易受到洪涝灾害的侵袭。1931 年长江流域特大洪水，全省 54 县受灾，棉田受灾面积高达 53%。大水过后，商业萧条，金融枯竭，经营棉业者无不颇具戒心，花号中收歇者竟占一半。棉化输出数额更“几不及往年十之二三”^①。1935 年，鄂西及汉水流域再遭水祸，洪水横扫汉北平原，光化以下 16 县一片汪洋，损失棉花 180 万担。在水旱灾害频繁的冲击下，鄂棉总产量急剧下跌，年输出值从四五千万关两跌至一千余万关两。汉口棉花贸易深受重创，外棉充斥市场。

第二，棉种严重退化，掺杂作伪盛行。湖北是清末国内最早大批引入陆地棉种的省份，兼之气候温和，光照充足，具有较优越的植棉条件。然而，由于一般农户缺乏农业科学知识，限于所见，昧于因循，时至 30 年代初，棉种早已退化，陆地棉种的优点几乎丧失殆尽。汉口市场集中外运的棉花中，除粗绒中的家乡花，特粗绒中的汉口花外，其余纤维长度和整齐率均非上乘。加上棉农商贩掺杂作伪之风日甚一日，棉花运沪后价格低落，销路大受影响。“识者虑之既深，而实地经营此业者，亦莫不痛心疾首。”^②

第三，捐税繁重。自 1927 年改征营业税后，几年中汉口市场棉花交易四易税率，从千分之一点七五增至千分之二点五；1932 年更增至千分之十。后经商界再三呼吁，始改为千分之八，但在产地和汉口分别征收，共计千分之十六。除正税外，棉商还要负担公益捐、慈善捐、建设捐等各种杂捐，名目繁多，不胜枚举（见后表），其数额常常要超过正税，“斯亦独高于其他各省者”^③。苛捐杂税之下，生产者收入锐减，经营者苦不堪言。

① 《中国经济评论》第 3 卷第 2 号，1934 年。

②③ 胡邦宪、张履鸾：《汉口棉花贸易调查记》，1934 年。

名 目	营业税	关税	改良费	检验费	公益捐	市政捐	堤工捐
数额 (元)	8%	0.91	0.06	0.06	0.15	0.15	0.04

第四，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价格是生产发展的杠杆。尽管 20 年代中后期，国内棉纺织工业的发展已日益成为汉口棉花贸易增长的重要因素，但外国资本利用其资金和特权，最终仍支配着汉口棉花市场的命运，表现最为突出的就是棉价问题。汉口棉价向来以上海行情为转移，沪市每日来电五次，报告现货期货之纱花及美棉美汇等价格。汉口号业公会接电后，即负责迅速传达于各同业，消息不可谓不灵通。然而上海棉价完全视纽约棉花市场行情而动，美棉之丰歉，常常成为国内棉花市场价格升降之主因。1929 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后，资本主义各国生产出现大量过剩，农产品价格狂跌风潮逐渐波及中国；加上 1931 年后白银汇价上升，汉口棉花价格逐年下跌，棉花最高价格从 1931 年的每担 58.01 元，跌至 1935 年的 36.40 元，下跌了 37.2%。加之同期国内纱厂生产萎缩，纱不畅流，花因疲滞，“整个棉商事业，因此益见无利可图而苟延残喘矣”^①。及至 1938 年 10 月武汉沦陷，城市经济处于日军严厉的控制下，除日商八大行及日伪拼凑的“汉口棉业公司”被允许经营棉花外，其他棉花行号先后全部收歇。抗战胜利后，汉口棉花市场虽一度有所恢复，但很快为通货恶性膨胀、物价狂涨所吞没。由于花纱布成为囤积居奇的主要对象，棉花市场兴衰无常，只是一种虚假的“繁荣”。

^① 胡邦宪、张履鸾：《汉口棉花贸易调查记》，1934 年。

十五、民国年间武汉经济地位下降原因述论

武汉襟江带湖，当东西南北之要冲，素有“九省通衢”之称，自古即为全国著名的商品集散地。进入近代以后，作为内陆开放口岸，地位日渐重要；加之张之洞督鄂期间，大力兴办洋务企业，推进武汉的工业化，一时称雄全国，居上海之后而成为全国的工商业重镇，有东方芝加哥之称。但是，进入20世纪20年代以后，尽管武汉的经济仍在继续发展，然而在全国各大城市中的有关经济指标的排名中，地位显著下降，其在全国经济中的分量也有日渐减轻的趋势。是什么原因使武汉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发生如此重大的变化呢？有专家对此作过简要论述，并将影响武汉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归纳为四个方面：其一是战争对商业的影响；其二是近代中国交通新格局的出现；其三是“时势”的变迁；其四是天灾作梗。^①这四个方面的原因确实对武汉经济的发展影响巨大，甚至严重削弱了武汉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使武汉经济在发展过程中缺乏后劲。但是，除这四方面的原因之外，我认为还有很多方面的因素也使武汉的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制约。为了全面认识20世纪20~30年代影响武汉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在吸收已有认识的基础上，本文拟从非经济因素、宏观经济因素和内部经济因素三个方面作进一步论述。

（一）

一个城市及其经济圈内的经济要获得发展，除了与经济发展直接有关的条件，诸如工业基础、商业设施、交通运输、原材料来源、金融状况、经济政策、技术力量等等必须具备之外，还须具备良好的政治文化环境和安定平和的社会环境。一个城市及其经济圈的工业基础、商业设施等都好，如果政治混乱、管理落后、社会动荡，也难以获得持续发展，并最终影响城市的经济地位。经济发展需要良好的非经济环境为铺垫，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20世纪20~30年代的武汉及其经济

^① 参见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73~576页。

圈的非经济环境十分恶劣,对武汉经济的发展有着直接而持久的影响。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武汉大经济圈内持续的战乱和接连不断的社会动荡直接影响着武汉商业的进一步发展。武汉因商而兴,因商得名,所依赖的是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和在强大商业辐射力下形成的大商业网络。明清以来,一直如此。正如清代学者刘献庭指出的那样,“汉口不特为楚省咽喉,而云贵、四川、湖南、广西、陕西、河南之货,皆于此焉转输。虽欲不雄于天下,而不可得也”^①。正是有了广阔而物产丰富的西部地区作为武汉商业的支撑,明清以来武汉商业持续繁荣的局面才得以保证。如此一来,广阔的西部地区作为武汉商业的腹地,其经济的或非经济的因素的变动,均或大或小地影响武汉商业的发展。这是武汉经济发展的优势之一,也是导致武汉经济发展基础相对脆弱的因素之一。以20世纪20~30年代而论,西部商业腹地的持续战乱和社会动荡就严重影响着武汉商业的发展。

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后,中国进入了一个军阀势力膨胀和战乱不止的时期,而从全国来看,云贵、四川、广西、湖南、湖北、陕西、河南诸省的战乱,相比于其他地方,更为频繁,时间延续更长。先是武昌起义后的“阳夏战争”,发生在商业中心的武汉,历时1月有余。后是护国战争,云南、四川、湖南遭罹战火。其后又有护法战争,湖南、广西数年之内战火不绝。进入20年代后,战乱更多,南北对立依然如故,大小军阀为争地盘而常启战端。其最典型者为四川,平均一个月就有两次战争。广西在李宗仁1925年统一广西之前,也连年战祸不绝。湖南、湖北、河南也不例外,大者如北伐战争、中原大战,小者如援鄂战争、李唐战争。陕西、贵州亦大致如此。此外,1927年以后,先是湖南、湖北、江西、贵州、四川是中国红色根据地的集中地区,也是红军活动的主要区域,为“围剿”红军,国民政府动辄调集数十万大军往来“进剿”,战火连年不绝,社会极度动荡,一直延续至1935年。战争对商业经济的影响是极其致命的。它阻断商路,破坏交通,使以转输为中心的武汉经济备受其害。这从当时的有关记述中可见大概。如1922年至1931年的江汉关海关报告中即指出,河南、湖南、湖北因在各派的武装冲突中横遭蹂躏,“导致商业混乱和中断”。^②又说,“促使汉口出口递减的另一重要因素是最近三年席卷中原的共产主义浪潮以及由此引起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使内陆局势险恶,各产地与汉口的交通中断”。^③细查1920年以后的武汉贸易情形,均可发现战争和社会动荡给武汉商业确实带来了致命的损害。试举几例:

① 刘献廷:《广阳杂记》卷4,中华书局1957年版。

②③ 穆和德等著,李策译:《近代武汉经济与社会》,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146、150~151页。

(1) 1920年,“汉口、九江、芜湖、南京、镇江各口,本年变故多端,复因党争而有军事行动,危及大局,阻其贸易,故铁路交通,贸易往来,间有不堪其扰者”^①。

(2) 1921年,“由于秋季近地之军事行动,交通上受严重窒碍,故土产之通常经由汉口装运出洋,或国内各处者,均裹足不前”^②。

(3) 1923年,“春间长沙战起,交通忽断,湘汉贸易,暂告停顿”。^③

(4) 1929年,“年初商业前途似有进展希望,商人咸抱乐观,迨平汉交通忽断,商人殷望转眼成空。……秋间军事复起,纷乱情形年终未止,商业又遭打击”^④。持续不断的打击,使武汉商业发展相对缓慢,抑制了土特产出口贸易的增长,进而影响其在全国各大港口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据统计,1881~1883年时,汉口对外贸易所占份额还排在上海、广州之后居第三位,而到1929年至1931年时,天津的对外贸易总值已远远超过汉口,汉口被挤到第四位。同时,在全国对外贸易总值中仅占2.4%,不仅远远低于上海的44.8%,也大大低于天津的8.4%。^⑤尽管造成这一状况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但战乱和社会动荡给武汉所带来的商业上的影响,显然不能低估。

第二,政治斗争影响武汉商业的发展。20世纪20~30年代政局最为动荡,而武汉作为战略要地和华中地区的经济中心,在重大政治事件中总是难以置身事外。其所受影响有轻有重。最为重大的影响事件是1927年的宁汉对立。下面我们具体分析一下该事件对武汉商业的影响。

中国大革命发展到1927年初,国民政府迁都武汉,武汉立即成为革命中心,声闻中外。同时,由于国共合作内部以蒋介石为首的右派集团反对深入进行工农运动与反帝斗争,与以共产党人为核心的左派发生严重政治对立。到1927年4月,上海、广州、重庆发生反革命政变,由此形成了以武汉为中心的革命势力与以南京为中心的反革命势力的对立,史称“宁汉对立”。宁汉对立中,蒋介石右派集团依靠江浙财团的经济实力和自己的军事、政治权力,并与外国政治、经济势力勾结在一起,对武汉实施全面的经济封锁。其措施有:断绝交通,即切断粤汉铁路、断绝汉渝航线,停止汉沪航运;停止汇兑,禁止现金运往武汉,同时也禁止汉票在各地行使;煽动工厂、商行停工停业。在这种形势下,武汉国民政府尽管也采取了一些反经济封锁的措施,但仍不足以挽救武汉经济的颓势。举凡武汉的金融、贸易、商业、工业生产,无一不受沉重打击。以出口贸易而言,1927年全年仅为1 198万余

①②③ 曾兆祥主编:《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273、274页。

④ 曾兆祥主编:《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329页。

⑤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69页。

海关两,仅为1926年的50%,1925年的40%左右。^①“出口总额之一落千丈各情形,试以记忆力所能追及之贸易凋敝年份,恐未有如此之景象者也,显见年内发生之事变,其扰害本境致附近各内地之密切情形,致为重大,遂使本埠商业,虽有抵抗之能力至此亦徒唤奈何。”^②以金融而论,43家钱庄停业倒闭,69家钱庄绝大多数也只在名义上保留牌号。^③武汉钱庄业从此一蹶不振。工厂停工、商店关门,使数以10万计的工人、店员失业,武汉整个市场日用品奇缺,物价高昂。武汉的经济在这次政治事件中,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

政治斗争对经济的影响,无论是什么地方都一样。但是,对于武汉来说,更为突出的是,“九省通衢”的区位优势特点和以贸易为主的经济特点,使它比其他城市更容易受政治风波的影响。事实上,20世纪20~30年代的每一次政治风波都影响过武汉的经济。为节省篇幅,在此再举一例为证。武汉的茶叶贸易一直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尽管20世纪初在国际市场上受到了锡兰、印度、日本等国茶叶的竞争,出口量仍保持在稳中有增的水平。但是,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实行反苏政策,先是撤销苏联领事馆,后是中苏断交。这一政治动向使向来以苏联为客户的汉口茶叶出口大受打击。“中俄绝交,汉口茶市,乃顿衰落。”^④茶叶出口的总值由1927年的222万余海关两猛跌至1928年的百余万海关两,再跌至1929年的57万余海关两,又跌至1930年的24万余海关两。^⑤几年之间,减少了近90%。对于国民政府来说,反苏纯然是为适应反共的政治需要,而对于武汉来说,则严重影响了它的贸易地位。

第三,气候对武汉经济的影响问题。武汉出口货物以农副产品为大宗,而农副产品受气候影响极大。同时,武汉商业腹地广阔,腹地内地形、气候差异很大,时有灾害发生。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长江中上游水灾或旱灾发生频率较高,区域性或全流域性的水旱灾害均足以给武汉的经济带来或轻或重的打击。稍微细检一下1920年以来的武汉商业情况即可以发现,气候对武汉经济有重大影响,决非虚言。

1921年,“出口土货,因国外市况不利,销行迂缓,故为数较微,其首要情形,系因潦水为灾,五谷市面,损失綦重”。^⑥

1923年,茶叶“品质平平,较上年稍次,实因气候恶劣,旱干太甚,叶之发育不良”,结果导致外商撤销原定收购合同。^⑦

① 参见穆和德等著,李策译:《近代武汉经济与社会》,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150页。

② 曾兆祥主编:《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328页。

③ 姚会元:《近代汉口钱庄研究》,《历史研究》1990年2期。

④⑤ 曾兆祥主编:《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42、43页。

⑥⑦ 曾兆祥主编:《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274~280页。

1924年,“所可憾者,本年洪水为患,襄河上游一带,受灾极重,致(棉花)收获较十二年减色……此项贸易,大受影响”^①。

1925年,“受去年冬旱影响,冬麦收获,尤见荒歉”。“气候奇旱且热,夏季收获,深受影响”^②。

1926年,“六月内,雨水过多,江流泛滥,涨过已足为灾之高度,秋收岌岌可危。秋后,霉雨不止,江水日高,至8月21日,竟达本关水表49英尺,自前清同治九年(1871年)以来,实为绝无仅有之事。堤防溃决,禾稼漂没,及财产损失之大,不可胜计。商业交通,也颇受阻碍焉”^③。

1929年,“各类蛋品来源缺乏,因天时不正,瘟疫流行及禾道(疑为稻——引者注)歉收所致。各种油类及芝麻等亦见萧条”^④。

1931年大水,“洪水为灾,贸易为之停顿”。黄豆、棉花,“因洪水为灾,来源缺少”^⑤。

1932年,“上年惨遭空前水灾疲弊状态,依然如故”^⑥。

1935年,“汉口附近,所受水灾,虽属轻微,而出口土货来源之鄂西及汉水流域,则惨遭淹没,并有数县,水灾之外,复为旱魃摧残,以致丰年之望,顿成幻想。所有苧麻棉花,收获均歉。棉花产额仅供669800公担,以视客岁,锐减485800公担”^⑦。

从上面所列举的情况来看,在1920年以后的17年中,受天灾影响的年份就有9个年头。实际上,这还不包括湖南、四川、陕西、河南、贵州等地较小区域的自然灾害。天灾肆虐之下,作为武汉出口的大宗物品茶叶、棉花、苧麻、油料作物均极受影响。另外,天灾所带来的对经济的持续影响还体现在因人民财产损失所带来的购买力下降,从而影响武汉向商业腹地的商品运销。

上述三端,是影响武汉经济的非经济因素中之卓卓大者。此外,武汉的商业文化气息和观念亦对武汉的经济发展有负面的潜在影响。如重转销而轻加工,敏于投机而昧于大势等等,均为武汉商家的顽症。这一顽症在武汉对外经济中的大宗商品交易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如茶叶加工工艺长期不能改变;棉花贸易中掺水加劣屡见不鲜;桐油贸易中只顾小利、目光短浅、丧失信用之事也严重存在。如此一来,自然难以提升武汉经济在全国的地位,影响武汉整个经济的发展。

(二)

城市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离不开国家和国际大的经济环境,国家和国际大的经济

①②③ 曾兆祥主编:《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274~280页。

④⑤⑥⑦ 曾兆祥主编:《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327~332页。

环境有时甚至能够左右或决定城市或地区经济的发展速度、规模,进而决定其经济地位的轻或重。在近代经济的发展中,尤其是这样。从推动新兴城市的产生方面来说,新航路的开辟,引起了欧洲传统经济格局的变化,一大批新的国际贸易中心和港口城市在这一大背景下兴起。世界经济发展史也证明,每一次科学技术革命都要推动一些新的城市或经济区域的诞生。从另一方面来说,新经济格局的形成和产业调整,旧的城市格局要被新的城市格局取代,旧有的著名城市的地位就有可能下降,这是宏观经济因素对城市发展发生作用的结果。另外,我们还应看到,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不能脱离该时该地和本国经济发展的大背景,国家经济形势及其特点与地区经济发展的程度都会对某一时段的城市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依照上述思路来考察 20 世纪 20~30 年代武汉经济的发展变化,就不难发现为什么武汉在全国的经济地位会迅速下降。

就一般而言,20 世纪 20~30 年代是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外部和内部环境都极为恶劣的时期。就外部而言,20 年代是战后欧美经济恢复和繁荣时期,中国的产业和商品都重新受到外国势力控制和压抑,外销不畅,内销遭到洋货激烈竞争。20 世纪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遭遇到前所未有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各国实行关税壁垒政策,使中国货物难以进入各发达国家及其经济附庸国。同时,又受到外国商品的强势倾销。1934 年和 1935 年又遇美国抬高白银价格,造成白银严重外流,影响中国银根,使中国产生发展和商业受到严重打击,直到币制改革实行后,才得稍解其困。就内部环境而言,长时间的战乱,造成农村贫困不堪,市场疲软,生产停滞,农业衰败,农副产品产量不稳。金融上,币制混乱,除传统银、钱、纸币外,又有军用票,通货信用时常发生危机。此外,政府大量发行债币,以高额利诱,吸纳游资,而用作内战军费,使工商业发展饱受资金缺乏之苦。税收上,到处关卡林立,捐税名目繁多,使商业成本无形增加。凡此等等,无不给以商业贸易为核心的武汉经济带来比其他城市经济更为严重的损害。除这些因素外,我认为还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宏观经济因素对武汉经济地位造成严重影响。

第一,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格局变化造成了中国个别地区和城市经济的畸形发展,相对地削弱了武汉地区经济在全国的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帝国主义在华势力,以英国最具实力,长江流域是其经济侵略的主要区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及以后,日本、美国的势力发展迅速。其中,尤其是日本地位变化最大。日本在 1905 年日俄战争中打败俄国后,以南满作为势力范围,并以此为根据地,向华北渗透,后又进入胶东半岛,展开对中国疯狂的经济侵略。日本势力的增长在某种程度上讲,使中国的经济格局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具体来说就是,由于日本对东北矿产和农作物的大肆掠夺,东北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在经济上获得发展,在全国的

地位举足轻重,从而也推动了华北经济的半殖民地化进程。我们可以用一组数据来说明。1905年以前,华北、东北地区在全国总的出口贸易价值上所占比重,加起来也只有7.9%(华北是3.5%,东北是4.4%),但到1919~1921年,仅东北一地就占全国总出口贸易价值的25.9%。1929年至1931年占33.3%,加上华北,比例就更高。从大连港的情况来说更是这样。1905年以前,在全国对外贸易总值中所占比例为4.9%,1909~1911年就上升为13.1%,1919~1921年则达15%,一跃而成为全国第二大港。^①日本对东北、华北的经济侵略,迫使这些地方的经济迅速半殖民地化,并将其作为自己的商品倾销地和原材料基地。这些地区的经济也因此得以畸形发展。影响所及使中国整个经济格局发生很大变化。武汉经济正是在这一变化中,地位发生相对跌落的。而相对跌落最为显著的时期就在20世纪20~30年代,它与日本加强对东北和华北的经济侵略大致同步,并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及其以后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新格局的形成相吻合。

第二,近代交通网络格局的初步形成,削弱了武汉在进出口贸易中的转输功能,从而导致武汉经济地位的相对下降。武汉控南扼北,承东启西,处中国腹心而依傍长江黄金水道。在近代交通网络未形成以前,是天然的交通中心。其商业中心的地位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形成的。进入20世纪后,随着中国经济的日益半殖民地化和为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中国掀起了修筑铁路的高潮。1905年,横贯东西的最长的内陆铁路陇海线开工,1909年汴洛段通车,1916年洛观段、开徐段竣工,1927年观陕段、徐海段、陕州灵宝段又相继完工。这条东西大动脉的贯通,使陕西、河南、安徽的货物找到了比经过武汉转运更为便捷的出运通道,或者说,为陕西、河南、安徽的农副产品开辟出了又一条出运路线。1901年开工的粤汉铁路,南段1918年已修到韶关,1936年与株州接通,实现全线营运。这样,湖南、贵州的货运亦开辟了一条通过该路直运广州口岸的路线。在长江航运上,宜昌、万县、重庆直通上海的航线开辟,这些港口可直接与上海进行交易往来。湖南的岳阳也是这样。这使四川、湖南,甚至陕西、云南、贵州、甘肃等地的货物亦可不经武汉而由万县、宜昌或岳阳直接出口。尽管这一时期内,平汉路的通车开辟了汉口与河北、天津等地的贸易通道,但平汉路受战争影响很大,时常停运,且运价较别路为高,使武汉货物的北输和北方货物的南运皆受阻碍。正因为上述原因使得武汉的转口贸易,尤其是出口贸易在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大受削弱。当时即有人著文指出这一因素对武汉贸易的影响。文章说:“平汉铁路之运费,较高于津浦各铁路;同

^① 参见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68~69页。

时,宜昌或重庆、上海间之直航汽船,次第发达;于是长江上流及河南,原以汉口为实行对内外贸易中心者,因以上运费、金融等各种原因,则回避汉口,而与上海行直接贸易矣。”^①“豫省出产各土货,向来由平汉路运汉而改装出口者,今已改由陇海路运沪矣,至其进口之货,亦由沪载浦,再装陇海各路,直运豫晋陕陇等省矣。”^②如此广阔的原有商业腹地的货物改道自然使武汉进出口贸易数值相对降低,宏观来看是这样,微观来分析或许更能说明问题。以桐油为例来说。桐油是汉口出口贸易中的大宗产品之一,其来源是四川、湖南、贵州、陕西及湖北本地。由于有广阔腹地的关系,汉口桐油出口数值,向来居全国首位。但到20年代以后,“四川万县、重庆的桐油,因为川沪航线发达,因此直接运到上海,不复运往汉口”^③。“及轮船运输,日渐普遍,内地桐油,多报关由轮船运出。”^④因此,在汉口报关出口的桐油数额很快下降,甚至比岳阳还少得多。而上海一跃而成为桐油出口量最大的港口。不仅桐油,其他很多产品都有类似情况,可见新的交通网络格局的初步形成对武汉转口或出口贸易影响之大。

第三,20世纪20~30年代中国进出口商品结构的某些变化趋势,也使武汉在进出口贸易中的地位相对下降。根据有关资料,汉口的主要进口货物有棉布、洋纱、紫铜块、马口铁、茶叶、糖、烟叶、染料、煤油等。主要出口货物有猪鬃、蛋品、棉花、小麦、黄豆、牛羊、芝麻、花生、桐油、茶叶、豆饼、生铁、石膏、纸烟等。从这些货物品种来看,大多为轻工原材料和日用品。生铁虽为出口产品,但20年代后半期严重萎缩。从更为详细的货物清单来看,出口者还有部分来自湖南的有色金属,但数量较少;进口产品中机器、铁路器材等虽然也有,但总值均只在二三百万海关两以内,极个别的年份达到过六百万海关两。进一步分析武汉进出口货物结构,还可以看出,以武汉为中心的经济区,能源工业和重工业原材料工业并不发达,化学工业也较落后,而仍以棉纺和土特产为主,这使得武汉经济更多地是与生活消费品经济相联系。以20~30年代而论,国内生活水平和购买力提高极其有限,加上军阀混战,日用生活品销售增长缓慢。无论是国货、洋货都是一样。国外市场尽管1929年(甚至包括1932年)前,因大萧条前的经济繁荣和银价较低利于出口等因素,推动中国整体出口有所增长,但武汉在这一时期内却遭受战乱、政争与前所未有的天灾影响,丧失了提升自身地位的机会。而到了30年代以后,中

① 曾兆祥主编:《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371页。

② 《汉口商业月刊》(1934年)卷1,第1期,第68页。

③ 曾兆祥主编:《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212~213页。

④ 曾兆祥主编:《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214页。

国进出口商品结构变动较大。这种变化可以从下表^① 看出：

表 1 主要进口货物所占进口总值比重 进口货物总值 = 100

年份	棉布	棉纱	棉花	煤油	糖	米	小麦	钢及铁	机器及工具
1929~1931	10.0	0.7	10.0	4.4	6.8	6.1	3.0	4.4	3.5
1933	4.3	0.3	7.3	6.5	3.1	11.2	6.5	6.1	3.2
1934	2.6	0.3	8.7	3.9	3.2	6.4	3.1	8.3	5.7
1935	2.3	0.2	4.5	4.1	3.0	9.8	3.8	8.1	7.2
1936	1.3	0.2	3.8	4.2	2.2	2.9	1.3	9.8	6.4

表 2 主要出口货物所占出口总值比重 出口货物总值 = 100

年份	茶	豆	豆饼	花生	棉花	棉纱	桐油	猪鬃	蛋
1929~1931	3.6	14.8	5.5	2.2	2.9	2.5	2.7	1.1	5.0
1933	5.6	0.8	(不及 0.05)	2.8	4.9	6.5	4.9	2.0	5.9
1934	6.7	1.3	(不及 0.05)	2.2	2.8	5.8	4.9	2.8	5.6
1935	5.2	0.9	(不及 0.05)	3.5	3.8	3.3	7.3	2.8	5.6
1936	4.4	1.1	0.3	1.6	4.0	1.7	10.3	3.5	5.9

从表 1 来看，汉口进口货物中的大宗项目棉纱、棉布、煤油、糖在整个中国的进口贸易中是呈现下跌趋势的。呈上升倾向的钢铁及机器、工具则又不是汉口的主要进口货物。此时期内，钢铁、机器、工具的进口增多原因是因国民政府进行抗战准备，需发展国防工业，而这又与作为商品转运地的汉口关系不大。从出口货物（表 2）来看，极不稳定，棉花、茶、棉纱都是下降的，桐油虽然处上升趋势，但此时汉口桐油出口在全国的地位已显著下降（参见前面的分析）。只有猪鬃和蛋品相对稳定。另外，从别的资料还可以看到，30 年代以后，铁矿石和有色金属的出口量增长较快，而这都与汉口关系不大。如此一来，汉口作为进出口重要港口的地位理所当然地要相对下降。正因为如此，当时有人认为，“汉口地位之重要，不在直接对外贸易，而在间接贸易”^②，主张发展汉口的转口贸易。这种认识实际上是承认汉口已经退出全国重要进出口贸易港口的地位，而成为名副其实的内陆货物转运站了。

① 表 1 和表 2 均根据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 76 页的表 18、表 19 节缩而成。

② 曾兆祥主编：《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资料选辑》第 2 辑，第 353 页。

(三)

前文的分析只是解决了 20 世纪 20~30 年代武汉经济地区下降的外部影响问题。一个城市经济的兴衰主要应取决于内部经济因素的作用。下面不妨从武汉自身经济发展的特点来考虑一下导致武汉经济地位下降的内部因素。

近代以来,外国势力由沿海向内地逐渐扩展,处于内陆腹地的武汉以其水路航运的便捷,适应了他们企图迅速将经济爪牙伸向中国内地的需要,因而,传统的内陆商品集散地很快就在国门洞开之后成为全国最为重要的少数口岸之一。张之洞不满足于此,以其恢宏的气魄,想将武汉建设成既是进出口口岸,又是工业生产基地的城市。于是,有大力筹办实业之举。其宏图展施之时,武汉挟商业、工业两者之重,声名鹊起,成为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先行城市之一,在全国的经济中举足轻重。张之洞的武汉经济发展思路应该说是大致正确的。但极为可惜的是,武汉后来的经济并没有沿着这一道路走下去,结果导致武汉经济发展仍主要只依赖于日渐下降的进出口贸易和转口贸易。工业尽管也有发展,但比之于其他地区,速度很慢,使武汉经济地位受到严重削弱。我们仍可从有关统计中了解这一变化的具体情况。以纺织业为例,1908 年,武汉的纱锭数还占全国总纱锭数的 20.6%,比之于上海的 30.6% 相差只 10 个百分点。但到 1935 年,武汉的纱锭数却只占 3.0%,比天津的 4.8%、无锡的 6.5%、南通的 3.9% 还少得多,更不用与上海相比了。另据统计,1933 年上海等 12 个城市的工业调查结果显示,汉口工业厂数、工人数、资本数、生产净值上分别只占该 12 个城市各同类数总额的 5%、5%、3%、2%。^①而这 12 个城市还不包括关外的工业城市。如果将其放在全国的总数额中来看,所占比例更小,武汉的工业已无足轻重。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武汉工业的不发展或发展缓慢,是造成武汉经济地位下降最为根本的原因。工业经济没有以应有的速度发展,其所依赖的商业和贸易经济又受到前文所分析的非经济因素和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而被限制发展,武汉经济地位遂不复与以前同日而语了。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武汉工业经济发展缓慢或不发展呢?首先,武汉的工业经济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经济的一部分,同样具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点,即作为先进国家工业的补充而存在。反映在生产上则只是原材料和轻工业产品的粗加工,反映在消费上则只是外国商品的倾销对象。因此,外商在武汉投资办厂,是以便掠夺西方工业需要的原材料和倾销商品为转移的,并不是真正想发展武汉的工业经济。这一点从外商在武汉所办工厂的种类就可清楚知道。更有甚者,外国为了抢占中国市场,挟资金和技术优势,竞相向中国倾销商品,使市场达到相对饱和,

^① 参见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 106~108 页的表 8、表 9。

大大地抑制了中国的商品生产，使中国产业难以发展起来。武汉自不能例外。20世纪20年代前后日本棉纱、布匹和洋糖的倾销压制了武汉国产纱、布、糖的生产和销售即是典型。其次，种种原因带来的市场狭小也是制约武汉工业发展的因素之一。20~30年代，中国内地相比于开埠较早的沿海地区而言，近代经济发展水平要低一些，自然经济的成分仍大量存在，农村对农用机械、化肥等的需求极其低下，对生活物资的需求亦不高。再加上湖北、湖南等作为武汉商业腹地的地区长期战乱，又因洋货倾销和沿海国货在内地的销售，使本已需求有限的市场变得更为狭小。需求决定生产。正是由于需求有限、市场狭小抑制了工业的发展。第三，武汉工业经济发展中的一些独特情况也抑制了武汉工业的发展。武汉的重工业发展起步较早，曾名噪一时。它在20年代以前的发展确实不错，但进入20年代以后则乏善可陈^①。另外，武汉的棉纺织业尽管早期规模较大，但产品质量一直不好。同时因为中国棉花纤维较短，不适宜于纺织较好质量的布匹，需与进口棉花混纺；而引用的美国棉种又未被棉农接受，因此，发展备感艰难。同时由于工业发展中技术要求高、资金需求量大等特点，有着商业传统的武汉商家大多不愿意将商业资本转向产业资本。这只要看一看武汉20~30年代商号林立的局面就可一目了然。正是上述三个因素使武汉的工业在20~30年代没有像此前那样迅速发展起来。

既然工业没有得到长足发展，武汉经济在20世纪20~30年代就只能在动乱的年代里照旧发挥其商品转输的功能，成为某些轻农副产品出口和某些轻工业产品进口的基地，以及从事内陆转口贸易的港口。

^① 参见穆和德等著，李策译：《近代武汉经济与社会》，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159页。

十六、武汉旅游发展的近代化历程

（一）古代武汉的旅游沿革及文化传承

论及古代武汉的旅游历史，首先要从武汉城市建制沿革谈起。

武汉有着十分悠久的文明史。据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早在新石器时代，武汉地区就有人类生息繁衍，《史记·五帝本纪》中有：“三苗在江、淮、荆州。”所谓三苗，即有苗、苗民、苗蛮，他们是商人南下，楚人东进之前武汉地区的土居。《尚书·禹贡》中有大禹治水，历“九州万国”。武汉属于九州之一的荆州。《战国策·魏策》记载：“三苗之居，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彭蠡即今天的江西鄱阳湖，这表明，“三苗”聚居地分布在洞庭湖与鄱阳湖之间。有学者认为“三苗”是武汉最古的地名。

商代以前，武汉并没有形成城郭市廛，只不过是台墩寥落、渔村点点。三苗之民仅在此地筑台垒墩、猎兽捕鱼、开荒种谷、饲养家禽。这一切可以从今日武昌南湖一带以及近郊的驼店、纱帽山、圣家墩、余家嘴的考古发掘得到证明。当时武昌只是较大的居民点，地属九州之一的荆州管辖，战国时又属楚国。秦代天下设 36 郡，武昌属南郡管辖。西汉改南郡为江夏郡，到西晋又改为“武昌郡”。

今天武汉的武昌、汉阳、汉口三镇，在历史上形成的时序是江北先于江南，汉阳先于武昌。但名称的出现，则有些特别，最先出现的是“武昌”，其次是“汉口”，再次是“汉阳”，但最早出现的武昌、汉口、汉阳都不是今天的三镇所指。

“武昌”一词大约在东汉末年出现。当时天下纷争，战事不断，吴国孙权最早在今日的蛇山建筑军事城堡，名为“夏口城”，属“江夏郡”。而孙权在今天的鄂州建立都城，取名武昌。这是“武昌”一词的由来，孙权说过：“武昌，因武而昌。”后来，司马氏于公元 280 年建立西晋，改江夏郡为武昌郡，这大概是今日的武昌城“正名”之始。当然，后来武昌的称谓又多有改动，如晋朝以后，武昌在历史上被称为鄂汉、鄂渚、驿渚、沙羡、汝南、鄂州等。特别是公元 589 年隋统一中国，武昌之地又改为江夏，一直沿袭到清代。

汉阳古地同武昌一样古老，它建城的时间要比武昌早。商代的盘龙城应该说是汉阳地区最早的城邑。但“汉阳”之名则出现较晚。大约是公元 606 年，隋朝大业

二年,改江津县为汉阳县,汉阳之名才正式出现,并一直沿用到今天。先秦时期,汉阳在历史上有安陆、沙羡、石阳、曲阳、淝阳、沌阳、汝南、汉津、沔阳等称谓变化。三国时,孙权在武昌筑夏口城时,荆州牧刘表就已派江夏太守黄祖镇守郢月城,后孙权攻下郢月城进行了一场大屠杀。《三国志·吴主传》记载,“屠其城”,“虏其男女数万”,获舟船六千多艘。并派刘琦为太守,又在龟山上筑鲁山城备战。可见当时的郢月城是颇有规模的。

汉口是从汉阳城区分离出来的城镇,其历史比武昌、汉阳晚得多。隋、唐以后,武昌、汉阳作为县名确定后,江南江北双城的发展相当迅速。现在的汉口,是明朝成化年间(约1465~1487年)由于汉水改道,自龟山南改为龟山北入长江,汉口便由汉阳城区自然剥离出来。“汉口”乃汉江入长江之口,作为地名“汉口”一词的出现要比它的实际城区出现早得多。最早的史籍记载是:南北朝时期梁武帝进军汉口,在龟山西北处约5公里处筑萧公城,又称为“汉口城”,这是“汉口”一词的最早由来。而今天的汉口城区实际上只有500余年的历史。

武汉是武昌、汉阳、汉口三镇的合称。但“武汉”一词,比武昌、汉口、汉阳三地名出现得都晚,据考证,最早出现“武汉”之名的是元朝。明代万历年间姚宏谟在《重修晴川阁》中,有“武汉之胜迹,莫得恣其观游”之句^①;明末阮汉闻著有《武汉纪游》。“武汉”一词是武昌、汉阳两城各取一字组合成双城的代称。

从武汉地名的形成以及称谓演变过程来看,武汉的城邑文明至少有3000多年的历史。皮明麻先生将这3000多年的城市文明史分为四个历史时期:第一时期为“城堡时期”。大约自商代盘龙城的建立开始,到隋朝统一中国止;第二个时期是“镇邑时期”。自隋唐到清代中期,历时1200多年;第三个时期为“都会时期”。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四个时期为“社会主义新型城市时期”。即1949年至今。^②这种分期颇能概括武汉城市发展的历史特点,具有较强的客观性与科学性。我们从武汉城邑文明的发展过程还可以看到如下几个特征:

第一,从古代武汉地名称谓的变迁来看,武汉的城市文明发展源于长江与汉水。它不同于黄土文化与山岭文化,它是一种具有流动性强的江河文化。从历史地理学考察,武汉古时有“夏水”、“夏汭”、“夏口”、“夏州”、“江夏”之称,经历了十分漫长的城邑演变历史。《汉书·地理志》记载:“夏水出江流于江陵县东南,又过华容县南,又东至云杜县,入于汭”^③。这里的“夏水”泛指包括武汉在内的江汉下游的湖北地段;古“夏汭”、“夏口”都是指汉江流入长江之口以及西侧和对岸

① 余育德:《江汉荟萃,黄鹤呈祥》,《长江文化论集》,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92页。

② 皮明麻:《武汉城市发展轨迹》,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

③ 《汉书·地理志》,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37页。

的地区。“纳”为河流弯曲和汇合处；“口”为江河之出口。这证明古代武汉城邑文明是起源于水、得益于水。

第二，武汉是因武而生，因武而昌。不管是商代的盘龙城的建立，还是夏口城的修筑，郢月城的诞生等，武汉镇邑文明最先起源于军事堡垒。因为军事扩张、政治吞并，武汉才得以兴盛和发展。三国时孙权的一句话概括得十分明确：“武昌，因武而昌。”今日“武汉”这一称谓，仍然是“武”在当头。由于军事城堡的建立，军备的需求，武汉的水陆交汇地理位置得到不断地强化与提升。连绵不断的战争与地盘争夺，使武汉的水上运输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人口的流动随之频繁，商贸以及军事相关的手工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三国时期，汉阳一度称为“石阳”，《三国志》中有“石阳市盛”的记载^①，军需带来了“商舟之会”，军事刺激了商贸的发展。必须指出在武汉城堡时期，工商贸易、交通运输、商品集散、人口迁徙等都是附属于军事活动的，是服务于军事扩张、武力争斗的。也是为政治控制提供经济后盾的。但无论是附属于军事扩张，还是服务于武力争斗，商贸、运输及手工业的迅速发展，毕竟大大地拓宽了城堡时代单一的军事功能，为其向封建镇邑文明过渡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第三，城堡时期，武汉军事重镇的地位，使它的知名度大大提升，由此带来了天下群雄的看中和觊觎。天然的水运条件，地处华夏、中原腹地的地理优势，以及频繁的战争带来的人口流动，使得不同地域的文化主体、生活方式、风俗习性以及民族特征彼此模仿、相互整合，不断扩散，也使得武汉在社会相对稳定的条件下将迅速由军事重镇转变为商贸和政治中心。

隋唐以后，由于封建帝国的统一，武汉的军事重镇让位于商贸重镇。由于社会的相对稳定，武汉直接的军事功能逐渐弱化，而政治、商贸性质日益增强，武汉开始逐步形成区域性的政治商业中心，带来了经济的迅速发展，带来了武汉政治地位的上升，也带来了旅游的蓬勃发展。

古代武汉的旅游历史，虽无专门史书记载，但从大量史料中可以查找出这方面的雪泥鸿爪。从时段上考察，古代武汉旅游历史与武汉城邑文明进程及城市建制沿革相演绎。在城堡时期，史料上所记载的大多是先民领袖、王侯将相、文人墨客的游迹与诗文。

大禹应当是武汉旅游史的开篇之圣。《尚书·禹贡》记载，大禹“嶧冢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过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意指大禹导山、寻水，先从“嶧冢以浚其源，至于荆山内方以引其流，使由大别以入江。而汉之源流治矣”^②。大别乃古汉阳龟山之名，相传大禹治水“自小别至于大别”，时值春暖花开

① 《三国志》，上海古籍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149 页。

② 《尚书·禹贡》。

时节，他刚刚从冰冷草枯、千里冰封的北方来到江南，面对江南草绿，万紫千红，感叹南北景象之差异，“一山隔两景，真大别也”。后来人们便把大禹驻足感叹之地名为“大别山”（即今日之龟山）。这段传说，可以看作是武汉古代旅游史上对武汉地区风光最早的评价。

春秋战国时期，爱国诗人屈原被放逐时，曾流连于武汉，在其著名的诗篇《离骚》中，就有关于今日武昌“南浦”的记载。明代史学家陈循有文记载：“南浦在（武昌）府城南三里，离骚经送美人兮南浦”。^①可见屈原“放逐之游”，武汉是其所经之地。屈原不仅游南浦，而且还登上龟山，写有“登大坟（龟山）以远望兮，聊以舒吾忧心”^②。据郭沫若考证，“大坟”即“龟山”。《九章·思美人》中记叙了他当时游经武汉的行吟感叹：“吾将荡志而愉乐兮，遵江夏以娱忧；揽大薄之茝芳兮，搴长洲之宿莽，昔吾不及古之人兮，吾谁与玩此芳草。”屈原不仅赞美长江汉水滔滔之气势，而且对长江中的江心绿洲作了最早的文字记载。江中洲上的萋萋芳草作为他抒情表意的比兴之物。

“伯牙鼓琴，子期知音”的故事，已是传古之谈。俞伯牙游历武汉，寻觅知音，表现了战国时期文士出游的情态与心态。

秦汉时期，作为军事堡垒时期的武汉，引来过无数英雄豪杰。他们筑城设垒，屯粮聚兵，各派相斗，连绵不断，不绝于时。秦汉至三国时期的各路枭雄几乎都曾旅居过武汉，并留下许多的历史遗迹。如秦朝宰相李斯府水刻石的南岸嘴，刘备祭天的磨山郊天台，关羽举刀卓地泉水涌出的卓刀泉，以及洗马磨刀的洗马口、藏马洞，还有祢衡作赋葬身的鹦鹉洲，蛇山上助战导航的孔明灯等等。

这些古迹记载了当年英雄豪杰鏖战武汉的踪迹，虽然与今日之旅游行踪相去甚远，但他们在刀兵相见之余，不自觉地充当了武汉山川风物的游观者，也为他们的后人留下了可资观览和凭吊的历史景观。

汉末大学者蔡邕在游历武汉，并且对武汉的山川形胜作了详细的调查之后，写下了著名的《汉津赋》：“南援三州，北集京都，上控陇坂，下接江湖，导财运货，懋迁有无。”作为文学体裁，诗中难免有夸张之笔，不可为信史。但诗中将当年汉阳的交通枢纽和商贸繁荣的风貌以及优越的地理形势表现得极为充分。

魏晋南北朝时期游历武汉的文臣武将数不胜数。著名的武昌柳，相传为晋朝镇守武昌的荆州刺史陶侃（259～334年）所种。明《寰宇通志》有此记载：“晋陶侃镇武昌种柳，都尉夜盗柳为己种。侃问：西门柳何以盗种？尉惊怖，谢罪。唐刘禹锡诗：‘一辞温宝树，几见武昌柳’。孟浩然诗：‘行看武昌柳，仿佛映楼台。’”^③

① 陈循等：《寰宇通志》卷50。

② 屈原：《哀郢》。

③ 陈循等：《寰宇通志》卷50。

南北朝时南齐王琅琊王简栖在畅游武汉之后，曾在《头陀寺碑记》中记述武昌的胜景风貌：“南则大川浩瀚，云霞之所沃荡，北则层峰削成，日月之所迴薄；西眺城邑，百雉纤金；东望平皋，千里超忽，信楚都之胜地。”《头陀寺碑记》载入了《昭明文选》，后寺以文传。北宋诗人黄庭坚曾道此碑记，“唯有简栖碑，文章巍然立”。由此可见，当时的武汉已是风光独特的“楚都之地”^①。

隋唐之后，武汉开始进入封建镇邑时期。特别是唐代社会经济空前发达，刺激了商品经济在封建社会母体中孕育发展，使得全国各地的封建镇邑得到迅速发展，工商贸易空前繁荣。特别是中国经济重心开始由北向南转移，北方及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成果源源向南输入，极大地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发展。武汉地区经济文化以及城市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成为长江中下游地区商业、手工业、游览航运的中心。交通发达、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带来了旅游的迅速发展。唐宋时期的著名诗人词家、学者名流、贤士圣哲，几乎很少没有不畅游武汉的。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已成为千古绝唱：“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李白在武汉留下了不少诗作，对黄鹤楼、汉阳树、鹦鹉洲、放鹰台、修静寺等景物的描写已成为后人游览此景的经典。崔颢的“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已是后来妇孺皆诵的佳篇。除李白、崔颢外，白居易、刘禹锡、孟浩然、鲍照、皮日休、贾岛、王维、韩愈、杜牧等等，可谓数不胜数、举不胜举。他们留下的名篇佳作，不仅是人类历史的珍贵遗产，也是我们追寻武汉旅游历史的宝贵资料。除李白等唐代著名诗人外，宦游武汉的诸位名贤留有无数量迹，如唐太宗之叔江夏王李道宗，大学士李善，江夏学人李邕及子李暄、李洞等。

宋代许多著名的诗人学者都曾驻足武汉，或游历山川，或赞叹古迹，或镇守此地，或路经此邦，留下了许多后人常常引用的文字记载，如陆游、范成大。民族英雄岳飞，曾以崇信军节度使和荆襄潭州制置使职，坐镇鄂州，总管三路兵马，在洪山武昌府留有许多岳飞的古迹。

元代蒙古人夺取中原以后，元世祖忽必烈曾顺汉水而南征，胡风丹《大别山志》记载：“元世祖南巡驻蹕黄鹤，因询于父老曰：隔江中（山）头石矶何名吕公？或对曰：唐仙人吕纯阳吹铁笛其上，因以为名。又问：唐以前何名？复有对曰：世传大禹治水功成之所，后人讹为吕公。世祖大悦，遽令有司鼎新庙宇，岁时致祭。”^②

明代的武汉，是与朝廷最为相关的地方。吕寅东的《夏口县志》曾记录过洪武皇帝朱元璋当年征战武汉，留有赞叹武汉后湖黄花地的诗句：“马渡沙头苜蓿香，片云片雨渡潇湘。东风吹醒英雄梦，不是咸阳是洛阳。”朱元璋登基后，采取封藩

① 同治《黄鹤山志》卷2。

② 同治《大别山志》卷6。

政策,封其第六子朱桢为楚王,镇守武汉达40多年,后楚王子孙世袭王位,九代相传,统治江夏达262年之久。武昌的楚王府留有許多明代的遗迹。

明代许多文人学士,曾留有不少的赞美武汉胜景的诗篇,如公安派袁氏三兄弟、大学者李梦阳等都写过不少畅游武汉的诗作,还有明代画家仇英曾经绘制过《古武汉三镇图》,把龟山蛇山夹江对峙的雄伟气派描绘得栩栩如生、跃然纸上,成为后人研究武汉的珍贵图舆。

清代以来许多诗人学者,对东湖、南湖、月湖以及后湖的风光之美的赞叹更是妙笔生花,如范锴的《汉口丛谈》、王柏心的《续辑汉阳县志》等。

从古代武汉的旅游主体来看,史料记载和历史传说中的大多是帝王将相、王侯大臣、诗人墨客、名流学者。普通工匠、下层农夫以及小商小贩等广大民众的旅游活动,因受传统文化的束缚,历来不为文人学士所记叙。同时,封建镇邑时期的武汉,旅游还是属于极少数人所能享有的一种生活方式,还不具备普遍性与大众性。

从旅游客体来看,无论是屈原登“大坟”、吟“芳州”,还是李白颂汉阳柳色、赞黄鹤山景,或是苏轼赞禹庙的千年古柏,概而言之,古代武汉旅游者所游览观赏的客体,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武汉的江河湖山的雄浑而清秀、奇特而壮丽的自然之景;另一类是建于江湖之滨、山岭之上的古楼、古庙、古寺、古刹等人文胜迹。

自武汉城市的兴起,到晚清三镇蔚为规模,武汉自古以来逐步形成了一条横穿南北、依山带水的旅游风景线。而龟山、蛇山是这条旅游风景线上的两个重要节点。仿佛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又像是传说中的大禹导山导水的功绩,武汉以龟、蛇两山为节点,向南北延伸一条跨越长江、逶迤汉水、似断非断、隐隐相连的丘陵山系。自南向北延伸的有武昌的关山、喻家山、南望山、磨山、桂子山、珞珈山、洪山、凤凰山、蛇山等。跨长江接龟山,沿汉水向北的山系有龟山、梅子山、凤栖山、米粮山、仙女山、扁担山、银顶山、汤家山、汉南山等等。在山系的两旁,有东湖、南湖、沙湖、水果湖、紫阳湖、莲花湖、月湖、墨水湖、后湖、后官湖等大小湖泊。它们山水辉映、相映成趣,形成了许许多多的自然风景点。清同治年间,胡丹凤撰《黄鹤山志》,在卷5中,载有杨士奇的“武昌十景图序”,序中概括了当时的武昌十景为:黄鹤山(蛇山)、黄鹤楼、南楼、石镜亭、凤凰山、龟蛇夹江对峙、江汉两水合流、洪山及洪山宝塔,与称衡有关的鹦鹉洲,与屈原有关的南浦。明嘉靖25年(1546年)朱衣的《汉阳府志》记载了汉阳知府王静的诗,概括了汉阳的山川风貌,归为“汉阳十景”:即古刹晚翠、江汉朝宗、禹祠古柏、官湖夜月、金沙落雁、凤山秋兴、晴川夕照、鹦鹉渔歌、鹤楼晴眺、平塘古渡。汉口自明代成化年间从汉阳分离之后,汉口玉带河西北侧有一片湖水,“东西数十里,平畴旷野,弥望无垠”,“名之曰后湖,古称潇湘湖,亦名黄花地,即古之废襄河也”^①。据清

① 嘉靖《汉阳府志》。

同治七年（1874年）王柏心的《续辑汉阳县志》记载，后湖“夏秋水涨，名潇湘湖。冬涸草生，名黄花地，若时值二三月，黄花烂漫，千顷一色，士人谓之黄花地，唯汉上有之，他处所罕见也”^①。清道光时范锺著《汉口丛谈》，记录过明太祖朱元璋征战武汉时为潇湘湖（即后湖）赋诗，同时还描写了后湖迷人的景色和游人争相观览的盛况：“淤后襄河二百年，平芜十里望茫然。白云有影常垂地，青草无依欲上天。春色任来鸠枝裹，苦怀休到酒杯前。今朝准拟开襟抱，莫放斜阳堕柳边。”后湖之美，以致文人墨客常常流连于此：“散步不知远，频来第五泉，品茶贪野趣，读书忆高贤。绿暗庭前树，凉生雨后天。无人同领略，惆怅夕阳边。”^②可见道光时期，后湖已成当时武汉的一道胜景。范锺在《汉口丛谈》中详细描述过后湖风光：“后湖夏秋水汛，一片苍茫。对于夕阳低坠。官署者呼船载酒，丝竹清歌，夜分始返。”“月湖平敞后湖遥。六尺虚篙两把桡。凌叶风清湖水汛。酒船何日又笙箫。”^③叶调元的《汉口竹枝词》也详尽地记载了后湖游人“肩挤肩”的盛况：“春来麦草秀成行，夏日盈畴菀菜香。更有冬来黑白菜，移根不肯向他方。”“两层屋宇势毗连，晴日游人擦背肩。要吃清茶兼望远，楼高须上涌金泉。”“夏汛初看几尽添，平湖万顷镜中天。倚栏领略烟波趣，位置无如第五泉。”“水涨平湖景致多，远霞红透晚来波。土塘买棹弯桥口，一路乘凉到小河。”^④

在横跨南北的古代武汉旅游风景线上，除了上述如诗如画的自然之景外，还有许许多多遐迩闻名的人文景观。除上文所提及的黄鹤楼、禹王宫、晴川阁、古琴台之外，因宗教兴盛而建设的佛塔、古寺、道观宗庙等，也是古代武汉旅游者所游观咏叹的风景点。如南朝时期建于武昌文昌门内的报恩寺（后改为铁佛寺）；唐代宝历年间建于洪山下的宝通寺（原名洪山寺）；宋代太平兴国年间建于汉阳龟山南的太平兴国寺；以及元代为纪念道家高人丘处机曾养真于武昌蛇山南麓而修建的长春观；还有建于清初的归元寺等等。宗教园林景观，曾一度成为古代旅游者所着重游观的人文景观。它是古代旅游客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旅游方式上看，大多数旅游者可以概括为内向型的仿古方式。即游观景物多为娱心适意、自我欣赏、自得其乐。他们对古代遗迹无限倾情，往往把山川自然之景作为表情言志的载体，以抒发某种情怀，或者寄托某种宗教理想。文人墨客尤其如此。这种旅游方式与地理大发现之后的欧洲人重商逐利、冒险勇进的航海探险旅游相比较，在旅游的民族性方面，明显表现出“重因袭，少变革”、“重稳健，少探险”、“重适应，少超越”的内敛稳健的民族旅游性格特点。

从旅游观念上看，古代武汉旅游者多表现为一种因循与模仿式的旅游观，其封

① 同治《续辑汉阳县志》。

②③ 范锺：《汉口丛谈》卷5。

④ 叶调元：《汉口竹枝词》卷3。

建专制色彩十分突出。无论是对古迹的赞叹，或是对自然的欣赏，都以是否有帝王大臣、圣贤名人游览过此地为价值标准。所谓的“山以贤称，境缘人胜”，“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旅游者对景观客体的注意力，不在客体本身，而多在客体是否与帝王大臣、先贤圣哲有关联。如历代诗人墨客对古琴台、黄鹤楼、晴川阁、大别山、鹦鹉洲的赞叹，多是因人及景，建立在对皇权、对圣贤名人的崇拜基础之上的。古琴台因俞伯牙“碎琴谢知音”而流名千古；黄鹤楼因道士子安和诗人崔颢为后代所称颂；鹦鹉洲因祢衡作《鹦鹉赋》并葬身该洲而出名。这些景点代代相传、世世相依，形成了古代旅游文化中少个性、多模仿，少创新、多因循，少未来、多迷古的封建专制、一元独盛的旅游文化特征。它充分表现出了武汉古代旅游文化对传统儒家文化的全面传承与因袭。这种现状直到 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武汉开始步入近代都会时期，才开始发生蜕变。

（二）开埠通商与西方旅游文化的冲击

自 16 世纪世界“地理大发现”以后，欧洲人冒险扩张的殖民精神以及海上探险旅行得到了极为迅猛的发展，他们越洋跨海的殖民掠夺，使世界格局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欧洲的航海家、殖民掠夺者以及旅游探险者漂洋过海，跨越文化空间，客观上将世界上各大文化圈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大联结。一方面使得世界逐步开始形成一体化，各大文明之间的交流与碰撞、接触与冲突、融合与裂变使人类文化得到空前的交流与发展，促进了人类地理知识的大增长和眼界的大扩展，提高了人类认知的能力；另一方面，他们的重商逐利、殖民扩张，带来了资本主义和殖民势力在世界范围内的急剧膨胀，使得美洲、非洲和亚洲各国人民受到沉重的奴役和压迫，面临着巨大而深重的民族灾难。世界的“一体化”过程，也是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发展与扩张世界的过程，这一过程使得欧洲人成了近代世界的“中心”，而中国等其他文化圈作为“边缘”地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转变与冲击。

历史的演进往往是血腥的，充满着暴力与恐怖，也带来了神奇的探索和创造。在这种世界格局大变动，社会大转型的时空背景下，中国近代的旅游开始发生了风格与内容上的巨大变化。一反古代文人学士的那种“适情悦意”、“独抒性灵”、文雅柔秀的游风，变得急切愤懑、恣意任行、急功近利，且游步沉重、形态多样。在欧洲人的冒险扩张的游步之后，首先是商旅的匆匆游步，开始“游于深山海国……危身取给”，继而带来社会各阶层为救亡游、为生存游、为抵御外辱游、为求知寻道而瀛寰漫游……旅游风格厚重，旅游内容多样化，旅游范围迅速扩大，由“多囿于中国一隅”的传统旅游范式，开始走出国门，向海外迈出坚实的游步，这是近代旅游的风格特征之一。

武汉旅游的近代转型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开始的。

1. 坚船利炮下的被迫开放

早在 15 世纪, 当中国明代伟大的旅行家、航海家郑和七下大西洋之时, 欧洲的近代工业文明就已初露端倪。他们步郑和之后尘, 掀起了世界历史上又一次跨越海洋的探险高潮, 尽管欧洲人当时的航海设备、科学技术远不及中国郑和当时所拥有的先进水平。据史料记载: 郑和 1431~1433 年的第七次远洋旅行, 带有舰船 900 艘, 船员 27 000 人, 历时一年零七个月, 几乎走遍了南海、北印度洋沿岸地区以及阿拉伯半岛沿岸和非洲东岸国家。除了普遍使用罗盘辨别方向外, 其舰船的吨位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认为: “关于郑和所率领船队的规模、实力和适航能力来看, 其中几艘运载金银财宝的大船, 大约 400 英尺, 排水量超过 1 500 吨, 这些船只完全可以绕过非洲航行。”^① 费正清认为: “在此之前, 世界上从未有过如此大规模的航海活动。这些中国船只横跨印度洋, 较葡萄牙人 1498 年绕过非洲到达印度的远航差不多早一个世纪, 较西班牙舰队震动西方历史的绕英格兰短途航行早约一个半世纪”^②。可以说中国的航海技术在当时世界具有领先地位。然而, 中国却由于封建社会的自身缺陷, 在举世瞩目的“郑和七下西洋”之后自动地放弃了发展海外贸易并进而领导世界潮流的机会, 相反, 欧洲人向世界扩张的海洋探险则异乎寻常地迅速发展。正如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所说的那样: “征服海洋, 使欧洲在世界居领先地位达几个世纪。”^③

由于中华民族旅游性格的稳健性与内敛性特点以及明朝以来统治者在认知世界观念上的局限性, 加上明朝当局所采取的“重义轻利”、“重陆轻海”等政策, 使中华帝国一度领先世界的航海探险旅游十分遗憾地终止了。1433 年郑和完成了第七次航海探险, 1436 年, 明朝英宗皇帝下令禁止建造远洋船只, 以后又下令禁止保留超过两根以上桅杆的帆船, 郑和的远洋船舰也渐渐烂掉, 一大批优秀的航海科学家只得成为小运河上的木船帮工。随之而来的“海禁”, 使中国自动退出了探询与征服世界大洋的竞技场。而欧洲人的航海旅游、海上扩张则愈加迅猛。其航海方式、航海技术、航行设备以及航行远程等已将自以为是地球中心的明清帝国远远地抛在后头。至 19 世纪 40 年代英国人凭着船坚炮利的强劲威力, 以扩张的脚步踢开了中国关闭多年的大门。

① [美]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 北极光出版社 1989 年版, 第 64 页。

② [美] 费正清、刘广京:《剑桥中国明代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第 467 页。

③ [法] 布罗代尔:《15 至 18 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 1 卷, 北京三联书店 1992 年版, 第 481 页。

1840年,大英帝国打着通商的旗号,悍然发动了震撼世界的侵华战争。他们以坚船利炮打破了大清帝国锁国时代的沉寂,将熊熊的战火在中国沿海诸省最先点燃。1842年8月29日,大清国在英国武力威逼下,被迫在南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第一次鸦片战争宣告结束,中国自此开始了漫长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

然而,第一次鸦片战争对于“地为衢国”,“处天下之中枢”的内陆城市武汉来说,虽“外侮纷乘,皆战之于门户之外”,“海上构兵,沿海诸省首当其冲”,武汉因“地处堂奥,始终未与其患”。但是,外患虽未迅速祸及武汉,而内战却给武汉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当时太平军三克武昌,几进几出武汉三镇,曾国藩及胡林翼之湘军对太平军和捻军的反复围剿,武汉内战频繁,兵燹不断,经济、文化创痛尤深,城镇人口锐减。显然,由于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硝烟并没有直接弥漫到武汉的上空,武汉封建内陆性镇邑的特点依然未变。

是什么原因和契机使得武汉突然在近代发生了巨大的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使她从封建镇邑城市向近代都会城市转变呢?

应当说,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武汉被迫开埠通商这一历史的偶然,导致了武汉的历史车轮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使她获得了迅速走向近代的契机。尽管这个契机是伴随着屈辱和血泪、沉重和无奈,但武汉还是被迫拖进了西方旅游冒险者所创导的“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之中,开始了她的荣辱交加、喜忧掺半的近代化的“奇异旅程”。

1856~1858年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武汉开始变为帝国主义列强争夺的势力范围,封建内陆性城市开始解体。根据《天津条约》之规定,大清帝国除《南京条约》中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为通商口岸外,还必须开放牛庄(后改为营口)、登州(后改为烟台)、台湾(台南)、淡水、潮州(后改为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天主教、耶稣教可以到内地自由传教;外国人可以到中国内地自由通商和游历;外国商船和军舰皆可驶入长江各口,并减轻商船吨税,降低关税,海关雇佣外国人帮办税务。同时承认鸦片贸易的合法化。

《天津条约》给外国列强到内地传教、通商、游历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也给武汉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使深居堂奥的武汉正式卷入了国际市场的浪潮之中。

1858年11月8日,英国特使额尔金在上海同清政府代表桂良、花沙纳等签订了《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十款》。签约的当天,额尔金就率领“狂怒号”、“报应号”巡洋舰及“迎风号”、“鸽号”、“驱逐号”炮舰,从上海启程,沿途对长江航道、两岸据点与市镇作详细的测量与侦察。他们经历了二十多天的航行,于12月

6日抵达武汉的江面，在拜会了湖广总督官文并侦察了武汉三镇全貌之后，额尔金率舰队返回上海。显然，额尔金此行只是试探侦察并炫耀其武力。

由于太平军的战火遍及长江两岸的缘故，英国自1858年底对武汉进行军事侦察之后，两年多以后英国人才决定于1861年在汉口正式开辟商埠。咸丰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即1862年3月7日），英国官员威司利（Wesley）与上海宝顺行（即颠地行）行主韦伯（Weber）通事（翻译）曾学时、杨光谦以及随行人员40~50人，乘轮船抵达汉口。次日，过江到武昌拜见总督官文，初步商谈武汉开埠通商之事。威司利还委托汉口都司李大桂代寻栈房一所，每年交给房主租金400银，并留下杨光谦及随员数名住在栈房内，韦伯等人返回上海。

1861年3月初，英国海军提督贺布与英参赞巴夏礼（Harry S. Parkes）率领远征舰队共4艘兵舰，载兵400多人由上海到汉口，正式办理汉口开埠事宜。巴夏礼在汉口镇下街尾杨村口勘定租界地址，并租地458亩，听由英商自由使用。至此，英国人在武汉建立了合法的活动据点，武汉的租界历史也自此而开始。

英国人宣布汉口开埠之后，俄国商船在事先不通报的情况下也陆续来到武汉，并在汉口兑换桐油、白蜡等货物。俄国船只“来去自由，亦无须事官偕来，语言不通，任意装载往来，殊属莫从理喻”^①。重商主义与殖民战争的结合，“国旗跟着军舰走，商人带着财富归”的掠夺方式在武汉开始出现了。随着英帝国的舰船接踵而来的还有美国、法国、德国、丹麦、荷兰、意大利、比利时、日本、瑞士、秘鲁、葡萄牙、刚果等17个国家（见列强争利于武汉的时间表）。

它们纷纷在武汉建租界、设领事、盖工厂、开银行、立商号、修教堂，开始全面推行“一种属于商业性质的抢劫和一种属于抢劫性质的商业贸易”。英国学者威·哥斯特曾说过：“掠夺、谋害及经常诉诸武力，为欧洲国家与中国贸易的特色。在欧洲人还未充分获得地位以前，他们已获得‘洋鬼子’的这个难堪的称号。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所有西方蛮夷的目的就是战争与抢劫。”^②列强们自称他们是“西方文明商业的先驱者”，而实际上“与其说合乎和平文明人之道，毋宁说同于盗贼。他们不仅应驱逐于帝国之外，而且应当由中国当局剿灭。他们飘忽于中国南部海岸，掠夺焚毁乡镇与城市，杀死和平男女及幼孩以百数计，而后安然航海离去。或者登陆之后，以最暴戾残忍的手段强迫当地中国人为他们筑堡垒，掳掠妇女，抢夺本地人所有任何贵重之物，违犯一切礼仪与人道的信条”^③。武汉这个“九省通衢”之地，的确使列强欣喜若狂。

①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876页。

② 于醒民、唐继无：《从闭锁到开放》，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第57页。

③ 《中国与远东》，台湾淡江大学出版社，第136页。

列强争利于武汉的时间表

国 别	时 间	地点	条约名称
俄 国	咸丰八年五月三日（1858年6月13日）	天津	天津条约
美 国	咸丰八年五月八日（1858年6月18日）	天津	天津条约
英 国	咸丰八年五月十六日（1858年6月26日）	天津	天津条约
法 国	咸丰八年五月十七日（1858年6月27日）	天津	天津条约
德 国	咸丰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1861年9月2日）	天津	天津条约
丹 麦	同治二年五月二十八日（1863年7月13日）	天津	天津条约
荷 兰	同治二年八月二十四日（1863年10月6日）	天津	天津条约
西班牙	同治三年九月十日（1864年10月10日）	天津	和好贸易条约
比利时	同治四年九月四日（1865年11月2日）	北京	通商条约
意大利	同治五年九月十八日（1866年10月26日）	北京	通商条约
奥地利	同治八年七月二十九日（1869年9月2日）	北京	通商条约
日 本	同治十年七月二十九日（1871年9月13日）	天津	通商章程
瑞 士	同治十一年二月（1872年3月）		海关税则
秘 鲁	同治十三年五月十三日（1874年6月26日）	天津	通商条约
巴 西	光绪六年八月（1880年9月）		
葡萄牙	光绪十三年十月十七日（1887年12月1日）	北京	和好通商条约
刚 果	光绪十五年六月（1889年7月）		

2. 近代都会城市的确立

武汉的门户被列强的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之后，既给武汉的发展带来了民族的屈辱和政治的压迫，但也在客观上获得了迅速迈向现代化浪潮的历史机会，使武汉这一深居堂奥的内陆封闭型市镇迅速转化为外向型的国际商港。武汉城市的发展轨迹从开埠之后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武汉在列强通商的战略地位也日益重要。“锁国时代之楚与开通时代之楚异，通商伊始之楚与门户洞开之楚异。今日之楚乃因各国竞争之局势而重其价值者也。”^①“楚为九省总汇之通衢，江汉殷轸，商贾辐辏，白晝人种联翩并集，以交易总额计之，则长江商埠除上海外，无一能凌驾汉口者，岂非其位置之善，为腹地所罕有耶？吾闻日本矢津昌永之言曰：‘将来铁道四通八达，则滨海繁盛之区，将移于陆地，现为航路、铁路换气之时，故并行而不相让’。呜呼！吾焉知芦汉铁路告成之后，汉口商务不駸駸焉驾上海而上之也。地球资本家之掷资本于是地，以谋吸取吾之子金者，夫岂不十倍百倍于今日也。是为经济上竞争

① 张继熙：《叙论》，《湖北学生界》1903年1月29日。

之中心点。上江航路千余里，下江航路二千余里，皆以汉口为起点。”^①

列强的军舰与商船，通过长江水道将武汉推向了世界，同时也将另一个新的世界带到了武汉。正如列宁所说的：资本主义破坏了旧时经济体系的孤立和闭关自守的状态（因而也破坏了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狭隘性），把世界上所有国家联结成统一的经济整体。武汉在外力的巨大冲击之下，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结构均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大变动、大改组。外国传教士、商人、商团纷纷登陆武汉，各式欧美商品纷纷通过武汉向中国内陆倾销。武汉商旅大兴，以商人为主体的旅游队伍源源不断地莅临武汉，并且不断壮大。商旅的扩大、移民的增多、流动人口的日益加剧，促使武汉开始从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从封建专制走向半殖民化式的近代化旅程。

开放，无疑将会带来武汉经济的发展，加速武汉近代化的进程，并且将会使得武汉人在认识自身的同时获得一种世界性的参照物，能够睁开眼睛看世界。然而，历史却又是这样的残酷，武汉是在被迫无奈的情况下而开放自己的大门的。那种被抢劫、被掠夺、被蹂躏的辛酸以及强烈的民族屈辱感、创伤感又无时无刻不在噬咬着武汉人的民族尊严。尽管如此，武汉人还是带着痛楚和屈辱，带着心灵的煎熬艰难的开始了武汉近代开放史。

自 1861 年武汉被迫开埠通商之后，来鄂的外国游历者与日俱增。他们中间有传教士、有商人、有军人，也有外交官员和探险家。据台湾学者苏云峰统计，自 1861 年至 1916 年，外国传教士深入湖北 54 个州县，传教兴学，举办医疗事业的共有 391 人（见列强各教派在鄂之境内分布表）。

列强各教派在鄂之境内分布表

地 名	教 派	开教年	男	妻	女教士	合计
安陆	循道会	1891	3	2	2	7
樊城	信义会	1894	5	5	4	14
	行道会	1891	2	2	2	6
房县	路德会	1912	3	2	2	7
汉口	美、圣经会		1	1		2
	英、圣书会		2	1		3
	宣道会	1908	1	1		2
	内地会	1889	2	2		4
	救恩会	1913	5	4		9
	万国邮电基督	1914	1	1		2

① 张继熙：《叙论》，《湖北学生界》1903 年 1 月 29 日。

续表

地 名	教 派	开教年	男	妻	女教士	合计
汉阳 武昌	会	1861	8	5	5	18
	伦敦会	1877	1	1		2
	苏、圣经会	1868	6	6	6	18
	美、圣公会		1	1		2
	圣教书会	1912	7	6		13
	安息日会	1862	6	4	5	15
	循道会	1909	3	2		5
	青年会	1863	1	1	2	4
	循道会	1893	3	3	1	7
	宣道会	1867	2	2	3	7
	伦敦会	1868	17	8	19	44
	美、圣公会	1890	4	4		8
	行道会	1865	7	4	3	14
	循道会	1905	3	2		5
	青年会	1901	2	2	4	8
黄州	内地会	1898	1	1		2
黄陂	伦敦会	1895	1	1		2
宜昌	内地会	1878	5	3	7	15
	苏、福音会	1886	2	1	3	6
	美、圣公会	1894	2	2	1	5
	瑞典教会					
监利	同 上	1909	2	1		3
荆州	同 上	1909	4	4		8
	行道会	1908	2	2		4
荆门州	同上	1907	2	2	1	5
蕲水	瑞典教会	1916	2	1		3
均州	路德会	1899	2	2		4
来凤	P.B.I.M	1913	1			1
老河口	内地会	1887	1	1	3	5
	路德会	1894	8	6	8	22
麻城	瑞典教会	1905	1	1	1	3
南漳	行道会	1905	2	2	1	5
沙市	美、圣公会	1886	1	1		2
	瑞典教会	1896	4	4		8
淝口	北信美会	1913	1	1		2
	路德会	1913	2	2		4
	信义会	1913	1	1		2

续表

地 名	教 派	开教年	男	妻	女教士	合计
施南		1915	1			1
石花街	路德会	1904	1	1	1	3
襄阳	行道会	1900	2	1	2	5
孝感	伦敦会	1880	2	2	2	6
随州	循道会	1897	2	2		4
太平店	路德会	1897	1	1	1	3
大冶	循道会	1889	2	2		4
德安	同 上	1808	2	2		4
皂市	伦敦会	1899	3	3		6
枣阳	伦敦会	1902	3	2	2	7
武穴	遵道会	1871	3	3		6
郧阳	路德会	1898	2	2		4
合计	57		167	132	91	390

除传教之外，西方商人来武汉开办洋行的截至 1911 年共 150 家，商人总数 3 022 人（见“湖北洋行及洋商统计表”）。

湖北洋行及洋商统计表（1891～1911）^①

年份	洋行数	指数	洋商数	指数	活动地区
1891	32	100	412	100	汉口、沙市
1901	76	238	570	138	汉口、宜昌、沙市
1911	152	475	3 022	734	同上

以上统计只是一些到领事馆登记的来华人员，而数量更多的来汉的外国水手、流民和不愿到领事馆登记的外国人则无法统计。如此大量的外国游历者川流不息地涌进武汉，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长期住在租界，他们的行为无疑极大地影响着武汉本地居民。这些冒险家带着各式各样的欲望而来，在武汉及内陆投机钻营、冒险发财，使得几千年来封建统治者的各种礼仪规范在他们面前斯文扫地，而近现代资本

^① 此表引自苏云峰：《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 1860～1916·湖北省》，台湾近代史研究所 1981 年版。

主义的制度和思想文化观念则无情地冲击和影响着武汉，使武汉贸易日繁，开始朝着近代化的路径迈出艰难的步伐。

开埠通商，首先使武汉的航运业、转口贸易业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1871 年湖北设立招商局，开始由帆船时期进入轮船时代，而外轮则自开埠之后纷纷挤入长江黄金航道，纷纷向武汉输送列强的商品并掠走无数的资源。据 1907 年的调查统计，当时，沪汉航线上的外轮公司有 7 家，其吨位、船只数和所占航运市场份额见沪汉航线轮船公司统计表。

沪汉航线轮船公司统计

公司名称	船只数	吨位数	百分比
(招商局)	4	5 859	19.07
太古洋行	3	5 493	17.88
怡和洋行	3	5 191	16.90
大阪商船会社	3	4 387	14.30
鸿安公司	4	2 731	8.89
瑞记洋行	2	2 290	7.45
美最时洋行	3	3 450	11.20
麦边洋行	2	1 324	4.31
合 计	24	30 725	100

航运的迅猛发展，使得武汉的贸易额直线上升。1867 年武汉贸易额达 4 300 万关两，到 1910 年翻至 1.72 亿关两，增幅达 3 倍多。开埠 50 年的时间里，武汉外贸总额在全国大商埠中名列第二，仅次于上海，超过了广州与天津。当年的《国风报》有文评论曰：“上海者，为中国贸易之总汇；汉口者，为内地贸易之中枢，扬子江流域其他各港，皆不过此两地之附庸而已。”^① 航运的发展也使得流动人口急剧增加，旅游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武汉的近代工业，在开辟通商之后开始由手工作坊向近代工业化迈步，而外资工厂是武汉近代工业的始作俑者。从 1861 年到 1911 年，外商在武汉设有工厂 11 间，主要有砖茶、蛋品、炼金、造冰、豆油、纸烟、发电、冻肉、炼锑与玻璃。这些工厂都是利用新的机器设备与新的管理技术，并雇佣本地廉价的劳动力和利用两湖及安徽、江西的低价原材料。最为著名的有俄商的砖茶厂和欧洲人的制蛋厂。如下表：

^① 见《国风报》23 号第 4 页。

汉口外国制蛋厂产量统计^①

工 厂	国籍	所在地	设立年份	日产蛋粉(磅)	日产蛋液(磅)
美最时蛋厂	德	英界	1887	1 000	5 775
礼和蛋厂	德	英界	1887	1 000	2 310
元亨蛋厂	德	英界	1889	400	5 775
瑞兴蛋厂	德	日界	1891	1 000	5 775
公兴蛋厂	法	法界	1893	400	2 310
宝带蛋厂	德	桥正街	1902	1 848	9 240
碑格蛋厂	德	同上	1905		

工厂的大量设立,产生了一大批新的产业工人。广大农村的无业农民开始纷纷流向城市,新的市民阶层开始出现。城乡的往来开始加剧,城市开始成为广大农民向往的地方。

武汉近代的银行业肇始于 1863 年的英国麦加利银行,随之英国的汇丰银行紧跟而来。继英国之后,德、法、俄、日、比、美纷纷在武汉设立银行,到 1882 年达 40 家之多,后因茶叶贸易的亏损,各银行或停业、或合并。在汉的主要银行见下表:

外国在汉银行一览表(辛亥革命前)^②

行 名	国 籍	总行地址	汉口分行地址	设立年代
麦加利	英	伦敦	英租界	1863
汇丰	英	香港	英租界	1866
德华	德	上海	德租界	1895
华俄道胜	华、俄合资	彼得堡	俄租界	1896
东方汇理	法	巴黎	法租界	1902
正金	日	横滨	英租界	1906
住友	日	大阪	歆生路	1908
义品放款	法、比合资	布鲁塞尔	阜昌街	1911(一作 1912 年)
花旗	美	纽约	英租界	1910

除航运、工厂、银行之外,外国洋行是武汉最为引人注目的机构。开埠以来,

① 此表引自苏云峰:《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 1860~1916·湖北省》,台湾近代史研究所 1981 年版。

② 此表引自苏云峰:《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 1860~1916·湖北省》,台湾近代史研究所 1981 年版。

武汉洋行的发展尤为迅猛。自 1861 年至 1910 年，各国在武汉主要洋行和商号多达 120 多家。这些洋行主要经营进出口贸易，还兼营航运、房地产、金融汇兑与发行钞票等业务，他们通过中国买办阶层倾销外国工业品，掠夺中国土特产，以资金和特权优势，占领中国市场，靠不平等贸易攫取武汉及内陆地区的巨额财富，并培植了一批近代买办阶层，造就了一批中国近代商人。买办是这一时期不可忽视的特殊阶层。他们是靠发洋财起家的，没有洋行就没有买办。但买办也是商人，并非个个买办都是卖国贼，他们中间有许许多多不同的情况。早期的买办大多是洋商的合伙人，而不是唯命是从的打工仔。经济学家黄逸峰先生认为：“早期的买办活动，主要在经济方面。他们和外国资本家在华企业之间存在着一种奇特的关系，既是雇佣的、又是相对独立的，根据契约规定，实现彼此之间的权利义务”。^① 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斥责所有的买办都是卖国贼。于醒民、唐继无先生认为：“无法用单一的色彩画出卖办的脸谱来。事实上根本不能用画脸谱的办法来研究买办。他们所面临的挑战和机会都是前所未有的，而他们开风气之先的勇气也是前所未有的。这些人不以洋化——在当时洋化等于禽兽化——为耻。他们是第一批造洋房的人，也是第一批穿西服的人。他们不怕被人指着脊梁骂假洋鬼子，在固守夷夏之大防的中国，敢于开创西化的风气。他们起先是驾着马车在大街小巷奔驰，后来又坐着各式各样、一辆比一辆更漂亮的轿车在马路上疾驶”。^② 应当承认，武汉早期的买办为武汉的开放与发展作出了不可否认的贡献，不仅仅在商业上，在社会风气的转换、休闲娱乐方式的改变等等方面都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外商与外资的大量涌入，不仅影响了武汉工业、金融、外贸的进程，也深刻改变了武汉的城市面貌。英、德、俄、法、日在汉口设租界后，租界区的各式各样的洋楼鳞次栉比，像是在举办一个世界建筑博览会，它既展示出欧洲各国以及东方日本的艺术，又把先进的市政规划理论、市政管理思想带到了武汉。租界区如同西方现代文明的窗口，使武汉人透过这个窗口能够效仿西方建筑上的现代文明。在租界“建筑博览”的影响下，武汉城市建筑面貌大为改观。汉口商界各团体、商会等，纷纷“建造洋式三层楼房”作为办公之用。汉口邮政大楼亦是“洋楼数层规模宏敞”^③，连半官方的湖北专议局也采用了仿西式建筑的现代结构来建造。民间商人、买办、士绅则更是纷纷效仿。当时湖北总督官府治所武昌，“城内有不少外国建筑和工厂，其中以官方、半官办机构居多”^④。可见流风所及，无论官民了。

开埠之后，武汉的城市人口骤然大增。汉口人口在咸丰时期（1860 年）约 10

① 黄逸峰：《关于旧中国买办阶级的研究》，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② 于醒民、唐继无：《从闭锁到开放》，学林出版社，第 83 页。

③ 见侯祖等编：《汉口县志》卷 9 交通志，湖北省长公署（1920 年）。

④ 皮明麻：《近代武汉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15 页。

万多人,但开埠不到 50 年,汉口城区人口在光绪十四年(1908 年)增至 244 892 人,宣统三年(1911 年)汉口市区人口猛增到 59 万人^①。此外还有大量的流动人口不计其内。人口的剧增与流动人口的加大,使武汉近代旅游迅速转型,旅游主体由文人学士、封建士大夫以及各级官宦开始向广大商旅和平民普及与下移。

同时,西方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经营理念也深深地影响了当时武汉市民文化和社会风俗,传统的旅游文化观念受到了巨大的影响与冲击。

开埠之后,更深刻的影响还是西方重商主义思潮在武汉日益扩展。

3. 重商逐利的思潮冲击与扩张

欧洲航海探险旅行者从他们开始踏上航海甲板的那一刻起,就挂上了“重商逐利”的旗帜,哥伦布曾在他的航海日记中写道:“我尽一切可能去找有黄金和香料的地方。”“黄金,这是最好的东西,谁有了它,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甚至能把人的灵魂引入天堂”。^②欧洲人的近代航海史,也是他们为新兴资本主义工商业寻找原材料和海外市场的冒险扩张史。“国旗跟着军舰走,商人带着财富归”^③。他们所有的一切,不外乎是通商、掠夺资源和文化扩张。

西方工业革命以来,人们开始从中世纪的对土地的依恋和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重商逐利的思潮在整个欧洲悄然兴起。那些神气活现的商业冒险家、那些孜孜经营乡村磨房和手工工场的业主们,还有那些立志开拓未来的思想家们,都在努力地营造一种全新的“重商逐利”的社会气氛。哈孟德夫妇在《近代工业兴起》一书中描写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人价值观念时写道:“人生的目的不是要去战斗、去祈祷、去沉思、去创造、去享乐,或者去变成什么样子,而是要去图利。如果他是主人,就得为自己图利;如果他是仆人,就得为别人去图利,这就是人的职责,而社会的职责就是不去加以阻挡。”^④十六十七世纪的西欧,以鼓励发财致富、追求超额利润为时尚的社会思潮大为流行,人们处处感觉到“世界正在努力向财富表示敬意”,“对于财富的获得和利用所加的每一种约束都落了个不美之名,一个人寻求私利就是有益于公共的事的那个信条,就像牛顿的发现一样被大家接受”。欧洲的无数冒险者,随着他们的商船、大炮和新式武器的轰鸣声在世界各地频频出现之时,也把他们那种重商逐利的思潮带到了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为了获得暴利,欧洲的无数冒险者开始大量地走出家园,到海外经商。据统计,1821~1910 年间,大约有

① 《湖北武昌等 11 府属 68 州县城议会议员姓名履历清册》(1911 年)。

② 《申报》1901 年 3 月 16 日。

③ 《申报》1902 年 2 月 20 日。

④ 哈孟德夫妇:《近代工业的兴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84 页。

五千万欧洲移民在其他大陆定居下来。^① 这些重商主义者大肆宣扬：“我们必须有钱，如果我们不能从本国的生产中得到，我们必须从外国人身上赚到。”^② 所以 19 世纪末，欧洲几乎控制了面积约为 2 500 万平方公里的海外殖民地和这些地区近 6 亿人口。同一时期内，先后有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被卷入到欧洲人世界“掠夺、探险”的范围内。欧洲冒险者探险旅游活动在其旅游文化上的具体表现有如下几点：第一，旅游主体的冒险意识、进取精神以及对黄金香料等物质财富的掠夺，得到了极大的张扬、歌颂和肯定。例如丹尼尔·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班扬的《天路历程》等小说，都在极力赞颂欧洲人的探险进取精神和坚忍不拔的意志；甚至连哥伦布等撰写的航海日记也成为当时的畅销书。第二，旅游范围的急剧扩大和旅游客体的日益多样化。欧洲人再也不像中世纪时期那样，仅仅限于一地区或一国度的漫游。工业革命之后，整个世界范围内的山川地貌、江河湖海、各色宝藏都成了他们的旅游对象。他们不仅仅掠夺黄金、象牙与香料，同时，他们也不断探访和研究并观赏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名胜古迹和山川风物；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许多地理新发现，成了欧洲人 20 世纪之后的旅游胜地。第三，旅游设施和旅游服务的中介体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如造船技术的空前改进，航海技术与地理观念的更进一步的提高，以及旅游医学知识的巨大进步，使得旅游工具得到了重大改善和进步。同时冒险旅游还促使一系列的旅游制度及规范的形成和完善。许多为冒险旅游服务的机构纷纷出现，如金融对航海探险的支持与帮助，政府对旅游范围的种种纠纷给予的调解与协商等，使得这时期的西方旅游文化具有强烈的扩散性和影响力。

开埠后的武汉，随着大批的欧洲旅行者纷纷涌入，西方的工业产品和“文化产品”也随着长江这条黄金水道登陆武汉。西方旅游文化的影响可分为硬件器物层面和精神观念层面。

在硬件器物层面，西方旅游文化的冲击影响主要表现在交通方式上，以动力机车与铁路运输替代传统的人力及畜力运输，以轮船替代传统的帆船，使近代武汉走上了逐步告别帆船的旅程；在通讯方式上，以电报、电话替代传统的驿站、烽火台等信息传输方式；在旅游主体上，电光戏、幻灯、电影院以及公园、波罗馆、跑马场等西式娱乐设施丰富了传统的私家园林、古寺、古庙、名人胜景等旅游主体。

在软件的精神观念层面的影响更为广泛。突出的表现之一，就是开埠之后武汉的重商思潮与日俱增。19 世纪末期的武汉，由于开埠以来的西洋文化思潮的影响，重商主义迅速兴盛。人们开始反省与批判传统的“重农抑商”、“强本抑末”的传统

① C.E. 布莱克、E.C. 赫尔赖克合著：《二十世纪欧洲史》，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3 页。

② 米歇尔·博德：《资本主义史 1500—1980》中译本，东方出版社，第 34 页。

观念,并积极评价商人和商贸活动的作用与意义。1899年4月30日,张之洞创设《湖北商报》,他认为:“商务为富国第一义,内保利权,外筹抵制,居今更不容侵。”^①

许多有识之士从社会发展的趋势看,已明显意识到社会已进入到一个万国通商的时代,即“商战时代”。因此,中国要想在世界商场上一争雌雄,就必须彻底转变传统的“农本思想”,以“工商立国”。当时在武汉广为发行的《申报》在宣传重商主义方面最为得力。1857年5月7日的《申报》有人撰文道:“宇宙之最能致富者,工商之事也。而中国则反皆谓为逐末,其谓为务本者,惟农桑而已……今中国若欲能行西国理财之政,先应恤商,次则惠工,至于不夺民时,中国早已知之矣。若再能恤商惠工则税务之收必能数倍于钱漕矣,中国岂有不富过他国哉?”1896年3月9日的《申报》载文:“中国之政崇本抑末,历代以来皆重农贱商……降至今日,环地球皆为通商之国,终千古皆为通商之局,商务之盛衰即人民贫富之所系,人民之贫富即国家强政之所制,又安可漠视商政而不加董理乎?”《申报》1901年6月19日有文疾呼:“治国之道,农商并重。然一国独立则在于农,辟群雄角逐则重于商”,“商固富强之始基而国民命脉之所系也。”1906年12月9日的《汉报》刊发《论今日商市之竞争》一文,鼓吹发展商贸,输出商品,参与“竞争”。“一国之元气何在乎?在财利。滋生财利何恃乎?恃生殖、博贸易。不有生殖,何以交易?生殖者固属交易之原料,第交易不求其发达,虽有生殖,尚非活动之财利也。”“今则虽开通矣,顾财利外输,元气日泄,转换收纳,尚无出纳之枢纽也,一呼一吸,力强者胜,其势不得不竞争,争而后可生,竞而后可存,生存之气,操之商市。故觐国力者,莫不注意商市之竞争。”“我商人知竞争乎?果推其竞争之心,计竞于一市,竞于一国,并竞于通商之各国,使各国之地皆我金碧丹朱、瑰奇结构之商铺,庶几乎龙旗飘拂,电灯闪烁,发为异彩,表特色于环球上矣。”^②可见,商贸已成为当时人们所认为的一项任重道远的光荣事业,商旅经商第一次被社会价值观念认同为国计民生之根本。

重商思想还表现为全社会对政府有关商业政策的关心。当时的商会、行会都纷纷要求政府改善商人的经商环境,保护商人的合法权益,以利于提高中国商业的发展水平和市场竞争力。他们希望“商之所恶,官必去之;商之所欲,官必成之;商或不能及,官必多方调护之,不足则更以军威予之”^③。

重商主义的兴盛还表现在商旅的社会地位的空前提高。当时的社会舆论,一改以往的“抑商”、“贬商”之口吻,时常给予商旅以诸多慷慨赞颂之词,如“商人

① 刘望龄:《黑血·金鼓》,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5页。

② 《汉报》1906年12月9日。

③ 《申报》1902年3月6日。

者，立国之要素也”^①，“商人在现世界为最重之人物，国家之富强视此为转移”^②。“国家不欲图强则已，欲图强非先致富不可，欲致富非爱惜商民不可，未有不保元气而可以存活者也。故曰商民为国家之元气也。”^③“资本家者，国家致富之元素也，一国之资本家多，则农工商业可以振兴而国富，一国之资本家少，则农工商业不易发达而国贫，此为一定不易之理。”^④当时既济水电公司的创办人宋炜臣，被张之洞视为“有为之士”，赠其官衔，资其巨资办厂；民族商人蔡辅卿、周仲宣、张松樵、万为伯、毛树堂、万泽生、黄文植等等在当时均享有极高的社会声望。当时武汉从商的人员不计其数，商会、商帮、公所、公馆等商团组织成为当时社会的一支十分重要的力量。

重商思潮的兴盛，带来了武汉商贸的空前繁荣，使得武汉人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和流动，客观上也带来了旅游的发展。在这巨大的社会价值观和行为习惯转型的过程中，早期的买办及其他商人是功不可没的先行者和思想观念变革最快的实践者。在同洋人的接触交往中，许多商人率先冲破封建主义礼仪之邦的种种束缚，以开风气之先的勇气在固守夷夏大防的中国，敢于开创西化的风气，较早地接受西方文明的熏染，在经济和社会生活方式中改变古老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特别是早期的商业买办在适应西方文化方面尤其值得一提。如汉口早期法商立兴洋行买办刘歆生，最早接受西洋文化熏陶，曾发起创建了汉口华商跑马场。尽管买办阶层在我国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是作为道义上被唾骂和被谴责的对象，因为买办们充当了东西方的中介人，但“很明显，买办是近代中外贸易的桥梁，他们是洋行组织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外国洋行—买办—中国商人构成了近代武汉中外贸易的主体”^⑤。买办之所以受到指责，“常常被人谴责为汉奸，因为起初他们服务于非孔孟之徒，后来他们辅佐的人又不是炎黄子孙。现代民族主义兴起以后，他们尤受中国爱国者的蔑视，被看作外国帝国主义经济上的走狗，因而同外国侵略者无异”^⑥。其实，买办也是一种商人，“是在华外国行号的中国经理，在外国行号同中国人的交易中充当中介人”^⑦。这种类型的商业中介人不是一种独特的外来的制度，而是在中国传统经济制度的框架中发展起来的。中国早就有“牙行”特许的经纪人制度，买办也是从牙行经纪人演变而来的。客观地讲，没有早期的买办阶层的存在，没有他们为世界市场所作的服务，为武汉走向世界所作的努力，武汉贸易的迅猛发展并迅速

① 《申报》1909年9月1日。

② 《申报》1909年11月6日。

③ 《新闻报》1900年12月9日。

④ 《申报》1909年6月10日。

⑤ 皮明麻：《近代武汉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7页。

⑥⑦ 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1页。

溶入世界近代化的大潮，将是一件不可能迅速成为现实的事情。

买办也是早期武汉旅游的创导者和身体力行者。他们模仿洋人的休闲生活和旅游方式，有的还积极兴建西式旅游设施以吸引更多的人参与旅游活动。如法国立兴洋行买办刘歆生，俄国阜昌洋行买办刘子敬，宝顺洋行买办盛恒山等，他们在闲暇之余，经常携带中西厨师和猎狗，或自备小火轮相邀到金口、沌口等郊野打猎，或携带家眷及佣人到庐山、鸡公山等风景区避暑。刘子敬还在庐山购买了旅游渡假别墅。刘歆生同刘子敬、周星棠（汉口商会会长）、梁俊华（实业银行行长）、韦紫峰（熙太昌茶栈经理）等一道集股筹资兴建汉口华商的跑马场，曾一度成为汉口旅游的一大热闹景点。王葆心的《汉口竹枝词汇编》（1915年）曾载有罗汉的一首赞叹华商跑马场的诗：“络绎香车去马场，春秋两赛竞华商，先鞭一着齐呼彩，赢得佳人为捧觴。”可见当时华商跑马场吸引游人之多，场面之热烈，也说明西洋旅游文化影响已渗透到人们具体的旅游休闲方式之中。

（三）西洋工业文明的移植与旅游方式的转变

武汉被迫开埠通商之后，列强凭着他们多年海外扩张冒险的殖民经历和在上海设立租界十多年的掠夺经验，开始在武汉如法炮制他们的殖民模式的掠夺，并建立他们的商品销售网和原料收购网。扬子江边的租界地是列强嵌在武汉城市中的一块资本主义的飞地，它既是列强为所欲为的乐园，也是列强掠夺财富的桥头堡，它更是列强文化入侵的登陆点。但是，武汉租界却是一个袖珍型的西方社会的模本，对于古老的内陆城市武汉来说，它无疑代表着一片陌生的天地、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既令人愤慨又令人憎恶，既令人不安又令人艳羡的神秘地区。租界足以向古代的武汉展示西方工业文明的丰硕成果，如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工业、建筑、贸易、市政建设与管理、文化娱乐、生活方式，一切的一切。武汉人自从租界设立的那天起，就开始在欧风美雨的浸润下，接受着西洋文明的挑战、冲击与影响，开始向西方工业文明迈出其沉重的步伐。正如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所说的那样：“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被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而且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也很愚蠢。但是问题不在于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态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实现自己的命运？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干了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①应当承认，列强在武汉开埠通商，对于推动武汉的近代化发展，使武汉由封建宗法制的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过渡等方面，也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6页。

1. 无处不“洋”的大商埠

近代世界一体化的趋势，或者说是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过程，是建立在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发展的势差结构基础之上的，这是一种梯形的、不平等的势差结构。“在这种结构中，少数工业化国家处于梯形的最上层，而大多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则处于梯形的最下层”，“近代世界一体化势差结构的存在，对不发达的国家和社会发展来说是极为不利的”，这种势差结构，“把资金与财富迅速从广大落后地区集中到少数发达地区，西方国家通过武力征服、政治控制和国际价格体系等手段，使各国间的交往与竞争处在表面平等而实质不平等的状况中”^①。开埠后的武汉，使这种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梯形势差结构”更加明显，处于强势的列强西方文化，向处于弱势的封建文化之间，产生着巨大的文化倾斜和冲击。使得近代的武汉变成了一个无处不“洋”的大商埠。

首先是洋教的输入。自 1861 年至 1915 年的 50 多年时间里，欧洲的“新旧两大教派在湖北 54 个州县设立教堂，置有不动产。连同动产在内，其资产总数为 340 万元，其中旧教约占 190 万元，新教 150 万元”^②。……由于新旧两大教派的“普遍深入，对湖北的社会产生了相当的刺激作用”^③。据 1916 年的调查资料，“湖北共有 23 个教派，其中属于新教者 21 个；外国传教士共 352 人，其中属于新教者 253 人，约占全部的 72%。二教均培养华人传教士，新教尤为积极，计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在湖北工作的华人传教士共有 1 018 人，拥有教徒 10 809 人”^④。可以认为，对武汉来说，“欧风美雨”的文化浸润，首先是以传教士为开路先锋的。在基督教传入东土佛国之时，西方文化开始迅速地影响和冲击着近代的中国知识分子。

洋教士既是西方漂洋而来的游历者，又是西方文化的传播者。他们中间确有一些贯悉满盈的侵略者，但也确实有一批洋教徒通过医疗、办学等社会福利事业来配合传教，很快在武汉以及湖北内地站稳了脚跟，不仅较好地改善了绅士及官府与教会的关系，而且使得两湖地区的部分绅士通过对医学等自然科学的接触，开始对西学形成比较公允、全面的认识。台湾学者嘉惠霖认为，“西方慈善事业为中国人的福利所设计的一切计划，再也没有比医药、传教会所采取的手段和目的更为聪明了……外国人开设医院，可以帮助扫除中国人的偏见和恶意等障碍，同时又可以为西方的科学和发明打开道路”^⑤。

① 乐正：《近代上海社会心态》，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9 页。

②③④ 苏云峰：《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 1860～1916·湖北省》，台湾近代史研究所 1981 年版，第 98 页。

⑤ 高钟：《文化激荡中的政府导向与社会裂变》，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83 页。

我们不排除洋教输入带有征服中国的殖民主义目的，但是，应当承认这么一个事实：西方近代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主要是由外国传教士带到中国来的。“历史让外国传教士玩了一个魔术：当他们打开《圣经》时，科学的幽灵也飞了出来。传教，作为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政策，本来是出于从精神上奴役中国人民、‘征服中国人的心’之目的；但是文化的交流与碰撞，自会产生预想不到的结果，尤其是新教，早已渗透着资本主义的文化精神，当其与衰朽的封建传统文化比肩时，前者的感召力与吸引力自不待言，而给后者带来的启蒙和师法的冲动则更是不可估量。”

“但是，如果认为传教士到中国来就是为了传播科学文化、普及科学知识的，那就不对了。科学是他们传教的手段，也是他们生活的组成部分，他们无法不体现、展示属于自己生命组成部分的东西。值得惊异的是，他们把宗教与科学奇妙地结合起来了，认定：科学来自上帝。圣约翰大学的《约翰声》杂志说：‘我们将传授科学，不仅因为科学有实用的价值，还由于科学真理和其他一切真理都来源于上帝。’这样，科学与宗教就成为难舍难分的孪生姊妹结伴来到了黄浦江畔。”^①

我们可以从传教士在武汉地区所开设的“教会医院一览表”看到传教士们是如何通过办慈善事业不遗余力地在武汉“扩大上帝的领地”的。

武汉教会医院概况一览表^②

所在地	医院名	国籍、教会别	设立年份
汉口	天主堂医院	法、天主教	1858
	普爱医院	英、循道会	1871
	普爱妇婴医院	英、循道会	1878
	仁济医院	英、循道会	1917
	仁济妇婴医院		
	同仁医院	各国合设	1917
	仁慈医院	法、天主教	1913
武昌	仁济医院	英、福音堂	
	仁济妇婴医院	英、循道会	
	普爱妇婴医院	英、福音堂	
	同仁医院	美、圣公会	1906
	爱德医院	天主教	1870

① 于醒民、唐继无：《从闭锁到开放》，学林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21 页。

② 苏云峰：《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 1860～1916·湖北省》，台湾近代史研究所 1981 年版，第 93 页。

也许洋教的渗入本身，其本意并非要与封建统治者对抗，但传教士在其传教的过程中所传播的“人人都是上帝的子民”，“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都在无意之中使接受者对封建等级统治的合理性产生怀疑和追究。最终使不少人因之而走向了反抗、推翻封建统治的革命斗争之中去。如辛亥革命功臣曹亚伯在《武昌革命真史》中就说过：“革命者天性之慈悲，而为世人除凶燥、求平等之事业也。予生八岁，闻屠人语，中国人有辫，乃降服外国人之标志，方今皇帝即外国人。予闻之愤甚，谓中国人不应许外国人作皇帝，谨记之，因藐视读书人之无志，惟斤斤于求为翰林，从无敢求为皇帝者。然于吾国之圣贤，极崇拜之，以其嘉言懿行，可为斯人之圭臬也。闻耶稣教为异端，痛恶之。年十五，至大冶县福音堂教士张长善处寻仇，大骂之曰：洋奴邪言惑众，吾若得志，必尽杀若辈而后已。张对予唯微笑。予奇之。自揣设有人指予辱骂，吾必不然。旋张示予一书，名曰《格物探源》，乃上海广学会所译。予生长于极闭塞之兴国崇山之中，见此新书，极其快意，欲借一读。张故靳而不予，予强借，顿悟守旧之非，即入大冶福音堂为信徒。于是家庭革命、社会革命，往复于胸中，不顾自身之一切，时与旧习惯相抗矣。”^①可见，西方文化的传入，在客观上是一种文化启蒙，对于封建文化也是一个极其巨大的冲击。

除洋教的传入之外，对武汉影响重大的还有洋商与洋行。如前文所述，至1911年止，在湖北的洋商总数达3 022人，洋行数达152家，而武汉一地的洋商就有2 862人，洋行125家。这些洋行几乎渗入了武汉社会各个重要的商业领域。在贸易输入方面，英美洋行主要垄断石油、纺织品的贸易；德商洋行主要输入五金机械、染料，几乎垄断此领域的贸易；日商洋行则在棉纱、食糖等方面与英美竞争；而在贸易输出方面，俄商继续垄断砖茶，英商主要垄断蛋品、红茶等，德商则在羊、牛皮、桐油、五倍子输出中占巨大份额，日商主要在棉花、油脂、杂粮、猪鬃贸易上占较大份额^②。洋商洋行的大量设立，不仅在贸易方式、方法、技巧上极大地影响着武汉地方商人，使他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尺度、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而且培植了一大批买办、雇员，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后来成为中国近代新式商人的主力。其中有一部分人后来成为民族资产阶级商人。

随着洋行的大量设立，使武汉的商业流通真正国际化，同时也带动了传统的工商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过去在汉口市场占主导地位的中国商业行帮亦更加兴盛。18世纪中叶时，汉口曾以所谓“汉口六大行”即“盐、米、当、木、花布、药材”著称全国。到19世纪后期，由于商贸的国际化，商业行帮发展成为“八大行”。正如叶调元的《汉口竹枝词》中所说：“（汉口）四坊为界市廛稠，生意都为获利谋，只

①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中华书局1927年版，第3页。

② 皮明麻：《近代武汉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8页。

为工商帮口异，强分上下八行头。”这里的“上下八行头”，指的是银钱、典当、铜铅、油蜡、绸缎、布匹、杂货、纸张等八大商业行帮。这八大行帮的贸易额几乎占武汉各商帮年贸易额 1.65 亿~1.7 亿两的 60% 左右^①。洋行的设立不仅吸收了许许多多的学徒、店员、走街、实习生等大量雇工，也使许许多多的民族商贩并入其商业网络，客观上带来了许多附属洋行的坐商与行商的诞生；同时，洋行的建立，带来的西方现代企业制度和它的管理模式，这对于传统的封建商贩无疑是一巨大的启蒙。商贸的繁盛极大促进了武汉城市人口的流动，尤其是各商埠之间的商旅往来，使近代武汉的旅游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由此衍生出了餐饮、娱乐及市民文化的繁盛。

与洋行开设的同时，列强为了寻求市场、掠夺资源，并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开始在武汉设立许多外资工厂。如前文所列，自开埠到 1911 年的 50 多年时间里，列强在汉口所投资开办的工厂共有 76 个之多，工厂种类达 11 种行业之多。这些外资工厂“多属食品民生工业，投资少，生产快，利润高，其主要市场既为其本国，则其行为不异夺取中国资源。中国人所得到的不过是一点原料费很低廉的工资而已”^②。洋行、洋厂的纷纷设立，使近代武汉的城市人口迅速增长。大量的外资企业需要廉价的劳动力，这形成了人口转移的第一股作用力——城市人。如英美烟草公司汉口烟厂，仅女工的雇用就达 5 000 人之多；日商的泰安纱厂，拥有 300 台布机，25 000 枚纱锭，需雇用 2 000 多工人。而农村经济的日益凋敝，大量的剩余劳动从农村溢出，造成人口转移的第二股作用力——农村人口推力，这样使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转移。特别是在洋行与洋厂的刺激下，近代武汉出现了一大批官办、商办和官督商办的洋工厂，也使得大量农村人口迅速向武汉市流动。有关资料统计，开埠前的武汉，由于兵燹不断，战乱频繁，武汉三镇人口不足 20 万，开埠之后到 1911 年，武汉“城区有户人口，约 80 万人左右，此外还有临时性的流动人员”。^③

外资工厂在大肆剥削内地极其廉价的劳动力和掠夺丰富资源的同时，也培养了一批近代产业工人，这些工人中的许多优秀者后来成为民族工人阶级中的中坚力量。同时，这些工厂的设立也为民族资本家提供了创办民族企业的范例。西方的企业模式以及管理制度，使带薪假日开始出现，为广大的产业工人参加旅游提供了时间与经济上的可能。

城市人口的迅猛增加，使旅游的主体与客体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城市的市场

① 民国《夏口县志·商务》，第 11~12 页。

② 苏云峰：《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 1860~1916·湖北省》，台湾近代史研究所 1981 年版，第 124 页。

③ 皮明麻：《近代武汉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18 页。

流通和消费功能得到了增强，城市的经济和空间规模得到了扩大，为后来旅游业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对武汉经济危害深重的除洋商、洋行对丰富资源的大肆掠夺外，无数洋货的输入，使民族工业惨遭冲击。英美为了彻底打开中国纺织品销售市场，以次等布料仿制中国土布，并以比中国本地土布便宜一半的价格倾销，使中国的织布业受到极为沉重的打击。仅 1880 年英商在武汉就销售洋布 59 030 匹，美国销售洋布 30 700 匹。使得中国的土布纺织业几乎完全被挤出市场，而英美的洋布则取而代之。除洋布外，洋油的垄断倾销，使传统的民族蜡烛遭到了致命的打击。还有洋线、洋纱、洋钉、洋火（火柴）、洋铁等等数不胜数的洋货纷纷挤入武汉市场，几乎所有的货架都成了洋天洋地的世界了。洋房、洋楼、洋建筑等使得传统的民族建筑黯然失色。

随着洋教、洋商的大量涌入，洋人资本纷纷进入武汉，西洋科学技术也随着被引入武汉，因而带来了武汉传统的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

2. 西洋科技带来交通、邮电的迅速发展

武汉开埠之后，西洋现代工业文明开始深刻地冲击内陆社会经济结构。尤其是在交通运输、工业制造、邮电通讯以及城市管理等方面，为武汉旅游业的诞生奠定了物质基础，提供了推动旅游业萌芽和发展的外动力。

首先是西洋科技对交通的巨大推进。旅游向来与交通密切关联，古代旅游的交通工具主要依赖马和马车，内河及海上航行也主要是木帆船，而蒸汽机的发明，对交通工具的推动带来了一场极为深刻的革命。蒸汽机车和蒸汽机轮船的出现，使近代的航行进入了一个繁荣时代。由木排、竹排、帆船主宰了千百年长江航运的历史，自开埠之后，被西方的洋船彻底打破。自“大火轮”驶入长江之后，一场水运技术的革命就正式开始了。西洋的“各式各样的轮船参加竞争，从拖曳船到海洋大轮船，从机器摇动螺旋推动的暗轮，到美国开来以左右舷引擎推动的大明轮，无不具备”^①。武汉素有“九省通衢”的美称，在长江黄金水道上，武汉素以商贸和航运以及交通枢纽的区位优势等引得无数文人学者的称誉。诸如“连舫累舰，百货云来”、“夜半车击毂，差鳞衔舳舻”，“贾客客舫，不可胜计”，“南市泊船延绵数里”，“二十里长街八码头”……举不胜举的诸多描述，无非是说明当时武汉水运的繁盛与航运之发达。然而，这一切的繁荣都是建立在封建社会传统的“自给自足”、“产销合一”、“生产流通”相一体的封闭式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并且主要的交通工具依然是竹木排、木帆船等运输工具。武汉开埠之后，洋船从世界各地蜂拥而至，长江上出现了世界近代航运史上罕见的洋船大展览的场面。木帆船独霸长江的局面很

^① 上海英文《北华捷报》1863 年 2 月 21 日。

快被洋船所改变。帆船与轮船相比，显然是不同的两个时代。轮船不仅速度快，费用低，且安全舒适，它为更多的人外出旅游创造了极便利的条件。

最早开辟汉口至上海航线的是英国太古洋行，随之而来的有美国、法国、德国和日本。到 1913 年航行汉沪之间的轮船公司主要有 7 家，请看下表^①：

汉口至上海各公司船期及吨位数（1913 年）

公司名称	航期（每周）	船 数	总吨位
日清汽船会社	4~5 次	8	24 332
太古洋行	4 次	6	16 763
怡和洋行	3~4 次	5	15 197
招商局	4 次	7	17 448
鸿安公司	5 日 1 次	2	3 017
美最时洋行	5 日 1 次	2	3 364
宁绍轮船公司	10 日 1 次	1	1 920
合 计	18~20 次	31	82 041

除汉沪线之外，汉口至宜昌、汉口至湘潭、汉口至常德、汉口至重庆等武汉上游航线也相继开通。并且，“从汉口驶向国外的轮船，可直达德国的汉堡、不来梅，荷兰的鹿特丹，埃及的塞得港，法国的马赛，比利时的安特卫普，意大利的热诺瓦，日本的东京、大阪、神户、横滨”^②，洋船成了武汉连接世界的流动的桥。它把无数的西方工业品带到武汉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科技与文明，它把武汉和中原内陆的巨额财富掠至大洋彼岸，也把许许多多的武汉人引向了世界。当年许许多多的游学海外的赤子，就是通过这些“流动”的桥通往世界的。

洋船的先进，在于它的动力——蒸汽机，而西方工业革命的标志性成果之一就是蒸汽机的诞生。蒸汽机是资本主义得以称雄世界的主要物质依靠，是近代新兴生产力的代表。洋船只是蒸汽机所创造的无数奇迹之一，交通、电力、通讯等部门，都因为有了这种在当时被誉为威力无比的蒸汽机而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蒸汽机”刚引入中国时，人们叫它“火轮机”，应用于船上动力时，轮船被叫着“火轮船”；当应用于火车时，人们叫它为“火轮车”，还有许许多多以“火轮”为名的洋机器都是由蒸汽机而派生出来的。

蒸汽机应用于交通，使铁路开始大规模的兴建。京汉铁路的建造，是武汉交通

① 苏云峰：《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 1860~1916·湖北省》，台湾近代史研究所 1981 年版，第 435 页。

② 皮明麻：《近代武汉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14 页。

史上的巨大革命。在铁路未通武汉之前，武汉“陆路交通工具，始终以一轮小车、轿子、驴马车、牛车与人夫为主”。汽车的出现也是到民国初年之后才有的现象。湖北铁路的修建最早并不是客运交通线，而是张之洞为办汉冶萍钢铁公司在湖北大冶所建的“大冶矿山铁路”，全长 50 里，1893 年完成。真正给武汉带来陆路交通运输巨变的是 1905 年 11 月全线通车的京汉铁路和 1912 年开始兴建、1936 年才全线贯通的粤汉铁路。南北交通大命脉的贯通，迅速改变了在近代中国经济格局的地位，使武汉从一个流域性的城市变成了全国交通枢纽城市，尤其是在商贸方面，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东方芝加哥”。不仅仅是武汉的商贸因此而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而且武汉的旅游也随之迅速发展。交通是旅游的必要前提条件，机械化交通工具的使用，使得大部分居民外出旅游成为可能，特别是除商旅之外的广大社会阶层也由于铁路的贯通而开始频繁出行，这在客观上使得旅游的主体迅速扩大。千百年来马车、牛车以及人力独轮车等传统的交通工具被威力无比的火车远远地甩出了现代交通市场。它安全舒适、经济快捷的优越性，以及与轮船相联合的“水陆联运”方式，使武汉的近代旅游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从武汉迅速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已成为现实。

随着火车大规模的应用之后，汽车在旅游交通方面也逐步普及起来。世界上的第一辆汽车是 1885 年法国人卡尔·本茨由汽油发动机代替蒸汽机安在马车上的，自此之后，世界交通史发生了又一次的根本性进步。我国的第一辆由汽油驱动的汽车是 1902 年由袁世凯从香港进口献给慈禧太后的生日礼物。同年上海也有了小汽车。武汉第一辆汽车是 1903 年由英国领事馆带来的，它是美国福特厂制造的，名叫“来路卡”。1908 年，法商利通洋行也带来一辆福特汽车。自此以后，汉口许多洋行都陆续购买了汽车。

武汉人拥有汽车是在 1909 年以后，首先是大买办刘子敬、韩惠安、梁俊群等购买了汽车，以后又有一些富商、买办私人购买了汽车。但当时的小汽车都是供大亨们本人享用的，没有用于公众交通。民国之后，武汉汽车渐渐多了起来。最早开汽车行的是法商利通车行和英商中央车行，后来俄国也在三阳路开车行。中国人开车行是 1916 年才开始的。1916 年上海人盛东生、盛福生兄弟在汉口北京路开办了上海汽车行，董宝福在兰陵路开办了宝亨汽车行，湖北人罗洪喜、罗怀喜开办了扬子江汽车行。这三家是中國人在汉口最早开办的汽车行。

汽车行的诞生，是由于当时市场的需求。民国初期，许多买办、官僚、富商、资本家及其太太、小姐喜欢乘汽车兜风、赶马场、赴舞会、迎新人、看风景，乘汽车成了一种时髦的风气，因此汽车行也就应运而生。

汽车首先应用于市内交通，后来慢慢有了客运短途汽车和货运汽车。随着公路的发展，长途汽车到 1934 年才开始运营，而主要是湖北省内运营。

近代武汉汽车运输的发展主要是为极少数客人服务的。当时武汉出现了有名的

汽车“四大行帮”，四大行帮的形成主要是亲缘和乡土关系的缘故。它们是“下江帮”（主要是上海人）、“柏泉帮”（主要是汉阳柏泉人，与刘歆生是老乡）、“葛店帮”（主要是鄂城葛店人）、“本地帮”（主要是武汉人）。汽车行的兴起，大多是为往来武汉的巨贾富商服务。它们为近代武汉城市旅游服务近代化作出过许多贡献。但是，汽车、电车等现代交通工具很难普及，“重要原因在于道路的制约”^①。

西洋工业文明的另一伟大成果是电报、电话的发明与应用。它不仅缩短了世界的时空距离，加快了信息的传递，而且使出洋远行不再被视为畏途，旅游可以随时传递各地的音讯。据《武汉市志·交通邮电志》记载，湖北最早的一条有线电报，是上海电报局于1884年所铺设的汉口至南京线。光绪十年（1884年），沪汉电报线架通，汉口开办电报业务，主要为官署传递消息，民间所用甚少。光绪十二年（1886年），汉口至江夏过江水线工程竣工，江夏（武昌）也开办了电报。其后，汉口至重庆、长沙、郑州等地电报线相继架通，电报业务范围逐渐扩大，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汉口电报局已成为全国电报接转中心之一^②。武汉的电话业最早始于1901年德商在汉口租界内所开办的市内电话，时称“租界电话”。当时的武汉电话业务一度为外商垄断，直至1915年才由政府出资收回。电报、电话的传入，加快了武汉与世界各地的信息联络，使武汉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大都会。武汉的无数商情市况，通过电报、电话迅速传递到世界各国，同时也将各国的信息反馈到武汉。各国游历者往来武汉也日趋便捷顺利。

3. 科技带来旅游方式与内容的巨变

中国有句古话：“在家千日好，出门时时难。”这一方面反映出中国人恪守故土、不愿远游的农耕文化特征，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由于交通不发达，路途多舛，使无数人对出门旅行产生极大的畏惧的时代社会心理。许多诗人常常在诗文中感到羁旅的孤独艰难，也多是因为旅行条件的恶劣和交通及通讯的不便。杜甫《登岳阳楼》中“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的诗句给人一种凄凉寂寞之感，对客居他乡异地的旅行者产生极大的悲凉、怜悯之情。近代以前，中国的旅游者除了乘坐马车、木帆船外，主要是靠徒步行走，因而在旅游的范围和地域方面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不说要穿越茫茫无垠的沙漠和无边无际的森林，即使是来往于广州、北京两地的旅行，也往往要花费一年半载的时间。既花费大量的时间，又花费大量的金钱。

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输入，首先在交通条件方面给旅游带来了巨大革命，使旅游方式发生了极大转变。人们乘木船、坐马车的陈旧旅游方式被乘火车、搭轮船、坐汽车的方式取代，而且省时、省钱、便捷、舒适，并且使古代旅游主体往往由少

① 刘志琴：《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2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32页。

② 《武汉市志·交通邮电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41页。

数人组成的局面得到极大的改观。近代交通为旅游成为大众性的活动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外国商人、传教士以及形形色色的游历者，之所以纷纷登陆武汉，与近代旅游交通现状的改变有着一定的原因。交通的改观，使得各地的坐商、行商也开始了不断的商游，“导财运货，懋（贸）迁有无”，“千里遨游，冠盖相望”的古代商旅行在近代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其次，近代工业文明的输入，使武汉的城市化进程加快，产业革命也初见端倪。其特征是工业文明开始取代农业文明，工商业经贸活动逐步取代农业活动并在国民经济生产中占主导地位。与此相伴的就是城市化运动开始加快，大批破产农民、手工业者和部分小商人被吸引到武汉这座大都市来，开始其城市生活和城市工作。《汉口丛谈》卷三就曾记载过晚清时期“汉镇之民，不事田业，惟贸易是视”，“四方商贾辐辏于斯”。汉口成了吸纳各种商旅的“大商场”。但是，大量移民的涌入，使武汉城市迅速膨胀，而城市的基础设施严重不配套，肮脏、嘈杂、拥挤、混乱、紧张、压抑是近代初期武汉城市的基本外貌。这时候，又使得人们开始向往农村的田园生活，向往闲散、消遣的乡村生活方式。休闲性旅游开始悄悄出现。许多大商人、官僚、买办难以忍受城市的紧张、拥挤、压抑的生活，于是，稍有空暇便走出城市，到乡村田园或风景点旅游休闲。当时阜昌洋行的大买办刘子敬在庐山建有别墅，每逢天热和闲暇之时，举家由汉口往庐山避暑，还有许多达官贵人，常常自备小火轮相邀到武汉的郊区金口、沌口等地，会同当地猎人集体打猎。也有许多买办商人沿京汉铁路到鸡公山等风景区消闲避暑。

平民阶层尤其是早期的产业工人，由于工作时间长，工作压力大，往往精神高度紧张。他们有着强烈的休整愿望。当时，在武汉的许多买办工厂、外商工厂常常发生产业工人为了争取自身权利的劳资纠纷。他们不堪机械重复的单调工作，恐惧纪律约束性极高的奴隶式的劳动，渴望有假日，能休息，企盼着暂时离开那令人紧张、厌恶的工作场所，到大自然的轻松环境中去放松、调整。西方现代的企业制度引入，产业工人的某些权益开始部分得到恢复，带薪节日逐渐得到保障，因此而导致工薪阶层的旅游兴起。尽管这部分阶层参与旅游的人数极少，但同古代相比，已经大大超过了那时参加旅游的阶层和人数了。

再次，城市化运动的开始，近代都市生活的日渐繁华，信息的灵通，商贸的发达以及各种现代休闲娱乐设施的建设，使得大量的农村官绅、地主和较为富裕的商人开始向往大城市生活，他们与久居城市的人们不同，向往都市的喧闹，繁盛的氛围。因而许多农村绅商大规模地来到武汉大都市，使得劳作性旅游与休闲性旅游互为增长。许多乡村绅商或常常到武汉租房小住几日，或进城打货贩货顺便到市内游览，或在城区购置房产作为长期往来于城乡的据点……这使得乡村与城市之间旅游者骤然增加。当然，由乡村来城市的旅行者中，他们目的不一，成分复杂。有的是为了进城经商，有的是为了进城接受新式学校的教育，有的是为了谋取功名。尽管

目的不一，但客观上造成了乡村绅士到城市旅游的现象频繁出现。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近代乡绅进城是旅游发展的一种突出现象。为了接受新式教育，许多新士绅不辞劳苦纷纷从乡村来到城市，“清光绪丙午年正月，有黄冈张炳南者，家仅中资，乃变卖产业，率其子海滔，在武昌正卫街租一室”^①；利川范腾霄回忆说，他的家乡距武汉“水陆程达两千余里，邑人视赴省有如适异国，乃余深幸为难得之机会，不计一切，决心应选”^②。当时湖北大约有两万多名新士绅为接受新式教育，大多变卖乡村产业，“不计一切”从乡村来到省城武汉。

乡绅进城还使其滞留在乡村的兄弟子侄、亲朋好友、同事同窗亦纷纷离开乡村，或进校求学谋职，或从军从商，或预备出洋留学等等，如立宪派代表人物汤化龙，不但鼓励其大弟汤芑铭留学欧洲，并“复令从弟丙南入省立农业高等专科学校，季弟毓龙入省立工业学校”^③。像汤化龙这样举家进城的现象在当时十分普遍。许多地方“一人离乡，带动一帮离乡”。这种兄弟子侄、同乡同窗互相援引而离乡进城的现象，既是当时社会大转变中的一种普遍现象，也是近代旅游活跃的标志。尽管它属于功利性极强的“劳作性”旅游，但它们毕竟是近代武汉城乡旅游主体互动现象的一个突出表现之一。

近代武汉城乡旅游主体互动还表现在大量的乡绅进城投资工商业的行为方面。农村“绅士掌握着农业收入之大部分，这部分经济收入也便跟着投入商业和工业，促使城市迅速增大，摆脱传统郡县城市模式，向现代新城市转化”^④。近代湖北的许多乡绅，纷纷进城，一方面使乡村资金流失，促使乡村的封建小农经济破产，另一方面使乡村人口向城市移民进程加速，加剧了社会流动与变革的频率。由于许多乡绅纷纷进城，使当地官府感到“最堪忧虑者，厥为士绅之不安于其乡，在乡者又不愿出面问事”，“蒲圻士绅侨居省恒者甚多，对于县政进行亦颇热心赞助，惟不愿负责整理”。武昌“县巨绅多半居汉口，地方有要事，多由县长亲自造访，平时对地方事不甚过问”^⑤。

另外，城市的旅游设施的现代化，不仅吸引着城市自身旅游者的参与，更吸引着大量外埠及广大乡村的游客进城旅游。酒店业的空前发展，现代化的旅店设施，新奇、豪华的场面，热情的服务，使得许多外埠和乡村富裕阶层纷纷到武汉游览。留英工程师吴国炳在民国初年曾主持汉口的市政工程设计工作，他不仅设计过府前

① 罗福惠、萧怡：《居正文集》上，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9页。

② 范腾霄：《辛亥首义前后》，见《辛亥首义回忆录》第3辑。

③ 见《汤化龙形状》，《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

④ 金观涛：《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超稳定结构》，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6页。

⑤ 湖北省政府民政厅：《湖北县政概况》，第21、22、50页。

花园、中山公园以及沿江马路，而且还设计了武汉的几家大旅馆，他十分注重引进西欧先进的旅馆设计技术，在旅馆内设卫生间、抽水马桶，安设电梯、电灯、电话，使外埠商人来汉后大加赞叹。据吴国炳回忆：“一些外来的客商，一到汉口旅馆先洗澡，看见旅馆有各种卫生设备，回去后大肆宣传汉口如何的好，如何的新。我叔叔吴翼生是个商人，从家乡运货到汉口，住在旅馆洗澡，打电话给我，叫我到旅馆见他。他说：‘很多人回到家都说汉口很好，是个叫吴国炳的工程师建设的。’”^①

除旅店的空前发展之外，西方的摄影技术、幻灯、留声机、电影、钢琴、手风琴等新器具和新式娱乐技术以及赛马、舞会以及波罗馆等旅游方式的引入和迅速普及，极大地丰富了旅游业的内容。许多乡村的绅士为了拍摄一张照片，特地从遥远的乡村赶到武汉，据《孝感市志》记载：“民初时，士绅常有举家乘舟至汉口听戏，进相馆留影……”^② 特别是汉口三大跑马场的建立，使大众游乐有了驻足的场所。当时“每逢赛马之季，汉口万人空巷”，赛马场人山人海、万头攒动。各洋行、外国银行均停业半天，叫做“封关”。同时期号称“世界冒险家乐园”的上海，也仅有“上海”、“江湾”两家跑马场。而汉口则有“西商”、“华商”和“万国”三大跑马场，其规模之大，居全国之冠。

不单跑马场，各式各样的俱乐部也吸引了大量不同阶层的游人。俱乐部又称“波罗馆”，或“波楼馆”，是来自于西欧的一种娱乐场所。武汉的第一家俱乐部是1878年英国人在汉口英租界开设的。后来俄、法、德、日租界内也相继开设。俱乐部内设有高尔夫球场、网球场、游泳池、跳舞厅、图书室、弹子房、击剑场、马场和轮盘赌场等。它既是娱乐休闲场所，又是社交的主要场地，许许多多的重要社交活动，大多是在俱乐部进行的。继租界的许多俱乐部兴建之后，汉口许多华界富商以及洋行买办也纷纷建立自己的俱乐部。如汉口买办王伯年、欧阳会昌、刘歆生、蒋佩霖、周星棠、胡范冰、黄厚卿、刘少岩等自发成立的“华商总会”，实质上就是一个华商大亨巨富者的俱乐部。它的会所设计大都是根据娱乐活动场所而定的，内有大会场，可演戏、开会，有餐厅、大小会议室、阅览室、理发室、更衣室、浴室、起居室、储藏室、卫生间等等，一切设备和陈列物品都是当时最新式的。会员们的日常活动有两大项：大吃与大赌。除此之外也有下棋品茶、打球阅报和交流商情的，也有在此吸食鸦片，甚至还有少数携带妓女在起居室过夜的。华商总会吸引了不少商场巨头，许多富商巨贾把它作为市内的主要娱乐场所，流连忘返，乐此不疲。

现代剧场的建立，使清末民初武汉的戏剧观演热潮成为流行一时的大众娱乐生

① 吴国炳：《我与中山公园及市政建设》，《武汉文史资料》第1辑，1988年3月。

② 《孝感市志》卷12，民情风俗，第845页。

活方式。先是各种地方戏进入各式茶楼、茶园，接着“汉口新市场”的建立，戏剧开始在大剧院、大舞台上演，民众观剧成为时尚，票友几乎涵盖武汉各阶层，既有官僚名流，也有商贾平民。《汉口小志》风俗卷记载：汉口戏剧曲目繁多，“端午则演白蛇传全本，七夕则演天河配，中秋则演唐明皇游月宫等曲，观者争先恐后，每夜座上客常满矣”^①。后来，许多戏院也开始放电影，并且许多电影院是由茶园、剧院改造而成的。

除戏剧观赏，武汉在民初时期还十分风行西方舞蹈。自欧洲各式交际舞蹈（如华尔兹、伦巴、探戈等）传入之后，跳舞渐渐成为武汉上流社会交际与消闲的时髦方式。当时许多俱乐部、游乐场、茶馆、公园等场所都设有专门的舞厅。跳舞打破了千百年来“男女授受不亲”的礼教传统，使男女平等观念得到了具体的体现。交际舞的风行，产生了许多许多的“舞迷”，使得许多舞场、舞厅常常人满为患，舞场给男女间的面对面交流提供了便利场所，同时舞厅也把西洋音乐带到了武汉，并逐渐传播开来。汉口民初时，曾有一大批以“舞台”为名的游乐场所，如“大舞台”、“新舞台”等等，可见跳舞之风波及之广。“西方交谊舞的传入为中国树立了男女公开社交的文明生活方式的典范。但是，由于民国初年国民素质普遍不高，对男女公开社交不能正确认识，加之舞厅的商业化，使西方交谊舞与中国市民社会的糜烂生活挂上钩。于是，橘子北移则为枳了。”^②

当然，随着西洋工业文明的输入，许多消极的旅游方式也带到了武汉，如形形色色的赌场，各式各样的妓院，带有明显色情特征的西式酒吧、夜总会和鸦片馆等等，都在中西交汇的方式中迅速蔓延。1902年，由于新政的实施，中外交流频繁，都市流行西方转盘赌具，“赌风炽盛，地方官员见怪不怪，听之任之”，究其缘由，“关键在于大清王朝上至慈禧太后，下至文官武将，均以赌博为乐”^③。中国传统的妓院、赌场，在西方的新式赌博方式和纵欲主义观念影响下得到新的滋生土壤，使得旧汉口“烟”、“赌”、“娼”三馆十分普遍，成为一大难以消除的毒瘤。

这一切带有新奇因子的旅游方式与娱乐内容，迅速冲击着传统的休闲娱乐方式，使近代旅游主体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与壮大。

（四）官学下移与旅游主体的壮大

千百年来，在中国旅游舞台上，一直是达官贵人、文人学士占主导地位。旅游的主体一直是以上层社会成员为基本构成，社会下层则被农本社会牢牢地束缚在土

^① 见徐焕斗：《汉口小志》，1915年版，第6页。

^{②③} 刘志琴主编：《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2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13、254页。

地上,很少出游。这一方面是由于隋唐以来封建统治者所实施的流官制,使得大批官员宦游他乡异地,演绎着无数的旅游故事;另一方面是由于科举取士制度,要求考生必须具备较为全面的文化修养,以及较广博的社会知识,使得无数有志于科举的文人学士在潜心苦读的同时,注重对山水田园风光的欣赏。他们观风知俗,足迹访胜,寻求灵感,培养性灵。许多考生还在应试之前,往往效仿前辈而漫游天下以交结当世豪俊名流,并激扬声誉,显示才华,自造文誉。这就使得许多文人学士养成遨游山水、放情田园、漫游天下的习惯,也极大地丰富了旅游文化。

近代武汉开埠之后,社会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特别是经历了欧风美雨的浸润之后,近代武汉旅游的主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反过去“官、绅、士、学”独占旅游舞台的局面,旅游者阶层大大丰富,出现了明显的向市民普及与官学下移趋势。许许多多的商旅寒士、贫民布衣纷纷参与旅游者的队伍,使近代武汉的旅游呈现活跃的局面。尤其是国门洞开之后,许多有志之士以各种方式和途径漂洋过海,驻足海外,或负笈扶桑,求学问道,或羁旅西欧,寻知借经。这些托足海外的游子,不仅使近代的旅游空间得到了空前的拓展,而且为武汉近代旅游增添了新的方式与内容。

1. 开埠造就了一批新式旅游者

武汉开埠通商之后,重商逐利的观念开始风行于世,长期被儒家农本文化观念所排斥的“工商游食之民”,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开始冲破各种清规戒律,或越山过岭,或涉水渡川,且商且游,危身给取。使得一向重义轻利的士人对商旅刮目相看,社会的价值标尺开始向商旅倾斜,“重农抑商”的观念开始瓦解,不少人开始重商轻农,重商逐利的价值观带来了商务旅游的空前发展,也使参与商业旅游活动的旅游者日益增多。

随着外国洋行、银行、工厂和轮船公司等列强机构在汉的设立,形形色色的外国人开始蜂拥蚁聚般来到武汉,他们不仅仅在租界地游乐、消闲,还经常到武汉郊外打猎、游观。许多外国传教士几乎游遍湖北的山山水水,如湖北教区的意大利籍主教徐伯达和明维笃,英国传教士扬格非、郭修礼等人,他们以武汉为立足点,游历了湖北许多地方。特别是许多外国商人,他们不仅往来于上海、南京、九江等开放的商埠之间,还常常漂洋过海,穿梭于他们的母国与武汉之间。如英国冒险家渣甸,他不仅往返于广州、上海、武汉等大商埠之间,还经常为英国当局侵华提供情报。他最早在汉口设立怡和洋行,后来又设立怡和轮船公司,他还在汉口铁路附近强行低价收买了许多农田,修建了许多小洋楼,命名为“怡和村”,并在此办游乐场和私人花园,他把怡和村通往英租界的道路称为“渣甸路”。当时还有许多渴望了解中国文化的西方饱学之士和对古老中国充满好奇心的旅行家、传教士等频频游历武汉,并留下许多文字记载。这些文字记载有许多成了今日研究近代武汉的珍贵

材料。如法国旅行家加勒利·伊凡、英国女传教士亨利埃塔·格林、英国旅行家菲尔德维克（著有《汉口》一书）、英国旅行家乔治·沃尼斯牧·莫里循（著有《中国风情》一书）、美国传教士明恩溥（著有《中国人的特征》、《中国乡村生活》等著作）、美国传教士何天爵（著有《真正的中国佬》一书）、日本驻汉领事水野幸吉（著有《汉口》一书，并首称汉口为“东方芝加哥”）……这些外国游历者不仅给武汉带来了异域文化，也向西方宣传与介绍了武汉，无论他们是否公正地宣传与介绍，但毕竟为武汉走向世界作了一些最基本的宣传工作。

在近代武汉旅游舞台上最为活跃、也是对近代武汉旅游推动最有力的要算武汉的买办商人。开埠之后，随着武汉对外贸易的进一步扩大，各国商旅纷纷进入武汉，建立其产品销售网络和原料掠夺渠道。他们因语言和社会文化习俗方面的障碍，不得不依靠当地的略通外文的商人，于是大批的买办商人在武汉出现了。这些买办在与洋人的商业合作中，既帮助了洋商在中国牟取暴利，也为自己捞足了财富。他们中间，有的除担任买办之外，还兼开自己的商铺，办自己的工厂，其中有许多人拥有千百万两的财富，并修建了成百栋的里弄住宅。如法国立兴洋行兼东方汇理银行的买办刘歆生，就是通过与洋人合作贸易而发了大财的新豪富。

刘歆生在近代武汉旅游史上是一位值得认真书写的买办商人，也是一位具有爱国情感的民族资本家。武汉近代较著名的旅游设施，几乎都与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如西商跑马场是购买他的地皮而兴建的；华商跑马场是他领衔发动创建的；作为汉口商业繁盛象征的街道——歆生路（即江汉路）是他让地给英国人修建的；还有汉口张公堤的围建，后湖广大土地的开垦，中山公园前身西园的修建以及汉口20年代“模范区”的创建等等，都与刘歆生的名字密不可分。

刘歆生（1875～1945年），湖北汉阳柏泉刘家嘴人，自幼家贫，曾为人放牧鸭群，祖父与父亲都是天主教徒。少年时就随父亲刘作如到汉阳龟山之麓为人牧牛挤奶，后加入天主教，从神甫那里学得流利的法语和英语，并通过教会介绍进入太左瑜洋行当练习生。由于其秉性机敏、才智过人，很快被法商看中，成为立兴洋行的买办。1902年又兼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汉口分行的买办。从此，他的生意如日中天。通过东方汇理银行，他借入低利息的贷款，自开阜昌钱庄，然后以高利息贷出，从中牟取暴利，开始积累了大笔资金。由于他的义兄刘长荫（刘作如收养的养子）也信奉天主教，自幼便在法国轮船上当西崽，后来当上了上海立兴洋行的买办，刘歆生与他在一次白芝麻贸易中获纯利纹银50两，这使得刘歆生在武汉商界的地位大为提升。后来又在义兄刘长荫的支持与指点下，大做地皮生意。1904年张之洞修张公堤，刘歆生主动资助，并购买了上自舵落口、下迄丹水池、西抵张公堤、南至铁路边所含面积的1/4的地皮。1905年张公堤建成后，刘歆生便成为武汉首屈一指的“地皮大王”。除经营房地产之外，刘歆生还“先后经营了许多工商企业，如刘万顺牛皮行、东方转运公司（原刘万顺转运行）、普润毛茶厂、汉口榨油厂、武

汉电话公司、刘万顺土产商店、阜昌钱庄、阳新碳山湾煤矿和江西铜矿”，“民国初年，他沿京汉线上至石家庄站，沿陇海线西起归德、东至徐州各站，凡有东方转运公司分支机构的地方都不遗余力地收购地皮，留备该地发展后自用或居奇牟利”^①。

刘歆生对武汉旅游的突出贡献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是热心倡导并积极修建现代游乐设施。1902年，刘歆生“以四十文一方的低价”卖给外商建起了近代第一座游乐场——西商跑马场。1905年张公堤修毕，西商跑马场不再受水患侵扰，从此赛马之风在武汉兴起，并长达50年之久。赛马方式吸引了数以万计的中国人参与赌马娱乐，其经营利润有时一天就高达20万元。1906年，刘歆生因不甘受洋人的欺侮，首先倡导修建华商跑马场，并提供大片的土地作股本，邀约汉口商会会长周星棠、实业银行行长梁俊华、熙太茶栈经理韦紫峰、大买办刘子敬等人，合资集股，创建了华商跑马场（当时称“华商体育运动会”），占地3.3万平方米。徐焕斗《汉口小志》曾记述过华商跑马场的盛况：“华商跑马场在后湖铁路处，每年春秋二赛，游者络绎不绝，走马看花赏心悦目。场内建有西式楼房数栋，为普通游客列座观赛处。另有会员观赛亭，暨音乐亭，售票处。迤北楼房一栋为临时售卖茶点场所。南有花园数畦，为培植花卉之地。并有休息小亭，纵客坐卧。本年四五月间，为巴拿马赛会湖北出品协会，展览会场一时入场者人山人海，如趋膻附蚁。场内增筑临时房舍数椽，除弹压巡警住宿外，其余分为男女来宾茶座，沿途添设电灯，幽僻地一变为热闹场矣。”

1913年，刘歆生又与人合资修建了汉口华界的第一座高楼“楼外楼”，楼内装有近代武汉的第一部电梯，并设有戏院、茶座、弹子房、西菜馆等，吸引了大批的游人到此憩乐，“楼外楼”曾名噪一时。

二是积极推进汉口模范区的建设。对汉口近代城区建设和繁华街市的兴盛作出了较大贡献。辛亥首义，刘歆生表现出对革命的积极支持，他曾经会同汉口商会董事韦紫峰、刘子敬、李紫云等32人共同发起国民捐，资助国民军军费100多万元。当停战议和步步实现之际，他又同商会总理蔡辅卿和巨商宋炜臣面谒黎元洪，要求市政府、军政府重建市区、筹划经费、承担项目，对工商业提供保护。民国初年，为实现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将汉口建为“模范之市”的理想，刘歆生同汉口华商总会的富商、买办等发起了在华界创建模范区的运动，以与洋人的租界媲美。模范区的范围选定西起江汉路、北抵铁路、东至大智路、南至中山大道这一地域，而这一地域的绝大多数是刘歆生的地皮。刘歆生将这些地皮拿出作股本，邀约华商总会会长蒋沛霖等人出面，并串结武汉“将军团”中的显要和绅商买办参与建房。经过几年的建设，在刘歆生提供的土地上，一片带有近代风格的街市迅速建成，如丹风街、

^① 《武汉文史资料》1988年第4辑，第150、151页；华中、天德：《汉口地皮大王刘歆生》。

华商街、铭心街、吉庆街、泰宁街、保成路、汇通路、雄伟路（今南京路）、云樵路（今黄石路）、瑞祥路、交易街等。这些街道与汉口传统的汉正老街以及许多棚户区相比，确有天壤之别，不仅为汉口的街市繁盛提供了场所，也为武汉的商务旅游提供了可供观赏的客体。

除刘歆生之外，阜昌洋行的买办刘子敬、和记洋行的买办韩永清、和记蛋厂的买办杨坤山、安利英洋行的买办蒋沛霖、猪鬃买办周德安、桐油买办周绣山、美最时洋行的买办王伯年、永兴洋行的买办元坤山等等，都在汉口模范区修建了大批里弄住宅，为汉口大都会的城市建设作出了贡献。

2. 市民旅游的悄然兴起

美国学者罗·威廉在他的著作《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 1796—1889》中认为，近代的汉口，是一个较为典型的移民城市。他从人口结构特征来分析武汉人口增殖的原因，得出汉口的人口来源并不是由于本地区人口的自然繁衍，而是外地的商贾向武汉的移民和流注的结论。这说明了商业的发展是导致武汉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据 Appendix 的《海关十年报告》中记载：“汉口的人口不是纯粹的本地人，由于该港的诱惑，他们来自远近各地，居民成分复杂。”日本人水野幸吉的《汉口》在谈及当时市民的职业构成时，也认为汉口是一个以工商业者、产业工人以及苦力和手工业者为主体的港口型的商埠城市：“如汉口等之大商业地，其有力之商人，大概为广东宁波人，而湖北产之土人，却不过经营小规模之商业，工业颇幼稚。锻冶、染业、木工、石匠、职物业、家具制造业等，犹不免于用手工。在武汉三镇，被使役于诸工场之职工，其数当不下三万。特如汉口百货辐辏之地，搬运夫更为多数。到处各工场及仓库之前，居然成列，无非从事于货物之搬运，仅汉口一处，其数可统称十万。”^①正因为武汉大多数居民为外来移民，且多以商业和与商业活动有关的职业作为其生存方式和谋生手段，而武汉商埠的日益扩大，不断地满足坐商、行商和随之俱来的诸如学徒、店员、杂务等谋生人员的需求，并提供其求职的机会和谋利的机遇，因而使得武汉城市人口在清末民初骤然增长。武汉像一座巨大的商场，接纳着四面八方的商人、手工业者和从事各种商业服务的外来劳动力。而这些外来移民的移入，又促使了武汉的商贸规模迅速扩大，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工匠和手工业者们，不仅在一大商场中找到生存之地，而且也带来他们各地的文化习俗、经营思想以及他们各自的才华与智慧，使得武汉的商贸更为发达。《汉口丛谈》记载过“瓦屋竹楼千万户，本乡人少异乡多”的移民现象，《汉口竹枝词》中也描述过商旅的繁盛：“茶庵直上通硚口，后市前街屋似鳞。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

^① [日]水野幸吉：《汉口》，第11～12页。

商业的迅速发展，其明显的结果就是导致民众的群体价值准则与行为方式与传统的悖离。人们注意交往，注意信息，追求变动，慕异喜新。不单在生意场上仰慕新潮，在休闲娱乐和生活方式上也赶时髦，看戏、听书、品茶、观艺不再是官绅学土的专利，普通商民也习以为之。《汉口小志·风俗志》曾有一段记叙市民看戏时所表现出来的慕异喜新的性格特征：“国人心理崇尚新剧，前新民所排之大香山，社会趋之若鹜，而舞台之座殊觉冷淡，后舞台排演烈士投海与情天恨等剧，武汉人亦趋之，而新民之座不觉顿减，可见人心世道好奇新此其证也。”^①不单是听书观戏，在民间节日欢游和大型集会、宗教“礼佛”方面，平民参与旅游的现象十分普遍。如春日踏青之旅，秋日登高之游，特别是在三月初九的寒食节，五月初的端午节，八月十五中秋节等传统节日时，市民们均以传统风俗开展各种游乐活动。或踏歌游赏，或龙舟竞赛，或歌舞赏月，或灯会献艺……许许多多民众性歌舞娱乐活动的繁盛场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旅游活动的普及与下移。宗教信仰形成的群众性“礼佛”活动，也是旅游普及与下移的表现之一。许多迷道信佛者，每逢宗教盛事或朝拜之时，总是沿途观景揽胜，在礼佛活动之余，或体味禅意，或观赏人文，或谒庙还愿，或祭神游仙，或烧香拜佛，或听经诵道……武汉的宝通寺、归元寺、长春观等佛道寺观，往往是善男信女经常朝拜、游览之处。清末时期，有位曾在江夏为官的沔阳人郑东华，曾写过一篇反映清末武汉民众旅游风情的竹枝词——《江汉图》，它既描写了武汉三镇四季风光和可供游览的景色、景点，同时也描绘了当时社会风貌和人们的游观情趣：

“正月叹到梅花地，武汉三镇赛云梯。黄鹤楼，成古迹，江汉书院御笔题，晴川阁高凌云际，行宫内面供虞姬，蛇山断腰半空里，凤凰山自有凤凰栖。佳人才子寒温叙，‘得意春风快马蹄’。

二月春风百花茂，弥衡坟葬鹦鹉洲。崇福寺桃花开洞口，红粉佳人龟山游。月湖堤，垂杨柳，三太馆开怀饮酒瓯。游女归去黄昏后，‘悔教夫婿觅封侯’。

三月清明桃李盛，轰轰烈烈汉阳门。黄会馆，听瑶琴，来往踏青女佳人。过长街就把古楼（指南楼）问，草湖门在面前存。何方歌舞闹盈盈？‘牧童遥指杏花村’。

四月清和景自幽，闹热还算大码头，米厂河，卖风流，会馆对面造洋楼，接驾嘴针对洗马口，转弯抹角后湖里游。得意相逢沽酒美，‘与尔同销万古愁’。

五月龙舟闹长江，有名花园刘景棠。洪山宝塔高数丈，盐船尽湾塘角上。

① 徐焕斗：《汉口小志·风俗志》，1915年版。

卓刀泉，关圣像，关圣帝君把名扬。芦（楼）中玉笛风飘荡，‘众仙童儿咏霓裳（裳）’。

六月荷花踩（采）莲船，乘凉要到梅子山。杨叶湖、立旗杆，望江失火东门湾。两岸野花无心看，‘月移花影上栏杆’。

八月桂花忙举子，粉墙鹅字王羲之。贡院门主考何房师？考选湖北奇才子。阅马场排的弓箭与刀石，不用文章李杜诗。摘下丹桂第一枝，‘十年身到凤凰池’。

九月登高珠玉带，幽雅还上伯牙台，钟子期知音人不在，伯牙碎琴泪满腮。八仙藏躲西门外，如来阁下菊花开。饮酒赏花君当醉，‘隔篱呼取尽馀杯’。

十月梅花满山村，诸葛亮造起满山邓。鲇鱼司（套）许败不许兴，江汉书院武昌城。四大衙门威风凛，禁止喧哗销拿闲人。三声炮响天地震，‘路上行人欲断魂’。

冬月朔风寒冷天，大王庙修花楼前。永宁巷、四官殿，青春女子美少年。王孙公子去游院，唱的马蹄调，外要落金钱。扭开菱花照脸面，‘将谓偷闲学少年’。

腊月雪花飘江口，救生船湾龟山头。魁星阁文光照牛斗，朝中门对御矶头。归元寺五百罗汉修，大王庙修在府街后，花台十里成古丘。一年四季表完后，六十花甲转轮流，‘物换星移几度秋’。^①

《江汉图》也许是目前已发现的武汉旅游文献中最早的一份武汉城市导游图。它不但写法独特（每月景色之后引一句千家诗结尾），还生动形象地再现了当时的人们所喜爱游观的旅游景点，而且为我们描摹出一幅清末武汉的旅游风俗图。

3. 旅游大军中的青年知识群体

在武汉旅游主体中，近代的知识群体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们步入旅游者队伍之中各有不同的原因，有怀抱求治河山乃匹夫之责而壮游天下，如谭嗣同等热血青年；有寻找变革之道而变卖家产，漫游海外的仁人志士，如江陵的朱子龙等；也有为救亡图存而负笈大洋彼岸的留学群体，如戢元丞、吴禄贞、李书城、刘书禺等；还有许多为接受新式学校的教育而走出乡村，游学省城……

谭嗣同（1865～1898年），是清末的著名改良政治家、思想家，是在戊戌变法中献出年轻生命的著名“戊戌六君子”之一。他并非湖北人士，祖籍为湖南浏阳，因其父谭继洵曾任湖北巡抚，后兼署湖广总督。谭嗣同随父居武昌。尽管谭嗣同只

^① 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春秋》第1期，1988年。

在人间匆匆经历了短短的 33 年，但他却有着壮游河山，行程达 8 万余里的旅游经历。

谭嗣同出生于北京宣武城南的谭家寓中。5 岁起开蒙读书，10 岁迁居北京库堆胡同的浏阳会馆，拜开明学者欧阳中鹄为老师。谭母徐五缘，出身名门，有古贤女之品格，对子女管教严厉又钟爱有加。父亲谭继洵是咸丰的进士，一生游宦，曾任户部郎中，派任北通州坐粮厅，做过陕西按察使，甘肃布政使并加封二品衔，后任湖北巡抚，光绪 20 年兼署湖广总督。

谭嗣同 11 岁起就随父不断迁居，他刚强不屈的个性、坚毅顽强的“任侠”精神，是与他少年时起就不断迁徙的生活经历有关。在他 13 岁那年，他随父由北京回湖南祖籍，然后父亲从浏阳赴甘肃兰州上任，谭嗣同随父游历了几乎半个中国。1878 年春，他们从浏阳到长沙，再换汽船游洞庭，过长江经汉水到襄阳，再到洛阳入函谷、潼关至陕西，直到 1878 年秋才抵达兰州。这段旅行生活对谭嗣同来说影响巨大。后来他在兰州过了一段浪漫而豪迈的轻狂生活，对他性格的形成影响重大。他常同父亲的幕客刘云田扬鞭策马，奔驰于戈壁沙漠，过着唐时许多文人墨客所向往的边关豪放生活。他们还经常带领数百名士兵和当地少数民族猎手在群山峻岭中狩猎，或追狼逐鹿，或弯弓射雕，即使是寒冷的冬天，飞沙走石，风雪飘扬也不畏惧。有一年大雪纷飞，谭嗣同带一队人马出门七天七夜，行程达 800 多公里。他们深入到漫无人迹的荒漠岩谷中，尽管风雪弥漫，北风怒吼，谭嗣同仍悠然自得独立苍茫。带来的干粮吃完了，他们“斧冰作糜”。待回到兰州时，已是“髀肉狼籍”，见者“目骇神战”，而谭嗣同却泰然自若。谭嗣同十分珍惜他在兰州的这段“军旅生活”，他在《刘云田传》中记载他的这段经历时写道：

安定防军，隶大人（谭父）部。嗣同闲至军。皆囊帛首以军礼见，设酒饌军乐，陈百戏。嗣同一不顾，独喜强云田并辔走山谷中，时私出近塞，遇西北风大作，沙石击人，如中强弩。明驼咿吠，与鸣雁噪狼互答。臂鹰腰弓矢，从百十健儿，与凹目凸鼻黄须雕题诸胡，大呼疾驰，争先逐猛兽。夜则支幕沙上，椎髻箕踞，掬黄羊血，杂雪而咽。拨琵琶，引吭作秦声。或据服匿，群相饮博，欢呼达旦。^①

1882 年，谭嗣同从兰州返湖南首次参加科举考试不第，又返回兰州。1884 年因新疆巡抚刘锦堂很赏识他的才华，拟招募他为幕府，不料待谭嗣同入疆后刘已去官，谭嗣同只好回兰州。从 1884 年起，谭嗣同开始了他一边准备科举考试、一边漫游天下的壮游经历。在这 10 年中，他六次赴南北省试，均不第而归，但却游历

^① 《谭嗣同全集》：《三十自纪》，岳麓书社 1985 年版。

了大半个中国。他多次由湖南到兰州，并从湖南到上海，从上海到烟台、天津至北京，再由天津出海到上海西上武汉。谭嗣同在武汉两湖书院就读时，对甲午兵败、清廷无能十分愤慨，与唐才常一起发表了他们的许多救亡宏论。在武汉期间，他游历了许多名胜古迹，写下了《记洪山形势》、《三十自纪》等文章，并撰写了《登洪山宝通寺塔》、《鹦鹉洲吊祢正平》、《汉上纪事》、《览武汉形势》等诗歌，记述了他在武汉的游历生活和感怀。他在《三十自纪》中曾总结其 10 年漫游河山的经历：

十年中至六赴南北省试，惟一以兄忧不与试，然行既万有余里矣。合数都八万余里，引而长之，堪绕地球一周。经大山若朱圉、鸟鼠、崆峒、六盘、太华、终南、霍山、匡庐无算；小水若泾、渭、漆、沮、灞、洮、沔、蓝、伊、洛、涧、恒、卫、汾、沁、滹沱、无定、沅、澧、蒸、淥无算；形势胜迹无算。制情偷情，未付简毕，退缅游乐，难忘于怀。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城郭犹是，人民复非。续此以往，仍有前之升峻远览以写忧，浮深纵涉以聘志，哀鸣箫于凌霞，翼叠鼓于华乎？^①

这几年中，他既看到了多姿多彩的壮丽河山，更感受到民众生活的凄凉与悲哀。他从内心发出“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城郭犹是，人民复非”的忧国忧民的感慨。这 10 年的艰辛、紧张、沉重、严肃的漫游生活，使他获得了立志投身于救国救民运动的根本动力，也使他坚忍不拔、豪迈勇为的性格得到进一步冶炼。在他被捕入狱后，仍大义凛然，在狱中他用煤渣题诗于壁上：“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在行刑之前，他仍高声吟诵：“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这种视死如归的精神，得益于他壮游山河的精神铸造。

与谭嗣同怀有同样“救亡图存”、“求治河山”志愿的，是稍晚于他的一大批有幸得到政府资助的近代留学青年。他们负笈大洋彼岸，问道扶桑，借经西方的游学经历，是近代武汉旅游史的奇观。

甲午海战之后，朝野无不震惊万分。向来不把“撮尔小岛”放在眼里的清廷当局以及许许多多的封建士大夫也不得不承认“天朝上国”的落后。国人对北洋水师的覆没、马关条约的签订，无不伤心愤慨。许多有识之士深刻反省此次海战，认为中国之所以败给日本，主要是缺乏人才。日本一弹丸之国，“撮尔小岛”能在明治维新之后迅速强盛，在于他们善于吸取西洋文化之长，有深刻的民族危机感。而中国的惨败在于夜郎自大，以“天朝上国”自居，不图进取，不思安危。中国要自强，必须先要培养人才，要人才培养，必须效仿西方，而日本岛国是学习西方最成

① 《谭嗣同全集》：《三十自纪》，岳麓书社 1985 年版。

功的国度。一时间,朝野上下都感到通过日本学习西洋文化是中国的最佳出路。

张之洞是鼓励留学最为积极的倡导者之一。他于1898年5月20日在《湘学报》第37期发表了他的著名《劝学篇》,文中认为:

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伊藤、山县、榎本、陆奥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学生也,愤其国为西洋所胁,率其徒百余人分诣德、法、英诸国,或学政治工商,或学水陆兵法,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东方。(见《劝学篇》游学第二)因而张之洞认为,培养人才,留在国内不如送到国外培养,“出洋一年,胜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①

在张之洞等人的大力倡导下,清廷开始对留学予以重视。一时间,留学之风盛行全国各地。尤其是留日的学生最多,创造了中国留学史上的人数之最。据日本史学专家实藤惠秀统计,“以1905与1906两年,留日人数都在8000左右”^②。“在清末庞大的留日学生队伍中,不仅有众多的青年士子,而且有年逾花甲的老翁,天真烂漫的少年。例如广东顺德李昂新,年已82岁,尚请留学东瀛,考求工业,受到清朝学务处嘉奖;云南一位已届70高龄的官费留学生,热诚担任班长,天真之态凌驾于年轻人之上;还有两位14岁的乡下学童,私自留书出走,等到家人发现时,他们已抵达日本。当时留日之风,不仅影响及于老翁童稚,甚至影响及于方外和尚。四川涪州天宝寺僧人佛源向重庆府申请发给出国咨文,赴日留学;广东六榕寺僧人铁禅等向地方当局稟称:我等‘伤心陵谷,蒿目时艰。虽在世外之身,常怀处堂之叹’,自愿于本寺祖遗田产210余亩中,捐出193亩,献给政府作留学经费;四川成都沙门学愚为留学日本,决意逃禅,蓄发易装东渡。当时蒙古土尔扈特郡王也受内地留日风气的感染,向清朝学部稟请赴日留学”^③。

特别要提到的是,“清末留日群体中,有父子,有夫妇,有兄妹,甚至有全家全族者。廖仲恺和何香凝夫妇变卖首饰嫁妆一同留日。曹汝霖留日时,其妹曹汝锦亦随之。杨度留日时,携其女儿杨庄同往。钱恂赴任驻日使馆外交官时,带了他的两子一媳一婿去留学。云南省更有全族去留学的,一时传为美谈。那时每一个留日学生都成了留学的义务宣传员。他们通过书信鼓动亲朋留学;还有的发布告家乡父老书,劝说留学;回国度假更是他们直接吸引国人留学的有效途径。往往一家有人留日,影响及于全家;一府有人留日,影响及于全府。1906年,山东登州府有一位留日学生利用回国度假之机,到处劝人留日。登州府中闻风随往者八九十人”^④。

① 《劝学篇》外篇。

② 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37页。

③④ 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湖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99页。

形成如此浩大的留学队伍,其根本原因有两个,一是“甲午海战”和1904年的“日俄战争”,日本作为战胜国,其国际地位迅速上升,使许多中国士人不得不钦佩日本的国力和社会制度的先进;二是清廷科举制度的废除,出洋留学成了许多士人的晋升之阶。另外,由于中西文化撞击之后,许多士人不满于现状,纷纷参加各种反清活动而受通缉,因而出洋寻求庇护,如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胡汉民传》中对此有过中肯的分析:“其时(留日)学生全体内容至为复杂。有纯为利禄而来者,有怀抱非常之志愿者;有勤于学校功课而不愿一问外事者,有好交游议论而不悦学者;有迷信日本一切以为中国未来之正鹄者,有不满日本而更言欧美之政制文化者……有为贵族富豪之子弟者,有出身贫寒来自田间者;有为秘密会党之领袖以亡命者,有已备有官绅之资格来此为仕进之捷径者”^①。

湖北的留学群体在清末时期成为中国留学潮中的令人瞩目的群体。虽然湖北派遣留学生不算全国最早的省份,但却是政府推动最为得力、发展势头最快,曾一度也是派遣人数最多的省份。仅日本一国,“1900年中国留学日本的学生共有100多名,而湖北的留学生几乎达到全国留日学生总数的一半”^②。

熊贤君教授在总结湖北留日教育的特征时认为:

“第一,湖北地区的留学教育虽然起步不算太早,但是一旦开始,势头就很猛,很快就跃居全国各省的前列。

第二,湖北的留学教育国别的选择,几乎清一色的是日本一国。虽然国别未免有些单一,但它为20世纪初年的留日高潮到来,开通了航道,做了十分重要的奠基性的工作。

第三,为了加强留学生的管理,湖北省在全国率先派遣留学生管理官员,负责湖北籍的留学生事务。这是光绪二十五年建立的一项制度,是年湖北派遣身为知府的钱恂为留日学生监督。

湖北的留学教育还有一定的连续性,无论出了什么事,留学生的派遣工作一如继往地进行。光绪二十六年夏秋的自立军事件发生后,湖北也未终止留学教育活动;光绪二十八年的戊戌政变后,湖北的留学教育也没有中途停辍。”^③

1900之后,湖北留学生群体由单一去日本,开始向西欧各国留学。湖北当局1903年春选派锦铨等8人赴德国,派刘庆云等10人赴美国,派肖焕烈等4人赴俄国,并令赴德留学生陈篆取道法国留学;1903年底又选派杨荫渠等24人赴比利

① 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湖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98页。

② 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53页。

③ 熊贤君:《湖北教育史》上卷,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页。

时,1904年又派出48人赴欧留学,其中留法10人,留德13人,留比23人,留美2人。至1908年,湖北地区留学欧洲的学生,不算自费和其他途径前往的,仅官费生就达103人。^①

据目前已搜集到的资料统计,不计民国之后留学外洋的官费生,到清末止,湖北有留学生807人。“其中有270人所学科目不明,其余537人中,学习陆军者共251人,占46.7%;学习政法者有139人,占25.9%;学习师范的人73人,占13.6%;学工者32人,占6%;学农者共17人,占3.2%;学格致者12人,占2.2%;学商的有9人,占1.7%,学医的更少,仅有4人,占0.7%。”^②

除留学生外,在庞大的出洋的知识群体中,还有大量官员被政府派遣出洋游历,“光绪二十八年,湖北省派出弁目20人及补用知县廷启盐、补用知事石沅等人赴日学习警察。三十年,又派出文武弁员47人入日本警视厅及警监学校学习。同年,湖北省还派仕学院学员20人及候补人员10人赴日留学。三十一年,张之洞考选候补中正佐各班之文理精通者92人赴日留学,以48人学习警察,44人学习翻译。此外,还选派知府齐耀珊等人、知县方仁元等16人,以及新补实缺州县各员12人赴日考察。三十二年,湖北要求全省新补州县各员均自费赴日考察6个月,或春到欧美诸国考察9~12个月。湖北清末派出了大量官员游历,人员到底多少,很难估计。据统计,湖北留学生与游历官员仅日本一国,至少也有2000人以上。”^③

出洋学习,不仅使广大留学生开阔了眼界,了解了日本及西方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与社会体制,造就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同时也将中国文化传播到了海外,尽管这种文化传播是一种弱势文化对强势文化的传播,但留学生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让西方人了解了中国知识群体的许多侧面,对中西文化交流起到了极其重大的影响。

张之洞兴学堂、练新军、办洋务所亟需的“新式人才”,在持续不断的派遣留学生过程中得到了部分解决。留学教育为湖北培养了一大批各式人才,他们学成回国后,对推动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如工科进士李四光、赵建熙、黄瀛元,农科进士程鸿书、刘先骕,政法科进士张祥麟、程明超,政治经济科进士戡翼翬,还有著名的国学大师黄侃,外交家郭泰祺等等,他们学成归国后,在各个行业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然而,大部分的留学知识群体,在国难当头的现实面前,在“知识救国”或“革命救国”的选择中,大多数毅然选择了后者。他们在欧风美雨的浸润下,并没有按照张之洞为他们所设定的“拥护传统秩序,具有近代新知的洋务新政人才”的

① 《东方杂志》,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号《教育·各省游学汇志》。

②③ 熊贤君:《湖北教育史》上卷,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39、237页。

模式发展,相反在中西反差的强烈刺激下,对传统秩序产生了极大的怀疑。许多留学生对于发达的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并无多大兴趣,倒是西方近代各种民主学说、社会政体理论拥有浓厚兴趣。这也是许多留学生大多数选学社会科学的主要原因所在。在湖北留学生群体中,一大批成了后来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启蒙者和辛亥革命的先锋。没有留学生群体“辛亥革命能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武昌首义在湖北爆发更是不可想象的”^①。翻开辛亥革命史可以看到,湖北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中坚主要是一批优秀的留学生组成。戴元丞、吴禄贞、刘成禺、李书城、田桐、蓝天蔚、刘公、吕大森、朱和中、张继熙等,资产阶级立宪派的代表人物汤化龙、张国溶、夏寿康等都是留学东洋的热血青年。

官费留学东西洋的目的是为了学习西方的科技文化,这种走出国门,形成漂洋过海的万里游学之旅,不仅培养了一批知识丰富、胸襟开阔、熟悉西方文化的近代第一批新型知识分子,同时也培养了一批清王朝的掘墓人。湖北留学生在海外一边学习先进的科学知识,一边传播中西文化,刘成禺、蓝天蔚、张继熙等发起创办的《湖北学生界》月刊,对中国特别是湖北的民众启蒙产生了极大的作用。吕大森、朱和中等翻译《猛回头》、《警世钟》等反清檄文在湖北广为传布,更是唤起了一批批热血青年加入反清的洪流。因此,出洋求学之旅,也是近代知识分子群体中的有志之士追求进步之旅,参加革命之旅,正如《留学生鉴》中所说:“旅行然后知居乡之可贵,出国然后知国家之可贵。”经历负笈大洋之游的生活之后,爱国救国之心在留学生中高扬起来,他们在实践中认识到游学旨在讲求救国的学问,讲求与列强竞争的学问。近代武汉知识群体的大洋游学,极大地丰富了旅游的内涵,前所未有地拓宽了旅游的空间。

(五) 近代武汉旅游客体的丰富与扩大

按现代旅游学的观点来看,旅游活动是旅游主体(旅游者)作用于旅游客体的行为过程。旅游客体是旅游的目的物、吸引物和吸引力等诸多因素的总和。它的外化形式即是存在于自然的环境和社会生活中,并对广大旅游者产生引诱力的诸多事物和诸多现象。旅游客体既可以是椰林海浪、云海高山、熔岩石窟、温泉火山、奇峰异石、海滨沙滩、崇山峻岭、深瀑悬崖、大漠戈壁等自然存在物,也可以是古人类遗址、古城人文景观遗址、宫殿建筑、园林景观、书院学堂、壁画碑刻、寺庙道观等等,还可以是民族节庆、民族习俗、民族音乐、戏剧等无具体形态的民俗风情、社会习俗。总之,旅游客体即是人们通常所指的“旅游资源”,但又不完全同旅游资源画等号,有许许多多非物质形态的文化现象,也是特定时空下对旅游主体

^① 皮明麻:《近代武汉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64页。

发生巨大吸引力作用的旅游客体。如异域的民歌和附会于高山大河或沙海戈壁上的无数神话传说等。但一般旅游学者认为，旅游客体是“指对旅游者具有吸引力的自然存在和历史遗存以及直接用于娱乐目的的人工创造物”。其客体分类可见下表：

旅游客体分类表

一级类型	二级类型	三级类型
自然风光	山岳	雪峰 冰川 名山 火山 怪石
	岩溶	石林 峰林 峰丛 溶洞 地下河
	江河	峡谷 瀑布 急流 险滩 江岸石矶 江心洲 岛屿
	湖泊	湖滩 湖堤 湖心岛
	泉水	冷泉 温泉 热泉 沸泉
	海洋	海滩 海岸 礁石 海岛 海港 海湾
	黄土	黄土塬 黄土沟壑 黄土丘
	生物	森林 草原 花卉 动物
	沙漠	沙丘 响沙 戈壁
	奇观	日出 日落 日蚀 月蚀 海市蜃楼 佛光 圣灯
	自然保护区	植物保护区 动物保护区 地质剖面保护区 典型地貌保护区
	气候	日照 气温 积雪 风力 降水
人文景观	历史古迹	古人类遗址 古文化遗址 古城遗址 古冶窑遗址 皇帝陵墓
		古代墓群 宫殿建筑 寺庙建筑 园林建筑 纪念性建筑 亭台楼阁
		书院学堂 名人故居 牌坊 宫阙 长城关隘 古代道路 古运河
		古堰塘 古桥梁 石窟 古塔 碑刻 壁画 壁影 造像 经幢
	近代史迹	革命遗址 烈士陵园 纪念性建筑
	园林艺术	帝宫园林 第宅园林 公共园林
	社会风情	民族节日 民族服饰 民族习俗
	文化艺术	绘画 书法 音乐 文学 戏剧 曲艺 电影 杂志 体育 博物馆
	城乡风貌	街道 大楼 商场 乡村 田园 牧场 梯田 农场
	现代工程	水库 水坝 隧道 船闸 潮闸 大堤 桥梁 矿井 钻井台 铁塔
	科学技术	实验场所 科技成果
	旅游设施	饭店 酒店 车队 购物中心 索道 游船
人文产品	交通设施	地铁 码头 机场 车站 停车场
	游乐场所	公园 游乐场 文化宫 俱乐部 动物园 植物园 主题公园
	运动场地	体育场 体育馆 海滨浴场 滑雪场 狩猎场 高尔夫球场
	工艺产品	雕刻 景泰蓝 瓷器 漆器 刺绣 织锦 编织 地毯 剪纸 泥塑
人文产品	土特产品	茶叶 名酒 药材 果品 土产
	名菜佳肴	小吃 名菜 名点

随着近代武汉旅游的迅速发展、旅游主体的不断壮大,旅游客体在西洋工业文明的冲击与影响下,同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具体表现为:传统的私家园林开始向公园转型;现代的游乐场、俱乐部、大剧院、电影院、跑马场等开始取代传统的说书、演戏的勾栏茶肆;现代都市风貌成为旅游者的主要吸引物。

1. 从私家园林兴盛到近代公园的兴起

中国园林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如果从最初的殷周时期诞生的“囿”算起,我国的园林历史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中国园林多以创作山水、自然为生活境域而著称于世,早在唐宋时期,我国山水园林的创作已经全面成熟。到了明朝,已经有了更完美的成果。明崇祯七年即1634年,著名的造园家、江苏吴江人计成先生(约生于1582年)就撰写了世界最古老的园艺学名著——《园冶》。全书一万多字、235幅插图,集中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的园林面貌和高超的中国园艺技法,对后世的造园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自隋、唐之后,武汉由“城堡时期”进入“封建镇邑”时期之后,武汉园林景观建设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大量的私家园林、王府花园和寺院园林的出现。据不完全统计,武汉城区自明清以来有30多座被史料记载的私家园林,它们分别修建于武昌、汉阳、汉口三镇。其规模之盛、气势之大、构建之美,令游人感怀不已。清末著名方志学家王葆心(1864~1944年)在《续汉口丛谈》一书中记述了明清以降武汉地区私家园林的盛况:“汉阳园亭池馆之盛,在明季清初,点缀殊胜后来。当时承平雅尚,不似今人但竞侈于车马服食也。”“明季汉南园亭池馆之胜,甲于江汉间。当万历之末(即1619年),世运承平,士大夫解组归来,无不假此行乐……于时南北雅儒士夫、文人墨客游江汉者,自黄鹤、晴川外,登眺之盛以肖氏园林为之最,王章甫‘水明楼’及‘葵园’次之,李大参园亭又次之”。①“有清中叶,汉口花木园亭之胜,有洪旂林坛之‘谁园’,在居仁坊,园中有‘问青阁’、‘得月亭’、‘卅字桥’诸胜。又有包云舫遐谿怡乐园。在汉口南岸、汉阳东门外;园内有水亭,满种芰荷。今皆不知遗址所在。又有白园,在后湖,程耕云秉有题壁诗,其址今亦不可考。此外覃怀会馆同人有‘豫成园’,亦耕云为之记,在今药王庙。至近日通镇所传,只一刘园,在铁路外,辛亥之变,半已摧毁,尚待规复云。”“黄鹤山濒臬署一带,从前饶有园亭。咸同燹后,久不闻矣。”②“除汉口中山公园及武昌首义公园席由政府修建管理外,其余私家花园亦颇不少。惜因管理无人,亭台湖榭沦为荒丘耳。”③如武昌大东门外的东园和漏泽园,大东门内的桑园(清代),蛇山南侧的

① 王葆心:《续汉口丛谈》卷2,1916年版。

② 王葆心:《再续汉口丛谈》卷4,1933年版。

③ 《新武汉》1940年9月。

熊园（明天启年间），塔影园（乾隆年间），借影园（乾隆年间），乃园（清代）；蛇山北侧的王园（清代顺治年间），紫藤仙馆（清同治），木园（清同治），藹园（清乾隆年间），崇王府花园（明），亦园（明），补园（明），山园（清嘉庆年间）；建于汉阳龟山四周的萧园（明崇祯年间）、葵园（明末清初）、宋园（清康熙年间）、万园（清末）、怡园（清末）；建于汉口宗关的周园（清末），建于唐家巷的谁园（清乾隆末年），建于后湖边上的葛园、白园（清嘉庆年间）；建于武胜路周围的也园（清末）；建于药帮巷的豫成园（清康熙年间），以及于江汉路的刘园（清咸丰、光绪年间）。请参阅明清时期武汉三镇私家花园一览表：

私家花园一览表

编号	园 名	园 主	建园时间	建 园 地 址	备注
1	崇阳府花园		明	武昌花园山	
2	熊园	熊廷弼	明万历四十三年(1613年)	起义门内 紫阳湖东南	
3	梅亭书屋(董园)	董长驭	明万历年间	武昌旧中和门(今起义门)内梅亭山上	与熊园遥遥相对
4	肖氏园林	肖方伯	明天启年间	汉阳旧城西凤栖山梅岩间	
5	葵园	王章甫	明崇祯年间	汉阳归元寺内	
6	西园(李大参园亭)	李学仲	明崇祯年间	汉阳	
7	江园(灵芝峰)	江西崖	清初	汉阳龟山南麓	
8	东山小隐	徐子星	1680年	武昌高观山	蛇山上的一峰
9	藹园(又名刘园)	刘居士	1793年	武昌崇府山、花园山之麓	明崇阳王府遗址约十亩
10	寸园	张明卿	1868年	武昌胭脂路	
11	乃园	湖北臬署	1886年	武昌大成路	约数十亩,明代臬署园,已毁,后重建。
12	白园		清嘉庆年间	汉口后湖	
13	怡园	包云舫	清中叶	汉阳显正街东口	
14	谁园	林坛	清中叶	汉口居仁坊(硃口)	
15	紫藤仙馆	胡月樵	清同治年间	武昌城东黄家巷即今候补街侧	
16	怡神园		1895年	汉口旧循礼坊夹街	原山陕会馆附属花园

续表

编号	园 名	园 主	建园时间	建 园 地 址	备注
17	豫成园	覃怀会馆 同人建		今汉口四官殿附近	约十亩
18	万寿宫				原江西会馆
19	憩园		1896 年	今武昌司门口武昌区政府院内	鄂王府后花园
20	鄂园	湖北省教育界	清光绪年间	武昌黄土坡街	
21	刘园	刘歆生	清光绪年间	今汉口循礼门车站旁、铁路外	
22	东园	王少林	清光绪年间	汉阳依山	约一亩
23	止园	鲁之裕	清	今武昌胭脂路旁	
24	孙森茂花园	李廉方	1901 年	今武昌花园山	
25	湖上园	蔡汉卿	1913 年	今武昌张之洞路	
26	杨园	英国人	1914 年	今武昌杨园	
27	啸园	王绳高	民国初年	武昌烈士祠街锅山	
28	西园	李华堂	民国初年	汉口今中山公园内	约五亩
29	高山仰止园		民国初年		
30	陆水汾园		民国初年		
31	隋园				
32	张香根园	张香根		汉阳凤栖山下校场湖畔	
33	东北花园			锅山	
34	官园	石兴川		武昌洪山	
35	老圃花园	刘歆生		江汉路京汉铁路内	
36	新新花园			今汉口铭心街昌业里对面	

上述私家花园林林总总、大大小小不下百余座。它们或因地利制宜、小中见大，在不足一亩之地的园内表现无限的美景；或曲径通幽、锦上添花；或朱门绣楼、飞阁流丹；或廊腰漫回、曲折多姿。体现了明清以来武汉地区的许多园林师、建筑师、美术师以及广大能工巧匠的无比智慧。如建于清中叶汉阳莲花湖附近的怡园，是一座颇具规模的艺术园林。园地不大，但却有十二景。范锴在《汉口丛谈》中记载：“怡园著有十二景之目：曰‘亭北春红’、‘廊西秋碧’、‘仄径竹深’、‘澄池荷静’、‘薇架花香’、‘蓉屏月影’、‘小山丛桂’、‘曲磴古梅’、‘悬崖瀑布’、‘一石洞

天’、‘平台歌舞’、‘高阁琴书’。包山属江都张某绘画册十二幅，一时题者甚伙。”^① 这些私园大多由明清以来汉上一些解组归里的士大夫或巨商富贾为自娱自乐、崇尚雅兴所建，园址大多选择于城区依山傍水、风景秀丽的地方，园林风格也多借江南园林之技巧。许多私园都是园主招致雅流、文人学士汇聚之所。如葵园之主王章甫，在明末购地辟葵园，意在会天下名士，交当时奇才。

葵园曾是当时名士袁宏道等常聚之所。袁宏道曾撰写过《汉阳过王章甫葵园和二仲韵》一诗：“户外郎遥岭，寒香渐出林。增池缘亩阔，疏竹为庭阴。烟云裁为向，风泉收入琴，欲知桐性老，火里试焦音。”^② 葵园后为明末农民起义军所毁，王氏子孙将此园卖给汉川人张慕存，张氏买此园不到十年就施舍给浙江苕溪殷氏之二子白光（1605～1683年）、王峰（1616～1678年），改为归元寺，师尊禅宗。《归元寺碑记》中有：“风动葵园，葵本无目，向日而繁；蕉本无目，闻雷而荪。”的记载。王葆心在《续汉口丛谈》卷2中也曾有关于葵园的详细记载：“在江（西）崖前，于明季擅园林之胜者有汉南王氏，曰王章甫郡丞，工诗。尝构‘水明楼’于凤山脊。……王氏当时复辟‘葵园’于城西关外二里，招致雅流，如袁公安，麻城邱长孺辈，觞咏其中。……园中亦有奇石，绉透殊伦，题曰‘翠微峰’。峰旁有井，号‘翠微井’。……故址今为归元寺。顺治十五年（1658年），云川高僧白光明主峰昆兄弟游楚，即募得园址为寺。至光绪十五年（1889年），上人恩普复募于宋寿丞军门。刘斌廷观察等，入都迄得全藏经1127卷，建阁贮之。而乞罗田编修周伯敬先生锡恩为之记。又募建五百罗汉。堂前有‘放生池’养龟无数。游人多以饵投入，观其竞食为乐。辛亥北伐军破汉阳，以军储屯积地，寺半摧损，今犹未复旧观也。”^③

鸦片战争以后，尤其是1861年武汉开埠通商以来，传统的私园建筑开始发生转变，在风格上开始吸收西洋建筑风格，在材料上以钢筋水泥替代了传统单一的木质结构，私家园林渐渐被称之为花园。园地面积以及园内设施也较过去的私园大有改观。这些花园主多为租界内列强富商，也有一些军阀、官僚和著名的工商业者。他们或在汉口租界区内，或在城区景色极佳之地，或在城郊风景宜人之处，以十分低廉的地价购得地皮，大兴土木，圈地建园。这些建筑成为风靡一时的现代都市游观点。修建花园和别墅的主人，目的动机各不相同，有效仿明清时期大修私园的仕人富商那样，造园既为主人生活享乐，也为名垂青史；也有受欧风美雨浸润的园主，造园是为商业交际的需要，花园作为他争名逐利的活动场所；还有的园主是为了提高身价，将花园别墅作为他做买卖的招牌；也还有为营利而将花园作为经济

① 范锴：《汉口丛谈》卷5。

② 昌学汤：《汉阳归元寺史话》，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96页。

③ 王葆心：《续汉口丛谈》卷2。

收入的场所的园主。无论如何,这些花园别墅的建设是对传统旅游景观的一种补充,也是西洋工业文明在武汉移植的结果,它既表现了传统旅游客体的拓展、丰富与变迁,同时也为近代武汉旅游客体近代化提供了可资仿效的范例。在许多花园与别墅兴建的同时,另一种新的旅游景观——公园建设开始在武汉出现了。公园是指公众消遣游憩的场所。西方最早的公园是波斯帝国的苑囿,内有广阔的狩猎场、供骑射的驰道、供躲避风雨的处所,经艺术加工成为一类公园;另一类公园是从露天集会场地发展而来的,如古代雅典的竞技场,原是举行比赛、训练运动员的地方,后来连同画廊与宗教建筑形成了公园。西方近现代城市的公园有两种:一种是18世纪以前的私人园林,后成为公众娱乐的场所;另一种是靠公积金维持的供公众娱乐的园林。另外还有国家公园,它拥有大片土地,可供公众游憩,也有为保护动植物生长的公园。公园与私园的最大区别在于它属于公众的游乐场所,而私园往往是某一部分人的游观处所;另外,私园游观是不收取费用的,而公园往往收取一定的门票费以供维持管理。有些公园不收门票是由于其建造和维护费用均来自于某种公积金。

近代武汉最早的公园并不是政府投资兴建的,而是一位酷好山水、宦游武汉的浙江永嘉人任桐。

任桐(1868~1932年),字琴父,始祖由福建迁往浙江永嘉之任桥,乃当地之大族。至其父辈,家道中落,但父母仍资其求学。任桐自幼喜诗文,稍长擅书画,雅好山水。年轻时曾游历过“雁荡、西泠、虎丘、秦淮、洞庭、潇湘,以及北京三海,广州之珠江,巴东之三峡”^①,所以他对园林艺术颇有造诣。30岁前,任桐曾三次乡试不第,虽自憾而不气馁。1900年任桐筹资500元“赴鄂入校求学”,抵鄂时已误考期。1901年由刘渠川观察推荐,通过“纳粟入仕”,在武昌斗级营捐局施夔甫太守的鼎力帮助下,捐得一候补知县。辛亥鼎革后,任桐曾一度任职于武昌商埠局,并与友人筹建盐业公司。后“移居沙湖,不闻时事,自号‘沙湖居士’”^②。任桐所言“沙湖”,即现在的东湖。他在《沙湖志》中称:“沙湖旧名东湖,又名歌笛湖。方三十七里。在武昌南阜东。”虽《江夏县志》中无“沙湖旧名东湖”之说,但明景泰六年(1455年)陈循等著《寰宇通志》中有“古东湖在府城东四里,湖上有东园,为近城登览之所”的记载。可见《沙湖志》之说可信。

任桐是武汉第一个建造公众性游乐景区——琴园的创始人,也是现代最早开发东湖风景区的第一人。琴园始建于1916年,其地址位于今武昌徐家棚一带的琴园路葛化集团塑料厂附近,占地3.75公顷,曾是东湖风景区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园中设有茶楼、戏院、照相馆、花园、假山、天桥,并有大池塘、小池塘、仙人

① 任桐:《园林春色》,石印本。

② 任桐:《沙湖志》,1926年石印本。任桐之孙任世铎赠笔者石印本复印件。

洞、仙人桥。园内凿有十米多宽的人工河，绕园蜿蜒而过，还配有两艘机械游艇供游人使用。大门口建有票房，游园者须购门票入园，票价为大洋5分。1934年7月出版的《旅行指南》杂志曾记载：“琴园占地辽阔，其中亭台池榭布置得宜，花木菁密，足供游览。”据毕业于解放前的中华大学、现已80多高龄的郑昌琳先生回忆：“琴园是当时武汉三镇惟一的一座具有现代特点的山水公园。”琴园曾吸引过当时许多的名人学士，如当时武汉的名人杨铎，晚清改良派领袖康有为等。杨铎曾为唱和任桐修建琴园之功，撰写过十分精彩的《沙湖三唱》，对东湖的美景作过相当精到的描写。康有为曾为琴园题写过“琴谱茶经，扶轮风雅；园花池月，悟彻禅机”^①的楹联。任桐晚年拟组织“沙湖建设会”，以琴园为依托，系统地开发、营建整个东湖风景区，并著文将琴园归“沙湖建设会”保存，作为地方公益事业，“不私于子孙”。可惜时世不佳，琴园衰废于三次劫难：其一是军阀败兵的破坏；其二是1931年的武汉大水灾；其三是1938年日军侵占武汉，琴园成为日军兵营，园内建筑物全部被毁，一片荒芜，此后未再恢复。

任桐对东湖风景区的另一贡献，是他用了几十年的心血，“从残碑断碣、家乘手卷、藏抄本，以及墓陵寺观中，十余年搜索备至”，撰写成一部全面反映东湖风景区的山水地貌、自然风光、历史沿革、文物典籍、名胜传说的山水志书——《沙湖志》^②。该书全一册，成书于1923年，出版于“丙寅九月重阳后十日”（即1926年秋），为石印本。全书分十大类，以“沙湖十六景”居首，依次为湖景、山景、名胜古迹、人物、寺观、村集、出产、风俗、杂俎。卷首有叙、有目、有记，卷末附有“沙湖名胜全图”。该书史料丰富、内容广博，不仅志山、志水，而且志人、志事。志山，不仅包括东湖附近的大小洪山、珞珈山，而且囊括方圆二百里的明代楚藩八王陵寝所在地的灵泉山；志水，以东湖37里水面为中心，远至周边的汤逊湖、今鄂州的梁子湖，充分体现了任桐区域景观的园林美学思想。“沙湖十六景”（琴堤水月、雁桥秋影、寒溪渔梦、金冢桃花、东山残碣、九峰晨钟、虎岩云啸、卓刀饮泉、泉亭松韵、兰岭香风、青山雨夜、石壁龙湫、沟口夕阳、夹山咏雪、梁湖放棹、鸥岛浴波）是任桐从区域景观思想出发，把东湖四周方圆几百里的湖光山色、名胜古迹、神话传说融为一个整体而归纳出的可供深度开发的十六处典型景观；志人志事，不仅记载清末、民初的东湖周边的人物史事，而且远及汉唐，近至民国。作者广搜博采、抉剔梳理，几乎列举了历朝以来与东湖有关的许多名人学士，如汉代的樊噲、黄琬；晋代的陶侃、孟嘉；唐代的李宗道、李北海；宋代的岳武穆、张叔夜；明代的邹智、张璞；清代的艾然、敬心等文臣武将与名士僧道。《沙湖志》中的描景状物、叙史写实、谈古论今，均体现了作者独到的叙事方法和

① 任桐：《园林春色》，石印本。

② 任桐：《沙湖志》，1926年石印本。任桐之孙任世铎赠笔者石印本复印件。

开阔的学术视野，并将作者对沙湖地区的历史景观、人文地理、风土传说的熟稔表现得淋漓尽致。“沙湖十六景”是任桐先生以一种凌空鸟瞰的宏大视角，对东湖及周边地区自然景观中极具特色的景点的一种凝炼概括。他以东湖为中心，将古时狮子山的正觉寺的钟声、九峰山的松柏、灵泉山的黑虎岩、卓刀泉的山水清音、大江边的青山、梁子湖的放舟等景观和谐有机地连为一体；这对后来的东湖风景区的景观建设，以及将来东湖风景区的发展，都有着十分宝贵的指导与借鉴作用。卷尾的“沙湖名胜全景图”，是近代东湖最早的、也是最完备的山水舆图，同时也是近代东湖风景区最早的导游图。

任桐之后，有辛亥元勋夏道南创建的首义公园。该园所用地系民国十三年（1924年）政府体念首义伤军所拨给的。它坐落在武昌蛇山西端南麓，东起文庙（现武汉市第十中学），西至陆水巷，北抵陈友谅墓，南止大成路乃园遗址附近。1923年开始筹备，筹备处设在都司巷，公推夏道南为首义总务主任，后为经理。夏道南，湖北嘉鱼人，早年加入武昌新军，因散发反清宣传品被开除，旋即赴日本留学，先入振武学校，毕业后再入步兵专科学校，又转入参谋部研究军事三年。武昌起义，他潜行归国，先被聘为都督府顾问，后邀任军务部参谋长……孙武、张振武离鄂期间，黎元洪令他代理部长职务，南北和议后，在汉口组织东亚大同社会和汉大舞台，自任经理^①。据湖北档案馆《武昌辛亥首义铁血伤军清册》记载了武昌首义公园筹备建筑的经过：“首义公园经理夏道南称：……辛亥之役，武昌首义……专制倾覆，民国奠基……迄今十年来政府尚无若何纪念之表现。道南及诸首义同人恐其日久湮没，系于十年（1921年）十月，呈请督省两署备案，组立‘武昌首义纪念事业筹备处’于都司巷。十二年春，道南被公推为园务主任，负责筹划建筑纪念公园。……开辟公园现址荒山，收买玉带街民房四十余间及……等地，并修葺大汉陈友谅坟墓，建筑墓旁双亭，全园石级等项计费洋贰万余元。惟此项经费，既作政府拨给，又未各种募捐，其所自来，实为道南私人借垫。同年，又借粤汉铁路协会洋贰万余元，修建纪念堂、西游厅等处，又集股洋壹万五千六百元修建共和游艺社。十三年又借湖北官钱局洋壹万元，补竣全园工程，总计所费共洋陆万五千陆百元……”^②

尽管首义公园属主题十分明确的纪念性公园，并且黎元洪把它作为辛亥革命伤兵自找饭碗的谋生场所，并放任一些伤兵在公园内任意搭盖建筑物，但在当时尚属城区内的惟一的一座公园，故游人甚多。据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7月26日的“社会新闻”报道：“武昌首义公园，与黄鹤楼相毗连，山水花木，引人入胜，虽其内汉班剧社不甚佳，而一至夜间，清风徐来，黄鹤楼所不及也，所以日来游人甚

① 贺觉非主编：《辛亥武昌起义革命人物传》下册。

② 湖北省档案馆，全宗一〇四卷号四五八，1935年。

多,尤其是文人墨士。”武昌首义公园内常举行各种公众活动,使得武汉城区景观平添一道亮色。

自首义公园建成之后,1928年国民政府在原西园(地皮大王刘歆生的私人花园)基础上开始筹建中山公园。由留英归来的著名工程师吴国炳负责设计。当时的内政部长蒋作宾曾夸奖中山公园的设计水平,他视察中山公园之后曾说:“我到过欧洲、日本,还没有这么好的公园,回南京要通令全国到汉口考察,提倡建公园、修下水道,以汉口为榜样。”中山公园除花圃外,还有各种运动场,“是亚洲第一个综合公园”^①。

从私家园林的兴盛到近代公园的兴起,我们可以看到武汉园林景观建设所走过的一条漫长的向现代化转变的道路。其中,西洋文化的巨大冲击,是这种转变的外在动力;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促进这种转变的重要原因之一;而随着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人文主义思潮和平民化思想的传播与发展,则是这种转变的内在动因。

2. 从旧式茶馆到现代游乐场馆的建立

武汉开埠以前,勾栏茶肆是人们驻足休闲的主要场所。由于武汉自古以来就是商贸重镇,流动人口繁多,商贾往来频繁,形形色色的旅游者常常驻足武汉,使得武汉早期的服务行业悄然兴起。最具代表的服务行当是人们常常称道的“三馆”:即“茶馆、饭馆和旅馆”。早期的“三馆”服务对象略有区别,茶馆主要接待本埠居民,而旅馆和饭馆多为外邦的旅行者服务。但茶馆也常常接待外邦游客。很多来往的船民,中、小工商业者都喜欢利用茶馆这个场所进行商业贸易,更多的则是武汉本地军民常常聚集茶馆听书看戏,品茶聊天。他们中间既有小手工业者、码头工人、工厂雇员,也有各式商人、社会闲杂人员。早期武汉的茶馆多设在人口稠密的街道,武汉三镇稍稍繁华之处皆有茶馆设立。较著名的茶馆有同善里的临城茶楼、后花楼口的“楼外楼”茶楼、三民路的沧海茶馆、民意一路口的江南春茶楼、集稼嘴河边的怡心楼、硃口路的德心路、大夹街的凤台茶楼、汉正街的安乐泉、长堤街的保寿泉茶馆、利济路的清香茶社等等^②,因为这些地方是商业繁华之处。还有一些茶馆设立在市郊风景优美的湖山交汇之地,如汉口的后湖,是当时茶馆业最为繁华的地方之一。范锴的《汉口丛谈》就曾记述过后湖茶肆之盛况:

“后湖茶肆,上路以白楼为最著。白楼者,白氏之故址也。在大观音阁后,百弓地辟。垒上坚垆编槿为篱,积石成径。中构小楼,作东西两厢,轩窗豁达,槛曲廊回之内皆设小座,以供茗坐。外复四植杨柳、绿阴垂幄。翠堤襟

① 武汉市园林局编:《武汉风景名胜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05页。

② 田梅村:《旧时武汉茶馆见闻》,《武汉文史资料》第18期。

带间。又筑堤以高之，大水不没。可通游人往来。楼外远山几抹，隐隐青露。……若于盛夏，湖水平堤。……渔郎远近，乡应沙渚，避暑者接踵而至。布衣挂树。凉风袭人。七碗香生，适然歌咏，凭眺之胜。以斯楼为第一。……

后湖有茶肆。相传自湖心亭始，近若涌金泉、第五泉、翠乡、惠芳、习亭、丽春轩之名为著。皆在下路雷祖殿三元殿后。其余尚有数十处。弦歌喧耳。士女杂坐。较上湖游人更盛。湖心亭地颇疏散。艺花叠石，位置亦宜。”^①

王葆心的《续汉口丛谈》也有对后湖茶肆的描述：“近年茶肆酒帘，列置上下，亭馆数十椽，间植花柳。湖光野色，点缀可观，豪竹哀丝，夜分不断。”由于后湖景观独特，“湘湖八景”吸引了无数游人，加上“百戏杂陈”，后湖一带成了人们所说的“销金锅”^②。1985年当时许多富商巨贾常常到后湖茶楼包船游观，或品茶狎妓，或洽谈生意，或娱乐休闲，或商谈“行市”。

开埠之后，随着武汉商贸的日渐繁盛，城市人口剧增，茶馆的发展也同步增长。据初步统计，“1909年，三镇茶馆为411家，其中汉口250家，汉阳、武昌161家；1918年汉口茶馆696家，1927年1117家”^③。茶馆既是商人、行帮进行交易、借“茶会”谈“商情行市”的地方，也是旅游者休息等候同伴的场所，同时也是一个纷繁复杂、各式人物大荟萃的地方，一个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

开茶馆的人往往都是些颇有背景的人物，比如武汉名人刘玉堂、刘桂苟、章庆澜、潘义、王贵和、黄辅臣、杨庆山、周汉卿等等，都是先从开茶馆、饭馆、旅馆这三馆起家的。汉口曾流传一句名言：“不是光棍不开茶馆。”

应当指出，茶馆的种类很多，分类的方式也多种多样。按经营面积大小来分，“茶馆大致可分为大型户、中型户和小型户三种。但不管哪一种型户，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除经营茶馆业务外，均聚众赌博，从中抽头渔利，这是开设茶馆的另一种收入。也有个别茶馆专营卖茶业务，不聚众赌博，但这只是极少数”^④；按照经营性质来分，又可分为“清水”和“浑水”两种。清水茶馆以卖茶为主，里面不演戏、不打牌；浑水茶馆里，说书、唱戏、打皮影戏、标会，甚至打牌赌博、招妓等都有；按照经营特色来分，有的以浓厚的乡土文化传递为其主要特点，卖茶只是辅助手段，说书、唱戏是其主要经营内容。许多名为茶园的茶肆，实质上就是后来的戏院、娱乐城；有的以提供商贸交易场所为主要目的，这类茶馆多有雅座、包间，以利茶馆交换商情行市；有的以打探情报、行帮聚会为特点，这类茶馆多为行帮的

① 范锴：《汉口丛谈》卷1。

② 徐明庭等：《汉口竹枝词校注》。

③ 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55页。

④ 《武汉文史资料》总第18期，1984年第6期，田梅林：《旧时代武汉茶馆见闻》。

窝点，许多不可告人的活动，多在这类茶馆里密谋策划，这类茶馆的主人也多是行帮头目，如生成里的味春茶馆、民生路的荣华茶楼、江汉路的洞天居茶楼、必成里的荟萃茶馆等。

茶馆与地方戏曲素有不解之缘。范锴的《汉口丛谈》里多处提到嘉庆年间在茶馆里卖唱的“唱婆子”，她们均“青衣布素”，“手挈（提）竹篮入市”，这是当时“善歌小词”的少妇特有的装扮。范锴描述她们：“黑漆包头白粉腮，竹筐携去店门开，等闲爱听清平调，十个铜钱唱一回。”

清朝末年，黄孝花鼓戏在武汉颇有爱好者，因为花鼓戏里头大多言情故事，也夹杂许多“浑俗不堪”的内容，因而当时的官府严禁演唱。为了躲避缉拿，花鼓戏班就“在德租界华景街附近一个茶馆的楼上半夜三更秘密地演出”。后来花鼓戏在租界上的茶楼里盛行起来，观众十分踊跃，茶馆生意就更好了。在茶馆里搭班的演员，伙食由茶馆老板供给，观众点戏给的钱，老板也分账。辛亥革命以后，花鼓戏在茶馆里更是风行一时。在法租界上，演出花鼓戏的茶馆就有20多家，茶馆也改称茶园和茶楼，每天座无虚席。当时著名的有共和升平楼（在今人民剧院）、四海升平楼、天一茶园、天仙茶园等。1927年经过改进的花鼓戏正式定名为楚剧，花鼓戏发展成拥有广大观众的地方戏。汉剧戏班不仅在茶馆里演出，演员们还常常到茶馆聚会，谈家常，说戏艺。汉口六渡桥几家大茶馆就是汉剧演员云集之所。对汉剧的改进和发展颇有贡献的傅心一，当年就常到茶馆里和艺人们探讨改进汉剧的问题。

据方明、陈章华统计，汉口最早请戏班到茶馆里唱戏的是1898年创建的“醉乐茶园”。它地处长堤街，是西北艺人“王月鲜”来汉唱京剧的发祥地^①。1899年开业的丹桂茶园也是戏班子活跃的地方，可惜它地处大智门，当时那里地广人稀、交通不便，致使开业不久便歇业；建于1901年的天一茶园，地处花楼街，它是首创京剧、汉剧同台演出的茶园，可惜该园经营仅一年光景便毁于火灾。后来，“刘天得药店”的老板刘子陶因酷爱戏曲，在三元殿开设“满春茶园”，聚集了一批戏剧名人，周信芳、王鸿寿等名家曾在此献过艺。三元殿因此而改称“满春街”。满春茶园直到1930年才最后歇业。

首先将专业唱戏的茶园改为戏院的，是美成茶园（即后来的清芬剧场）。紧接着，乐园戏院（今老会宾酒楼）、长乐戏院（今楚风剧院）、万松园戏院、新汉舞台（在今舞台巷内）、怡园（今江汉路口）、新民戏院（盐业银行旁）、双红戏园（新民戏院旁）、共舞台（今人民剧院）、天声舞台（今民主剧场）、天仙舞台（今兴汉剧场）、京汉舞台（今市政府礼堂原址）、立大舞台（华清街庆安里内）、美商舞台（金城银行附近）、合记大舞台（盐业银行旧址）、笑舞台（桃源坊附近）、楚一戏院

^① 方明、陈章华：《武汉旧日风情》，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58页。

(单洞门附近)、共和舞台(今黄鹤楼剧场)、乃园(首义公园内)、野园(今硚口崇仁巷内)等等相继开业,且都是由茶园演化而来的,所以初期都还保留了一些茶园特色,将茶馆唱戏改为戏院卖茶。开始时不对号入座,后来才将座位分等级,当中称正座,两旁为边座,楼上为楼座。楼座的前几排档次最高,桌上铺台布,摆鲜花,夏用竹椅垫,冬用棉椅垫,称“花楼”,颇似古代“勾栏”。正座的前几排设包厢,每一包厢坐5人,票价昂贵。一些高官显贵、富商巨贾或纨绔膏粱子弟常常一两人坐一包厢,以显示其与众不同的身份。有的戏院还设有供军、警、宪、特人员看白戏的专席,美其名曰“弹压席”。每座戏院都有称之为茶房的服务人员数十名,这些茶房没有固定工资,只靠观众买茶、瓜子,夏天给观众送手巾赚取小费谋生。当时的戏院老板,多为有权势或与权势者有关的头面人物。剧院之间彼此竞争激烈,其手法层出不穷,有的还颇为新巧。如竞相聘请京沪名伶,制作精巧新颖的布景机关,上演离奇荒诞的连台本戏,还派女演员、女艺人推销红票或随票赠送香烟、团扇等招徕顾客,甚至相互挖脚拆台。因连年不断的战祸,使百业萧条,至解放前夕,武汉三镇苟延下来的剧场仅剩10家。

所以说,茶馆不仅有娱乐休闲的功能,还具有传播和发展乡土文化的功能。许多著名的戏剧艺术家如汪笑侬、董瑶阶、吴天保、陈月仙等,早年都曾分别在丹桂茶园、天一茶园和满春茶园唱过戏。特别是群仙茶园(后改为怡园)更是戏剧明星的汇聚之地。当时花鼓戏、楚剧、汉剧等剧目大多数是通过茶馆的流浪艺人传播到广大民众中去的,并使之家喻户晓。许多新的娱乐方式如纸牌等也往往先从茶馆里传播开来。皮影戏、电影等,也是从茶馆这一特殊场所让广大市民阶层所了解和见识。

随着西洋文化的影响和西方现代电声光等科技娱乐技术的传入,戏剧的表演方式,勾栏茶肆的演出场地以及戏剧的声、光效果等等,都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其突出特征为:一是许多茶馆、茶园开始改为舞台或大戏院;二是部分茶馆自动消失;三是茶馆的部分经营者开始经营大戏院或电影院。“1920年前后,茶园这名称,逐渐被人淡忘,茶园多已停锣。贤乐茶园的所在地原名‘土垱’,以后这里的巷子就名为贤乐巷,而贤乐茶园早在70年前便已消失。早年茶园继续演出过渡到成为戏院、舞台的,只剩下四家,即满春、共和升平楼、玉壶春、玉仙。以后,玉壶春改名天仙,共和升平楼改名共舞台,玉仙改名天声。20年代初或稍前,新开的剧场,不仅称为舞台或戏院,有的还加一个‘大’字,如大舞台或大戏院。约在20余年的时间里,汉口先后出现的剧场有:汉口大舞台、天声、天仙、满春、兴汉、立大舞台、长乐、美成、德明、宁汉、黄金、长江、民乐、建国等;同时期里,也出现了以综合几个剧场为一家游乐场(游艺场)的有老圃、新市场、新新、凌霄。有的剧场,由于经营时间短促,地址偏远,因而知名度低,自难录全。”^①

① 皮明麻:《汉口五百年》,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94页。

由此可见,茶馆、茶园以及后来由它转型演变而来的戏院、大舞台、电影院等,均是近代旅游者娱乐休闲游观的主要场所。

3. 现代都市风貌成为旅游者的重要吸引物

开埠之前,武汉的城市风貌,还保持着传统的封建镇邑的特色,古街古楼、古道古巷,大多数建筑沿河而建,随风朝阳,且自然生成,几无规划,因而武汉的城市建筑极为拥挤不堪,特别是汉口街道更为密集。嘉庆《汉阳县志》记载:“沿岸居民蜂钻蚁聚,其舟居者鱼鳞杂沓,曲巷小口通道,辄十室之众纷然杂处。”19世纪50年代,传教士胡克神父就曾描述过汉口建筑的密集,他说汉口“异常的喧闹……在汉口各个角落,到处熙熙攘攘,人群是这样的拥挤,以至要想穿过他们中间寻觅去路,必须付出很大力气”。美国学者罗·威廉认为:“汉口的拥挤在中国城市达到了独一无二的水平”,“在整个19世纪的中国,很可能汉口是人口最密集的地方”^①。在汉水之滨、长江两岸和后湖边上,由于移民的迅速涌入,自发地搭盖了许许多多的吊脚楼。英国传教士亨利埃塔·梅林在1885年5月1日的日记中曾写道:“这些房屋像英国木偶戏中驼背角色那样,较矮的部分有木桩支着,很多房屋倾斜得很厉害,经常一起倒下来”^②。官府的房屋虽然比平民好许多,但“官衙多为平房,用普通材料,厅室一般铺以砂土,或张以板,并列椅子于其上,中央具备桌子,常围绕以坐之”^③。

法国人加勒利·伊凡曾对当时的武汉作过十分形象化的描述:

“我从不厌倦地注视着这两条河流(长江与汉水),它像天蓝色的丝带似的环绕着这三座大城(武昌、汉阳、汉口)。扬子江真是一个内海,海豚在江中嬉戏,宛如海洋里一样,许多极大的船只航行于激流上。汉水虽不如它所流入的江水大,却也是一条美丽的河流,滚滚的波涛,颇与法国的都兰斯河相似,那里的波浪也是很大的。中国的船确乎是世界上最喧闹的,时时刻刻都敲着锣,放着鞭炮。试想,五六千只船汇合在一起,发出多么可怕的喧嚣!在这一片几乎无边的平原上,金属物的铿锵声和火药爆炸声夹在一起,刺入人的耳鼓,好比大蜂房里嘈杂的嗡嗡声。”

“汉水在右岸,武昌的对面是汉阳城。右岸有广大的郊区,蜿蜒的大江灌溉着平原,在这平原上坐落着三座大城。江堤上种着垂柳树和翠竹。在绿树的空隙外,可以看见许多棚架,上面栖息着全家的人,这是渔夫的空中住所……

① [美]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的城市和社会》(荆州文史),1990年1期。

② 皮明庥:《近代武汉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

③ [日]水野幸吉:《汉口》,第49页。

他们把带着长柄木框的鱼网抛进河里，借着木柄运转，同时用绞盘把它拉回来，每天可以有好几次得到满网的鱼。”

“汉水流入扬子江的交叉点，本地人称为汉口，中国人认为这地方是国内最大的商埠。汉口距海有两千余里，但是江流全程可以航行最大的船只。一队一起航行的船只因行业不同，形状各异。……桅杆上装着丝带与旗子，满载着欧洲人所需要的茅宁茶、毛尖茶，江西的木材，饶州府的瓷器、布匹、棉货、刀剑乃至夷人走私的鸦片烟，因为任何一个商业繁盛的地方，都必定有很多走私者。”

“一个欧洲人的想像力，很容易设想这些布满弧形屋顶的城市，和那些川流不息的水船，装饰得跟我们过节的船一样；船夫和平民都有辫子，戴着宽大的竹帽。总之，这幅景象既滑稽可笑，而又美丽如画。……这三座孪生城市比马赛和里昂还大，只是为一条大江所隔开，这条江连最强健的船夫，也要好几个小时的猛划才能渡过。”^①

加勒利·伊凡这番散文式的描绘，把当年汉口的商贸繁盛、商船穿梭往来以及汉上的喧哗、江边湖岸渔夫的生存状况等描写得栩栩如生。给人一个总的印象是：当年的武汉是一座带着浓郁乡村气息、颇有“江风渔火”情调的贸易集镇，尽管比法国的马赛、里昂大，但缺乏现代都市的整洁与规范、气派与凝重，整个武汉就是一个大码头。

街道的拥挤，流动人口的猛增以及城边无数吊脚楼的搭盖，一方面说明武汉作为内陆封建市镇的繁荣、商贸的发达、流动人口频繁；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旧武汉市容的杂芜、凌乱和无序的增长。从官府和平民的住房来看，旧武汉的城市建设缺乏近代城市起码的市政设施和市政管理。

武汉开埠以后，列强的租界区为武汉城市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可资参考与借鉴的模式。租界里鳞次栉比的高楼，千姿百态的建筑风格，新颖的绿化园艺，宽敞整洁的街道，豪华气派的洋行，现代化的市政设施，如排水系统、照明、消防系统以及邮政服务等，使得租界区外的华界建筑顿显落魄。一位当年曾经到过租界区的外国人曾感叹汉口租界变化之快，他说：“在汉口，其变化之大更是令人惊叹。……新近设立了俄、法、德租界，几年前还是稻田和肮脏小屋杂处之地，现在铺设了马路，竖起了高大住宅。这些新租界与英国租界一起使汉口有了长达两英里，联成一气的河街。”^② 租界的示范效应，极大地刺激了武汉当局和广大工商业者。当时的

① 《武汉文史资料》，1996年第1期，第23~24页。

② 皮明麻：《近代武汉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9页。

报纸对租界区的西洋现代城市文明给予了极大的赞誉,《汉口日报》1905年发表评论说:“何以通商租界,一经外人居住,即顿改旧观?非复华街景象。即杂居内地之教堂亦复洋楼高矗,窗闼洞开,足以收纳空气,比之华民住屋,真有天堂地狱之分”。^①租界所展示的西方建筑艺术,城市规划布局,市政管理模式以及全方位的治安管理等,客观上刺激了湖北当局和整个社会在城市近代文明建设中效仿和学习西洋现代文明,使武汉的城市近代化迈出了艰难的步伐。在西方文明的展示下,武汉城市建筑受到了强大的辐射,社会各界开始纷纷仿效西洋建筑模式。许多商业社团、会馆、公所开始建造洋楼作为办公之用,如汉口的邮政大楼就是仿效洋楼的方式而建的,使其“规模宏敞”,“高大气派”。武汉的第一家商办既济水电公司的厂房和十分耀眼的水塔,都是聘请英国工程师按西洋风格设计建造的。民国的买办、富商、士绅名流以及部分政客亦纷纷效仿西洋建筑,大建欧式住宅。1901年,袁海观、刘貽德、蒋广昌等人在法租界扩界区的海寿街、友益街、车站路、长兴里、三德里、长清里等地段建造了数百栋里弄住宅,这是武汉的首批里弄住宅。这些里弄住宅不同于传统的“板壁”民居,它在外观和房屋结构方面比较美观适用,且十分规划整齐,居住面积较大,每单元大小比较一致,多为高级职员和殷实商贾之家居住。1904年浙江吴兴人刘澄如、刘貽德又修建了通德里、永福里、永广里;1908年上海买办叶澄衷购置了秦兴里。据统计,至1949年止,汉口共建里弄208个。据调查,这些里弄房仅上海、广州和武汉这三座城市才有,且三座城市的里弄建筑风格如出一辙,极为相似,这也许是由于受租界西洋文明影响所致吧!汉口的一大批里弄和仿洋楼建筑,使得城区面貌大为改观。据《夏口县志·交通志》记载:“老城厢和租界一样,新式西洋建筑使老式建筑黯然失色。”不仅汉口城区面貌在迅速改观,与租界隔江相望的省府所在地武昌也变化较大,武昌“城内有不少外国建筑和工厂,其中以官方、半官方机构居多。”如湖北咨议局大楼就是仿效西式楼结构的典型代表。

特别要提到的是1903年孙武等人集资修建的“汉口大旅馆”,是当时汉口较早的高层建筑,人们称它为“楼外楼”,其建筑风格和内在设施,多为借鉴西式楼房的诸多特点。它是武汉最早使用电梯的旅馆,也是汉口所有大楼中的第一部电梯。当时的《汉口竹枝词》曾有描写“楼外楼”的民谣:“楼外楼高第五层,不须烦跨自升腾,诸君放胆云霄去,牢系天梯有玉绳。”1919年开业的“汉口新市场”,更是气势恢弘,规模惊人。它占地12 187平方米,建筑面积达17 168平方米,是当时武汉三镇惟一的一座大型游乐场所,一次能容纳几万名观众,当时有许多“竹枝词”盛赞“新市场”的气派与宏伟:“新市场中几度游,呼来鸳侣与莺俦,楼台百

^① 《汉口日报》,1905年4月4日。

尺最高处，望到隔江黄鹤楼。”其开业时的盛况亦有词记载：“果然汉口最繁华，岂止南城百事奢，新筑市场轩敞甚，搜奇应已满天涯。”^①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汉口掀起了一股建造楼宇的风潮，而外商是这股风潮的掀起人。这些大楼中较为著名的有花旗大楼、亚细亚大楼、汇丰大楼、景明大楼、保安大楼、立兴大楼、信义大楼、怡和与太古大楼、新泰大楼、南洋大楼、日清大楼、正金大楼。这些大楼大多为外国银行的办公楼。中国官僚资本集团在当时的汉口也修建了许多楼宇和里弄住房。中国银行除 1917 年修建大楼之外，还占有汉口吉星里 14 栋房屋，号称北方财团的四家银行“北四行”（中南银行、金城银行、大陆银行、盐业银行）和南方财团的三家银行“南三行”（上海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第一实业银行）除盖了自己的大楼外，还另外修建了许许多多的里弄住房。

“北四行”中的大陆银行，在扬子街盖了一栋大楼，并在大陆里、大陆村、大陆坊盖有 42 栋里弄房；中南银行在胜利街口修有一栋大楼，并在积庆里、方正里、辅德里建有 173 栋住房；金城银行在南京路口盖有一栋大楼，又在金城里、辅义里建有 114 栋住房；盐业银行建有昌年里和江汉村登 2 栋房产。

“南三行”中，上海银行在江汉路建有大楼，并盖有慈德里、上海村的 79 栋房屋；浙江兴业银行除盖了大楼之外，还在兴业里建有 14 栋房产；浙江第一实业银行除在北京路修建大楼外，还在义昌里盖有 26 栋房屋。

另外，广东银行在扬子街盖有大楼，并盖有 17 栋房屋；四明银行在江汉路建有大楼并创建了宁波里；中国银行除大楼外，还盖有华中里 128 栋住房。

除高楼大厦、里弄住宅的大量修建之外，武汉当局还注重学习租界的市政设施和市政管理方面的精华，在城区开展修下水道、建公园、拆屋修街、清除江边吊脚楼、修建沿江马路等文明城市建设活动。当时留英归国的工程师吴国炳，在武汉市政设计、武汉公园建设等方面做了不少的贡献。吴国炳为武汉设计过许多条马路、堤岸和码头。他所设计建造的中山公园在当时为“亚洲第一个综合公园”，他还主持许多街道的设计，在武汉率先“建下水道排除污水，市民都可以安装抽水马桶，拆屋修街”，“又拆除吊脚楼子修沿江路，有伦敦式的地下厕所，新式的码头，旅客方便之至”^②。由于吴国炳在工程设计方面的努力与身体力行，使得武汉（特别是汉口）城区的“许多建筑和租界区不相上下”。很多客商来武汉后，大加赞赏武汉旅馆有各种卫生设备，认为汉口建设得相当漂亮。当时的内政部长蒋作宾听到很多人称赞武汉的市政建设，特别抽空到武汉视察，他看到武汉的中山公园和市容市貌后，曾说过：我到过欧洲、日本，还没有这么好的公园，他说：“回南京后要通令全国到汉口考察，提倡建公园、修下水道，以汉口为榜样。”蒋作宾回南京后，“称

① 《汉口大陆报》，1921 年 4 月 14 日。

② 吴国炳：《我与中山公园及市政建设》，《武汉文史资料》第 1 辑。

赞武汉的进步，有新式的码头、沿江马路，新式的综合公园和运动场、跑马场、下水道和家庭卫生设备等，成了华中最新式的城市”^①。

在武汉的近代城市建设、城市近代化过程中，当时的一些洋行买办是作过许多贡献的。尽管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最大程度上赚取利润，但客观上成为武汉近代化的主要推动人。当时的华商总会一些骨干会员，如美最时洋行买办王伯年、立兴洋行兼东方汇理银行买办刘歆生、瑞记洋行兼住友银行买办欧阳会昌、安利英洋行买办蒋佩林、礼和洋行买办胡范冰、和记洋行买办黄原卿、副买办闵绍骞、嘉利洋行买办潘恕安、慎昌洋行买办刘少岩等等，他们开旅馆、建高楼、盖豪宅、修建华商跑马场、创办汉口“模范区”（即现江汉路以北、大智路以南、中山大道以西、京汉铁路以东广大地区），以及设商场，办实业等方面做出了许许多多有益于武汉城市建设的工作，使得武汉的城区面貌发生了巨大改观。许多往来武汉的游人，由过去登山看庙、游湖观江，开始注重武汉的现代市政建设。林立的高楼、华洋交融的都市风貌、新式的游乐场所（跑马场、俱乐部、新市场综合娱乐城等）以及新式马路、街道以及洋行等，成为游人驻足观览的主要景观。游人到武汉来，总要到街上逛上几圈，到公园看一看，从熙熙攘攘的人流、风格各异的城市建筑以及不同的行为方式中体验和感受现代都市文明的氛围与工业文明的成就。

（六）结 束 语

从上述武汉近代旅游的发展、变迁过程以及旅游观念的传承与变异来看，武汉近代旅游呈现出十分鲜明的特点：

第一，由于开埠之后西洋工业文明的冲击，导致近代武汉社会模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城市社会形态和城市文明形态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转型。武汉由一个“土货转运中心”的封建内陆大镇，转变为有一定工业文明内涵的开放型的带有明显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特征的国际大都会。社会的空前发展与转型，导致了社会流动性的迅速增强，其流动特征之一，就是劳作性旅游的频繁。正如美国学者奈特·毕乃德所指出的：中国“村庄和代代相传的社会群体普遍解体，导致个人有更大的社会流动性”，“随着自我改善地位的新机会在他们面前出现，空间流动性增强，社会流动的速度也加快了”^②。由于个人流动性的加大，近代武汉出现了千百年来所未有的大变局，移民的空前增加，城市流动人口迅速上升，旅游呈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第二，近代武汉的旅游者，无不怀着各种各样的目的而旅游四方，或经商，或

① 吴国炳：《我与中山公园及市政建设》，《武汉文史资料》第1辑。

② [美]布莱克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225页。

求学，或求职，或求官，或投府入幕，或漂洋取经，或躲避包办婚姻，或投身近代革命……凡此种种，都带有极强的功利性。尤其是走出国门的旅游者，无论是怀着以“科学技术救国”的李四光、赵建熙、吴国炳等留学西欧的游子，还是怀着“革命救国”目标的宋教仁、吴禄祯、刘成禺、李书城等留日学生，亦或像孙武、余诚、朱子龙等因成为“亡命客”而羁旅他国者，他们无不将旅游作为改造社会和参与政治斗争不可缺少的形式和手段。面对国家危亡、山河沦丧、民不聊生的现实，他们的旅步无不沉重而庄严，充满紧张和严肃的风格特点。

第三，近代武汉旅游在传承中国传统旅游文化中的内敛性、稳健性的旅游民族性格的同时，更多地吸收了西方旅游文化中的冒险性、求变性和独创性的特点，使近代旅游的内容变得丰富多彩、绚丽多姿，为现代旅游业的诞生奠定了思想、文化和理论基础。“重商思潮”的兴起与风行，使近代武汉的旅游者们改变了传统的“重义轻利”、“重农抑商”的“官本位”和“农本位”的价值观念，许多读书人也一改历代传诵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古训，纷纷弃儒服贾，弃学经商。耕夫、农妇则更是纷纷“弃其本业而趋商场”；许多士绅亦热衷于投资工商业，交游于大买办。商人在一定程度上主宰着近代武汉的经济，这在客观上促成了武汉商贸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商旅成了“劳作性”旅游的主力军。

第四，由于西洋工业文明的传入以及欧洲资产阶级文化的熏染，近代武汉的城市化运动开始起步，“洋务企业”的大量创办以及民族工商业如雨后春笋纷纷诞生，造就了一大批近代产业工人，他们同广大的商民以及买办阶层一道，组成了近代武汉旅游主体的骨干，使近代的武汉旅游由极少数达官显贵的“专利品”开始变成各阶层人士纷纷参与的广泛性的社会活动。

第五，武汉开埠，是近代旅游发展的一个起跑点，它造就了武汉一批又一批旅游舞台上的生力军。首先，外商洋行的纷纷建立，外资工厂的相继创办，既促成了武汉贸易的急剧发展，更造就了近代武汉的一批特殊商人——买办阶层。他们既为“洋人”推销了西方现代工业品，并协助“洋人”获取中国大量廉价资源，同时也借洋人的势力积蓄了自己的经济实力。他们本不甘俯首帖耳地听命洋人的指使，但又不能不依赖洋人的势力为自己争取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他们是一群地地道道的假洋鬼子，但又是一伙真正传播西方工商文明之火的先行者。是他们最早建立了汉口的近代民营资本主义工商业，也是他们为近代武汉的新城区和近代新式娱乐场以及近代新式旅馆业作出了不可抹杀的贡献；他们在道义上也许应该遭到民族主义者的唾骂与谴责，但他们为武汉的近代化所作出的贡献也应当肯定。其次，武汉的开埠以及租界地的建立，不仅为西方传教士传播西方文化、宣传近代资本主义启蒙思想提供了桥头堡，也为列强掠夺武汉资源、倾销西方产品建了后方基地，并且在客观上为近代武汉城市的经济、文化、工商、贸易的发展，提供了生动形象而又可资效仿的西方社会模式的范本。从某种程度上看，租界的建立，在文化精神层面和物

质基础层面上，为清王朝的瓦解埋下了真正的“祸根”。另外，西方工业文明的输入，现代科学技术的引进，使得旅游的赖以生存的交通工具以及旅游客体等得到巨大的改善。火车、轮船、汽车等现代运输工具的引进，使人员大规模流动成为可能。并且，时间与成本的大大节约，为各阶层的人们出行创造了条件，同时使跨地区、跨国家的远洋旅游因此而成为真正的可能。

第六，西方科技文化的输入是武汉旅游近代化的外在动力，而内在动力的作用则是近代旅游进入近代化的关键。武汉这座以商民为主的古老商埠，自古就有经商之风。市民们渴望扩大贸易，开拓市场，繁荣经济。可是在农本社会“重农抑商”和锁国闭关的封建统治下，武汉的商民们受到了严厉的管束和制约，无法在广阔背景下显露其经济贸易的身手。武汉开埠之后，商旅们获得了“自我改善地位的新机会”，找到了显露身手的舞台。他们因此欢呼雀跃，雄心勃勃，穿梭往来，长期被压抑的发展商贸的热情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终于汇成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条件下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潮流。这是武汉旅游近代化的内在动力。由于内力和外力的相互作用，因而造成了武汉社会“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在内、外力的驱动下，武汉社会经济发生了质的变化，农耕文化、小商品生产的封建经济关系被近代工业文明逐渐冲溃，社会新的经济机制开始产生，随着铁路、轮船、汽车等现代交通工具的纷纷建立，新式旅馆、酒店纷纷设立，在现代游乐场所的不断引进与移植的条件下，武汉近代旅游业开始萌芽成长，产业模式和管理也逐步建立，为后来旅游业的真正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近代武汉旅游发展与演进的过程可以证明：

旅游与人类文明演进相生相息，与社会历史进程相伴相随；旅游不仅仅是一种人类的实践活动，还是一种蕴涵十分丰厚的社会文化现象，也是一种世界文化现象，是许多国家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是人类最高和最深层的愿望。随着时光的推移和科技的发展，旅游在内容、形式与功能上将会不断发生深刻的变化。原始社会的初民们冲出自然包围，逃离自然束缚，最后战胜自然、超越自然而创造了人类独有的旅游方式，终将在改造自然、依靠自然、顺应自然的过程中得到新的升华，在回归自然的过程中，来反省自我，使人类真正与自然共和谐、共生生存，从而在更高的精神层面上创造新的旅游形式。

近代武汉旅游的发展与演变，是武汉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的一个侧面表现，它促进着武汉的发展与演变，对武汉城市现代化进程产生了较大推动作用。

近代武汉旅游的发展，提供了人们了解西方文化、学习西方先进科技的机会，同时也促进了武汉与世界各地的思想文化交流，增强了武汉人民生活的丰富性与多样性。

但是，近代武汉旅游的发展，也使许多社会糟粕大肆泛滥，赌博、娼妓、吸鸦片以及西方文化中的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糟粕在一定程度上污染、侵蚀了中

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使旅游成为纵欲主义、拜金主义以及腐化、颓废思想风行的载体。它留给了后人发展现代旅游的极艰巨的任务。

研究与总结近代武汉旅游发展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不仅有助于我们拓展近代城市史的研究领域，丰富我们的研究内容和开阔研究视野，同时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多层面、多视角地认识历史、了解历史，为我们发展当代武汉的旅游业提供有益的借鉴。

十七、两次世纪之交武汉对外开放之比较

19至20世纪之交武汉的对外开放，张之洞因为他个人的魅力和不凡的政绩，一百多年来屡屡被人提及，武汉作为中国外贸第二大港、国际性城市的辉煌历史和“东方芝加哥”的绚丽风采让老武汉骄傲和炫耀、外国人羡慕和垂涎。20至21世纪之交所进行的新一轮对外开放，重新激发了武汉——一个开放城市应有的活力，在唤起人们对往日历史旧梦追忆的同时更激起人们对武汉将重新崛起为国际性城市远景的向往。

世纪百年，河汉遥隔，看似遥远，其实存在着许多内在关联。尽管跨越两个不同时代的开放的客观环境（区位格局）、主观动因（主动开放与被动开放）和最终效果都大相径庭，但我们透过历史的表象仍然可以发现两次对外开放的不少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其中最大的同应该是现代社会条件，尤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开放是城市现代化发展的必由之路。因此，对两次世纪之交对外开放作一番历史比较，不仅具有找出两次开放特殊属性和共同属性、认识事物本质和特征的方法论意义，更有从历史的经验中获得灵感，在历史与现实相互关照中寻找新世纪武汉对外开放发展战略支点的现实意义。

（一）对外开放的滞后与“迟发展效应”

武汉两次对外开放都具有某种滞后性，这应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武汉开放的这种滞后性，其参照系是沿海开放城市。19至20世纪之交的对外开放，武汉较之沿海一些城市晚了20~30年时间。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根据《中英南京条约》，上海、宁波、厦门、福州、广州等东南沿海城市先后于1843年和1844年开埠，成为西力东侵最早的受难者和对外开放最早的受惠者。1861年，汉口、九江、镇江等三个沿江城市根据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被迫开埠，这个时间与沿海五口通商城市开埠大致相差20年。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引进西方先进机器和先进制造技术，建立了近代第一家用机器生产枪炮的军工企业“安庆内军械所”。此后不久，江苏、上海、天津的近代化军工、民用企业不断涌现，以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富国强兵、抵御外侮为旨趣的洋务运动

在沿海各省蓬勃展开。其中 1865 年李鸿章在上海筹办的江南制造总局,为拥有十几家厂和一座中型船坞、雇工 2 000 余人的大型洋务企业。天津机器局于 1866 年创办,1870 年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后对其加以整顿,常年注入经费 30 万两,截至 1893 年止共投资约 800 万元。史载天津机器局“巨栋层栌,广场列厅,迤丽相属,参错相望,东则帆墙沓来,水栅启闭;西则轮车转运,铁辙以横。与天津郡城遥相对峙,隐然海疆一重镇焉”。武汉的洋务运动则到 1889 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后才开始实质性起步。1890 年,张之洞在汉阳大别山(今龟山)北麓筹办湖北枪炮厂,1891 年,汉阳铁厂建设工程正式动工,1890~1898 年,张之洞在武昌分别筹建了湖北织布局、湖北纺纱局、湖北缫丝局、湖北制麻局,合称“丝麻四局”。由此看来,武汉学习西方,开展近代工业化运动晚了沿海地区整整 30 年。

历史往往有相似之处,至少在表象层面上如此。这一个世纪的新一轮对外开放,由于武汉地处内陆,因此在中国对外开放梯度式推进格局中亦晚于沿海城市。1980 年 5 月,中央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市、珠海市、汕头市和福建省的厦门市各划出一定范围的区域,试办经济特区,拉开了沿海也是整个中国对外开放的序幕。1984 年 5 月,中央正式确定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 14 个沿海港口城市,至此,中国沿海 15 个港口城市(厦门已列入特区)已全部开放,整个海岸在这些城市的开放下等于全部向外开放。而这种开放态势正如国际舆论所认为的“开放整个海岸,意味着实际上开放半个中国”。与沿海如火如荼的开放热潮相比,长江沿岸的开放则相对冷清。

1980 年,国家在武汉重开外贸口岸,武汉海关重新恢复,1984 年又赋予武汉直接对外经济贸易权限,但整个城市并没有纳入开放体系当中。直到 1992 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后,国家决定对外开放战略从沿海向沿江扩展,推动全国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布局由东向西的梯度转移。于是,长江沿岸芜湖、九江、岳阳、武汉、重庆等 10 个城市才被批准全部实行对外开放。这距离 1980 年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开放整整晚了 12 年,距离 1984 年沿海 14 个城市对外开放亦晚了 8 年。

如果说,上次武汉等沿江城市的对外开放虽然晚于上海等五口通商城市,但仍然遥领于全国尤其是内陆城市之先,那么,这一次武汉的开放,却毫无领先态势可言,因为同年 8 月,武汉等沿江城市宣布开放不久,国务院又决定进一步开放内陆省份的省会城市如郑州、西安、成都等。也就是说随着长江流域及内陆主要省会城市的开放,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东西南北中,沿海、沿江、沿边、内陆立体交叉,全方位的开放格局。

两次世纪之交武汉对外开放的这种滞后性,对于武汉城市的现代化发展都不同程度地带来某种“迟发展效应”。所谓“迟发展效应”,也可以称之为“后发展效应”。它有正反两方面的不同效应。从负面效应来看,开放的滞后当然带来经济发

展的滞后,使后开放城市与先开放城市的差距拉大,先开放城市总是先受惠、先发展,后开放城市则往往“邯郸学步”,亦步亦趋,并在生产资源配置过程中造成各种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源、技术知识资源向沿海开放城市流失。更为严重的是,在文化心态方面,内陆文化在与沿海特区文化的对比中蜕变为劣势,往往形成不利于开放、封闭保守的所谓“内陆意识”。当然,“迟发展效应”也有正面效应。这首先是因为先期开放、发展的城市开放后形成为外来先进文化的“二次传播源”,对内地不断地施加影响,使其风气大开,近代的上海如此,改革开放的深圳亦如此。上海成为近代西方文化向内地传播的桥头堡,内地甚至沿海等城市文化近代化深受其惠,如民国初年厦门《海关十年报告》经常说到:“上海成为‘文化首府’的趋势不断加强,像厦门这样的城市已更多地依赖上海的出版物。”“正如上一个10年报告所说,上海仍然是中国文化中心。厦门的阅读材料来自上海,包括杂志、期刊和学校课本。”深圳特区为内地改革开放提供了不少可资借鉴的经验,使后开放城市在对外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少走弯路。另外,迟开放和后发展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可以激起后发展地区的人们不甘落后、赶超先进的决心,从而奋起直追,创造后来居上的奇迹。

迟发展的负面效应在两次世纪之交的武汉都有程度不同的表现。就19世纪而言,从1840年到1889年,整整半个世纪,除了中间(1855~1861年)胡林翼任湖北巡抚时有所作为外,武汉的开放一直处于被迫、被动局面,近代化事业基本没有起步。在早期洋务运动中,上海、天津、福州等地生气勃勃,而武汉却一片沉寂,仅有民营企业1家。1867年,汉口海关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仅为3050万海关两。在同沿海几大城市如上海、广州、天津等城市对比中,武汉毫无地位可言。

20世纪80年代,武汉迟发展方面效应同样十分明显。80年代初,武汉市综合经济实力一直居全国大城市上海、北京、天津之后的第4位,但到了80年代末却退居于第6位。80年代10年间,武汉全社会投资211.93亿元,平均投资率21.9%,年均投资率19.5%,尽管较之改革开放以前有了质的飞跃,但同全国比同期却低5.7和6.7个百分点。武汉的迟发展显然与开放滞后和开放不足有关,80年代中期的1986年,全国外贸出口商品收购额占工农业总产值比重的5.5%,而同期武汉仅为3.6%。外贸出口额只占全国的0.12%左右。整个80年代,武汉实际利用外资额,在全国12个大城市中低于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大连、青岛、沈阳、重庆,居第9位。

两次世纪之交,武汉一样的迟开放,但是发展的结果又如何呢?

19至20世纪之交,武汉城市地位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已出现提升态势,由于张之洞大力兴办洋务,举官商之力兴办工业,扶持商人,鼓励商战,使武汉一跃成为晚清洋务重镇和超诸沿海城市成为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对外贸易大港。表1显示,1895~1913年在由中国人自己开办的近代化企业中,武汉企业在几大城市排

名位居第 2 位，创办资本额亦位居第 2 位。武汉是当时全国知名的钢铁、军工和纺织基地。仅以纺织工业为例，武汉一直跻身于全国六大纺织城市（上海、青岛、武汉、天津、无锡、南通）的第 2 位。1892 年，张之洞所办纺织厂的纱锭数占全国总数的 40.9%，1893 年高达 77.1%，一度超过上海^①。时人评价认为“汉阳之铁政局，武昌之织布、纺纱、制麻、缫丝四局，规模之大，计划之周，数十年以后未有能步其后尘者”。

表 1 1895~1913 年开业的华资制造业和采矿业的企业数和创办资本（按地点）

地 点	企业数	占总数的（%）	创办资本 （1 000 中国元）	占总数的（%）
安徽	18	3.28	1 868	1.55
浙江	29	5.28	4 346	3.61
直隶（不包括天津）	34	6.19	11 951	9.94
天津	17	3.10	4 219	3.51
福建	19	3.46	1 461	1.21
河南	12	2.19	1 890	1.57
湖南	24	4.37	3 968	3.31
湖北（不包括武汉）	9	1.64	1 937	1.61
武汉	28	5.10	17 240	14.33
江西	13	2.37	2 383	1.98
江苏（不包括上海）	70	12.75	13 510	11.23
上海	83	15.12	23 879	19.85
广西	5	0.91	1 424	1.18
广东（不包括广州）	68	12.39	5 038	4.19
广州	16	2.19	5 791	4.81
贵州	1	0.18	79	0.07
满洲	44	8.01	4 922	4.09
山西	10	1.82	3 038	2.53
山东	20	3.64	4 614	3.84

① 参见严中平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 107 页。

续表

地 点	企业数	占总数的 (%)	创办资本 (1 000 中国元)	占总数的 (%)
陕西	1	0.18	405	0.34
四川	19	3.46	2 248	1.87
云南	5	0.91	1 671	1.39
其他	4	0.73	2 406	2.00
合计	549	100.00	120 288	100.00

资料来源：《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

对外贸易方面，进入 19 世纪 90 年代以后，江汉关进出口贸易额一路飙升，达 1.72 亿海关两，其间接贸易额除个别年份外一直仅次于上海居第 2 位，直接对外贸易额仅次于上海、广州、天津居第 4 位。“长江沿岸之商场除上海以外，其交易总额无一能凌驾汉口者”^①。这种态势一直保持到 1936 年抗战前夕（见表 2）。“汉口为国内五大商埠之一，抗战以前，汉口的对内贸易占五大商埠（上海、天津、广州、青岛）中第 2 位，对外贸易占五大商埠中的末位，对内对外总贸易占五大商埠中第 3 位。对内贸易中，抗战以前，每年集中汉口的棉花达 200 万担，为湖北全省上市棉花的 75%，而湖北的棉花产量则居全国各省中的第 1 位；每年集中的小麦为鄂豫湘三省全部出售量的 52%。对外贸易方面，汉口被称为全国三大茶市之一，桐油在抗战前的出口占全国总出口量 23%~40%”^②。

表 2 1936 年五大商埠对内对外贸易价值表 （单位：百万元）

	上海	天津	汉口	广州	青岛
对内贸易额	752	165	250	130	110
对外贸易额	904	178	45	71	102
对内对外贸易额	1 645	343	295	202	212

资料来源：《武汉概况》。

20 世纪 90 年代，由于改革和对外开放步子加大，武汉城市经济实力纵向比较在 70 年代末有了长足进展，全市国内生产总值（GDP）由 1978 年的 39.91 亿元增

① 《汉口小志·商业志》。

② 《武汉概况》，书报简讯社 1949 年版，第 213 页。

长到 1998 年的 1015.89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 7.2 倍,年均增长速度为 11.1%;全市财政收入由 1978 年的 11.06 亿元增加到 1998 年的 100.06 亿元,增长 8.8 倍,年均增长 11.9%。尤其是 1992 年实行对外开放以来,全市 GDP 和财政收入连续 7 年保持 16% 和 19% 的平均增长速度。1998 年全市进出口总额为 18.4 亿美元,比 1985 年增加 20.4 倍,其中进口额 7.6 亿美元,增加 21.9 倍,出口额 10.8 亿美元,增加 19.6 倍。全市进出口总额占全国贸易总额由 1985 年的 0.12% 上升到 1998 年的 0.6%。这一系列数据表明,开放对武汉的发展起到了有力推动作用。但是,从横向对比来看,武汉和全国 19 个主要大城市相比则显得底气不足,迟发展效应相当明显,与 19 至 20 世纪之交武汉位居前列的态势恰好形成鲜明对比。1998 年,武汉全市国内生产总值(GDP) 1 012.89 亿元,居全国 19 个大城市第 9 位;全部工业总产值 1 228.82 亿元,居全国第 12 位;城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5 913 元,居全国第 14 位;对外贸易进出口额(按海关口径计算) 11.25 亿美元,居全国第 12 位,实际利用外资 10.56 亿美元,居全国第 7 位。上述对比表明,近代的武汉尽管较之沿海迟开放几十年,但在张之洞督鄂后却创造了后来居上的奇迹。而 20 至 21 世纪之交,1992 年武汉对外开放以后,虽然城市现代化有了长足进展,但与沿海和相关类型城市横向对比则显示出相对落后的态势。80 年代下滑的位次不仅没有奇迹般地向上飙升,而且主要经济指标还有继续后移的趋势。同样是晚开放,但结果却完全两样,个中缘由,颇值得探究。

19 至 20 世纪之交武汉的崛起有内外两方面的原因,从外部环境来看,沿海一些城市虽然开放较早,但从总体发展态势看,除上海外,其他城市因各种原因在经济实力上并没构成对武汉压倒优势,五个通商口岸中,宁波、厦门、福州地处东南一隅,而且城市块头很小,实力不足,在中国传统城市体系中一直处于边缘性地位,远没有“九省通衢”居中独厚的武汉位置重要。如福州开埠后,美国人经过调查后认为“它是没有价值的而且一定要放弃……这个最后的口岸经过七年多的试验以后,已经证明是确定的失败的”^①。又如宁波,宁波开埠后第一年(1844 年),进出口贸易额虽达到 50 万元,但“五年后减到这个数额的十分之三以下”^②。英国驻宁波领事在总结失败教训时认为是宁波离上海太近,“我们在这里遭受失败的原因很明显,上海把一切东西都吸引到它那儿去了,把过多的进口货输送到那里,同时还把原来准备到宁波的茶商吸引到它那儿去了”^③。广州虽然开放较早,但因受殖民主义者掠夺太深而排外心理特强,故主动开放的步子迈得不大,张之洞在任两广总督时在广东搞洋务没有多大起色,即与这种普遍的民众心理有关。因此“鸦片

① 见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 1 册,第 604 页。

②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 1 卷,第 404 页。

③ 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 1 册,第 619 页。

战争虽然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开放了五个通商口岸,但除上海外,其他几个口岸的发展和外国商人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西方商品的进口量增长有限,中国仍然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体,整个国家还没有卷入到世界资本主义的市场体系中^①。最早开埠的五个通商口岸的这种微弱的开放与发展态势对于开埠前的武汉没有形成有实质性的影响和挤压态势,而真正形成的全国性开放态势的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列强通过《天津条约》在长江中下游和华北地区城市的开埠,武汉因其独特的地理条件成为第二轮开埠的首选城市,5国租界,12国领事馆,30余家外资企业,114家洋行和10余家银行,先后有17个国家的商人来汉进行商贸活动,19世纪60年代刚开埠的汉口年进出口额每年即达3000万海关两左右,80年代每年达3980万海关两,20世纪初年达17000万海关两。1895年以后,汉口港平均每年进出的国际货轮在2300~2400艘之间,年进口货物总吨位最高时超过800万吨。因此,武汉在被迫开埠和被动开放时代,由于特殊的历史机缘所促成,不仅与最早开埠的城市没有造成发展的距离,而且在同一时期开埠的后续城市中也居于领先地位,“现在汉口兴旺的日子终于来到了,它不仅超过了镇江、南京和芜湖这些旧条约规定的开放港口,而且超过武昌这个省会城市,成为上海的巨大对手了”^②。

武汉与上海、天津、福州等早期洋务运动基地相比,也具有上述相似特点,即上述城市虽然在外国资本主义掠夺下采取主动开放而加以应对,但这些城市除李鸿章在天津开办机器局以及开平煤矿对天津城市近代化发生较大实质性影响外,其他城市的洋务活动均不同程度存在局限性,一是产业结构上偏重军事工业,二是只有点的动作而无面的铺陈,而且大都孤立于整个城市体系之外,尤其是对城市市政建设缺乏有力的动作,上述城市除上海外在整体实力上与武汉并无实质性差距。因此这些先期主动开放的城市对武汉并无太大的影响力,更谈不上在经济、文化诸方面构成对武汉的挤压与威胁。

这一个世纪武汉对外开放和城市发展面临国内周边态势却与近代大不相同。一方面,沿海开放城市不仅开放得早,而且势头猛,尽享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因此发展快,武汉与这些城市的差距越拉越大;另一方面,由于武汉在整个国家开放格局中居于晚开放一类,几乎在武汉被批准为开放城市的同时,内陆大部分城市也基本上开放。因此武汉不仅与沿海差距拉大,即使在内陆城市尤其在长江中上游城市中已毫无优势可言。这种晚开放格局对城市发展带来的主要后果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沿海开放城市由于开放早、发展快而形成对武汉的合围与挤压态势;二是武汉在华中地区及长江中上游地区的传统优势地位受到挑战,城市边缘化趋势愈演愈

① 隗瀛涛主编:《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1页。

② 《江汉关十年报告》,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110页。

烈。关于后一点下文将要着重谈到，这里仅就前一种后果略作分析。沿海开放城市对武汉的合围与挤压亦表现在两方面，首先，国家以沿海地区为重点的投资政策和产业政策向沿海地区倾斜的发展战略，不仅使国家有限的资金投入到了沿海地区，而且各种优惠政策的实施又在很大程度上吸引了内地大量的资金向沿海地区转移，使内地发展所需资金出现严重短缺。武汉作为一个老工业基地，资金的不足势必影响企业技术改造的步伐，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矛盾逐渐暴露，产品缺乏竞争力，知名企业和名牌产品逐渐减少，企业发展动力明显不足。与此相关联，沿海地区的高速度发展，内地大批人才纷纷“孔雀东南飞”，向沿海集聚，武汉受此影响，大批科技、教育、文化人才流向深圳、珠海、广州等地，严重制约了武汉城市现代化发展。其次，沿海早开放，内地迟开放的梯度开放格局对武汉的对外开放的负面影响也极为明显，主要体现在武汉开放之际外商在沿海投资已完成了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的转移，武汉等内地城市则只能步其后尘，成为外商劳动密集型项目的投资地。据统计，20世纪90年代以来，武汉虽然引进了诸如日本 NEC、德国西门子、美国施乐、瑞典爱立信等先进通讯技术，形成了具有相当规模的通讯产业。但从总体上看，70%的外商投资技术档次无先进技术、高新技术可言，投资产业多集中在服装、纺织、餐饮、食品等劳动密集型项目上。存在着组装技术、下游工序生产技术多，上游工序生产技术少；来料加工、劳动密集型多，资金、技术密集型少；消费类产品多，投资类产品相对少等现象。有的产品技术虽属高技术范畴，但实际并未将关键技术转让给合资企业，而只是利用我方的廉价劳动力搞装配。如磁头装配生产，属劳动密集型且没有什么高新技术可言；用于激光唱机的激光头确属高技术产品，但只能采取以外商提供的零件、按外商提供的工艺来装配，外商保留其中的核心技术和设计开发技术，即便是某些产品的整机，尽管在合资上已明确规定要转让技术，也很难兑现。因此，由于外商控制了关键技术、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他们不仅获利大大高于中方，也大大阻碍了武汉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

两次世纪之交武汉迟开放、后发展的两种不同结果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市场经济体制与市场体系的发育程度上所存在的明显差异。

近代的汉口商贾辐辏，商路发达，是国内著名的贸易中转地，“汉口贸易年见繁盛，盖以输运便利也，此地为中国全国之中心，水路四通八达……中国内地商务实以此地为要冲焉”。在汉口盐、米、木、花布、药材、典当六大行业中，除典当一行外，其他五行都以中转贸易为主，汉口市场体系的发达，官方以此作为引盐、漕粮的分销、交兑处中转点，民间各种自发性的商贸活动更是相当活跃，发达的商业市场体系和市民与生俱来的市场意识，使汉口在外国资本主义打入汉口市场后能很快与之适应并接轨。作为与华中、西南各省低级市场联系的纽带，汉口发达的高级市场体系备受外商青睐，“在19世纪60年代和进入70年代以后，外国洋行（特

别是英国洋行)的分行把大部分棉制品运进汉口等商埠,但位于较小通商口岸(它们是大贸易区的城市市场)的这些分行甚至不能与中心市场一级的中国销售商发生长期的直接联系,当然更谈不上与中间市场或基层集市发生联系了。与这些分行在镇江和汉口打交道的中国商号高踞于传统市场结构的最上层,它们具有了解地方情况以及与低级市场发生长期关系的有利条件”。“汉口十一个大华商定期在上海通过其代理人购买进口的布和纱,然后把货物转售给汉口的零售商和从湖南及河南低级市场前来汉口购货的商人”^①。武汉市场体系的发达不仅使其在对外开放中弥补了迟开放的不足,而且因为近代交通(轮运、铁路)的发展建立起了更加完善化的国际国内市场体系,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其在国内的影响力和辐射范围,“汉口为国内主要的物质集散城市,向有‘九省通衢’的称号,湖北、湖南、江西、河南、四川、甘肃、陕西、云南、贵州九省物产,都集中于汉口而为分配,九省需要物质亦经汉口取给,商圈的扩大,国内很难找出第二处”^②。

当然,武汉的这种市场体制和体系局限性也是相当明显的,首先它仍然较为传统,不仅商会、商帮内部管理体制是旧式的,而且在市场联系畅通渠道,货币流通体系诸方面都与近代市场经济体制相距遥远。“十九世纪的商业制度尽管按传统标准衡量是高度发展的,但仍然还不是‘近代’的市场经济……商业往往局限在大量层层预定的小单位结构内,这是由一些因素产生的摩擦阻力所致。这些因素是:存在着多种地方通货的银—铜复本位货币制;运输费用昂贵(既花钱又花时间);对商品的信用预付款比较少见;缺乏互相清理债务用的商业银行体系,在传统贸易结构中享有既得利益的无数小中间商遍及各地,每个小组织忙碌地进行着小商业和索乐·塔克斯所称呼的‘廉价资本主义’活动,但这些组织只是通过半奢侈的交易以及白银和一部分粮食以纳税形式流向上级行政机关的方式发生联系”^③。其次,由于商业流通的市场机制缺乏与近代工业化运动的联系与沟通,不仅一般商人因观念影响对投资制造业缺乏兴趣,而且更重要的是投资体制、体系也没有能够建立。“晚清的近代制造业的整个发展前途是受限制的,把非通商口岸的储蓄纳入工业的各种组织——特别是近代的银行制度——并不存在。中央政府在思想上和政治上都不能建立和保证一个有法律、商业和教育等制度的体制,而如果没有这个体制,近代企业就不能繁荣发达”^④。不仅非通商口岸没有近代银行制度,武汉在张之洞督鄂期间亦是如此。在武汉,可以说商业与工业是严重脱节的,商业没有也不可能给工业以有力的支持,张办工业获得的款项完全来自官署拨款和各种税款,商人通过

① [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7页。

② 《武汉概况》,书报简讯社1949年版,第250页。

③④ [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7~58页、52页。

钱庄和银行投资几乎没有,关于这点可以从张之洞筹办湖北纺纱局所筹款项的清单中得到证明。其中湖北省款项包括:盐署款项45 960.00两,粮署款项15 670.00两,善后局款项97 410.06两,枪炮局款项116 601.87两,铁政局款项172 358.50两,银元局款项313 798.43两,赈捐局款项185 022.00两,江汉关拨款52 224.00两,官钱局款项20 580.00两,官银局款项10 780.00两,臬署款项32 000.00两,外加两江督署款项25 017.68两。在总计1 087 422.54两款项中,都是采取行政手段筹集而没有一项是通过市场运作或贷款或私人入股投资得来的。因此,张之洞在武汉办企业基本是官办,这既有张之洞作为一个封建官僚个人的原因,同时与武汉近代市场经济体制没能建立起来存在着直接联系。正如《剑桥中国晚清史》的作者所指出的:“由于(中国的)市场有限,又缺乏能把储蓄系统转入工业投资的现代银行体系,其中央政府的财政资源严重不足,以及面临着进口货和在华外资工厂的制成品的竞争,所以某些地方大员和与之有关联的实业家为了共同利益而试图建立一些有限度的,但受到保护的工业帝国,也许就不令人奇怪了。能指望获得成功的纯商办企业为数很少。”此虽是就晚清全国普遍情形而言,但这一结论对近代的武汉同样是适合的。

这一个世纪之交武汉发展的滞后与市场经济体制不够完善存在着更为直接的关联。改革开放以来,武汉市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取得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传统城市区位优势 and 国内商业流通圈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一个以商品市场为基础,以生产要素市场为支柱、特种交易市场为补充的市场经济新格局开始形成。但是,对武汉各项市场指标评估表明,武汉生产市场领域市场化程度为40.13%,企业市场化程度为44.12%,商品及要素市场化程度为47.12%,城市政府行为及其职能适应市场化的程度约为61%,外贸依存度为14%,资本依存度为8.35%,综合对外开放程度仅为10%。按海内外有关学者的分析评定,市场化程度在0%~15%为非市场经济,15%~35%为弱市场经济,35%~55%为转轨中市场经济,55%~65%为发展中市场经济,80%~85%为市场化理想目标。按照这个指标体系,武汉市的市场经济还处于转轨市场经济阶段,离发展中市场经济还有相当距离,更谈不上理想中的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不发达对武汉的城市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它使武汉传统商业优势和区位优势受到挑战,近代以来属于武汉商业圈的城市和城区纷纷离我而去,分别东向上海,南向广州、深圳,北向天津靠拢,武汉城市边缘化势头愈演愈烈。其次,市场体制和体系欠缺直接导致武汉对外开放状态的滞后与残缺,如在外商投资方面,由于市场体系尚不完善,政府政策的引导与市场导向的运行存在差距。尽管《武汉市外商投资导向目录》早已公布,但其导向效果并不明显。这一方面反映出现行产业导向政策对鼓励类投资项目的优惠倾斜力度和对限制、禁止类投资项目的监控力度均不够;同时也说明外商投资结构的形成不仅仅取

决于政府政策的引导，市场导向往往比政策引导更重要。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由于附带较多的信息，对市场的依赖程度更大。其高素质人力资源的获得，信息的反馈、技术的传播、知识产权的保护等，都必须靠完备的市场运行机制作后盾。由于我们的市场体系还处于转轨阶段，有关的政策和法规不够完善，生产要素的供应渠道不够通畅，劳动力素质偏低，管理粗放，种种市场条件都使先进技术的发展空间受到限制，所以导致外商在武汉的投资局限在中低技术含量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及项目上。另外，市场体系不完备也影响外贸出口和公司竞争力，技术创新市场主体和市场竞争环境的欠缺，不仅造成出口结构、品种、数量上都存在较大问题，出口的服装、机械、电子产品在国外只能占领低档商品市场，而且制约了外贸出口企业的发展，造成企业规模狭小，企业长不大，企业仍受地方政府保护。小到公司大到整个武汉经济实力薄弱，应对市场能力差，显然难以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尤其是中国加入 WTO 后经济竞争激烈的复杂局面。

（二）江山依旧在，优势各不同——两次对外开放的区位环境比较

武汉在近代被西方列强所觊觎并崛起为国际性城市，首先得益于它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区位优势。武汉位于湖北省东部，长江和汉水交汇处，东经 $114^{\circ}16'$ ，北纬 $30^{\circ}34'$ 。武汉尤其是汉口因地处中部两江交汇处，形成“九省通衢”独特的地理区位优势。“汉口当江汉交汇之区，水道之便无他埠可拟，循大江而东，可通皖赣吴越诸名区以直达上海，循大江而南可越洞庭、入沅湘以通两广云贵，又西上荆宜而入三峡，可通巴蜀以上溯金沙江。至于逆汉水而西经安陆、襄阳、鄖阳诸府纵贯全鄂以抵汉中，又沿汉水之支流白河、丹江二水以至宛洛，可谓九省之会也”^①。帆船运输时代的武汉，因得江汉之便，明清时期是全国有名的“四大名镇”之一，“南北两京，无过于此”，是仅次于南北两京的又一经济中心。各省商人荟萃于此，有盐、米、木、花布、药材、典当六大行业，1840 年以前，汉口商业会馆、公所有 38 个，其中本地商人只建有 2 个，以行业划分未载地域者有 8 个，其余 28 个皆为外省商人所建。故时人有“汉口为九州百货备集之所，而盐务一事，亦足甲于天下”^②。

武汉独特的地理位置，到了近代随着轮运时代的到来，其区位优势更显突出。“长江航路千余里，下江航路二千余里，皆以汉为起点”。汉口下距九江 132 英里，

① 民国《夏口县志·商业志》。

② 乾隆《汉阳府志》卷 23，《食货志》。

距上海吴淞口 570 英里,距东海 600 英里。从汉口到东海 600 英里江段,吃水 8 英尺以下的轮船一年四季皆可航行,吃水 29 英尺的轮船,在夏季涨水季节,也可以航行到汉口。从汉口上溯宜昌一般轮船可常年航行,汉水可航行里程也达到了 500 公里,连接湖北、河南、陕西等广阔经济腹地。故地方志评价说,“扬子江之航路自上海迄重庆水程都千四百英里,其间分三段,而地点适中,交通最盛者,厥惟汉口”^①。两江交汇,又便于航运的武汉对于欧美商业人士来说,潜藏着巨大的商业价值,法国人加勒利·伊凡在其所著《太平天国纪事》中就曾以满含钦羡的语气写道:“汉水流入扬子江的交叉点,本地人称为汉口,中国人认为这地方是国内最大的商埠。汉口距海有二千余里,但是江流全程可以航行最大的船只,一队一起航行的船只,到达交叉点时,便为两地,一批停在武昌,一批驶入汉水。”“武昌、汉阳、汉口……大江环绕着三座城……这些河流使中国的财富一直流布到帝国各地。”在当时铁路未修,航空还不知为何物,只有水运为惟一远程运输渠道的特殊背景下,西方人欲打开中国内陆广大的市场,舍武汉更无他求。因此,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国殖民主义者“把商业向五个通商口岸以外的地方进逼”^②,武汉便成为极为重要的开埠通商目标。

1861 年,美国旗昌轮船公司首开汉口—上海的轮运航线。随后不久,多家外轮公司云集汉口,开辟航线,1875 年,英国太古洋行轮船公司开辟汉口—上海、汉口—宜昌、汉口—湖南的航线。英国怡和、麦边、鸿安以及日本的轮船公司不仅积极开辟汉口到中国内地多条航线,而且国际性航线也相继开通,直航目的地远达大阪、横滨、神户、汉堡、不来梅、伦敦等。武汉从此成为国内对外贸易的重要转销口岸,从 80 年代起,平均每年进出口贸易净值达 3.58 万海关两,90 年代增长至 4.34 万海关两左右。到 20 世纪初年,更达到 1.78 亿海关两,成为仅次于上海的国内第二大对外贸易口岸城市。时任日本驻汉总领事水野幸吉评论:“与武昌、汉阳鼎立之汉口者,贸易年额一亿三千万两,夙超天津、近凌广东,今也位于清国要港之二,将进而摩上海之垒,近观察者艳称为‘东方芝加哥’。”^③

19 至 20 世纪之交,武汉能够迅速崛起为国际性城市,有特殊的历史机缘。江汉交汇并处长江航运之中点这一独特的区位优势,在轮运成为近代国际间交往和联系的主要方式手段的前提下成为其他城市不可替代的区位优势。如果我们翻检历史,尽管 1905 年卢汉铁路通车后对武汉的商贸起了很大推动作用,“近观年汉口贸易额增进之数,较前几大一倍,俨然占全国通商口岸之第 2 位,皆此铁路之力”^④。

① 民国《夏口县志·交通志》。

② 伯乐考维茨:《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商务印书馆 1959 年版,第 15 页。

③ [日]水野幸吉:《汉口》。

④ 张寿波:《最近汉口工商业一斑》,1911 年版。

但汉口的对外贸易额的绝大部分是间接贸易，即通过长江到上海进出口来实现的。汉口收购的内陆各省农副土特产通过长江出口，而上海则通过汉口深入到中国的腹地取得出口资源和中转国外工业制成品。汉口传统商业市镇“转输贸易”在近代国际商贸活动中得到延伸和发展，成为当时中国内、外贸易最理想的中转港口。民国时期出版的《汉口商业月刊》曾经对汉口这种独特的商业枢纽地位作如是评价：“汉口一埠乃内地之枢纽……盖其不处海滨，外国航轮，无由直达，只司集中土货，运沪出口，收纳洋货，散销内地，最为相宜。”因此与上海直接对外贸易不同，汉口的对外贸易主要以埠际转口贸易为主。1867年，汉口对外贸易额3053万海关两，由江汉关直接进出口仅为50万海关两，而经上海等地间接外贸额却高达3000万海关两，两者相差60多倍。1902年，汉口进出口货物价值1.032亿海关两，其中直接进出口货物价值不过886.6万海关两，只占全部进出口额的8.6%。1910年，汉口外贸总额达1.7亿多海关两，直接贸易额仅为3700万海关两，而间接贸易额却达1.35亿海关两。长年统计资料表明，汉口海关间接外贸额除个别年份外，在全国外贸大埠中高居第2位，仅次于上海。而直接贸易额大多数年份却仅为全国第4位，不仅与上海相差很远，而且常常落在广州、天津，有时甚至青岛的后头。因此，可以这样认为，近代汉口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上海进行转口贸易而成为著名的国际商贸港口城市的。“上海者，为中国贸易之总汇；汉口者，为内地贸易之中枢，扬子江流域其他各港，皆不过此两地之附庸而已。”

武汉在中国近代对外贸易格局中因为居于长江中点的区位优势，成为内地副产品转销海外和海外工业制成品输入内地的枢纽，而这种转输贸易是通过沪汉联动的途径来实现的。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抗战前1936年仍然如此。“从上海和汉口的贸易来说，在1936年，未经加工的食料及饮料类商品，从汉口输往上海同上海输往汉口的商品值比例为12:1（是年汉口输往上海的未经加工的食料及饮料类商品值为14434043元，而上海输往汉口仅为1201863元—原注），原料品从汉口输往上海同上海输往汉口的比是23:1（是年汉口输往上海的原料品为85755483元，上海输往汉口为3592520元—原注），即大量未经加工的原料及商品从汉口流向了上海，在这里上海是真正的城市，而汉口只是作为内地农村的中心才显示其城市的功能。以制成品来说，情况就完全相反了。同样在1936年，从汉口输往上海的制成品价值同上海输往汉口的制成品价值之比为1:27，这说明上海以大量的制成品（包括进口的机制品）运向了汉口，在这些埠际贸易中上海表现出典型的城市态势，而汉口只是作为内地乡村的代表”^①。

① 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0~161页。

如上所述, 19 至 20 世纪之交武汉的区位优势主要是在水运交通为主体的运输方式下通过长江淤塞而凸现出来的。历史到了 20 世纪 20 年代, 随着工业发展程度的普遍提高及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 人类交往、联系的手段、渠道已经高度现代化和多样化, 武汉原有的区位优势已不复存在。首先从国际上看, 当代著名国际性城市除巴黎等外, 几乎都是港口城市, 而且除法兰克福、芝加哥外, 绝大部分属于海港城市。进入 50 年代以来, 由于大型船舶的发展, 内河航道水深已经不能适应其需要, 于是那些内河港口城市面临着两种选择: 要么通过多种途径向沿海发展, 使传统的城市区位优势得以继续保持, 要么大力发展其他现代交通事业, 并进一步扩展同国际交往的新方式、新渠道。从目前世界城市的交通方式看, 主要还是第一种。如芝加哥虽然地处内河, 但船只通过五大湖和圣劳伦斯河或伊利运河一塔德逊运河区, 既能直通大西洋, 又能直通太平洋, 因此芝加哥成为世界著名的港口城市。武汉位于长江中游, 北接汉江, 南接鄱阳湖, 西接嘉陵江, 东接洞庭湖, 是连接中国南北、沟通东西的重要枢纽。随着工业发展程度的普遍提高及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 人类交往、联系的手段、渠道已经高度现代化和多样化, 武汉原有的区位优势已不复存在。首先从国际上看, 当代著名国际性城市除巴黎等外, 几乎都是港口城市, 而且除法兰克福、芝加哥外, 绝大部分属于海港城市。进入 50 年代以来, 由于大型船舶的发展, 内河航道水深已经不能适应其需要, 于是那些内河港口城市面临着两种选择: 要么通过多种途径向沿海发展, 使传统的城市区位优势得以继续保持, 要么大力发展其他现代交通事业, 并进一步扩展同国际交往的新方式、新渠道。从目前世界城市的交通方式看, 主要还是第一种。如芝加哥虽然地处内河, 但船只通过五大湖和圣劳伦斯河或伊利运河一塔德逊运河区, 既能直通大西洋, 又能直通太平洋, 因此芝加哥成为世界著名的港口城市。武汉位于长江中游, 北接汉江, 南接鄱阳湖, 西接嘉陵江, 东接洞庭湖, 是连接中国南北、沟通东西的重要枢纽。随着工业发展程度的普遍提高及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 人类交往、联系的手段、渠道已经高度现代化和多样化, 武汉原有的区位优势已不复存在。首先从国际上看, 当代著名国际性城市除巴黎等外, 几乎都是港口城市, 而且除法兰克福、芝加哥外, 绝大部分属于海港城市。进入 50 年代以来, 由于大型船舶的发展, 内河航道水深已经不能适应其需要, 于是那些内河港口城市面临着两种选择: 要么通过多种途径向沿海发展, 使传统的城市区位优势得以继续保持, 要么大力发展其他现代交通事业, 并进一步扩展同国际交往的新方式、新渠道。从目前世界城市的交通方式看, 主要还是第一种。如芝加哥虽然地处内河, 但船只通过五大湖和圣劳伦斯河或伊利运河一塔德逊运河区, 既能直通大西洋, 又能直通太平洋, 因此芝加哥成为世界著名的港口城市。武汉位于长江中游, 北接汉江, 南接鄱阳湖, 西接嘉陵江, 东接洞庭湖, 是连接中国南北、沟通东西的重要枢纽。

① 参见皮明麻主编:《汉口五百年》,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114 页。

（三）从“码头文化”到“内陆意识”：百年武汉人文心态的演变及其对开放的影响

人文素质与人文心态对开放发生影响，主要包括两个相关层面，即领导者层面和普通市民层面。前者因其处于决策和具体操作层面，其素养、眼光以及文化心态对开放产生决定性和主导性影响，后者则通过营造某种社会文化氛围来推进或制约对外开放和社会现代化的整体进程。领导者和一般市民的素质往往具有同一性，共同受时代风尚和区域文化环境的熏染与制约。

说到 19 至 20 世纪之交武汉对外开放以及清末民初武汉的崛起，人们很自然会想到张之洞。张之洞作为一个儒家兼官僚的两栖人物，其素养眼光是超出一般官僚的。作为儒家学者，他在主动开放过程中必然要考虑开放所带来的必然后果，即中学与西学的内在矛盾和冲突，因此他必须在学习西方与保存国粹的张力之间维持某种平衡。因此他提出了“中体西用”的理论主张，在开放的战略构架上，作为儒者的张之洞不仅在经济领域里有许多开放举措，更在文化教育上作了不少开放尝试，使湖北武汉的城市文化品位有了质的提高，一改宋、明、清以来落后于全国的局面。作为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张之洞行事果断，善弄权术，纵横捭阖，能将开放和近代化构想付诸实施。正是因为张之洞这种身份与角色的双重性，使他在近代武汉的对外开放中能争取主动，频出高招，取得实效。对此，张之洞的门生张继煦曾有过一段评论，认为他“治鄂为他人所不能及者”有远识、毅力、缜密、精勤四大优长。其中尤以“远识”最为突出：“公治在一方，而能统筹全国之利害；治在一方，而尝为数十百年之计。铁路议兴，其主修者，不过谓利用运兵转饷而已，公独以尽地利，抵洋货为言。理财者，以搜刮商民为长策而已，公独谓鄙人向来论理财，以先赔钱为主义。当举国鼾睡之时，公独以设厂制械为务，惟恐后时。议修川汉粤汉铁路，全国以借外资为饮鸩，公独主张借款修路，以速其成。庚子以前，公又以保存国粹为言，此所谓高瞻远瞩，先知先觉者也。”^① 这里，修铁路的目的在拓展武汉区位优势及发展民族经济；理财的目的在放水养鱼、培育适应民族工商业发展的良好环境；兴办洋务、推进工业化走在全国前列；不怕流言蜚语大胆利用外资修建卢汉铁路以及大力提倡西学……都显示出张之洞具有超出凡人，主动开放的战略眼光。张之洞的这种“远识”，关键在于他对世界和中国开放态势的理性体认和准确把握，顺时而动，其开放与近代化功业具有时代价值。故张继煦认为，张之洞与胡林翼同为抚鄂名臣，在治理地方军政方面都有建树，但两人治鄂功业的价值

^① 张继煦：《张文襄公治鄂记》（一），《文襄督鄂之时代及其环境》。

却有本质不同：“清咸丰时，胡林翼抚鄂，自谓造成一崭新湖北，若与公比较，胡当地方残破之余，理财练兵，使湖北一变而为富强。东征各军，倚此以削平大难，而减漕积谷，鄂人尤歌颂其惠政，然其功究在一时。公固私淑林翼者也，而值历史所未见之世变，排除万难，为鄂兵百世之利，所谓崭新湖北，盖在此而不在彼。虽公之明达，有以致之，抑亦时为之也。”^①

的确，张之洞的开放举措对武汉发展的影响是历史性的。但是，必须指出，张之洞的阶级局限和时代局限也是非常明显的，这种局限限制了他开放的眼光。首先，由于张之洞作为儒学忠实信徒身份所固有的儒家文化本位主义观念意识和对西方以民主为精髓的精神文明的偏见，带来了他开放和吸收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局限——“中体西用”，只在技艺层面上吸收西方工业技术和某些管理经验，而排拒资本主义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其次，由于张之洞作为封建士大夫所受到的知识结构的局限以及对西方科学知识尤其是科学精神的茫然无知，造成了他在引进设备、技术和企业管理方式方法上所出现的一系列重大失误，使他办洋务、办工业不如他办教育、办市政那样得心应手，工业方面的成就也不如教育、市政那样显著。“失败的原因总的说来显然是没有经验和管理不善”。再次，由于张之洞作为封建官僚尤其是朝廷重臣、封疆大吏的“官本位”和“官本商末”思想作祟，使他在有效鼓励地方商人参与开放和近代化事业方面受到重大局限。他办企业是“官商合办”而不是像李鸿章那样搞“官督商办”。他用强制手段获取“商人资本”，但不许商人在企业中负经营管理的责任，商人在企业的投资只能获得“利息”，这实质上根本算不上“投资”，只不过是“借贷”而已。另外，“张之洞在吸引有才干的商人的帮助方面，也是非常不成功的，他的顾问中间没有一个出色的买办。也许这是无法避免的，因为他一向低估商人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张之洞的搞工业发展的路子与李鸿章的路子截然不同。李鸿章从商人和官吏队伍中起用了许多优秀的经理和行政人员，而且知人善任，但张之洞作为一个近代工业的提倡者，因缺乏才干如盛宣怀或唐景星的助手，所以他对工业发展的贡献严重地受到了限制”^②。

关于张之洞与商人的关系，张之洞本人则认为是有苦难言。张继煦在《张文襄公治鄂记》中为之辩解云：“世有议公者，谓重官治而抑民治。事业监督者少，则成绩不克显著。人民无练习之机会，即上有善治，亦人存政举。不为久远之保持，此稍明外情者皆能言之，以公之明，岂见不及此。徒以风气闭塞，不启迪其知识，而遽主张民治，宣统时成立之县议会，其效大可睹矣。公从教育实业下手，正所以培植民治之基础。即公所举办官营事业，始何尝不分配商股，及劝导商人自办，而

① 张继煦：《张文襄公治鄂记》（一），《文襄督鄂时代及其环境》。

② [美] 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499 页。

或入股而退出，或劝导再三而不应，公尝谓近时人性情风气，喜发议论而不出钱，盖有感而言。岂得谓公深信官力万能，而阻遏人民之自办乎。”而张之洞自己也认为汉口商人“力微识近，大都望而却步”^①，不愿意也缺乏大的财力来投资近代工业。上述说法，孰是孰非？笔者认为，两方面的因素都存在。关于后一方面因素，就涉及近代武汉市民素质和城市文化氛围了。

近代武汉特别是汉口，在“九省通衢”地理环境和“转输贸易”的商业格局的作用下，形成文化信息传播迅速、市民乐于接受新鲜事物并包容外来文化的“码头文化”特征。同时，由于城市的商业特性使然，汉口市民文化又存在“坎流之性有余，艮止之性不足”和民风俚俗、急功近利等弊端。这种种文化氛围对近代武汉对外开放产生了正反两方面的制约和影响。由于武汉城市文化所具有的喜新逐奇、兼容并包的特性，使市民在反对西方殖民主义武力入侵的同时，对于先进的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乐于接受、善于模仿和创造，较少盲目排外的心理与举动。这正是近代武汉虽然开放滞后但却后来居上的重要原因。但是，另一方面，“码头文化”同它“转手贸易”的商业特性一样，一切都是即时性和看得见摸得着的，人们追逐显而易见的商业利润，而对投资大、见效缓慢的近代工业却望而却步。市民尤其是商人这种急功近利的文化心态和素质，有利于汉口在对外商贸方面的发展，从而成为国际上著名的商业大港，但对张之洞的洋务事业却大为不利。如果翻检有关地方史书，我们就不难发现本籍商人大多从事于商业，而投资工业的则多为外省籍商人，如投资兴办既济水电公司的宋炜臣就是江浙一带人。后来张之洞意欲将丝麻四局“出租”给商人自主经营时，本地商界仍然没有人出来承租。结果是“出租给韦紫正为首的商办公司，韦是一位在汉口做生意的广东茶叶商。在此之前，1896年，张之洞在筹集更多的官方资本的努力失败后，已被迫将汉阳铁厂移交给盛宣怀为首的商人集团了”^②。正是因为汉口商人“力微识近”和“讳谈洋务”的文化氛围，制约了张之洞的开放、洋务事业，即使他后来愿意“官督商办”，实际情形正是无商可招，惟有官办而已。

城市文化个性的形成与城市功能性质存在着直接关联。19至20世纪之交汉口的“码头文化”是“码头城市”的“转输贸易”商业功能的产物，而20至21世纪之交武汉的对外开放受到城市市民浓厚的“内陆意识”的制约则是武汉成为国内工业基地、商业港口城市功能退化的结果。所谓“内陆意识”，表现在武汉人囿于地域区位的局限而形成的封闭自守，甘居中游的文化心态和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过去那种对商品和市场天然敏感性的丧失。“内陆意识”在遗弃传统城市文化善于捕捉市场信息，接纳并包容新事物优点的同时，却保留了急功近利、重利贱义等传统

① 《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44。

② 费维恺：《中国早期工业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4～35页。

劣根性，从而在众多方面对 20 世纪末叶武汉改革开放产生消极影响。

首先，“内陆意识”是一种保守和自我封闭意识。与沿海城市思想解放，主动对外开放相比，武汉人的思想较为保守，对外开放的主动性较差，思路也欠开阔。如有研究者指出：“在沿海开放地区，外商成片开发已成气候，独资企业逐步成为三资企业的主角，股权融资、境外直接融资、BOT、TOT 融资已成为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途径。相比之下，武汉尚存许多空白。我们要么不敢想，要么想到不敢做，一些部门‘没有文件等文件，有了文件等细则’”^①，从而丧失了许多开放和发展的良机，已全然没有 19 至 20 个世纪之交那种敢为天下先的闯劲和主动精神。武汉人对待开放的态度基本上是被动的，在全国主动开放的大环境下，武汉人曾经有所谓“中部地区开放慎重论”。这种被动性制约了武汉的开放和发展，著名经济学家夏振坤指出，武汉和湖北“为什么发展不够，为什么思想解放不够？我认为就是因为湖北省、武汉市开放不够。开放问题，首先是个解放思想的问题。我们要打破常规来抓开放，开放搞得好不好，是关系到我们湖北省、武汉市今后以怎样的姿态跨入 21 世纪的大问题。社会上有一种理论，叫‘中部开放慎重论’……实际上是画地为牢的陈旧的民族独立观。这个思想不打破，我们的改革就会受阻，经济发展就会受到限制”^②

其次，“内陆意识”与“中游心态”并行不悖。武汉人认为，武汉地处中原，九省通衢，得中独厚，地理位置优越，虽然不如沿海开放城市富有发达，但较之中西部许多欠发达省份却有相当优势，故“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这种中游心态使武汉人的对外开放主动性、发展的进取心严重残缺。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指标长期徘徊在中等水平上，19 至 20 世纪之交那种“中国第二大商埠”的雄风荡然无存。

再次，“内陆意识”使武汉人目光短浅，急功近利。武汉人精明而不高明，在对外开放中往往只局限于看得见摸得着的经济利润，而很少从提高武汉城市现代化整体水平的大处着眼于社会、经济、文化方面全方位、宽领域的开放。在一些领导决策层面，往往把开放引资同突出政绩简单挂钩，“把‘用市场换技术’的初衷扭曲为‘用市场换资金’，再加上为突出政绩的‘大干快上’，往往竞相出台各种优惠政策，过分强调放与引，忽视监与管；重视局部短期利益，忽视全局长期利益”^③。在企业家管理者层面，则“在谈判中往往只算小账，算眼前账，怕别人赚钱，精明而不高明，明明自己缺乏资金，却要坚持控股占大头，丧失了不少合资合作的机遇”^④。在对外贸易领域，“外贸出口企业内部缺乏长远的经营战略，许多出口企业看到的只是短期利益，很少关注市场的长期预测和长远竞争优势的投资。由于地方

①②③④ 殷增涛主编：《论武汉 21 世纪的对外开放》，武汉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59、465、261、259~260 页。

分割、条块分割，国内缺乏真正的统一大市场，从而造成企业规模狭小，企业长不大，企业仍受到地方政府的保护”^①。

事实一再表明，“内陆意识”、“中游心态”作为一种区域城市文化现象对武汉对外开放的负面效应是十分明显的。也就是说，武汉在 20 至 21 世纪之交开放的滞后、被动并不单单是国家梯度式开放的产物，亦即不单与区位优势有关，更主要的是受制于市民封闭保守、急功近利的文化环境。由此看来，武汉要创造后来居上的奇迹，重现往日“东方芝加哥”风采，仅仅通过现代手段延伸和再现武汉区位优势还远远不够，必须系统清理城市文化中不利于开放与现代化事业的种种惰性，营造一种健康、向上、开朗、恢弘的城市市民文化氛围，去迎接和应对新世纪全球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更为猛烈的扑面而来的开放大潮。

我们对两次世纪之交武汉对外开放的比较研究就要告一段落了，比较使人清醒，比较催人奋进。然而，任何历史的比较又都是蹩脚的。两次世纪之交武汉对外开放比较研究的结果，似乎很容易使人产生出厚古薄今、今不如昔的错觉。其实，两次对外开放是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历史起点上展开的，主持开放者的动机及其后果也不可同日而语。19 至 20 个世纪之交张之洞“种豆得瓜”，动机与效果事与愿违；而 20 至 21 世纪之交，对外开放在完善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方面目的与结果却是完全一致的。正是在这一大的背景下，武汉新一轮对外开放无论从开放的广度、深度以及对武汉城市现代化的巨大推动，都是上一轮对外开放所无法比拟的。我们谈到它的不足，是在肯定它在本质上优于历史上任何一次对外开放并充分评估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基础之上的某种不足，而且主要是从空间横向对比上作为参照系来作比较和评价的。因此，无论是全盘否定近代开放历史，还是一味厚古薄今，都有悖于历史的真实，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应有的科学态度。

^① 殷增涛主编：《论武汉 21 世纪的对外开放》，武汉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88 页。

十八、武汉人的形象^①

——对武汉人自我形象的实证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

武汉是一座非常具有特色的城市。从地理环境上看，武汉由于交通发达，素称“九省通衢”；坐落于长江、汉江两江交汇处，使武汉有了“江城”的美称；由于独特的气候条件，武汉又有“火炉”之称。从历史文化上看，武汉是历史名城，汉口曾经位列全国四大名镇之一；在近、现代史上，从辛亥革命到“二七大罢工”，武汉曾经成为多次决定中国命运的革命活动上演的舞台。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计划经济时代里，武汉在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的地位也都得到了应有的重视。但是，在改革开放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武汉人似乎与武汉这座伟大的城市之间产生了某种不和谐。武汉人的形象开始受到社会的挑剔、揶揄乃至批评。“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这句不知是褒是贬的民谚似乎已成了人们对武汉人的刻板印象。前不久有好事者又给武汉想当然地加上了一个褒贬不明的绰号——“最市民化的城市”，并且通过媒体广为传播。这可把武汉人搞糊涂了，我们武汉人到底怎么了？于是武汉人的自信心似乎也动摇起来，有人开始自己谴责自己。有一位作者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从武汉人打麻将中有打“癞子”和“打晃晃”这种现象，得出结论说，“赖”和“晃”就是武汉人的德性和形象。^②

武汉人失去自信了吗？武汉人如何看待自己？或者说武汉人的自我形象究竟如何？我们能从武汉人对自己的认识与评价中发现些什么？正是从这些问题出发，我们设计并进行了这项研究课题。

① 本文是运用武汉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委与武汉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共同主持的研究课题“21世纪武汉人形象研究与设计”的有关资料写成的。

② 张宇光：《从打麻将看武汉人》，《长江日报》1998年9月7日。

（二）研究的方法

1. 研究对象的界定

本课题的研究对象是武汉人。

在本研究中，我们把武汉人界定为具有武汉市户口在武汉市市区内（本研究不在武汉市郊区、县抽取调查样本）工作或生活（时间长短不限，在武汉市工作或生活时间的长短将作为重要的自变量进行测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为什么要对武汉人作如此界定呢？这是由本课题研究内容的特殊性决定的。

2. 研究内容的确立

本课题的研究内容是武汉人的自我形象。作为研究对象的武汉人只是作为研究内容的载体而存在。我们最终关注的是研究内容而不是研究对象。当然，研究内容不可能离开研究对象而独立存在。

从研究的角度来看，存在两种武汉人形象，即他人（非武汉人）心目中的武汉人形象和武汉人自己心目中的武汉人形象，即武汉人的自我形象。

武汉人形象是指武汉人作为一个整体在他人或武汉人自己心目中的评价性印象，也就是社会心理学中所说的刻板印象。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证明，刻板印象是一种客观存在，即人们对以地域为标志的某一地方的人们存在着一种颇为一致的评价性印象，如北京人的豪爽、大方，上海人的精明、细致等等。而且，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还证明，人们对某一地方人们的刻板印象的形成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其印象可能与该地域内人们的实际情况吻合或基本吻合。但是，也存在这样的情况，如果受到某些特殊因素的影响，如某些突发事件或媒体歪曲性宣传的影响，有可能形成人们对某一地域范围内人们扭曲性的评价性印象，即形成与该地方人们实际情况存在差异甚至差异甚大的刻板印象。

（1）他人心目中的武汉人形象

他人心目中的武汉人形象是指外地人（非武汉人）对武汉人的评价性印象或刻板印象。

外地人的界定有三种情况，从而相应地存在着三种研究他人心目中的武汉人形象的不同方法。

其一，不住在武汉市的外地人。通过抽样调查，了解他们心目中的武汉人形象，如在全国范围内（除武汉市外）进行武汉人形象的抽样调查。

其二，暂时居住（如出差、旅游或短期工作等）在武汉市的外地人。调查他们对武汉人的评价性印象。

其三，武汉人中的外地人。武汉人中的外地人是指一方面属于本研究所界定的武汉人的范围，即属于有武汉市户口、在武汉市区内工作或生活的中国公民，另一方面又不是土生土长的当地武汉人。显然，这些人虽然工作、生活在武汉市，但他们对当地价值的认同以及对武汉人的评价性印象与当地武汉人是存在差别的。而且，应该说，这些人是对武汉人认识最清楚、了解最深刻的一个社会群体。

(2) 武汉人的自我形象

武汉人的自我形象即武汉人自己对作为整体的武汉人的评价性印象或刻板印象。本文所研究的便是武汉人的自我形象。

(3) 数据的收集

本研究的准备、酝酿工作开始于 1998 年 6 月，正式入户调查工作从 1999 年 7 月 10 日开始，8 月 10 日结束，其他的研究工作一直进行到现在。

整个研究过程严格按照国际通用的质量控制方法进行：用严格的随机抽样方法在全市 7 个城区中共抽取出 39 条街道，从 39 条街道中抽取出 188 个居委会，最后从 188 个居委会中抽取 3 088 户居民进行访谈式问卷调查。调查工作在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的协助下进行，得到了被调查对象所在单位（各区文明办、街道及居委会）的大力支持。

(三) 调查者基本情况分析

本次调查共收回问卷 3 088 份，经审核最后确定的有效问卷为 3 009 份，问卷合格率为 97.4%。被调查者中男性为 1 459 人，占总人数的 48.5%，女性为 1 550 人，占总人数的 51.5%。被调查者中年龄最小的 18 岁，最大的 82 岁，平均年龄为 42.48 岁，各年龄组的分布情况见表 1。

表 1 被调查者年龄分布表

年 龄	人 数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18~35	866	28.8	28.8	28.8
36~45	918	30.5	30.5	59.4
46~55	660	21.9	22.0	81.3
56 岁以上	561	18.6	18.7	100.0
合 计	3 005	99.9	100.0	
缺 损	4	0.1		
总 计	3009	100.0		

表 1 告诉我们,被调查者中,18~35 岁的青年人占 28.8%,36~45 岁的中年人占 30.5%,46~55 岁的壮年人占 22.0%,56 岁以上的老年人占 18.7%。

被调查者的婚姻状况见表 2。

表 2 被调查者婚姻状况分布表

婚姻状况	人 数	百分比 (%)	有效百分比 (%)	累积百分比 (%)
未 婚	457	15.2	15.3	15.3
已 婚	2 416	80.3	80.8	96.1
其 他	118	3.9	3.9	100.0
合 计	2 991	99.4	100.0	
缺 损	18	0.6		
总 计	3 009	100.0		

从表 2 可知,被调查者中,未婚者只有 457 人,占总人数的 15.3%;已婚者 2 416 人,占总人数的 80.8%;其他(包括离婚后未再婚、离婚再婚、丧偶后未再婚、丧偶后再婚、分居等)共 118 人,只占 3.9%。另有 18 人(0.6%)未答而计入缺损。

被调查者的文化程度的分布见表 3。

表 3 被调查者文化程度分布表

文化程度	人 数	百分比 (%)	有效百分比 (%)	累积百分比 (%)
小学及其以下	279	9.3	9.3	9.3
初 中	802	26.7	26.7	36.0
普通高中	729	24.2	24.3	60.3
中 专	408	13.6	13.6	73.8
大 专	431	14.3	14.3	88.2
大学本科	317	10.5	10.6	98.7
研究生以上	38	1.3	1.3	100.0
合 计	3 004	99.8	100.0	
缺 损	5	0.2		
总 计	3 009	100.0		

从表 3 中可知,被调查者中,小学及其以下文化程度者占 9.3%(279 人),初中毕业生占 26.7%(802 人),普通高中毕业生占 24.3%(729 人),中专(包括职业高中和技校)占 13.6%(408 人),大专(包括成教大专)占 14.3%(431 人),

大学本科（包括成教本科）占 10.6%（317 人），研究生以上学历者（包括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占 1.3%（38 人）。有 5 人（0.2%）缺损。

被调查者的职业分类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既然我们的抽样调查结果要用来推断武汉市的总体情况，被我们抽中的调查对象中自然包括了各种职业类型。被调查者职业分布情况见表 4。

表 4 被调查者职业分布表

职业类型	人 数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1. 机关干部	233	7.7	7.7	7.8
2. 企业管理人员	83	2.8	2.8	10.6
3. 科技人员	107	3.6	3.6	14.1
4. 医务人员	84	2.8	2.8	16.9
5. 大学教师	62	2.1	2.1	19.0
6. 中小学教师	84	2.8	2.8	21.8
7. 新闻工作者	6	0.2	0.2	22.0
8. 财务人员	93	3.1	3.1	25.1
9. 商业服务业人员	171	5.7	5.7	30.8
10. 公司职员	104	3.5	3.5	34.3
11. 律师	2	0.1	0.1	34.4
12. 文艺工作者	5	0.2	0.2	34.5
13. 军人、警察	18	0.6	0.6	35.1
14. 个体经营者	78	2.6	2.6	37.7
15. 工人	688	22.9	23.0	60.7
16. 农民	5	0.2	0.2	60.9
17. 离退休人员	411	13.7	13.7	74.6
18. 下岗后尚未就业者	333	11.1	11.1	85.7
19. 无一定职业者	178	5.9	5.9	91.7
20. 其他	247	8.2	8.2	99.9
21. 拒答	2	0.1	0.1	100.0
合 计	2 994	99.5	99.5	
缺 损	15	0.5		
总 计	3 009	100.0		

从表 4 可以看出，被调查者中包括了各种职业的人们，其中所占比例最大的是工人，占 23.0%（688 人）；其次是离退休人员，占 13.7%（411 人），下岗后尚未就业者，占 11.1%（333 人），机关干部占 7.8%（233 人）等等。

在 3 009 位被调查者中，有多少人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又有多少是从外地来武汉的，以及他们是以何种方式来到武汉的？详细情况见表 5。

表 5 被访者是如何来到武汉的频数分布表

来武汉方式	人 数	百分比 (%)	有效百分比 (%)	累积百分比 (%)
生在武汉长在武汉	2 144	71.3	72.5	72.5
来武汉上学, 毕业后留下	180	6.0	6.1	78.6
外地毕业分配来武汉	82	2.7	2.8	81.3
从外地调来武汉工作	239	7.9	8.1	89.4
军队转业来汉	90	3.0	3.0	92.5
其他方式	220	7.3	7.4	99.9
拒 答	3	0.1	0.1	100.0
合 计	2 958	98.3	100.0	
缺 损	51	1.7		
总 计	3 009	100.0		

从表 5 可知, 被调查者中土生土长的武汉人占了 72.5% (2 144 人), 其他以不同方式来武汉的武汉人一共只占 27.5%。

在土生土长的武汉人中, 情况又有不同, 可分为: 三代以上世居武汉、祖父母时搬来武汉、父母一代迁入武汉等等, 其统计分布情况见表 6。

表 6 被访者前辈来武汉情况频数分布表

来武汉方式	人 数	百分比 (%)	有效百分比 (%)	累积百分比 (%)
三代以上世居武汉	1 178	39.1	49.9	49.9
祖父辈搬来武汉	27	7.5	9.6	59.6
父母一代迁入武汉	858	28.5	36.4	95.9
其 他	75	2.5	3.2	99.1
不 知 道	12	0.4	0.5	99.6
拒 答	9	0.3	0.4	100.0
合 计	2 359	78.4	100.0	
缺 损	650	21.6		
总 计	3 009	100.0		

从表 6 得知, 被调查者中, 三代以上世居武汉的占 49.9%, 祖父辈来武汉的占 9.6%, 父母一代迁入武汉的占 36.4%。这需要说明一下, 表 6 中的资料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回答他们的前辈来武汉的时间, 但表 5 中显示土生土长的武汉人是 2144 人, 表 6 中回答问题的人数 (包括回答 “ 其他 ”、 “ 不知道 ” 和拒答) 为 2359 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是: 有些被调查者, 虽然不能算是 “ 生在武汉, 长在武汉 ” 的武汉人, 如父母一辈不在武汉, 但是属于 “ 三代以上世居武汉 ” 或 “ 祖父辈搬来武汉 ”。这些人本可不回答表 6 中的问题但他们回答

了，因此出现了上述情况。

被访问者的祖籍所在地也是我们这次调查的重要内容之一，其分布情况见表 7。

表 7 被调查者祖籍所在省分布表

祖籍所在省	人 数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1. 湖北	2 081	69.2	74.0	74.0
2. 湖南	123	4.1	4.4	78.4
3. 河南	127	4.2	4.5	82.9
4. 江西	40	1.3	1.4	84.5
5. 安徽	33	1.1	1.2	85.5
6. 江苏	82	2.7	2.9	88.4
7. 山东	41	1.4	1.5	89.9
8. 上海	20	0.7	0.7	90.6
9. 浙江	50	1.7	1.8	92.4
10. 福建	7	0.2	0.2	92.6
11. 广东	33	1.1	1.2	93.8
12. 山西	20	0.7	0.7	94.5
13. 广西	12	0.4	0.4	94.9
14. 四川	32	1.1	1.1	96.1
15. 陕西	5	0.2	0.2	96.3
16. 云南	4	0.1	0.1	96.4
17. 天津	5	0.2	0.2	96.6
18. 北京	4	0.1	0.1	96.7
19. 河北	48	1.6	1.7	98.4
20. 新疆	1	0.0	0.0	98.5
21. 内蒙古	1	0.0	0.0	98.5
22. 黑龙江	7	0.2	0.2	98.8
23. 辽宁	24	0.8	0.9	99.6
24. 吉林	8	0.3	0.3	99.9
25. 贵州	1	0.0	0.0	99.9
26. 甘肃	2	0.1	0.1	100.0
合 计	2 811	93.4	100.0	
缺 损	198	6.6		
总 计	3 009	100.0		

从表 7 可知，武汉人的祖籍分布于全国 26 个省市自治区，绝大多数人（74.0%，2 081 人）祖籍为湖北省，其次多的依次为河南（4.5%，127 人）、湖南（4.4%，123 人）、江苏（2.9%，82 人）、浙江（1.8%，50 人）、河北（1.7%，

48 人) 山东 (1.5%, 41 人) 江西 (1.4%, 40 人) 安徽、广东 (同占 1.2%, 33 人) 和四川 (1.1%, 32 人) 等等。

如果我们进一步将武汉人的祖籍划分为湖北本省人、南方人和北方人三大类型, 则其分布如表 8 所示。

表 8 被调查者祖籍所在南方、北方分布表

祖 籍	人 数	百分比 (%)	有效百分比 (%)	累积百分比 (%)
1. 湖北本省	2 081	69.2	74.0	74.0
2. 南方省份	437	14.5	15.5	89.6
3. 北方省份	293	9.7	10.4	100.0
合 计	2 811	93.4	100.0	
缺 损	198	6.6		
总 计	3 009	100.0		

从表 8 可知, 如果把湖北本省人除外, 祖籍在南方省份的武汉人占 15.5%, 而祖籍在北方省份的武汉人占 10.4%。如果把湖北也作为一个南方省份, 则 89.6% 的武汉人祖籍为南方人, 只有 10.4% 的武汉人祖籍是北方人。

被调查者在武汉市生活、工作的平均年限为 36.07 年, 标准差为 13.99, 最短的才 1 年, 最长者为 73 年。其分布情况见表 9。

表 9 被访者在武汉生活、工作时间分布表

年 限	人 数	百分比 (%)	有效百分比 (%)	累积百分比 (%)
10 年以下	115	3.8	4.0	4.0
11~20 年	385	12.8	13.4	17.4
21~30 年	529	17.6	18.4	35.9
31~40 年	679	22.6	23.7	59.5
41~50 年	755	25.1	26.3	85.5
51~60 年	296	9.8	10.3	96.1
60 年以上	111	3.7	3.9	100.0
合 计	2 870	95.4	100.0	
缺 损	139	4.6		
总 计	3 009	100.0		

表 9 以 10 年为间距划分被调查者在武汉生活、工作的时间组, 其分布基本上符合正态分布, 即时间在 10 年以下和 61 年以上者相对较少, 而在武汉生活、工作 20 年、30 年、40 年者依次递增, 50 年者最多, 60 年者又减少, 61 年以上者最少。

被调查者的家庭经济状况,是最难以了解到真实情况的问题。为了尽可能收集到真实可靠的资料,我们从各个侧面进行调查,然后对不同的信息进行综合。

被调查者的家庭收入情况见表 10。

表 10 被调查者家庭年收入

家庭年收入	人 数	百分比 (%)	有效百分比 (%)	累积百分比 (%)
10 000 元以下	1 198	39.8	42.0	42.0
10 001~20 000 元	1 086	36.1	38.1	80.1
20 001~30 000 元	358	11.9	12.6	92.6
30 001~40 000 元	127	4.2	4.5	97.1
40 000 元以上	83	2.8	2.9	100.0
合 计	2 853	94.8	100.0	
缺 损	157	5.2		
总 计	3 009	100.0		

从表 10 可以看出,被调查者的家庭年收入呈明显的负偏态分布,即收入越低人数越多,收入越高人数越少。家庭年收入在 10 000 元以下的最多,占被调查总人数的 42.0%,收入在 1~2 万元之间的占 38.1%,2~3 万元的占 12.6%,3~4 万元的占 4.2%,家庭年收入在 4 万元以上的只占 2.9%。这就是说,在武汉市,家庭年收入为 1~2 万元的中等水平收入者与家庭年收入在 1 万元以下的低收入者占绝大多数(80.1%)。这是符合武汉市的实际情况的。这从被调查者对自己家庭生活水平在武汉市所属档次的主观评价中可以得到印证。

问卷中的问题是“您认为您家庭的生活水平在武汉市属于什么档次”?调查结果见表 11。

表 11 被调查者家庭生活水准自我评价分布表

生活水平	人 数	百分比 (%)	有效百分比 (%)	累积百分比 (%)
低水平	710	23.6	24.0	24.0
中等偏下	969	32.2	32.7	56.7
中 等	1 085	36.1	36.6	93.3
中等偏上	180	6.0	6.1	99.4
高水平	18	0.6	0.6	100.0
合 计	2 962	98.4	100.0	
缺 损	47	1.6		
总 计	3 009	100.0		

表 11 所显示的情况与表 10 基本上一致，那就是：中、低生活水平的人占绝大多数（93.3%），承认自己的生活水平属于“中等偏上”和“高水平”的人仅占总人数的 6.7%。

比较表 10 和表 11 的结果（ X^2 检验表明，二者存在显著性相关关系），我们有理由相信，用表 10 中被调查者的家庭年收入来表示其经济地位是能反映实际情况的；同时，表 10 和表 11 的相互关系也证明，我们同样可以用表 11 的资料来代表被调查者的经济状况。

在入户调查开始之前，我们对样本在 7 个城区的分布按比例作了分配，但在实际调查过程中难免要作出一些调整，在实际完成的 3 009 份有效问卷中，被调查者在 7 个城区的实际分布如下：

表 12 被调查者所在 7 城区分布表

城 区	人 数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1. 武昌区	517	17.2	17.2	17.2
2. 洪山区	320	10.6	10.6	27.8
3. 汉阳区	392	13.0	13.0	40.8
4. 江汉区	490	16.3	16.3	57.1
5. 江岸区	568	18.9	18.9	76.0
6. 硚口区	444	14.8	14.8	90.0
7. 青山区	278	9.2	9.2	100.0
合 计	3 009	100.0		

从表 12 得知，7 个城区中，样本比例最大的是江岸区（18.9%），其后依次是武昌区（17.2%）、江汉区（16.3%）、硚口区（14.8%）、汉阳区（13.0%）、洪山区（10.6%）和青山区（9.2%）。

这一部分即被调查者基本情况的分析，我们进行的是单变量的统计描述。通过这一部分的分析，我们要达到两个目的：其一，了解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并由此判断抽样调查的真实可靠程度。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次的抽样调查所获得的资料是真实可靠的，主要根据是样本统计量与武汉市的情况基本相符。因此，我们便可以以此为依据推断武汉市的总体情况。其二，这一部分所分析的都属于自变量，对自变量的整理和分析是为双变量（一个自变量一个因变量）及多变量（多个自变量一个因变量甚至多个因变量）分析打下基础。

（四）武汉人自我形象分析

在研究设计中，我们把武汉人形象分为武汉人自我形象和他人心目中的武汉人

形象。本文只研究武汉人的自我形象，即武汉人自己心目中的武汉人形象问题。当然，在我们的研究设计中，定义了广义的武汉人和狭义的武汉人。广义的武汉人即所有在武汉市生活、工作具有武汉市户口的中国公民，包括土生土长的当地武汉人和外地来汉工作的武汉人。狭义的武汉人仅指土生土长的武汉当地人。因此，在没有进行户口不在武汉的外地人心目中的武汉人形象研究时，我们可以非土生土长的武汉人权当外地人，以非当地武汉人心目中的武汉人形象作为他人心目中的武汉人形象。这个问题将另撰专文进行分析。

1. 武汉人自我形象因子的提炼

通过对调查资料的统计分析，我们得出如下武汉人的自我形象：

聪明 热情 果敢 求新
语言欠文明 行为少规范 交往乏宽容 修养缺风范

前面 8 个字为正面形象因子，而后面的 20 个字则属于负面形象因子，这些形象因子通过整合而形成完整的武汉人自我形象。武汉人这一现实形象的确定，是从大量的调查数据中，通过统计分析抽象出来的。现将其分析过程摘要叙述如下：

步骤一，形象描述。

在问卷调查中，我们要求每个接受调查者用三个词或短语描绘他们心目中的武汉人形象，将所有描绘武汉人形象的词或短语汇总归类，然后统一编码录入计算机，进行统计分析，保留超过 1.0%（30 人以上）提及的词汇或短语，舍弃其余，所得结果见表 13。

表 13 武汉人形象分类描述统计分布表

形象描述	人 数	所占百分比（%）	排序（按百分比）
1. 行为不文明	579	19.8	1
2. 语言不文明	575	19.1	2
3. 热情	487	16.2	3
4. 不讲卫生	292	9.7	4
5. 精明	258	8.6	5
6. 素质差	219	7.3	6
7. 直率	206	6.8	7
8. 豪爽	200	6.6	8
9. 脾气暴躁	194	6.4	9
10. 聪明	189	6.3	10
11. 讲义气	145	4.8	11
12. 不诚实	134	4.5	12
13. 凡事不吃亏	111	3.7	13

续表

形象描述	人 数	所占百分比 (%)	排序 (按百分比)
14. 吃苦耐劳	107	3.6	14
15. 不吃苦耐劳	106	3.5	15
16. 修养差	104	3.5	16
17. 大方	94	3.1	17
18. 不讲社会公德	86	2.9	18
19. 小市民	82	2.7	19
20. 自私自利	82	2.7	19
21. 有经济头脑	68	2.3	20
22. 好客	66	2.2	21
23. 待人友善	63	2.1	22
24. 好吃	59	2.0	23
25. 讲究衣着打扮	52	1.7	24
26. 泼辣	48	1.6	25
27. 爱慕虚荣	48	1.6	25
28. 爱赌博	48	1.6	25
29. 开放	45	1.5	26
30. 不宽容	45	1.5	26
31. 乐于助人	45	1.5	26
32. 有闯劲	44	1.5	27
33. 无闯劲	44	1.5	27
34. 待人不友善	41	1.4	28
35. 太随便	41	1.4	28
36. 不实在	31	1.0	29
37. 爱凑热闹	30	1.0	30

从表 13 可以看出, 被调查者用词语既描绘了武汉人的正面形象, 同时也描绘了武汉人的负面形象, 我们称这些词语为形象因子, 正面形象因子与负面形象因子通过整合而形成一个完整的武汉人形象。在表 16 中, 形象描述的词语即形象因子排序越靠前 (运用该词语描绘武汉人形象的人数越多), 则该形象因子在武汉人的形象整合中作用力越大。如果我们以排在前 10 位的 10 个词语, 即行为不文明、语言不文明、热情、不讲卫生、精明、素质差、直率、豪爽、脾气暴躁、聪明代表武汉人的形象因子, 则其中热情、精明、直率、豪爽和聪明属于正面形象因子, 其余 5 个属于负面形象因子。相比之下, 虽然正面形象因子个数等于负面形象因子, 但

负面形象因子的位次要比正面形象因子高，由此整合而成的武汉人形象有可能是一个倾向于贬斥的整体形象。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排序在 10 位以后的一系列形象因子，虽然它们在整合形成武汉人形象的过程中作用力比前面的因子要小，而且位次越低，其作用力越小，但是我们不能忽略它们在武汉人形象整合过程中的作用。因此，我们不能就此得出结论，还需做进一步的分析。

步骤二，负面形象描述。

在前面的整体形象描述中，我们发现负面形象因子数量不仅多于正面形象因子，而且位次大都高于正面形象因子，特别是有几个负面形象因子如行为不文明、语言不文明、不讲卫生、素质差显得很突出。为了证明这种情况不是出自偶然，我们设计了专门研究负面形象因子的问题。问卷中的问题是：“您认为武汉人给人最不好的形象是什么？”调查结果见表 14（同样只保留 1.0% 以上人数提出的形象因子）。

表 14 武汉人负面自我形象因子分布表

形象因子	人 数	百分比（%）	排序
1. 语言不文明	1 082	36.0	1
2. 行为不文明	672	22.3	2
3. 不讲卫生	304	10.1	3
4. 不讲社会公德	110	3.7	4
5. 素质差	65	2.2	5
6. 太随意	61	2.0	6
7. 自私自利	60	2.0	7
8. 不诚实	54	1.8	8

表 14 的结果证明表 13 中的调查结果是真实的，那就是语言不文明、行为不文明、不讲卫生、素质差等负面形象因子的确存在，而且其作用不容忽视。此外，从表 14 我们还发现，相比之下，语言不文明比行为不文明在武汉人形象整合中作用力要大得多。这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步骤三，正面形象因子评价。

为了准确地提炼武汉人自我形象因子，我们在实施步骤一、步骤二的基础上进一步实施步骤三，即让被调查者从正面对武汉人的形象因子进行定量评价。我们问卷中的问题是：“请您给武汉人各个方面打分，最高为 10 分，最低为 1 分，或者说，您完全同意为 10 分，您完全不同意为 1 分。”问卷中共列出了 26 个方面的内容。评价结果见表 15。

表 15

武汉人正面形象因子评价得分统计表

形象因子	评价人数	最低分	最高分	平均得分	标准差 (%)	排序
Q3a. 聪明	2 966	1	10	7.50	1.51	1
Q3e. 精明	2 956	1	10	7.47	1.63	2
Q3v. 凡事不吃亏	2 950	1	10	7.31	1.86	3
Q3b. 热情	2 961	1	10	7.02	1.73	4
Q3f. 开放	2 951	1	10	6.88	1.68	5
Q3n. 有经济头脑	2 956	1	10	6.85	1.67	6
Q3c. 豪爽	2 961	1	10	6.83	1.85	7
Q3s. 讲究衣着打扮	2 956	1	10	6.81	1.70	8
Q3i. 讲义气	2 961	1	10	6.71	1.83	9
Q3d. 大方	2 957	1	10	6.66	1.81	10
Q3m. 吃苦耐劳	2 956	1	10	6.35	1.87	11
Q3q. 有闯劲	2 951	1	10	6.27	1.72	12
Q3o. 有毅力	2 951	1	10	6.23	1.64	13
Q3y. 有幽默感	2 943	1	10	6.19	1.80	14
Q3p. 乐于助人	2 950	1	10	6.03	1.82	15
Q3k. 讲信用	2 963	1	10	5.92	1.72	16
Q3h. 待人友善	2 957	1	10	5.91	1.79	17
Q3z. 有正义感	2 951	1	10	5.90	1.94	18
Q3j. 对人宽容	2 959	1	10	5.86	1.81	19
Q3l. 诚实	2 955	1	10	5.84	1.78	20
Q3u. 对人信任	2 949	1	10	5.82	1.67	21
Q3w. 办事讲规矩	2 948	1	10	5.79	1.84	22
Q3t. 有教养	2 957	1	10	5.46	1.79	23
Q3x. 讲社会公德	2 955	1	10	5.30	1.89	24
Q3r. 讲卫生	2 961	1	10	5.04	1.99	25
Q3g. 讲文明	2 963	1	10	4.81	1.88	26

表 15 中的调查结果与前面的分析结果可以说是完全一致的。通过表 15, 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武汉人形象的轮廓了。表 15 中共有 26 个形象因子, 评价最低为 1 分, 最高为 10 分, 也就是说, 平均得分的满分为 10 分。形象因子得分最高的前 4 位是聪明 (7.5 分)、精明 (7.47 分)、凡事不吃亏 (7.31 分) 和热情 (7.02 分)。得分最低的 4 个形象因子依次是: 讲文明 (4.81 分)、讲卫生 (5.04 分)、讲社会公德 (5.30 分) 和有教养 (5.46 分)。

显然, 得分最高的 4 个形象因子是在形象整合过程中对武汉人正面影响力最大的正面形象因子, 而得分最低的 4 个形象因子则是对武汉人形象负面影响力或破坏性最大的负面形象因子。除了形象的正面影响力和负面影响力比较大的那些极端形

象因子之外，那些处于中间的形象因子在形象的整合过程中作用不太明显，我们称这些形象因子为中性形象因子。如果我们以平均得分 6.50~5.90 为上下限划线，把平均得分大于（等于）5.90 分而小于（等于）6.50 分的因子划分为中性因子，则武汉人形象的中性因子包括：吃苦耐劳（6.35 分） 有闯劲（6.27 分） 有毅力（6.23 分） 有幽默感（6.19 分） 乐于助人（6.03 分） 讲信用（5.92 分） 待人友善（5.91 分） 有正义感（5.90 分）。这 8 个形象因子虽然不能说对武汉人的形象整合没有作用，只是说它们的作用力没有其他因子那样大，它们的存在与否不会对武汉人的整体形象发生大的作用，在理论分析和实际工作中我们可以将其列入次要考虑位置甚至忽略不计。在舍弃中性形象因子之后，我们得到了如下形象因子：

正面形象因子：聪明、精明、凡事不吃亏、热情、开放、有经济头脑、豪爽、讲究衣着打扮、讲义气、大方

负面形象因子：讲文明、讲卫生、讲社会公德、有教养、办事讲规矩、对人信任、诚实、对人宽容

为了更准确地提炼武汉人形象因子，我们还要做进一步的统计分析。

步骤四，运用因素分析法提炼形象因子。

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是一种运用广泛的多元统计方法。因为分析过程非常复杂，在此我们只能简要地总结、叙述分析结果。

表 16 武汉人形象因素分析统计表之一

内容	第一公共 因子 F1	第二公共 因子 F2	第三公共 因子 F3	第四公共 因子 F4	共通性
Q3x 讲社会公德	0.814	0.141	0.109	0.18	0.727
Q3t 有教养	0.794	0.158	0.143	0.194	0.713
Q3u 对人信任	0.765	0.267	0.135	0.120	0.690
Q3g 讲文明	0.757	0.714	0.124	0.051	0.621
Q3l 诚实	0.754	0.312	0.217	-0.006	0.713
Q3w 办事讲规矩	0.719	0.718	0.131	0.275	0.642
Q3k 讲信用	0.718	0.360	0.208	0.014	0.689
Q3r 讲卫生爱整洁	0.713	0.023	0.170	0.180	0.571
Q3j 对人宽容大度	0.708	0.447	0.121	0.036	0.716
Q3z 有正义感	0.684	0.326	0.103	0.243	0.645
Q3p 乐于助人	0.662	0.409	0.212	0.102	0.661
Q3h 待人友善	0.631	0.472	0.126	0.105	0.648
Q3o 有毅力	0.573	0.148	0.559	0.107	0.675
Q3y 有幽默感	0.524	0.308	0.131	0.464	0.603
Q3q 有闯劲	0.521	0.149	0.493	0.254	0.602

续表

内容	第一公共 因子 F1	第二公共 因子 F2	第三公共 因子 F3	第四公共 因子 F4	共通性
Q3c 豪爽	0.248	0.760	0.189	0.129	0.691
Q3b 热情	0.262	0.751	0.192	0.107	0.691
Q3d 大方	0.313	0.700	0.178	0.147	0.642
Q3i 讲义气	0.432	0.619	0.046	0.211	0.617
Q3n 有经济头脑	0.310	0.029	0.729	0.249	0.690
Q3e 精明	0.020	0.266	0.696	0.253	0.619
Q3m 吃苦耐劳	0.515	0.119	0.571	-0.099	0.615
Q3a 聪明	-0.001	0.458	0.559	0.142	0.543
Q3v 凡事不吃亏	0.002	0.104	0.109	0.703	0.517
Q3s 讲究衣着打扮	0.315	0.074	0.147	0.649	0.548
Q3f 开放	0.63	0.234	0.329	0.525	0.619
单个公共因子的有效程度	31.331 %	13.927 %	10.631 %	7.731 %	
累积的有效程度	31.331 %	45.258 %	55.889 %	63.621 %	
因子命名	负面与中性 形象因子	热情、果敢	聪明	求新	

从表 16 可以看出, 26 个原始形象因子经过因素分析后归纳为 4 大公共形象因子。在第一个公共因子 F1 有较高负荷量(负荷量大于 0.5)的变量一共有 15 个, 这 15 个变量正是我们在前面的分析中平均得分低的那些负面形象因子和中性形象因子。第二个公共因子 F2 负荷量比较大的变量有 4 个, 它们是豪爽、热情、大方和讲义气。结合前面的分析结果, 我们把 F2 命名为“热情、果敢”。第三个公共因子 F3 负荷量高的变量也有 4 个, 它们是: 有经济头脑、精明、吃苦耐劳和聪明。我们将 F3 命名为“聪明”。第四个公共因子 F4 负荷量大的变量有 3 个, 即凡事不吃亏、讲究衣着打扮、开放。结合前面的分析, 我们将 F4 命名为“求新”。

这样, 武汉人形象的正面形象因子便被确定为: 聪明、热情、果敢、求新。

表 16 的底部一栏的内容告诉我们: 第一个公共因子 F1(负面因子与中性因子)的有效程度为 31.331%, 即这些因子能解释总体方差的 31.331%。这就是说, 这些因子在武汉人形象整合过程中发挥了 31.331%的作用力; 第二个公共因子 F2(热情、果敢)的有效程度为 13.927%; 第三个公共因子 F3 的有效程度为 10.631%; 第四个公共因子 F4 的有效程度为 7.731%。那么, F2(热情、果敢)、F3(聪明)、F4(求新)在武汉人形象整合中分别起 13.927%、10.631% 和 7.731%的作用。正面形象因子一共所起的作用为 32.289%, 可见正面形象因子在武汉人形象整合中的作用力稍大于负面形象因子。

正面形象因子与负面形象因子一共能解释形象的 63.621%，也就是说，我们用上述形象因子来代表武汉人形象，能刻画出武汉人形象三分之二以上的轮廓。

负面形象因子和中性形象因子总体上已确定，但尚需进一步提炼。前文已经提到，中性形象因子在形象整合过程中作用力比较小，可以将其忽略。但是，丢掉这些中性形象因子之后会对整体形象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或者说中性形象因子在武汉人形象整合过程中作用力到底有多大，可不可以忽略不计，还需作进一步的统计分析。

如果我们把中性形象因子（有正义感、讲信用、乐于助人、待人友善、有毅力、吃苦耐劳、有闯劲、有幽默感）舍弃，再进行因素分析，其结果会如何呢？请见表 17。

表 17 武汉人形象因素分析统计表之二

内容	第一公共 因子 F1	第二公共 因子 F2	第三公共 因子 F3	共通性
Q3x 讲社会公德	0.833	0.182	0.152	0.750
Q3t 有教养	0.823	0.195	0.185	0.750
Q3g 讲文明	0.725	0.217	0.090	0.656
Q3u 对人信任	0.759	0.311	0.133	0.691
Q3r 讲卫生爱整洁	0.755	0.059	0.210	0.618
Q3w 办事讲规矩	0.740	0.205	0.242	0.649
Q3l 诚实	0.727	0.373	0.114	0.680
Q3j 对人宽容大度	0.671	0.486	0.083	0.694
Q3c 豪爽	0.221	0.797	0.194	0.722
Q3b 热情	0.235	0.762	0.216	0.682
Q3d 大方	0.294	0.734	0.204	0.666
Q3i 讲义气	0.396	0.628	0.157	0.576
Q3e 精明	0.051	0.254	0.730	0.601
Q3n 有经济头脑	0.330	0.080	0.675	0.571
Q3f 开放	0.200	0.224	0.585	0.432
Q3a 聪明	0.015	0.440	0.564	0.511
Q3v 凡事不吃亏	0.031	0.055	0.550	0.301
Q3s 讲究衣着打扮	0.378	0.023	0.542	0.437
单个公共因子的有效程度	29.383%	17.236%	14.456%	
累积的有效程度	29.383%	46.619%	61.075%	
因子命名	正面形象因子	热情、果敢	聪明、求新	

比较表 17 和表 16 可以看出，当舍弃掉 8 个中性因子之后，虽然公共因子由原

来的 4 个变成 3 个, 但并没有改变分析的结果, 而且使分析的结果显得更加清晰合理。

公共因子 F1 包括因子负荷量比较高的 8 个变量, 即讲社会公德、有教养、讲文明、对人信任、讲卫生爱整洁、办事讲规矩、诚实、对人宽容大度。这些都是负面形象因子。根据这些因子的内涵结合前面分析的有关结果, 我们将武汉人的负面形象因子概括为: 语言欠文明、行为少规范、交往乏宽容、修养缺风范。

公共因子 F2 包括负荷量比较高的 4 个变量: 豪爽、热情、大方、讲义气。我们将 F2 命名为“热情、果敢”。公共因子 F3 包括因子负荷量比较高的 6 个变量, 即精明、有经济头脑、开放、聪明、凡事不吃亏、讲究衣着打扮。我们将 F3 命名为“聪明、求新”。

表 17 中, 负面形象因子的有效程度为 29.383%, 即负面形象因子在形象整合中的作用力占总作用力的 29.383%, 比原来(未舍弃中性因子之前)下降了 1.948% ($31.331\% - 29.383\%$), 也就是说中性因子实际上只有 1.948% 的负面作用力。

正面形象公共因子 F2 的形象作用力为 17.236%, 比原来增加了 3.309% ($17.236\% - 13.927\%$)。

正面形象公共因子 F3 的形象作用力为 14.456%, 比原来下降了 3.906% ($10.631\% + 7.731\% - 14.456\%$)。

正面形象公共因子 F2 与 F3 作用力之和为 31.692%, 比原来下降了 0.597% ($32.289\% - 31.692\%$)。这说明中性形象因子在形象整合过程中只有 0.597% 的正面形象作用力, 小于其负面形象作用力 1.948%。由此看来, 所谓 8 项中性因子实际上并不是完全的中性因子, 而是略带负性的负面形象因子, 因为它们在武汉人的形象整合过程中其负面作用力大于其正面作用力。

此外, 舍弃中性因子之后, 形象因子的整体解释力或有效性略有下降, 下降了 2.546% ($63.621\% - 61.075\%$), 可见下降幅度甚小, 而且在下降的这 2.546% 中, 负面作用力占了 1.948%, 正面形象作用力仅下降了 0.597%。因此, 从实际形象的整合效果来看, 下降的幅度非常小, 可以忽略不计。这就是说, 虽然在我们舍弃了中性因子之后, 我们确定的形象因子只能整合出 61.075% 的武汉人自我形象, 但其形象效果并不会比原来的 63.621% 差多少。

需要说明的是, 表 17 中, F1、F2、F3 三个公共因子的负荷量都在 0.542 以上, 这说明所有变量的有效性都比较高。但是, 我们注意到, 18 个变量中的 15 个在三个公共因子上的共通性大于 0.5, 只有三个变量(Q3f 开放、Q3s 讲究衣着打扮和 Q3v 凡事不吃亏)在三个公共因子上的共通性小于 0.5, 分别为 0.432、0.437 和 0.301, 说明这三个变量对形象的作用力相对而言要低一些。

综上所述, 我们最后确定的武汉人自我形象因子为:

正面形象因子：聪明、	热情、	果敢、	求新
负面形象因子：语言欠文明、	行为少规范、	交往乏宽容、	修养缺风范

2. 对武汉人形象因子的阐释

(1) 正面形象因子阐释

a. 聪明

聪明一词,《辞海》的解释是“视听灵敏”,这是就词的本义而言,所谓耳聪目明是也。《四角号码新词典》的解释是:“智力高,理解力强。”聪明是构成武汉人形象的首要形象因子。在本研究中,聪明这一形象因子是对“聪明”、“精明”、“有经济头脑”和“凡事不吃亏”这四个形象因子的总结和概括。

在武汉人形象描述中,认为武汉人聪明的有 189 人,占被调查者的 6.3%,认为武汉人精明的有 258 人,占 8.6%,认为武汉人有经济头脑的有 68 人,占 2.3%,认为武汉人凡事不吃亏的有 111 人,占 3.7%。四者之和其人数达 626 人,共占被调查总人数的 20.8% (见表 13)。

在武汉人形象因子评价中,“聪明”平均得分最高,排在第一位,为 7.50 分;“精明”排在第二位,平均得分为 7.47 分;排在第三位的是“凡事不吃亏”,得 7.31 分;“有经济头脑”排在第六位,得 6.85 分。四项之总平均得分为 7.28 分 (见表 15)。

在武汉人形象因素分析中,“精明”、“聪明”、“有经济头脑”和“凡事不吃亏”被显著地归为一类公共因子(F3)之内,且因子负荷量均在 0.55 以上 (见表 16、17)。

由此可见,武汉人聪明,这是一个没有争议的共识,这种共识正是武汉历史与现实在人们头脑中的正确反映。

b. 热情

热情即热烈的感情。热情是构成武汉人形象的第二大形象因子。

在武汉人形象描述中,认为武汉人热情的达 487 人,占被调查者的 16.2%,排在正面形象因子描述的第一位 (见表 12)。

在武汉人正面形象因子评价得分统计中,热情排在第四位,得 7.02 分 (见表 15)。

武汉人的热情是楚文化的优良传统在武汉人人格中积淀的反映。

c. 果敢

果敢,字典的解释是:勇敢而有决断。果敢是构成武汉人形象的第三大形象因子。在本研究中,“果敢”是对“豪爽”、“大方”和“讲义气”的总结与概括。

在武汉人形象描述中,认为武汉人豪爽的有 200 人,占被调查者的 6.6%,认为武汉人大方的为 94 人,占被调查总人数的 3.1%,认为武汉人讲义气的共有 145

人,占被调查总人数的 4.8%。上述三项之和为 439 人,占被调查者(3 009 人)的 14.5%;除此之外,被调查者描述武汉人形象提到的“脾气暴躁”(194 人,6.4%)、“泼辣”(48 人,1.6%),之中也包含有“果敢”的成分(见表 13)。

在武汉人正面形象因子评价得分统计中,豪爽得 6.83 分,排在第七位;讲义气得 6.71 分,排在第九位;大方得 6.66 分,排在第十位。三项平均得分为 6.55 分(见表 15)。

在武汉人形象因素分析中,“豪爽”、“大方”、“讲义气”明显地归纳在公共因子 F2 之内,且因子负荷量均在 0.70 以上。而且,我们发现另一重要形象因子“热情”也被归纳于 F2 之内,说明热情与果敢是有关系的。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可以说热情是果敢的基础,果敢是热情的表现形式,没有热情的人不可能表现出果敢的行为(见表 17)。

众所周知,果敢是荆楚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作为荆楚文化的继承者,武汉人的人格中不可能没有果敢这种文化因子的积淀。

d. 求新

求新指的是一种追求新颖、时尚的社会心态,一种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求新是构成武汉人形象的第四大形象因子。

对求新这一形象因子的提炼,比前面三大形象因子的提炼难度要更大一些。

在武汉人形象描述中,没有直接提及武汉人的求新问题,但我们认为“开放”、“有闯劲”以及“讲究衣着打扮”等词语中包含有求新的含义(见表 13)。

在武汉人正面形象因子评价得分中,“开放”得 6.88 分,排在第五位,“讲究衣着打扮”得 6.81 分,排在第八位,“有闯劲”得 6.27 分,排在第十二位。“有闯劲”是中性形象因子,因此,“求新”主要是通过对“开放”和“讲究衣着打扮”的综合概括而得到。“开放”、“求新”可以说是同义词,开放意味着不守旧,意味着对新事物的渴求。“讲究衣着打扮”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武汉人的求新心态与精神。讲究衣着打扮可以有不同的表现方式。讲究衣着的档次与品位是一种方式,而追赶服装时尚新潮流是另一种方式。武汉人的讲究穿着打扮两种方式兼而有之,但以后一种方式为主。因此,透过武汉人讲究衣着打扮这一日常行为的表面现象,我们看到的是武汉人可贵的求新精神。

在武汉人形象因素分析中,“开放”、“讲究衣着打扮”与“聪明”等被归纳在形象公共因子 F3 之内,这一方面说明开放与讲究衣着打扮的确内涵着某种共同的东西——求新;另一方面说明求新与聪明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这也是符合道理的,只有聪明的人才不满足现状,才有求新的欲望、动机和精神。

可以说,无论从历史的角度,从武汉人对楚文化继承与发展的角度,还是从武汉人的现实表现来看,说武汉人具有求新精神,都是当之无愧的。

(2) 负面形象因子阐释

a. 语言欠文明

“语言欠文明”是影响武汉人形象的第一大负面形象因子。

武汉人的语言欠文明有两层含义。其一，指一种语言习惯，即武汉人说话爱带脏字，动不动开口骂人。其二，武汉人不喜欢说普通话，武汉方言有损武汉人形象。

在武汉人形象描述中，提及武汉人语言不文明者达 575 人，占被调查总人数的 19.1%，而在问卷中问及“您认为武汉人给人最不好的形象是什么”时，多达 1082 人（占被调查总人数的 36.0%）选择了“语言不文明”（见表 13、14）。

在武汉人正面形象因子评价得分统计中，形象因子“讲文明”得分最低，只得了 4.81 分，成为影响武汉人形象最大的负面因子。讲文明中包括了语言文明和行为规范两大部分（见表 15）。

b. 行为少规范

行为少规范，指行为的随意性大，规范意识不强，因而容易产生各种不文明、不符合社会规范要求的社会行为。

在武汉人形象描述中，行为少规范主要通过以下词语表现出来：行为不文明，提及者达 579 人，占被调查总人数的 19.8%；不讲卫生，提及者有 292 人，占被调查总人数的 9.7%；不讲社会公德，提及者有 86 人，占被调查总人数的 2.7%；太随便，提及者有 41 人，占被调查总人数的 1.4%；爱凑热闹，提及者有 30 人，占被调查总人数的 1.0%，等等（见表 13）。

在负面形象的特别描述（最不好的形象是什么）中，提及频率最高的 8 项内容中，与行为少规范有关的占了 4 项，分别是行为不文明（672 人，22.3%）、不讲卫生（304 人，10.1%）、不讲社会公德（110 人，3.7%）、太随意（61 人，2.0%）（见表 13）。

在武汉人正面形象因子评价中，得分最低的 8 项内容，与行为少规范有关的内容同样占了 4 项：办事讲规矩得 5.79 分，讲社会公德得 5.30 分，讲卫生得 5.04 分，讲文明（包括行为不文明）得 4.81 分。

c. 交往乏宽容

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人与人之间和谐交往，需要人与人之间相互宽容和理解。调查结果表明，武汉人在人际交往中对他人缺乏足够的宽容。

在武汉人形象描述中，下列词语与交往乏宽容有关：脾气暴躁（194 人，6.4%）、不诚实（134 人，4.5%）、凡事不吃亏（111 人，3.7%）、小市民（82 人，2.7%）、自私自利（82 人，2.7%）、不宽容（45 人，1.5%）、待人不友善（41 人，1.4%）等等。上述内容提及者之和为 555 人，占总人数的 18.4%。

在武汉人负面形象因子描述中，有 60 人（占被调查总人数的 2.0%）提出武

汉人给人最不好的形象是自私自利和不诚实(54人,1.8%)。

在武汉人正面形象因子评价中,凡事不吃亏得分很高,得7.31分,对人宽容只得5.86分,诚实得5.84分,对人信任得5.82分。“凡事不吃亏”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曾把“凡事不吃亏”纳入“聪明”公共因子中,显然是合理的,“凡事不吃亏”肯定是聪明人的表现。但是,“凡事不吃亏”在人际交往中则成了“交往乏宽容”的行为表现方式。此外,“凡事不吃亏”还是一种很重要的价值观念,对此我们只能在其他文章中专门论述。

在武汉人形象因素分析中,我们最终从对人信任、诚实和对人宽容这三个负面形象因子中抽象出“交往乏宽容”这一公共因子。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凡事不吃亏”最终被纳入聪明、求新公共因子之中,但由于“凡事不吃亏”既表现为一种行为方式,同时也是一种重要的价值取向,因此它对“交往乏宽容”这一公共形象因子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

d. 修养缺风范

修养,《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指理论、知识、艺术、思想等方面达到一定的水平;其二,修养是指养成的正确为人处世的态度和行为方式。显然,在我们的研究中,修养一词包含了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即素质、教养或涵养和为人处世的态度与行为方式等。风范即风度与气派。因此,所谓修养缺风范,指武汉人在素质、涵养以及为人处世方面缺少高雅的风度和气派。

因为修养涉及到素质、教养和行为方式,因此,我们所抽象出的所有负面形象因子都与修养有关,可以说,修养是对前面所说的“语言不文明”、“行为少规范”、“交往乏宽容”所作的总结。有鉴于此,我们在这里主要从素质和涵养等方面来谈论修养问题。

在武汉人形象描述中,认为武汉人素质差的有219人,占被调查总人数的7.3%;认为武汉人修养差的有104人,占被调查总人数的3.5%。

在武汉人负面形象特别描述中,有65人(占被调查总人数的2.2%)认为武汉人给人最不好的形象是素质差。在武汉人正面形象因子评价中,“有教养”这一形象因子只得了5.46分。在武汉人形象因素分析中,有教养(即教养欠佳)被列为重要的负面形象因子。

十九、武汉现代化现状：比较、评价与对策

(一)

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以工业化为动力，以科学技术发展为纽带，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主体的，涉及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组织管理、生活方式、人类活动空间等诸多领域的革命性、长期性和整体性发展过程。^① 更具体地说，现代化作为一个大系统，它是由经济现代化、社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人的素质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六个基本子系统组成的。但是由于各个国家的历史条件不同，面临的国际环境不同，现代化起步的起点不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水平不同，现代化的含义不尽一致。特别是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现代化既具有全球性，又具有中国特色。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所蕴含的意义在于：是对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制度文明与文化意识形态的全面改革，它以焕发社会主义的内在生命力为前提，以向更合理更文明的社会状态迈进为目标。它同样是一项包括经济增长、民主政治、人的全面发展的宏伟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但保持了中国的民族特色和社会主义性质。

现代化成为我国发展的主旋律。“建立现代化、多功能的国际性城市”^② 成为武汉人民的奋斗目标。对武汉市现代化的里程进行回顾，将武汉市现代化现状放在国内、国际层面比较，分析武汉现代化水平居于什么样的位置，这对推动武汉现代化向更高水平发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评价与测量现代化水平必须建立一套与目标相衔接、能对目标状况进行定量测评的指标体系。科学的指标是现代化目标的具体化和监测器，并且对于现代化发展过程有导向作用，为此现代化指标的选择和设计应遵循以下原则：

科学性原则。一套科学的指标体系，不仅能准确全面地揭示现代化的现状，能

^① 陈成文：《社会现代化：一个概念的社会学考评》，《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7年第3期。

^② 武汉市统计局：《武汉年鉴》（1999）。

表明现阶段离现代化还有多大差距,同时指标体系反映的特定数据对于政府部门还具有政策导向的作用,对社会经济的运行又能起到一定程度的警示作用。为了科学地反映武汉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和基本面貌,还要考虑到武汉市区与郊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因素,并且要求各个指标具有系统性和揭示内在差异性的特征。

保持中国特色与国际标准接轨相结合原则。现代化是一种世界性现象,因此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对现代化的衡量应尽可能一致,以便于国际比较。一般说来,大多数指标应采用国际组织的规范化标准,同时也要照顾到中国特色,设计一些反映中国特色的独有指标。

合理性与可操作性相结合原则。选取的指标不仅要求科学,而且还应合理,同时具有可操作性。

简明代表性原则。为了使现代化指标便于分析观察,指标选择应简明扼要,切实可行,而且各个子系统指标也要少而精,把握住关键变量。

基于上述原则,对武汉现代化水平进行评价,具体指标组成见表 1。

表 1 武汉现代化指标体系^①

指 标 类	指 标 名 称	计 量 单 位
经 济 现 代 化	人均 GDP	元
	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
	农业劳动生产率	元
	贸易总额占 GDP 比重	%
社 会 现 代 化	城市化指数	%
	恩格尔系数	%
	获得安全饮用水人口比重	%
	每千人医生数	人
	“三废”处理率	%
	社会安全指数	件/万人
科 技 现 代 化	政府社会支出占总支出比重	%
	R&D 经费占 GDP 比重	%
人 的 素 质 现 代 化	科技进步贡献率	%
	平均预期寿命	岁
	在校率	%
	每万人大学生数	人
	每人拥有图书量	本

①此指标体系是参照了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现代化指标体系研究组设计的指标体系(国家计划发展委员会,1999)。

(二)

自“九五”以来,武汉现代化进展迅速,各项事业都有较大发展,下面就现代化指标,将武汉现代化放在全国和上海水平中进行科学地量化比较,以发现问题,找出差距。

1. 经济现代化

所谓经济现代化主要是指以现代工业为核心的现代经济体系取代以传统农业为核心的传统经济体系的变革过程^①。它既是整个社会现代化的基础,又是它的核心内容。为了使经济现代化的目标和内容更为明确,一些经济学家对现代化的内容规定了一套指定的可操作的标准,如认为应包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农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有的认为现代化社会是指工业和服务业在社会中占有绝对优势并起着主导作用,可以用人均国民收入来衡量,也可以用三个产业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来衡量^②。这里分三个层次用5个指标来评价武汉经济现代化水平。

(1) 经济现代化综合指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所谓国内生产总值是指一个国家(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年内所生产的全部货物和服务价值超过同期投入的全部非固定资产货物和服务价值的差额,即所有常住单位增加值之和,按市场价格计算,用以反映一年内经济活动的成果,是人民生活的物质基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按人均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它是国际公认的最能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性指标。

武汉市注重经济发展的总体实力,1997年完成国内生产总值912.33亿元^③,人均GDP达到12 602.98元,分别比1996年增长17%、15.4%;同年全国GDP为74 462.6亿元,人均GDP为6 023.33元(见图1),比1996年增长9.7%和8.6%。1997年武汉GDP和人均GDP分别比全国增幅高出7.3和6.8个百分点,人均GDP比全国多6 579.56元。1998年武汉国内生产总值突破千亿元大关,达到1 015.89亿元,人均GDP达到13 882元,分别比1997年增长13%和10.1%,人均GDP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18个百分点。1999年武汉市国内生产总值继续增加达到

① 吴增基、吴鹏森、苏振芸:《现代社会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4月第1版。

② 列维:《现代化和社会结构》,纽约,1976年。

③ 数据出自武汉市统计局:《武汉统计年鉴》(1998)。以下有关1997年、1998年武汉的统计数据均来自《武汉统计年鉴》(1998、1999),有关1997、1998年全国、上海的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8、1999)。如不作特别说明,数据来源都与此相同。

1 085.68 亿元^①，比上年增长 11.0%，分别比全国、全省平均水平高出 3.9 个百分点和 2.7 个百分点，人均 GDP 为 14 667 元，比上年增长 7.3%。2000 年是武汉经济从疲软、紧缩状态走向快速健康发展的一年，GDP、人均 GDP 高于或好于上年同期，也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全年完成国内生产总值 1 207 亿元，比 1999 年增长 12.0%，比全国增幅高出 3.7 个百分点。“九五”期间，武汉国内生产总值、人均 GDP 与上年相比涨幅都很大，人均 GDP 由 1995 年的 8 454 元提高到 2000 年的 16 238 元，并且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虽然武汉经济现代化步伐在不断加快，工业化程度不断提高，但是同上海相比差距很大。1999 年上海全市人均 GDP 为 3.08 万元，达到世界中等收入国家水平，而同年武汉人均 GDP 只有 14 667.4 元，武汉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于上海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16 133 元。2000 年上海市人均 GDP 提高到 3.3 万元左右，接近上中等国家收入水平，同年武汉人均 GDP 只有 16 238 元，比上海低 4.92 个百分点。“九五”期间，武汉人均 GDP 平均水平只有 13 663 元，而上海为 28 014 元。虽然武汉市人民紧紧抓住国际经济环境趋好的机遇，开拓前进，保持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势头，但是建立国际性大都市，实现现代化，综合经济实力仍有待提高。

(2) 产业结构现代化。产业结构现代化可以分别用工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来衡量。工业和农业，第一、二、三产业均是产业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以工业化为基础的现代化的重点内容，所以工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可以充分显示产业结构现代化的情况。在一个人口大国，农业现代化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农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高低，而在于产出水平，尤其是劳动力的产出水平。“农业劳动生产率”正好可以反映我国及各个地区的农业现代化的真实情况。

1999 年武汉市工业生产平稳增长，全年完成工业增加值 387 亿元，比上年增长 10.0%，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 35.6%（见表 2）。2000 年快速增长，全年完成工业增加值 435 亿元，比 1999 年增长 13.5%，增幅高出 1999 年 3.5 个百分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 35.6% 上升为 36%。作为一个工业基地不仅工业增长快速，而且工业产品结构调整进展明显，全年开发新产品 1 200 个，新产品实现销售收入 55 亿元，利税 7 亿元，以激光应用技术、新材料和环保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含量、高新附加值的现代工业产品生产规模迅速扩大。同样，第三产业也平稳发展，1999 年第三产业增加值为 529.5 亿元，比上年增长 13.9%，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

^① 数据出自武汉市统计局：《关于 199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长江日报》2000 年 3 月 19 日第 3 版。以下有关武汉 1999 年、2000 年的数据均来自《关于 1999 年（200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长江日报》2000 年 3 月 19 日第 3 版（2001 年 1 月 23 日第 4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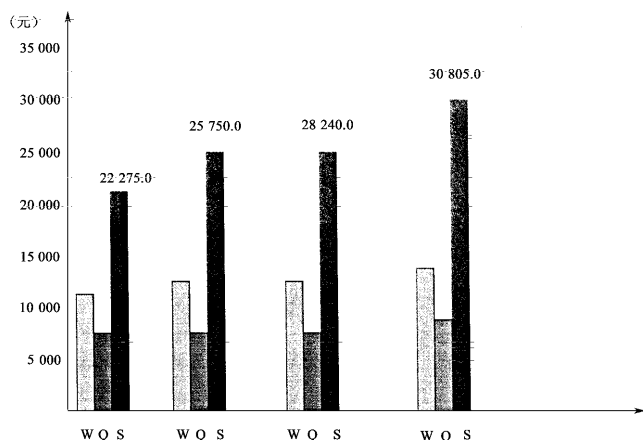


图1 “九五”期间武汉、全国和上海人均 GDP 增长图

重为 48.8%。2000 年第三产业增加值为 592 亿元，增长 12.4%，增幅有所下降，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49.0%，上升 0.2 个百分点。而 1999 年上海第三产业增加值就已达 2 000 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49.6%^①，同年分别高出武汉 1 470.5 亿元和 0.8 个百分点，并且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比 2000 年武汉的比重还高出 0.6 个百分点。上海正由我国最大的工业基地转变成为一个具有较强服务功能和辐射功能的中心型城市，武汉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借鉴上海的成功经验，加快第 109

元，比 1997 年增长 21.9%。而上海在 1997 年就已达到 5 054 元，比武汉 1998 年农业劳动生产率高 23%，1999 年、2000 年差距拉得更大。不妨再从三次产业结构比例来看看武汉产业结构现代化的步伐。1998 年三次产业结构由 1997 年的 8.6:46.3:45.1 调整为 7.6:44.9:47.5，第一次实现了“三、二、一”的排列顺序，2000 年随着第三产业的发展，产业结构由 1999 年的 7.2:44.0:48.8 进一步调整为

① 数据出自《上海第三产业首超第二产业》，《文汇报》2000 年 1 月 15 日第 4 版。

② 农业劳动生产率 = 农林牧副渔总产值 / 乡村劳动力。所需数据源于 [年鉴] 第十一部分“农业”的“乡村劳动力”附表以及“农林牧副渔总产值及其指数”附表。

6.7:44.3:49.0。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使武汉地区经济增长格局由过去的主要依靠第二产业转向由第二和第三产业共同推动,但与上海相比,第三产业仍有待进一步加大发展力度。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上海就已提出“三、二、一”的产业发展方针,并且取得了实质性突破,1999 年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 2.0:48.4:49.6。并且第三产业占全市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九五”初期的 40.2% 提高到目前的 50% 以上。

表 2 1999 年、2000 年武汉产业结构状况

指标 年份	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第三产业增加值 GDP 比重	三次产业结构比例
2000 年	36.0%	49.0%	6.7:44.3:49.0
1999 年	35.6%	48.8%	7.2:44.0:48.8

资料来源:武汉市统计局:《关于 199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长江日报》2000 年 3 月 19 日第 3 版;《关于 200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长江日报》2001 年 1 月 23 日第 1 版。

(3) 国内经济对外开放程度。当今世界的经济现代化,具有国际化和全球化特色,反映到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就是经济对外部世界的开放程度,可以用“贸易总额(含进口与出口)占 GDP 比重”的指标来反映。

武汉地区对外贸易经过努力取得较好成绩。1998 年贸易总额为 18.37 亿美元(见图 2),占 GDP 的比重为 15.0%,比 1997 年高出了 0.3 个百分点,但同年全国贸易总额占 GDP 的比重为 33.8%,高出武汉 18.8 个百分点,上海贸易总额 31.35 亿美元,占 GDP 的比重为 70.4%,高出武汉 55.4 个百分点。1999 年武汉市全年市属外贸进口出口额为 17.94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4.1%,其中,出口 12.12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2.0%。虽然对外贸易持续快速增长,但与上海的距离拉得很大,因此必须加快对外贸易步伐以推动武汉地区经济现代化的发展。

2. 社会现代化

所谓社会现代化是指以满足社会日益发展的需要和人的全面发展需要为目标而进行的高层次、综合性的变革。社会现代化所包含的内容很宽,包括形成符合国际趋势的社会城市化格局,形成符合国际水平的合理、科学、营养、健康和有利于发展的现代化生活方式,营造高质量的生活环境,建立系统的、全面的社会服务网络等。社会现代化反映了经济现代化的水平,同时对经济现代化产生推动作用。可以从城市化、居民生活、社会服务、环境保护、社会安全五个方面来衡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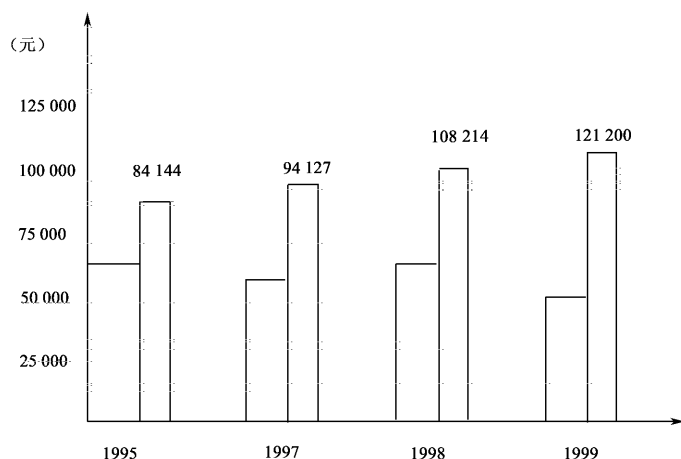


图 2 武汉对外贸易总额

(1) 城市化。城市化是指人类活动和居住场所由以农村为中心转到以城市为中心。人类活动和居住方式的这种变化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人类精神世界和生活方式迈向现代化的反映,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是因为城市集中了大量的人口与财富,集中了各种不同的经济活动、社会活动和文化活动,因而聚集了现代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城市化是工业化发展的必然表现,并且会对整个社会现代化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水平是由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即“城市化指数”来测量的。

表 3

武汉城市化指数

地 区 年 份	武汉 ^①	上海 ^②	全国 ^③
1997	58.38	72.24	29.9
1998	58.55	72.99	30.4

资料来源:①武汉市统计局:《武汉年鉴》(1998、1999),②③国家统计局:《国家统计年鉴》(1998、1999)。

武汉地区加快城市化进程的步伐,1997年城市人口比重为58.38%,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8.84个百分点。1998年比重上升为58.55%(见表3),而全国城市化指数仅为30.4%,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8.15个百分点。1999年、2000年城市人口继续上升,城市化指数不断增大。但与上海比,1997年城市化指数比上海低13.86个百分点,1998年低14.44个百分点。

(2) 居民生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日益丰富,人们不再满足温饱型的生活,而是追求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可以用恩格尔系数和获得安全饮用水人口比重这两个指标来反映。恩格尔系数指食品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19世纪德国统计学家恩斯特·恩格尔对收入与食品消费支出关系进行研究后,提出了恩格尔定律,即一个家庭或个人收入越低,其中食品消费在总的消费支出中所占比重越大,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食品消费支出比重将逐渐减少。对国家、地区而言,一个国家或地区越穷,每个人平均食品消费支出比重越大。联合国粮农组织根据恩格尔系数确定了划分贫富的标准,食品消费支出比例在20%以下为最富裕,20%至39%为富裕,40%至49%为小康水平,50%至59%为温饱型,而60%以上则为绝对贫困。以此标准为参照,计算出武汉的恩格尔系数,从而了解武汉地区人民生活质量如何。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武汉市城乡居民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居民的消费结构变动一直处于上升状态,居民消费从追求物质消费向精神消费和服务消费转变,从满足基本生存需要转向追求人的全面发展。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家庭总支出中,食品消费支出比重即恩格尔系数稳步下降。1997年城镇居民食品消费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由1996年的51.4%下降到49.7%,农村居民食品消费支出的比重也由57.9%回落至54.0%(见表4)。1998年城镇居民食品消费支出比重为44.5%,比上年下降了5.2个百分点,农村居民食品消费支出比重为52.9%,下降了1.1个百分点。人均恩格尔系数由1997年的51.49%降至47.98%,下降了3.51个百分点。1999年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城镇、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为43.1%、52.3%,与上年比分别下降了1.4个百分点和0.6个百分点。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武汉市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偏高,1997年比全国平均水平高3.3个百分点,1998年高0.02个百分点,1999年高出1.24个百分点。但是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997-1999年这三年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1个百分点,0.53个百分点,0.26个百分点。与上海比,武汉市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要低一些,但农村恩格尔系数大大高于上海。1997年比上海高出12.5个百分点,1998年高出10.71个百分点,1999年高出9.05个百分点。上海农村居民生活早已率先在全国达到比较富裕的小康水平,而武汉农村居民生活水平还属于温饱型。就人均恩格尔系数而言,武汉市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但比上海高,1998年人均恩格尔系数比全国低2.42个百分点,比上海高出1.55个百分点。从这些统计数字可以清楚地看出

武汉市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城镇居民生活已迈入了小康水平,但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离小康还有一段距离。人均生活水平已在 1998 年开始进入小康水平,但与上海居民生活水平比还有相当一段差距。

表 4 1997~1999 年武汉与全国、上海城镇及农村恩格尔系数比较* (单位:%)

指 标	城 镇 恩 格 尔 系 数			农 村 恩 格 尔 系 数			人 均 恩 格 尔 系 数		
	武 汉	全 国	上 海	武 汉	全 国	上 海	武 汉	全 国	上 海
1997 年	49.7	46.4	51.5	54.0	55.1	41.5	51.49	52.5	49.5
1998 年	44.5	44.48	50.51	52.9	53.43	42.19	47.98	50.4	46.43
1999 年	43.1**	41.86	45.01	52.3**	52.56	43.25	—	49.25	44.54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8~1999),《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8—2000),武汉市统计局:《武汉统计年鉴》(1998~1999)。

* 数据均是根据统计年鉴提供的资料推算得来的:城镇恩格尔系数=城镇居民食品消费支出/城镇居民总的消费支出;农村恩格尔系数=农村居民食品消费支出/农村居民总的消费支出;人均恩格尔系数=城市人口比重×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农村人口比重×农村恩格尔系数。

** 资料来源于武汉市统计局:《关于 200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长江日报》2001 年 1 月 23 日第 4 版。

“—”数据缺省。

“获得安全饮用水人口比重”是国际组织十分关心的有关发展中国家、地区人民生活水平方面的最重要指标之一,可以从另一侧面来测定人民生活的现代化程度。武汉市政府向来重视改善人民生活的饮用水质量,1997 年获得安全饮用水人口比重为 96.07%,到 1999 年城市地面水水质达标率达到 100%。

(3) 社会服务。可以用“政府社会支出总支出比重”和“每千人医生数”二个指标来显示。市场经济下,提供社会服务的主体是政府,而政府财政开支中用于社会开支的比重这一指标可以表示政府在社会服务中作用的大小。“每千人医生数”指标反映了社会提供的医疗卫生能力和水平。

武汉市政府用于科教文卫事业、工交商部门事业、支援农村生产、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的支出占全部财政支出的比重由 1997 年的 34.58% 上升为 1998 年的 35.64%,上升了 1.06 个百分点(见表 5)。同上海比,1997 年、1998 年分别高出上海 0.65 和 4.06 个百分点。但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14.46 个百分点和 14.92 个百分点。卫生事业稳步发展,1998 年每千人医生数为 3.31 人,比全国平均每千人医生数多 1.71 人,比上海少 6.79 人。1999 年、2000 年武汉市卫生事业保持稳步发展,每千人医生数上升至 3.33 人、3.32 人,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低于上海。

表 5

武汉市社会服务指标

	政府社会支出占总支出 (%)*		每千人医生数 (人)*	
	1998	1997	1998	1997
武汉	35.64	34.58	3.31	3.44
全国	50.1	49.5	1.6	1.6
上海	31.58	33.93	10.1	10.2

* 社会服务支出 = 科教文卫事业费 + 支援农村生产支出与各项农业事业费 + 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每千人医生数 = 医生总数 / 人口总数。

表中数据均是根据 [年鉴] 提供的资料推算得来的。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8、1999）；武汉市统计局：《武汉统计年鉴》（1998、1999）。

（4）环境保护。我们选用“三废处理率”来表示。“三废”（废水、废气、废渣）均为现代化过程中由于工业生产活动而产生的环境污染，对其处理的程度及水平代表了对环境保护作出的努力。武汉市近几年来加大环保力度，“三废”治理有所进展。1999 年黄浦路污水深排江工程全部完工，治理老污染源 10 项，整治排污口 10 个。新增工业废水处理能力 6.66 万吨/日，全年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 78.86%，比上年提高了 3.83 个百分点，工业废气处理能力 114.2 万标立方米/小时，工业固体废弃物处理能力 0.4 万吨/年。2000 年治理老污染源 50 项，排污口整治 229 项，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 80%，比 1999 年提高了 1.1 个百分点，垃圾无害处理率 85.4%，虽然环境问题一直被高度重视，不断加大投入治理污染，但环境质量有待继续提高。

（5）社会安全。社会安全是指人们生活的社会环境稳定，刑事案件、交通事故和火灾事故等对社会安宁有影响的事件控制在一定幅度内。可以用“社会安全指数”表示。社会安全指数越高表示社会安全程度越低。随着现代化进程推进，数值不是增高的趋势，而是应控制在一定幅度内。1997 年武汉地区社会安全指数为 37.97 件/万人^①，同年全国社会安全指数为 42.85 件/万人，武汉比全国平均水平少 4.83 件/万人。1998 年这一指数为 39.47 件/万人，比 1997 年多 1.5 件/万人，比全国平均水平少 6.23 件/万人，虽然 1998 年社会安全指数上升，社会安全程度有所下降，但是 1999 年、2000 年指数持续下降，这说明人民生活还是有一个较安

① 社会安全指数（每万人案件事故发生率）=（公安机关立案的刑事案件 + 公安机关受理的治安案件 + 交通事故 + 火灾事故）/ 人口总数（万人）。所需数据可以从 [年鉴] 第二十一部分“体育、卫生、社会福利和其他”各附表中查得。

定的社会环境。

3. 科技现代化

所谓科技现代化是指科学技术进步带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过程。科技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纽带,从特定意义上说,现代化就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对社会整体系统各个子系统影响和作用的过程。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可以直接导致社会生产发展的重大突破,而且引起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和领域发生全面而深刻的变革。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不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就根本不可能完成现代化。科技现代化的内容主要有:科学技术研究队伍日益扩大,科研经费日益增加,科学技术对生产的贡献越来越大,科学技术组织规模从单一组织发展到国家规模,由单个国家、地区发展到世界规模。这里主要从科研经费的规模和科技对生产的贡献两个方面来考虑科技现代化的水平。一般可以用“R&D经费占GDP比重”反映用于科研与开发的经费规模大小,这实际上是衡量对科技进步重视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可以用“科技进步贡献率”指标衡量实际的科技进步效果。由于数据不足,我们无法用这一指标对武汉地区进行衡量,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略科技进步的实际效果,无论哪个国家、哪个地区不仅要重视科学技术研究与开发,同时也要注意科技对生产的实际效果。

围绕高新技术产业和支柱产业高新技术化,1999年武汉市全年实施科技计划项目138项,投资4.16亿元,占GDP比重为0.38%。早在1995年全国平均“R&D经费占GDP比重”就已达到0.5%,武汉地区落后了四五年。2000年加大对科研与开发投资的力度,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取得新的突破,全年科技部门归口组织实施的科技计划项目132项,投资6.46亿元,比1999年增长55.3%,计划部门归口组织实施的科技计划项目48项,投资10.43亿元,比1999年增长56.7%。加上企业管理归口组织技术创新的投资,全年总共投资超过17亿元,占GDP比重超过1.41%,比1999年提高1.03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随着“武汉·中国光谷”的建设正式启动,武汉地区的科技现代化迈上了新的台阶。

4. 人的素质现代化

一个社会的现代化,不仅是结构、文化、经济、科学技术及城市化的发展,而且也是人的发展。所谓人的现代化主要包括如下方面:具有与宿命论相对立的效能感,乐于接受社会变迁,愿意接受新的生活经历(具有开放性),尊重并愿意考虑各种不同的意见,积极获取并关心新的知识和信息,守时惜时具有较强的时间观念,无论在公共生活还是在私人生活中都趋于计划性,基于对理性的信赖而对周围的人给予信赖,重视专门技术和公正的分配,有较高的受教育和职业期望,具有普遍主义的取向而不因特殊的个人特征而给予不同的对待,对生活采取分析的态度,

倾向于更积极地解决问题而不是回避问题等。^① 不同于以上对人的素质现代化内容的界定, 有人认为人的素质现代化应包括身体、教育文化和思想道德三个方面的内容。为了研究的可操作性, 我们选用后一种, 即从人的身体素质、教育文化水平和思想道德 (一般来说, 思想道德素质可以借助教育文化方面的素质间接表示) 三个方面来衡量人的素质现代化水平。

(1) 身体素质。可以用平均预期寿命来反映。所谓平均预期寿命就是指某一个特定人口数预期能生存的平均年限^②。最常用的是出生预期寿命, 用以说明全部人口生命存活的预期年限。它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指标, 它既能反映出社会、经济的进步状况, 人民生活的改善情况, 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医疗水平的发展状况。平均预期寿命与人口的身体素质高低成正比, 平均预期寿命越高, 说明人口的存活率越高, 身体素质越好。

1997 年武汉市人民平均预期寿命男性 72 岁, 女性 76.72 岁, 同年全国平均预期寿命 72 岁, 男性基本上能达到全国平均水平, 女性超过平均水平 4.72 岁。1998 年平均预期寿命男性 72.72 岁, 女性 77.35 岁, 分别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0.72 岁和 5.35 岁。这说明随着武汉经济的迅速发展, 医疗保健水平有很大的进步, 人们的生活质量有了显著的提高, 从而带动人口素质的提高。

(2) 教育。教育涉及面很广, 应用单一的人口教育状况来分析, 往往很难综合反映人口的受教育状况, 因此在这里选用在校率来衡量教育资源的综合系数 (应该用“每万人大学生数”表示人们接受教育的最高程度及水平, 但限于缺乏统计数据, 我们无法用它来衡量)。在校率是指 6~24 岁人口中正在各级各类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的人口比重。它反映的是社会在教育方面提供资源的综合情况, 同时也能反映人们受教育的程度和水平。

1997 年武汉市在校率为 67.60%, 同年比全国高 24.22 个百分点。1998 年在校率为 67.24%, 比上年降低 0.36 个百分点, 同年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 18.05 个百分点。可见武汉市在校率呈下降趋势, 但比全国高出几乎 20 个百分点。与上海比, 武汉市落后了二三年。早在 1995 年, 上海在校率已高达 62.03%, 位于全国之首。根据我国各地区人口构成情况、生产力水平和教育事业发展状况, 武汉地区在校率是合理的, 但要达到较高水平, 仍需重视教育, 重视人的文化素质。

武汉市 1997 年、1998 年学生在校率比较见表 6:

(3) 文化事业。人们对文化生活要求的增长, 推动文化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日趋繁荣, 并对人们的思想、道德、观念及生活方式产生重大的影响。可以用每人拥有图书量来反映人们文化素质方面的情况。这里的图书是指公开出版发行的书籍。

① 西里尔·E·布莱克:《比较现代化》,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6 年 10 月第 1 版。

② 冯立天、戴星翼:《中国人口生活质量再研究》,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

图书出版的数量、种类，可以体现一个国家或地区文化事业的发展程度，人们对图书的需求程度以及二者的适应程度等。

表 6 武汉与全国 1997 年、1998 年在校率比较 *

地区	年份	小学在校学生数	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	职业中学在校学生数	中等专业学校在校学生数	普通高校在校学生数	总学数	6~24 岁 **	在校率
武汉	1997	797 397	405 544	15 945	153 463	165 810	1 538 159	2 275 449	67.60
	1998	788 923	407 029	12 080	167 743	173 334	1 549 109	2 303 757	67.24
全国	1997	139 953 696	60 178 565	5 118 867	4 554 158	3 174 362	213 079 648	491 240 016	43.38
	1998	139 537 995	63 010 260	5 416 128	4 980 752	3 408 764	216 353 897	439 831 200	49.19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8、1999），《中国统计年鉴》（1998、1999）；武汉市统计局：《武汉统计年鉴》（1998、1999）。

* 在校率计算公式为：在校率 = （小学在校学生数 + 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 + 职业中学在校学生数 + 中等专业学校在校学生数 + 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 ÷ 6~24 岁人口数 × 100%（单位：%）

** 本列数据根据统计年鉴的分组年龄人口推算得出。

1997 年武汉地区出版图书 36 305.52 万册，每人拥有图书 50.2 本，几乎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9 倍，1998 年平均每人拥有图书 49.0 本，较之上年每人拥有图书下降了 2.3 个百分点，但是同年全国平均每人拥有图书 5.77 本，仅为武汉地区的 1/9 左右（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武汉地区作为全国教育文化基地，高校格外集中，可能导致出版图书的数目特别大，以致人均图书量大大超过全国人均水平）。1999 年武汉出版社全年出版图书 16 类 165 种，获各级奖励图书 25 种，武汉图书馆新建和安装工程基本完工。2000 年来，全市有公共图书馆 17 个。武汉地区文化事业蓬勃发展，给人的素质现代化向更高水平发展提供了很好的硬环境。

武汉市在 16 个现代化指标中，经济现代化 5 个指标中有人均 GDP、第三产业增加值 GDP 比重 2 个指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贸易总额占 GDP 比重（不考虑这两个指标的指标属性）、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社会现代化 7 个指标，其中城市化指数、获得安全饮用水人口比重、每千人医生数、三废处理率 4 个指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恩格尔系数、社会安全指数是 2 个合理的逆向指标，虽然数值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从指标反映的内容看人们的生活水平、社会稳定程度都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政府社会支出占总支出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科技现代化中 R&D 经费占 GDP 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人的素质现代化中，平均预期寿命、在校率、每人拥有图书量 3 个指标都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同上海比，除了政府社会支出占总支出比重、平均预期寿命好于上海外，其余 14 个指标都要落后于上海。从这十几个指标我们就可以看出武汉加快实现现代化

的步伐需要加强的薄弱环节，以便于对症下药，尽快实现现代化目标。

(三)

社会现代化是一种全球性变迁过程，各国各地区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内涵和实现条件等方面都有许多共性，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也有一些共同的规律，比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生产必须充分社会化，必须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合理解决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的转变，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占多数，必须解决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等等。既然社会现代化是一种全球现象，我们就可以将具体某个国家、某个地区的现代化纳入整个变迁过程的总坐标中，分析它的时空地位。现将武汉的现代化水平纳入全球现代化总坐标中，与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中期中上收入国家，同期高收入国家即 OECD 国家的现代化水平进行比较（见表 7），以找准武汉现代化水平的位置，找出差距，找到武汉人民努力的方向。

在现代化的国际比较中，选用的 10 个指标中武汉地区的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恩格尔系数、每千人医生数、平均预期寿命、每人拥有图书量的数值比中上收入、高收入国家高，其中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恩格尔系数是逆向指标，除去这二个指标，剩下反映人民生活水平指标之一“获得安全饮用水人口比重”，反映人们身体素质及生命水平的“平均预期寿命”，反映医疗卫生事业能力和水平的“每千人医生数”，反映人的文化素质的“每人拥有图书量”已达到或超过中上收入、高收入国家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现代化水平。其中 1999 年武汉市“获得安全饮用水人口比重”已达到 100%，比 90 年代初中上收入国家高出 18 个百分点，比高收入国家高 2 个百分点。1998 年武汉地区“每千人医生数”已超过 3 人，分别比中上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多 1.61 人、0.71 人。“平均预期寿命”也要比这些发达国家高一二岁。这说明在这些领域武汉地区已完全进入了现代化。

“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和“恩格尔系数”是逆向指标。武汉地区“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1998 年比中上收入国家要低 2.4 个百分点，比高收入国家高 3.6 个百分点。可以发现武汉地区的工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是逐年递增的，并且所占比重比较高，超过世界中上收入和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阶段，这直接导致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偏低。2000 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49%，比中上收入国家低 6 个百分点，比高收入国家低 15 个百分点。要实现现代化，首先就得改革目前这种“工业偏好”格局，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恩格尔系数”系数越高，人们用于食品方面的支出比用于文教娱乐、医疗保健、交通通讯等方面的支出就越多，这与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是不相符合的。武汉地区城镇、农村恩格尔系数在 90 年代末都超过了 40% 或 50%，而早在 90 年代初期这些中上收入、高收入国家都只有 10% 或 20% 左右，所以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引导人们

表 7 武汉与中上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现代化指标体系

指标类	指标名称	20 世纪 90 年代前 5 年 ^①		1998 年 ^②		1999 年 ^③		2000 年 ^④	
		中上收入国家	高收入国家	武 汉					
经济 现代化	工业 增 加 值 占 GDP 比 重 (%)	37	32	34.6		35.6		36	
	第三产业增加值 占 GDP 比重 (%)	55	64	45.8		48.8		49	
社会 现代化	城市化指数 (%)	66	74	58.55		—		—	
	恩格尔系数 (%)	20	13.5	47.98	城镇	农村	城镇	农村	
					43.1	52.3	38.5	50.2	
	获得安全饮用水 人口比重 (%)	82	98	96.07	100		100		
	政府社会占总 支出比重 (%)	59.4	57.1	35.64	—		—		
	每千人医生数 (人)	1.7	2.6	3.31	3.33		3.32		
科技 现代化	R&D 经 费 占 GDP 比 重 (%)	0.8	1.8	—		0.38		1.41	
人的 素质	平均期望寿命 (岁)	70	76	男	女*	—		—	
				72	76.72				
现代化	每人拥有图书 量(本)	2.0	4.0	—		49.0		—	

①资料来源：国家计划委员会《“十五”规划战略研究》(上)，中国人口出版社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②资料来源：武汉统计局：《武汉统计年鉴》(1999)。

③资料来源：武汉市统计局：《关于 199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长江日报》2000 年 3 月 19 日第 3 版。

④资料来源：武汉市统计局：《关于 200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长江日报》2001 年 1 月 23 日第 4 版。

“—”表示数据缺省，* 数据来源：《武汉年鉴》(1999)。

改善消费结构，提高生活质量，以真正达到生活方式的现代化水平。除了这二个指标与发达国家有差距外，武汉市还有一些指标离全球现代化标准有一段距离。“城市化指数”在 1998 年只有 58.55%，而早在 90 年代初中上收入国家就已达 66%，高收入国家这一指数高达 74%，分别比武汉要高出 7.45 个百分点和 15.45 个百分点。“政府社会支出占总支出”也要比这些发达国家低近 20 个百分点。武汉

科技现代化水平也不高，其中的“R&D经费占GDP比重”2000年只有1.41%，而20世纪90年代初高收入国家已达到1.8%。

通过以上指标的量化分析可以看出武汉地区有些指标已赶上或超过发达国家，但是差距也是客观存在的，经济现代化、科技现代化的任务还很艰巨。因此，要想达到这些国家的现代化水平还需作更多的努力，必须有科学的战略思想和更有效的对策。

（四）

通过国内比较和国际比较可以发现武汉市是一个极具潜力的城市，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要选择新的发展思路，寻找新的战略思想，即用整体科学观来指导武汉市现代化建设事业。既要以习近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作为更高层次的指导思想，全面而深刻地理解现代化的内涵，真正把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主要特征，又要同武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适合本地特点的现代化发展战略，从而使武汉在新的历史进程中更有活力，更具特色。具体地说就是要坚持以质取胜的战略思想，提高城市的综合竞争力。

现代化同任何复杂系统的运行一样，它的发展既有量的规定性，又有质的规定性，两者动态的辩证统一构成了发展的完整涵义和社会良性运行的必要条件。在西方“现代化理论”学派看来，发展中国家、地区的发展问题就是如何通过经济增长追赶发达国家的问题，只要经济增长就会发生“涓流效应”，许多问题都可迎刃而解。但是单纯追求“量的扩张”，并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地区，相反暴露出许多弊端。在发展实践中，由于尚未走出量的冲动的误区和传统的“增长第一”的发展观的影响，导致许多地区发生“工具挂帅”、“GDP崇拜”和“见物不见人”的倾向，以及经济因素支配非经济因素，量的考虑压倒质的追求等等。许多地区的领导对“后现代化”必须保持较高的发展质量这一点则没有明晰的概念^①。因此要特别强调武汉作为后发地区在追求发展速度的同时，也要注重发展质量，走“以质取胜”的路子，并以此贯穿现代化的全过程。

“以质取胜”是武汉现代化发展的必然选择，那么实现以质取胜的发展要解决什么问题 and 把握住哪些关键环节呢？以下几点是最重要的。

1. 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战略。近十年来，国内外很多专家学者提出：现代社会发展战略，应该以人中心，不断提高生活质量，促进社会经济文化协调发展。1994年在埃及召开的世界人口与发展大会明确提出“可持续发展问题中心是人”。

^① 王雅林、何明升：《论现代化的发展质量》，《社会学研究（京）》，1997年第3期第34～42页。

1995年哥本哈根举行的世界首脑会议上,通过了《宣言》和《行动纲领》,提出社会发展“以人”为中心。无论从当今世界发展战略上看,还是从我国社会主义本质看,武汉现代化发展都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战略。

2. 坚持创新发展,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武汉市现代化的发展应努力探索如何凭借相对少的生存空间和物质资源,而充分利用武汉地区丰富的文化资源、深厚的文化底蕴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社会发展质量高不高,不完全取决于人均GDP,西方现代化发展造就的“单向度的人”、“畸形的人”,以及造成物质和精神生活严重失衡等许多问题就证明了这一点。物质消费水平同人们的生活质量之间具有弹性关系,因而有时较高质量的精神生活又不一定以很优厚的物质资料为载体。在具备一定的物质生活的条件下,精神生活越充实,生活质量就越高。武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人文气息浓厚,这就为充实人们的精神生活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3. 科学认识和正确引导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是资源配置的有效方式,又会在造就现代人和培育现代观念方面起到“伟大的文明作用”。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各个地区出现了“神化”和“泛化”市场功能的倾向。市场经济的发达,现代社会仿佛成了技术社会,人本身逐渐失去了主体性而被对象化,除了服从技术规程外,别无选择,人的特殊性需要与情感受到了无情的漠视。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个人权利的追求、无情的竞争使得人与人之间往往只有契约、业务及竞争的关系而缺乏超功利的情感联系纽带,其结果是人际关系的疏离、淡漠乃至紧张、冲突。因此,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应注意到它的负面影响,大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正确引导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4. 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功能。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条件下,市场日益成为社会资源配置的基础和主体,经济的自组能力增强,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将退出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和管理。同时由于组织功能专门化,在社会生活领域许多由政府直接管理的事务将由各种社会组织承担,形成“小政府、大社会”格局,社会的自主性也将增强。但是,政府的职能仍是不可替代的。因为社会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和许多精神文化、社会公共生活领域的事务,仍需由政府来统筹规划和发挥宏观调控功能。但此时的政府是处于交响乐指挥的地位,而不是演奏员,去对具体的社会、经济生活滥加干预。为此,政府应加强自身廉政建设,反腐倡廉,提高工作效率和领导艺术,加强民主化、制度化建设,建立制衡机制,增加实施宏观调控的能力等等。

5. 提高全民素质,走科教兴国之路。全民素质既是经济与社会快速、高质发展的根本要求,也是其根本保证。提高全民素质不仅应包括提高全民技术素质,也应包括提高人们的人文、道德素质;不仅要为实现现代化提供丰厚的人力资本,而且也要塑造出有较高质量、社会责任感和大公无私的社会主义新人。特别是作为后

发地区，造就出一批目光远大、洞察社会发展规律和具有献身精神的精英，对武汉现代化将有决定性的意义。

6.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后发国家和地区已不具备早发现代化国家那样宽裕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加上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生态系统的脆弱性，以及巨大的人口压力等等，都决定了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同时现代化的发展又是若干代人共同完成的事业，发展的成果也需要在当代人和后代人之间进行合理分配。因此有质量的发展应是可持续性的发展，今天的发展能为未来更好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不是以牺牲子孙后代的资源为代价的“发展”。

7. 全面创新，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反映一个城市发展水平的不是它的经济总量，而是它的综合竞争能力。城市综合竞争力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综合服务能力；二是综合发展环境；三是综合创新能力；四是综合管理能力；五是市民综合素质。^① 这一新的发展观明确表明它对武汉这座华中地区特大中心城市，是有着启发和借鉴意义的。武汉同全国其他城市相比，其自身优势是十分明显的，如区位、市场、科技等，要将这些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并最终转化为城市的竞争能力和综合实力，根本途径是全面创新。制约武汉市综合竞争实力的主导因素是创新不足。具体说来在城市发展战略定位，经济、社区管理体制，政府行政体制，对内对外开放等方面，缺乏自主的、可持续的创新性的改革与改进。由此导致对周边地区的辐射能力、综合竞争力和整合力提升不快，阻碍了现代化发展进程。

以质取胜、提高城市发展质量为战略思想，以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为目标应当贯穿武汉现代化过程的始终。特别是 21 世纪，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即迈向第三步战略目标，实现从小康向现代化过渡，人均收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更要以此为指导制定科学的发展策略，重点解决经济现代化、社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人的素质现代化各个系统中存在的问题，促进整个系统健康协调的发展，争取成为走有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的一个典型，超过上海，赶上发达国家。

1. 经济现代化问题

新的发展阶段，要搞好城市各方面的工作，而搞好经济是第一位的，它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人的素质现代化的物质基础。新的发展阶段经济方面有四个特点^②：经济进入协调、稳定、持续发展；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经济运行机制进一步市场化，服务领域的市场化进程进一步加快；经济运行进一步国际化。明确了 21 世纪武汉市经济发展将要面临的新形势，更加有利于对整个经济现

^① 《聚焦武汉新世纪发展观：城市综合竞争力》，《学习与实践》，2001 年第 2 期。

^② 王守海：《加快科技进步，扩大对外开放，实现武汉国民经济整体起飞》，《长江日报》2000 年 3 月 22 日第 3 版。

代化的各个环节进行统筹规划,制定更有效的发展对策。根据武汉的实际情况,在新阶段武汉市经济现代化主要要解决好工业现代化问题、农业现代化问题、产业结构优化问题、经济国际化问题。

(1) 工业现代化问题。在现代化进程中,工业化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或必经阶段。经过几十年的工业建设,武汉市在原有基础上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初期工业化和中期工业化的历史任务。目前武汉市已具备了向工业现代化进军的条件,但仍存在一些不足:布局比较分散,企业集团的规模不够大;资金、技术密集型企业渐次增多,但劳动密集型企业还占较大比重;资金供给不足;缺乏对结构调整具有带动作用的龙头企业;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高;国有企业扭亏脱困进展缓慢,企业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不完善,企业社会职能分离难。鉴于此,我们认为实现武汉工业现代化的主要途径在于:第一,增加科技投入,全面落实“科技兴市”市策,依靠科技进步,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化进程;第二,抓好重点项目,提高重点产品的市场占有率、营销规模等;第三,在加强硬环境建设的同时,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建设现代化的路网、水网、电网、通讯网仍是硬环境建设的重点;软环境上主要是培植真正公平竞争的市场,最首要的是政府退出竞争性市场,政府权力不干预市场竞争,政府权力让位于市场权力;第四,重塑国企改革的动力主体。必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行政企分开,企业直接面对市场变化,承担市场压力和风险;建立和完善经营者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把经营者对追求超额产品或价值的努力建立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要赢得职工对改革的认可和支持;第五,重视培育和适当引进跨世纪的人才,认真落实“科教兴市”、“科教兴工”的战略方针。

(2) 农业现代化问题。武汉地区的农业,同样有较好的条件和基础,农业劳动生产率稳步增长。但是农业的机械化和科学化水平不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仍然不高;农业的基础还相对薄弱,水利等设施老化,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不强;由于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始终存在,影响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在“以工补农”、“以工建农”的推动下,仍不免有个别地方的耕作水平下降和相对的粗放经营,以致从总体看,“二元结构”现象未有根本改变。武汉农业现代化仍然是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入,既要运用市场机制,又要给以宏观调控和政策推动。具体地说,就是要坚持不懈地开展农业和农业现代化重要意义的宣传教育,反对重工轻农思想,强化全民的农业意识;加强土地管理,保护基本农田,抓好农田复垦,力争做到人增地不减;坚持抓农村的劳动力开发和转移,对农民流动要积极鼓励,加强组织引导,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强对外出打工农民的技术培训,增强技能和适应能力,要解决好外出打工农民家庭的实际困难,解除后顾之忧;从培育和推广良种、改进耕作制度和栽培方法直至完善农田设施,实现农业机械化等,都要有实行先进技术的规划、政策和办法并付诸实施;多渠道地增加对农业的投入,既要扶植农户的自我积累能力,又要在财政、金融上强化倾斜,并引导社会资金和利用外

资；重视农业技术教育，培育包括农民企业家在内的农业人才，提高专业农业服务人员水平，试行“绿色证书”制度。

（3）产业结构优化问题。产业结构的优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随着经济的发展，武汉的产业结构也不断演进，但是第三产业比重仍不高，并且三次产业的技术含量都不高；地区之间的结构趋同未得到真正扭转，一些前景看好的产品还在一哄而起，组织程度较差，浪费了大量的人财物力。解决这些问题一定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发展第三产业要有规划，重点在金融、运输等流通产业，教科文产业和信息咨询等新兴产业以及为生活服务的薄弱产业；一般的零售商业和高档服务产业如宾馆、娱乐场所等要防止畸形发展；第二，加快第三产业发展，提高武汉服务业发展水平及能力；第三，调整三次产业结构的目标也是实现现代化，要有兴有汰，贵在改造、提高，不宜一味地铺新摊子。

（4）经济国际化问题。现代化必然是开放的，在过去两年，武汉市在对外开放上，已更上一层楼，特别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武汉扩大对外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充分利用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加快经济发展提供了新机遇。如何抓住机遇，进一步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开发格局，一定要做好以下几点：其一，加强投资环境建设，提高办事效率和服务水平。在进一步改善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硬环境的同时，提高政策、法制服务等软环境建设，确保投资软环境的稳定。其二，千方百计地利用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水平。重点引进国际知名的公司和品牌，积极推进服务领域的对外开放，优化外商投资结构，注重利用外资改造传统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其三，优化银行体系，若武汉市能够尽快提升银行的服务素质，并对外商的融资采取更宽松的政策，可吸引更多外商前来投资；其四，抓紧建立一支国际型的人才队伍，这对武汉经济国际化能否实现以及推进现代化有决定性作用。

2. 社会现代化问题

社会现代化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可以反作用于经济现代化，并且是人的现代化的现实基础。目前，武汉社会现代化各子领域中主要有城市化问题、人民的生活质量问题、环境问题亟待解决。

（1）城市化问题。城市化关系到城市和乡村、人口的分布和再分布、社会物质存量的变动、社区结构的变动等问题，并对现代化进程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武汉市城市人口所占比例迅速增加，城市规模也不断扩大。但是，城市人口迅速增加，给城市建设带来太大压力，同时造成农业经济活动人口缺乏，农村科技人员流失，反过来成为制约城市进一步发展的因素。对武汉当前城市化迅速发展的形势，应该冷静、全面地分析，以下几点为指导武汉城市化建设有参考价值。其一，不能以牺牲农业发展而片面追求城市化。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片面、高速度的城市化，

不仅严重阻碍了农业的发展,而且最终也削弱工业城市化进一步发展的后劲。因此,必须坚持优先发展农业,保证粮食自给,并以此为指导有计划地、合理地发展城市化。其二,防止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和高文化素质者过度转移而造成农业劳动力素质蜕化。在城市化过程中,必须控制农村人口外流的规模、结构,有效地解决农村外流劳动人口的质量倾斜度过大的问题。其三,引导离农人口向城镇定居。这不仅有利于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也有利于农民向市民转化,提高其素质,改善其生活,还有利于促进农业的规模经营,有利于计划生育。其四,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解决城市负荷过重问题。其五,加强对城镇建设的规划。一方面,在宏观上制定科学的区域规划,确定各个城镇的功能定位和发展目标,达到合理布局、相互协同、防止盲目性和随意性,另一方面,在微观上要制定各类城镇自身的规划,使城镇内部也有合理布局,防止散乱。

(2) 人民的生活质量问题。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不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这也正好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现代化发展战略。目前,武汉市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正在迅速提高,但是消费结构不太合理,并且城乡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差别较大;由于旧观念的泛起,由于消费者素质不高,还存在着浪费性、愚昧性消费。要解决以上问题,需从以下方面着手:其一,加强理论、舆论和政策的引导,广泛开展生活、消费知识的宣传、普及、咨询和维权活动,帮助人们形成健康、文明、科学的生活方式以及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消费模式,反对和消除各种不良现象。其二,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调整收入分配政策。要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定额发放,着力改善低收入群体的生活。在农村也必须千方百计增强农民收入,加快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其三,改善生活环境,提高生活质量。除物质生活外,着重于文化生活,包括提高城乡居民的思想境界、道德修养和娱乐档次等,构造一个健康向上的生活环境。其四,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拓展社会保障的范围和领域,建立起广覆盖、高层次、低费用、有保障的新型保障体系,使保障制度走向社会化、规范化和现代化。

(3) 环境问题。环境问题是当今世界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武汉实现现代化不能绕过而必须解决的问题。要彻底根治环境污染问题是要动大手笔的,不仅要有雄厚的资金,而且要有政策、法律出面干预。要使武汉成为一片热土,一片净土,一片乐土,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第一,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将环保融入经济发展浪潮中,发挥其促进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作用。第二,行政、经济、法制三种手段同时利用,但以法制为本。行政手段在环境管理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经济手段是市场经济下环保的有效措施,而法制手段是最根本、最有力、最稳固的环境保护的武器和法宝。因此,必须加强环保立法,改善环保执法环境,改进环保执法监督。第三,保护环境要还清旧债,不欠新债,对新扩建项目要坚持“三

同时”，对遗留的大量问题要作出规划，分期解决。有的企业污染严重并且难治，要坚持转产或关闭。

3. 科技现代化问题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已逐渐深入人心，科技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也已被大多数政策制定者接受。武汉地区科技事业稳步发展、科技实力不断增强、高新技术产业迅猛发展、科学研究进展良好的事实已证明了这一点。但要在全民中形成一个重视科技工作、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注重创新的氛围，加强技术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真正做到“科教兴汉”，提高科技贡献率，首先要加快教育现代化进程。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离不开教育现代化，培养创新型人才也离不开现代化的教育，教育现代化不仅是现代化的内涵，更是保证现代化的重要因素。现代化的教育必须树立全新的观念，即现代化教育要培养创新人才，才能满足现代化发展的要求。基础教育必须营造一个有利于创新思维发展的环境，学校尽力营造讨论的良好学习环境；进一步开门办学，让优秀人员到学校兼职，增加优质教师的数量；实施宽基础、宽专业教育，办一批文理学院，努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精神。科技现代化不仅要求教育现代化，还要注重加大对科研和技术开发的投入，促进科学技术的产业化、市场化。武汉科技现代化一定要以“武汉·中国光谷”建设为龙头，大力发展高科技工业产业，加快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加强“两区多园”建设，加强科技队伍建设，建立和完善科技投资融资机制。

4. 人的素质现代化

现代化不仅是物质文明，还有精神文明，其目的和标准是塑造一代有现代化素质和观念的新人，即实现人的素质现代化。人的素质现代化是任何国家、任何地区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目标。武汉地区在过去几十年的改革发展中，在抓经济建设的同时，也注重人的全面发展，改善医疗卫生条件，大力发展教育文化，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但是人的整体素质仍然不是很高。要提高武汉人的素质，培养具有现代化观念的新人，首先要以现代意识武装城乡居民。一定要采取多种方式，逐步树立起一些新观念，诸如主人翁观念、市场经济观念、创新观念、人才观念、争先观念、效益观念、资源保护观念、加速发展和持续发展观念^①。其次是加强主体责任意识、竞争意识建设。

在培养新观念和新意识的同时，也要加强主体能力建设。即增强主体的智力、体力、意志品质力并促使其组合，协调地全面发展。在现代化进程中加强现代化主

^① 黄智英：《论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的主体性建设》，《漳州师院学报》1994年第1期第46～50页。

体的能力建设必须重视科学在生产中的作用，促使技术、工艺不断进步，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要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

余论：新世纪武汉展望

城市化是一个历史的必然进程。根据前此学者对 1800 年以来世界城市化进程的分析，我们可以知晓：1800 年世界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 3.0%，此后，从 1800～1900 年的 100 年间，世界城市人口从 2 930 万人增加到 2.24 亿人，占世界人口的 13.6%；从 1900～1950 年的 50 年间，世界城市人口从 2.24 亿人增加到 7.06 亿人。1950 年以后，世界城市化进入加速推进阶段，1970 年，世界城市人口接近 14 亿，1980 年为 17.49 亿，1994 年为 25.31 亿，2000 年则超过 30 亿。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城市人口已占世界总人口的半数左右。与城市化进程相一致，大城市迅速发展。以 1 000 万人以上的大城市而言，1950 年只有 1 座，到 1990 年，已增加到 12 座。以 500 万人至 1 000 万人的大城市而言，1950 年只有 7 座，1990 年增加到 21 座。以 100 万人至 500 万人的大城市而言，1950 年只有 75 座，1990 年增加到 249 座。而且，根据专家预测，在未来 20 年间，大城市的迅速发展态势还将持续。^①

城市化是现代化的标志之一，而大城市的迅速发展又是一个地区或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标示，必然出现以大城市为核心的区域经济圈或城市经济带。区域经济圈或城市经济带的形成，势必提高大城市的综合能力，使其在国家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发展中占有更加重要的地位。

武汉是我国重要的区域性特大中心城市，在我国的城市经济体系和以大城市为核心的区域经济圈中，具有突出的地位。明清时代以来，武汉就是著名的商业重镇，汉口开埠以来以及张之洞督鄂时期，武汉成为重要的对外开放城市，走在我国早期现代化城市的前列。改革开放以来，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武汉又有新的发展。1980 年，国家正式批准武汉港为对外开放口岸，拉开了新时期武汉对外开放的序幕。1992 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后，我国对外开放的地域迅速由沿海向内地推进，国家批准武汉为对外开放城市，武汉的经济发展也进入了又一个快速发展时期。1999 年，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在调查和评价武汉的投资环境时认为，武汉是迈向中国中西部大市场的桥头堡，是中国西部的商贸中心、金融中心和科技信息中心。目前，

^① 参见高汝熹、罗明义：《城市圈域经济论》，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83—189 页。

在全国 221 个地级以上城市中，武汉的综合经济实力居第 6 位^①。

事实上，早在 1919 年，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已预示武汉将成为世界最大都市之一，认为“武汉将来立计划，必须定一规模，略如纽约、伦敦之大”。1998 年，美国未来学家麦金利·康韦在《未来学杂志》上撰文，认为武汉区位优势明显，淡水资源丰富，腹地市场广阔，科教实力雄厚，因此，把武汉列为 21 世纪全球的 10 个“超级城市”之一。由于武汉的区位优势和已经具备的条件，武汉在新的世纪中建成世界最大都市或超级城市之一，似乎没有疑问。关键是如何抓住机遇、如何发挥优势和如何定位。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以来，武汉市政府及一部分学者就十分关心武汉市的发展与战略定位，多次开展武汉市战略定位的大讨论，先后有“交通与流通两通起飞”说、“工业主体起飞”说、“科技与开放两翼起飞”说、“科教立市”说，等等。各种说法都有其合理的成分，为武汉市的发展和战略定位作出了贡献，但也有其片面性。

笔者在参加 2000 年 9 月召开的“21 世纪湖北暨武汉教授论坛”以及 2000 年 10 月召开的“武汉市人民政府国际咨询顾问团第二次会议”时，撰文认为，武汉的优势是在历史的发展中形成的，其优势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一是区位优势，二是水资源优势，三是交通优势，四是商贸优势，五是科教优势。武汉在 21 世纪的发展定位，应该充分考虑已有的优势和潜在的优势，以“五个中心，全面发展”为指向。五个中心即：交通中心，商贸金融中心，科教中心，信息中心，工业中心。这五个中心是武汉建设国际性特大都市的重要支撑，缺一不可。但是，作为现代化的城市，只靠这些“中心”还不够，还必须有环境、市政、文化、人的素质的全面发展^②。

上揭 2000 年 9 月和 10 月的两次重要会议，主要在于论证 21 世纪武汉的发展战略与对策，是关乎武汉战略定位的最集中的讨论。在这两次会议上，国内外专家已经形成了许多共识。

2001 年 1 月召开的武汉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武汉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将“五大产业基地”和“五大功能中心”作为新世纪最初几年的发展目标。此后，又经过进一步的酝酿和论证，正式形成了“五大产业基地”和“五大功能中心”的规划方案和相关咨询论证报告。五大产业基地是：钢材及新材料基地、光电子信息产业基地、现代制造业基地、生物技术及

① 参见王守海：《迈向 21 世纪的武汉——发展定位与战略》，见《新世纪的武汉：发展战略与对策》，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5 页。

② 参见陈锋：《武汉国际性城市的发展历程与前瞻》，见《新世纪的武汉：发展战略与对策》，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49 页。

新医药产业基地、环保产业基地；五大功能中心是：华中科教中心、华中金融商贸中心、华中物流中心、华中旅游目的地和集散中心、华中信息中心。

各个产业基地和各个功能中心都有具体的规划方案，如《华中物流中心总体规划研究》称：华中物流中心的发展总体构想是，依托武汉市在华中经济区域的中心城市特殊地位，以武汉为华中物流中心的核⼼，以武汉及周边城市物流基础设施与物流企业为基础，以国家综合运输网络现代化为主干依托，构筑四重物流服务时域圈和四大物流服务主渠道，形成我国华中地区物流发展与运作的“双四”架构。所谓的“四重物流时域圈”，一是指区域配送物流圈。构筑以物流基地——物流中心——配送中心为依托，面向武汉市区重要产业基地、商品集散地、城市消费功能区的1小时区域配送物流圈。二是指分拨及终端配送物流圈。构筑以武汉为中心，以武汉市及省内周边地市物流设施为依托，面向武汉及周边城市的12小时分拨及终端配送物流圈。三是指区域分拨与中心城市终端配送物流圈。构筑以武汉为中心，以湖北省内重要物流设施为依托，面向武汉及其他华中经济中心城市的48小时干线区域分拨与中心城市终端配送物流圈。四是指国际终端配送物流圈。根据服务需要与市场发展，在上述三重物流圈的基础上，依托国家及跨国民用航空系统，构筑以武汉为中心，以武汉及国内各主要经济中心城市的重要物流设施为支持，面向远东、东南亚及欧美地区的72小时国际中心城市终端配送物流圈。所谓“四大物流服务主渠道”，是指长江水运物流通道、铁路干线物流通道、高速公路干线物流通道和航空干线快速物流通道^①。就我们所看到的各种规划方案及相关专家的咨询论证来看，都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及可行性。

“五大产业基地”和“五大功能中心”的出台，意味着武汉近期发展目标确定。如果切实执行，武汉在21世纪必将有新的快速发展。

在这里我们需要进一步指出的，尚有以下数点：

第一，与“五大产业基地”和“五大功能中心”的规划方案相配套，还应该有相应的措施。这包括了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管理体制的创新、政府职能的转变、政策环境与生态环境的改善、人才的培养与引进、科技的创新与转化、资源的配置与财力的分配、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产业结构的调整、名牌企业与名牌产品的创立与保持、利益关系的协调、区域合作的运行、开放力度的加强等等方面。在这些方面，都应该有细化的措施和政策指标。有关领导也已有所考虑，如前揭王守海的文章在谈到“实施人才工程”时即指出：“为了实现21世纪武汉经济的起飞，我们必须把人力资源开发当作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来抓，通过大力实施人才工程，构筑21世纪武汉的人力资源高地。实施人才工程的核心是吸引、培养、发展和保留。要建立顺畅的沟通、协作机制，加大力度开发利用武汉地区丰富的人力资源；要采

^① 参见武汉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编：《咨询论证》2001年第12期。内部文稿。

取特殊政策，面向国内外引进各类急需人才，用好国际国内两种人才资源；要创设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人才工作环境，创造优美舒适的人才生活环境，改进激励与分配制度，保证高智力人才和对社会贡献大的人才引得进、用得着、干得好、留得住；要调整我市的教育结构，大力发展各种形式的职业教育，进一步提高我市产业队伍的整体素质。”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五大产业基地”和“五大功能中心”已经有了年度计划实施方案，这是一个好的开端。但是，不可忽视的是，我们还必须及时跟踪实施过程，使其有序的落实、健康的发展。

第二，近期目标要与长远目标相结合。就武汉的近期目标而言，五大产业基地和五大功能中心的形成，要有缓有急、有主有次，分步实施。有的产业基地和功能中心可能会在近期建成，有的受制于各方面的条件，有可能相对滞后。另外，我们也注意到，五大功能中心的提法，都用了“华中”的限定词，这既意味着五大功能中心具有地域性特征，也意味着现阶段和近一个时期，武汉的地位还不能与上海等国内发达城市相比，认识是清醒的。但是，既是华中的中心，在各种指标上，就应该位居华中的第一，至少位居前列。所以，对一些不足的指标，要加快弥补的速度。就武汉的长远目标而言，在“华中”中心的基点上，希望渐次进展为中国的中心、亚洲的中心、世界的中心。虽然不太可能五大中心都能齐头并进，但基于武汉的优势，有些中心的渐次进展则是有望实现的。也只有这样，武汉才能发展为国际性大都市或世界超级城市。笔者在《香港的现代化与启示》一文中认为，20世纪60年代末期，香港成为亚洲地区的轻工业制造中心，到20世纪80年代，“香港已形成以贸易、金融、制造业、航运业、房地产业、旅游业等六大行业为支柱的多元经济结构，并形成了多个区域性和国际性中心，即：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旅游中心、信息中心、轻工业制造中心。香港也由此成为繁荣的世界性大都会”。如果从20世纪50年代香港的轻工业开始起步计算，其成为亚洲的轻工业制造中心，用了不到20年时间，到20世纪80年代形成多个区域性和国际性中心，也就短短的几十年。所以，有一个长远的目标是必须的。

第三，要注意到武汉的整体发展。五大产业基地和五大功能中心的确定，只能说是武汉建设国际性大都市的初衷，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有许多条件，需要整体的发展。美国未来学家麦金利·康韦在论述国际性大都市时就给出了10个条件：（1）水和能源，（2）国际机场，（3）市内外交通，（4）一流的城市硬件，（5）科技中心，（6）通讯中心，（7）公共交通，（8）垃圾处理，（9）绿色场所，（10）新政治体制。这些条件无疑是值得注意的（但也不一定完全囿于这些条件）。有些条件武汉已经具备，有些则需要进一步改善或创造。比如说武汉的自然环境，武汉的环境是得天独厚的，有山有水，有江有湖，关键是要把环境的绿化、净化放在重要的位置。对东湖等市内湖泊的治理尤其要放在首位。有一个清澈的湖泊，将会是一番怎样的感觉！当笔者漫步在碧波荡漾的日本的琵琶湖畔时，不仅仅是旅游的愉

悦，还有对现代化的感悟。再比如说武汉的城市建设，武汉的城市建设已有一定的水准，关键是要有统一的、长远的规划，并体现出武汉的沿江、滨湖特色以及各个行政区的历史沿袭、发展特色相吻合。这既有建筑规划问题，也有建筑风格问题。又比如说武汉的文化，武汉的文化有深厚的底蕴，楚风汉韵源远流长，也有近世的辉煌，辛亥首义令人称道，关键是进一步发掘和弘扬，并使其在一些公共场所、城市雕塑及标志性建筑上得到表征化体现。

我们希望，新的世纪武汉有新的发展，在把武汉建设成为一个国际性特大都市的同时，也把武汉建设成为一个特色独具的城市。

附录：国外学者笔下的汉口

汉 口

按：本文译自菲尔德维克：《现时远东印象及在国内外都有名的人》，环球百科出版公司 1917 年版。

汉口是扬子江上的一个开放口岸。位于湖北省汉水和扬子江的会合处，下距九江口 132 英里，距黄浦江的江口吴淞 570 英里，距东海 600 英里。它是两个相邻城市——汉阳和武昌的商业中心。武昌是省政府所在地，汉阳则存在有兵工厂。

汉口的地理位置靠近中国的中心。从东海至汉口 600 英里江段，有四季航行的便利。吃水 8 英尺以下的轮船一年四季可以航行，吃水 29 英尺的轮船，在夏天涨水季节，也可以航行到汉口，这就给汉口带来商业上的价值，并迅速地为到华中地区进行贸易的欧洲人士所认识到，由于它位于汉水入江之口，这个价值更是加大了。汉水可航行里程为 300 英里。汉口码头区域，若以江岸下 12 英尺的沙洲算起，上至武昌江岸下 18 英尺为止，其长度为 5 英里，至汉水入江口为 2.5 英里。

过去，汉口地区隶属各个州县，三国时期，这里是荆州辖区，当时荆州为魏、蜀、吴三国分据着。武昌和附近地区为吴孙权所有，武昌城成为这个新兴王国的首都，从那时起武昌一直保持着一个重要地位。唐朝（618～915 年）称它为鄂州。元朝为湖广行省治所，辖今湖北、湖南、广东和广西四省。明朝仍之，但辖区仅为湖北和湖南两省。汉口，虽然在 1861 年对外通商以前，早已取得了四大名镇之一的地位，但却仍然是一个为人所忽视的渔业之乡。现在汉口兴旺的日子终于来到了，它不仅超过了镇江、南京和芜湖这些旧日条约规定的开放港口，而且超过武昌这个省会城市，成为上海的巨大对手。

从 1911 年革命，两个革命者在汉口俄租界被捕并及时惩处以来，汉口，还有武昌和汉阳获得了新的、突出的地位，这件事导致了武昌首义的发生，导致了以黎

元洪为首的民军与清帝国之间的、在汉口和汉阳发生的残酷战斗，经过这场战争，汉口老区几乎全都毁灭掉了。三镇共有人口 115 万（汉口 80 万、武昌 25 万、汉阳 10 万）。根据 1913 年官方统计，汉口的欧洲居民有 1 495 人（英国 508 人，德国 347 人，美国 140 人，法国 72 人，还有挪威、意大利、瑞典、俄国、葡萄牙和西班牙人）。同时，根据 1914 年的统计，日本国有欧洲居民 1 502 人。

1914 年末，估计 80% 被烧毁了的房屋得到重建，不幸的是汉口旧区现代化计划，由于经费困难未能实现，另外，市区扩大发展的计划，由于政府的支持，已经开始了，如果能从战后欧洲获得资金，当会有成功的希望。

1916 年 7 月，骚乱者烧毁了邻近租界的数百间土著人的房屋，他们的财产受到严重的破坏，估计值一百万两。

租 界

汉口以北、沿江左岸是外国人租界区。英租界长 800 码，宽 300 码；接着的是俄租界，俄租界长 600 码，宽 300 码；它下面是法租界，法租界长 500 码，接下来是德租界，德租界长 1 000 码；最后是日租界，日租界长 800 码。英租界布置整洁，道路宽阔，林荫成行。英国教堂经过重建，于 1904 年开始了宗教活动。有一个大的罗马天主教教堂，也有新教教会及希腊东正教教堂。俄国人所有的几个砖茶厂都在租界。各国都设有工部局，沿江大道把各国的租界连接起来，成为人们骑马散步的美好地方。所有租界都有营业和昌盛的迹象。现在的情况显示汉口的将来是有光彩的。

交 通

汉口至上海有 8 条船，大多是英国的，排水量为 500~1 000 吨，汉口至宜昌有定期汽轮航行。夏季涨水的时候，从汉口至长沙，通过湘江，也有汽轮往返。

汉口至北京有铁路联系，铁路全长 750 英里。普通车 60 小时可以到，快车只需 36 小时，汉口的主要火车站位于汉口下 3 英里的江岸，另外为旅客设立了两个站：一个位于租界后面，另一个在汉水。现在，旅客通过西伯利亚铁路，16 天便可以到伦敦。最近几年，京汉铁路已经成为外国人在汉利益巨大增长的主要因素。修筑合同于 1897 年赋予比利时辛迪加办理，1905 年通车至黄河南岸。在粤汉路修筑完工以前，本路成了联系广州至九龙线、通过西伯利亚到欧洲大陆的链条。粤汉铁路完成以后，一定还会带来远远超出汉口本身利益的巨大成果。

气候与保健

汉口气候干燥，夏天很热，热天可以持续到9月中旬，从那以后至12月转为宜人的好天气，那时气温逐渐下降，到元月份为止，气温降到冰点以下。年平均雨量为49英寸。2至3月份，一般为梅雨季节，10和11月份是全年中最好的日子，这时，空气比任何时候都干燥。

居住在汉口必须采取足够的预防措施，以对付气温的急剧变化，保持健康的生活环境；否则，这里会是影响人体健康的坏地方。本市现有一个现代化的供水系统，它完成于1912年，只供应租界区，老区居民仍然用江水，富有者则施以净化措施后再饮用。租界内有完善的排水系统，老区则不如此，排水系统很差。

工 业

由湖广总督张之洞建设的纺纱厂是1892年投产的。汉阳铁厂已发展成为一个大型的重要企业，雇有3500名职工，大量的铁矿石由大冶铁矿生产供应。一个新的矿坑还在该处建设中。1895年武昌造币厂成立，近年来还得到相当大的扩充，麻适应面不断发展需要。除铁港和铜矿建设起来了。武昌有锡铝锌矿机器破碎

厂，供应出口。火柴厂、蛋白制造厂进行着大规模的贸易。这里还有贮藏大量油脂的贮油罐，经营冰冻猪肉、鲜蛋、家禽和野味的出口。茶叶是这里的大宗出口商品，占全国出口总量的1/6。

娱 乐

汉口西商跑马场（Hankow Race Club and Recreation Ground）是1904年建成的。从那时以来已有了巨大的发展，现有会员300人，拥有最完善的设备，有一条跑道，18洞高尔夫球场、足球场、网球场、游泳池——实际上会员们通常酷爱的各项运动设施这里都有。除这个主要从事运动的俱乐部外，这里还有汉口俱乐部、俄国俱乐部、德国俱乐部以及其他国家的俱乐部等等。大多数俱乐部都有壮丽的图书馆、弹子房等。汉口高尔夫球俱乐部建立于1878年，为本港最早的俱乐部，拥有会员100人。这里还有一个跑道良好的华商跑马场，比赛是按照西商跑马场的规则进行的，并且完全由中国人经营。

武昌与汉阳

武昌为湖北省省会，前面曾经提到过，它位于扬子江右岸。在蛇山的西北端有黄鹤楼，这是一座大的庙堂，和对岸的晴川阁相似，这两个庄严的建筑物隔江相望，相距约 2 里，武昌最繁盛的区域在蛇山和花园山脚下，即城区的西南部。这里有张之洞建立的著名的商品博物馆，还有许多好的公共建筑如：省政府、兵营和学校，同样，也有为数众多的教会和教堂。

紧靠汉水右岸和龟山北麓的就是著名的汉阳钢铁厂、兵工厂和火药厂。山之西北有月湖，山之南方顶上能俯望宏伟的扬子江和对岸的武昌城，这里有著名的晴川阁。龟山的西南脚下就是有 10 万人口的汉阳城，向西更远一些的是鹦鹉洲。

银 行

[汇丰银行] 汇丰银行汉口支行是租界第一个连续不断地建设的银行。其他银行虽然在它以前开业，但是经理人经常变动。该行也是总行在中国最早开设的分支机构之一。或许是由于汉行地位重要，关系着广大的利益，汉行开设不久，杰克逊·杰克逊·伯德爵士即被任命为经理，而且在位了一段时间，只是后来，由于他表现出明显的理财能力，才升迁到较大的工作岗位去了。

汉口支行位于英租界沿江大道的一幢大楼里。该行新址即将完工，不久可交付使用。新址空间为旧址的两倍，除银行用房外，还包括上层的经理室，大型的中国人员办公室、会计室以及少年食堂。该行除经营通常的业务外，以其中英公司代表人的资格，还执行某些中英双方政府间有关财政方面的重要谈判。辛亥首义期间，它是坚持对外开放的惟一的银行。当时到银行来的顾客是要冒很大的危险的，因为除了大量的流弹外，沿江一带还有相当数量的狙击事件发生。经理胡顿先生有一个狭窄的避弹室，但是，一个炮弹穿过他的更衣室的窗门，打碎了浴室和两扇门，没有打中他，并且炮弹没有爆炸。

汉口支行的现任经理为加德勒先生，会计为瓦特先生，职工全部是志愿兵团的成员，他们随时随地表露出组织观念。

[汇理银行] 总办公处：巴黎拉菲特街 15 号；汉口办事处：汉口法租界沿江大道。

汇理银行是 1875 年法国政府为了资助法属印度支那和远东的法属工商企业所颁布的法令而设立的，同时赋予它在法属殖民地和印度支那保护国、大洋洲等地发行钞票的专门权利。原来资本总额是 8 000 000 法郎，共 16 000 股，每股发行额为 500 法郎，已缴 125 法郎，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企业经营有了成绩，资本逐步提高：

1888年为12 000 000法郎，共8 000股，每股发行额为575法郎；1900年为24 000 000法郎，共24 000股，每股发行额为675法郎；1906年为36 000 000法郎，共24 000股，每股发行额为1 000法郎；1910年为48 000 000法郎，共24 000股，每股发行额为1 200法郎。1914～1915年红利：股金500法郎的为551法郎（其中125法郎已付）。储备金保持在48 632 000法郎。

该行有19个支行，分布地点是：曼谷、马德望、广州、吉布提、本地治里、海防、汉口、河内、香港、门寨、努美阿、北京、帕皮提、金边、西贡、上海、天津、新加坡和岷港，同时，在世界各地设有通讯员。

汉口支行开业于1902年，它的专门作用在于代表法国在汉利益，办公处设在法租界沿江大道。经理是特鲁雷特先生，他也是义品放款银行的负责人，出纳是哈利先生。叶斯肯德先生和泼雷德先生的两名职工于1914年被动员赴前线作战，不幸牺牲。

〔台湾银行〕早在1897年的时候，台湾的经济情况是很悲惨的。信用制度是非常原始的，由于货币成色不足，加上日本来的货币，因此，台湾的货币状况很混乱，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日本政府在1897年3月颁布了台湾银行法令，授权台湾银行发行纸币，并在需要时给予帮助，此外，又借给银行5年内的无息贷款日元2 000 000元，因此，银行在1899年9月26日开始营业。

台湾银行原有资本500万日元，后来增加到1 000万日元，共20万股，最近，即1915年资本增至2 000万日元，如果连同415万日元准备金和日本政府的支持加以考虑的话，很明显，该行是完全稳妥和可靠的。

除办理通常的银行业务以外，该行还担任管理金库基金和调节台湾金融工作的任务。世界各地几乎都有它的分支机构或代理人，总管理处设在台湾，伦敦支行位于旧布罗德街58号。

该行建立以后，金融流转的困难大为减轻，总利率也大为降低了。该行还用低息、大额贷款的办法，帮助台湾各个企业，以利发展，同时用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的办法，促进与支持台湾工业向国外扩展。

一个非常重要的分行就是汉口分行，它的建立相当大地促进了台湾工业向中国内陆的发展，汉口分行经理为T.Kusakari君，他很有能力，在本市银行界中享有突出的地位。

〔横滨正金银行〕日本首要的金融机构。它建立于1890年，总行设在横滨，注册资本为48 000 000日元，其中30 000 000日元已缴清，而准备金高达20 400 000日元，分支机构不下28个，代理则遍布亚、欧、美三洲。

在汉口，由于日本社区迅速发展，重要性日益显露出来，所以，在汉口设立一个分行是不足为奇的。汉口分行开业于1907年，办事处设于英租界，屋宇非常壮观，自有主权，与沿江大道一带配合得十分和谐。

分行办理所有银行业务，汇票可以在日本、朝鲜、台湾、中国和印度的主要地点、欧美等国的主要商业中心兑换和使用。

该分行经理水津先生，有多年的实际经验。应该特别提到的是他在纽约和上海分行工作过，有经验。他雇有几个日本人和许多中国人以协助他的工作。

建筑工程业

[英商通和有限公司] 上海通和有限公司汉口支公司成立于 1898 年 3 月，事务所设在宝善路，英国总领事馆对面，曾主持过汉口和临近地区一些重要建筑物的设计与监督工作，如七里河政府造纸厂，这可能是中国最大的造纸厂；黄石湖北水泥厂；已故湖广总督张之洞设立的武昌造纸厂、裕大洋行、宝顺洋行；兴立特许银行；中国银行；维纳斯保险公司事务所和湖北路剧场。

[景明洋行] 1910 年成立，历史很短却后来居上，在汉口建筑业中占据了领导地位，曾负责建筑过许多大型的现代化建筑物，又精于最新的施工方法，钢筋混凝土就是由它首先介绍到汉口来的，此法的应用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因而迅速地为公司赢得了巨大的声誉。

在它已完成的事业中，可提到的有：保安大楼，平和货栈，辉记洋行新货栈，顺丰茶厂，英亚货栈，日清轮船公司货栈以及汉口药房，同时还为个人盖了许多住宅。

景明洋行的建筑式样和施工方法都是优秀的，吸引了汉口的人士极大的注意，它被任命为英俄两国工部局建筑物的检查员。它现在位于英租界的华昌街上的宏大的六层楼新址即将完工，它是由钢筋混凝土建筑起来的汉口最高的建筑物，是它优秀建筑技术的典型例证。

工 商 业

[英商公会] 早在欧战开始以前，外国人在汉的贸易、商业、运输业等的促进工作是由一个称作“总商会”的国际性协会所担任。该会实际上是由所有在汉的外国商社共同组织的，每个商社都是会员，共有 56 个商社，即有 56 个会员。全会一年召开一次，全会下分进口、出口、航运和银行各组，它们也是一年开会一次。

战事带来的结果，必然是拥有大量德国会员的总商会不利于英国贸易的要求。有鉴于此，英国驻汉总领事福克斯先生迅速地召集了一个英国商人的会议，讨论应当采取的措施，以维护英国商人的贸易利益，以及为了利用当时的机会，为英国在本港取得新的贸易门路，而组织英商公会或其他适当的组织形式问题进行商讨。

这次会议是 1914 年 11 月 10 日在英国总领事馆举行的。会上一致决定组织

“英商公会”，并通知所有的英商公会和商务局，还要英国驻汉总领事照会中国当局，说明本会的成立，并得到了英国政府的充分支持。旧总商会于1915年2月28日解散，过去发表多年的每周统计由英商公会继续编辑发表。这个公会的诞生，汉口的英国商人起到了带头作用，为在中国各地建立英国商会树立了榜样。公会的目的不仅是促进英国贸易、商业和运输业的发展，而且为解决贸易以外的问题所引起的争端起仲裁作用。

现在英商公会委员会由下列人士所组成：连利洋行弗塞先生（主席），伯特威尔先生，天祥洋行杜勃雷先生，怡和洋行加登勒先生，汇丰银行杰克逊先生，泰和洋行沙恩德先生，哈斯登先生任秘书。委员会现在的工作是组织一所教授中国官话的语言学校。

英商公会现有31名英国工厂会员和16名协约国与中立国工厂会员。

[沙逊洋行] 在东方各地，没有一家商行像沙逊洋行一样具有广泛的声誉，这不仅是由于它建立的时间长，而且由于它所从事的活动性质多种多样。它的开拓历史很有趣：该行创建者沙逊先生1792年出生于巴格达，其父当时为美索不达米亚犹太人社区的首领。1832年来到孟买，开始经营鸦片和印度产品的贩卖，那时中国正走向对外通商的时期，因此派遣他的儿子来中国进行商务联系，很快地获得了一个稳固的立足点，特别是在鸦片贸易上。而当香港变成了英国殖民地的时候，沙逊的大本营便在那里建立起来了。

该行总事务所设在伦敦，而于曼彻斯特、加拿大、孟买、卡拉奇、香港、上海和汉口设立分行。在这些地方，沙逊不仅是贸易经纪人，而且是金融家和大地产所有者。

汉口沙逊洋行建于1909年，主要从事出口贸易。它拥有大型货栈和专门的现代化的豆类、种子等等机械处理设备，同时，有三名外籍助手和几名中国员工，现在的负责人为凯德先生。他是1910年从卡拉奇调来的。

[怡和洋行] 英国在远东最老最著名的商行是渣甸先生等经营的怡和洋行，渣氏是对中国进行贸易的先驱。自汉口改为对外开放港口之日起，怡和洋行就在那里建立起来了，从此，公司业务飞跃地发展，扩大了贸易往来，增加了贸易设备，如今已是租界上的最重要的贸易商行。作为进出口商、运输业和保险业来说，怡和都占据着首要的地位，在刺激、增进英国的商业利益方面占有头等地位。英国商业对于这个注目的商行欠下很多债务。

进口业：作为各种商品、布匹、机械以及普通制造物品的进口商来讲，由于怡和洋行的历史悠久，与当地商人有广泛的联系这些有利因素，因此，在进口业务方面同其他商行相比，占有一个比较优越的地位。

出口业：在怡和出口部经营的各种商品中，芝麻、皮革、茶叶、牛脂、油料、豆类、棉花等占据多数。牛脂处理能力在收获季节可达一万吨，而仓库的贮藏能力

则可达二万吨，这些仓库都有最现代化的设备，而且这些设备都是由长期工作于远东，有丰富经验的、熟练的欧洲籍人员操管着。

运输业：怡和洋行是印度支那轮船运输公司的总经理，有一个由 42 条船组成的船队，航行于中国、日本、菲律宾、东印度、海峡殖民地及印度等国的各个主要港口之间。直接经营扬子江运输的有 8 条船，其中 5 条船航行于上海和汉口之间，沿岸港口均可停靠，各港口平均一周有三次轮船开航，每条船的平均排水量为 3 000 吨，都是最现代化的轮船，乘务人员都由充分合格的欧洲籍人员担任。汉口到宜昌约 368 英里，也有类似于汉口到上海的轮船航行其间，不过船体较小，每周开航一次。也有轮船去长沙和常德。最近，新增加了吃水较浅的轮船，悬挂英国国旗，第一次从宜昌出发驶往重庆，这样就完成了包括沿江 1 400 英里各港口的航运任务。

怡和还经营海运。它代表加拿大太平洋服务公司，派遣最快速最漂亮的船只航行在太平洋上，和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相接，以横过加拿大本土；又派遣同样的轮船航行在大西洋上，去欧美各主要港口的客货运输均可在汉口办理手续。怡和还代表怡太轮船公司所有的希尔航线航行在苏伊士运河上，这些都是第一流的货轮，它们都是最新设计，有着各种现代化设备，能够运输各种货物并能保证迅速安全的船只。从各方面来说，这条航线都是为人们所广泛利用的。

保险业：怡和办理各类保险业务，按当前汇率发行保险证券。它代理广州保险公司、香港火险公司、联盟保险公司以及劳埃德协会的业务。

作为一个成立时间较长的英国公司，既能全面了解中国，又有受过专业训练人员管理的最现代化的一组船队，现今汉口的怡和洋行是处在精心维护英国贸易的地位。特别是在这个时候，英国与盟国的贸易正在重新组合，那些国家的商人与制造业者，对中国有共同利益的人，不应当对该公司现有地位，对它的组织上周到的性质，对它作为一个重大的贸易媒介的能量等闲视之。

[阜昌洋行] 早年，茶是汉口的主要产业，现在它的重要性虽然有所降低，但在这个新兴的租界区内仍然占有较为突出的地位。汉口的俄国侨民，很久以前，对茶叶的贸易就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世界上惟一的砖茶厂都在他们的手中。汉口有三家砖茶厂，都是俄国人开办的。其中一个阜昌，该厂在福州、九江、上海、天津、科伦坡和莫斯科设立了分支机构。莫岗诺夫和波恰诺夫两先生都旅居汉口多年，前者负责汉口厂的工作，后者则执掌俄国国内的活动。

阜昌砖茶厂是一个大型的、设备完好的企业，位于英租界，雇用了大批的中国人，在欧洲籍职员的监督之下劳动，绿砖茶是从专门准备的绿茶叶中制成的，红砖茶是从功夫茶筛选机制成茶末制成的。

制法：先把茶原料放入棉袋内蒸馏，再放入模子内加压，使其成为硬块，然后用纸一块一块地包装，每 80 块装进一个竹篓子内，以便运输。每篓重约 1.5 担。

红砖茶是由最好的茶末制成的，不需蒸馏，而是干压成硬块，每块约 2.5 盎司，这是为了避免茶味的削弱。然后用锡箔纸或普通纸包装，每 432 块或 480 块装一箱，以便运输。这种茶实际上是专门供应俄国军队饮用的。

在茶叶收获季节，即 5~8 月，这种茶由俄国志愿军团舰只担任运输工作。阜昌洋行作为这条航线的总代理人。茶往往是直接运往俄国或是经由上海换船，然后再运往海参威、柯拉菲斯克（通过黑龙江）和敖德萨。

[裕大洋行] 从事对中国贸易而闻名英国商行之一的就是裕大。该行是根据香港法于 1908 年组合而成的，是有限公司性质。执行主任为金先生，总公司位于上海，该公司致力于出口贸易，专门向欧洲和美国出口茶叶，也从事运输和保险业务，业务交往很大，在伦敦、汉口、福州、科伦坡以及巴达维亚等地设有分支机构。

汉口裕大洋行掌管下列重要机构代理业务：

运输业方面：怡泰、瑞典东亚轮船公司、东洋轮船公司、金德丰、汉口码头仓库公司。

保险业方面：老公茂公司、英国永隆保险公司、扬子保险公司、海上保险公司、标准人寿保险公司。

进出口方面：旧金山香料油漆公司、纽约标准卫生工程公司、香港绳索公司。

公共事业方面：字林报、英商驻华利华肥皂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沿江大道 6 号，现任经理为盖尔先生。

[新大信洋行] 像汉口这样一个繁盛的制造业中心，煤炭的重要性是不能忽视的，因此，从事这种矿物的商行就相当突出起来了。在本埠从事煤炭行业的商业中，主要的一个就是 1912 年建立的新大信。该行不仅经营煤炭，而且经营金属，汉口几家主要的中外运输业和工业厂商所需之燃料都依赖它供应，它代表两个非常重要的煤矿，其中湖北梅子山煤矿是这一地区远近闻名的煤矿。该公司在汉水上有自己的煤栈，大约距离汉口 3 英里。

该行创办人新大信先生第一次到远东来是在 1874 年，在福州住了 13 年，一直从事茶叶贸易，后来回英格兰，1912 年重来中国，并开办了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公司。

[宝泰洋行] 宝泰洋行是地方上最著名的商行之一。从事电器工程、金属贸易和进口业务。是由宝泰肖先生于 1902 年创建的。他也是该行惟一的所有者和总经理。

宝泰肖先生最初来中国的目的是学习中国语言，经过 25 年长期逗留，能很流利地讲三种地方语，又能阅读和书写出书面文章的文字，他也曾从事过土木建筑学的研究，并在两方面取得了最高的学业证书，由于他有很大的才能，使人相信他能够为中国政府提供良好的服务。一个时期，他是杭州总督的参谋，在那里为地方造

币厂提供了机械设备；在武昌，为政府经营的棉织、铜钱、银元等厂的经营管理做出过帮助，为各个厂的机器设备的更新改造做了许多工作，因而这些工厂都比较好地提高了工作效率。

该行掌管几个商行的代理业务，其中有：旧金山约翰笛尔犁具公司、标准化消毒公司、大英霍特金属公司、伦敦国际橡皮公司、美国布法罗天平公司、杰姆斯·雷菲尔公司、伦敦阿里夫打字机公司、瑞士柏尼斯阿尔卑士牛乳公司、上海嘉泰洋行、伦敦霍布·哈脱布公司、希尔顿电气公司（电讯振子）、电热电气公司（电热设备）、美国代尔制造公司、伦敦摩托联合保险公司、伦敦乔治简林公司。

〔永兴洋行〕 永兴洋行，这个著名的商业机构成立于 1891 年，其他法国商行可以说都是从这个母体产生出来的。

该公司拥有两个很好的地产，一个在汉口的商业中心区，占地约 700 平方米；另一个，新近才取得，在北京路，占地约 2 000 平方米。目前正在北京路上的那一块地上兴建五个漂亮而宽敞的二层楼仓库，大部分都是宽 180 英尺、长 60 英尺，只有一个宽 220 英尺、长 60 英尺，并且将要完工，全部完工后，可贮藏巨大数量的进出口货物。该行所有的牛脂融化与精炼设备，能熔炼大量的牛脂，而且是目前在中国所见者中最现代化的。

永兴洋行经营业务之重要性，可从下列各种土产品的年平均出口数量中表现出来：皮革 30 000~40 000 担，牛脂 10 000~15 000 担，猪鬃 7 000 担，山羊皮 3 000~4 000 担，桐油 20 000 担，蛋品、麝香和人发也小量经营。

像天津支行一样，猪鬃为其最重要的出口项目，在产品的拣选、分类工作中，在大忙季节里，至少雇用 500 名男工，最近两年猪鬃业务极迅速地发展，和两年前比较至少增长了两倍。

浮欧贝克先生从 1914 年以来，一直掌管着汉口支行的工作，而在过去的 14 年中，他和汉行一直保持着事务的联系。早先，他是作为总行派遣的海外市场的代表、采购员和销售员的资格和汉行保持业务关系的。现在，他是英法商务公会的会员，也是所有地方俱乐部的会员。他有 4 名欧洲籍助手和大约 40 名中国雇员。

〔格罗斯金洋行〕 法国格罗斯金洋行 1898 年建立于汉口，是第一家制造蛋黄和蛋白的工厂。该行成立以来，逐年扩大，现正从事广泛更新设备，以符合美国联邦政府最近实施的食品卫生条例中的要求。该行加工、出口完整的干蛋、蛋黄粉和干蛋白，并保证一切产品的质量。此外，还从事普通产品的出口业务，例如：种子、油料、皮革、牛脂、苧麻、五倍子等，特别是猪鬃，如标有“A.G.C.”商标的猪鬃，即标有该行名称的猪鬃，在欧洲和美洲市场上是最著名的猪鬃之一。

格罗斯金先生，即本行的创办人，也是中国古代艺术品的著名的鉴赏权威，他曾写过一篇有关本题的非常有趣的论文。

〔良济洋行〕 良济洋行是 1906 年由蒙巴隆先生一人建立的。一直到 1916 年，

斯德金先生才加入进来，成为合股公司。公司的活动包括：中国产品的出口、保险、运输以及一般委托代理业务。

该公司是下列保险公司的代理人：华北保险公司，巴达维亚海事和火灾保险公司法律协会和触礁保险公司，俄国保险公司，俄国劳埃德保险公司，风息保险公司，巴黎、马赛、哈佛雷、波尔多海上保险联合会。从它所代表的都是一些比较高水平的保险机构这点来看，我们可以说，保险业活动是该行优先考虑的事业，所以，汉口大多数的地方保险业事务都由它总揽了。

良济洋行是开滦矿务局的地方代表。因为它同这个有影响的企业的轮船有联系（见本书天津部分），所以该行还从事相当一部分运输代理业务。

良济洋行事务所设在汉口最繁盛的商业区，该行还经营对欧美重要产品的出口，出口数量日益增加。它占有大型仓库，并且由于它和当地头面商販有广泛的联系，所以在满足顾客订货方面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

〔天祥洋行〕就考验英国商行创办者和指导者来说，没有比中国更合适的国家了，在那里，企业多种多样的利益，特别是从事运输业、进出口贸易方面的企业，能够证明它们的创办者和指导者的聪明才智和组织能力。在这些企业中又以天祥洋行的地位最高。该行建立于1899年，最先名叫卡里尔洋行，是1891年接管伦敦阿德生贝尔公司之后建立的。该行的总事务所设在伦敦圣玛丽娅街交易商会，在远东、加拿大和美洲设有许多分支机构。

在汉口，该行的能量主要集中在布匹、面粉、木材和机器的进口工作上，同时还从事种子、油料、五倍子及其他扬子江流域产品的出口工作。该行也掌握许多运输代理业务，如：纽约汽轮航线、巴伯航线、蒙古航线、沃雷克航线、美洲至东方线。而在一般机构中，该行还代理下列单位的业务：恩德渥德打字机公司、哈里逊编织机公司、联合保险协会。

该行的汉口事务所设在洞庭街，负责人是布特威尔先生。有关该行的其他详细情况可参阅本书香港与上海部分。

〔宝顺洋行〕宝顺洋行是设在汉口繁盛的贸易中心区的最古老的机构之一。由伊文斯先生于1861年所建。几年以后，蒲尔先生参股进来，后来郝斯、怀斯勒和郝渥德三位先生依次随他参股进来。上述最后两位先生组成现在的合资商行。

公司事务所位于英国总领事馆隔壁，宝善路与洞庭街的会合处，是一幢整洁、漂亮而又完全现代化的房子，附有大型而又坚固的仓库，除开本建筑的地产为其所有以外，该公司还在租界区、华人居住的老区拥有许多地产，是英国古老商行的一个辉煌的典型。该行政策虽然较为保守，但从其所代表的机构业务来看，仍可看出它与时代是相通的。这些重要的机构是：半岛和东方蒸汽轮航海公司、凤凰火险公司、挪威联合火险协会、华北海上保险公司、永明人寿保险公司、塞缪尔洋行、厄肯布雷克皮革抑制剂公司、路透社、斯坦东铁厂以及一些其他公司。

该行的主要活动实际上包括整个华中地区的出产物，主要有茶叶、猪鬃、种子、豆类、蛋制品、苕麻、菜油、牛脂、五倍子等。该行经常雇用许多男工在仓库内从事拣选与打包工作，同时装备了一部现代化的种子净化设备，日加工 150 吨。

马歇尔先生负责运输部，曼乌林先生负责出口部。曼先生和这个远东商业支公司许多年来一直有交往。

怀斯勒先生积极参与本行工作 30 年了，现在居住于伦敦附近的乌克斯布里奇的肯特寓所，在那里照料本行的事务。

郝渥德先生，汉口分行的主任，热心公共事务，在群众中，颇负盛名，担任本地英商公会主席已经两年多了，现在为其他几个地方委员会工作着。

宝顺洋行正准备扩大它的经营范围，因此欢迎在这个方向上及时给予注意和咨询。

[泰和洋行] 汉口泰和洋行（关于上海总行的建立与发展的一篇有趣的评论见本书上海部分）开业于 1913 年 11 月 1 日。由现任经理新大信主持其事，该行的主要业务是出口贸易，大量经营的是豆类和种子，并由从英国进口的机械事先加以净化。锑、桐油以及其他土特产品也出口一些，还发行中国火险公司和新西兰保险公司的保险证券，本公司是这两个著名的保险公司的代理人。它也是伊勒曼大马力海洋航行船队的代理人。

[百昌洋行] 俄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茶叶消费国之一，因此，在茶叶的贸易中，他们的商行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是不足为奇的。大多数俄国茶商都在汉口设有事务所，百昌洋行，亦即闻名的包公房就开设在这里。

这个商行很古老，其创立年代可回溯到 1842 年，从那年起到 1888 年，该行都是通过代理人从中国购买茶叶，直到 1888 年才派遣自己的品尝者到汉口购买商品。

该行地址位于洞庭街和怡和路之会合处，即英租界之 23 段，房屋非常宽敞，包括三个仓库、中国人部、事务所和茶室。控制着红砖茶在俄国和其他国家的买卖。1915 年收获季节购进了 112 000 小箱，通过黑龙江运到海参威和尼柯拉页夫斯克转运莫斯科，或者经由苏伊士运河运往敖德萨。

自从欧洲大战爆发起，为供应纽约支行的需要，建立了一个打包厂，雇用了约 250 名工人，大多数为中国妇女，产品则经西雅图和旧金山运往纽约。除汉口打包厂外，该行还在俄国设立了两个同样的打包厂，一个在莫斯科，雇用女工 600 名，另一个设在敖德萨，雇用女工 300 名，把茶叶装进漂亮的罐头盒内，或按 1/8、1/4、1/2 以及 1 磅的俄国计量标准装入纸袋中。

总事务所设在莫斯科考斯涅茨基·莫斯特，设收购分行于伦敦明星巷 21 号、加尔各答政府区 10 号以及科伦坡维多利亚拱街，而在的里雅斯德和纽约设立了外贸分行，同时在所有国家设有代理处。此外，还在俄国各主要城市设立了零售店。汉口分行经理先后为西威尔德第西夫先生、德孚罗米耶夫先生，他们二人的签字形式

都在自己的名字后加上“由某某代理”的字样。

[日清轮船公司] 该公司经办扬子江上各港口与上海之间的运输工作，是由几家最大的日本轮船公司联合组成的联合企业，有8条轮船航行在汉口与上海之间，天天服务。沿途停靠镇江、南京、芜湖和九江。有3条船航行在汉口与宜昌之间，船都比较大，又有现代化设备。另有一种比较小的船开往仙桃、常德以及九江与南昌之间；同时，在不甚重要的港口之间，还有小汽艇来往，该行还代办东京海上保险公司、大阪商船株式会社的业务。在英、俄两国租界以及华人居住区都设有事务所。沿江大道有它的大型仓库，现任经理是角田隆郎，他也在日本工部局中任职。

[汉口赞育大药房] 每个人都认识到中国缺少纯净的药物，各种疾病十分普遍，重要的问题是难以获得纯净的药品和药材。现在汉口这个大城市（也许有一天它会变成中国的首都），由于赞育药房的建立，具有了采购药物的便利，这一点，甚至连欧洲的大城市也是意想不到的，这是令人高兴的。汉口赞育大药房已是远东设备最好、贮藏最全的药店之一。

这个药店一个时期曾是香港华生有限公司的支店，但1909年为林先生所承办，并以10万美元资本，作为地方公司而另行开办，林为经理。地皮是1914年从法租界购买的，现办事大楼就在那里兴建起来。新药房可能是苏伊士运河以东地区零售药店中最大的一个，备有各种药材、药剂和专卖药以及最现代商品性质的配套设施。

该企业附有一个矿泉水制造厂，鉴于中国人居住区生活的需要，整体建设贯穿一个观点，即取得最完善的卫生条件。机器是最新式样的，且尽可能采用自动化。水经过科学的方法消毒，使细菌危害减少到最低限度，工厂日产矿泉水3000打。

[和利冰厂] 和利冰厂，建于1904年，过去10年逐步扩大，设备增加，以适应社区发展和本港船舶运输急剧增加的需要。该公司着重生产高质量的冰产品。制冰水事先经过蒸馏，然后放入容器内冷冻。这种方法，在技术工艺上叫做“阿摩尼亚压缩法”，过去几年中新增加了相当多的冰库。

除适应港口和临近地区的普通需要以外，还执行各个海军当局签订的供货合同，各海军当局的医务官员多次来厂视察，普遍察看了工厂的活动，并且签字认可。

工厂位于较为适合于公司目的的地区，事务所设在工厂内。经理对于写有本厂挂号地址“冰——汉口”的电报极为注意，他会立刻从准备在手头的冰库中取出冰以急件的方式派人送到指定地点或送往进口船只上。

[大仓洋行] 著名的日本大仓洋行成立于1904年，设事务所于法租界。总事务所在东京、上海、天津、北京以及其他远东欧美等地的重要贸易中心设有分行。

该行主要从事进出口贸易，输入中国市场大量的日本产品是：棉纱、海产品、

日本松木、机器垫座和杂货；输出的土产品是：牛皮、豆类、油料、种子等，由该公司运往日本和欧洲市场。

大仓矿物和化学实验室，从事矿物测量、管理或矿山设计，工业原料分析以及矿石或矿石产品在中国的经销工作。

该公司取得了政府有关日本在汉租界的设计、画图与施工的合同，并于1909年在公司雇用的有能力的工程师们的监理下圆满地完成了。

现任经理为吉田胜之先生。他是本行业中众所周知的人物，他具有精湛的市场和贸易知识，他也是赛马和日本俱乐部的成员。

〔三菱洋行〕 促使日本民族生气勃勃的这一种商务精神，在三菱洋行的形形色色的交易中充分地显示出来了。三菱公司或称三菱株式会社，是一个家族企业，在日本是最大的一个私人企业，是由已故矢太郎先生所创建，现任主管为山岸庆之助和小弥太男爵。

公司有名义资本15 000 000日元，从事矿山、冶金、造船、船坞、工程、银行、仓储以及造纸等。它拥有的巨大资产包括：煤矿、矿山、船坞场地、造船场地、工厂、车间等等，并且雇用了70 000人。

该公司在远东所有的重要贸易中心地设有分行，包括汉口。汉口分行的办事处设在日租界的沿江大道上，汉口分行开办之初，目的是举办汉口至魏卡马祖间的矿石运输车，以便把汉口附近的大冶铁矿石运出来。现在本地区各种工业的兴起与成长，需要扩展它的业务范围，如公司现在急需煤、铜两种资源，与三菱利益密切相关的，本公司生产的三菱纸和朝日（Asahi）窗用玻璃的订单正接踵而至。

公司的业务由于掌管着桐油、芝麻、种子、蚕豆以及其他中国产品的出口而扩大了。

现任汉口总支行的经理为山岸庆之助先生，副经理为黑田幸彦先生。

〔三井洋行〕 东方历史，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的惊人特点就是日本力量和日本贸易的奇迹般的发展，它把过去的脚镣抛在一边，开始以非凡的成就投身于世界贸易之列。太阳旗可以在各个海洋为人们所看见，日本货物在世界各国畅通无阻。在华北与华中，日本商务上的敏锐尤其明显，它的许多头等的商行的业务联系，只有古老的欧洲人的商行才能与之抗衡。这类日本的企业中，光辉的地位应当给予三井洋行，其汉口支行位于英租界太平路，建于1901年，汉口支行的成绩是如此的迅速，不久，就在长江开设了一个分理处，工作也很优秀。

该行热心从事进出口业务，从日输入大宗煤炭、棉纱、布匹、糖、矿物和木材，公司自己有船只运送上述货物，回去时则满载富饶的扬子江流域的产品而归。公司也从事保险业务，它系三井火险公司及其他六大保险公司的代理。

公司事务所和仓库非常之大，以致必须把事务所职员单独分出来，其中日本人50名，中国职员占多数。经理为野平道男先生，他具有中日贸易的丰富经验，在

各个分支行服务多年。

[辉记洋行] 该行具有世界范围的声誉，是它 75 年来持续不断，精心努力的结果。它源于有历史的俄国古老商行——阿列克谢·哥勃金·阿·库兹涅佐夫有限公司，它是一个茶商，这个商行早在 19 世纪就在莫斯科建立了，并在全俄所有的主要城市建有分行，伦敦、科伦坡、加尔各答、巴达维亚和上海也有它的分行。现在公司有 10 000 000 卢布的资本，准备金为 3 000 000 卢布。

汉口支行创办于 1899 年，自那日起，它成了茶叶大宗买卖的中心，事务所位于俄租界沿江大道，附近有公司的巨型仓库和砖茶工厂，茶厂雇有 1 500 名当地工人，他们在外籍人员的监督之下从事茶叶生产，汉口茶厂年产砖茶 100 000 篓，片茶 10 000 盒，尽数对俄国出口。

该公司出口事务可以从下述事实中得到一些概念：汉口和上海两处的红砖茶和绿茶的年贸易额为 65 000～70 000 箱之间，除开在中国的活动以外，它还从印度、锡兰与爪哇采购大量茶叶。该公司也是闻名的汶里斯达公司汶里斯达茶箱专利的经理。

托罗金和俄国工部局主席格里哥里也夫两先生出任该行的经理。

[立兴洋行] 普遍承认立兴洋行是法国在远东最重要的商行。该行 1893 年建立于上海，1895 年又在汉口开业，可以准确无误地讲，在即将到来的远东商业优势的竞争中，没有几个企业能与之相比，取得明显的成就，或表现更突出。作为出口者讲，立兴洋行实际掌管着向欧美出口的每一种中国产品，仅仅茶叶一种未曾染指。

在保险业中该公司代表著名的法国都市火险公司和康菲恩斯火险公司，以及澳大利亚古老的苦因士兰和荷兰的劳埃德海上保险公司。立兴洋行也代表国际卧车公司。它也是法国邮船公司和恰格斯·路里斯公司的行为代理。

汉口分行的事务所设在法租界沿江大道，房屋宽大，很适合于公事房的要求。同时，位于华人居住区的仓库也是根据进出口工作经常增长的对空间的要求、根据适当的发展比例而建造的。

[意中进出口公司] 这个突出的汉口企业，它的总事务所在米兰，在那里，公司惟一股东马培里先生主持事务。该行的经营方法，和普通的从中国办出口商行一样，专门重视牛皮的出口，在这项经营中，意中进出口公司在华中地区有关出口的地方商行中占有更重要的位置。牛脂可以说是它的第二种重要的出口商品，设有现代的炼油工厂。同时，猪鬃的经营比重也较大。在收获季节，该行需要雇用大约 200 名苦力，以从事这项产品的拣选和包装。种子和五倍子也有大量的出口。

事务所设在法租界，附有两个大型仓库，占地约 100 平方米，产权为自己所有，在租界外还有地 1 000 平方米，至少有三个仓库设在那里。

卡芦果先生负责汉口支行的工作，和公司合作多年了。他和当地主要的土著商

人以及批发商有交往，研究顾客的兴趣，博得了他们的信任。他在中国的商界中，受到人们的尊重。

〔梁记药房〕 由伯纳德和隆霍法尔两先生所领导的梁记药房，在汉口建立已有9年了，占据法租界河内路上的公司屋宇漂亮，经营一般现代药业的业务，精心调制配方，同时从欧洲主要的商行运进各种化学药品、药材、香料、盥洗用具、肥皂、杂物等各种储备以应需求。药房雇用了完全合格的调剂师和三名助手。在隔离的葡萄酒和烈性酒的储藏柜里，储藏的都是名牌酒，同时为旅游爱好者备有照相器材和引人入胜的风景明信片出售。

1910年，该店为皮卡先生所购。他也从事其他的商业活动，由于他是各种不同财产所有者和铁路公司等等的总代表，部分时间还要用到不动产、铁路以及其他事务中去。

他为第一流的商行开办代理业务，他拥有一种把各方面顾客的业务推向前进的优势地位。

〔瑞兴蛋厂〕 汉口的蛋白贸易虽然是在大约20年前已经开始，但却只是过去10年中才好像表现出重要性。瑞兴蛋厂专门从事蛋品工作。由于中国这部分地区鸡鸭蛋的供应广泛，使该企业在顺利地推行蛋品的交易中，拥有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蛋黄与蛋白先在工厂进行分离，然后按不同的方法进行处理。对不同品种的蛋黄分离工作，非常小心。再按订货单将不同品种的蛋黄用木桶或铁听盛放，装船外运。蛋白，经过干燥，再按蛋白的形态装运。蛋品的需求在过去几年中，有了相当大的增加。迹象表明，不久的将来这种需求还会有相当大的发展。

该行的总事务所在布鲁塞尔。

〔中国银行〕 官方资本60 000 000元，已缴资本1 232 000元。中国银行建立于中华民国元年，是一个有限公司，公司条例经参议院通过，由大总统命令发表，为了表明它作为政府银行的地位，被赋予了发行钞票和管理政府金库的职能。其结果，使它成了一个完全牢固的机构，基础稳固，发展迅速，因其为中国官方财务的中间人，所以全国各地都有它的分支机构，大约180余处已经建立起来，目前正采取步骤在全世界选定通讯员。该行目前的业务量，包括私人存款和商务存款两个方面都很大，以至达到60 000 000元。1915年，财政部要求从商界募集5 000 000元的资本，年末完成，并即时加入股本中去。银行业务是按照一般的经营路线活动的。

该行总裁为财政部长，由总统任命。设有副总裁，由总裁任命。汉口分行设于1913年，目前行址是临时的，新的华丽的行址，现正在歆生路上施工，从分行建立之日起开始建筑，耗费160 000元，目前正接近完工。

汉口分行办理银行各种业务，贷款需要确实可靠的担保。经理为秦春汉，副经理为查先生。

[交通银行] 该行总管理处设在北京。汉口分行是1908年成立的，位于法租界，是一个很重要的分行，除办理普通银行的业务外，也提供专门设施，为全国各地转账服务。

汉口分行经理为关鹤舫。关氏生于1868年，广州人，在天津从商多年，曾游历东方各地，后来出任大清银行主席二年，1913年被任命为汉口交通银行经理。

关先生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现在美国学习。

[姚才滋] 姚先生是湖南银行汉口分行经理。该行是湖南省的首席财务机构，以前曾称作清关银行。自从改组成现在的模式以后，过去一个长时期中利润年年增加，分行共有17个，包括汉口这个重要的分行，成为具有大量财产的银行。1911年大革命震撼了这个国家，交易停滞几个月，许多银行顾客不能按时清偿债务达1 000 000两，所以筹集5 000 000两资金才使银行渡过这一难关。

该行的主要业务包括发行汇票和用不动产作抵押的放款等。汉口分行的费用约14 000两，而收入一般都在40 000两以上。该行盈利从此可见一斑。去年，该行经理从存放款中成功地聚集了100 000多两利润全部加入资本户头中去。姚先生是安徽贵池人，现年40岁，青年时期，他在江西省出任过县政长官。不久，由于不满清王朝的专制统治，辞去县政职务。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从隐居中推举出来，出任丰旗粮食运输公司经理，这是一个从事大量的粮食运输，供应部队食用的组织。两年后，他受朋友、湖北财政厅厅长胡文藻之邀任远安龙坪厘金局局长。1915年辞去厘金职务，改任汉口湖南银行经理。1914年，在杭之林和周清杨两先生的合作下，成功地倡导了两个工业企业，一个是沙市棉纺织厂，拥有资本金2 500 000两，得到商部的及时认可，发给了许可证。但是，由于欧洲大战发生，机器来源困难，计划被搁置下来。另一个企业是铜矿公司，一切必要的资本也筹集起来了，准备开发公司所有的黄石铜矿，也是由于那里存在着闹事和愚蠢的帝制运动以及反袁战役所造成的巨大不安，开发工作不得不推迟下来，如果秩序恢复，这些计划还可望付诸实施。

[张履鳌大律师] 事务所设在法租界巴黎路35号。

张履鳌博士是汉口开业的辩护人和律师，受过专门训练，有实际工作经验，是一名完全合格的律师。早年上海圣约翰大学学习，后来到美国学习法律，20岁进入弗吉尼亚大学，取得经济和哲学学士学位，然后到耶鲁大学法学院专攻法律一年，1911年被授予法学学士学位。

对他的回国，引起了学术界和官方的注意，帝国诏书任命为民法博士（法科进士），因此担任了黎元洪将军的法律参谋的重要职务，即前副总统现任总统的黎元洪。张履鳌也是湖北省外事局的执行主任，湖北省高等检查厅的执行高等检查员。

他和上海小姐罗秀珍女士结婚，罗女士也是留学美国、学有成就的人，曾获得弗吉尼亚兰多夫—马肯妇女学院学士学位。

值得提及的是张先生在留学期间曾是《中国学生》月刊的主编，这是一个广泛传播的留美学生联合会的机关刊物，他的夫人罗小姐任联合会的副主席。

〔秦书周〕 秦书周先生出生于江苏省上海，多年以来一直出任汉口怡和洋行买办，积极参与本港的商务工作，由于他具有中国学者平均水平以上的文化修养，特别酷爱书法艺术和古物。他的古代著名艺术家们作品的收藏，在本市或中国任何其他地方都是最好的。

最近和一个朋友议论中国艺术问题时，秦先生表达了精通中国书法所带来的乐趣，虽然近来书法的重要性已减色了许多。他有一个儿子在著名学者苏琪的指导下学习，苏老师最近给孩子的父亲寄去了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苏老师用优美的文字和良好的欣赏力对他书法上的成就表示了由衷的赞赏。尽管作者对他的优美的文笔很是尊崇，作者还是继续地写道，在他的亲身交往中，最吸引人的地方还是他的品德。虽然他不被人们认为是一个伟大的学者，但是他的语言知识、写作能力以及思想意识方面说明他是孔门中最有才能的一个。秦先生的父亲 64 岁时死于汉口，在清帝国时代拥有许多职务，其中最具有信用的一个职务是和医学科学有关的。

秦书周先生是广东医院院长，广东商业联合会委员，汉口商会委员，他又参与所有以启蒙和提高同胞觉悟为目的的地方群众运动。

〔王先舒〕 王先舒先生，即闻名的王冰生，是浙江省澄海县清树浦人，现年 64 岁，在他还是婴儿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因此，他通过艰苦奋斗以获得生活和教育的机会。当他 29 岁时，结识了上海商界头目之一的叶清昌先生，由叶推荐，被派来汉口担任慎记五金号的会计。以后自己创办了达记和新达记商行。除从事相当大规模的运输业务以外，还经营煤油和船舶业务，同时他又是汉阳铁厂和日清轮船公司的买办。他在日清轮船公司在诸条约口岸的商务扩展中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助手，他自己在上海、汉口、宜昌和重庆也建立了一些分支机构。

由于他有相当可观的财产，慈善机构接受了他的许多实质上的捐助，在许多以减轻穷苦人的苦难为目的的这类慈善机构的创办中，他都起了带头作用。例如，由他在汉口附近的蔡甸镇创办的大和布厂，对贫穷的妇女同胞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在他的家乡清树浦，王先生为了穷苦儿童的教育，创办并维持了一所初等小学，他还捐献大批款项编纂全族宗谱，此外，他还负担宗祠的修建费用，表达他对祖先的崇敬。在汉口组织了一个反对吸食鸦片协会，印发数千份反对吸烟的小册子，挽救了成千上万的愚昧的患者，使他们摆脱了可怕的精神负担。在清王朝阴暗的日子里，他向帝国财政作过慷慨的捐献，被清王室授予三级文官品位、副知事头衔和二级带孔雀毛的铜剑钝头。最近，王先生被选为汉口中国商会的副主席。

〔俞成柏〕 汉口台湾银行买办俞成柏先生 1871 年 12 月出生于上海，在他取得了学术经历以后，1889 年进入中国政府担任公职，被派往四川，担任电报局成员，在那里工作了两年，1891 年调往上海办事处。1896 年，他辞去政府职务，改

任汉口道台秘书，在职 11 年。

1907 年，改营商务，加入日清轮船公司，担任流动买办。在职之时，由于成绩显著，上海高田公司劝说他出任该公司买办的职务，在那里，再次证明他是完全可以信得过的。1914 年，当上海中国人寿保险公司需要一名中国职员部主任的时候，俞先生被选中出任这一重要的职务。尽管如此，第二年他仍然回汉口，到台湾银行出任现在的买办一职。

〔劳用宏〕 中国企业的典型可从劳金记的独生子劳用宏的经历中得知。劳用宏，广东人，出生于上海，初等教育是在广州职业学校获得的，最后是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念的书，1911 年进入泰和洋行上海分行，在那里工作到 1913 年，转来汉口分行任职。1914 年他创办广丰矿业公司，主要从事锑矿业务。次年，又主要是他的力量，创办了广索王锑熔炼厂，以熔炼附近矿山和本公司生产的矿石，把它们变成 2 至 3 吨相当纯的锑，公司意欲在不久的将来提高这个产量。

劳用宏先生是上海水火保险公司汉口分公司的经理，也是武昌白沙洲造纸厂的经理。对后者，由他按照现代系统进行了重建。从商业角度上看，他是一位知名人士，在体育界中，他也是一位很出名的人，因为他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这里了，特别是赛马，为此，他拥有几匹比赛用的小马。

〔扬子机器公司〕 这个已经取得了明显成就的企业，它的起源还得归功于前任汉阳钢铁厂总经理李维格博士，他是一位有远见而又有事业心的人。他认识到在汉阳钢铁厂附近组建一个机器公司，以便就近利用这一著名工厂生产出的粗料，使其化为有用之产品，该是可能办到的事。他也认识到创办这样一个企业所需要有助手的重要性，他找到有工程师学会会员等资格的王匡先生。王先生在香港黄浦船坞公司当过博士的学徒，又在香港劳埃德海外运输公司和上海国际船坞公司服务过一些时间，也担任过香港贝利公司技术部的负责人，在李维格博士的劝说下，王先生接受了扬子机器公司总经理的职务，并和一些有影响的朋友，立刻创办起来。

工厂计划留给了能干的王先生去规划，王先生亲自监督全部机器的采购，由于他热诚的工作，在 1908 年的下半年，全部工厂已经完工。当部分厂房还未完工之时，几笔订货单就陆续执行起来。由于他预知获得良好训练，能在车间胜任各种不同订货的生产人员的来源困难，当他从香港来的时候，同时带来了 10 名中国男孩，并迅速加以训练，使他们成为公司很有用的人才。

扬子机器公司在得到各个铁路、汉阳钢铁厂以及华中地区其他企业的丰富的股份以前，许久未能开工建设。特别是 1911 年革命爆发时订货单很多，这种巨大的时代危机需要的是关闭工厂，因为炮弹射入了车间。虽然如此，也只停产了约一个月，在 1912 年 1 月工厂在高压下开始生产。从那以后，工厂大踏步地前进。虽然欧洲大战，使进展受到某种影响，但是总的来说，进步还是很大的。在一次年会

上，兴建附属建筑物、购置更多的工具、增设铸钢厂等各种事项被肯定下来，其结果就是现在这个样子，工厂占地三倍于初办工厂之时。

现在的扬子机器公司包括下列车间，并且全都是用最现代化模式装备起来的，包含着机械工程领域的一切最新的改良设施。动力车间、机械车间、道叉车间、螺栓螺母制铆钉车间、铜工车间、铁工车间、铸造成型车间、桥梁运输车间。除开这些重要的车间外，工厂还有一个巨型水力厂，内有一个电动水泵、强大的水力帽头钉机和一个 500 吨容量的水压机，机上有一个能容许最大钢板通过的工作台，还有一个轮胎厂和容量 80 000 加仑的水塔。

工厂无处不备有轻便铁路，以适应合同所需的快速递送。

在工厂生产的多种多样的产品中可以提及的有：各种型号以及 200 英尺跨距的铁路桥梁；100 英尺跨距的铁件；容量 150 000 加仑、150 英尺高的水塔和水罐；特定军事构件；考贝炉、鼓风炉座、汽管等，后面三种都是钢厂需要的；铁路用防水箱、货车箱；各种型号的道叉；矿石倾斜设备；纸厂设备；500 马力陆地和水上用锅炉；500 马力陆地和水上用发动机；500 马力双螺旋或单螺旋拖轮；中国政府定制的电动炮艇；钢制或木制汽艇、火力小艇、驳船；300 尺长的趸船；200 马力的吸油发动机；适合中国无烟煤用的煤气发生器；水厂用的水管；以及海上设备和工厂的修理机械等等。

[汉冶萍煤铁公司] 任何乘船到汉口观光的人，只要他往南方望去，不会看不到对面著名的龟山处，1911 年革命战争主要场地，耸立着许多长长的烟囱喷出来的缕缕黑烟表示了汉冶萍煤铁公司四个主要部门之一汉阳钢铁厂的活动。其他几个部门是大冶铁矿、大冶钢铁厂和萍乡煤矿，因而名为汉冶萍。现在公司的名称是 1907 年开始的。在此之前，汉阳钢铁厂和大冶铁矿是一个企业，它们和萍乡煤矿是两个独立的企业。但是由于主要股东对二者都感兴趣，导致二者的合并与扩大成为一个有限公司。必须认识到，在中国，汉阳钢铁厂是钢铁工业中第一家现代化工厂，为总督张之洞 1860 年所创建。工厂建筑整整花去三年时间，当时设备包括：两个日产 50 吨的鼓风炉，每一个鼓风炉仅有两个热火炉，带有两个汽锤的 20 座搅炼炉，100 个容量 5 吨的考贝（Coppe）焦炭炉，两个 5 吨的贝氏转炉，一个 12 吨的西门马丁炉，一个钢轨厂，一个钢条厂，一个板厂，一个耐火砖厂以及带铸造的机械车间。该厂 1896 年以前由政府经营，1896 年总督张之洞和盛宣怀（即盛宣怀）磋商，由时任中国招商局督办盛宣怀以私人企业名义继续接办。在政府管理时的早些年代里，主要困难是缺乏合适的煤炭，特别是鼓风炉用的焦炭。当时用的是马鞍山出产的含硫量较高的煤炭，这对炼钢是不利的。盛宣怀接办时，便着手寻求一种含煤量较丰富的煤矿，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在江西和湖南接壤的地方萍乡发现了煤田。虽然盛宣保有非凡的热情和才干，也很快地发现炼铁工业比预期的责任要大得多，但是，他还是勇敢地支撑下来。1904 年他派遣汉阳厂主任李维格博士

(当时是李先生)前往美国、英国以及欧洲大陆,参观那里的钢铁工业中心,随同前往的有两名技术参谋,一名是矿业工程师学会会员、出任过上海工程师协会主席的汤麦士·伯恩特(ThoMas BuNt)先生,另一名是萍乡煤矿主任工程师哥斯塔夫·列龙(GustaΛ LeiNuNg)先生,他们访问了大多数海外的主要钢铁厂。在英国期间,他们征询了著名的冶金学专家斯对德先生(现在博士)的意见,并且请他就汉阳钢铁厂所使用的炼铁原料,在他著名的实验室里进行分析检验,他的分析报告表明汉阳钢铁厂所使用的原料是最令人满意的。根据这一委托的建议结果,汉阳钢铁厂是大大地扩大和现代化了,萍乡煤矿也得到改善。1907年,汉阳钢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合并,注册为一个公司。关于扩大计划是:建议1915年在大冶兴建一个钢铁厂,所以1914年10月派遣了一个专门委员,就新厂建设问题和钢铁工业中最现代化的实践问题进行研究,提出初步意见,决定从兴建两个400吨的鼓风机开始。由于欧洲大战爆发,进展大大地推迟了,但是可以预期1918年早期可以完成。

关于公司行政组织,从业务恢复之日起就进行了重新改组,废除了由正副主席直接控制各职能部门的办法,代以由9个主任组成的理事会来控制,同时把主要执行权力授予总经理,并委派一名襄理和一名商务经理协助总经理办事。总办事处现在上海,现已经决定要迁往汉口,公司不仅拥有前面已经提到了的诸厂和矿山的资产,而且还在湖北阳新和湖南的常来与常宁两县有锰矿,在湖北鄂城有一个低磷的铁矿。

汉冶萍煤铁有限公司的人事组织是:理事会——孙宝琦(主席)、李经方(副主席)、沈东合、周清承(译音,下同)、张起孙、林美各、杨学沂、孙哲生;总办事处——谢介福(总经理)、沈恩怡(襄理)、王国山(商务经理)、陈起兰(商务副经理)、金乔方、赵平生(司库);汉阳钢铁厂——吴(总监督);大冶钢铁厂——李维格(总监督)、Z.T.K 吴(副总监督);大冶铁矿——K.S.K(行政监督),应扬(矿务监督);萍乡煤矿——李镜澄(矿长),黄××(主任工程师)。

大冶铁矿:这些丰富的铁矿层位于汉口下游65英里处之南岸18英里的地方,由一个同样长的,适合标准轨距的铁路线把它同江岸连接起来。大冶之名有大熔炼的意思,历史表明,早在公元前304年,炼铁工作就在那里实践开了。铁矿脉由2/3的磁铁和1/3的赤铁所组成,厚度为60~75米,分布在高于山谷地面65~165米的山区内,矿脉大致垂直于黑花岗岩和石灰岩之间,矿石的化学成分多样,靠近石灰岩部分的矿石含铁量一般都较高,含磷量较低,反之,靠近黑花岗岩部分的矿石含铁量一般都较低,含磷量较高,循此规律考察下去至矿床极端,铁的含量最多处为66.5%,最少处为59%,磷的含量最少处为0.02%,最多处为0.06%,整个矿床的含铁与含磷的数循此百分数在石灰岩与黑花岗岩之间变化。除磁铁矿外,紧邻处还有一个褐铁矿,藏量约100 000 000吨,在剥去矿脉两边的岩石,使矿脉裸

露以后，一直用简单的打眼爆破法开采铁矿石，待把它掘起以后，再把铁矿石装进矿车，利用自动运输铁路把矿石运送到铁路终端的货站，在那里再用吊车把矿石倾倒在火车内。现在三处正在开采，1915年总产量为558 119吨。

大冶钢铁厂两年前买下的厂址测量已迅速地完成了，占地约670亩，距大冶铁矿约20英里，厂房和其他组织工作正在施工和进行之中。开始要做的是两个生产能力为400吨，附带一切必要设备的鼓风炉，但是厂方的意思是鼓风炉设备还要增加到8个，还需带足够的西门子马丁炉和轧钢机，以便使鼓风炉的产品变成精细的产品。预期鼓风炉产品的第一次装运可于1917年初实现。

[刘友才少将] 一名刘春霖，是汉口稽查处处长，现年52岁，年轻的时候，曾在汉阳水面炮艇上当兵，在他30岁以前，脱离军事职务，进入湖北警察界，在那里他以其天生的敏锐、勇敢和热情迅速地被提拔到领导位置，当他被任命为武汉市稽查处处长的時候，新兴的共和国还刚刚克服腐朽的和衰败的清朝专制政体不久。近几年中，他又有大多数比较重要的政治与严重犯罪案件要做。在武昌黎元洪的继任人给予他以充分的信任，由于他们的推荐，他才这样迅速地提拔到少将衔的位置，并被袁世凯政府授予五等勋章、两个奖章和文虎嘉禾勋章。在袁世凯称帝时期，他保持着高尚的品质，在扬子江各省的官员中是非常出名的。

[刘子敬先生] 汉口最著名的商人之一，是刘福堂先生的儿子。一次，在80个与外国人做生意的青年人中，他的表现最为突出，是一个突出的商业人才。刘子敬1883年出生于汉口，受教育于波恩大学（美国），他是一个品质优良、意志坚强的人，在他18岁那年，离开大学，协助父亲经商，当时商务规模相当大，证实了他是一个能干的商业工作者。

1906年，他父亲去世，留下一大笔遗产，刘子敬先生开始独立的在各个方面从事商务活动，从此成为商界中著名的和为人熟悉的人物。在慈善事业中，他父亲做出了良好的榜样，他也和父亲一样从不厌恶慈善工作。他曾为饥荒救济、敬节堂、慈善社以及其他许多公共事业筹集大笔捐款。为各地失学青年开办学校，提供学习机会是他父亲的夙愿。同样，在1913年，他创办了福德学校，用以纪念他的父亲。该校已经迅速地发展了。开始只有40名学生，但学生人数一年一年增加，到现在已经超过200人。学校已经在教育部备案为高级中学。他又为无法上学的贫穷儿童开办了初等学校。这些学校的位置在惠民厅，这是一所纪念已故总督张之洞的纪念堂，现在大约有200名男孩在那里学习。他用这些办法实现了他父亲的遗愿，同时帮助国家提供了用德、智、体三方面铸造的青年。

作为对共和国的热爱与忠诚的象征，他曾为国家的生民提供财务和其他方面的捐助，因此获得政府发的四级嘉禾勋章。他的弟弟刘丹起也就读于波恩大学，也是一位汉口有名的商人。像哥哥一样，被所有的人尊崇为善良而又有才能的人。

[潘恕安先生] 是汉阳首席居民潘位三先生的长子。几年前他受雇于立兴洋

行,在那里取得了许多商务方面的经验,9年前,接受汉口意中进出口公司雇用当买办,这就是现在他掌管着的一个非常有责任的工作。1899年同张W.S.先生的女儿结婚,现有两个儿子,大的8岁,小的3岁。

[朱应生先生] 52岁,浙江省海盐县人,初等教育是在家里接受的。随后去上海,在那里学习了10年,学业完成以后,在一个轮船公司的专门往来于汕头、厦门、牛庄、芝罘之间的轮船上工作。大部分时间都在公司的船舶中,在这些港口往来的旅途中度过。由于他是一个良好的学者,又完全熟悉几种中国地方语言,在37岁的时候,被奉献给萍乡煤矿运输局,担任翻译,10年以后,由于这个职务仅有利于自己,无利于雇主,他辞去了翻译职务,改任汉口闻名的裕大洋行的买办,他已被裕大洋行雇用5年了。与此同时,他还兼任恒兴仓储公司经理,后者是9年以前被任命的。

[丁笏堂先生] 一名立春,又名佛长,他的经历非常突出而又成功。他是江西省新建县人,现年40岁,毕业于江西省立学校,对于教育工作他有浓厚的兴趣。在以学校为工具,以群众进行启蒙的运动中,他是突出的,在他的指导下,几所学校建立起来了。在24岁生日那天,他通过新闻媒介“江声”——一种汉口出版的日报的栏目,传播了光明和知识。许多青年受到他的教育,为他的爱国精神所鼓舞对他表示崇敬,赞同他关于祖国早一些从满洲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中国人民就早一些有好日子过的主张,把他们的命运献身于消灭非常可恶的清王朝的斗争,他和他的弟子们参加了武昌发生的伟大的1911年的革命,迅速地推翻了年幼的皇帝宣统和不幸的摄政王的统治,是他把隐居在河南家乡彰德的袁世凯,以“拯救国家”的名义请了出来,是他做了这样简短的了结。在革命时期,丁笏堂是陆军部代理秘书和财政部长的参议,随后又被举为善后维持和平协会主席,当伟大的斗争过去以后,被中华民国副总统黎元洪将军任命为顾问。黎元洪当时居住在汉口附近的武昌。这时,他也是湖北政府银行汉口分行的经理,在他的任期之内,奉命组建鄂州元洪银行,即后来重新改建和起名的鄂州兴业银行。这个新的财务机关有官方资本10 000 000元,但是在筹集必要的金额中,遇到了很大困难,该行进行重建,实收资本1 000 000元,就这样开业了,而且很有名气,现在成为华中地区最有生气的企业之一。如此大的信誉是由于丁笏堂先生,是他倾注了心力,对他的同胞,武汉三镇的工商界,在他们急需银行业便利的时候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提供了有用的服务。是他在这方面做出了显著的成绩,才使得该银行获得了如此大的信誉。

十九世纪汉口的贸易

陈锋按：本文译自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罗威廉教授这本书出版不久，即由彭雨新先生主持翻译，彭先生并作了校改，但一直未能在国内出版。这次将罗威廉教授大著中的一章收入本书，又请鲁西奇教授进一步作了校正。业师彭雨新先生已逝世多年，将本文收入该书，也是对彭先生的一个纪念。

19世纪的汉口是几个世纪以来中国流通经济持续发展的产物。根据藤井宏的观点——他第一次对此种经济之出现作了理论性的探讨^①——在宋代，地区间的远距离贸易主要是经营非奢侈品以及国家直接统制商品（例如食盐）之外的大众化消费品^②。到明代中期，主要是受到由国家主持实施的向西北边疆地区的大规模移民，以及长江下游地区棉纺织业的普遍发展的影响，此种地区间贸易得以迅速发展，以致全国各地偏僻乡村的农户也一边为全国市场生产商品，一边依赖地区间贸易为他们提供日常生活必需品。国内许多地区开始了某些产品的专业化生产，并通过专业的地区间商人——如藤井宏所研究的来自安徽徽州商人——为他们的产品寻找全国性市场。到19世纪中叶，中国已使胡克神父（M. Huc）得到了“世界上最商业化的国家”的印象^③。

此种商业发展的结果之一是一种新型商业城市的产生。胡克指出：“所有大城市都有重要的商业场所，各省的商品如水流归池一般，自动纳入这些场所。来自全国各地的人群纷纷涌进这些大货栈。”^④自宋代以来，汉水与长江汇合处就一直在商业活动中发挥着作用，但正是16、17世纪国内商业的迅速发展，才赋予它近代意义上的全国性重要地位。明后期经久不息的全国性动乱结束之后，清朝的安定局面更加促使汉口发展成为中国大陆上最大的商品集散地。清初的一本商业手册指出：

① 藤井宏：《新安商人研究》，《东洋学报》第36卷（1953～1954年）第1期，第1～44页；第2期，第32～60页；第3期，第65～118页；第4期，第115～145页。

② 在藤井宏的著作中，“流通经济”的含义大致等同于毛泽东以及后来许多中华人民共和国作者们所使用的“商品经济”。参见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③④ M·胡克（M. Huc）：《中华帝国旅行记》（纽约，1859年）第1卷，第129、141页。

“汉口是全国惟一的最大的货物聚集港。”^①直到今天，它仍然保持着中国第一流商业中心的地位。

在对汉口贸易状况的考察中，我将采用威廉·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率先提出的中华帝国晚期的中心地理论及其分析方法。施坚雅根据市场交易的规模和兴旺程度，将所有中国村庄以上的聚落分为八个层级，每一层级的聚落均可视为拥有相应规模经济腹地（市场体系）的一个中心^②。实际上，这些市场体系被嵌入一种观念，即市场层级中较高一级的中心地自动地履行较低一级中心地的功能。施坚雅进一步指出：在中国，相同层级的市场体系是独立的——也就是说，一个既定区域内的交易活动主要从属于一个中心地，而且也只从属于一个中心地。可是，我相信，当一个地方上升到中心地的层级时，这种独立局面就会被打破，以致一个村庄的产品，比如茶叶和大麻，就有可能通过两个不同的地区城市卖出去，而每一个城市只不过控制着其中一种商品的区域市场。因此，更确切地说，一个较高层级的中心地是在其特殊商业功能不断加强的过程中，与其固有的层级形成一致的，而并非绝对地从属于哪个层级。当然，某些中心地比其他中心地增加了更多的功能——这一思路将有助于我们简要地阐释一个城市（比如，一个“地区都会”）的成长历程。

处于中国国内贸易最高地位的汉口，被认为具备与所有八个层级中心地联系的功能。为了简便起见，我们将只在四个等级层面上考察它的贸易，即：中心都会、地区都会、较大城市和地方城市（分别相当于施坚雅所说的第一、第二、第四和第五层级）。汉口的第一、第二级地位是肯定的，因为它在施坚雅所说的“长江中游大区”——它基本上包括湖北、湖南两省和江西、河南、陕西的一部分——中居于统治地位^③。作为中心都会，汉口需要在长江中游之外的一个区域体系的生产品与另一个区域体系的消费者之间发挥桥梁的作用；作为地区都会，它则将其他地区的产品输入长江中游地区，而将长江中游地区的产品输出到其他地区，并且控制本地区生产与消费品的再分配；作为较大城市与地方城市，汉口在稍小的地区内重现了这些功能。我们将要看到，汉口事实上实现了所有这些功能，只是在某些方面比其

① 吴春甫（音译）：《商贾便览》，转引自重田德：《关于清初湖南米市场的一点考察》，见《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10期（1956年11月），第485页。

② 威廉·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城市与地方层级体系》，见威廉·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加利福尼亚，斯坦福，1977年），特别是第286～287页。（译者注：中译本为叶光庭等译，中华书局2000年版。关于地方经济层级的划分，见中译本第338～339页，以及第403～410页。）威廉·施坚雅所划分的八个层级是：中心都会、地区都会、地区城市、较大城市、地方城市、中心市镇、中间市镇、基层市镇（standard market town，今中译本译为“标准市镇”，揣施氏之本义，当是指最低等级的市镇，故此处译为“基层市镇”。——译者注）。

③ 威廉·施坚雅：《19世纪中国的地区城市化》，见威廉·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212～215页及各处。（中译本第242～252页。——译者注）

他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一些而已。

此外，汉口当然还直接生产商品，并消费输入的商品。与分析家们将城市区分为“生产型城市”和“消费型城市”的假设相反，很明显，汉口只不过从通过其市场的全部贸易额中直接添加或提取很小的一部分。汉口居民生产大量的手工艺品，并消费大量食物，但大多数人主要是致力于过往货物的输入、储藏、销售和输出。

一、汉口贸易的类型：全国性市场

汉口从一个主要经营奢侈品的地区市场转变为联结全国商业网络的重要枢纽，根本的原因是它在向长江下游地区输出米粮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明朝后期，随着江南地区城市化的逐步发展和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其粮食供应开始仰赖于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在这些地区，为输出以换取现金为目的的稻谷种植在逐渐增加。这些地区包括湖南、四川和湖北的较小部分^①。实际上，所有这些稻米都通过汉口运往长江下游，而且其中的大部分都要在汉口换船易主，从而使得汉口作为贸易中介赚取了巨额利润，同时也提供了大量的搬运工与码头工的工作机会。所有报告均表明，此种贸易到18世纪前半叶已经达到了顶点。比如，湖广总督迈柱记载：1730年仅4个月的时间里就有400多条大粮船通过汉口；三年以后，估计每年由汉口大商人经手处理的大米就有1000万担^②。此外，在中华帝国晚期的漕粮体系中，汉口也据有某种中心地位。湖广地区提供大量的漕粮，以致雍正皇帝曾称赞它是“清室之粮仓”^③。而武汉正是这些漕粮向北方运输道路上的主要汇集地。

为数众多而且仍在持续增加的汉口人口也是由从它的市场上收集来的大米供养的。几个世纪以来，湖北省的粮食始终未能做到自给自足，仅有两个府连年生产有余。汉阳府是其中之一，可是汉阳府出产的大部分粮食都送到了其他市场，特别是漕粮。1728年，迈柱在一篇纪事中说，当时武汉的大米主要来自四川，其次是湖

① 日本学者曾经梳理过汉口米粮贸易的历史资料，请参阅中村治兵卫：《清代湖广米粮流通的一个方面》，见《社会经济史学》第18卷第3期（1952年），第53～65页；北村敬直：《关于清代的商品市场》，见《经济学杂志》第28卷第2期（1953年），第11～19页；藤井宏：《新安商人研究》，特别是《东洋学报》第36卷第1期，第25～26页；重田德：《关于清初湖南米市场的一点考察》，见《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10期（1956年11月），特别是第437页；也可参见全汉昇：《清朝中叶苏州的米粮贸易》，见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4本（1969年），第71～86页；全汉昇、理查德·克劳斯（Richard Kraus）：《清中叶的米市场与贸易：价格变动的研究》（马萨诸塞，坎布里奇，1975年）。

② 全汉昇：《清朝中叶苏州的米粮贸易》，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4本，第77页。

③ 转引自佐伯富：《清代盐政研究》，京都，1956年，第307页。

南。在正常年岁，汉口米商手中掌握着大量的米，足以使城内保持较低的米价^①。由于粮食供应主要仰赖其他地区，汉口几乎完全独立于基本上仍处于自然状态的周围腹地；它由国内市场支持着，并在其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事实上，汉口还向湖北省的其他地区提供粮食；更重要的是，驻扎在缺粮而且变乱频生的省内山区的军队主要在这里采购粮食^②。

系统研究汉口粮食贸易的日本历史学者曾注意到 18 世纪末汉口输往长江下游地区的大米量急剧下降，他们不能完全解释其原因。虽然此种贸易在 19 世纪二三十年代再度兴旺，但它再也未能恢复此前的繁荣^③。不过，所有清朝后期的地方史料都证实，大量米船从号称“谷仓”的湖南来到汉口繁荣的粮食市场^④。另外，当 19 世纪 50 年代后期汉口从太平军手中再次夺回之后，此种大米贸易曾有一个复苏期——这种复苏是由于需要把粮食从重新平定的长江中游地区运去供应仍在遭受战火蹂躏的长江下游地区的军民^⑤。迟至 1907 年，日本领事仍把大米排成汉口贸易的第二位商品（估计每年的贸易额价值达 1 800 万两），并报告说汉口码头每天都有 100 至 300 艘湖南米船在卸载^⑥。

虽然粮食贸易是汉口商业力量的基础，并在我们所研究的时期内一直保持其主要成分之一的地位，但是汉口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在其他商品例如食盐、茶叶的交

① 关于汉口的粮食供应，一些第一手观察资料就已进行过讨论，如《庄毅公年谱》（裕泰的年谱，约 1865 年前后）第 74 页，胡克：《中华帝国旅行记》第 2 卷第 297 页，水野幸吉：《汉口》（东京，1907 年）第 445 页等。另请参阅安部健夫：《谷米需求之研究——拟作为 雍正史的第一章》，见《清代史研究》（东京，1971 年），第 411～522 页，特别是第 467、502 页；重田德：《关于清初湖南米市场的一点考察》，见《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 10 期（1956 年 11 月），第 436 页。

② 藤井宏：《新安商人研究》，《东洋学报》第 36 卷第 1 期，第 26 页；苏云峰：《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 1860～1916·湖北省》（台北，1981 年），第 24～25 页；伊夫林·兰斯基（Evelyn Rawski）认为：汉口的粮食主要来自湖南，反映出汉口在粮食供应方面与其周围腹地的隔绝。湖南乡下生产的粮食要经过好几道转手才从生产者手中汇集到某一个地方收集点，如湘潭；然后，当汉口米商来买米时，就需要当地的“买办”在不同文化的买者与卖者之间搭桥。参见兰斯基：《华南农业的变化与农民经济》（马萨诸塞，坎布里奇，1972 年），第 104～107 页。

③ 中村治兵卫：《清代湖广米粮流通的一个方面》，《社会经济史学》第 18 卷第 3 期，第 60 页；北村敬直：《关于清代的商品市场》，《经济学杂志》第 28 卷第 2 期，第 8 页。

④ 例如叶调元：《汉口竹枝词》卷 1，第 15 页；《申报》光绪二年四月二十二日。湖南向江南运输的大米数量之所以下降，部分原因可能是由于进入 19 世纪之后，四川直接输往江南的大米数量有所增加。参见《湖北通志志余》第 6 章，《李善新传》。

⑤ 《湖北通志志余》，第 6 章。

⑥ 水野幸吉：《汉口》，第 290～291 页。大米之外，其他粮食的年贸易量也达到 1 800 万两。

易中必将发挥中心的作用。清朝后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汉口是淮南盐区的首要分销中心,由政府指定向长江中游的大部分地区销售食盐。尽管粮食贸易在汉口占有重要地位,但使这个城市享有“中国最商业化的东方城市”之美誉的,却首先是那些高贵的盐商们^①。数量相当多的大米(虽非大部分)由盐商的船队装载运往江南,而当这些船队回程时便满载食盐从扬州上行到汉口。虽然在19世纪后半叶盐贸易在地方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急剧下降,但到1907年,估计其每年的贸易额仍高达四五百万两,在全部商品贸易额中居第七位^②。在汉口建立之初,从湖南和其他茶产区汇集并重新分配茶叶就成为汉口的主要功能之一。历明、清两代,汉口为国内以及北边的蒙古和俄国的亚洲部分提供了巨大、而且不断增长的茶叶市场。1861年之后,茶叶成为汉口向海外贸易的主要商品,而且正是此种茶叶贸易的中心地位,才使西方人重视它。

作为国内贸易的中心,汉口据说拥有360种不同的商品^③,但当地的清代史料只说到有“八大行业”,通常是指粮食、食盐、茶叶、油料、中药材、皮毛、棉花以及来自广东、福建的种种杂货^④。在清代,油料的对内对外贸易均稳定地增长着(特别是桐油和白蜡),因此,到20世纪初,有报告称汉口的油料贸易额超过了粮食和茶叶,在所有商品中位居第一^⑤。在中药材贸易方面,汉口长期保持其全国最大中药材汇集地的地位,它的大批发商们控制了整个中国卖药商人所需要的各种土特产药材的装运。棉花与丝也是汉口传统的大宗贸易,它包括许多种类:生丝、染色的与未染色的、纺成线的、织成布的,以及已做好了服装。每天都有几百只民船停靠在棉花市场的岸边装卸货物。

对于长江中游地区特别是汉水流域来说,棉花贸易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自从元朝以来,棉花就成为汉水流域重要的经济作物和贸易商品。从陕南到汉水与长江的汇合处,汉水两岸都种植着棉花,尤其是位于汉阳上游汉水南岸的“天一沔”地区(包括天门县与沔阳州)的经济与棉花的关系最为密切。棉花贸易是湖北商人居支配地位的极少数贸易项目之一——特别是主要来自麻城县的商人组成的“黄帮”,在黄州城外的长江港口黄冈,操纵着棉花市场。相当一部分棉花是在汉口纺、

① 王葆心:《续汉口丛谈》卷1,第17页。

② [日]水野幸吉:《汉口》,第290~291页。

③ 张寿波:《袖珍汉口工商业一瞥》(1911年),第25页。

④ 所谓“八大行”,有时指管理这些商业活动的行会,而有时则简单地指这些商业活动本身。(参见本书第十章有关行会名称的分析)。有时候,一些其他行业,比如木材业,会取代上述行业中的某一个而进入这个名单。

⑤ [日]水野幸吉:《汉口》,第290页。关于汉口油料贸易更全面的报告,可见《申报》光绪六年八月十三日;刘载宗(音译):《汉水贸易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1800~1911》(台北,1980年),第74~90页;苏云峰:《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1860~1916·湖北省》,第32页。

织并染色的,这些棉纺织手工作坊都集中在棉花街与花布街上。另外,至迟从18世纪末开始,汉口就在来自于汉阳、黄州、荆州府等许多其他生产中心的手织布的市场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产品中的一部分在长江中游地区内部流通,但大部分质量较好的布都进入了地区间的贸易^①。

除了这“八大行”之外,汉口还是诸如大豆、麻、糖、植物蜡等农产品的主要国内市场(在对外贸易中,汉口在这些方面的垄断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发展)^②。汉口港外的鹦鹉洲是当时中国最大的竹子与木材市场。1859年,这个城市的煤炭贸易量曾经使额尔金勋爵(Lord Elgin)非常吃惊。习惯上是利用返回的运盐船把煤运往下游,因此,后来煤也成为汉口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之一^③。来自全国各地的土特产也在汉口找到了很好的销路。

总之,这些就是汉口主要的贸易商品。只要列一个表就可以清楚地表明汉口作为一个广阔地理范围的中心市场的地位。事实上,即使缺乏可靠的国内贸易量的估计数据,我们也能从一些确切的证据中得出这样可信的结论:19世纪的汉口发挥着一种独一无二的最重要的地区间商业联系的作用,它把长江中游广大地区的商品集中起来再加以分配。这个港口不仅是水陆路的转运地,也是水上运输的装卸地:在这里,货物被装进不同吃水深度的船只,以与深度和流量不同的长江上下游、汉水及湘江相适应。在大多数情况下,货物经过汉口时都要重新包装,并从一个船主转包给另一个船主。

我们运用施坚雅的大区(macroregion)理论对19世纪下半叶经过汉口的区间贸易作了分类,列成表5。区域顺序大致是按照它们与汉口之间贸易量的大小排列的,各区域下各种货物的顺序也是按照它们与汉口的贸易量由大到小排列的(这个表

① 蔡辅卿:《闲话汉口》,见《新生月刊》第6卷第1~2期,第78页;《武汉城镇合图》(1890年,武汉1980年重印);苏云峰:《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1860~1916·湖北省》,第29~30,37页;刘载宗:《汉水贸易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1800~1911》,第93~115页;水野幸吉:《汉口》,第498~515页;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北京,1957),第241~244页。另请参看潘新藻:《武汉市建制沿革》(武汉,1981)。关于汉口商业与湖北其他主要市场(沙市、宜昌、襄阳、老河口)之间的关系,请参阅苏云峰:《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1860~1916·湖北省》,第23~54页。

② E·H·帕克(E·H·Parker):《中国:她的历史、外交与商业》(伦敦,1901年),第148页;关于豆类市场,请参阅刘载宗:《汉水贸易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1800~1911》,第35~40页。

③ “额尔金(Elgin)致马尔莫斯伯利(Malmesbury)”,1958年1月5日,英国外交部档案,405/3;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北京,1957年),第2卷,第163页;佐伯富:《近代中国的经济统制政策》,见所著《中国史研究》第2卷,第62页;加纳特·J·沃尔斯利(Garnet Wolseley):《1860年与中国的战争纪事》(伦敦,1862年;特拉华,威尔明顿,1972年重版),第389页。

格只代表一种估计,而且有些单项的有关贸易量在这一时期的各阶段可能有变化)。

正如此表所示,汉口的中心位置使它成为中华帝国晚期许多最繁忙的贸易路线的交汇点。即使不是大部分也是很多的在汉口贸易的货物沿着这些道路中的某一条来到这里,并经过另一条路线离开。这些路线从汉口向四面八方辐射开去,其中最重要的五条——从南方起按顺时针方向数——分别是①:

1. 沿着湘江河谷贯穿湖南,之后转陆路赴广东。这是一条传统的主要贸易路线,活跃的广东商人从明代以来就开始把南方热带地区的香料和食品、当地的工业品如铁锅,后来甚至还有进口的洋货(包括鸦片)带到华中地区来。回程时则带走部分湖南输出的大米。广州——汉口商路上的城市,如湘潭、长沙,都是当时国内最活跃的市场。湖南本身沿着这条路线的北段把它的大米、茶、木材和煤运到汉口。这样,汉口就有数以千计的湖南船夫。随着广州在对外贸易中地位的下降,长江下游各港口的对外贸易逐步发展起来;后来,当汉口直接向西方开放之后,这条路线的南段就很少被使用了。不过,于此同时,外国人对湖南茶叶需求量的增长使这条路线北段的运输量不断增加。

2. 沿长江上行。许多四川船夫也聚集在汉口,他们带来大米、糖以及中药材(也是其中获利最大的商品)等负有盛名的四川农副产品。四川商人在汉口购买经由广州(后来是从上海来)到达汉口的外国纺织品。但汉口自身也直接开放以后,越来越多的四川商人越过汉口直接到上海去购买外国货了②。汉口——重庆一线的重要港口有宜昌、万县(原文作“芜湖”,显误,今经改。——译者)和沙市。长期以来,西方商人一直试图打开各种“关节”,以便挤进长江上游地区从事贸易,他们最后于1877年获得了成功③。

① 关于这些贸易路线的使用情况,在下列资料中均有记载:叶调元:《汉口竹枝词》、总理衙门档案、英国外交部档案、《申报》等。较为有用的第二手统计资料则包括北村敬直:《关于清代的商品市场》(《经济学杂志》第28卷第3期,1952年,第5、14页);藤井宏:《新安商人研究》(《东洋学报》第36卷第1期,第26、32页);张国辉:《十九世纪后半期中国钱庄的买办化》(《历史研究》1963年,第6期,第94页);森田明:《清代水利史研究》(东京,1974年,第138页);森田明:《关于中国的商业行会》(《富国大学研究年报》,第16卷,1972年);西里善行:《关于清末的宁波商人——浙江财团的起源研究》(《东洋史研究》第26卷第1期,1967年,第8页);罗兹·墨菲(Rhoads Murphey):《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马萨诸塞,坎布里奇,1953年。译者按:中译本198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查尔顿·刘易斯(Charlton Lewis):《中国革命的序幕:湖南省思想与制度的转变,1891~1907》(马萨诸塞,坎布里奇,1976年,第6~7页)等。吉尔伯特·罗兹曼(Gilbert Rozman):《中国清代与日本德川时代的城市体系》(普林斯顿,1973年,第131页)列出了15条中国长距离运输的路线,其中有五条主要路线通过汉口。

② 《字林西报》,1869年9月1日。

③ 弗朗西斯·怀特(Francis White):《发自汉口的报告》,见海关总税务司:《中国通商口岸的贸易报告1877年》,第21页。

表 5 汉口区域间贸易的品类, 1855~1900

地 区	来 汉 口	出 汉 口
长江中游	大米、粟、茶、油、煤、木材、金属、中药材、漆、麻、烟草、原棉、脱脂棉、芝麻	盐、原棉、糖、大米、纺织品、工业品、食品
长江下游	盐、棉线、茶、纺织品、陶瓷、漆、墨、海味、食品	大米、其他粮食、豆、油、煤、皮、麻、染色棉、中药材、木材、纺织品
长江上游	大米、中药材、油、盐、糖、蜡、丝绸、麻、食品	纺织品、棉线、其他工业品
西 北	皮革、羊毛、畜产品、漆、豆、油、酒、原棉	棉线、纺织品、茶、食品
华 北	粟、豆、皮革、麻、油、中药材、小麦、鸦片、煤、纺织品、地方手工艺品	棉线、纺织品、大米、食品
岭 南	洋货和土货、糖、食品、鸦片	中药材、谷物、豆、油、麻
东南沿海	茶、海产、食品	谷物、豆、油、煤、麻、中药材
云贵地区	漆、油、蜡、木材、鸦片	棉线、纺织品

资料来源：采自彭雨新：《抗日战争前汉口洋行和买办》，见《理论战线》1959年2月，第23页；据叶调元：《汉口竹枝词》；水野幸吉：《汉口》、英国驻汉口领事的报告；《海关报告》、苏云峰：《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 1860~1916·湖北省》以及其他资料作了修正。

3. 沿汉水上行，转陆路往北，到陕西、山西、蒙古以及西伯利亚。水陆路相结合的道路网，将富饶的汉水流域的产品，以及中国西北地区的毛皮、皮革和畜产品带进了汉口市场。至少是从宋代开始，就一直有大量的茶叶沿着这条路线运往北方，而这条商路的形成至少应当部分地归因于全国著名的“晋商”的兴起。从汉口沿汉水上行，直到陕西省的汉中，甚至更远一点的地方，是中国当时最重要的水路干道之一；而19世纪后半叶汉江大堤的建设，更有利于汉口贸易的发展^①。汉口与其腹地包括与它紧邻的汉水两岸的富庶州县之间有着最为直接的关系。

4. 经陆路至河南和河北。这是完全经过陆路进入汉口的最重要的一条贸易路线。通过这条路线，帝国首都的各种手工业品（如靴子）、干燥的华北平原上的农产品，由骡马和人驮驮载着，源源不断地送到汉口来。汉口也因此频繁地受到（北方）饥荒的影响，不时有报告称，来自河南省贫苦农家的女儿被带到汉口来，卖作女奴^②。

5. 沿长江而下，至江南和上海。这可能是自汉口建立以来其所有商路中最繁忙的一条，主要是由于汉口与江南之间的米——盐交换所致。其他各种各样的货物丰富了这种基本的贸易关系，并加强了汉口与九江、芜湖（原文作“无锡”，当误，

① 森田明：《清代水利史研究》（东京，1974年），特别是第99、138页。

② 参见《申报》光绪四年六月二十日所举的例子。

此处经改。——译者）扬州、南京等沿江下游城市、乃至宁波和其他三角洲海港城市之间的贸易往来。上海崛起之后，无论是在国内贸易还是在对外贸易方面，它就成为汉口惟一的最大的贸易伙伴。

至此，我已经初步指出：地区间贸易在汉口的集中，使汉口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市场体系”，或者说是一个“全国性市场”。这里，显然有必要更清楚地对这一观点加以辨析，特别是因为施坚雅（他的著作为我的这项研究在理论构架方面提供了很多帮助）否认在 1895 年之前存在着这样的全国性市场。他和另外一些学者，比如近年来从事这一问题研究的弗朗西斯·莫德（Frances Moulder），之所以否认存在着这样的全国性市场，主要是建立在这样的假设基础之上的，即：在中华帝国晚期，虽然存在着地区间的贸易，但地区间的贸易量相对于人口和社会生产总量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他们引证前工业化时期的运输成本来为这一假设辩护。施坚雅指出：“因为运输费用昂贵，加上路途遥远，所以一个地区和另一个地区的中心城市之间的事务联系被减少到最低程度。……[高昂的运输成本]，实际上使得地区之间进行价格低廉的大宗货物的贸易成为不可能。”^①

但是，近年来中国学者的研究却支持一种相反的观点。中国学者们一致认为：至迟到 18 世纪中期，中国即已出现了统一的国内市场。这一结论是建立在他们对当时存在着巨额的区域贸易量的认识之上的^②。例如：据彭泽益估计，18 世纪中期区域间贸易商品的价值每年可达 8 600 万两^③。（这个数字还没有包括地区间的走私贸易，而我们知道此种走私贸易的量也是非常巨大的）。尽管彭泽益指出此种贸易的规模在 18 世纪末、19 世纪初曾有所缩小，但他与其他中国学者都一致同意：此种贸易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又恢复了上升的趋势。

对汉口的研究势必导致赞同中国学者的这一观点。尽管我不太相信帝国晚期另有用意的那些国内贸易额的统计资料对于我们目前的研究是有用的，但一些确凿无

① 威廉·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地区城市化》，见威廉·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加利福尼亚，斯坦福，1977 年），第 217 页（中译本叶光庭等译，中华书局 2000 年版，第 249 页。——译者）。另请参阅同书第 248～249 页（中译本第 287～288 页。——译者）；威廉·施坚雅：《导言：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同上书第 24 页；威廉·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迁移策略：一个区域体系的分析》，见卡尔·A·史密斯（Carol A. Smith）主编：《区域分析》（纽约，1976 年）第 1 卷第 1 期，第 330 页；弗朗西斯·莫德（Frances Moulder）：《日本、中国与现代世界经济》（英国，剑桥，1977 年），第 32～35 页。

② 彭泽益：《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中国史研究》1981 年第 1 期，第 54～57 页；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史论》，北京，1973 年，第 280 页；韦庆远、鲁素：《清代前期的商办矿业和资本主义萌芽》，北京，1981 年，第 35 页。中国学者近年来的这些讨论，实际上是 20 世纪 50 年代最早提出的在 18 世纪即已形成全国性市场这一观点的继续与发展。另请参阅最近由杨益译成英文的《清代前期的土地制度》（1958 年中文版）刘荣春翻译的《清代苏州的手工业行会》（1959 年中文版），均见《中国史研究》1981～1982 年秋冬号，特别是第 105、140～141 页。

③ 彭泽益：《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中国史研究》1981 年第 1 期，第 54 页。

疑的、非数据性的证据都证明至少在本书所研究的时期内存在着全国性的市场。在贸易活动中支撑着汉口巨大的商业大军的主导性因素就是区域间贸易货物的转运。而且,转运的货物不是单价高昂的奢侈品,而是单价低廉的大宗货物,诸如大米、其他粮食、植物油、豆类、原棉,以及稍贵重一些的茶叶、食盐和木材等。这清楚地表明,相当比重的地方产品,甚至是重要的日用品,都已经超出本地区范围内进行买卖了^①。来自汉口之广阔经济腹地的各种商品(湖南的大米与木材,湖北的豆类和棉花)的去向为这一观点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其中的大部分都被装上船运往长江中游地区之外,而不是在长江中游地区内部交流。

更有意思的是相当普遍地存在着一种“国内移殖”(internal colonization)现象,即国内一个地方的商人集团在另一地区(常常与其故乡相距甚远)占据一个地盘,在那里他们主要或完全从事面向区域外市场的商品生产。作为例证,彭泽益曾提到18世纪江西商人对四川森林的开发,四川与湖南人对陕西林区的开发,以及四川、湖南和广东商人对云南铜、铅矿的开发,等等。在本书的后面各章中,我们还将看到几个19世纪的例子,如江西商人对湖南中药材和贵州木材的开发,陕西商人对湖北茶叶与烟草的开发等^②。

在这种较高水平的地区间贸易中,许多以籍贯为基础的商人集团,诸如著名的徽商、晋商、宁波商人、广东商人等,发挥了一种居中引导的作用。在这种引导下,才逐步形成了真正统一的国内市场(至少是在许多关系到中国人民物质生活的关键性商品方面)。这样的商人集团广泛分布在中国的各个地区,内部组织相当完善,而且为了共同的利益彼此间能够进行很好的合作(本书将多次提到这一点)。商业情报网络的迅速发展,更重要的是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成熟而灵活的钱庄、

① 此种跨区域市场的形成,并非在所有大区都是一致的。实际上,面向非地方性市场的商品生产主要集中在那些易于直接进入日益扩展并渐趋精密的遍及全国的水路交通体系的地方。(最清楚的例证则是与水路距离的不同,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影响,请参见伊夫林·S·兰斯基:《中国南方的农业发展和农民经济》,马萨诸塞,坎布里奇,1972年,第5章)。每个大区内跨区域市场最为发展的地方则是施坚雅所谓的“区域核心地带”。此外,陆上运输费用的限制(施坚雅、莫德及其他学者都强调过这一点)也是阻滞全国性市场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尽管如此,在我看来,在那些区域间贸易特别偏重的地方,人口与生产的高度密集化,恰恰使这样的地方易于形成全国性的市场。

② 彭泽益:《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1期,第56页。此种现象与米切尔·赫茨特(Michael Hechter)在《国内殖民:英国发展过程中的凯尔特边缘,1536~1966》(伯克利,1975年)中所描述的现象甚为相符(Celtic fringe,统指高地苏格兰人、爱尔兰人、威尔士人和康沃尔人或他们所居住的地区,因这些地区均属英国的边缘地区,故有此称。——译者注)。可是,在中国,这种国内移殖不像英国那样普遍,给移殖区带来的影响也不像英国那样消极。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在中国,国内移殖大都限于从日趋多样化或较少多样化的农业经济体系中取得一种单一的商品,如正文所举例证表明的那样。

票号系统的出现,促进了此种商人集团在全国范围内的广泛分布。汉口的例证说明:当时中国的商业资本对于全国范围内的市场状况极度敏感,这表现在它有能力如愿以偿地将投资从一种商品转换到另一种商品,或从一个大区转移到另一个大区^①。

总之,前工业化时期高效率的水运系统和特殊的商业手段,使中国克服了长距离、低技术的障碍,并在清朝中期形成了全国性的市场。即使在欧洲和其他地区,这样的发展也只有在蒸汽动力运输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实现。如果说中国国内市场有一个惟一的集散中心的话,它就应当是汉口,它完全称得上是一个“中心都会”。

二、汉口贸易的类型:地方体系

正如施坚雅所论证的那样,在市场层级中特定等级的中心地很可能同时发挥其较低一级中心地的功能,但它并没有这样做的必要。更准确地说,如果一个较高级别的市场体系的中心地处于一个较低层级的市场体系的空间范围之内他的话,那么,这个较低层级的市场体系的某些功能就会表现出向较高级别市场体系的中心地集中的趋势,而另外一些适合于较低层级市场体系的特殊的商业功能则可能分布在更为便利的地方。施坚雅本人指出,这种中心地集聚模式可能有一种例外:“我们在较高的经济层级中可以看到背离此种普遍性的中心地集聚模式的现象,并不是一个城市自身充当着较低层级的市场体系之中心,而是在这个城市的各重要城门外形成了好几个市场。这样,一个大城市就可能会有四个以它为中心的(较低一级的)市场体系,成扇形状地围绕着它。”^② 汉口就是施坚雅所说的这种背离了一般模式的极端的例子之一:较低层级的市场功能被分散给它的卫星市场去承担,而不是由汉口本身来承担。换言之,汉口在地区间贸易与区域市场体系中所发挥的作用,远比它在汉阳县及其附近的地方市场体系中所发挥的作用,要大得多。

这里,我们必须提到一个明显的一般性规律:从微观地形的角度看,有时河流不仅无益于商品流通,反而是一种障碍。因此,长江,这条中国地区间贸易的大动脉,对于小于区域规模的贸易来说,实际上却成了一种难以逾越的障碍。虽然汉口起着将长江南岸地区出产的某些商品(比如茶叶)运进全国市场的作用,但同一地区更为地方化的商业活动,则几乎完全依靠武昌和其他长江南岸的市场中心。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所有与汉口有着直接联系的较大城市和地方城市市场体系几乎全部

^① 史料中有无数例子都说明汉口的投资者变换所经营的产品,参见《湖北通志志余》第6章《李湘兴传》。关于商业资本在地区间转移的例证,则请参见帕特里克·胡休(Patrick Hughes):《汉口贸易报告,1877年》,英国外交部档案,17/1788。

^② 威廉·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迁移策略:一个区域体系的分析》,见卡尔·A·史密斯主编:《区域分析》(纽约,1976年)第1卷,第1期,第331页。

坐落在长江北岸。同样的规律也适用于考察汉水。这条较为狭窄（但湍急莫测）的河流虽然被证明并非不可克服，可是，在传统的水运条件下，对于低层级的市场体系来说，它所起的限制作用显然大于联系的作用。

这种情况造成的结果是：无论是作为较大城市，还是作为地方城市，汉口都表现出一种跨越市场体系的倾向，而此种倾向较之于它作为同一层级市场中心的倾向更为明显。认为这个城市在这些市场层级体系中完全没有起到一个市场中心的作用，显然是不恰当的，但多种地理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使它不可能仅仅停留在一个地方城市的水平。对于小船来说，除了在汉水与长江上航行的艰险之外，还会遇到在汉口港湾里驾驶与停泊的特殊困难——汉口的港口是为停泊长距离运输的大船而设计的。此外，大船船主们为泊船、货物贮存及市场设施所支付的费用也远远超过当地市场体系中商人的支付能力。一般说来，汉口与其紧邻的经济腹地的商业关系，基本上限制在供给本市居民自己消费的物品，或直接进入全国市场的物品范围之内，而较少供给本地区内部交换的物品。

然则，这些市场体系呈现出怎样的空间形态呢？沿着长江北岸，在汉阳县两侧，分别以黄州和仙桃这两个“较大城市”为中心，形成了两个市场体系。（见图2）黄州位于汉口下游130里处，是黄冈县和黄州府的治所。它也是“黄帮”——一个在整个汉水流域的贸易中占据着主导地位的、富于冒险精神的商人集团的总部所在地。相当多的黄州商人聚集在汉口，创建了一个同乡聚居区：至迟到1738年，他们已建立起自己的会馆。同时，黄州也是它所处的这个较大城市市场体系的中心，它汇集了诸如豆类、植物油和稻谷之类的商业产品。这些商品中有一部分也在汉口进入全国市场。清代中后期，随着越来越多的黄帮商人将他们的商业活动转移到了汉口，黄州作为一种“较大城市”的部分市场活动也因此向汉口转移。正因为如此，介于黄州府与汉阳府之间的黄陂县在行政上被从黄州府划出来，改隶汉阳府^①。

仙桃是沔阳直隶州的一个非行政城市。它坐落在汉水的西南岸，距汉阳城大约150里（50英里），来自盛产棉花与稻谷的天门县境的无数条支流和排灌水渠在这里汇集。和黄州一样，仙桃也是几个势力雄厚的商人家族的总部，他们的活动遍及汉水河谷和江汉汇合地带。在20世纪的一次行政调整中，仙桃的商业中心地位得到承认：沔阳州的治所从那个沉寂的、衰落的沔阳城迁到了仙桃^②。

① 《申报》光绪九年七月二十一日；1920年《夏口县志》卷2，第24～25页；蔡辅卿：《闲话汉口》，见《新生月刊》第6卷第1～2期，第78页；《长江日报》1964年6月21日，《黄陂街》。

② 王凤生：《筹办江汉水防备览》（1832年）卷2，第20～21页；《刘氏宗谱》（1924年）；《冯氏宗谱》。

在“地方城市”这一层级上，汉阳县被汉水分隔成两个互不关联的市场体系（参见地图3），而汉口则与这两部分都保持着联系。位于汉水南岸、靠近汉阳城的这部分，俗称“汉南”，面积较大，农业非常发达。它的面积虽然不到汉阳全县的3/4，但却包括了全县19个税区（“里”）中的17个。到1894年，它更囊括了全县得到承认的23个集市中的19个^①。虽说偶尔有些丘陵，但由众多支流所组成的水网以及大路，仍使汉南很好地统合为一个市场体系。除了稻谷与棉花等农作物之外，自从康熙朝以来，这个地方就逐步形成了一个买卖棉布的较小规模的、却面向全国的市场。这个市场叫索河，位于汉阳城以西大约85里（相当于26英里多）处。对于周围地区的农民来说，它是一个最重要的中心，他们都将自己的家庭副产品拿到这里来。18世纪初至19世纪末的很多报告都表明：很多以汉口为基地的小商贩每天都到索河去购买棉布，然后拿到城市去卖。在汉口，这些棉布被染色、加工、卷成匹，再卖给从事地区间贸易的大商人^②。

除了索河与汉阳城（它的作用甚至在当地商业活动中也惊人地微弱^③），汉南还包括三个市场中心，其重要性足以导致在那里设置巡检司。新滩是汉阳上游的一个长江码头，距县城约110里（大约40英里）。它是汉阳县南境的主要集市。沌口位于一条流入长江的小河的入江口，是一个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的据点，也是漕粮汇集的一个初级仓库。由于19世纪中期湖北漕粮大部分改成了折银，沌口逐渐衰落下去，最后，巡检司也从这里迁到了蒲潭^④。第三个集市是蔡甸，它位于距汉阳60里（约20英里）的汉水上游，是汉南地区最重要的经济中心。而且，作为地方市场体系的中心，蔡甸进一步将它与区域，甚至是地区间贸易中的某些重要功能结合了起来。19世纪50年代，当地的一位作者把蔡甸描述成“汉口的附庸”^⑤。同更上游的仙桃一样，蔡甸也是如血管般遍布“天（门）沔（阳）”地区的众多小水道的排泄口。对于许多汉水上的商人来说，蔡甸往往是他们南行的终点——出于经济或方便的考虑，他们大都不愿亲自到汉口去。这个镇的名字令人联想起和它的兴

① 光绪《湖北輿地志》卷5，第22~23页。

② 1748年《汉阳县志》，转引自藤井宏：《新安商人研究》，《东洋学报》第36卷第1期，第15页；1818年《汉阳县志》卷7，第22页；范锺：《汉口丛谈》卷1，第17页；“额尔金（Elgin）致马尔莫斯伯利（Malmesbury）”1859年1月5日，见英国外交部档案，405/3。

③ 汉阳在市场层级中只能列为“地方城市”。虽然它也兼负着更高一级或两级经济层级之中心地的某些功能，但是，（1）作为府治的行政地位，要求它为官绅与文人们提供居住条件；（2）因为紧靠汉口，它只能从那里分得一点点地区间贸易的余额；（3）即使在汉口兴起之前，它也只是个地区城市。所有这些原因，决定了它只能是一个地方城市。

④ 《申报》光绪六年七月五日。

⑤ 胡兆春：《尊闻堂诗集》，《胡氏遗书》，第6页。

起联系在一起的蔡氏家族——明朝末年，蔡家在当地的影响力达到了顶点。1670年，蔡甸商业上的重要性使它成为著名的刘氏家族和姚氏家族的宗庙所在地和商业总部——刘氏与姚氏也许算得上是最能适应商业潮流的地方权势家族。在19世纪上半叶，姚玉魁是当地最重要的商业力量。据说，他一半时间在汉口工作，一半时间在蔡甸工作。几十年后，他的一个后裔，姚朝宗，在蔡甸和沙市创办了一系列的干货连锁店^①。到1818年，蔡甸镇已经驻有几千家商号，而且当太平天国运动时，尽管周围的商业中心多次遭到破坏，它却得以幸免于难，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到19世纪末，蔡甸已经成为著名的“水陆要津”，以及捞钱的厘金局的驻地^②。自1950年起，蔡甸就成功地取代汉阳城，成为汉阳县的政府所在地。

汉阳县位于长江以西、汉水以北的那个扇形地区（汉口本身也处于这一地区），属于与汉南分离的另一个市场体系。这一地区湖沼密布（一个名叫“后湖”的巨大的贮水塘是这一地区地貌特征最主要的代表），直到19世纪初还没有被大规模开垦。虽然19世纪二三十年代这里的人口越来越多，但其农业仍仅限于生产维持生存的粮食，以及提供一些瓜菜给汉口的零售市场。捕鱼是最重要的副业，捕到的鱼同样也大都拿到汉口市场上去卖^③。汉阳县北境与该县其余部分经济上的分离，有利于独立的“夏口厅”（后来在20世纪初改称“夏口县”）的建立，但它却从未形成自己独立的经济体系，而是与其北面的邻县——黄陂和孝感的部分地区连成一片，共同组成一个地方市场体系。除了与黄陂分享共同的江岸之外，汉口还通过由许多虽小却很适于航行的小河组成的水网与黄陂、孝感二县相联系，大部分小河在汉口土垌湾和六渡桥附近流入玉带河。土垌附近也是联系汉口与黄陂的主要大道的终点。到1820年，在沿着玉带河（也就是沿着汉口面向陆地的边界）的一些平整的空地上，已经形成了很多每天都逢集的露天市场。到19世纪后半叶，随着地方贸易的加强，一些小商贩和经纪人在附近商人们的引导下，更加老练地经营着流入汉口的食品生意^④。

汉口有时会从这个地方腹地直接输入某些种类的消费品。它也为黄陂的作坊和

① 《刘氏宗谱》（1832年）第2章；《汉阳姚氏宗谱》第2、3章；《姚氏宗谱》第6章，第10页。

② 1818年《汉阳县志》卷7，第21页；《申报》光绪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③ 范锺：《汉口丛谈》卷2，第1页；《申报》光绪五年七月十二日；张寿波：《袖珍汉口工商业一瞥》（1911年），第20页；《在玉带河的故道上》，见《长江日报》（佚日期）。

④ 范锺：《汉口丛谈》卷2，第26页；《申报》光绪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光绪八年六月十八日；《汉口的六渡桥》，见《长江日报》1962年8月23日；关于其他汉口周围的产品市场情况，参见王葆心：《续汉口丛谈》卷3，第47页；刘文岛：《汉口市政史概况》（汉口，1930年）第1册，第1章，第5页。

农民家庭手工作坊所生产的手工业品（如烟袋、铜饰等）提供进入全国性市场的通道，还向这个腹地的人们提供进入城市工作的机会。尽管汉口在地方体系中发挥着如此之大的作用，但将它看成是包括黄陂、孝感和汉阳县东北部在内的广大地区的中心地仍然是错误的。地方内部的市场功能看来主要是被分散在几个较小的中心地。其中最重要的也许算得上是半边店。它是黄陂县的一个非行政性的“地方城市”，是当地植物油贸易的中心。附近几个县的农民和小商贩们都被吸引到这里的榨油坊来，而汉口则完全被置诸一旁^①。

总之，虽然汉口并非与其腹地完全隔离，但它在湖北中南部地区的经济作用却受到很大限制。它几乎完全是为了适应地区间贸易而形成的，无论是在与其他地区的联系上，还是在长江中游地区与国内市场的联系方面，它都占有绝对的垄断地位。甚至在居民的食物供应方面，虽然汉口从它的郊区“后湖”地区获得鲜鱼与蔬菜，但它还需要通过地区间贸易从遥远的地方得到大量的食物——实际上包括绝大部分的粮食。换言之，汉口的这种情形显示出它周围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非常之低，而这一事实又反映了汉口社会历史的某些特点。

在最近出版的《局外人：西方人在印度与中国的经历》一书中，罗兹·墨菲（Rhoads Murphey）更进一步地阐明了与此相同的观点。他说：

与印度的情形相比，中国通商口岸与其腹地之间的联系受到了严格的限制。这种联系很大程度上被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通过中国买办运出一些重要的农产品来出口，再通过他们将进口或在开埠城市生产的比较少量的工业品分散到各地。在某些经济领域，通过通商口岸的间接代理商，商品化的程度有所提高，对外贸易有所增强，但总的说来，这些变化并没有能够带来中国经济状况的巨变。

我们可能不太同意墨菲有关中国城乡经济分离程度的看法，但总的说来，我们对汉口的研究结果，证实了他的“城市独立于乡村”的观点。无论如何，似乎都没有理由将此种现象完全归因于这个城市是通商口岸。汉口引人注目的地区间贸易量和贸易范围在鸦片战争前好几个世纪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并且甚至在汉口开放之后仍然是它最具生命力的一个方面^②。正是汉口之全国性突出地位的建立，而不是西方的影响，使它逐步摆脱了地方商业体系之中心城市中的地位。这种转变是明清时期中国统一的全国性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① 嘉庆二十五年戴春云奏疏，见《明清档案》，“刑科题本”。

② 罗兹·墨菲：《局外人：西方人在印度与中国的经历》（安阿伯，1977年），第8页。

三、商业的运营

城市学家一般认为：“前工业化城市”必然存在着较低的劳动分工与职业的专门化。但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却总是与此种观点不符。在中国，正如施坚雅已经指出的那样，随着经济中心地规模的扩展，劳动分工的程度也在不断增强。因此，像汉口这样在市场层级中居于最高层级的城市，在职业构成和商业内部部门都拥有高度发达的分工^①。

在汉口商业活动中，存在着复杂的劳动分工，它是按照产品 and 功能来分门别类的。金融投机家和运输承包商可以（也确实是这样做的）根据市场行情，把他们的投资和运输业务从一种商品转移到另一种商品^②，但是，更直接地参与商品经营的商人们大都倾向于专做某一种商品的生意。报纸上关于当地火灾的报道列举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零售商店，它们专门出售一种商品，诸如帽子、手帕、酒、烟草、鞭炮、食用油和绳索等等。政府特许的经纪人受到法律的限制也只得经营一种商品。批发商则可以像非常成功的汪士良和他的妻子那样，从一种单一的商品开始（种类繁多的当地茶叶），发展到与之相关的领域（其他食品），之后再开办附属商行，经营与之无关的商品（棉布）^③。但是，根据经营商品而组织的商业行会比起同乡会来日益增多的趋势，反映了这样的事实：个体批发商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地朝着经营商品的专一化方向发展。

更为显著的是，汉口商业活动复杂细致的劳动分工还表现在这样的体制中，即：每一个商人在某种特定商品的收集与出卖过程中，都只承担其中一个很小环节的工作。曾经有一位中国学者将这种体制称为“自然行业”，以与“现代企业”相对应，其特征是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存在着由各种承包商和次一级的承包商组成的商业网络。为了适应国内贸易的需求，它曾历有变化，并在最后也被用于对外贸易。例如：在考察桐油从汉口向海外输出的过程时，彭雨新列出了7个不同等级的商人，通过他们，桐油才从生产者那里转送到外国买主手中^④。在商品集散链上每

① 威廉·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亚洲研究学报》第24卷（1964～1965），第3～44、195～228页（中译本由史建云、徐秀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译者注），特别是第二部分，第212页（中译本第93页。——译者注）；威廉·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迁移策略：一个区域体系的分析》，见卡尔·A·史密斯主编：《区域分析》（纽约，1976年）第1卷第1期，第328页。关于城市学家的观点，请参阅杰顿·斯乔伯格（Gideon Sjoberg）：《前工业化时期的城市》（纽约，1960年），第91页。

② 作为一个记录下来的例子，比如：据“总理衙门档案”记载，光绪十三年五月，一个独立的船主为了一宗获利更多的运盐业务，而突然违背了与洋商已订好了的运输合同。

③ 武汉市工商联：《武汉市汪玉霞食品厂沿革》，手稿，1959年。

④ 彭雨新：《抗日战争前汉口洋行和买办》，《理论战线》1959年第2期，第29页。

一环节的商人都有明确的权限和责任。

许多联结这些商品集散链的节点都是在重要的商业城市里,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中的大部分已实现了高度的资本化。相反,其中的大部分都是“以代理业务为基础的本地小本商人”,就像英国领事莫德赫斯特(Medhurst)1867年所描述的那样^①。几乎所有值得注意的中国和日本有关这一问题的学术论著都指斥这一体制的“封建性”,认为它只能是建立在大小商人之间的金钱契约基础之上的^②。在最近修订的一篇文章中,罗曼·迈尔斯(Roman Myers)(马若孟)明确指出:这种体制使人们对中华帝国晚期的商品化水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它刺激较少积蓄的那部分人在从事生产活动的同时,又可以从事承包或转包活动”^③。这两种观点是合理的;可是,当面对国际竞争的时候,这种资本利用水平很低的商业体制就暴露出许多严重的缺陷,就像在汉口茶叶贸易中所发生的那样。

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将汉口的商业团体划分为五大类。下面,我们将按照它们在商业活动中所处地位之高低,分别加以简要地讨论^④。

1. 代理商或经纪人。根据他们所专营的商品,经纪人可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拥有政府执照的“牙行”,一类是没有政府执照的“经纪”。他们都是独立的商业从业人员,其基本作用是管理某一类商品交易的市场和在卖主与买主之间充当中间人。经纪人或者拥有自己的栈行,或者是某一栈行的合伙人。“栈行”里储藏其委托人的货物和近期的进货。它一般附设有一个客店(“舒行”),商人们和他们的伙计们在汉口做生意时就住在这里。这些货栈兼客店是汉口真正的核心。据一本1867年的《商业指南》说:沿着汉口的主要街道,所能看到的实际上只有这些货

① “莫德赫斯特(Medhurst)致阿尔科克(Alcock)”,1867年1月23日,见英国外交部档案17/428。

② 较好的论著可以举出波多野善大《中国近代工业史研究》(东京,1960年)、横山英《中国近代化的经济结构》(东京,1972年)以及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人资本》(北京,1956年)等。

③ 罗曼·迈尔斯(Roman Myers,马若孟):《明清时期的商人和经济组织》,见《清史问题》第3卷,第2期(1974年12月),第85页。

④ 这里的总体分析是以收集自如下文献的原始资料为基础的:《总理衙门档案》,《明清档案》,《申报》的报道,叶调元:《汉口竹枝词》,水野幸吉:《汉口》,以及日清贸易研究所《清国商事指南》等。与此相关的第二手资料则包括:冯华德:《湖北省“牙税”性质之演变》(见方显廷主编《中国经济研究》,长沙,1938年,第2卷,第1067~1080页),彭雨新:《抗日战争前汉口洋行和买办》(见《理论战线》1959年第2期),根岸佑:《买办制度研究》(东京,1948年),阿德利·李·麦克埃德里(Andrea Lee McElrerry):《上海的老式银行(钱庄),1800~1935》(安阿伯,1978年),以及斯波义信:《宁波及其腹地》(见威廉·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410~414页)等。而我对于中华帝国晚期商业结构的认识,则应归功于与苏珊·梅·琼斯(Susan Mann Johns)教授的多次交谈。

栈兼客店建筑^①。经纪人可观的收入主要来自于这些房屋的租金、监督买卖与看管抵押货物的佣金，有时也来自于为某项交易提供保证金得到的利息。此外，经纪人也常常在他们所“经纪”的商品方面，经营自己的生意。

2. 其他委托代理商。除了经纪人之外，汉口还有各种各样的代理商开业。这些人也主要是把卖主与买主撮合在一起，作为报酬，他们得到一定比例的交易额。与经纪人不同，他们实际上没有资本，不是独立的商人。他们更像是一种契约雇员，在买卖双方谈判交易的过程中，提供一些帮助。（一种特殊的代理商受雇于经纪人，处理他们日益增多的一些日常事务。）代理商因其特定的作用而有各种各样的称谓，可是，作为一个阶层，他们都被归于“经手”或“经手人”。有一种“经手”就是众所周知的“买办”。虽然“买办”制度在开埠之后才逐渐发展成熟，但在汉口这样五方杂处的大都会，在1861年以前，“买办”就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比如，聂道平，一个湖南人，就是一个参与全部国内贸易的买办。一位湘潭大煤商雇用了他，并通过他将煤卖给汉口的各省商人^②。和经纪人一样，这些代理商也不时通过投机经营自己的生意，以谋取利益。

3. 批发商。这类商家有各种各样的称号，比如“庄”、“号”、“店”。他们都专营一种或某一系列的商品，这些商品在出卖时经常盖上店主的姓或店号。他们一般只是买卖自己经营的货物，有时也会对商品做一些局部的加工。因此，一个“庄”通常是一个相当大的营业点。一份清末的史料估计：在汉口，一个“庄”的资本一般在一万两至六万两之间。较大的批发商长期雇用自己的采购员，而较小的批发商则从独立的“行商”那里购买货物。汉口的“庄”常常进入其他商业中心的相同行业中去。例如：1940年前后，著名的宁波镇海的方氏家族就在汉口建立了经营洋花布的批发行，它是一家在上海、杭州和其他城市都有分号的、经营糖、茶、丝绸和棉花的大集团企业的一部分。同样，汉阳县的姚氏家族在汉口、蔡甸以及沙市也都有经营棉花与丝绸的商号。再一个例子就是一些专营粤菜和川菜的人，他们在汉口的分店与其在重庆、成都、广州、上海和扬州的分店都有密切的联系^③。

4. 行商。他们通常被称为“客商”或“贩子”。虽然这些人在较小的市场一般

① W·F·迈耶（Mayers）N·B·丹尼斯（Dennys）C·肯（King）：《中国、日本通商口岸大全》（伦敦，1867年），第445页。关于汉口经纪人群体的经营情况，特别是在大米交易方面，请参阅安部健夫：《谷米需求之研究——拟作为 雍正史 的第一章》，见《清代史研究》（东京，1971年），第502页。

② 同治六年一月二十九日湖广总督官文的奏疏，见《总理衙门档案·湖北、浙江、奉天华洋煤窝交涉》聂在最初的记载中即被称为“买办”。

③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上海钱庄史料》（上海，1960年），第730～731页；《姚氏宗谱》第6章；《申报》光绪七年闰月六日。关于“庄”的资本化，请参阅日清贸易研究所《清国商事指南》第1卷，第972页。

是分别从事零售生意，但在汉口，他们却几乎是专门的批发商：他们把商品带往主要的城市中心或乡村市场，或者从其他城乡市场运回货物。很少“客商”是汉口本地人，但他们中的许多人长期居住在这里，而且在好几个街区，他们占据了人口的多数。个体客商的营业规模有很大差异，但集合起来，他们就构成了汉口市场的血液，并提供了几乎所有的贸易商品。他们不仅买卖自己的货物，还接受雇用，为别人处理一些商业事务。一些大客商可能拥有自己的运输工具，但大部分人依靠租船或挑夫。汉口最典型的大客商是宁波商人史富润，他与他的叔叔、兄弟以及杭州人陈中吉合伙，在宜昌与几个下游港口城市如镇江之间，从事帆船贸易。史与他的合伙人用他们自己的资金购买木材运往下游，而在回程则装上桐油。由于桐油的单价较高，他们的上水贸易常需要向金融财团求助^①。

5. 零售商。多称为“铺”，有时也称“店”（常与某一批发商号同名）。为了供应众多的人口，汉口需要大量的市内商人。他们的店铺种类繁多，大小不一，从街头小贩的货郎担，到露天的小摊子，到拥有数千两资本的历史悠久的商号。一般说来，零售贸易与这个城市主要的地区间贸易有着明显的区别，但在两者的连接点上，经常有一些个体商贩在发挥着作用，他们帮着照料批发商号周围那些准备装运的存货，并在这里收购一些可供零售的货物^②。

现在，让我们对汉口商业企业的结构作一个简要的考察。正如日本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中华帝国晚期的大部分商家都是遵循着血缘关系（日本学者称作“封建”）组织的，其雇员一般是通过血缘关系或同乡关系补充的。在汉口商业中，我们可以找到很多这种情况的例子。这有利于增强雇员们的忠诚。这一点对于上面所提及的、来自四面八方的汉口商家来说，尤其重要。藤井宏把这种商行，比如徽州商人在汉口所建立的商行，描写成这样一种家族系统：家长就是企业的领导，主要由其直系血统的亲属辅助他，只有少数杂务由那些与主人同乡但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来做，他们又常常是主人家的“世仆”^③。受雇的伙计如果不是老板的亲属，通常会规定一些相当苛刻的义务。如一位英国官员记载说：由于受到太平军的威胁，“汉口商行的老板们几乎全部逃离了他们的商店，而只留下很少可靠的人，他们作为主要店员留下来负责照看商行”^④。

① “艾勒伯斯特（Alabaster）致韦德（Wade）”，1880年7月7日，见英国外交部档案，228/651。

② 《申报》光绪十三年十一月九日。

③ 藤井宏：《新安商人研究》，《东洋学报》第36卷，第3期，第78～79页。

④ 怡和洋行档案，“汉口办事处理查德·杜德利（Richard Dudley）致上海总部”，1861年5月20日。译者按：作者对此条史料的理解可能有误，它不足以说明非亲属雇员承担的苛刻的义务。至少，这条材料不是很典型。

然而,如果作进一步的考察,我们发现:在帝国晚期的汉口,这种家族所有、家族经营的商业企业已经逐渐发生了转换。我们注意到18世纪中期有一个这样的例子,徽州商人汪士良将他门类繁多的汉口商行转交给一位山东籍的职业经理,以便他自己能够告老还乡^①。到19世纪中后期,绝大多数因各种原因而被汉口道台调查过的商行都是由来自全国各地的合伙人组成的^②。而且,这些商行往往是按照看起来相当现代化的合资经营方式组织的。

显然,19世纪汉口的商业世界完全符合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提出的“经济理性”的主要标准:资本的普及化及其精巧的运用^③。到19世纪,股份制商行在中国商业领域已有了很长一段历史。根据今堀诚二提出的时间表,“古典式”的合伙企业是从明代中叶开始的,其结算体系的特征是按照每一个投资合伙人投入资本所占的比例,来分配利润(这与领薪水的雇员大不相同)。在19世纪的前25年中——即鸦片战争以前——负责具体经营商务的经理(“伙”)与单纯的投资人(“东”,他不负责商务的具体经营)之间的区别就越来越明显了^④。在中国最近重新发表的一篇研究清初煤矿经营的文章中,邓拓详细说明了煤矿资金账簿所反映的如何根据资本投入的比例、经营责任的大小以及更广泛的其他因素,来计算利润分配给股东们。而且这一体制有一种内在的能力:当需要增加投资时,它可以在内部扩大融资^⑤。

在汉口,复杂的合伙形式与资本积累方式长期维持在一种相当低的水平上。19世纪50年代的一份地方史料描述几乎所有类型和规模的汉口商行,都是“各有财东各有宾”^⑥。到19世纪60年代,一位当地海关官员描述说:汉口的“中国投机

① 武汉市工商联:《武汉市汪玉霞食品厂沿革》,1959年稿本。

② 汉口道台的这些调查报告见于总理衙门档案。有关各地商人的合伙关系更详细的情况,请参阅本书第7章。

③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社会与经济组织的理论》(纽约,1964年),从第191页开始。遗憾的是,我未能找到19世纪汉口的账簿。有不少证据是有关北京的,罗伯特·P·加拉(Robert P. Gardella)在《中国清代和西方的商业账目:一个初步的评估》(见《清史问题》第4卷第7期,1982年,第56~72页)一文中对此作了讨论。关于账簿革新的意义,请参阅雷蒙德·德·路福(Raymond DeRoover):《中世纪布鲁日的金钱、银行和信用》(马萨诸塞,坎布里奇,1948年)。

④ 今堀诚二:《清代合伙的现代化倾向——以“东”、“伙”分化形态为重点》,《东洋史研究》第17卷第1期(1956年),第1~8页。关于中国合伙制的早期历史,请参阅斯波义信:《宋代商业史研究》(日文初版于1968年,风间书房;英文本由伊懋可译,名为《宋代的商业与社会》,安阿伯,1970年;中译本由庄景辉译,台北稻禾出版社1997年版。——译者注),自第199页始(所注为英文本页数。——译者注)。

⑤ 邓拓:《从万历到乾隆》,见所著《论中国历史几个问题》(北京,1979年),第221~224页。

⑥ 叶调元:《汉口竹枝词》卷5,第3页。

商们”由于前一年茶叶歉收而蒙受了损失，所以正将他们的资本大量地转移到盐贸易方面来，以便努力弥补他们的损失。这说明当时的汉口不直接参与具体商务经营的投资人已经相当普遍^①。

1887年，皇家亚洲协会中国分会举办了一次有关中国商行破产处置之法律定罪的讨论会，会议论文集充分反映出中国商业组织的复杂性，以及法律原则不得不依靠强化个人责任才能实施的情况^②。与会的大部分人都在汉口长期生活过（艾勒伯斯特、加德纳、帕克），毫无疑问，他们是以其在汉口的观察为基础进行评论的。讨论会一致认为：在中国，没有固定的法律法规以确定每个合伙人的责任，但合伙人一般会认可官方的判决，认为那是公正的。通常，合伙人按照他们先前的投资比例来分担债务责任。然而，在一些情况下，合伙人之一常被指定为“经理股东”，其他合伙人提供的投资可能仅仅被认为是借钱给他；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合伙人的债务责任也就只限于其最初的份额。在任何情况下，如果是由于经理股东的失职而导致商行事业失败的话，那么，他就要承担比他的投资份额要多的债务责任。

汉口的商业运营因其经营项目之不同而有很大的不同，甚至每一种商品所使用的重量、尺寸等基本标准都不相同。但是，在这个城市大部分贸易活动中，某些共同的规则还是统一的。其中最主要的是使用“中人”——他在经济领域各层次中都发挥作用，从上述之批发经纪人、代理商，到同乡邻里往来中的私人小生意和个人借贷。“中人”通常起两重作用：一是作为交易当事人的保证人，二是作为买卖活动中公正的仲裁人。作为所剩不多的19至20世纪中国商业活动之特征的证据，“中人”的第一重作用已有许多人作过论述（如玛丽安·利维^③及其他学者）；在这里，我想强调一下“中人”在维持一个有秩序的市场中所起到的“理性”作用。

“中人”的这种“理性”作用在如下事件中可以得到很好的说明。1880年，几位英租界的居民打算向停泊在汉口港的运石船购买一批铺路石，以维修当地的路面。船主急于卖掉石头，但说必须要当地的石头商行会作中人。英国人就去找石头商行会的管事人，这些不知所措的“洋人”得到的答复是：为了保证市场上持续有货和价格稳定，运石船必须按照到达汉口的先后排定顺序，只有在所有排在前面的船都卖完了石头之后，才能允许后来的船交货^④。这样做的后果，减弱了买卖人之

① 海关总税务司：《中国通商口岸对外贸易报告》（上海，1865年），第40页。

② 《中国的合伙制：个体成员的责任》，《皇家亚洲协会中国分会学报》，第22卷第1期（1887年），第39～52页。

③ 玛丽安·利维（Marion Levy）与石科衡（音译）：《中国现代商人阶层的兴起》（纽约，1949年），第1章第6节及其他各处。

④ 湖广总督李翰章的奏疏，光绪六年八月二十八日，见《总理衙门档案·湖北洋人交涉》。

间竞争的强度，稳定了物价。但这并不意味着物价是由“中人”决定的。鸦片战争时期的湖广总督裕泰作为见证人提供了这个事实的证据。当时，清廷命裕泰在汉口采办铁料用以铸造大炮，以反击进犯广东的英军。当他为办理此事与作为中人的当地的生铁经纪人接触时，这位总督对市场上金属的要价深感惊异。于是他着手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市场价格既不是固定不变的，也不是任意上涨的，而是在汉口生铁经纪人成功的调节下，由供求关系决定的。这让裕泰感到很满意^①。

另外一些得到汉口商业界普遍承认的共同准则，也有利于市场秩序的维持。汉口有很多交易地点，在每个交易地点，都有一种占据主导地位的交易，这与唐代官方管理市场的某些特点很相似。虽然现在起控制作用的是民间组织商业行会，但控制并没有因此而放松。较大的市场交易几乎都是季节性的，因为在冬季的江河上航行对于无数装载货物去贩卖的民船（个人所有的小帆船）来说，有很大的风险。每个控制一种贸易的商业行会都选择一个吉日，以开始此种贸易的交易季节；这个吉日每年不同，但这个城市里所有的或大部分的市场对于特定季节所选的开张吉日却几乎相同。一旦市场开张，对贸易负有督导责任的经纪人即努力把喊价与出价限制在适当的秩序与稳定的价格范围内。在大部分贸易中，新来的买卖人在公认的某一种商品市场之外的地方摆摊出卖他们的商品，并不受到严格地禁止，但因为这些公认的市场一般都位于最方便装载这一类货物的船只停靠的地方，并且保证提供给他们以装卸货物的方便，也有充足的理由在这里可以遇到买主，所以，大部分新来的商人都乐于服从市场和市场管理人员^②。

虽然在汉口商业的内部，坚持不懈地致力于控制与自我调节，但19世纪的汉口仍得以保持为一个著名的自由运转的市场。贸易受到严密的监督，但从未被彻底控制。江湖骗子、纨绔子弟与街市混混儿在这个城市都很活跃。可是，西方著作中通常描绘的中国城市（或“前工业化城市”）的种种陋习和效率低下，在汉口却很少表现出来。以原始的讨价还价代替理性的市场控制机制，在与贸易伙伴的关系上持一种强烈的排他性态度，不合适的贮藏方式和贮藏设备，以及缺乏马克斯·韦伯赋予给城市的“契约自治”的特征^③，等等，似乎没有一条完全适用于中华帝国晚期像汉口市场所显示出来的大宗批发贸易方面。所有各式各样书面的商业协议，从船运协定（“船票”）、装货单（“保单”、“清单”），到各种凭据（“凭票”、“借据”）

① 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裕泰的奏疏，见《清宫档案》。

② 关于汉口市场的季节性安排，可参见《申报》光绪二年二月十八日、二月二十八日的记载，以及水野幸吉：《汉口》，第291页。

③ 马克斯·韦伯：《中国的宗教》（纽约，1951年），第102页；杰顿·斯乔伯格（Gideon Sjoberg）：《前工业化时期的城市》（纽约，1960年），第200~207页。

的交易契约(“订单”、“成单”),都在汉口正常地通行流转^①。实际上,如果没有这些,这个城市如此庞大的贸易是无法想像的。商人们与行会地质量控制方面的一致努力,恰恰证明他们并非忽视“市场理性”,而是对它抱有一种依赖感。韦伯曾把“理性经济”定义为“一种功能性组织,它与源于人们在市场中的利益争夺的货币价格相适应”^②。基于以上事实,我们认为:19世纪的汉口经济完全适合韦伯所说的“理性经济”。

四、贸易转型

本世纪(指20世纪——译者)初,长期居住在中国的阿奇博尔德·利特尔(Archibald Little)曾这样描写武汉三镇:

对于中国居民来说,他们还清楚地记得1855年太平军撤出武汉后三镇受到彻底破坏的荒凉景象。……如今,武汉三镇却已惊人地恢复过来。毫无疑问,这种恢复,不仅是由于中国人自己巨大的恢复能力,更是由于汉口港向外国居民的开放。这一开放措施,虽然受到中国官员们的极力反对,却受到人民的非常欢迎。通过引进外资,湖北全省得到救助;同时,国际竞争机制的引入,也激发了这个城市的活力。^③

除了最近的一些西方学者,这种自鸣得意的臆想总是在关于汉口及其同类城市的讨论中反复地被重复着。但是,在鸦片战争之后的半个世纪里,汉口的贸易是否真的发生了巨变呢?此前的讨论似乎对此给出了明确的答案:正是西方商人的极力

① 关于汉口港的管理规章,请参阅《湖北通志》卷50,第14~16页;《申报》光绪六年六月十七日和光绪三年十月二日;水野幸吉:《汉口》,第296页。奥古斯塔·马杰利(Augustus Margary)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中国商业合同的例子,当时他正在汉口为将使他饱受磨难的1874年的贵州之行做准备:“船主带来了一份正式的中国商业合同,并送到我的手里。其主要内容是:他将把我送到贵州省的镇远府;为此,我需要支付11万钱,这将在途中分几次支付,在汉口要支付的首期定金是6万钱。经费总额包括在任何突发情况下都能保证我的安全与自由,以及为解决频繁出现的、各种将导致延期或给旅行者带来困扰的‘事件’所需要的费用。”(见马杰利:《从汉口到大理的旅行笔记》,上海,1875年,第2页。)关于清末其他合同的格式,请参见邓拓:《论中国历史几个问题》(北京,1979年),第201~203页;罗曼·迈尔斯(马若孟)和张陈福美合著:《中国清代的习惯法与经济发展》,见《清史问题》第3卷第10期(1978年),第4~27页。

② 马克斯·韦伯:《马克斯·韦伯社会学论文集》(纽约,1958年),第331页。

③ 阿奇博尔德·利特尔(Archibald Little):《远东》,伦敦,1905年,第94页。

推动,才使汉口这个“尚未为人所知的著名的商业中心”向世界开放^①;虽然他们明知这个城市在1850年之前已经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大、最复杂的贸易中心之一了。与西方的贸易带来了一些显著的变化,比如轮船的到来和茶叶的国际贸易。可是,我们必须谨慎地区分这些变化何者可直接归功于与西方的接触,而何者则是其内在发展过程的必然结果,尽管这一进程因受到外贸的催化而加速,但它的发展毕竟远远早于对外贸易。在1889年中国开始引进蒸汽动力工业之前,这一内在发展的结果看来要比(西方势力的到来所引起的)变化重要得多。

为了弄清1890年以前对外贸易给汉口所带来的影响,我们必须将这一时期的汉口与几十年之后更受西方重视的汉口分别开来。太平洋两岸的研究者们都倾向于将更为人所知的后一时期的汉口的状况反推到汉口与西方贸易的初期。由此,就产生了这样的倾向性认识:这些状况的变化,应归因于港口的开放,而不是其随后发展的结果。然而,甚至是坚持强调洋人支配汉口对外贸易带来危害影响的彭雨新,也承认在汉口开埠的头30年里,西方贸易“还停留在初期阶段”,其特征是外国势力的影响相对较小^②。

在“绪论”中,我曾提到19世纪90年代之后汉口社会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那是伴随着张之洞的“自强”工业化运动以及《马关条约》后外资工业的发展而出现的。从1890年到1910年的20年时间里,是当地商业的一个转折期。在这一时期,在中日战争和工业化影响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帝国主义势力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的掠夺,西方人才逐渐真正取得了他们寻求已久的、在汉口贸易中的控制地位。因为各种原因,特别是第一条铁路的建设贯通了汉口,汉口的对外贸易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一份当时的资料报告说:从1867年到1916年,汉口的年度外贸额增加了两倍(从6900万两增加到2亿200万两);另一些报告说,这些年中的增长幅度要更大一些^③。随着贸易的扩展,到汉口来的外国人显有增加之势。1895年,英租界与俄租界连接起来,这一年晚些时候与德租界、1898年与法租界相继连成一片。同样在1898年,日本人也首次在汉口建立了租界,并且在随后的7年中他们将租界扩大了近一倍。这样,在这一时期内,几个世纪以来汉口的老商业传统遂几乎完全被外来势力征服了。

.....

① 《北华捷报》,1854年8月12日。

② 彭雨新:《抗日战争前汉口洋行和买办》,《理论战线》1959年第2期,第24页。

③ 张鹏飞主编:《汉口贸易志》(1918年)。另请参阅约瑟夫·艾什利克(Joseph Escherick,周锡瑞):《中国的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湖南湖北》(伯克利,1976年),第5页;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工业发展》(华盛顿,1956年),第22~23页。

要正确评估外贸的实际影响,我们必须考察在汉口开埠前贸易方面的情形。欧洲工业品开始到达汉口,大约是在19世纪初由广东商人通过湘江水道运到华中地区来的。1822年,一位中国旅行者来到汉口,在市场上看到有“新奇的洋货”在出卖^①。鸦片战争以后上海的开放,促进了此种贸易的发展,因为“洋货”可以通过更方便的长江航线运往内地了。大约在此时,专营“洋货”的批发商开始在汉口出现。比如:19世纪40年代,宁波商人方承志就开始在汉口经营英国白洋布^②。1861年英国开埠代表团成员们在当地也看到商店里陈列着不少外国商品,其中有日本的海带和几种不同种类的英美纺织品^③。

1861年以前,外贸对汉口到底有哪些影响呢?19世纪50年代访问汉口的胡克神父总结说:“如果不能在内地省份引起某种轰动的话,与外国的贸易可能会立即完全停顿下来。”^④如同神父的其他论点一样,这个结论有点夸张。至少,当时外国棉织品已成为汉口经济的主要商品之一。一位早期的英籍海关官员甚至认为,19世纪60年代许多新进口货物之所以销售不畅,正是由于在开埠前“洋布”已充斥汉口市场的缘故^⑤。而且,给汉口及其周围居民带来重要收入的地方染布业,早在1860年以前即已开始印染英国棉布^⑥。因此,到19世纪中期,汉口已经与欧洲贸易发生了意义深远的接触,这种接触绝不仅仅限于某些特定奢侈品的贸易。

如要说汉口在1861年开埠前即已逐渐融入正在全面扩展的中外贸易之中,那么,它开始直接对外贸易的意义又是什么呢?至少,这个城市的历程,似乎证实了罗兹·墨菲的结论:“实际上,贸易的增长是很小的。开埠对于中国经济的冲击,与贸易数字所反映的情况相比,非常之小,这也是那些使用这些数字的学者们想不到的。”^⑦理由很简单:外国官员无法衡量、实际上也确实没有适当的概念来判断那

① 范锴:《汉口丛谈》卷2,第27页。译者注:原文为“洋货新奇广货精”,所录为当时汉口流行的歌谣,作者将此系于1822年(《汉口丛谈》刊刻之年)一位中国旅行者身上,对原文之理解略有误。

②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上海钱庄史料》(上海,1960年),第731页;另请参阅彭雨新:《抗日战争前汉口洋行和买办》,《理论战线》1959年第2期,第22页。

③ 《有关开放长江对外贸易的通信》,1865年1月31日,见《英国议会公报》1861年第66期,第342页;托马斯·布莱克斯顿(Thomas W. Blakiston):《在长江上的五个月》(伦敦,1862年),第65页。

④ M·胡克:《中华帝国旅行记》(纽约,1859年)第2卷,第127页。

⑤ “A·马克菲逊(Macpherson)的报告”,1865年1月31日,见《英国议会公报》1866年第71期,第108页。

⑥ 劳伦斯·奥利芬特(Laurence Oliphant):《1857~1859年额尔金勋爵出使中国、日本纪行》(纽约,1860年),第563页。

⑦ 罗兹·墨菲:《局外人:西方人在印度与中国的经历》(安阿伯,1977年),第197页。

些建有海关的城市之间国内贸易的情况。正如《汉口海关规章》所规定的（和当地官员反复申明的）那样，由下述三种船舶装载的所有货物都要经过海关的检查与课税，即：（1）航海轮船与帆船；（2）内河轮船；（3）属于外国人或外国人租用的三桅帆船和平底帆船^①。事实上，这意味着汉口海关每年公布的“贸易报告”即未包括也未打算包括汉口贸易中最大的部分——用当地固有的和由本地人驾驶的各种船舶运载的地方、地区和地区间贸易。因此，汉口的海关数字并不能反映出这个商埠真实的贸易总额，而后来的学者们却根据这些数字做出了开埠后汉口贸易成几何级数增长的乐观分析。

实际上，从 1861 年至 1890 年，汉口的国内贸易额一直比其对外贸易额大得多。甚至连海关数字（尽管它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对外贸的偏袒）也证实了这一点。表 6 给出了 1880 年的海关数据（这一年的茶叶贸易状况很好，因而外贸的总体情况也较好）。它表明：当年汉口的国内贸易量较之于外贸额占有优势：前者为 29 063 900 海关两，后者为 18 430 973 海关两。换言之，国内贸易额占总贸易额的 61.3%。如果我们把从其他中国港口运来的“外国货”看作是“国内贸易”而不是“对外贸易”的话，那么，国内贸易所占的比重将超过 89.3%。无论是哪一种估计，只要再加上中国人自己拥有并驾驶的船舶所运载的为数巨大的国内贸易总量（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海关数字完全没有反映这一部分的情况），那么，1880 年汉口的国内贸易额势必在全部贸易总额中占据压倒性的优势。

表 6 汉口海关检查的贸易货物价值统计，1880 年 （单位：海关两）

货 物		价 值
对外贸易	从海外进口的外国货物	27 841
	从其他中国港口进口的外国货物	13 303 494
	出口到海外的地方产品	5 099 638
	总 计	18 430 973
国内贸易	从中国其他港口输入的地方产品	13 513 967
	输出到其他中国港口的地方产品	15 549 933
	总 计	29 063 900

资料来源：海关总税务司：《中国通商口岸对外贸易报告》1880 年，第 47 页。

① 《海关规章》，汉口，1974 年 5 月 7 日制定，见海关总税务司：《海关法令与规章：关于通商口岸货物的装运、课税以及港口的停泊与领航》（《海关公报》第 5 期，1876 年，上海），第 61～63 页（英文本），第 64～66 页（中文本）；“H·E·霍伯逊（Hobson）的报告”，1869 年 2 月 19 日，见海关总税务司：《有关通商口岸租界当局之特权事务及其贸易促进活动的报告》，《海关总税司系列专刊》第 8 种（上海，1869 年），第 18～19 页。

在汉口对外贸易的早期,虽然偶尔也有光明的时候,但总的说来,外国官员与记者们的文章中一贯反映出来的却是最初满怀希望的商人们的失望^①。在开头的三年里,茶叶贸易几乎垄断了对外贸易。茶叶贸易的增长速度非常之快,不久,汉口就超过了广州,在茶叶出口贸易总额中位居第二,仅次于上海。于此同时,其他贸易项目(比如运用外国轮船运输出入汉口的货物方面)却未能尽如初愿。1864年初,对外贸易开始显示出萧条气象,其部分原因是由于周围乡村里的土匪一直在频繁地活动。1865年,英国领事写道:“在过去两年里,汉口的商业年鉴上几乎找不出什么亮点来。”^②在此后数年中,这种认识都引起外国观察家们的共鸣。1866年,英国领事沃尔特·莫德赫斯特(Walter Medhurst)曾提到过“地方贸易与总的贸易情况的不景气”;翌年,一本英文的参考手册告诫那些准备投资的人们说汉口的“商业低迷不振”^③。到19世纪70年代初,西方的报道才表现出一些谨慎的乐观情绪,但不到10年,又发生了严重的倒退,仅在1877~1878年的商业季节里,就导致了数以百计的中国出口商的破产^④。中国史料也持续报道在整个19世纪80年代前期出口市场相当不景气。到1886年,英国领事加德纳(Gardner)虽然试图消除外国人对汉口贸易持续不景气的忧虑,但他仍然不得不承认,外国进口贸易一直停留在一个令人沮丧的低水平上,而且事实上,近年来还在不断地下降^⑤。《北华捷报》的一位通讯员在1885年的一篇快讯中对此种状况概括说:“25年前的这个月,恰恰是汉口开埠之时,我相信,当时人们对汉口的外贸是抱有很大期望的。汉口过去的历史既充满着成功,也不乏令人沮丧的挫折。因此,我们正在举行的汉口开埠25周年的纪念活动,丝毫也不意味着良辰美景即将来临。”^⑥

令人失望的部分原因可以在江汉汇合处的地形中寻找。湖广总督官文在奏报他第一次乘外国轮船巡视汉口时,曾沮丧地写道:“天然的地理结构使湖北省成为著名的‘泽国’。江、汉确是湖北繁庶之源,然每年夏秋之际,江汉暴涨,无以控驭;而冬春二季,水枯河淤,大船行驶困难。”^⑦实际上,没有海轮可以在低水位

① 除特别注出者外,以下的概括系根据汉口海关与英美领事的报告以及《申报》的有关记载编辑而成。

② 《英国议会公报》1866年第71期,第121页。

③ 《莫德赫斯特(Medhurst)致阿尔科克(Alcock)》,1866年2月12日,英国外交部档案,17/456;W·F·迈耶等:《中国、日本通商口岸大全》(伦敦,1867年),第444页。

④ 《申报》光绪九年十二月一日。

⑤ 《加德纳(Gardner)致欧克纳(O'Connor)》,1886年1月9日,英国外交部档案,229/831。

⑥ 《北华捷报》1885年5月19日。

⑦ 咸丰八年十一月九日官文奏,见《清宫档案》。译者注:此处据英文译出,未能查对原文。

的冬季各月里到达汉口，这对于汉口作为与海外直接贸易的终点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障碍。而且，尽管五千吨级的海轮一般可以从海上直接驶进汉口，但这个城市的天然港口的条件较差，不能适应这种轮船。汉口港很小，水也较浅，也没有保护设施，再加上官文所描述的频繁而凶猛的洪水泛滥——每年夏天，洪水都会以每小时5海里的速度持续不断地冲刷着码头^①。这些自然条件势必使外国人的希望不可避免地受到挫折。正如 T·H·朱在 20 世纪 30 年代所描述的那样：

汉口开埠以后，外国商人纷纷到来，大量的地方产品迅速地汇集到这里，汉口随即成为一个直接出口的市场。可是，由于它的位置深处内地，后来它就逐渐发展成为主要的进口货物与地方土特产的集散中心。于是，直接外贸渐趋于衰落，而转口贸易则明显上升。显然，这表明汉口的性质主要是一个转口贸易港。^②

因此，虽然汉口的地理位置和地形条件非常适宜于船舶运输，并使它在明清时期的国内贸易中居于重要地位，但却远不能使它发挥外国人所希望的“商业前哨”的作用。

人与社会因素，再加上地理因素，三者结合起来，限制了西方商人试图转变汉口商业方向的努力。虽然与西方（或者与西方代理人）之间的贸易已成为汉口现存贸易的重要补充，但在适应这种情况的过程中，国内贸易仅仅发展到能包容这些新参与者的地步。这些新参与者都不是中国人，其市场根基是在海外；但在汉口贸易中，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为了谋取各地不同阶层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利益而聚在一起，商谈生意，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所以容纳这些新来者乃是一种顺理成章之事）。

历史学家彭雨新在讨论另一个不同的问题时，为西方只是“介入”了现存的汉口贸易体系这一观点提供了一个很有代表性的证据。彭对当地史料的研究表明：西方来到汉口索求的那些中国商品，如茶叶、皮毛、桐油、大麻、生铁、煤等等，实际上在他们到来之前就已经形成为一个巨大的市场了。而且，当地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中国商行大部分不是新建的，或者从外地迁移来的企业，而是从已存的商行直接发展而来的，这些商行为了扩展自己的业务而与洋人做生意。进出口都是这样。许多原先只经营土特产的零售商店很快转为包括或专门经营洋货了^③。彭雨新关于桐

① 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马萨诸塞，坎布里奇，1953 年），第 97 页。

② T·H·朱：《华中地区的茶叶贸易》（上海，1936 年），第 197 页。

③ 彭雨新：《抗日战争前汉口洋行和买办》，《理论战线》1959 年第 2 期，特别是第 26～28 页。彭的论证也同样支持了罗兹·墨菲最近的一个结论，即：对外贸易的主要影响仅仅局限于“使原来在国内已经流通的商品转而进入了国外市场，从而稍微增加了一些这些商品流通的渠道”。（罗兹·墨菲：《局外人：西方人在印度与中国的经历》，第 177 页。）

油出售的七个环节中的最后一环是外国买主。在这样的市场网络中,不仅西方商人与主要生产和贸易过程相脱离,参与这一贸易过程的中国商人也同样与外国商人之间缺乏个人间的联系,更不可能对外国市场可能发生的变化有清醒的认识。

英国的贸易报告及其他同时代的史料也同样表明,西方只是“介入”了现存的贸易活动。西方商人要求开放汉口,部分目的是为了得到购买茶叶及其他中国土特产的机会,但更重要的却是为了更进一步打进“中国市场”,以倾销其工业品。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的愿望实现了,外国进口货物有相当一部分被长江中游地区的消费者买去了。但是,西方商人想在长江各港口自己销售他们的商品的希望却基本上落了空。早在1867年,英国领事就报道说:“一些为了在这个城市建立分支机构而花费了巨资的老式英国公司”发现,一些小本经营的本地代理商从他们手里抢走了很多进口商品的生意,而那些小代理商实际上没有什么日常费用^①。在随后的几年里,这种抱怨声持续不断。1874年,英国领事报告说:“曼彻斯特货物的生意几乎完全落到了中国人手中,其最终结果将是中国内地商人在上海商人与银行的支持下,逐渐控制了洋货在内地的销售。”^②1885年的一份报告则指出:“这里的市场上也许除了金属和鸦片之外,确实没有真正的洋货(指由西方商人自己运来的货物——译者)。所有商品都是从上海买来并运到这里以供应内地之需的。”^③

19世纪60年代前期,在汉口交易的西方商品中,大部分不是预定给长江中游地区的,而是准备运往更远的内地去的。这种贸易远不是西方商人所能期望进入的。19世纪60年代后期,由于四川和山西商人越来越多地直接从上海买到洋货,再由他们自己运往中国各处,这种(由汉口转口的)贸易就逐渐衰落了。^④

尽管历史学者倾向于根据贸易数据来过高地估计汉口早期的对外贸易,但当时的报告者对这些数字的局限性却似乎有着更为清醒的认识。首先,正如英国领事艾

① 《莫德赫斯特(Medhurst)致阿尔科克(Alcock)》,1867年1月23日,英国外交档案,17/482。

② 艾勒伯斯特(Alabaster):《关于1874年贸易情况的报告》,英国外交部档案,17/732。

③ R·E·布雷顿(Bredon):《汉口》,见海关总税务司《中国通商口岸对外贸易报告,1885年》,第75页。一份见于《申报》光绪二年三月十三日的中国报告反映了同样的现象。同样的情况在其他通商口岸也可以看到。最全面地反映此种情况的也许是天津海关官员托马斯·迪克(Thomas Dick)在1867年所写的报告。他说:“对于中国人来说,只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买东西,常被认为是合适的。因此,外国进口货物花费一两年的时间,经过转手的外商代理人在第二个港口才被卖掉,是很普遍的情况。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商人很快就学会了与外国轮船做生意,他们将自己从进口货物的大本营上海购买的货物运回自己熟悉的市场去经营。”(见海关总税务司《中国通商口岸对外贸易报告,1867年》,第21页,转引自刘广京:《英美轮船业在中国的竞争,1862~1874》,马萨诸塞,坎布里奇,1962年,第109~110页)。

④ 《北华捷报》1869年9月1日。

勒伯斯特 (Alabaster) 在 1879 年报告中所强调的那样,所有经过当地海关的进口货物都被登记为“对外贸易”,而事实上,其中的大部分在到达这个港口之前早就掌握在中国商人手里了^①。其次,所谓“外商”也经常是一种假象。中国商人在汉口与边远的内陆地区之间运输货物必须沿途交纳各种各样的厘金,而西方商人沿同样的路线则不需要交纳厘金。这一现象的背后是认为:在理论上,当货物仍留在外商手中时,还不算是进入中国(或者,算是已经出口了),所以就不需要交纳国内税捐。于是,中国商人设立假“洋行”之风盛行。这种假“洋行”让西方人出面挂名为洋行老板,而实际上他只不过是雇来专门用于获取“洋票”(运输免税通行证)的招牌的。汉口许多最兴旺的“洋行”实际上全由中国人经营,而其名称则可能来源于某些“富有商业头脑的送牛奶工”^②。据英国领事凯恩(Caine)说,早在 1869 年,这种体制就把“所有”的外国人都卷入到汉口的进口贸易中^③,同时它也广泛地应用于出口贸易中。

因此,中国商人绕过汉口直接到上海购买洋货的倾向,以及他们对“洋票”体制的操纵,这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使得西方人始终与汉口大部分商业活动相隔绝。1862 年,名义上大约有 1 500 只商船是受外国人雇用的,但事实上全部由中国人拥有和经营^④。虽然汉口的总贸易额持续处于一种惊人的水平上,但西方人参与贸易的范围却很快地从许多“中国通”曾经预言的主导地位退缩到集中于此种贸易的一个大方面上来(在中国人看来,它也并没有占据主导性的地位),即茶叶出口。正如汉口海关官员在 1876 年的年报总结中所注意到的那样:“我们必须承认,除了茶叶出口之外,汉口的贸易——包括来自上海的外国货物进口与本地货物的出口——已经完全落到了本地商人的手中。”^⑤

这样,在 1890 年前,直接对外贸易进入汉口之后,却并没有对由当地人控制的汉口商业带来重大的影响。换言之,外国人既未能从中国商人手中夺走国内商品的贸易,也未能掌握进口商品的贸易。然而,汉口的开放可能在另外三个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即商业融资、商品内部的相对构成以及商业技术(特别是在运输方

① 艾勒伯斯特:《关于 1879 年贸易情况的报告》,英国外交部档案,17/838。

② 《北华捷报》1884 年 11 月 12 日。关于这种情况的普遍性,还有很多其他的证据。如咸丰十一年九月官文的奏疏,见《湖北通志》卷 50,第 12~13 页;《艾勒伯斯特致弗雷瑟(Fraser)》,1880 年 4 月 19 日,以及《艾勒伯斯特致韦德》,1880 年 7 月 7 日,俱见英国外交部档案,228/651。

③ 《凯恩致阿尔科克》,1869 年 7 月 29 日,见英国外交部档案,17/506。

④ 《金格尔致布鲁斯(Bruce)》,1863 年 3 月 10 日,见《英国议会公报》1864 年第 62 期,总 3302 期,第 40 页。

⑤ A·诺维(A. Novion):《来自汉口的报告》,见海关总税务司《中国通商口岸对外贸易报告,1876 年》,第 21 页。

面)等领域。在金融领域,按照西方模式组织的所谓“现代银行”很早就被引进到汉口了,而且在不久将成为主流。另一方面,汉口市场上商品的平衡发生了意义深远的变化:茶叶第一次超过其他商品,上升到一种突出的位置上来。这一变化,对于汉口商业精英的结构以及这个城市经济腹地的农民生活都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在运输技术方面,西方也带来了重要且颇为复杂的变化,兹详述之。

虽然轮船的引进几乎是立即对汉口贸易产生了影响,但在这一方面,西方人最初的愿望也遭到了挫折。那些寻求汉口开埠的人们最初打算依靠英国轮船将汉口与伦敦直接连接起来,但问题很快就出来了:适宜于绕过好望角进行远洋航行的船舶,并不适宜于长江上(也就是他们计划中这一航线的最后一程)的航行。因此,大部分海轮不得不停在上海,而由内河轮船或中国本地的帆船来完成上海至汉口这一段航程。1871年,一位驻上海的英国记者报道说:“人们已经习惯于这样做,以前更是如此。通常,在旺季时有两三艘船从汉口出发,把货物直接运往伦敦。随着苏伊士运河的开通,这种直航的趋势有所增加。”^①不过,运河的开通对直航贸易的促进作用并不是很大。同一位作者称:那一年有9艘船航行在伦敦——汉口航线上,它们只是运载了全部出口茶叶的大约四分之一,其余的大部分则被送往上海转运。十年之后,这种情况仍无改观。直到1883~1884年间,海轮的直接进出才开始积极地进行^②。如上所述,即便到那时,外国人直接掌握的货物也只是局限于茶叶,所以,从伦敦出海前往汉口去运载茶叶的轮船往往被迫先装运供给澳大利亚或其他市场的货物。

这使我们转到汉口与上海间规模巨大的船运贸易这一话题上来。自汉口开埠那一刻起,这种船运贸易即已开始,并很快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虽然外国商人在汉口贸易中建立起自己优势地位的努力归于失败,但在货物的运输方面,他们却获得了成功。刘广京已对这一问题作了全面而精湛的研究^③,所以,在这里,我打算仅集中讨论一下外国船舶在中国河流上的航运,对汉口现存的贸易与运输体制带来了怎样巨大的冲击。

很明显,这种影响是重大的,但还不是毁灭性的(对于传统的运输体系来说——译者)。一些早年的英国作者记录了汉口——上海航线轮船运输迅速发展情况,他们相信已找到了开展内河贸易的万全之计。比如,弗雷德里克·布鲁斯(Frederick Bruce)在1864年春就曾断言:“由于狂风和某些河段存在着急流,在使

① 《泰晤士时报》1872年2月9日,一位佚名作者写于1871年12月21日的信件。

② 参见R·E·布雷顿有关汉口的报告,见海关总税务司《中国通商口岸对外贸易报告,1882年》,第74页;1885年,第75页。

③ 刘广京:《英美轮船业在中国的竞争,1862~1874》。特别请注意刘所列的1861~1974年间汉口——上海航运贸易增长与波动的表格,见刘著第42、66、107、150页。

用轮船运输之前,长江不可能成为有效的水上运输通道。”^①一份值得注意的叙述提到几个世纪以来,长江一直担负着湖广——江南规模巨大的粮食贸易的运输任务。而当年由外国轮船运载的本地货物在明显减少,则有力地反映出布鲁斯的断言是多么幼稚,同时也表明:对于轮船最初在水上运输方面所取得的短暂的优势,可能有完全不同的解释。刘广京早已指出:轮船的引进打破了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在太平军控制南京期间对长江的封锁。然而,当1864年清军攻陷南京之后,国内商品的帆船运输很快恢复,并且以其运价低廉,从外国轮船那里夺回了大量的货运生意^②。

随后,轮船逐步取代了在汉口开埠的最初几年里西方商人用来从事上海——汉口间贸易而包租的三桅帆船。在国内贸易方面,轮船也因为速度较快,越来越多地被用于运输那些不易保存的货物。但在汉口以下的长江航道上,国内货运的绝大部分仍然依靠帆船进行^③。甚至进入19世纪80年代后,连通汉口的其他所有水道(包括汉口以上的长江水道和汉水)仍不能通行轮船。在这些水道上,直到19世纪末,即便是西方商人也不得不主要依靠租用中国帆船^④。

在太平天国后的几十年中,随着汉口贸易(以及人口)的持续增长,国内帆船运输也有所增加。1877年,英国领事帕特里克·休斯(Patrick Hughes)总结此种发展说:“轮船运输严重影响了三桅帆船的生意,但对平底帆船的影响却微乎其微。事实上,长江上的平底帆船比其他船有较多的获利机会,因为它们不仅被雇来运载日益增多的进口货物,还被用来运送由轮船运来的国内产品。当然,由于快速交通工具的存在,有些帆船也许将无法找到自己的市场。”^⑤由此看来,轮船不仅没有取代、反而加强了汉口传统的国内帆船贸易。长期居住在汉口的格里菲思·约翰(Griffith John)估计,在19世纪60年代,每年平均有大约25 000艘中国船只到达汉口;到1905年,一位日本记者估计这个数字应当在七八万之间^⑥。

① 《布鲁斯致罗素(Russell)》,1864年6月7日,见《英国议会公报》1865年第33期,第11页。

② 刘广京:《英美轮船业在中国的竞争,1862~1874》,第13~14、67~68页。

③ 《泰晤士时报》1872年2月9日;《马克弗逊(Macpherson)致哈特(Hart)》,1865年1月31日,见《英国议会公报》1866年第71期,第116页。

④ 关于中国船舶公司主要为西方商人服务的情况,在汉口道台光绪十三年五月的上报材料中作了描述,见《总理衙门档案·湖北洋人交涉》。

⑤ 帕特里克·休斯(Patrick Hughes):《关于汉口贸易的报告》,1877年,见英国外交部档案,17/788。

⑥ 格里菲思·约翰(Griffith John):《来自中国的声音》(伦敦,1907年),第90页;查尔斯·M·刘易斯:《中国革命的序幕:湖南省思想与制度的转变,1891~1907》(马萨诸塞,坎布里奇,1976年),第6页。

轮船被引入中国内河航运的主要意义之一是刺激了中国仿造轮船。这种仿造是这些年中不多的技术改造的实例之一。由于中国商人很快就夺取了外国商品在中国的销售与市场,不久,他们就有效地开展了与外国轮船的竞争。1871年,官督商办的中国轮船招商局在汉口开设了它的第一家分公司,它声称自己的主要任务是从事漕粮运输,但同时也对商业货物有兴趣。汉口分公司的早期发展迅速而且步伐稳健。1877年,它已有能力买断上海轮船航运公司(美国旗昌商行的一家子公司)的全部产权;1883年,它投资45 000两,在汉口建立了一个大型的现代化码头和一个茶叶货栈。在这些年里,招商局一直能够将国内运输从外国竞争者那里吸引过来^①。更为重要的是,正是中国公司,而不是任何外国公司,首先成功地将轮船由长江驶入了内地河道。在没有得到政府许可的情况下,汉口“华商商行”的老板吴心九(在19世纪90年代)就使用一艘汽轮开辟了沿汉水至仙桃的航线,而他的成功很快又招致了其老对手姚冠卿的竞争^②。

因此,尽管轮船改变了汉口周围的货物流,并刺激了其现存的贸易,但中国商人一步一步地取得并保住了在轮船航运上的控制权,就像他们在贸易体系的其他方面一样。在这一过程中,西方人在汉口被迫处于一种相对孤立的状态。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马关条约》允许他们在汉口大量地建立外国工厂为止。

五、结 语

在结语部分,为了更集中地讨论外贸及其对汉口的全部影响,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对此做出了细密论证的罗兹·墨菲的论著。他认为:在19世纪中叶以后,汉口和其他主要的中国城市都逐渐卷入了彼此间的贸易之中,而很少与次一级的中心城市或乡村进行贸易。汉口与上海间的贸易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证。汉口海关官员弗朗西斯·怀特在排除了这个城市全部本地贸易的前提下,于1877年报告说:“上海是个大仓库,汉口收到的几乎所有货物都来自上海,几乎所有的输出货物也都运往上海,无论是用于消费,还是用来转运。”^③中国历史学家彭雨新已为此种论点提供了证据,他将鸦片战争之后的汉口仅仅描绘成上海海外贸易经营的一个“内府”^④。墨菲对这个论点予以完整的透析:

① 1920年《夏口县志》卷9,第1页;《休斯致弗雷泽(Fraser)》,1877年3月10日,见英国外交部档案,228/590;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上海,1910年),第32页;A·诺维:《汉口》,见海关总税务司:《中国通商口岸对外贸易报告,1876年》,第21页。

② 《汉口小志·交通志》第4页。

③ 海关总税务司:《中国通商口岸对外贸易报告,1877年》,第9页。

④ 彭雨新:《抗日战争前汉口洋行和买办》,《理论战线》1959年第2期,第24页。

在中国,城市功能的集中开始出现了三个不同的层级。上海与香港是全国性的中心地,它们在中国对外贸易方面占据着绝对的支配地位,类似于伦敦、纽约、布宜诺斯艾利斯、加尔各答和孟买。第二层级有天津、汉口和广州,它们分别在华北、华中与华南发挥着相同的作用。……第三层级是一些较小区域或省域范围内的中心,其中代表性的城市有长沙、重庆、福州等,这些城市也都是通商口岸体系的一部分。……这三个层级商业网点的发展是日益增长的商品化的象征,也标志着贸易已超越了传统商业的发展水平,在某些方面也意味着它已超越或取代了传统的市场中心和较低层级的市场体系。^①

出人意料的是:墨菲的这个结论(特别是关于新的市场中心已超越了较低层级的市场体系的说法),似乎比隐藏其后的假设更富有说服力。尤其是他假设在当时的中国,海外贸易较之于传统的国内贸易更能激发(商人们的)兴趣;准确地说,这种情况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是不可能出现的。这一时期里的许多材料似乎也未能证明这样的观点的正确性,即认为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商品化在已有的较高水平之上仍然保持一种不规则的发展。

在这一讨论中,有一个论点很值得注意,即:贸易活动越来越集中于地区都会之间;但是,将汉口视为上海的主要附庸,显然是一种误解。在与西方贸易的全部活动中(包括与上海之间所进行的面向出口的贸易),汉口的商业活动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同时,在整个19世纪(有人说更晚一些),国内贸易的主要汇聚点也仍然是这个长江中游地区的商业中心。而且,在与上海的贸易中,也仍然包含了许多传统的与江南之间的贸易成分。如同与江南之间的贸易一样,汉口与其他相关地区之间的贸易,也表现出一种将日益增长的贸易逐步限制在主要地区城市的趋势。毫无疑问,西方的贸易活动(特别是轮船的引进)加速了此种趋势,但是,中国传统商业网络的长期发展在此种趋势的演进过程中,仍然发挥着更为直接的作用。比如,在此前的几个世纪里,汉口与湖南经济区的贸易逐渐集中在湘潭一地;而在19世纪,湘潭则开始逐步让位于更大也更为中心的长沙。(这一转换就主要是本地区商业网络自身发展的结果,而不是西方影响的结果)^②。

与此相对应,我们已经注意到:汉口作为“地方”层级的市场中心,其作用受

① 罗兹·墨菲:《局外人:西方人在印度与中国的经历》(安阿伯,1977年),第178页。

② 伊夫林·S·兰斯基:《中国南方的农业发展和农民经济》(马萨诸塞,坎布里奇,1972年),第107页;查尔斯·M·刘易斯:《中国革命的序幕:湖南省思想与制度的转变,1891~1907》,第7页。刘易斯指出:由于受到长沙地区的严重影响,在整个19世纪,湘潭的人口数下降了50%以上。

到严重的限制。19 世纪 50 年代，这一作用似乎稍微有些恢复。然而，随着汉口与长江中游地区、以及区域间贸易关系的重建，不久它就再次发展成为超越其周围“地方”的城市。西方贸易仅仅是加速了这一进程而已。这些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已超出了本论题所讨论的纯粹的商业领域，而有助于一个更具世界性的城市社会的建立。

为了更准确地认识汉口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以及此种地位与当地社会之间的关系，我们必须细致地考察这个城市一些具体商品的贸易情况。我决定选择食盐与茶叶这两项在清代最为重要的地方贸易商品，作为进一步讨论的主题。实际上，这两种商品的贸易在汉口的社会经济生活中非常重要，对它们的考察是接下来有关城市社会之探讨的必不可少的前提。因为后一主题（城市社会——译者）才是我的研究目标，所以我将尽可能避免诸如商品价格、贸易水平等问题，而将侧重点放在这些商业活动的社会联系方面。

将食盐与茶叶的贸易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有着特别的意义，因为这两种商品反射着当地社会各个不同的环节。尽管茶叶贸易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但它在汉口的贸易活动中主要是作为外贸商品而存在的。而另一方面，食盐在这一时期则一直是只在国内行销的商品。这两种商品贸易在商业组织方面的异同，也为我们探讨西方对于 19 世纪中国城市社会之转型的影响，提供了又一线索。

十九世纪汉口的市民

按：本文译自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的城市冲突和社区，1796～1895》，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有关中华帝国晚期历史的热烈讨论之一涉及到明清时期的城市中“城市文化”的发展程度。比如，牟复礼（F.W.Mote）曾坚持认为：在中国，没有我们习见的西方中世纪以后所发生的独特的城市化：

在中国，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间清楚的分野很早就消失了，尽管这种分野在世界上许多别的地方长久地存留下来，直到近代才消失，而在其他文明中，这又产生了一种独特的城市傲态。在中国，这种傲态得以存在的社会条件，在帝国时代开始时似乎就已经消失了，它消失得如此之早，以致于那种城市优越感丝毫不留了。^①

伊夫林·兰斯基（Evelyn Rawski）则要谨慎一些，她最近总结说：在文化方面，清代中国城市与乡村的分离可能远不及近代早期的法国那样明显^②。

然而，其他一些西方学者却指出：早在宋代，中国就已出现了富于生机的“城市文化”，并对此作了描述；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家们则就晚明时期出现的“市民”类型作了长期的考察，这种“市民”超越了经济阶层，作为一个整体，摆

① 牟复礼（F.W.Mote）：《元末明初时期南京的变迁》，第 103 页，收于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所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加利福尼亚，斯坦福，1977 年），第 101～154 页。（译者按：中译本由叶光庭等译，中华书局 2000 年版，牟氏此文载于第 112～175 页，本段引文见第 114 页）

② 伊夫林·S·兰斯基（Evelyn Rawski）：《问题和展望》，载于戴维·约翰逊（David Johnson）、安德鲁·J·纳森（Andrew J. Nathan）与伊夫林·S·兰斯基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大众文化》（加利福尼亚，伯克利，1985 年），第 403 页。另请参阅巴巴拉·沃德（Barbara Ward）《地方戏及其听众：来自香港的证据》与詹姆斯·J·沃森（James L. Watson）《神的普及化：中国南部沿海地区“天后”的演进，960～1960》两部著作中有关“大众文化”的部分，分别见《中华帝国晚期的大众文化》第 173～175 页，第 292～293 页。

脱了土地的桎梏，并起而反抗封建政府的压迫^①。最近，戴维·约翰逊（David Johnson）系统地阐述了对牟复礼观点的反驳意见。概言之，他认为市民的出现可以前推至唐代：

由于城市的社会和经济生活变得日益复杂，真正的城市文化开始出现。……人们开始对城市和乡村的差别习以为常；“城市”的概念（相对于长期以来为人们所熟悉的“帝国”不同层次的行政首府而言）被纳入了公众语汇之中。……就城市自身而言，“城市”这个概念，首先是远离人们熟知的乡村村庄世界的一种表现形式；与此密切相联系而且同样重要的是：它意味着城市居民不同于农民。^②

有关这一问题的争论还远未结束。实际上，这样一个涉及到根本性认识、且关涉面广泛的问题，很难得出什么特别肯定的答案。但是，通过对汉口——一个在人口来源和职业方面都无比复杂的城市——的实例研究，势必将得出这样的结论：至少在一些中国城市里，存在着一种作为“市民”的共同身份的强烈意识，和独特的城市心态。本章的目的之一便是探讨此种“市民意识”与“城市心态”的内涵。

向“市民”这一共同身份的过渡，并不意味着建立在同乡、信仰与生意基础之上的、更为狭窄的身份和内聚力不再具有关键性的重要意义。更令人困惑的则是如何看待社会阶级的重要性。在这里，我将采用一种历史主义的、实事求是的阶级观点，以探讨19世纪汉口的阶级意识和阶级凝聚的历史真实。一般说来，阶级认同感看起来是微弱的，可并不是完全缺乏，而且在我们的研究时段里，有许多因素——比如生产结构的变化和贯穿于快速城市化过程的、城市贫民的增加——都为伴随着工业化的阶级凝聚力的萌芽，作了准备。

最后，我们将集中注意力于精英方面，考察汉口最成功的商人在生活方式、态度、爱好等方面，与全体市民、更传统的老式士绅之间的关系。他们已经习惯于按照儒家的理想行事，行为儒雅，彼此间的关系融洽，以及家长式的公共服务系统。因此，这些商人对于城市社区的孕育满怀热忱，在下一章，我们将看到，他们中间

① 最细致的研究是谢和耐（Jacques Gernet）所著《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加利福尼亚，斯坦福，1962年。译者按：中文本为刘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关于清代城市文化的分析，请参阅苏珊·纳金（Susan Naquin）与伊夫林·S·兰斯基：《18世纪的中国社会》（康涅狄格，纽黑文，1976年）。中国学者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最重要的成果则可举邓拓：《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收入所著《论中国历史几个问题》（北京，1979年，第2版）；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上海，1957年）。

② 戴维·约翰逊（David Johnson）：《中国唐宋时期的城隍崇拜》，《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第45卷第2期（1985年12月），特别是第413~417页，引文引自第416页。

的许多人，为慈善机构捐资和出力。

一、城市心态和文化

在我们研究的时期里，汉口是一个充溢着形形色色的单身汉、居民和来客的、十分混杂的城市，而当他们谈起所谓的“汉口特性”时，却都惊人一致地对此种混杂状态表示满意。汉口最引人注目的第一个特征就是极度的世俗化，其最典型的表现则是穷奢极欲，相互攀比以竞夸豪富^①。可以想见，这通常会遭到儒家文人们的谴责，他们指出：汉口的生活方式与儒家所倡导的“俭朴”精神背道而驰。例如，1747年《汉阳府志》的作者写道：

汉镇水陆珍奇莫不备，每一会宴，穷极丰腴。不但侨宦富商为然，中产之家勉强徇俗。惟务外饰，内鲜积藏，甚有典春衣而为之者。^②

寓居汉口的湖州人也发表了类似的批评。范锺当然崇尚美好的生活，但他对所见到的汉口人在衣、食、住等方面的奢华淫靡，特别是“恣意杀生”表示憎恶^③。与1747年《汉阳府志》的作者一样，范锺强调指出：这些风气不仅局限于富商巨贾，“中人之产亦相效尤”^④。此外，一位19世纪后期的本地作者也描述了弥漫于汉口的追求物质财富的奢华、炫耀、贪婪的风气。^⑤

这种生活方式被当时人认为是城市所特有的、虽然并不是中国大多数城市必备的特征。例如，在1867年《汉阳县志》的《风俗志》里，编者描绘了一幅老式的传统家庭的理想图画——丈夫耕作打渔，或者在本地做点小生意；妻子则纺纱织布，并指出：尽管这个县丰富的自然资源条件长期以来都带给人们以诱惑，但大多数汉阳人实际上都是这样生活的，不仅是在农村，在城市也是如此。惟一的例外出现在汉口，那里的人们将浪费、奢侈看作是正常的。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例外，看来

① 对于汉口部分商人们引人注目的夸豪斗富式的消费，也有一些人表示赞扬。参见《汉口紫阳书院志略》卷8，第15页；《汉口山陕西会馆志》，第4页。

② 1747年《汉阳府志》，转引自1920年《夏口县志》卷4，第2页。

③ 范锺：《汉口丛谈》卷4，第31页。

④ 这种情形令人联想起E·A·里格利（Wrigley）曾经考察过的、18世纪伦敦所广泛传播的、在奢侈消费方面“模仿胜于己者”的消费模式。此种消费为诸如茶叶、烟草、糖等商品提供了一个新的巨大的市场，从而对工业革命的经济起飞起到了某种推动作用。见里格利：《伦敦对于英国社会经济发展之重要性的简单图解，1650～1750》，《过去与现在》第37卷（1976年7月），第50页。

⑤ 见《汉口小志·风俗志》，第2页。

应该是由于长距离贸易所带来的不良的社会影响所致。^①

以下这些反复提到的评论，比部分儒家士绅简单的反城市偏见（尽管他们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更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一方面，早期的西方观察者对汉口生活的评论几乎持同一论调。如传教士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Wilson）在1862年写道：“随着太平天国之后人们物质财富的恢复，他们浪费、世俗、邪恶的习气在社会上越来越泛滥。可以说，他们太贪婪和过于沉溺享乐了。”^②另一方面，中国观察者的评论也并非全是谴责。1914年《汉口小志》的《艺文志》所收录的有清一代的诗词，就都以无比激动和丰富的感性辞藻，来盛赞汉口的富有、物欲横流和快节奏的大都市生活。^③

除了个人的奢华，这个商业中心独特的心态在商业行为上也暴露无遗。牟复礼所说到的“占单纯的乡下人便宜的狡猾的城市人”^④形象，在中国和在西方一样，都已是老一套的描述了；在汉口，除了极个别的例外，这一点表现得特别突出。在外国商业专家报告说他们遇到的竞争远超出他们的预料和以前在中国所遭遇到的所有竞争的同时，当地的文人和官员们却在不断地谈论汉口商人的狡猾和目光短浅的“势利”^⑤。确实，中外评论者从未忘记赞扬汉口那具有吸引力的工业和坚忍顽强的各阶层地方商人。17世纪的诗人查慎行，对汉口商业社会中的经商准则作了最好的概括：

一气十万家，焉能辨庐井？^⑥

较儒雅的观察家，甚至是那些对经商抱有某种赞同态度的人，在每一代都尝试着去回忆那些更美好的过去——那时，贸易行为并不是明显的惟利是图。范锺在1822年写道：“汉口市井，俗渐浇漓，生计劳劳，反衰于昔。”^⑦30年后，来自浙江的叶调元伤感地写道：“现在”的市场已越来越被那些急着向上窜的年轻人所控制了，这些人惟一有价值的东西是英俊的外表，所以被当地人称为“刮器”；似乎做生意不再需要精明的头脑和敏锐的商业直觉，而只要善于察言观色、对商行里的

① 1867年《汉阳县志》卷9，第1~3页。

② 威尔逊于1862年9月2日的信，见伦敦布道会档案，Box 3. 1. B。

③ 《汉口小志·艺文志》。是书第67页所收陆飞《汉皋夜市》就是一个最为典型的例子。

④ 牟复礼：《元末明初时期南京的变迁》，第106页。收于施雅雅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101~154页。

⑤ 佚名《武昌兵陷事略》，见《太平天国》第4册，第370页；官文咸丰八年十一月九日奏疏，见《清宫档案》；海关总税务司：《中国通商口岸贸易报告，1872~1873年》，第53页。

⑥ 查慎行：《汉口》，见《敬业堂诗集》卷1，第9页。

⑦ 范锺：《汉口丛谈》，“凡例”，第1页。

上司阿谀奉承就可以了。^①

对于汉口商人之冒险倾向的分析也许更应该放在商业史的研究中，而不应当放在这里。然而，很显然，从一个地方小买卖人进入到更有发展前途的新贸易行业的速度之快，他们对于开辟新市场的渴望，对于新出现的与国外开展贸易之可能性的强烈反应，以及为此而不顾后果地使用投机信贷，所有这一切商业心理，都与西方学者经常批评的行动迂缓、守旧的风格相违背。确实，也可能偶尔会彼此调和。1879年，海关总税务司弗朗克斯·怀特（Francis White）报告说：“在信息灵通、富有的本地人中，对未来（普遍）抱有一种强烈的怀疑态度，而且坦率地承认不愿意投资于那些依靠国外的需求而获得成功的企业。”^②然而，这种对于市场的细微、敏感的预见，不应混作为汉口人普遍地逃避风险。

一般认为，坚忍不拔和实用主义是汉口人的又一个特性。与商业冒险这一倾向紧密相连的是，当面对生活中的不幸以及生命与财富面临危险时，汉口人相当平静地接受之。例如，传教士格里菲思·约翰（Griffith John）描述了1869年夏天一场灾难性的洪水：“这是十分惊奇的……中国人如此耐心和幽默的承受着一切。他半裸着，谈笑风生、赌博、抽烟、喝茶、行乐，对于他来说，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似的。在英国，这样一场自然灾害将会产生遍地哀嚎；而在这里，却只有一些轻微的忧伤。”^③约翰卫斯理公会的同事威廉·斯卡伯勒（William Scarborough）则这样描写在同一场洪水中的汉口难民：“这些人陷入了窘境：他们的房屋被冲毁，生计被切断；他们拥挤在一起，面临着瘟疫的威胁，处于饥饿的门槛，但却都表现出一种平和、安宁甚至是满足的心态。”^④毫无疑问，这种（面对不幸）恬然接受的态度，对于19世纪的汉口相对而言较少巨大的社会动荡这一特征，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同时，有两个观点需要强调。首先，西方学者经常将这种坚忍不拔的行为方式看作是浸淫于儒——道文化传统之中的消极与逆来顺受。但实际上，至少在汉口，并非如此。也有人将它归之于宿命论。但是，我们在汉口所看到的，当人们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时，并不是一味地消极与顺从；相反，每一个都以某种方式表现出一

① 叶调元：《汉口竹枝词》卷5，第4页。译者注：原诗句为：“算盘眼色不须精，拉得豪商便出名。高底镶鞋尖顶帽，如今刮器是官人。”叶调元原注称：“近日学生意者不过如此。俗呼体面曰‘刮器’，或取刮垢磨光之意也。”

② 海关总税务司：《中国通商口岸贸易报告，1874年》，第40页。关于19世纪中国商人的企业精神和冒险意识的进一步讨论，参见郝延平：《19世纪中国的商业革命：中外贸易资本的增长》（加利福尼亚，伯克利，1986年）。

③ 格里菲思·约翰（Griffith John）1869年4月4日的信，伦敦布道会档案，Box 3. 3. C。

④ 威廉·斯卡伯勒（William Scarborough）1869年7月24日的信，见卫斯理会档案，第488函。

种乐于去迎接这些灾难的决心，并心甘情愿地去承受有时无法避免的灾难。最好的例证，实际上也是每一个到过汉口的外国人都会提到的，是那些住在河岸边房子里的贫苦人民的行为，这些人的生计或多或少与汉口港联系在一起。年复一年，这些房子被夏末的洪水所冲垮，经常有人丧生；年复一年，生存者在原地重建房屋，等待着下一年洪水的再次到来^①。其次，对于无法避免的死亡和不幸的接受，并没有妨碍人们采取积极的措施以减少危险和缓减痛苦，不仅为他们自己，也是为了大范围内的城市社区。在汉口的外国人进一步发现：“令人非常惊异的”是，他们通常认为的中国人“对死亡的冷漠”，实际上是与同样确证无疑的、对死亡的积极预防，同时并存的。^②

汉口的环境对于人类居住是极端危险的。洪水、火灾和传染病的威胁，即使以当代中国的标准来看，通常也是十分严重的。高死亡的总体环境，再加上因生意失败和市场萎缩而引发的危机，曾经导致了数量惊人的自杀^③。在此种环境下，一个人可能希望拥有一种热情的宗教信念。但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如果我们相信早期在汉口的基督教传教士的报告，“虔诚”在当地的意识形态中几乎未起任何作用。例如，卫斯理会的波特·史密斯（Porter Smith）在他为伦敦总会编写了几则当地居民重实用的生活方式的有趣的典型事例（诸如街头小贩很快发现了一个伪造史密斯教会医院门票的市场）之后，描述了他试图依靠此种“极端世俗的天堂”来吸引皈依者的打算^④。他的同事、来自圣公会的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Wilson）对此补充说：当地人民从未因为过于虔诚而受到指责——除了在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以及一些偶尔的宴会之日，燃放烟花爆竹，烧冥钱，从而消耗了大量的火药和纸。^⑤

汉口人诚挚地遵守中国各种仪式活动的基本规则。他们一丝不苟地坚持对死者的祭奠和埋葬准则。他们非常相信占卜和星相^⑥。在每年的贸易季节开始之前，职业行会都要祭祀财神。地方性的节日相当多。无须惊奇，最为热闹的庆祝活动是阴历的新年——店主专门迎接财神的日子和清除老账和借贷的时间^⑦。我们注意到，汉口有各种各样的寺庙，但是它们崇拜谁呢？重要的是，佛寺只占其中很小的一部

① 威廉姆·斯潘塞·珀西瓦尔（William Spencer Percival）：《龙的土地：长江上游峡谷航行记》（伦敦，1889年），第57页。

② 加尼特·J·沃尔斯利（Garnet J. Wolseley）：《1860年与中国的战争纪事》（伦敦，1862年；特拉华，威尔明顿，1972年再版），第384页。

③ 例如，《北华捷报》1887年6月3日。

④ 卫斯理会档案：《汉口圣公会医院的五年报告》，报告二（1865~1866年），第16页。

⑤ 威尔逊（Robert Wilson）1862年9月2日的信，见伦敦布道会档案，Box 3.1.B。

⑥ 参阅《汉阳府志》卷47，第83~84页。

⑦ 叶调元：《汉口竹枝词》卷5，第18页；斯卡伯勒1869年2月8日的信，见卫斯理会档案，第487函。

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增加得很少,而且主要是富有商人的妻子们光顾^①。大多数汉口寺庙供奉的主要是更为实用的神,比如财神、水神(水府、龙王、禹公)、火神和天后。最为普遍的崇拜是关羽,这位三国时代的英雄已经演变成商业信用保障的替身;还有雷祖,他被看作是雷神和节俭之神^②。换言之,深入汉口人心中的神为实用的神——这些神为各种群体(按照职业或籍贯原则)的凝聚起到了一种联结作用,或者给城市生活和商业事务等世俗活动提供庇护。人们对这些神的信仰是诚挚的,但事实上,它却受到人们为实现某种期望的结局而进行的具体行为的支配。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作为一种潜流,救世主义的价值观念曾出现在汉口的生活中,特别是在19世纪70至80年代,随着狭隘的宗派意识的不断上涨而逐渐传播开来;但它从未成为主流。

狭隘的反文化情绪的泛滥,以及与之相伴而生的一些相关现象,诸如素食主义的流行,是这个城市在经受了太平天国之后数十年中,对文化迷失的一种萎靡不振的回应。在我前一本关于汉口的著作中(即《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译者),我将这种现象描述为社会“失范”的一种类型,并指出:地方社会——精英和下层民众——通过组织建设和更全面的集体自我调节做出了部分的回应^③。一些汉阳的文人倾向于把这种颓废风气归咎于外国影响所带来的社会腐化;但是大多数汉口人承认,这种现象根源于原有社会领导者的更替,以及太平天国之后汉口商业和社会新的、摇摆不定的开放^④。

.....

同时,我们也必须警惕地看待一些过分怀疑的思潮,或者是将这一时期的汉口看作是西维尔(Chevalier)笔下所描述的19世纪早期的巴黎那样,存在着巨大的“社会堕落”的“病变”之类的观点^⑤。汉口各阶层的社會管理者很快地把他们因混乱——商业、犯罪、道德方面的——而产生的恐惧转移到新的或重新恢复的社会组织和控制体系中。并且,所有证据都表明,在太平天国之后,就如同之前一样,商业活力和城市生命力使汉口社会持续处于普遍上升的气氛中。

① 1884年《汉阳县志》卷2,第3页。

② 作为雨神,因而也作为丰收之神,“雷祖”根据粮商在运输过程中浪费的数量给予他们奖惩。

③ 罗威廉(William T. Rowe):《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加利福尼亚,斯坦福,1984年),第287、343页。另参见《汉口山西会馆志》卷2,第9页。

④ 1884年《汉阳县志》卷1,第19页;王葆心:《续汉口丛谈》卷1,第17页。参见藤井宏:《新安商人研究》,《东洋学报》第36卷(1953~1954年),第4期,第132~133页。

⑤ 路易斯·西维尔(Louis Chevalier):《19世纪上半叶巴黎的劳动阶级与危险阶级》(新泽西,普林斯顿,1973年),第394页。

二、传媒与政治生活

广泛而且范围仍在逐步扩展的传媒，包括口头和书写两方面的传媒，使这种充满活力的城市文化更加丰富。口头传媒是指城市里在露天市场或酒店、茶馆等场所活动的、形形色色的流行娱乐节目表演者：街头卖唱的、耍童、演艺者、吟夫、说书人以及汉口最富盛名的快板演唱者。汉口独有的最显眼的是一种“唱婆子”，她们是职业的民间艺人，常常穿着黑色的衣服，涂着白脸，挎着竹篮子，打扮得像是走街串巷的女裁缝^①。口头传媒不仅充当通俗文化和时事新闻的传播工具，也可能被谨慎地用于价值观念和信息的传播。19世纪60年代，在由地方士绅发起的一场反鸦片的运动中，就曾使用歌曲来描述鸦片的罪恶，并且把印有歌曲的小册子分发给城市大多数唱流行曲的艺人^②。城市街道上各种各样的戏院都有小商贩，他们带着无数的职业性的手摇鼓、喇叭，并伴之以大声吆喝，如同庙会的游行队伍和嘈杂、令人敬畏又激动人心的大官们的通过时一样。——这些场景，乡间的人们在一生中可能只见到一次，而城市人则早已习以为常了^③。人们经常参加在城市大行会和寺庙中举行的戏剧表演。街坊们也习惯于通过在大街上或茶馆里演戏以表达他们的兴旺发达，或者是从一场大火中幸免于难的感激之情。一位从江南来的旅行者曾描述汉口戏院中的听众是多么地有知识和通达人情世故，并肯定地指出：其部分原因应当是由于他们时常听经典戏剧节目，而且这些节目有许多形形色色的地方剧种^④。传媒的另一参与形式是举办节日。除了每年供奉土地神的节日外，很多主要的节日都是在全城范围内进行，至少在几个最重要的节日里——新年、清明、端午和中秋节，按惯例，雇工们会有几天假，整个城里会放鞭炮、挂灯笼、装饰店面，有各种各样的赛跑、跳舞及高跷戏。^⑤

① 范锺：《汉口丛谈》卷2，第25页；卷3，第15页；叶调元：《汉口竹枝词》卷5，第10页；《申报》光绪五年一月八日。

② 卫斯理会档案：《汉口圣公会医院的五年报告》，报告三（1867年），第7页。

③ “不只一次，当传教士向全神贯注的听众热心地传播令人欢欣鼓舞的福音时，有衙门的小吏敲着锣，大声叫唤着，宣布总督及其随员的到来，于是整个人群都跑出去看游行队伍经过。”南丁格尔（Nightingale）1878年4月6日的信，卫斯理会档案，第491函。

④ 叶调元：《汉口竹枝词》卷5，第12～14页。亦见卷1，第6页。《申报》：光绪五年一月九日及光绪七年九月二十五日；海关总税务司：《十年报告，1882～1891年》，第191页。

⑤ 范锺：《汉口丛谈》卷2，第25页。蔡乙青（蔡辅卿）在《闲话汉口》一文（系列文章，共12篇，载《新声月刊》卷5第5期至卷6第6期）中对汉口的节日作了总结性的介绍（见《新声月刊》卷6第6期，第34页）。有关于汉口节日活动的讨论，可见《申报》光绪二年四月二十二日，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四年八月二十一日，八年五月七日和八年七月十八日的有关纪事。

谈到书面媒体，我们会遇到极为复杂的通俗文学。最近，伊夫林·S·兰斯基对清代可以运用的识字水平远高于长期以来人们设想的较小比例这一令许多学者困惑了很长时间的问题作了阐释。然而，识字率到底有多高？像汉口这样的主要城市，识字率比全国范围内的平均水平要高出多少？兰斯基估计：19世纪“基本识字”（定为能够认识大约2000个字）的成年男子的比例为45%，女子为10%；但是，在大城市中，识字男子的比例有时可达80%^①。最后这个数字看起来相当高；我们在汉口发现了许多文盲的实例，甚至包括一些店主^②。可是，这些实例之所以被提及，本身就可能表明这些人具有某种不同寻常的性质。记录表明，甚至在19世纪60年代反鸦片运动中所列出的街头卖唱者，也能够阅读他们拿到的印制的抒情诗。

商人习惯于用基本的读写技巧记账，解释他们公布的行会规章制度，起草各种各样的常用商业合同（财产证明书、租赁合同、销售单、提货单、期票），以及准备名片^③。除此之外，在生活中，坚持不懈地大量使用书面形式，本身就是城市文明的一种表现。1871年，作为英国领事在汉口住过几年的瓦尔特·H·梅德赫斯特（Walter Medhurst）以感性的笔调写道：

每一个善于观察的人沿着中国小镇的街道闲逛，一定会注意到中国书面文字使用之广泛。……书面文字不仅用于商店标志和广告（与我们一样），并且随处可见，几乎每一事物上也都能看到，它被用来装饰建筑、船、家具、工具、衣服，以及不计其数的东西。确实，正如我们已注意到的，书面形式的使用如此之广泛，以致于一个人只要在街头散步时用心学习，就可以正确地掌握部分书面语言了。实际上，中国拥有纯粹的“街头文化”。^④

在汉口，包括莫德赫斯特所提及的招牌在内的有关街头文化的大量证据表明：人们不仅用颜色和形状来表示交易的性质，而且经常用长段的文字摘要详细地介绍商店内商品的性质、质量和价格^⑤。全城到处都张贴着海报，以及公布当时十分流行的每周彩票抽签的结果^⑥。官员们经常张贴希望人们去读的各种告示，宣布一些

① 伊夫林·S·兰斯基：《清代中国的教育和通俗文学》（密歇根，安阿伯，1979年），第11、23页。

② 例如：斯卡伯勒1881年6月27日的信；《申报》光绪五年一月八日。

③④ 莫德赫斯特（Medhurst）：《中国街头文学轶事》（上海，1871年），第26、7~8页。

⑤ 沃尔斯利：《1860年与中国的战争纪事》，第386页。J·F·毕晓普夫人（Bishop）：《长江河谷及其远方》（伦敦，1899年），第67页。

⑥ 《申报》同治十三年十一月九日；《北华捷报》1872年1月25日。

事情,诸如第一个外国人的到达,政府对待传教士的政策,在短期银行信用危机之后的银行假日等等。正如我们将见到的,非政府的煽动者偶尔也会张贴一些海报。^①

但是,有着持久影响、使19世纪后半叶的城市文化从太平天国之前的文化形态中转变过来的,则是报纸。根据柯昆成(音译)的研究,完全由中国人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报纸《昭文新报》于1873年在汉口出版,英国领事认为它是一块“完全本土化的和非官方的阵地”。《昭文新报》刊登地方消息、市场行情和广告,并转载《京报》的文章。显然,报纸以商人作为主要读者,但它最后却失败了。几个月以后,它由日报压缩为半周报,在一年内即停办了。后来,又有外国人分别于1874年和1880年两次尝试在汉口创办中文报纸,但同样都失败了^②。第一份在汉口持久发行的报纸是《汉报》,由汉口茶叶行会印刷出版。它从1893年一开始发行就获得成功,直至1900年才因被怀疑与唐才常密谋反叛一案有关,遭到张之洞查封。^③

然而,这些在汉口兴办报刊的早期努力的失败,绝不表明缺少读者群。汉口显然有广泛的读者群,但是这一市场自1872年后就被上海著名的《申报》有效地占领了^④。最初,《申报》偶尔刊载来自汉口的消息;到19世纪70年代末,这已经成为每一期必有的内容;1881年《申报》采用电报发送消息之后,汉口的消息变得更为及时。尽管无法估计出汉口人口中经常阅读报纸的人所占的比例,但对于城市火灾、犯罪和轶闻趣事的常规报道,清楚地表明报纸拥有一批重要的当地读者。

尽管《申报》是由英国人欧内斯特·美查(Ernest Majors)创办的,但总是有一名中国编辑代表中国人的观点。《申报》经常支持外国贸易和夸赞外国人办事的方式,但至少早在19世纪70年代末的中俄战争以及1883年的中法战争时,《申报》就摆出后来非常著名的民族主义的姿态。尽管美查最初希望《申报》不要办成

① 《申报》光绪三年六月二日;劳伦斯·奥利芬特(Laurence Oliphant):《1857~1859年额尔金伯爵出使中国、日本纪行》(纽约,1860年),第560页。拜瑞特(Bryant)1871年10月5日的信,伦敦布道会档案,B. 3. E. 卫斯理会档案:《汉口圣公会医院五年报告》,报告五(1870年),第78页。

② 《申报》同治十二年六月二十一日、八月十一日;金(King)1873年8月25日的信,英国外交档案,228/525;柯昆成:《中国报业史》,第153页;罗斯威尔·S·布瑞顿(Roswell S. Britton):《1800~1912年的中国期刊杂志》(台北,1966年),第76页。

③ 我曾阅读过现存的几期《汉报》,藏于武汉市图书馆;亦可见海关税务总司:《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1892~1901》,第320页。

④ 我对于《申报》的讨论基于广泛阅读了19世纪70至80年代有关汉口的报道,同时参阅了柯昆成《中国报业史》第106~109页,派瑞·林克(E. Perry Link)《鸳鸯蝴蝶派:20世纪初中国城市的通俗小说》(加利福尼亚,伯克利,1981年)第96~98页,以及玛丽·巴克斯·兰金(Mary Backus Rankin):《中国浙江省社会显要人物的活动能量和政治转变,1865~1911年》(加利福尼亚,斯坦福,1986年)。

一份局限于通商口岸的报纸，但它终究还是一份独特的“城市”报纸。商业消息占绝对优势使商人成为它的稳定的读者群。在最初的10年里，《申报》并没有形成自己独特而清晰的编辑方针。后来，经过审慎思考，《申报》被定位为立足于商业企业的报道，有时，它所作的充满激情的报道使它在这方面获得成功。很多报道（至少来自汉口的报道）来源于志愿通讯员，这保证了有一定不同意见的发表。虽然如此，《申报》每一期都有头版评论，主要是当时人们很感兴趣的时兴话题，例如“保甲”组织、城市犯罪、粮食流通和外交政策。更重要的是，《申报》关于地方社会活动模式与策略的讨论，时常被遥远的地方所学习和效仿，从而使它在那些地方成为先驱。早在19世纪70年代晚期，《申报》在长江流域和中国沿海城市中，就成为周锡瑞所称的“城市改革精英”的论坛。^①

这一新形式的书面传媒所带来的冲击是相当大的。在这里，没有必要去援引那些越来越多的“现代化”或“发展”理论，以讨论城市化、日益增长的识字率、不断发展的大众媒体以及逐渐增强的政治参与意识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这一基本事实^②，派瑞·林克（Perry Link）已经以另一种方式，对早期工业化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变幻莫测的中国城市，与相似的、更文学化的、狄更斯笔下的伦敦以及雨果笔下的巴黎之间，做了令人信服的比较，他指出：二者都如饥似渴地热衷于办报并连篇累牍地连载小说^③。19世纪后半叶汉口的历史表明，我们可以将这种相似点前推到“原初工业化”时代，也就是当新文学形式开始寻求读者并对社会产生影响之时。

许多西方报道者经常指出：异乎寻常的中介地位，造就了汉口人的另一特征，即“世界性”。当然，在汉口的历史进程中，曾荟萃了来自中国各地的人。事实上，外人常用中国俗语“五方杂处”来形容汉口^④。一般说来，方言、风俗和亚文化的混合融汇，以及频繁的进出城市，有利于在部分城市人口中产生很高水平的文化宽容（当然，这绝不是说就没有族群之间的冲突了，特别是在具体的群体利益上）。正是这种不同寻常的文化宽容，使汉口人在开埠后的头十年就接受了欧洲人。这种认同也可以扩展到与西方文化交往的过程中。在汉口，像其他地方一样，尽管中国文化的“自满”倾向使它不可能完全向西方社会模式转变，但西方物质文化特殊的

① 约瑟夫·埃什利克（Joseph Wharton Esherick，周锡瑞）：《中国的改良和革命：辛亥革命在湖南湖北》（加利福尼亚，伯克利，1976年）。

② 这一方面的早期论著之一，丹尼尔·勒纳（Daniel Lerner）的《传统社会的逝去：中东的现代化》（伊利诺伊，格林西，1958年）最值得信服，特别是第46、60～61页。

③ 派瑞·林克：《鸳鸯蝴蝶派：20世纪初中国城市的通俗小说》，第8～12页。

④ 这有许多例证，如：章学诚《章氏遗书》卷24，第26页；范锴：《汉口丛谈》卷6，第1页；1867年《汉阳县志》卷9，第2页。西方人对汉口人之“世界性”的认识，可参见戴维·希尔（David Hill）：《中国湖北：它的要求与呼声》（纽约，1881年），第1页。

和明显优越的成分却以一种惊人的速度被人们接受下来。西药的引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864年,即“伦敦教会医院”开业的第一年,教会医生波特·史密斯(Porter Smith)医治了20000多个病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在医院开张以前就申请治疗的。1879年,史密斯的同伴约翰·福德汉姆(John Fordham)在汉口建立了一家竞争性的诊所,在前四个月中看了2000多个病人。史密斯报道说:“病人来自各个生活阶层,各个省份……各省的巡抚、满清官员、文人雅士、举人、商人、市民、村民、武士和乞丐,都来尝试西药的作用。”^①

文化的宽容和“尝试”的广泛性(当然,这是由于:在这个商业都会里,完全可以品尝到中华文化中实际上可以消费的所有著名食物^②),是与对知识的广泛好奇和对外来事物的新鲜感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最早的西方来访者经常遇到礼貌却爱管闲事的旁观者,传教士们习惯于大张声势地宣称:在他们的传道会上,有许多“满怀渴望”和“专心”的群众,但其中较少是知道关注精神得救的聪明分子,更多的人则抱着好奇心理。1861年,仍然是平常显得冷淡的格里菲思·约翰这样写道:“听众所问的问题和由问题而引出的答案所反映的思想状况,与我在中国任何一处所遇到的情况相比,更属于好奇。”^③

有趣的是,对外国人的这种接受所产生的后果,与西方在1872年为觐见同治帝而进行的外交努力之成功,有着密切关系。当时《字林西报》驻汉口记者在这年9月报道说:“街谈巷议都在谈论外国人觐见皇帝的问题……人们都说,虽然满清官员强烈反对外国人觐见‘天子’,但百姓却更为明智、更实事求是地看待自古以来的惯例,他们相信皇帝会接见外国使者。”^④显然,这种议论的背后隐含着至少一部分汉口人的政治要求。尽管普通大众,正如格里菲思·约翰指出的那样,事实上“已经被灌输了这样的思想,即:只有统治者才有权力去思考公众事业”,但汉口人却总是坚持他们自己的观点,而且在太平天国之后这种倾向与日俱增。从事国内和国外贸易的商人,对我们今天所谓的“政治冒险”明显地表现出一种很强烈的投资兴趣。随着政治发展,这种兴趣越来越强烈地反映在面向商人集团的报刊如《申报》上。然而,谈论政治显然并不仅仅局限于商业精英,而是更广泛地深入到

① 卫斯理会档案:《汉口圣公会医院五年报告》,第2~3页;福德汉姆1879年12月29日的信,卫斯理会档案,第491函。

② 不仅一个例子涉及到汉口消费观念的广泛范围,参阅日本外务省通商局编:《汉口通商汇纂》(东京,1887年)。

③ 约翰1861年11月5日的信,伦敦布道会档案,Box 2. 3. E。另参阅英国议会下院:《英国议会公报》,1864年,卷63,第3294号,第134页;《北华捷报》1859年6月8日;戴维·希尔(David Hill):《在华中的二十五年,1865~1890》(伦敦,1891年),第10页;格里菲思·约翰:《来自中国的声音》(伦敦,1907年),第194页。

④ 《字林西报》1872年9月18日。

城市社会之中。事实上,《申报》本身就从汉口的各种“谣传”和“街谈巷议”中选取了很多本地区和本市的消息。^①

是何种契机促使对于较大政治事件的关心,逐渐转变成直接建基于当地商业环境的、更为活跃的政治参与意识?我们将看到,诉讼和向地方官府请愿等,是参与地方政治的习惯形式,即便是对于运水工和清洁工来说,也是如此。随着交纳商税的不断增加,商业精英们也越来越迫切地期望参与政治生活,特别是参与本地和本地区财政政策制定。然而总的来说,汉口的历史为玛丽·巴克斯·兰金(Mary Rankin)有关研究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持证据,她认为:促使政治意识之觉醒的契机,是光绪初年一些超出地方范围的重大事件——比如由政府主持的援助华北地区的救灾运动,和为对抗外国入侵而进行的大规模移民运动。1878年,汉口民众在地方社团的领导下,组织了救助陕西灾民的活动;1880年,他们参与了征募义勇军以准备对俄战争的活动;1883年,他们对清政府在中法战争中的软弱表现公开表达了愤怒^②。到1900年,当张之洞试图以同情革命为名强行关闭在汉口处于主流的中文报纸时,汉口人民成功地阻止了他。

三、职业结构

19世纪汉口的劳动者以何为生?这些劳动者分布在哪些职业部门?没有单一的资料可供我们了解这两个显然十分关键的问题。对这个城市的第一次现代调查是在1912年进行的,一共抽样调查了近100 000个职业家庭;几年以后,汉口商会调查了城内171个主要贸易行业的商店数量^③。这些调查分析都是有用的,但是,其可利用性因调查覆盖的行业不完整以及调查时间较迟——相对于1895—1911年间汉口的工业革命而言——而受到限制。传教士医生A.G.里德(Reid)对1873—1874年在他的诊所里就诊的4000个中国病人的职业进行的调查则提供了更为当时的证据。可里德的分类不是很精确。因此,除了这三份主要调查资料,我还依据更广泛的零星记载,最终得出了表2所提供的汉口职业结构。显然,这只是个粗略的估计,而且忽略了这段时间里劳动者构成的变化。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这是我们可能获得的对于汉口职业结构较为理想的估计。下面就让我们依次考察一下每一个

① 例如《申报》光绪九年八月十九日。另请参阅约翰1869年11月31日的信,伦敦布道会档案,Box 3. 3. C。

② 《申报》光绪四年十月八日;英国外交部档案:《1881年贸易报告》,第30页;威尔逊(Wilson)1886年7月3日的信,伦敦布道会档案,Box 5. 6。另请参照玛丽·巴克斯·兰金《中国浙江省社会显要人物的活动能量和政治转变,1865~1911年》一书。

③ 《汉口小志·户口志》,第3~4页。1920年《夏口县志》卷20,第9页。

主要的职业类别。

表 1 汉口伦敦教会医院 4000 个病人的职业分析, 1873~1874 年

职业	数量 (人)	职业	数量 (人)
店主	785	船夫	294
农民	751	教师	242
苦力	575	小贩	215
商人	508	士兵	130
仆人	405	其他	95

资料来源: A·G·里德于 1874 年 9 月 30 日完成的《汉口半年健康报告》;《海关公报》, 1874 年 4~9 月, 第 44 页。

说明: “农民”所占的比例较高, 根据其他可信资料, 这反映出病人来自附近的农村。

表 2 汉口的职业结构, 1860~1895 年

大类	占比	细类	
专业人员	约 5%	政府部门	官员, 编外的上层行政人员, 胥吏, 职业性的安全保卫人员
		社会部门	职业文人 (老师、生员、艺术家、作家), 上层管理者 (绅董), 医生, 牧师, 僧人, 占卜者
商业人员	30%	个体批发商	商品经纪人, 代理人与批发商, 钱庄主, 批发坐商, 批发行商, 代理人, 买办
		个体零售商	零售店老板, 放小额高利贷者, 饭店老板, 摊贩, 游动小商贩
		雇员	账房先生和学徒, 商业劳动者
运输人员	30%	运输代理人, 船主与水手, 长途挑夫, 从事当地运输的驮夫	
制造业人员	10%	工匠, 手工作坊的学徒和雇工	
建筑人员	10%	技工, 建筑学徒和工匠	
农业人员	5%	土地耕作者, 牲畜饲养人, 渔民	
边缘人	10%	保镖, 看门人, 家仆, 奴隶, 艺人 (演员、街头卖唱的人、妓女、说书人), 乞丐, 罪犯与地方无赖, 无业者	

1. 专业人员。除了任何时候都存在的文职和武职官员, 汉口城里还有大量的隐退官员, 有像叶谭青那样的从帝国其他地方官任上致仕回乡的本地人, 也有像黄赤城 (承煜) 那样原汉口官员、卸任后留在汉口的^①。数量更多的是职业性的、但却未列入正式官僚体系的上层行政人员——士绅通过应试或捐资, 成为正式官员的

① 范锴:《汉口丛谈》卷 5, 第 2 页; 王葆心:《续汉口丛谈》卷 2, 第 11 页。

私人秘书(“幕友”),他们主要是充当“文员”,或者在准官方的行政部门“局”中负责收税、管理港口、维护内部安全等等。“胥吏”的社会地位较低,但数量最多。根据1912年的统计,汉口有将近1000名胥吏。我们注意到,职业性的安全保卫人员——绿营兵、乡勇和保甲长——的数量在19世纪不断地增长,因而它在里德医生抽样调查中占3%的比例并非夸张。

除了政府部门之外,我们还注意到:在商业活动占据主导地位的汉口,仍然养活了一大批职业文人。其中一大部分是教师。尽管像胡桂生、江凯威和胡守廷那样的老师受到普遍尊敬,但教师并不富有。(叶调元讽刺地评论那些在门上挂着“学堂”小招牌有着吸引学生和赶走乞丐的双重作用,乞丐们知道居住者十分的贫困。)^①汉口大部分的职业文人是“生员”。那些来自富有家庭或依靠政府薪水生活的人之所以能一直过着这样的生活——如罗成黄(译音——译者),就在汉口度过40多年——显然是为了参加省试。除了从事教育,有些拥有文学才能的人选择了形形色色的、不那么稳定的生计:程耕云,一个“诸生”,是作贺词的专业作家;段嘉梅,生员,为诗文背诵者;吴仕潮,明显以出售他的诗和学术文集为生^②。

在一些例子中,职业文人具有绅董的双重身份。早在16世纪,首先在江南出现了具有现代早期特征的职业类型,如水利工程监察者(管理者)等。在整个19世纪,这种需要自己去寻找的、带有薪水的“白领”职位在当时的公众活动中——例如,在市内建设、消防、公共救灾事业领域——不断增加,行会、善堂和家族组织也需要使用一些文书。这个城市里最后的专业人员群体包括精神或身体的治疗者(医生、牧师、僧人、占卜者)。叶调元发现:在太平天国前夕,汉口有一千多个职业医生;在1912年调查中,有177个职业占卜者(地理卦)和47个术士,且有400个道士和佛教传播者(和尚)。^③

2. “商界”。大小不等的各种批发商人和零售商人总共占汉口固定劳动力总数的四分之一。在里德记录的4000个例子中,明确有25%的“商人”和“小贩”;如果从他的调查中排除有疑问的“农夫”的话,这个比例将接近三分之一。1912年调查表明:“商人”占这个城市居民的31%。

无需赘述,各种大型批发贸易构成了汉口的生命线,这些在我上一部著作中已有详论。在这里,我只想强调指出:在一个单个商人的职业中,这些功能性的角色

① 叶调元:《汉口竹枝词》卷5,第2页。胡桂生等教师的情况,见《明清档案》周天爵道光十九年五月二十五日的奏疏;1867年《汉阳县志》卷20,第34~35页;王葆心:《续汉口丛谈》卷2,第32页。

② 《黄山庙罗氏宗谱》卷20,第34~35页;范锺:《汉口丛谈》卷2,第22页;卷3,第14页;卷3,第17页。

③ 叶调元:《汉口竹枝词》卷5,第2页。

往往交叉在一起，而不是分离开来的。各种类型的批发商都拥有一个相当广泛的经济层级范围——从奢侈的大盐商，到那些每天都要去郊区市场收购布匹、赶回城中制成成衣的小“贸迁者”。^①

零售商人的数量有数千。这包括客栈老板、饭店老板和茶叶经营者（到20世纪初，总共达2000多家），还有屠夫、蔬菜零售商人、豆芽商、磨坊主、鞋店老板、理发师、豆腐店主、水果商、裁缝、帽子商、烟商和杂货、筷子商人以及供给各种城市作坊原料的商人^②。尽管这些固定的零售商店（也有一些兼做批发）在规模上有较大的变化，店主作为一个群体，明显地组成了一个社会阶层，其地位比那些暂时在街道弄堂摆摊或背着东西在城市里沿街叫卖的其他零售商要高一些。到1912年，后两种人占据了城市劳动者的十分之一。摊贩（“摊民”）主要是从农村贩买一些易坏的食品，聚集在城市里众多的“全日市”或“半日市”、“夜市”上。例如，一百多个摊贩主要活跃在江汉交汇处、龙王庙前的大水果市场^③。其他分散的摊贩将他们的商品放在席子上，置于空地，直到地方上的富人们将他们赶至其他地方。“摊贩”作为一个群体，其社会地位在巡回叫卖的小贩（“行贩”）之上。行贩们在街头叫卖他们放在手推车或吊在肩头篮子里的商品——鱼、食用油、花生、炊具，每个人以其独特的吆喝声、铃、铜锣等来向人们表示他们的到来。一些商贩努力维持稳定的生活，但很多人发现，他们需要通过季节性的做其他工作，诸如算命或乞讨，来获得收入。^④

与以上个体商人有着明显的区别，在批发和零售行业，不论是坐商，还是行商，都有一些受雇于商行的雇员，他们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这些人依次可以分为两类：一为店铺伙计、帮伙和徒弟，不管怎么贫穷，这些人都期待着有出人头地的机会；另一类是拿薪水的商业劳动力，诸如仆人和厨师。这两种群体的人数都十分庞大。在1912年的调查中，仅厨师一项，人数即已达到3000人。

3. 运输业从业人员。如果将大量的船夫、马车夫和长距离的赶牲口者等过境人口计算在内的话，汉口有将近四分之一的劳动者在一定时间里受雇于运输业。这一群体的上层阶级包括运输经纪人和船运代理人（“船行”、“车行”、“夫行”），这些人长距离的和当地的商品搬运紧密相连。横山英的详细研究表明：这些人为商人起草合同，处理金融方面的问题，为工人找工作，有时为工人提供工具、食物和

① 范锺：《汉口丛谈》卷2，第23页。

② 1920年《夏口县志》卷12，第9~10页。一份很有价值的资料表明，在《申报》上，常见到不计其数的有关汉口零售商人遭受火灾和被窃的报道。

③ 叶调元：《汉口竹枝词》卷1，第3~4页；《申报》光绪二年一月十六日。

④ 例如，布赖森（Bryson）：《约翰·肯尼思·麦肯齐（John Kenneth Mackenzie）与英国国教在中国的传播》（旧金山，1977年；伦敦，1891年原版），第109~110页。

住处，收取佣金和付经营税给官府^①。汉口拥有不下数百个这样的经纪行。^②

毫无疑问，汉口船夫的数量是巨大的。1877年，一份典型的报告估计大约有10 000只船同时云集汉口港；1891年，海关报告估计每年有165 000名水手在到达汉口的平底帆船（即从事长途运输的船只）上工作。这些平底帆船通常航行了较长路程，汉口一般是其航程的终点；也有很大一部分船只在港口停泊足够长的时间，以便交易他们的商品（通常是在自己船上），它们大多会与这个城市中自己的同乡会联系。通常，船上有一个主管（“船户”）——实际上是一个拥有自己船只、雇佣自己，并在货物运输中自己承担风险的小业主，一个熟练的搭档（“船伙”），并且雇用3至12个水手（“船夫”、“水师”）。由于船主在水下航行中可以运送不同种类的货物，而且通常是通过运输经纪人获得单程运输的合约，所以雇用水手时总是说明只是一个单程，从而使这些水手常常在港口、船、船主之间自由飘浮，并且经常不仅做水手，还要从事其他不太熟练的劳动^③。除了大型的平底帆船，汉口还有数量更多的、短小型的轻舟和划子，它们的主人兼操作者一家（“划户”），大都住在船上，主要从事地方运输（见图2）^④。在19世纪的最后10年中，上述各种类型的船夫都逐渐成为内河轮船上的船夫。

汉口大多数长途陆路运输者是赶马、骡和骆驼等牲口的人。这些人受雇于大商人，住在集中于马王庙一带昏暗的“骡马店”里。这些骡马店，正如1822年的文献所描述的那样：“有屋数十楹，幽暗失宦窻。不知何许人，出入只取闹。我来主试援而止，风雨破窗久无纸。朝阳夕阳不可徙，时方秋热汗如洗。”^⑤

数量更多的是成千上万的本地搬运工，包括相对特殊的群体例如车夫（推车）

① 横山英：《中国近代化的经济结构》（东京，1972年），特别是第149～155、178～185页。

② 1912年的调查表明有大约251个内河航运经纪人。关于他们的活动，可参见《申报》光绪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奥古斯塔斯·雷蒙德·马嘉理（Augustus Raymond Margary）：《汉口至大理府行记》（上海，1875年），第2页。

③ 有关汉口船员详细的叙述可见于：《明清档案》嘉庆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嘉庆二十五年六月十二日张荫桓奏；《总理衙门档案·湖北洋人交涉》：裕禄光绪十三年三月七日折；《申报》光绪五年九月十九日和九月二十一日。亦可参见森田明：《清代水手结社的性质》（《东洋史研究》，第13卷，第5期，1955年），第19～20页。

④ 例子见《申报》光绪八年六月十八日；海关总税务司：《十年报告，1882～1891年》，第184页。布赖森（Bryson）：《约翰·肯尼思·麦肯齐（John Kenneth Mackenzie）与英国国教在中国的传播》，第39页；W·阿瑟·考纳比（W. Arthur Cornaby）：《华中漫游》（伦敦，1896年），第42页；威廉姆·斯潘塞·珀西瓦尔（William Spencer Percival）：《龙的土地：长江上游峡谷航行记》（伦敦，1889年），第57页；阿诺德·福斯特（Arnold Foster）：《在长江河谷》（伦敦，1899年），第3页。

⑤ 范锴：《汉口丛谈》卷2，第23页。

轿夫、水夫、码头夫和少量特别的挑夫、扛夫、脚班。和水手一样，这些人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流动者，也是职业上的流动者；他们都试图从汉口直接腹地的某一部分挣出更多的钱来。所有的运输工人每天都在为生存而挣扎；地方报道中充满了这样的评论：“尽管他们工作极其辛苦，但仍然朝不饱夕。”^①

4. 制造业和建筑业从业人员。尽管被断言“寄生性”和“消费性”是它们的基本特征，中华帝国晚期的大多数城市仍然都有效地生产面向外部市场的商品，或者参与到这些商品的生产过程之中。即便是像汉口这样较单纯地依赖于运输业的巨大的商品集散地，也是如此。如果不是存在着相关的限制，一个城市的劳动力必然包括大量的、从事建筑和手工业生产的技工、工匠和劳动者。——到 1912 年，根据调查，汉口有将近 24 000 名这样的劳动者（见表 3）。

表 3 汉口工业和建筑工人，1912 年

职业	数量
小艺	4625
木工	3507
金工	1801
土泥工	1914
石工	384
窑工	44
各职业工人	2221
佣工	9256
总数	23752

资料来源：《汉口小志·户口志》，第 3～4 页。

说明：最后两类无疑包括许多新工厂的劳动者，而在 19 世纪，其中的许多人可能受雇于手工业品贸易行业。这些数字不包括商业和运输方面的劳动者。

无须惊讶，汉口制造业活动最集中的领域是与本地区直接相关的商业和航运业。作为一个主要河港，汉口拥有几家大型板厂，这些板厂集中在沈家庙一带，还

① 《申报》光绪四年五月二十一日。有关运输工人的情况，可参见《申报》光绪元年十月七日，光绪七年九月七日，光绪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和光绪八年十二月五日；叶调元：《汉口竹枝词》卷 1 第 4 页，卷 2 第 5 页和卷 5 第 19 页；《总理衙门档案·湖北洋人交涉》：涂（原文作“徐”，误——译者注）宗瀛光绪九年三月五日折，卞宝第光绪十年七月十四日折。1912 年的调查发现，城里有将近 8000 个长途陆路运输工人和同等数量的地方运输工。

有几个规模较小的维修厂散布在江边^①。更为重要的是箱子的生产。人们从这个城市巨大的木材市场买回部分木料，留下来用来制造装运茶和其他商品的木箱。像集中在沈家庙一带的船厂一样，许多工厂都参与木箱的生产，并且以制造棺材为副业^②。同样广泛生产的是在盐、米、草药的运输中使用的竹艺品、柳条篮、麻袋等，这些一般在“米厂”（地名——译者注）一带的工厂里生产。^③

同样依赖于这个城市在地区间贸易中之中心地位的，是众多的各种各样的加工业。在清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汉口广泛地参与碾米和经过这个港口的其他谷物的加工，以及桐油和其他植物油的榨油工作^④。由于邻近储存煤的湖北中部和湖南，以及产铁的鄂东北，至少早在19世纪90年代张之洞在汉阳创立汉阳铁厂之前一个多世纪，汉口就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地方冶炼工业^⑤。在雇工的数量方面，也许最重要的是棉麻加工厂。大量的本地特制棉布从汉阳府和武昌府的周围各县农村进入汉口，在汉口大型的踹石坊、研布坊里打磨光滑，在染坊里染上各种颜色，然后运送到中国各地的专业市场。当1858年额尔金（Elgin）爵士参观汉口时，这种生意已经走过了它最富有生机的阶段；那时，一些商店已经开始出售经广州进口的英国棉布^⑥。纺织品生产的另外一种类型是从农村生产者那儿收集大量的棉布，在汉口用“大剪子”把它们剪成小块，然后将这些卖给地方零售商或做出口生意的批发商。^⑦

除了加工运输过程中的商品，汉口的工匠和劳动者也广泛地参与多种多样的生产

① 《总理衙门档案·湖北洋人交涉》：李翰章同治十二年二月二十八日折；《申报》光绪六年八月十七日；日清贸易研究所：《清国商事指南》（上海，1892年），第1卷，第120页；孙敬之：《华中经济地理》（华盛顿，1960年），第155页。

② 1920年《夏口县志》卷5，第23页；《申报》光绪五年十二月十五日。阿拉巴斯特（Alabaster）1884年3月的信，英国外交部档案，17/959。

③ 《总理衙门档案·湖北洋人交涉》：裕禄光绪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折；《申报》光绪三年四月二十日。

④ 水野幸吉：《汉口》（东京，1907年），第470～478页；中山美绪：《清代前期江南的米价动向》，《东洋史研究》第37卷（1979年），第65、87页。

⑤ 包世臣：《安吴四种》卷34，第9～11页；英国议会下院：《英国议会公报》，1861年，第66卷，第342页。

⑥ 额尔金1859年1月5日的信，英国外交档案，405/3；劳伦斯·奥利芬特：《1857～1859年额尔金勋爵出使中国、日本纪行》；《申报》光绪六年七月十六日、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十三日；水野幸吉：《汉口》，第563页；藤井宏：《新安商人研究》，《东洋学报》第36卷第1期，第15、26页。

⑦ 范锴：《汉口丛谈》卷1，第17页；叶调元：《汉口竹枝词》卷1，第9页，卷5，第4页；《总理衙门档案·湖北洋人交涉》：李翰章同治十三年十月二十日折；《申报》光绪二年十二月十九日，光绪三年十二月十日，光绪四年六月二十六日，光绪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光绪八年十月二十四日。

活动。城市居民多参与丝、棉的纺织^①。一些小作坊生产了大量的绒、毛毡、丝带；而纸、皮革、麻绳和竹索之类，用英国领事的话来说，也是“普通的中国产品”^②。而汉口金属（铁、银黄铜和青铜）制品贸易的规模则相当大，它生产大量的珠宝、烟管、镜子、铜锣、剪刀、刀子、洗衣盆和厨具；不同寻常的另一项产品是爆竹烟花，汉口的鞭炮全国闻名。^③

5. 农业人员。汉口是中国建筑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19世纪的汉口有很少几个郊区和卫星村庄，从区际贸易中获得的大量食物远远超出其本地的出产。因此，与中国其他重要城市相比，汉口很少有人受雇于农业，即使是季节性雇工。根据1912年的调查，将从事农业作为首要生活来源的人口不到1%。虽然如此，但在1864年汉口建立城墙之后，在城市的边缘形成了一条“绿色地带”；1877年的地图则表明：在城市建成区里，也有许多小菜园像绿洲一样点缀其间^④。此外，相当一部分城市居民靠饲养家畜和捕鱼以维持生活，这也同样为本地人口提供了一些食物。^⑤

6. 边缘人。在汉口人口中，还存在着大量的失业者或从事被认为是次要职业的人，而且这部分人口不断增加。这一群体包括演员、艺妓及大量乞丐——他们以不同方式凭借其声音而谋生。所有这些都过着不稳定的生活，在社会的边缘生存着。这些各种职业类型的人数量较多，在汉口城市化进程中，他们虽然不是广泛地、但却是持续不断地影响着汉口。

在表2中称之为“保镖”的属于职业类型的下层，是由那些没有职业地位的官府士兵或保、甲长组成的，他们仍然参与地方法律和秩序的维持。他们包括短佣、更夫、栅夫、消防人员和私家仓库的看守者（经常被蔑称为“人夫”，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混日子的雇员”）。其中的大部分人是季节性或暂时受雇，或者是来自其他的经济行业的季节性失业者；这些工作对于那些难于维持生存的人们来说是救命钱。尽管生活的安全系数要高一些，与此相类似的还有政府衙门里负责保管和维修

① 水野幸吉：《汉口》，第498页；海关总税务司：《海关系列报告之三·丝》（上海，1881年），第35页；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北京，1957年），第2卷，第100页。

② 阿拉巴斯特：《1874年贸易报告》，见英国外交部档案，17/732；《申报》光绪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光绪四年六月五日，光绪四年八月二十一日，光绪六年七月十六日，光绪七年十月十七日。

③ 日清贸易研究所：《清国商事指南》，第1卷，第120页；《申报》光绪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光绪七年十月十七日；海关总税务司：《中国通商口岸贸易报告，1879年》，第29页；蔡乙青：《闲话汉口》，《新声月刊》第6卷，第5期，第40页。

④ 《湖北汉口城市导图》，1877年。

⑤ 《申报》光绪四年六月五日，光绪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的小职员、行会公所与庙宇的看守人和维修者，以及在富商家中的仆人（既有自由的，也有不自由的）。①

“艺人”这一职业门类包括各种不同的戏剧演员（“优俳”）、乐师、街头卖唱者、妓女、算命者、市场杂耍人等等②。同时也包括职业的吊丧人（无疑也是婚礼的庆祝者），这些人定居于众所周知的地方，如悲乐堂③。要清楚地区分这些各种各样的街头人群与乞丐，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后者（乞丐、乞儿）的大量存在，至少早在 19 世纪初就已经成为汉口的一道风景。19 世纪中期，一位来访的诗人曾写到：

乞丐盈街半暮年，朝生夕死总由天。
可怜枵腹斜阳后，一路哀呼卖小钱。④

这一问题在太平天国后的数十年中只会变得更为严重。1872 年，里德医生写到：“乞丐”的扩展已遍及这个城市的每一角落；到 19 世纪 80 年代后期，即便是在英租界，行乞者也日益增加⑤。乞丐明显地分为两种类型：相当少的一部分是汉口的长久居民，他们已成为半职业化的乞讨者；数量较多且随季节变化的是一些季节性的，或者靠乞讨来度过他们困难时期的乞讨者。第二种类型多是因洪水、饥荒或战争而产生的难民——当然，这些因素也给居住于在汉口的本地城市下层民众带来影响。

到 1912 年，调查表明：当时汉口固定人口中有将近 5000 个家庭处于失业状态（“无业”）。可以肯定地说，这应当是一个较低的估计数字。早在 19 世纪 70 年代，当地中文报纸就报道说，汉口居民中，长期失业的人口在不断增加⑥。一份 19 世

① 《汉口紫阳书院志略》卷 6，第 47～49 页；卷 8，第 58～59、75 页；《清宫档案》，同治七年五月十八日琦善奏；范锺：《汉口丛谈》卷 4，第 30 页；叶调元：《汉口竹枝词》卷 1，第 3 页；《申报》光绪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光绪五年十二月四日，光绪七年九月十八日，光绪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② 范锺：《汉口丛谈》卷 2，第 27 页，卷 6，第 1 页；叶调元：《汉口竹枝词》卷 5，第 10、16～20 页；《申报》同治十一年八月二十一日，光绪六年一月二十一日；布赖森（Bryson）：《约翰·肯尼思·麦肯齐（John Kenneth Mackenzie）与英国国教在中国的传播》，第 109 页。

③ 叶调元：《汉口竹枝词》卷 5，第 8 页。

④ 叶调元：《汉口竹枝词》卷 5，第 6 页；亦见范锺：《汉口丛谈》卷 5，第 16 页。

⑤ 《海关总志》（1872 年 3～4 月），第 44 页；毕晓普夫人：《长江河谷及其远方》，第 73 页；福斯特：《在长江河谷》，第 13 页。

⑥ 《申报》光绪二年三月四日。

纪80年代的地方资料证实,失业人口的不断增加始于19世纪20年代^①。当然,一般认为,失业人群的主要部分是季节性或年季性的失业者,或者是刚从周围地区来找工作的人。失业人数之众,可以从军队征兵的数字中见出一二。在汉口,如同在欧洲城市一样,由于士兵有固定的工资,征兵对那些失业者有很强的吸引力。1880年,当将与俄国开战的谣言传入汉口时,募兵处在汉口很快征到了20000名志愿兵,这使外国观察者大为吃惊^②。那时,人们很容易在汉口的街头看到很多身体强壮的人在到处游荡,并没有什么原因强迫他们留在那里。

四、劳动组织

近年来,从事西方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很多学者开始关注在生产组织方面所谓“家庭经济”的优势向“商人资本主义”优势的转变。这一转变与其说是由工业化所引起的,不如说是为工业化铺平了道路。在大多数地方,这一转变在工业革命之前几代或前几个世纪就已经完成了。在这一阐释体系中,“家庭经济”被赋予如下特征:生产规模较小,一个“作坊主”监督一至三个也许实际上已经是“作坊主”之家庭成员的“学徒”,这些学徒生活和工作在家长式的控制之下。当生产的控制权从这样的“作坊主”转移到某个以前经常向几个作坊主分包产品的大商人手中时,就发生了“向商人资本主义”的转移。“商人资本主义”具备以下特征:更关注“时尚”产品的生产,而不是传统商品;生产规模扩大(例如大的作坊);在一定程度上更为细致的劳动分工;学徒制度削弱,不再是以家庭作为劳动单位,纯粹的劳资雇佣关系;劳动者具有更大的流动性,等等。简言之,这就是习称的“无产阶级化”的开端。在E.P. 汤普森的分析中,“商人资本主义”是从与直接人身控制联系在一起的“学徒制”向“工厂制”过渡的中间形式^③。

中国历史学者已经注意到在长江下游及其他地区的一些城市中所发生的引人注

① 1884年《汉阳县志》卷2,第22页。

② 阿拉巴斯特:《1880年贸易报告》,英国外交档案,17/864。

③ E·P·汤普森:《贵族社会,粗俗文化》,《社会历史学报》,第7卷,第4、386页。对这一过程的总体描述见乔治·路德(George Rude):《18世纪的巴黎和伦敦:民众反抗研究》(纽约,1973年),第52~53页;罗伯特·杜伯勒斯(Robert Duplessis)和玛莎·豪威尔(Martha Howell):《再论现代早期的城市经济:以林登和里尔为例》,《过去与现在》第94期(1982年2月),第49页。有关欧洲和美国城市中这一转变的具体分析,可参见威廉姆·H·塞维尔(William H. Sewell):《法国工厂和革命:从旧制度到1848年的劳动语言》(英国,剑桥,1980年),第157~159页;保罗·约翰逊(Paul E. Johnson):《一个店主的太平盛世:1815~1837年纽约州罗切斯特市的社会与复兴》(纽约,1978年),第43~48页;艾伦·多利(Alan Dawley):《阶级与社区:里昂的工业革命》(马塞诸萨,坎布里奇,1976年),第17~32页。

目的变化,这就是他们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①。如今,大多数学者都同意这一变化始于16世纪,但对于它在清代的发展步伐、分布区域,这一进程对于生产率与劳动效率之影响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差异,仍然存在着诸多怀疑。毫无疑问,在19世纪的汉口,这一转变的某些方面仍然是潜在的,新、旧两种形式的劳动组织同时并存。在上一部著作中(指《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译者),我曾尝试着探讨了汉口企业的资本化结构和管理模式,指出:无比复杂的“合伙人”和投资结构,较之于更为传统的家族制企业结构,具有更大的优势。在这里,让我们更直接地考察一下企业内部的劳动关系。

和帝国晚期的中国各地一样,汉口绝大多数的重要商业企业,基本上仍然是最为典型的“家庭经济”。虽然不是像现代早期欧洲一些市政府所做的那样,由官僚行政部门“授予”家族企业以某种持续的控制权^②,但清朝的行政官员仍理所当然地认为家庭企业应当规范化。这具体体现在保甲的门牌上,每个商店都必须将门牌悬挂于门上。一个标准的门牌包括以下几项内容:

店名____, 甲号____, 牌号____, 户号____。

户主名____, 年龄____, 籍贯____。

户主的祖父母____, 父母____, 叔叔____,

兄弟姐妹____, 妻子____, 儿女____, 女婿____, 孙子____。

合伙人____, 店伙计____, 学徒____。^③

在汉口,“小户店铺”这个习称反映了零售店或小型批发商行的特点,它们一般由家庭成员组成,可能雇用一个“店伙计”或“帮贸”,一个或几个“徒弟”^④。较小的手工作坊的结构大致相仿,由“师”、“友”和徒弟组成。即使是汉口最富有的中间商所拥有的最有名望的茶行和其他商行,也一般是家族企业,直接雇佣的只有经纪人本人、一个会计、一个“帮贸”、一个徒弟和一些店伙^⑤。另一种常见的、

① 有关这一问题的经典性论著是傅衣凌所著:《明清时代商人之商业资本》(北京,1956年)。一位中国学者试图将对“资本主义萌芽”的分析用于汉口,但是他将他的讨论限定在城市商人在组织农村棉纺织生产中的作用。见范植清:《鸦片战争前汉口镇商业资本的发展》,《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第50~56页。

② 罗伯特·杜伯勒(Robert Duplessis)和玛莎·豪威尔(Martha Howell):《再论现代早期的城市经济:以林登和里尔为例》,《过去与现在》第94期(1982年2月),第49~84页。

③ 选自18世纪后期重庆的一个典型例证,见于今堀诚二:《清代商业合伙制的近代化倾向》(《东洋史研究》,第17卷第1期,1956年),第5页。汉口公布的保甲规章也有相似的规定。

④ 例如,《申报》光绪九年七月二十一日。

⑤ T·H·朱:《华中地区的茶叶贸易》(上海,1936年),第244页。

略有不同的家庭企业是当地的个体船户，他们拥有并在几个雇用水手的帮助下经营船只^①。

即使没有直接的政府或行会规范，家庭经济在汉口也表现出一种引人注目的弹力和适应性，这使得它即便是在商业总量成倍地增加的情况下也能生存下来。例如，来自徽州的汪姓家族，从17世纪90年代以来，就一直在这里经营他们著名的“汪玉霞食品店”，到19世纪中期，已历9代。在这些岁月里，通过利润的再投资，汪家的财富不断增加；但是汪家对此作出的应对，并不是大规模地扩大其起初的店铺规模，而是建立了许多经营食品、干货和其他商品的分店，因此，到1800年左右，他们的后代在汉口和长江流域各地总共拥有136家店，而每一家店实际都是一个独立的家庭规模的企业^②。许多其他的例证也表明：19世纪汉口的很多店主在这个城市各处建有连锁的分店，经营同一系列或不同系列的商品，通过雇佣伙计或长工维持分店^③。汪家的历史表明：经常被认为是导致西方家庭经济破产的因素，即商人资本进入生产领域，在中国也许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当“汪玉霞”认识到某一种食品有稳定而可靠的销售前景时，它就着手建立分支作坊以进行生产；这些作坊在规模和管理上都与城市里其他的手工作坊基本相同。在这种方式下，资本的扩张，并没有引起经营单位规模的扩大，而是将资产分成数份，每一份资产的获得者都拥有对自己资产的经营权，从而建立起一些相同的家庭规模的经济单元。这样，城市商业企业实际上“复制”了我们在农村常见的模式。^④

在家庭经济内部，对雇员实施的家长式的控制被儒家学说理想化了。可以找到很多证据证明，至少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真实情况与儒家学说的理想非常接近。雇员通常住经营场所，即“商店的售货间和作坊的工作间里，这些地方对大多数男性雇员来说，既是餐厅又是寝室”^⑤。血缘——同乡纽带经常是（尽管并非

① 《明清档案》：同治二十五年六月十五日李翰章奏；海关总税务司：《十年报告，1882～1891》，第184页。横山英在《中国近代化的经济结构》（东京，1972年）第155～158页，对作为一个经济实体的“船户”作了详细分析。

② 武汉市工商业联合会：《武汉市汪玉霞食品厂沿革》，1959年稿本。

③ 《申报》光绪三年十二月六日及光绪九年八月二十五日。

④ 戴维·福里（David Faure）最近提出：商业方面的典型模式是：对于独立拥有和管理商店的每个家族成员的家庭来说，家族地位是一种信用资源。而且张殷华（音译——译者）更进一步指出：拥有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商店如此频繁地从分散的家庭中分离出来，从而使“家庭企业”得以长期地维持雇佣机构和职业商业管理者的增加。见戴维·福里：《作为商业公司的家族》，“中国现代经济史第二次会议论文”（台北，1989年）；张殷华：《20世纪20至30年代中国城市的内部结构：一种生态趋向》（博士论文，普林斯顿大学，1982年），第351～352页。

⑤ 威廉·施坚雅：《导言：清代中国的城市社会结构》，见威廉·施坚雅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533页（前揭中译本第634页）。汉口的有关例证，见《申报》光绪九年八月二十五日，《遗文录》1884年8月23日。

总是) 征召雇员的渠道。显然, 雇主或者东家对来自亲近家庭的雇员的行为和福利负有某种责任。现存史料中有一个例子, 当一个雇工因表现不好而被解雇时, 他过去的工钱被交给他的兄弟或监护人^①。从 1876 年的一个案例中, 也可以清楚地看到雇主所应负的更为广泛的个人责任: 9 个甘肃干货店的伙计在一场夜间的大火中丧生, 虽然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业主仍然给每个死者家庭 200 两银子作为“恤钱”。^②

尽管这种家长式的控制适用于几乎所有的全职雇员, 但受到更为严格地管制的, 则是那些正式的“学徒”(“徒弟”)。在中国, 与西方一样, 学徒制是家庭经济的基础, 这一体制维持的首要因素是商业或手工业行会^③。学徒控制制度应用于汉口的许多行业(尽管不是全部行业), 特别是在高技术的手工艺品贸易和需要高技术专家的商业贸易中, 比如珠宝或中草药生意中^④。学徒大约在 14 岁时进入雇主家里, 按照惯例, 要举行拜师仪式, 并承诺恪尽“义子”应尽的孝道及各种义务。在作为学徒的由合同固定下来的通常三四年时间里, 这种亲属关系虽然是有意识地假定的。尽管处于一种极端的依附地位, 学徒仍然拥有法律赋予的权利, 包括有权离开或者在他学徒期满后建立自己的商店; 如果雇主忽视教他怎样做生意, 学徒有权起诉中止合同。有两套 19 世纪汉口的行会规章保留至今, 一是“天平公会(秤戥业行会——译者)条规”, 一是“豫章公所规约”。其中都包括为确保学徒制度的一致而制度的规定。行会或者通过间接的方式(为雇佣学徒付给行会高额的费用), 或者干脆直接规定允许的数量(在天平公会, 每人允许雇一名学徒), 限制每个雇主所带的学徒数量。每个特定行业学徒的时间是确定的, 既不允许学徒时间太长, 也不能太短——时间太短被认为不能确保学徒获得足够的业务训练。根本性的担心是对学徒品德控制的侵蚀。正是因为严格控制了学徒的个人品德, 行会领导成员才作为合法的专职者, 得以确保对商品价格的控制, 并在遭到质次价廉的竞争者入侵时, 采取措施以保护其自身的利益。^⑤

在所有文化中, 学徒制度本身都长期存在着将学徒制贬低为一种简单的契约劳

① 《明清档案》: 道光十年一月二十八日杨灏奏。

② 《申报》光绪二年一月十六日。

③ 关于欧洲的情况, 参见威廉姆·H·塞维尔:《法国工厂和革命: 从旧制度到 1848 年的劳动语言》, 第二章; 马克·沃克(Mack Walker):《德意志家园: 社区、州与大地产》(纽约州, 伊萨卡, 1971 年), 第 73~88 页。

④ 例如:《申报》光绪七年闰月十八日;《药帮大巷》, 见《长江日报》, 日期不明。

⑤ 东亚同文会:《支那经济全书》(东京, 1907 年), 第 2 卷, 第 133~134、641~642 页; 全汉昇:《中国行会制度史》(上海, 1933 年), 第 133~134 页。对于全国范围的行会有关学徒控制规章的较好分析, 可见今堀诚二:《清代的学徒制度》, 见所著《中国近代史研究》(东京, 1968 年), 第 133~152 页。

动关系的危险。例如：在 17 世纪的伦敦，自由劳动力市场的增加“导致了某些工业部门劳动力的过度拥挤，至少一些年轻的劳动力，虽然名义上是学徒，实际上却只是廉价的劳动力而已，当他们的学徒期满以后，不能得到雇佣的保证”^①。最近，盖尔·赫夏特（Gail Hershatte）关于 20 世纪前期天津的研究表明：在天津（毫无疑问，那时的汉口也一样），与此相同的学徒制的退化已经达到一种相当先进的阶段。^②在上述行会规章中，都有很大部分是有关防止此种贬低学徒地位的条款。然则，在 19 世纪，学徒制的弱化又是怎样实现的呢？

中国这一时期的资料中缺乏对这一问题的叙述。从 20 世纪前期记者们反复将这方面的问题作为丑闻加以报道这一事实来推测，可知学徒制的作用在工业化之前比在工业化过程中，要相对好一些。不管怎样，已经有数名学者注意到：在太平天国后的数十年中，汉口以及其他地方的行会频繁地公布有关保护学徒制度的规章。（行会规章的表述方式并没有改变，只是增加了更多的条目。）以这一证据为基础，彭泽益和今堀诚二分别探讨了商业和劳动组织结构的一般变化，认为此种变化预示着整个家庭经济将走向衰落^③。尽管对于如此频繁地颁布行会规章条例还存在着其他可能的解释（如：建设组织和颁布规章事实上常常是对大动乱之后出现的道德真空的普遍回应），但统计证据表明，彭泽益和今堀诚二的讨论没有偏离这一认识。

给家庭经济的稳定带来根本威胁的，是遍及全国各地的、大规模的、互不相联的、流动劳动大军的出现。近年来，一些文章指出：这一群体之开始出现，是晚明商业革命的结果；在清前期，伴随着商品化的进一步发展，这一群体持续增长；同时，清政府鼓励自由契约劳动和地域流动的政策，也促进了这一群体的发展^④。这些自由劳动者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来到汉口，例如：有因受命单程运货至汉口的水手，或者成群地来自湖北、湖南和四川的打工族^⑤。在整个 19 世纪，这些人的数量呈稳步增长趋势，并且在 19 世纪后半叶迅猛增长。武汉地方史研究者曾对后一阶段由于受到外国商品和轮船运输的竞争而引发的国内经济（重心）转移的发展历

① 马克斯·贝弗尔（Max Beloff）：《公共秩序与民众骚动，1666～1714》（牛津，1938 年），第 31 页。

② 盖尔·赫夏特（Gail Hershatte）：《1900～1949 年天津的工人》（加利福尼亚，斯坦福，1986 年），特别是第 4 章。

③ 彭泽益：《19 世纪后期中国城市手工业商业行会的重建和作用》，《历史研究》1965 年第 1 期，特别是第 71～72 页；今堀诚二：《清代的学徒制度》，见所著《中国近代史研究》，第 143～148 页。

④ 重田德：《明末清初江南城市流民的社会关系》，《史学杂志》第 90 卷第 11 期（1979 年），第 1619～1653 页；刘永成：《论清代前期农业雇佣劳动的性质》，《清史研究集》第 1 辑（1980），第 91～112 页。

⑤ 《明清档案》：嘉庆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三日金鲍奏；《申报》光绪七年闰月十八日。

程,进行过探讨,但我不认为这一研究思路有特别令人信服之处^①。相比之下,我更倾向于从持续发展的商品化、人口压力,特别是19世纪中期的起义等方面去探求(流动人口不断增加的)原因。

可以自由使用的廉价劳动力的出现,使得劳动组织向各个方向扩展。其一,通过“包头”或“夫行”的雇佣关系,形成了相当大的劳工帮派。正如我们将在第6章中更详细讨论的那样,这些日益增加的帮派在诸如运输、建筑、工业等各行各业找到工作,有时甚至替代了家庭工匠^②。其二,某些家庭企业已经扩大到超出了家庭规模。很难确定从何处是这些高度发展的家庭企业的结束和更明确的“现代”企业的开始。例如:在19世纪的最后25年,我们听到有雇用150名伙计的批发仓库,36名职员的银行,雇有100至200名工人的零售店。这些工人中的许多人仍然寄住在经营场所,并且服从(明显地减弱)于家庭模式的家长制的控制^③。在工业方面,西方人兴办的试验性机器工厂的出现始于19世纪60年代,而大规模的出现则是在1895年以后,这当然也意味着劳动关系的革命。尽管直到19世纪末,在汉口,家庭规模的手工作坊所生产的产品仍然持续保持着优势,但是对于这种生产方式的冲击日益加剧,其中最大的冲击应当是来自大规模的冶铁厂和染布厂。^④

那些新型的大规模企业雇佣了众多的薪水工人。到1912年,这类工人的数量仅在制造业部门就达到了10 000人。与那些有技术的作坊主和有经验的雇工(经常被归入“手工业者”,称为“匠”)明显不同的是,这些受雇佣的工人从事半技术性或非技术性的工作^⑤。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家庭经济中所雇佣的“短工”和“随雇工人”也不断增加——这些工人主要来自城市失业者或长期待业者——家庭经济也进一步走向解体。

这种劳动组织形式的改变所带来的经济与社会后果是各式各样的。毋庸置疑,

① 冯天瑜、周积明和王永年:《辛亥革命前的武汉民族资产阶级》,《江汉论坛》1981年第3期,第73~75页。

② 例如《申报》光绪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③ 海关总税务司:《盐的生产与税收》,“海关系列专刊”第81号(上海,1906年),第80页;海关总税务司:《关于通商口岸的海关结算体系与地方货币的报告》,“海关系列专刊”第13号(上海,1878年),第71页;《申报》光绪二年一月十六日;《遗文录》1884年8月23日;景苏、罗仑:《中华帝国晚期的地主和劳动者:以山东为例》(马萨诸塞,坎布里奇,1978;译者注:中文本书名为《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35~136页。

④ 包世臣:《安吴四书》卷34,第10页;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2卷,第277页。有关汉口西方工厂的情况,可参见苏云峰:《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1860~1916·湖北省》。

⑤ 《申报》光绪五年十二月四日。

在汉口如同在许多欧洲城市一样，“无产阶级化”的原始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便利了1895年之后这个城市迅速、顺利地向工厂工业的转变。1874年，英国领事查洛纳·阿拉巴斯特（Chaloner Alabaster）满怀希望地写道：“关于汉口的未来，我仍然认为有更多的迹象表明它将成为一个大的制造中心（较之于成为对外贸易中心而言，更有可能）。……这里有大量廉价的熟练劳动力……以及办企业所需要的一切条件，而这些却是在外国居民中找不到的；至于资本，我有充分的信心，它也即将到来。”^① 1879年，他再次写道：“五年前，当我受命负责这个城市时，我曾经提出汉口将要成为一个大型制造中心的观点。……现在，我也看不出有什么原因可以推翻那时我所表达的观点。……很容易找到熟练的劳动力，原有的地方工业已经为工厂训练好了工人。”^②

但是，发展工业的美梦却给社会管理者带来了噩梦。这些新的、流动的和相对而言没有根基的劳动大军使得社会控制和福利保障等问题层出不穷。问题不仅出在新生的无产阶级工人方面，也出在旧式的家庭经济方面——家庭劳动者发现：劳动结构的改变，给他们的职业带来了威胁。而在邻近地区和城市社会服务方面的革新浪潮的影响下，又产生了一些新的社会现实问题。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第二章中讨论。

五、城 市 化

与劳动组织的变化以及社会秩序混乱、公共福利等问题紧密相关的是城市正在经历着快速的城市化^③。19世纪的汉口人口经历了两个快速、稳定增长的阶段，中间隔有太平天国时期人口的严重损失。我主要根据描述性史料而不是人口统计资料估计，汉口人口在1800年大约为100万左右，到19世纪中期约为150万，19世纪50年代晚期降至约60万，然后在1890年左右又回升至100万^④。在两个增长阶段中，事实上新来者的人口数量远远超过自然增长的人口数量，这不仅是由于新移民不断地增加（例如，回乡途中的寄居者），还因为部分城市原居民的人口有较高的自然下降。

① 查洛纳·阿拉巴斯特（Chaloner Alabaster）：《1874年贸易报告》，英国外交部档案，17/7/32。

② 英国外交部档案：《1878年商业报告》，第68页。

③ 我在这里使用“城市化”一词，专门用以描绘那些至少是抱着定居打算的人口，从城市经济腹地向城市的集中过程。它与以下两种类型的向城市的转移不同：旅居和难民，尽管他们在汉口城市人口的发展中也发挥了作用。请参见拙作：《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第214～223页。

④ 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第40～41页。

在现代早期的欧洲,如果没有大批的移民,城市自身人口的繁殖速度甚至不足以使人口总数维持在不下降的水平上。这一观点虽然在近年来受到很多攻击,但是仍为人们所普遍接受^①。基于较高的死亡率和较低的结婚率,汉口几乎是一直保持着相当高的自然负增长率。由于没有成系列的人口统计数据,我们没有可信的数据资料来说明这一点,但大量的间接材料表明,当时汉口的死亡率是很高的。西方传教士医生反复提到严重缺乏公共卫生设施,各种致命疾病在城市里流行,以及伴随每年春天洪水而来的伤寒和霍乱的流行,等等。仅仅在 1888 年夏天,就有数千人死于霍乱^②。不平衡的性别比例和社会下层阶级单身人口的大量存在,说明当时的结婚率较低^③。因而,无论是 1850 年以前或之后,这个城市的人口之所以能够稳步增长,只可能是外地人口迅速迁入的结果。19 世纪下半叶,当我们拥有大量的新闻资料可供分析时,我们可以发现众多证据都说明了移民在汉口社会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伴随着城市化进程而引发的社会混乱。1883 年,一位《北华捷报》的通信员虽然并不过分,但有些夸大其辞地写道:“如今,汉口的居民几乎全部是周围地区的人,原有居民已经在太平天国第二次到达时被杀光了。”^④

19 世纪晚期汉口两个最为重要的人口统计数据的变化可能与这一进程有着直接关系。第一是来自汉口之亚区与大区腹地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不断增加。整个 19 世纪,在汉口社会与经济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一直是本地区之外的商人。但是,广为人知的商业精英的转换——新来的宁波与广东商人取代了原来的山西和徽州商人——不应当遮蔽另一个更为普遍的认识:实际上,长江中游地区各社会阶层的人口数量都在不断增加。这一点是无庸置疑的,因为湖北农产品(茶、棉花、稻谷、豆类)一直持续地向本地区之外输出,而且这种输出在 19 世纪后期得以加速发展,并持续到 20 世纪。——尽管汉口的首要功能是作为重要的运输中心,它参与地区经济的程度十分低,但汉口与其直接经济腹地的分离,越到后来越明显地减弱了。第二个相关的变化是城市贫民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也在增长。尽管来自汉口直接腹地的人包括一些社会经济地位相对提升的人^⑤,但他们的绝大部分仍然是工匠、劳动者、小贩、船夫和长期失业者。

如此众多的新居民并非均衡地来自汉口的腹地,其中的绝大部分都来自与汉口有着特殊历史联系的一些特别的地方体系。“接近”不是惟一的标准。例如:汉口

① E·A·里格利(Wrigley):《伦敦对于英国社会经济发展之重要性的简单图解,1650~1750》,《过去与现在》,第 37 卷(1976 年 7 月),第 50 页;简·德·沃利斯(Jan De Vries):《欧洲城市化,1500~1800》(马萨诸塞,坎布里奇,1984 年),第 9 章。

② 艾伦 1888 年 9 月 1 日的信,英国外交部档案,228/864;亦可参见《申报》光绪四年九月八日,光绪六年十一月十九日。

③ 劳伦斯·奥利芬特:《1857—1859 年额尔金勋爵出使中国、日本纪行》,第 566 页。

④ 《北华捷报》,1883 年 4 月 18 日。

⑤ 王葆心:《续汉口丛谈》卷 2,第 32 页。

本身就位于汉阳县境，但汉阳县却只提供了很小一部分新居民。方便的运输路线也不是问题的关键。汉水下游的几个县，特别是沔阳、天门，通过水道与汉口直接相连，这使得大量因洪水而产生的难民很容易进入汉口。但是难民和城市化类型的移民并非同一类型的群体，在汉口的城市化移民中，沔阳、天门人相对较少。相反，绝大多数城市化移民来自武昌府的江夏县和咸宁县、黄州府的黄冈县和麻城县，最多的则是汉阳府的黄陂和孝感。

正是汉口北部、东部、南部的地区构成了汉口的“城市化边缘”。在地形上，上述地区正好在低地平原的四周围了一圈高地。尽管事实上整个湖北都容易受到洪水的侵袭，但是这里的生态却并不比它上游或下游一点地区更为脆弱。事实上，这是湖北物产丰富的农业区域。在稻谷不足的湖北，这一地区生产稻谷却总是过剩，稻田面积占了所有农作物面积的一半以上。棉花和苧麻也是主要的农作物。黄陂和孝感产芝麻、草药和蜡；黄州出葛根和烟草，并养蚕；咸宁则是主要的产茶地。这一地区的手工业品有闻名全国的棉布、油漆、面点以及小型船舶制造。黄陂和孝感的人也因善于做经纪人而闻名。^①

为什么这一地区有如此之多的人来到汉口？原因之一是长期建立起来的市场模式是这些地方的产品必须要经过汉口。这一地区的农业在湖北是商业化程度最高的，市镇和小商业城市星罗棋布，其中的大多数都与汉口紧密相连，并且处在许多可航行的小水道网络的交汇点上^②。诚如地理学家孙敬之所指出的那样，商品以一种很像树枝状的模式方式从这一地区流出来，依靠汉口通过各种运输路线向所有方向输出，或从其他地区输入商品^③。几个世纪以来，这一地区以过剩的稻米在汉口换取食盐之类的其他地区的产品。在19世纪，随着本地输出产品的多样化，棉花、茶叶等也成为输出商品，它们也以汉口作为聚集地^④。城市资本费了一段时间才找

① 有关这些地区的农村经济，见章学诚《章氏遗书》卷24，第22～29页；海关总税务司：《十年贸易报告，1882～1891》，第183页；水野幸吉：《汉口》，第445、470～475、498～509页；孙敬之：《华中经济地理》，第164～173页；苏云峰：《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1860～1916·湖北省》，第24～31页；陈伯闻：《平汉铁路沿线农村经济调查》（上海，1936年），“附录”，第509～515页。

②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24，第23页；水野幸吉：《汉口》，第625～626页；陈伯闻：《平汉铁路沿线农村经济调查》，“附录”，第538～539页。事实上，汉口与黄陂之间的地理边界直接相连，以至于1898年湖广总督张之洞曾考虑将汉口从汉阳划出而归于黄陂，张之洞：《张南皮宫保政书》（光绪二十七年图书集成印书局铅印，又名《奏议初编》——译者注）卷12，第21页。

③ 孙敬之：《华中经济地理》，第172页。

④ 《总理衙门档案·湖北洋人交涉》：郭柏荫同治七年十二月十五日折，李翰章同治八年七月五日折；藤井宏：《新安商人研究》，《东洋学报》，第36卷第1期，第15页；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2卷，第242～244页。

到进入这一直接腹地投资的方式：相当小的一部分资金掌握在地主手中，也许稍多一点的在当铺主和其他的借贷机构手中，大部分资金预支给农民和用“预买”的形式收集经济作物的机构。同样，来自这些地区的小商人和作坊主则花了较长时间，在汉口建立了自己的立足点，并设法交易他们的地方特产，并从事特殊手工业品的交易，例如铜器和皮革制品。汉口咸宁公所建于18世纪，到19世纪中期，至少有四个互不相关的商业行会使用“黄陂”作为标志。黄陂街，汉口最繁华的街道之一，据说早在清朝前期就挤满了来自这个邻县的零售商和手工业者。^①

然而，19世纪下半叶来自这些地区的城市化与此（指上述因为这些地区的产品都要经过汉口转销，从而导致的这些地区人口向汉口的集中）有着不同的性质。在19世纪后期的城市化过程中，农村人口压力的“推动”和城市经济吸引的“拉动”，起到了同样的作用。到这一阶段，至少这一亚区每一单位耕地的人口密度在湖北省各地区中是最高的^②。在自己家乡长期从事经纪的黄陂人和孝感人，发现本地的需求不足，因而逐渐向汉口转移并成为码头工人和脚夫。那些原在家乡从事制茶的咸宁人也带着他们的手艺来到城市，成为汉口近代工厂劳动者的先驱^③。（随着1895年后汉口的工业革命，特别是20世纪初京汉铁路的建设，来自这些地区的城市化人口又出现了第二次大幅度的增加，这并不是偶然的。）^④当一些移民试图使自己成为诸如客栈主、店主之类的小商人的同时，绝大多数人则在竞争店小二、街头小贩、流动理发师以及其他社会地位较低的职业。

很多太平天国后来到城里的农村移民与较早到来的同村的城市化移民有联系，或者在到城里后立即与同胞联系。这些地方血缘纽带使得新来者进入学徒和合同劳动者体系，或者在找工作时为他们提供担保。如同在现代早期的欧洲或者是20世纪世界其他地方一样，新的城市居民仍与家乡保持一定的联系。即使很少有人还会利用重新回到农村生活的机会（那些不断遇到挫折的人被迫从城市的雇佣中退出），但他们大多仍在农村保留一处当遭遇危险时可以回乡避难的地方。在太平天国之后汉口那些纷扰不断的岁月里，乱兵叛乱与会党起义此起彼伏，“最后进入的，通常就是最早出来的”^⑤。

① 《总理衙门档案·湖北洋人交涉》：李翰章同治六年八月八日折；1920年《夏口县志》卷5，第22～34页；《长江日报》，1964年7月21日。

② 孙敬之：《华中经济地理》，第172页。

③ 《总理衙门档案·湖北洋人交涉》：翁同和光绪三年五月二十日折。

④ 《长江日报》1979年10月9日。

⑤ 这是保罗·霍恩伯格（Paul Hohenberg）和林恩·霍伦·利兹（Lynn Hollen Lees）在描述现代早期之欧洲时所用的句子，见二人合著之《欧洲城市的形成，1000～1950》（马萨诸塞，坎布里奇，1985年），第129页。关于18世纪巴黎人与其故乡村庄的联系，见理查德·科伯（Richard Cobb）：《警察和人民：法国大众的抗议，1789～1820》（牛津，1970年），第226～229页。

另一方面,19世纪的城市居民对于城市混乱状况的叙述,比他们实际遭遇到的要多一些。特别是黄陂和孝感两县的人,在很长时间内曾因其家乡处于暴力位置而被人指指戳戳。在白莲教和太平天国起义过程中,汉口腹地的这些地方拥有大量威胁汉口的队伍。在20世纪40年代,黄陂是中国著名的八个“赤化温床”县之一(这里不仅仅出了一个林彪)。^①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来自这些地区的移民通常都带有令人恐惧的太平盛世说的理想主义。更为普遍的是,他们深深地裹进了日益频繁的、一直困扰着汉口的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暴力活动之中。^②

原已定居的城市居民是怎样看待这些新来者呢?当然,他们很容易因说话方式而被区分出来。在华中,每一个地方体系都拥有自己明显特点的方言,其中的大多数在清代仅仅能够相互理解,也有一些方言,例如咸宁山区的方言,对于外地人来说完全无法听懂^③。在一些情况下,这种方言上的差异可以用来区别某些移民,特别是那些在社会下层的人。正如一位西方传教士所记载的那样,混合而成的官话能够被大多数的城市居民听懂,但在有些情况下不能被最下层的劳动者所理解^④。也是根据同样的语言标准,人们可以将城市化类型的移民与从沔阳、天门或者更远地方来的“渔民”区别开来,这确实带来了一定的便利。我在第6章将谈到:后者就是那些被汉口居民认为是最危险、而且完全没有本地保护人的群体。

汉口没有正式的权力或法律方式来区分公民与非公民,就像中世纪和现代早期的欧洲城市一样。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城市居民与外来者在观念上没有区别。例如,“脚夫”通常是指那些半长久性的本地劳动者,而那些仅仅是在这里寻找暂时性工作的外地人则被称为“外脚”。流氓罪犯也被安全保卫人员分为“地痞”和“外来匪徒”两种^⑤。并且也与欧美的城市一样,城市精英在公共福利方面,对待城市长期居民和外来难民也明显存在着不同的态度。

“汉口人”与外来者的部分区别是种族性的。有时是简单地根据住宅的使用期来确定是“汉口人”还是“外地人”。与住宅控制紧密相关的保甲制的目的之一,就是将城市里那些较为稳定的长久寄居者与值得怀疑的新来者区别开来^⑥。更多的时候是以一个人是否有稳定的“行业”和一个人选择保人的能力来确定(他是否为

① 罗伊·霍夫海因茨:(Roy Hofheinz)《中国共产党胜利的生态学考察:农村影响模式,1923~1945》,收于A·多克·巴纳特(Doak Barnett)主编:《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执行》(西雅图,1969年),第73页。

② 《总理衙门档案·湖北洋人交涉》:光绪三年三月二十六日翁同和折;《申报》光绪五年八月十三日、光绪八年十二月五日。

③ 布利威尔(Brewell)1878年4月21日的信,卫斯理会档案,第491函。

④ 科克斯(Cox)1863年3月18日的信,卫斯理会档案,第487函。

⑤ 《遗文录》1891年10月17日。

⑥ 参见《汉阳县志》卷12,第17页;《申报》光绪八年十月十四日。

“汉口人”）。然而，近来的研究表明，这种区分更主要的是根据其“行为”。相应地，我们必须将对“外来人”问题的讨论，放在本书第三部分有关本地认为的“社会叛逆者”的考察之后。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19世纪后期汉口的人口增长确实在公共福利与公共安全方面引发了严重问题和全新的应对之道，但并没有足够证据表明，这里存在着在许多欧洲现代早期城市中普遍存在的那种对待新来者的敌对情绪。^①

六、阶 级

通过对汉口市民之总体文化态度、职业分布、劳动组织以及新来移民问题的考察，我们终于找到了探讨广泛涉及到包含地方行为在内的社会阶级这一难题的着眼点，或者说为我们分析社会冲突之发生提供了一条线索^②。西方历史学著作大都承认：在现代早期，城市阶级远不及中世纪或工业化之后的城市阶级坚固。货币经济的高度渗入和近代早期所特有的新企业形式，给城市社会特权阶层带来了新的复杂性和不稳定性，从而首先给被认为是决定社会等级的因素——纯粹的经济对抗——带来了沉重的压力。例如：乔治·路德（George Rude）即沿用丹尼尔·德福（Daniel Defoe）的说法，认为现代早期的伦敦有六个等级的“阶级”层次，并简单地将此种等级差别归因于他们的经济生活水平^③。另一些学者则强调城市阶级结构的复杂是因为“中间阶级”的产生。保罗·霍恩伯格和林恩·霍伦·利兹总结近年来学术研

① 保罗·霍恩伯格、林恩·霍伦·利兹：《欧洲城市的形成，1000～1950》，第128页；理查德·科伯：《警察和人民：法国大众的抗议，1789～1820》，第270页；路易斯·西维尔（Louis Chevalier）：《19世纪上半叶巴黎的劳动阶级与危险阶级》（新泽西，普林斯顿，1973年），第394页。

② 和当今许多历史学者一样，我赞同E·P·汤普森（Thompson）著作中所提出的如下观点：“阶级”与其说是一种客观的实体，不如说它必然是流动的、处于不断变化状态中的。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是“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确实发生的某种东西”，是大众文化与经济影响的产物。运用此种分析结构，历史学者曾满怀希望地试图寻找部分同时代人的对“阶级”的认识——他们有意地将另一个人认定为某一阶级的成员。但这种努力并非总是成功的，其失误之处就在于他们假定某个一定的社会集团必然会具有某种带有“规律性”的社会行为模式。参阅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伦敦，1963年，第9～10页；译者注：中译本为钱乘旦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18世纪的英国社会：没有阶级的阶级斗争》，《社会史》1978年第3期，第147～150页。亦可参见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从社会史到社会的历史》，《代达罗斯（迷宫）》1971年冬季号，第36～37页。

③ 乔治·路德（George Rude）：《18世纪的巴黎和伦敦：民众反抗研究》，第41～51页。关于新的中产阶级的影响，参见菲利普·M·豪瑟（Philip M. Hauser）：《城市化概论》，见菲利普·M·豪瑟和L·F·斯高诺（Leo F. Schnore）主编：《城市化研究》（纽约，1965年），第49～50页。

究的成果,发现现代早期城市的特征可以概括为:富人与穷人之间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真正的中间群体”介入,纵向关系(诸如基于商业贸易和地方血缘的关系)以及阻滞对立阶级发展的地域性城市社区观念,都在持续地发挥作用。^①

大多数研究中华帝国晚期城市的学者都赞同与此类似的观点,即认为阶级结构在日益复杂化,而作为社会等级的决定性因素,财富的重要性也在不断提高。很多人也同意:在这一阶段里,“城市阶层”这一富有生机的自我意识的出现,覆盖了城市社会中各个分散的“阶级”观念。然而,除此之外,人们很难再找到共同点。一位日本著名的历史学家(承继恩格斯关于北欧城市的分析)注意到晚明时期中国城市中贵族、市民、平民三者之间的分裂日益加剧^②。中国历史学者追随毛泽东的思路,试图阐述清代“民族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和城市无产阶级的产生过程^③。尽管这些分析都没有足够的说服力,有些例证明显地不过是这一时期里在城市中偶然发生的阶级关系。我们已经看到:随着新的特殊城市精英的出现,一种全新的、特殊的城市工人阶级也同时出现了。生产关系被缓慢地重新限定。而且,中国学者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也已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证明:在一些城市里,新的社会冲突随处可见。凡此,阶级本身正在组合。^④

如同在中国任何地方都能见到的一样,19世纪的汉口在收入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当然也远比农村任何地方贫富差距要大。这种差距的一端(极富的一端)是从事地区间贸易的盐商和经纪人,他们的财富总共成百上千万银两;另一端是体力劳动者,这些人工作一年也挣不到一两银子^⑤。城市中下层阶级真正的“凋敝”始于19世纪20年代,在太平天国后日益加剧,经常可在街头看到因无处居住和饥饿而死的人。19世纪的地方史料经常这样描述所面对的事实:“贫富之间的差距日益

① 保罗·霍恩伯格、林恩·霍伦·利兹:《欧洲城市的形成,1000~1950》,第131~132、149页;汤普森:《18世纪的英国社会:没有阶级的阶级斗争》,第145页,及《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第2章。

② 田中正俊:《明末大众起义、抗租、奴变》,见林达·格利夫(Linda Grove)·克利斯蒂安·丹尼斯(Christian Daniels)主编:《中国政府与社会》(东京,1985年),第190页。田中在方法论上沿用了恩格斯在《德意志农民战争》一文中的思路。

③ 例如,郭毅生:《论新兴市民等级在太平天国革命中的作用》,《历史研究》1956年第3期,第4~5页。

④ 刘炎:《明末城市经济发展下的初期市民运动》,《历史研究》1955年第6期,第29~59页;李华:《试论清代城市的市民斗争》,《文史哲》,1957年第10期。

⑤ 关于典型的工资情况,参见《汉口紫阳书院志略》卷6,第48页;《汉口山陕西会馆志》卷2,第20页;范锴:《汉口丛谈》卷1,第6页;戴维·希尔(David Hill):《中国湖北:它的要求与呼声》(纽约,1881年),第6页。关于富人的财富情况,参见范植清:《鸦片战争前汉口镇商业资本的发展》,《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第52~53页。

加深。”^①

当时居住在汉口的西方人毫不困难地将汉口的人口划分为“较好的阶级”和脏的、有气味的、疾病缠身的下层阶级，但是中国居民是否也这样划分？这里有几个表面上的标准用于这种划分。与欧洲一样，一个人的职业总是被认为与其社会阶级内涵有关。例如：运粪工和运水工因其职业的功能而被认为是社会的“污点”。商人等级的划分，不仅根据其经济方式，还根据他们在商品生产和分配体系中的相对重要性。从明末开始，人们已经普遍地使用这一原则划分上、中、下商人阶层^②。在汉口，由于徽州人几乎全是富有的大商人，而湖北本地人则以工匠和劳动者居多，所以徽州人看起来居于较高的社会等级。然而，我们已经指出，有时一个人说官话的熟练程度也被当作其阶级状况的一个明显标准。^③

研究现代早期伦敦和巴黎的学者经常指出：一个人处于怎样的阶级状况，可以明显地，甚至是不经意地，从一个人的外表显露出来。用 E·P·汤普森的话说，这种“富人的戏院”，不仅是为了表明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更重要的是强化精英作为一个社会优越群体的意识——我们看好的东西，因此我们是好的人，值得尊敬。理查德·桑纳特（Richard Sennett）更乐观地解释说：这些不成文的准则受到全体城市居民的欢迎，人们希望在现代早期城市松弛的社会规范体系中，找到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以规范街头那些混杂的陌生人”，理清每一次遇到熟人时应当表示怎样程度的尊敬^④。类似的动因也塑造了汉口的公共行为和个人表现。当然，清政府通过强化其服装标准来区分绅士和平民，而且购买绅名的汉口商人数量的不断增加，也反映出他们渴望展示自己的财富，以及新获得的法定的社会地位。他们也很快学会了所有的绅士作派。19 世纪 80 年代，一位传教士描述道：“这些文人被如此奇怪的规则所约束，比如，走路时他们必须眼睛朝下慢走，‘一个轻轻的文人步’，而不能像平常人一样左顾右盼地看他们身边发生的事情。”^⑤ 汉口富有商人们学究式的装模作样也不都像这样，全是流于表面文章的，我们下面将要谈及，汉口的商业精英能够而且也确实展示了其真正的文化成就，正如范锴 1822 年所说：“居斯地者，半多商贾致富，书奇风雅勿尚。”^⑥

① 《闲谈汉口》，引自《汉口小志·风俗志》，第 4 页；亦见 1920 年《夏口县志》卷 15，第 18 页。

② 藤井宏：《新安商人研究》，《东洋学报》第 36 卷第 3 期，第 75 页。

③ 巴巴拉·沃德（Barbara Ward）：《地方戏及其听众：来自香港的证据》，收入戴维·约翰逊（David Johnson）、安德鲁·J·纳森（Andrew J. Nathan）与伊夫林·S·兰斯基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大众文化》（加利福尼亚，伯克利，1985 年），第 178～179 页。

④ E·P·汤普森：《贵族社会，粗俗文化》，第 395 页；理查德·桑纳特（Richard Sennett）：《大众的堕落》（纽约，1977 年），第 65～66 页。

⑤ H·格林（Green）：《格林自传》（英国，1891 年），第 114 页。

⑥ 范锴：《汉口丛谈》卷 2，第 1 页。

但是,毫无疑问,汉口精英地位最引人注目、令人欣羡的标志,并不是帝国颁发的品级或审美情感,而是直接由财富和权力反映出来的。它的标志则是轿子。轿子深受经纪人、大批发商及其妻子们的青睐。他们坐在轿子上穿过汉口人头攒动的商业街时,常常引起社会各等级居民的骚动;狂暴的轿夫傲慢地高声吆喝着,让人们让路^①。在贸易的鼎盛季节,汉口总共有 3000 顶轿子可供雇用^②。如果我们假设每顶轿子有三四个潜在的顾客,那么,这一数字可以为我们了解汉口上层精英在顶峰时所达到的规模,提供一个最好的线索。

如果说经常坐轿或自己步行,是区分社会地位之高低的一个决定性的上界的话,那么,与此相对应的另一条重要而且清楚可见的下界则可能是婚姻状况。在儒家社会,城市和农村一样,对于有能力负担的所有人来说,婚姻和生育的义务带有某种广泛的强制性。顺便指出,婚姻与生育的内在动因又被社会压力所强化。确实,正统的意识形态曾将一些品德高洁的单身汉奉为楷模,当地县志一再重印一个名叫李乐的人的生平言行——他是 19 世纪早期汉口的一个小水果贩,因为要依靠自己的劳动养活他的老母亲,而无法成亲^③。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居住在外面的“孤魂”即便是温良的人,也受到广泛的猜疑,被认为“不应得到大众的一丝同情”。^④结果,即使是处于下层的汉口长住居民——工匠、小贩、船夫、搬运工甚至失业者——都惊人普遍地不怕任何必要的牺牲,而想尽一切办法结婚,只是不愿娶带有孩子的妇女^⑤。这必然使大量的不能结婚的人被排挤到地方社会的更边缘处。

尽管具体经济层面上的特定术语十分丰富,“阶级”这一用语本身却并没有得到很大的发展。在其最上层是“贵商”、“绅商”、“宏商”;接着是稍小的“富户”和“中人”;社会底层是“小户”、“小家”、“小民”,这些术语都包含有承认他们为社会中坚分子的意思。往下较低一级为“贫民”,在此之下的是“穷苦”。这些用语毫无一点同情,而对于更下层民众的称呼则使用更具贬义的用语,诸如无人不知的“粗工”、“愚民”等。而真正具有诋毁、嘲弄含义的用语“无赖”,则将在第 6 章中

① 布赖森(Bryson):《约翰·肯尼思·麦肯齐(John Kenneth Mackenzie)与英国国教在中国的传播》,第 44 页;W·阿瑟·考纳比:《华中漫游》,第 39 页;《汉口小志·商业志》,第 13 页。

② 日清贸易研究所:《清国商事指南》第 1 卷,第 121 页。

③ 1818 年《汉阳县志》卷 25,第 14 页。

④ 叶调元:《汉口竹枝词》卷 5,第 19 页。

⑤ 叶调元:《汉口竹枝词》卷 2,第 5 页;《申报》光绪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光绪八年六月十八日;《遗文录》,1889 年 1 月 10 日;《汉口小志·风俗志》,第 2 页;最近有关现代早期欧洲的研究试图将“核心”城市的人口区分为各经济层次的高婚姻率的人口和大量的未婚人口两大类。相类似的划分可能适合于 19 世纪的汉口。见戴维·林格罗斯(David Ringrose):《马德里与西班牙的经济》(加利福尼亚,伯克利,1983 年),第 3 章;简·德·弗里斯:《欧洲城市化,1500~1800》,第 184~185 页。

详细探讨。

总之，即使与现代早期的欧洲城市（那里的政治封建主义遗留更为强大，时间也相距更近）相比，19世纪汉口的阶级身份也绝对不稳定。特别是在太平天国之后，社会流动合乎情理地广泛传播开来，并且扩散得十分迅速。一夜之间成为富翁或穷光蛋的故事构成了汉口民间故事的主要内容^①。我们注意到，居住在一起的邻居们是混杂的，城市社会组织最普遍的形式——同乡会——被审慎地包括在阶级之内^②。阶级隔离的水平之低，足以让同时代的、已经经历了很长时间工业化后果的英国人深感惊讶。伦敦教会医院的医生在19世纪60年代来汉口时，曾特别拨出几天的时间为地方名人看病，这些地方名人通过稍多一点费用而不必与普通人一样排队等候。但这一政策很快就停止了，因为自从把这一办法解释给汉口重实用的精英们听了之后，他们立即买便宜的普通票与普通的人混杂在一起了。^③

只是到了19世纪末，一种更自觉地依靠阶级来划分利益身份的明确趋势才开始出现，这表现在许多新型集体组织中。汉口的手工业行会不像那些欧洲的行会（而且，根据今堀诚二的研究，也不同于17世纪前期长江下游地区的行会），传统上就不是根据生产关系划分的，而是“由主人和工人组成的、面对社会的单位”^④。同一贸易领域的商店的投资者（“东”）、所有者（“店户”）、主要工匠（“师”）、“友”、徒弟和长工通常是同一行会的成员。留存下来的证据表明，在太平天国之前没有单一的工匠行会在汉口建立，因为方言将一个成员限定在自己所处的生产领域之内。

然而，到19世纪后期，出现了许多对参加成员有严格限制标准的新行会。例如：分别建于1858年、1862年、1885年和1890年的四个行会限于店主加入；三个分别建于1860年、1870年、1884年的行会只允许东、店主、师、友参加；两个建于1867年、1890年的行会规定参加者限于师和友；一个建于1871年的行会限于师、友、工。最有趣的例子是居仁里的砖匠行会。在太平天国之前，这一行业几乎没有什么稍为正式一点的控制机制，它的第一个正式的行会组织建立于1867年，是一个只包括店主与师、友的排外性的行会。大约20年后，1885年，砖业内的熟

① 《叶氏宗谱》卷15，第7页；《湖北通志志余》，第6册；海关总税务司：《盐的生产和税收》，“海关系列专刊第81号”（上海，1906年），第81页。

② 例如：汉口广东公所就包括茶叶经纪人、店主、劳动者和船夫，见《申报》光绪四年八月二十一日。

③ 伦敦布道会档案：《汉口圣公会医院五年报告》，报告一（1863年），第2页。

④ D·J·麦克杰文（D. J. MacGowan）：《中国行会》，《皇家亚州协会华北分会学报》第21卷第3期（1886年），第170页；今堀诚二：《“友”行会》，见今堀诚二编：《东亚社会经济史论文》（东京，1964年）。关于欧洲的友行会，见塞维尔：《法国工厂和革命：从旧制度到1848年的劳动语言》，第三章。

练工匠们感到有必要建立他们自己的组织。在这里，我们第一次清楚地看到了中国学者所指出的，在帝国晚期，行会制度本身在根本上就包含着阶级矛盾的历史证据。^①

关于这一问题，有几点需要强调，而且它也具有更为普遍的意义。首先，汉口雇主和工匠分裂为各自独立的组织，是在这个城市重要的工业化发生之前即已开始的，因此，似乎并非是对任何生产技术重大变革的回应。尽管我们不知道详情如何，但是看起来刺激特定阶层行会建立的原因，很可能是由于新的、资本主义方式的劳动组织对于传统家庭经济的挑战日益增长，而此种挑战又因为受到不断增长的、廉价的、非熟练的劳动力的出现，而不断加剧。我们似乎不能将这种阶层（或阶级）行会的出现，归因于刚刚发现的、对阶级纽带之作用的警觉。其次，无论如何，没有证据表明：汉口那些具有阶层限制的行会之形成，伴随着重要的冲突或者劳动纠纷。实际上，砖匠和砖厂主行会都是信奉一个共同的神（土房公），这一事实表明：新形式行会建立的首要目的，是保证稳定地做生意。再次，最为重要的是，进入20世纪初，具有严格的阶级限制的行会实际上只代表着一种很小的趋势，其总数也不到汉口注册行会总数的10%。绝大多数行会仍然是沿着贸易或同乡的纵向关系建立的。我认为，这表现了正向工业化世纪迈进的这个城市中“阶级”之更为普遍的作用：它慢慢地开始在界定一个人之社会身份、确定社会冲突之范围界线等方面，具有一些意义，但毫无疑问，相对于建立社会组织的其他类型的原则与标准而言，“阶级”仍然处于次要的地位。

七、精英和社区理想

整个清代，汉口的城市名人是由传统的“社会精英”（士绅）和富商共同组成的。近年来的学术研究提出，19世纪末期是一个新的原初资产阶级——“绅商”阶层——出现的时代，这个阶层的出现，部分原因是由于传统的精英从商，以及富商对绅士和荣誉头衔需求的增加。^② 在我的前一部有关汉口的著作中，我曾试图阐明这一十分活跃的过程。帝国晚期最后几年的变革并没有模糊我对汉口上层商业精英总是与绅士阶层的许多人及文人文化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的认识，当然，在许多

① 对于10个行会成员的限制见1920年《夏口县志》卷5，第22~29页。例如，关于行会之矛盾本质的讨论，参见彭泽益：《19世纪后期中国手工业商业行会的重建和作用》，《历史研究》，1965年第1期，第76页。

② 见马里亚尼·巴斯蒂-布律吉埃（Marianne Bastid-Bruguier）：《社会变化的潮流》，收于费正清（John K. Fairbank）和刘广京（Kwang-ching Liu）主编：《剑桥中国史》（英国，剑桥，1980年）卷2，第536~602页。（中译本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下卷，第599~66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其他重要的中心城市也是如此。这种联系实际上比太平天国后的数十年中绅士和商人作用的最终正式结合要深入得多。

如果说只有很少的汉口的“精英分子”是单纯的离土地主，那么，对于很多与贸易无直接联系的学者或官僚绅士家庭来说，汉口正是他们的家园。最早出名的是熊家，最有名的人物是熊伯龙，在1649年进士考试中得第二名，并成为一個高层市政官员和全国闻名的文学家。熊伯龙的两个弟弟熊仲龙和熊叔龙亦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并在各种下层行政机构中供职。到19世纪，这个家族的名声逐渐消退，但是仍在汉口居住，并且在地方公共事务管理上偶尔发挥作用。^①

毫无疑问，晚清时期汉口最为有名的地方文人家庭是胡家。尽管他们的老家是位于汉阳城南60里的黄陵矶。至少从18世纪早期开始，胡兆春在中了举人并在湖南一个县作了一任教谕之后，隐退到汉口，这个家庭的支脉就一直在这个巨大的港口城市定居下来。一代代的胡家子孙通过省试，并且在汉阳县学中作为拿薪俸的“生员”学习。胡桂生，1832年的贡生，为汉口富商家的子弟开办了一所私人学校，并作为正直绅士行为的模范而获得了广泛的尊敬。胡桂生的儿子胡兆春，更近于完美的典范。他是一个在1825年获贡生（比他父亲早7年），1835年中举的文学巨匠。胡兆春多次被委以县令，但是为了帮助其父亲，在汉口的学校任教师而拒绝了。作为抵抗太平天国运动的地方领导人，胡兆春引起胡林翼的注意（二人没有血缘关系），并且开始充当政府顾问和参与行政管理，直至1860年胡林翼去世。此后，他作为市政建设的元老，出版了大量的诗和散文，大约有近一千卷保存下来。与他所提倡的致用实学相一致，他在范围广泛的重建工程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他在汉口的后代包括数量繁多的有着更为显著成果的文人。胡家并不富有，但是胡家仍然通过担任全国闻名的叶家的家庭教师，通过胡兆春建立起来的与湘军的关系，而最终是通过胡家的女儿与军机大臣荣禄家的联姻，与官方保持着良好的联系。^②

与胡家的类型相对的例子是汪家，闻名汉口的汪玉霞食品厂的创立人。显然，汪家无人通过科举考试，但是他们的兴盛却维持了几个世纪。其创立者汪十郎是安徽徽州一个破落地主的儿子，1694年因在一个本地染房找到工作而迁居汉口。通过从同乡处借到的一小笔钱，他开了自己的染房，后来进入使其发家的茶叶和杂货贸易。到19世纪前期，他们出售的很多商品皆出自他们自己的作坊。在世纪末的最后十年，他们在长江流域拥有100多家商店。汪家的后代购买荣誉功名，并逐步把生意交给小字辈或转让给雇佣经理，且在汉口和其家乡徽州投资地产，以投资所

① 《汉阳会考题名碑录》（1803年）。

② 胡兆春：《胡氏遗书》，1915年；1867年《汉阳县志》卷16第55页，卷20第39～40页；1884年《汉阳县识》卷3，第20～22页。

得和租金过着闲适的生活。^①

纯文人的胡家和纯商人的汪家是汉口上层“精英”的两个极端的代表。虽然在各个方面的成功的扩展都不同寻常，但也许汉口惟一的最为著名的更接近于标准的世家应是叶家。通过清初的商业财富的原始积累，近三个世纪以来，叶氏家族联合拥有中国最成功的商业集团之一——叶开泰药房和无数的分支企业——叶氏子孙有不少人中举或进仕，包括不限于为臭名昭著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充当替罪羊的叶名琛^②。尽管有着不同的出身和社会文化观念，汉口大多数成功的商人都向往叶家具体化了的广博学识、承继观念和儒家社会领导能力。

汉口大量的富商——当然，主要是在太平天国之前——都要接受至少一些传统教育。相当一部分人通过科举获得合法的功名。例如，18世纪的孙汉高中进士，19世纪创立汉口商务总会的刘选青也是如此^③。孙汉和刘选青之外，县志的《人物志》和范锺的《汉口丛谈》中反复出现如下的叙述：“一个年轻的为科举而学习，但是后来从商，”或者“作为一个商人，仍作为一个传统研究倡导者。”这一类型的代表为黄承增，19世纪初的徽州盐商，伟貌修髯，交游甚广，工作诗词，文思斐然。黄承增和他的两个商人朋友在太平天国之前成为汉口著名的“三老”。^④

最近中国和日本的学者研究肯定：这种商人和文人作用的结合远非一种简单的情况，肯定学徒之前有一段时间用于传统文化的学习。这在大多数商业家庭中相当普遍。尽管也适用于来源于其他地方的群体，这种形式在组成汉口商业精英的徽州商人中高度制度化。徽州人拥有50所私人学校，大多数学校是因受益于两淮盐业贸易而建于清代前期。以此为基础，产生了全国著名的“徽州学派”，并为徽州商人群体不断地提供新生力量，从而使这一商人群体更为著名。“贾而好儒”的名言被提倡建立以新儒学诚、信为基础的商业道德的人赋予了主观的特性。^⑤

当在汉口时，这些商人没有放弃他们的文学追求，仍然致力于建立一种独特的城市精英文化，这种文化既是来自不同地方的人的桥梁，也是客居商人和土生土长的文人之间的桥梁。这并不是否认在这些商业入侵者与重要的湖北地方绅士之间存在着真正的冲突，如我们所见，这些冲突主要集中于其后代的教育机会问题上。有

① 武汉市商业工业联合会：《武汉市汪玉霞食品厂沿革》，1959年，稿本。

② 《叶氏宗谱》（1873年）；武汉市商业工业联合会：《武汉叶开泰药店简史》，1959年，稿本。

③ 范锺：《汉口丛谈》卷3，第13页；1920年《夏口县志》卷15，第27页。

④ 1867年《汉阳县志》卷22，第8页；1920年《夏口县志》卷15，第27页；范锺：《汉口丛谈》卷5，第12页。

⑤ 张海鹏、唐力行：《论徽商的‘贾而好儒’特色》，《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4期，第57～70页；重田德：《清代徽州商人的一个侧面》，《东洋史研究》第19卷第8期（1968年），第587～626页。

时我们能获得一些具有根深蒂固敌意的证据。例如,有关 18 世纪晚期居于武昌的孝感文人胡文爵的故事。当汉口山阴公所给他 300 两银子想请其题写书法以装饰新的公所大厅时,他傲慢地回答:“你们怎么会期望我这个御史的儿子为了区区银子而给你们写字?”^①但是总的说来,汉口商业集团上层的基本生活方式和观念,大致上可以被非商人的文人认同。相当具有无可置疑的绅士功名的汉口家庭,例如熊家、胡家、叶家,都积极参与建立与商业家族的联系。

在汉口,有许多富有商人精心地培植文人生活模式和鉴赏传统。范志渥是一个很有名的传统音乐家,叶东卿擅长古典骈文,吴辉根精通剑术和武术,吴伟堂收集古砚,范仁夫等不少人则因其丰富的藏书而极富声名^②。但是,无可置疑,精英文化中最突出的应是诗。

如果不以诗的质量而仅以数量计,那么,擅长作诗的汉口商人的名单有一长串。著名的有徽州的武邦治、常清云和向大德、向大夫兄弟,江西商人毛少唐,浙江人龙飞,湖北本地人胡修廷、叶松亭和彭栋堂。然而最特别的是一些并无共同审美观的本地人聚集后湖茶社、九萼庙的禅石园内、城中的四官殿以及盐商行会的各种分支机构交流他们的写景诗。在 18 世纪后期至 20 世纪初,大量正式或非正式的诗社在汉口出现又消失,使来自各地的儒雅的商人们在品茶饮酒之间交流他们的诗。其中最著名的是黄承增创立于 19 世纪 20 年代的新雨吟诗社和 19 世纪 60 年代吴国才创立的后湖茶社^③。各社成员的诗作不时的刊印出来,例如黄承增的《汉口漫诗》不幸失散了,遗留的有宦应清 1911 年编的《汉上消闲集》^④。后者包括了不下几百个来自全国各地寓居于汉口的商人的作品,每个商人于清代的后期在汉口度过了一些时光,并且隶属于不同的地方诗社。如果汉口的市场和大型茶馆是理查德·森尼特(Richard Sennett)所称的“公众谈论”的地点,对于时事新闻的无约束和无阶级限制的讨论,就像现代早期出现的排外的伦敦和巴黎的社团,城市的诗社是天生的和有头脑的城市精英的私人话题的论坛。^⑤

汉口商人从传统的精英文化中吸收来的不仅限于文学艺术的鉴赏力和对文学艺术的掌握。不能否认,许多有头脑的商人可以将儒家思想贯彻于专制政治的公共事

① 《湖北通志志余》,第 6 册(1885 年,稿本)。

② 范锺:《汉口丛谈》卷 4,第 19、24 页;王葆心:《续汉口丛谈》卷 2,第 11~12 页;1920 年《夏口县志》卷 15,第 27 页。

③ 范锺:《汉口丛谈》卷 2,第 16、32 页;卷 3,第 7~8 页;1867 年《汉阳县志》卷 1,第 20 页;王葆心:《续汉口丛谈》卷 2,第 11~14 页;卷 4,第 26~36 页。

④ 宦应清:《汉上消闲集》(1911 年)。另一类类似的以汉口郊区木材市场命名的、包括了绅商阶层的诗的集子是《鹦鹉洲小志》。

⑤ 参见理查德·森尼特(Richard Sennett):《公众人物之堕落》(纽约,1977 年),第 83~84 页。

务中。不管离家乡有多远,商业活动区域有多么地广泛,大多数人得出如下结论:社区——也就是城市附近地区和直接居住地的自治街区,应当是公益事业的最值得关注的地方。当然,公益活动是富商们使其地位在社会中合法化的一个途径。与现代早期欧洲的同行一样,以这种不规则的方式获得的社会优越地位有很多的不安^①。但是一些成功的商人在他们中年以后,逐渐从活跃的商业经营中激流勇退,转入全职性的社区服务领域。这种事例的频繁出现说明:这种职业生涯模式是习惯性的、可以预期的。他们期望加入一个全新的、明末才在中国城市出现的社会类型阶层——慈善人^②。这些人很清楚别人对于他们的期望,并且很安于处于天生的城市领导者的角色中。

当然,如果有汉口商人解释他们参与公共事务的根本原因的第一手资料,将十分有利于我们的研究;可惜这种资料基本上没有保存下来。除了商业信件和诗(几乎所有的诗都以自然的美丽为主题),我们只有十分零散的从地方志记载中一点点收集到的一些不完整的陈述,但实际上所有的陈述只是事后加以描述和记载的。事实上,反映商人态度最好的资料是他们行为的简单记录,这将是我在这一研究的剩余部分所关注的焦点。在保存下来的资料中,经常被引用来评价精英们行为的道德准则极为相似:善(美德、仁慈)、义(规矩、正确的行为)、公(公众);他们发起的活动则相应地有:慈善、善举或义举。

这些概念中最有趣的是“公”,一个最近引起许多学者注意的概念。在第4章,我将阐述这一术语在19世纪汉口的重要性。在汉口,“公”被用来指对公民的行为极其负责、公用物资的所有权,还用来指与公共、集体有关的所有扩展范围。下面,我将简单地阐述当时用于描述精英活动目标的“公益”和描述对于个人和集体主义的“因公”和“从公”之使用的普遍性。^③

在最近一篇著名文章中,沟口雄三追述了几千年来“公”字含义的演变过程^④。他的结论有两点与我们的研究有关。第一,沟口雄三指出:自晚明开始,受到李贽的反理性思想的影响,传统的“公”与“私”的二律背反关系,逐渐被不断

① 关于中国的情况,参见苏珊·曼·琼斯(Susan Mann Jones):《宁波地区的商人投资、商业化与社会变迁》(马萨诸塞,坎布里奇,1976年),第41~48页。关于欧洲的情况,参见W·K·乔丹(W.K. Jordan):《伦敦的慈善机构:城市社会的渴望和成就,1480~1660》(纽约,1974年),第47~56页。

② 梁其姿:《明末清初民间慈善活动的兴起——以江浙地区为例》,《食货月刊》,第15卷第7~8期(1986年),第304~331页。

③ 参见《清宫档案》:嘉庆七年五月十八日琦善奏;1920年《夏口县志》卷5第16页,卷15第27页。

④ 沟口雄三:《中国“公”、“私”概念的演变》,《史渊》,第669期(1980),第19~38页。

增强的“私利”观念所取代，而“私”与“私”的调和状态，就是“公”。显然，这种观念存在于汉口商人和商人群体的公共行为背后。这可以在徽州商人所标榜的“以义为利”——为了坚持在商业谋取利润的合理性，而对于官方意识形态的一种变通——中找到共鸣。运用这种分析理念，我们很容易会发现客居汉口的商人对投资于地方社区事业有着怎样的长期商业利益的考虑。第二，沟口雄三指出：“公”这个概念，越来越广泛地被解释为“共同的”、“相互的”，其含义逐渐与类似的“共”接近。尽管他发现这两个字的含义自自古以来就相当模糊，沟口雄三仍然强调晚明以来“公”、“共”合流的趋势不断加强。毫无疑问，在汉口，“公共”合用的逐渐普遍，以及太平天国后各地的商人行会会堂及其组织均被命名为“公所”，恰恰证实了这一观点。同时，众多的证据也表明，当地城市社区最为关注的也就是“公共”意识活动。例如，我们从用“地方义举”、“公情”等词汇来描述地方公益活动，以及用“乡党”这样的语汇来指称参加这些公益活动的人等等，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①。

汉口的商业精英，无论他们自己是不是学者，几乎没有谁脱离当时重要的文化潮流。我们将看到（如玛丽·巴克斯·兰金所指出的同时代长江下游地区的活动，也是如此）：在城市社会思想方面，回响着19世纪的“经世致用”思潮：非官方的社会组织机构建设不断加强，社区服务的区域范围主要以本地居民为主，对于官僚主义和办事人员的恶劣行径抱有明显的反感态度。随着文化分享网络在部分城市精英内部的发展——首先是通过《申报》及其他类似的、面向商人的报纸——这些文化潮流发挥了独特的城市改革作用，并促进了当时新的精英传统的形成。^②

八、结 语

19世纪的汉口社会与现代早期西方城市在许多方面拥有相似的显著特征，但是同时也在基本体系方面与欧洲的经历有着根本差异。这些领域异同在决定汉口社会历史的进程中起着很关键的作用。

不亚于中世纪后期的西方，一种独特的城市文化和心态成为中华帝国晚期最大城市的特征。尽管中国的城市文化可能比同时代的欧洲城市具有更多的乡村传统因素，城市居民仍然完全意识到了他们的独特性；儒家田园生活的理想模式使在西方

^① 1818年《汉阳县志》卷24，第43页；1920年《夏口县志》卷5，第16页。

^② 沃尔弗拉姆·埃伯哈德（Wolfram Eberhard）：《传统中国的社会流动》（雷登，1962年）；邓拓：《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斯波义信：《宁波及其腹地》，收入威廉·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今译本第469～526页）；田仲一成：《明清时期地方戏剧的社会和历史背景》，见戴维·约翰逊（David Johnson）等编：《通俗文化》，第149页。

十分明显的城市自我意识的优越性削弱。在中国，如在欧洲一样，传媒的深度和多样性能够帮助我们将城市从农村生活中区分开来；在这两种文明中，现代早期文化和书面媒体的繁荣，以及较古老的口头和感观形式，组成了十分庞杂的城市现象。

像近代早期西方的城市，随着旧的社会精英的退出和新的商业精英的加入，汉口形成了日益复杂和变动频繁的阶级结构。但是，清晰的阶级意识并没有以前所认识的那样强烈，并且我们将再一次证明这一点。尽管在汉口和在欧洲一样，阶级身份开始被用于界定一个人的身份，这说明它已迈向现代早期社会，但以地域——血缘与贸易的纵向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划分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劳动组织的变革所作出的回应，毋庸置疑，这种反映的速度在汉口比在西方城市要慢得多，而且也很不协调。和欧洲城市一样，汉口正经历着高度快速的城市化和新的城市贫民的增长，但是，与欧洲相比，汉口原有城市居民与新来者之间的关系更为融洽，前者对后者的态度也更为宽容。与现代早期的西方城市不同，中国城市由于特别强调他们独特的集体特征，从而在政治封建主义的内涵方面没有得到发展。

但是，如果他们比许多欧洲人更易于接受新来者，现代早期中国的城市可能更具有内聚性。汉口人所经历的多种多样的文化影响，与多种多样的人口构成、相邻区域以及贸易亚区之间的竞争与合作的方式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并造就了施坚雅所说的“城乡连续统一体”^①。此外，地方整合被部分城市精英的社会行为谨慎的方式所强化，这些城市精英与儒家文化所叙述的道德选择相一致，并且因时代的经世学风而更具体化。这一道德体系在父权社会领导作用的扩展，特别是将此种作用慢慢地与地域社区联系起来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城市社会乃成为乡村社会的翻版。

^① 威廉·施坚雅：《导言：中国社会的城乡》，见威廉·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269页。

在汉口的外国人权益

按：本文译自《东亚同文书院大学东亚调查报告书——昭和十四年度》，昭和十五年（1940年）版。

一、序 说

汉口位于长江的左岸，是沿着汉水入江口而形成的通商口岸，它与武昌、汉阳一起被称为武汉三镇。据说在事变（指八一三事变——译者）前汉口的人口有76万，武昌有41万，汉阳有12万多。

汉口的位置虽在湖北省的西部，但凭借着长江水运、平汉铁路以及昭和十一年（即1936年——译者）九月开通的粤汉铁路之便，不仅成为湖北省，而且成为湖南省以及其他内地地区的物资集散地。它是长江流域仅次于上海的贸易港口，同时工业也发达。它与长江对岸的政治、文化之都武昌，汉水对岸的工业之都汉阳形成一体。

由此看来，汉口在中国中部，无论在地理、经济、政治和文化哪个方面，都占有重要地位，它在南京陷落后作为中国的第二首都，成为抗日战线的中心地带，可谓必然之事。

汉口这个第二首都，北有险峻的大别山，南有江南的山岳及湖沼地带，加之长江这一大障碍，故而有固若金汤之概……

汉口陷落之后，蒋政权的抗日阵营很快显现出崩溃迹象，它现今实际上已经降为一个地方政权。而另一方面，汉口又成为建设新生中国的基本的出发点，在已经占领的区域，真正的建设工作正在展开。

所幸的是，外国人的权益因为存在于租界之外这一特殊原因，所以没有受到中国军的大肆破坏，除了确被日军空袭轰炸的军事设施之外，重要的商业地带大都得以保全，只有日本租界尽遭破坏……

想来外国人的权益可以大致分为两个方面，即政治权益和经济权益。前者包括租界、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等，后者包括外国的投资。按照莱玛之说，这些外国

投资基本上可分为事业投资和政府债务。外国资本来到中国的做法有以下几种：

甲，可由外国的企业家和外国的公司带来，而且在法律上归属国外，即所谓直接投资；

乙，由中国政府从外国借贷而产生，即间接投资；

丙，由中国公司从外国借来而产生，即间接投资。

这里的第三项，虽在过去并不具重要性，但在将来可能会有极大的重要性。

现在我所调查的外国人权益问题，正如标题所示，不是指外国人权益中的政府债务和外国政府投资，而主要是指外国人的个人权益。

关于外国人权益进入中国的做法，我依照的是莱玛所作的分类，甲、乙两项中的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都包含在内。

外国人权益必然还包括教会、学校等文化方面的内容，但我的调查则将之除外，只把直接营利方面的外国人权益作为问题提出来。

而且，这里所说的外国人权益，意味着直接营利性质的外国人对华投资，这一点也是不言自明的。

如同霍普逊所说，“最初的对外投资者是商人”（Hotson. C.K. The Expert of Capital, London），在中国的初期投资，也是从个人投资开始的。而且，在 1842 年五个口岸开埠通商后，外国人就在运输业中迅速占据了主导地位。

其后，1865 年为了支付对俄赔款而向英国人借款，这是其政府债务的开始。

近年来事业投资（含文化事业投资）与政府债务的比例，可见于下表：

年次	事业投资	所占总额 %	政府债务	所占总额
1902 年	503.2	63.9%	284.7	36.1%
1914 年	1 084.5	67.3%	525.8	22.8%
1931 年	2 531.9	78.1%	710.6	21.9%

单位：百万美元。根据《莱玛》。

如同上表所示，事业投资与政府债务的绝对总数都是逐年增加，而事业投资通常具有占压倒地位的重要性。

投资如此优越。在这方面，中国在上世界上恐怕也是显著的例子。

这些投资被使用到哪些方面呢？1914 年和 1931 年在华外国投资事业之目的及其类别，可列表如下：

目的及种类	1914 年		1931 年	
中国政府的一般目的	330.3 (百万美元)	20.5 %	427.7 (百万美元)	13.2 %
运输业	531.1	33.0	846.3	26.1
通信及公益事业	26.6	1.7	128.7	4.0
矿业	59.1	3.7	128.9	4.0
制造业	110.7	6.9	376.3	11.6
银行业及金融业	6.3	0.4	214.7	6.6
不动产	105.5	6.5	339.2	10.5
进出口业	142.6	8.8	483.7	14.9
杂 (未分类)	298.2	18.5	282.8	8.7
外国人自治团体的债务	——	——	14.2	0.4
合计	1 610.3	100.0	3 242.5	100.0

根据《莱玛》。

从上表可知，用于事业者占了大部分，其中，作为个人的事业投资（不包含文化事业投资）的运输业、制造业、银行业及金融业、不动产业、进出口业等，又占了全部对华投资额的半数以上。

列国在对华投资中所占比例又如何呢？现将 1902 年、1914 年、1931 年三个年份在中国的外国投资额分国别表示如下：

	1902 年		1914 年		1931 年	
英国	260.3 (百万美元)	33.0 %	607.5 (百万美元)	37.7 %	1 189.2 (百万美元)	36.7 %
日本	1.0	0.1	219.6	13.6	1 136.9	35.1
俄国	246.5	31.3	269.3	16.7	273.2	8.4
美国	19.7	2.5	49.3	3.1	196.8	6.1
法国	91.1	11.6	171.4	10.7	192.4	5.9
德国	164.3	20.9	263.6	16.4	87.0	2.7
比利时	4.4	0.6	22.9	1.4	89.4	2.7
荷兰	——	——	——	——	28.7	0.9
意大利	——	——	——	——	46.4	1.4
斯堪的那维亚诸国	——	——	——	——	2.9	0.1
其他	0.6	0.4	6.7	0.4	——	——
合计	787.9	100.0	1 610.3	100.0	3 242.5	100.0

从上表也可以看出，英国因早就着手对华投资而在此方面占据着主导地位。甲

午战争之后的政治局面，将俄国、德国也引入到对华投资中。

再看外国对华投资的地理分布：

	1902 年		1914 年		1931 年	
上海	110.4 (百万美元)	14.0%	291.0 (百万美元)	18.1%	1 112.2 (百万美元)	34.3%
满洲	216.0	27.4	361.6	22.4	880.0	27.1
其他中国地区	177.2	22.5	433.1	26.9	607.8	18.4
未分类的数额	284.7	36.1	524.6	32.6	642.5	19.8
合计	787.9	100.0	1 610.3	100.0	3 242.5	100.0

根据《莱玛》。

在上表中，汉口属于“其他中国地区”这一项类，与广东一同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可以肯定的。对“其他中国地区”的每年投资额所占百分比在逐年减少，而其投资的绝对数额却在逐年增加。虽然只有外国人对汉口的投资数额不得而知，但作为大城市，它与广东一样仅次于上海，成为外国的投资城市，因而为人们所重视。在汉口的外国人权益的特点在于：不像上海等地的外国人权益那样基本都集中在租界之内。汉口是根据 1858 年中英《天津条约》而成为开放口岸的，1861 年设立的英国租界是外国租界的发端，接下来在 1895 年设立了德、意租界，1896 年设立了法、俄租界，最后日本国也被赋予开设租界的权利。

这些租界都占据了江岸的主要地盘，其后，英国租界于 1902 年，日、法两国租界于 1906 年分别拓展，使汉口像天津一样，成了以外国文明兴盛著称的都市。

但在世界大战爆发之后，中国也仿效列国与德、意两国断交，接下来又发出了对德宣战的布告，申明按照国际法废除以往与德、意缔结的一切条约，此地的德、意租界也作为举措之一而被收回。接着，俄国租界也成为苏联抛弃沙俄时代旧政策这一国策的牺牲品，被归还给中国一方。最后，对于英国租界，中国方面也展开收复运动，而于 1927 年收回。

这些收回的旧租界，分别成为特别区域的特一区、特二区、特三区。现存的不过只有日本国和法国两片租界而已。

汉口陷落后，除了法租界之外，这些特别区域都归于日军统治之下，外国人权益的大部分也都集中到这些特别区域内，狭窄的法国租界里不过只有少数外国人权益存在而已。

此外，汉口在地理上的特色，是处于扬子江的上游，因而在它陷落后，此间外国人的航行在江阴上游全部被禁止，特别区域内的外国人权益自不必说，就是法国

租界里的外国人权益也被断其手足、徒有其表，其活动几乎陷于不得不停止的状态。

由此看来，汉口的外国人权益处于特殊情形之下，与上海等地的外国人权益有很大不同，他们的命运可以说掌握在日本军部手中，这对于制定对策也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然而，即便是处于这种状态之下的汉口外国人权益，由于其具有很长的历史，因而有很强的生命力是可以理解的。故此，无论如何应当采取慎重的对策。

再者，在战后的汉口，在特殊的外国人权益方面，还存在着所谓伪装权益，这就是：将中国人财产伪装成外国人权益。其中，有的只是借用外国的国旗，有的是用作事变爆发后借贷关系的担保，有的是依据事变后的买卖契约及其管理等等。即使是在日军占领后，如何处理这些伪装权益，也令军部大为棘手，在现今也还是很大的麻烦。

为了处理这些伪装权益并制定前述之针对外国人权益的对策，使之充分实现，首先必须对其在事变前的情形以及事变后所受的影响加以研究和掌握，由此才能懂得应该如何制定解决的对策和采取何种处理办法。

然而遗憾的是，汉口陷落的时日尚短，战后还没有充分开展针对外国人权益的工作，无论军部还是民间都还没来得及着手进行关于外国人权益的调查，所以尚未得到什么特别重要的资料。

我只是访问了军部和民间与此问题相关的一些人士，将其口述资料收集起来，形成以下的调查报告。

二、在汉口的外国人权益

（一）制造业

从外国人的直接营利性事业投资角度来看汉口的外国人权益，它是遍及所有方面的，也就是说，涉及制造业、进出口业、银行及金融业、一般商店等，其中规模大者，有的还兼营制造业、进出口业、船舶业等等。现在将它们分为各部门按国别分列如下：

1. 英国

（1）汉口打包公司（中英合办）（Hankow Press and Packing Co., Ltd）

轧花业务

汉口第三特别区

（2）平和打包厂（Liddel Brother & Co, Ltd）

轧花业务

第三特别区

(注——这个工厂又兼有进出口业的平和洋行, 参照进出口业一节)

(3) 隆茂打包厂 (Mackenzie & Co., Ltd)

轧花业务

第三特别区

(注——它又兼有从事进出口、保险业的隆茂洋行, 参照第二节)

(4) 颐中烟公司 (颐中烟草股份有限公司) (Yee Tsong Tabaco Co., Ltd)

生产卷烟

第一特别区 硃口

(注——这个工厂属于英美烟草公司系统)

(5) 瑞记英行蛋厂 (Arnold Trading Co., Ltd)

生产蛋制品

第一特别区

(注——这个工厂又与兼有船舶业、进出口业的瑞记洋行相联合, 分别参照第二、三节)

(6) 和记洋行 (The International Export Co., Ltd)

生产冻肉、蛋制品

第一特别区 汉中街

1909 年成立, 总行在伦敦

交易银行 (Hongkong &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麦加利银行

(The Chartered Bank of India, Australia and China)

(7) 顺昌洋行蛋厂 (Byrned and Co.)

生产蛋制品

第三特别区

(这个工厂与从事煤炭业的顺昌洋行相结合, 参照第五节)

(8) 赞育汽水厂 (Hankow Dispensary Ltd)

生产清凉饮料

法国租界

(还兼有赞育药房, 也兼营药酒、清凉饮料、杂志的销售, 参照第五节)

(9) 和利冰厂 (Hankow Ice & Aerate Water Works)

制冰

法国租界

(10) 新泰砖茶厂 (俄国人经营, 英国籍) (Asiatic Trading Corporation, Ltd)

生产砖茶

第二特别区

年生产额：据昭和十年度的调查，是 16 至 17 万担，约占汉口及附近地区全部生产量 29 至 33 万担（湖北省粤汉铁路沿线的羊楼洞占其中的 7 至 8 万担）的 50%。

出口目的地：经苏俄杂粮出口公所之手，发往西伯利亚及外蒙古。

（注——这个工厂由俄商新泰洋行经营到大正十二年前后，其后名义上转为英商太平洋行，但实际上由苏联全俄消费社中央协助会经营，现在归苏俄杂粮出口公所经营，也与新泰洋行相结合，掌握一般的进出口业务。参照第二节。）

（11）汉口电灯公司（Hankow Light and Power Co. Ltd.）

电气供应

第三特别区

（12）英商中国肥皂有限公司（The China Soap Co., Ltd.）

生产和销售肥皂

第三特别区

2. 美国

（1）慎昌蛋厂（Anderson Meyer & Co. Ltd.）

生产蛋制品

法国租界

（注——又与慎昌洋行相结合，有进出口业务）

（2）其乐洋行（Spencer Kellogg & Sons of Canada, Ltd.）

精制桐油

法国租界

（注——此工厂与进出口业的其乐洋行相结合，参照第二节）

（3）大美烟公司（Liggett & Myers Co. China）

生产烟草

第三特别区

3. 德国

（1）礼和洋行及礼和蛋厂（Carlowitz & Co.）

皮革加工及蛋制品

第二特别区

（注——它又兼营进出口业及船舶制造业，参照第二、三节）

（2）美最时洋行及美最时蛋厂及该行电气部（Melchers & Co.）

精制桐油、蛋制品与电力供应

第一特别区

（注——这个洋行还兼营船舶业和进出口业，参照第二、三节）

(3) 机昌洋行 (Hulsemann)

铁工业, 第二特别区

(4) 嘉利蛋厂 (Schnabel, Gaumer & Co.)

生产蛋制品

第一特别区

(注——与嘉利洋行相结合, 兼营进出口业, 参照第二、三节)

4. 法国

(1) 培林洋行 (Behr & Mathem Ltd.)

生产蛋制品

法国租界

(注——兼营进出口业, 参照第二节)

(2) 那嘉利汽水厂 (Niagara Mineral Water Co.)

生产销售清凉饮料

法国租界

5. 比利时

(1) 瑞兴蛋厂 (Societe Anonyme Belge I' Industring de Oeufs)

生产蛋制品

日本租界

从以上列举可知, 在制造业方面, 占大部分的是以面向海外出口的中国物资作为原料的制造业, 也就是轧花、蛋制品生产、砖茶生产、桐油精制、皮革加工等制造业; 另外就是以进口销售为目的的烟草制造业和其他日用必需品的制造供给等等。

而其中较大规模的制造业, 同时又兼营进出口业务; 至于更大规模者, 有的还兼营船舶制造业和保险业。

最初开始对华投资的英国无疑占了制造业的第一位, 其次是美国、德国、法国、比利时等。

(二) 进出口业

1. 英国

(1) 安利洋行 (Arnhold & Co.)

牛皮、棉布、机械类、汽车及其他一般进出口业务, 保险业, 在此次事变中从事兵器弹药输入

第一特别区

(2) 瑞记洋行 (Arnhold Trading Co., Ltd)

生产、出口蛋制品

第一特别区

(注——此商社还兼营制造业和船舶业, 参照第一、三节)

(3) 亚细亚公司 (Asiatic Petroleum Co., Ltd)

石油进口, 桐油、芝麻出口

第三特别区

(注——此商社又兼营船舶业, 参照第三节)

(4) 新泰洋行 (Asiatic Trading Corporation, Ltd)

制茶及其他一般进出口业务

第二特别区

(注——此洋行又兼营制茶业, 参照第一节。另, 此为俄人经营、英国籍)

(5) 贸易商会 (Board of Trade)

一般进出口

第三特别区

(6) 合意洋行 (Bunge & Co., Ltd., Shanghai)

进口小麦 (从阿根廷、加拿大)、米 (从泰国、缅甸), 出口桐油 (向美国、欧洲、南美)、芝麻 (向美国、欧洲)、豆 (向欧洲)

法国租界

成立于 1931 年

总行在上海

交易银行、麦加利银行 (The Chartered Bank of India, Australia & China)

(7) 卜内门公司 (Imperial Chemical Industries [China] Ltd.)

染料化学工业品、染料进口 (从英国)

第三特别区

总公司在上海

分公司在香港、广东 (当指广州——译者)、厦门、汕头、福州、重庆、天津、青岛、烟台、大连、哈尔滨

交易银行: Shanghai Commercial and Saving Bank, Ltd., Hang Kong & Shanghai B.C.

(8) 拔佳 (Bat ' a Shoe Co., Ltd)

鞋类进口

第三特别区

(9) 波衣也琴行 (Boyack Laurence B. Piano Co.,)

乐器类进口

第二特别区

- (10) 祥泰洋行 (China Import & Export Lumber Co., Ltd.)
一般进出口
第一特别区
(注——此洋行兼营船舶业, 参照第三节)
- (11) 老沙逊洋行 (David Sasson & Co., Ltd.)
棉布、谷类、桐油及其他进出口
第三特别区
- (12) 天祥洋行 (Dodwell & Co., Ltd.)
机械类进口及船舶、保险业
第三特别区
(注——此洋行兼营船舶业和保险业, 参照第三、五节)
- (13) 英孚工程所 (Eyre, A)
机械类进口
法国租界
- (14) 大平洋行 (Harrison King & Irmin, Ltd.)
茶叶出口, 铁、钢材进口以及保险业
法国租界
(注——此洋行又兼营保险业和船舶业, 参照第三节)
- (15) 和记洋行 (International Export Co., Ltd.)
蛋制品、冻肉生产和出口
第一区
(注——此洋行兼营制造业, 参照第一节)
- (16) 怡和洋行 (Jardine Matheson Co., Ltd.)
桐油出口, 保险、船舶业
第三特别区
(注——此洋行兼营船舶业和保险业, 参照第三节)
- (17) 保和有限公司 (Lacy & Cannan Co., Ltd.)
一般进出口, 保险业
第三特别区
(注——此洋行兼营船舶业和保险业, 参照第三节)
- (18) 平和洋行 (Liddel Brother & Co., Ltd.)
牛皮、桐油出口
第三特别区
(注——此洋行兼营制造业, 参照第一节)
- (19) 隆茂洋行 (Mackenzie & Co., Ltd.)

矿石出口及保险业

第三特别区

(注——此洋行兼营棉花压榨业务, 参照第一节)

(20) 祥利洋行 (Mehta B. R.)

酒类、杂货, 一般进出口

第三特别区

成立于 1925 年

总行在汉口

进口商品: 食物、酒类、呢绒、妇女装饰类 (英国、法国、印度、美国)、纸类 (英国、德国)、烟草类 (马尼拉、英国)

出口商品: 桐油 (英国、德国)

(21) 英瑞炼乳公司 (Nestle & Anglo-Swiss Condensed Milk Co.,)

进口炼乳

第三特别区

(22) 老晋隆 (Mustard & Co., Ltd.)

一般进口

第三特别区

(23) 礼福公司 (Nivea Co.)

麻、棕榈出口

第三特别区

成立于 1924 年

总公司在汉口

交易银行: Hongkong & Shanghai Banking Corp., The Chartered Bank of India Australia & China.

(24) 胜家公司 (Singer Sewing Machine Co., Ltd.)

缝纫机械进口

第三特别区

(25) 聚源洋行 (Representation for British Manufactures Co., Ltd.)

机械类、电气材料及其他进口

第三特别区

(26) 罗辨臣琴行 (Robinson Piano Co., Ltd.)

乐器类进口

第二特别区

(27) 天佑洋行 (Thurier & Kohr)

酒类、杂货进口

第二特别区

- (28) 合众贸易有限公司 (The United Trading Co., Ltd)

一般进出口业

第二特别区

2. 美国

- (1) 美光公司 (American Far East Match Co.)

火柴和火柴材料进口

第三特别区

- (2) 安定洋行 (J.C. Anderson & Co., Inc)

毛皮及其他出口

法国租界

- (3) 慎昌洋行 (Anderson Meyer & Co., Ltd.)

机械类进口及保险

法国租界

(注——此洋行兼营蛋制品业务, 参照第一节)

- (4) 中美大药房 (Chinese American Drug Co.)

化学工业药品进口

第二特别区

- (5) 大来洋行 (Dollar Co.)

进出口及船舶业

华景街

(注——如上所标大来洋行兼营船舶业, 参照第三节)

- (6) 大来木行 (Dollar Lumber Co.)

木材进口

华景街

- (7) 恒信洋行 (Dupont de Nemours & Co., Inc.)

染料进口

法国租界

成立于 1924 年 (in Hankow), 1802 年 (in U.S.A.)

总行: (Wilmington, Del., U.S.A.)

分行: 神户、上海、汉口、天津

交易银行: National City Bank of New York, Shanghai Commercial & Saving Bank, Ltd.

- (8) 美信洋行 (Gale Co., L.E.)

机械、汽车进口

法国租界

(9) 美国永备公司 (China & English Development)

一般进出口

第二特别区

(10) 其来洋行 (China Inland Motors Fed , Inc.)

汽车进口

第三特别区

(11) 汉口生利洋行 (Vongehr O. E. , Federal , I ' nc.)

桐油、一般进出口、保险业

第三特别区

(12) 联邦商业有限公司 (National Merchants & Underwriters)

一般进出口

第三特别区

(13) 美盛洋行 (Perashaw & Co.)

丝织品、化妆品进口

第二特别区

(14) 其乐洋行 (Spencer Kellogg & Sons of Canada , Ltd.)

桐油出口

第一特别区

(注——此洋行兼营精制桐油的制造业，参照第一节)

(15) 美孚行 (Standard Oil Co. of New York)

石油进口

第三特别区

(注——此洋行以美孚公司的名义兼营船舶业，参照第一节)

(16) 德士古 (The Texas Oil Co ,)

石油进口

第三特别区

(17) 友联无线电社 (Union Radio Service.)

收音机电气材料进口

第三特别区

(18) 施美洋行 (Werner G. Smith & Co.)

桐油出口

法国租界

总行：Cleveland Ohio U.S.A.

交易银行：Hongkow & Shanghai Banking Corp , National City Bank of

New York.

(19) 大昌实业公司

一般进出口业

第二特别区

3. 德国

(1) 义比洋行 (Bechler, E.)

机械类进口

第三特别区

成立于 1925 年

交易银行: Deutsch - Asiatische Bank, Hongkong & Shanghai Banking Corp. Shanghai Commercial & Savings bank, Ltd.

(2) 孔士洋行 (Kunst & Albers.)

机械类进口

第三特别区

成立于 1864 年

总行: Hamburg

分店: 太原、西安、上海、南京、汉口、香港、广东 (当指广州——译者)

交易银行: Hongkong & Shanghai Banking Corp, The Chartered Bank of India Australia & China, Shanghai Commercial & Savings bank, Ltd.

(3) 美记洋行 (Bremen Colonial & China Trading Co.)

桐油出口, 一般进出口业

第一特别区

(4) 礼和洋行 (Carlowitz & Co.)

棉布、机械类进口

牛、羊皮、桐油、蛋制品出口

第二特别区

(注——此洋行兼营皮革加工、蛋制品生产及船舶业, 参照第一、三节)

(5) 德昌洋行 (Chungking Import S.A.)

肠出口

第一特别区

(6) 捷成洋行 (Die Derichoson & Co., Ltd.)

棉布及其他进口

第一特别区

(7) 发得辅营造厂 (Faddeiev & Co.)

棉布及其他进口

第一特别区

(8) 福来德洋行 (Fuhrmeister & Co.)

牛皮和其他出口, 保险

第一特别区

成立于 1902 年

总行: 上海

分行: 汉口、天津

交易银行: Deutch - Asiatische Bank

(9) 万国大药房 (International Pharmacy)

药材进口

第二特别区

(10) 德孚洋行 (Deutch Farbin Handelsgesellschaft. Waibel & Co.)

一般进出口

第三特别区

(11) 信义书局 (Latheran Book Concern.)

书籍进口

第二特别区

(12) 味也洋行 (Mee - Yeh Handles Co.)

机械及其他进口

第三特别区

(13) 美最时洋行 (Melchers China Co.)

牛皮、羊皮、桐油出口

第一特别区

(注——此洋行兼营制造业及船舶业, 参照第一、三节)

(14) 裕兴洋行 (Rohde & Co.)

猪毛、牛羊皮、桐油出口

第三特别区

(15) 嘉利洋行 (Schmabel Ganmer & Co.)

锑、肠、蛋制品、桐油出口

第一特别区

成立于 1908 年

总行: Hamburg

分行: 汉口、上海

交易银行: Deutch - Asiatische Bank Hamburg & China

- (16) 西门子洋行 (Seemens China Co.)
 电气材料、机械进口
 法国租界
- (17) 禅臣洋行 (Siemsson & Co.)
 机械类进口
 第一特别区
- (18) 德华洋行 (Waslimg)
 化学药品进口 (从德国), 肠、红茶出口 (向欧洲)
 法国租界
 成立于 1930 年 12 月
 总行: 柏林
 分行: 天津、上海、Hamburg, Kalgon, Urgo
 交易银行: Deutch - Asiatische Bank
- (19) 兴华公司 (Schmidt & Co.)
 进口物品: Microscopes, Surveying Instrument, Clinical Apparatas, Surgical Instrument, Leica Camera, Chemicals (Deutch)
 第三特别区
 成立于 1934 年
 分公司: 上海、南京、北京、天津、香港、广东 (当指广州——译者) 新加坡
 交易银行: Deutch - Asiatische Bank, Shanghai Commercial & Savings Bank

4. 法国

- (1) 通济洋行 (France Import)
 酒类进口 (法国、英国、西班牙、葡萄牙)
 法国租界
 成立于 1929 年 8 月
 总行: 汉口
 分行: 长沙
 交易银行: Banque de L' Mdo - China Banque Belge (东方汇理银行); National City Bank of New York.
- (2) 培林银行 (Behr & Mathew Ltd., S.)
 蛋制品出口
 法国租界
 (注——此洋行兼营制造业, 参照第一节)

- (3) 立丰洋行 (Hankow Millary & Dressing)
 - 妇女西式服饰、化妆品进口
 - 法国租界
- (4) 波依也琴行 (Bayack, Laurence B. Piano Co.)
 - 乐器类进口
 - 法国租界
- (5) 麦逊商会 (Maison Des Modes)
 - 化妆品、洋货、杂货进口
 - 第二特别区
- (6) 永兴洋行 (Oliver Chine Compagnie)
 - 牛、羊皮、桐油出口
 - 法国租界
 - 总行：上海
 - 分行：天津、汉口
 - 交易银行：Banque de L'Indo-China
- (7) 东兴洋行 (Oriental Products Export Co.)
 - 猪肠、桐油出口
 - 法国租界
- (8) 立兴洋行 (Ste Racine & Co.)
 - 牛皮及其他进出口保险
 - 法国租界
 - (注——此洋行兼营制造业及船舶业，参照第一、三节)
- (9) 那嘉利洋行 (Niagara Mineral Water Co.)
 - 饮料制造和销售
 - 法国租界
 - (注——此洋行兼营制造业，参照第一节)

5. 俄国

- (1) 西伯利亚首饰公司 (A. & S. Lipkovsky Brothers Jewellers)
 - 装饰品类进口
 - 法国租界
- (2) 阜昌公司 (Molchanaff's Properties The Heirs of J.M. & N.M.)
 - 土货出口
 - 第三特别区
- (3) 哈尔滨洋行 (Harbin Store)
 - 妇女西式服饰、化妆品进口

法国租界

(4) 源泰洋行 (Nakuasin D.S. & Co.)

出口商品：砖茶、红茶 (向法国、德国)

第二特别区

成立于 1900 年

总行：汉口

交易银行：Hong Kong & Shanghai Banking Corp. , The Chartered Bank of India Australia & China.

(5) 顺利洋行 (Shrofb & Son)

一般进口业

第三特别区

(6) 协助会洋行 (Centrosojus [England] Ltd.)

砖茶和其他茶出口

第二特别区

(注——此洋行表面是英国籍)

6. 荷兰

(1) 海昌洋行 (Klink P.J.)

进口商品：化学药品、照相器材、钟表类

汉口湖南街

成立于 1931 年 8 月

总行：上海

分店：香港、汉口、天津

交易银行：浙江实业银行 (Chekiang Industrial Bank , Ltd.) 华比银行 (Banque Belge Pour L ' Etranger Extremeorient [S.A.])

7. 比利时

(1) 良济洋行 (Vanderstegen & Cocks)

牛、羊皮及其他出口

第三特别区

如上面所述，出口方面是以桐油、蛋制品、皮革、砖茶等为主，这些几乎都是在外国人经营的工厂制作或加工后出口。如同前面制造业一节所述，进出口业者中，有的不仅兼营制造业，而且还兼营船舶业务与保险业务。

在进口方面，机械类、染料、化学工业药品、酒类、石油、棉布及其他日用品占了大部分，进口业者也大多兼营此类物品的销售。

在进出口业中，英国占第一位，美国其次，其他依次为德国、法国、俄国、荷

兰、比利时等国。

(三) 船舶业

1. 英国

(1) 瑞记洋行 (Arnhold Trading Co.)

第一特别区

(注——此公司兼营制造业和出口业务, 参照第一、二节)

(2) 太古洋行 (Butterfield & Swire)

第三特别区

拥有船舶: 18 艘

总吨数: 30 911 吨

(注——此公司是中国航业公司的代理公司)

(3) 祥泰洋行 (The China Import and Export Limber)

第一特别区

拥有船舶: 2 艘

总吨数: 1 748 吨

平均船龄: 21.5 年

(注——此洋行兼营一般进出口业, 参照第二节)

(4) 天祥洋行 (Dodwell & Co., Ltd.)

第三特别区

(注——它兼营进出口业, 参照第二节)

(5) 大平洋行 (Harrison King & Irmin, Ltd.)

第三特别区

(注——它兼营进出口业, 参照第二节)

(6) 怡和洋行 (Jardine Matheson Co.)

第三特别区

拥有船舶: 13 艘

总吨数: 31 874 吨

平均船龄: 23.7 年

(注——此公司是印度支那航业公司的代理公司, 又兼营出口业务, 参照第二节)

(7) 保和洋行 (Lacy & Cannan. Ltd.)

第三特别区

(注——此公司兼营一般进出口业务, 参照第二节)

(8) 亚细亚公司 (Asiatic Petroleum Co.)

第三特别区

拥有船舶：3 艘

总吨数：1 999 吨

平均船龄：12.4 年

（注——它兼营进出口业务，参照第二节）

（9）Elerman Line（Agent Lacey & Cannon）

第三特别区

2. 美国

（1）大来洋行（The Robert Dollar Co.）

第一特别区

（注——它兼营进出口业务，参照第二节）

（2）美孚公司（Standard Vacuum Oil Co.）

第三特别区

拥有船舶：3 艘

总吨数：2 392 吨

平均船龄：11.7 年

（注——此公司的别名又称美孚行，兼有石油进口业务，参照第二节）

3. 德国

（1）礼和洋行（Carlowitz & Co.）

第一特别区

（注——此洋行兼营制造业和进出口业务，参照第一、二节）

（2）美最时洋行（Melcher & Co.）

第一特别区

（注——此洋行兼营制造业和进出口业务，参照第一、二节）

（3）享宝轮船公司（Hambrug - America Line）

第一特别区

（4）协平洋行（H. Sobbe & Co.）

第三特别区

（注——此洋行兼营代理业和保险业，参照第五节）

4. 法国

（1）立兴洋行（Racine & Co.）

法国租界

（注——它兼营制造业，参照第一节）

（2）聚福洋行

拥有船舶：2 艘

平均船龄：15.5 年

5. 丹麦

(1) 宝隆洋行 (The East Asiatic Co.)

第一特别区

(注——此洋行兼营出口业务, 参照第二节)

6. 意大利

(1) 义华公司

拥有船舶: 1 艘

总吨数: 507 吨

平均船龄: 4 年

如上述, 纯粹只经营船舶业的只有太古洋行和其他二三家小规模的公司。其他几乎都如以上第一、二节所述, 与进出口业结合, 其中也有与制造业和保险业相结合的。在船舶行业中, 英国赫然占据第一位, 德国、美国、法国、丹麦、意大利等次之。

现将各船舶业在不同航路上从事航运的船舶数以及总吨位数列表如下:

航路 公司名	上海—汉口	汉口—宜昌	汉口—湘潭	宜昌—重庆	上海—宜昌	合 计
日清公司	25 656 吨 (8 艘)	3 249 吨 (2 艘)	2 173 吨 (2 艘)	4 001 吨 (5 艘)	—	35 079 吨 (17 艘)
※太古洋行	14 517 吨 (5 艘)	1 327 吨 (1 艘)	1 195 吨 (1 艘)	4 806 吨 (8 艘)	10 883 吨 (4 艘)	32 723 吨 (19 艘)
※怡和洋行	20 336 吨 (6 艘)	2 209 吨 (1 艘)	1 337 吨 (1 艘)	2 881 吨 (3 艘)	5 111 吨 (2 艘)	31 874 吨 (13 艘)
招商局	27 052 吨 (9 艘)	1 293 吨 (1 艘)	—	—	—	28 345 吨 (10 艘)
三北鸿安 公司	13 280 吨 (6 艘)	3 302 吨 (2 艘)	2 093 吨 (4 艘)	1 617 吨 (2 艘)	—	20 292 吨 (14 艘)
宁绍公司	2 641 吨 (1 艘)	—	—	—	—	2 641 吨 (1 艘)
※美孚洋行	—	—	—	2 392 吨 (3 艘)	—	2 392 吨 (3 艘)
※祥泰洋行	1 746 吨 (2 艘)	—	—	—	—	1 746 吨 (2 艘)
※亚细亚公司	—	—	—	1 999 吨 (3 艘)	—	1 999 吨 (3 艘)

续表

航路 公司名	上海—汉口	汉口—宜昌	汉口—湘潭	宜昌—重庆	上海—宜昌	合 计
※聚福公司	——	——	——	1 768 吨 (2 艘)	——	1 768 吨 (2 艘)
※义华公司	——	——	——	692 吨 (1 艘)	——	692 吨 (1 艘)
民生实业 公司	——	——	——	18 399 吨 (27 艘)	——	18 399 吨 (27 艘)
合 计	105 223 吨 (27 艘)	11 380 吨 (7 艘)	6 798 吨 (8 艘)	38 555 吨 (54 艘)	15 994 吨 (6 艘)	177 950 吨 (112 艘)

(注——为了参考,将日本、中国的船舶业者也加以揭示。表中加※者由外国人经营)

按照国籍,可将上表中的公司数、船数、总吨位数及其百分比作如下表示:

国籍	日本	英国	美国	法国	意大利	中国	合计
公司数	1	4	1	1	1	4	12
艘数	17	37	3	2	1	52	112
总吨位数	35 079	68 342	2 392	1 768	692	69 677	177 950
百分比	19.7%	38.4%	13.0%	10.0%	0.4%	39.2%	100%

上表中船数和总吨位数,除去中国之外,英国位居第一,日本次之,再次是美、法、意等国。

接下来将汉口各公司的航行次数及其总吨数列表如下:

昭和十年四月——同年九月

公司名	航行次数	总吨数
日清汽船	88 次	39 756 吨
太古洋行	128 次	51 008 吨
怡和洋行	116 次	34 513 吨
招商局	90 次	33 454 吨
三北鸿安公司	86 次	38 114 吨
宁绍公司	23 次	9 379 吨

续表

公司名	航行次数	总吨数
祥泰洋行	21 次	15 281 吨
其 他	14 次	33 426 吨
合 计	566 次	254 931 吨

昭和十年十二月——昭和十一年三月

公司名	航行次数	总吨数
日清汽船	97 次	49 268 吨
太古洋行	109 次	46 682 吨
怡和洋行	109 次	36 621 吨
招商局	98 次	29 433 吨
三北鸿安公司	102 次	55 689 吨
宁绍公司	21 次	8 749 吨
祥泰洋行	24 次	18 436 吨
其 他	7 次	18 500 吨
合 计	567 次	263 378 吨

昭和十一年四月——昭和十一年九月

公司名	航行次数	总吨数
日清汽船	109 次	73 635 吨
太古洋行	111 次	41 095 吨
怡和洋行	111 次	41 753 吨
招商局	112 次	63 757 吨
三北鸿安公司	88 次	44 581 吨
宁绍公司	18 次	7 410 吨
祥泰洋行	25 次	20 012 吨
其 他	5 次	8 654 吨
合 计	579 次	300 897 吨

昭和十一年十月——昭和十二年三月

公司名	航行次数	总吨数
日清汽船	155 次	37 844 吨
太古洋行	112 次	79 050 吨
怡和洋行	118 次	83 945 吨
招商局	106 次	75 778 吨
三北鸿安公司	106 次	55 650 吨
宁绍公司	10 次	10 105 吨
祥泰洋行	24 次	18 041 吨
其 他	9 次	10 122 吨
合 计	646 次	370 535 吨

另外，有关汉口外国人经营的船舶业、制造业、仓库业等水陆机关设备情况，可用下面的表格加以揭示。

汉口水陆机关设备一览表

公司名	种类	栋数	容纳能力	水上设备	数目	容纳能力	备注
太古(英)	混凝土三层建筑	1	4 000 吨	平底船	1	——	日本租界河街下边
太古(英)	平房建筑	2	1 200 吨	平底船	1	——	日本租界河街下边
太古(英)	混凝土三层建筑	1	2 000 吨	废旧船	1	1 000 吨	特三区河街五码头
太古(英)	平房建筑	2	2 000 吨	废旧船	1	1 000 吨	特三区河街四码头
太古(英)	混凝土四层建筑	1	25 000 吨	废旧船	1	800 吨	中国街沿河路税关上边
太古(英)	其他平房建筑	数栋	25 000 吨	平底船	1	——	中国街沿河路税关上边
怡和(英)	混凝土四层建筑	1	6 000 吨	废旧船	1	1 200 吨	特一区河街二码头
怡和(英)	平房建筑	4	8 000 吨	废旧船	1	1 200 吨	特一区河街三码头
隆茂(英)	混凝土平房建筑	数栋	25 000 吨	——	——	——	轧花厂
平和(英)	混凝土平房建筑	数栋	25 000 吨	——	——	——	轧花厂
安利英(英)	混凝土四层建筑	1	4 000 吨	——	——	——	特一区中街
安利英(英)	油厂	1	2 000 吨	——	——	——	特一区中街

续表

公司名	种类	栋数	容纳能力	水上设备	数目	容纳能力	备注
安利英(英)	黄蛋厂	1	5 00 吨	——	——	——	特一区中街
安利英(英)	二层建筑	数栋	8 000 吨	——	——	——	特一区三阳路(原元丰栈)
和记英(英)	黄蛋厂	数栋	14 000 吨	平底船	1	——	特二区六合路
祥泰(英)	木材场		400 万平方英尺	——	——	——	特二区三阳路
祥泰(英)	三层建筑	1	5 000 吨	废旧船	1	600 吨	法租界河街
大平(英)	二层建筑	4	5 000 吨	——	——	——	特二区兰陵路
大平(英)	平房建筑	2	2 000 吨	——	——	——	特一区怡和街
亚细亚(英)	贮油场			平底船	1	——	丹水池
怡和(英)	桐油厂	3	800 吨	——	——	——	特二区合作路
怡和(英)	牛皮工厂	1	2 000 吨	——	——	——	中国街铁路外
陪林(英)	二层建筑 平房建筑	3	5 000 吨	——	——	——	法租界吕钦使路
天祥(英)	平房建筑	4	5 000 吨	——	——	——	特三区三阳街
遁逊(英)	三层建筑	1	4 000 吨	——	——	——	特三区河街
英美烟草(英)	平房建筑	3	5 000 吨	——	——	——	特三区河街
英美烟草(英)	贮煤场	1	20 000 吨	——	——	——	特一区河街
礼和(德)	三层建筑	1	2 500 吨	——	——	——	特一区五福路
礼和(德)	平房建筑	数栋	5 000 吨	——	——	——	特二区五族街大智路
美最时(德)	平房建筑	4	5 000 吨	废旧船	2	1 200 吨	特一区河街
美最时(德)	贮煤场		8 000 吨	——	——	——	特一区河街
捷威(德)	二层建筑	2	2 000 吨	——	——	——	特一区中街
福来德(德)	平房建筑	2	1 000 吨	——	——	——	特一区六合路
协平(德)	平房建筑	1	1 500 吨	——	——	——	特三区河街
瑞兴(瑞典)	二层建筑	1	1 000 吨	——	——	——	日本租界成忠路
宝隆(丹麦)	平房建筑	1	2 500 吨	——	——	——	特一区汉中路
美孚(美)	贮油场			平底船	1	——	丹水池汉口下游 6 英里处
大来(美)	木材场		400 万平方英尺	——	——	——	特一区汉景街

续表

公司名	种类	栋数	容纳能力	水上设备	数目	容纳能力	备注
其乐(美)	桐油厂	1	2 500 吨	——	——	——	法租界吕钦使路
德士古(美)	贮油场			——	——	——	丹水池汉口下游六英里处
永兴(法)	牛皮工厂	1	2 500 吨	——	——	——	法租界钦路外
东兴(法)	桐油厂	1	800 吨	——	——	——	法租界河街

(四) 银行业

1. 英国

- (1) 汇丰银行(The Hong Kong &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td.)
 资本金：5 千万元(注入金额：2 千万元。原文如此，其币种不明——译者)
 总行：香港
 当地支行所在地：第三特别区
 (注——加入外国汇兑银行合作社)
- (2) 麦加利银行(The Chartered Bank of India, Australia & China)
 资本金：3 百万英镑(已注入)
 总行：香港
 当地支行：第三特别区
 (注——加入外国汇兑银行合作社)

2. 美国

- (1) 花旗银行(The National City Bank of New York)
 资本金：12 400 万美元(已注入)
 总行：纽约
 当地支行：第三特别区
 (注——加入外国汇兑银行合作社)

3. 德国

- (1) 德华银行(Deutsch-Asiatische Bank)
 资本金：644 万元(原文如此，其币种不明——译者)
 总行：柏林
 当地支行：第一特别区
 (注——加入外国汇兑银行合作社)

4. 法国

(1) 东方汇理银行 (Banque de L' Indo - China)

资本金：12 000 万法郎 (已注入)

总行：巴黎

当地支行：法国租界

(注——加入外国汇兑银行合作社)

5. 比利时

(1) 华比银行 (Banque Belge Pour L' Extreme - Orient. SA.)

资本金：14 700 万法郎

总行：布鲁塞尔

当地支行：第三特别区

(注——加入外国汇兑银行合作社)

(2) 义放款银行 (Credit Foncier D' Extreme Orient)

资本金：不明

总行：布鲁塞尔

当地支行：法国租界

(注——此银行未加入外国汇兑银行合作社)

(五) 一般

1. 英国

(1) 裴费大律师 (Bailery & Perry)

律师

第三特别区

(2) 大英圣书协会 (British & Foreign Bible Society)

圣经类

第三特别区

(3) 保宁 (British Trader Insurance Co., Ltd.)

保险业

第三特别区

(4) 天工洋行 (F. Kortus & Son Co.)

卫生技术品销售

法国租界

(5) 吉昌牛奶公司 (Central China Dairy)

挤奶业

第三特别区

(6) 英文楚报馆 (Central China Post, Ltd.)

新闻业

第三特别区

- (7) 永年人寿保险公司 (Chinese Mutual Insurance Co. , Ltd.)

保险业

第三特别区

- (8) 宝顺洋行 (Euans Push & Co.)

保险业兼仓储业

第三特别区

- (9) 印度公司 (East Indian Co. , Ltd.)

骨董商

第三特别区

- (10) 葛廉士票行 (Gracy & Pearson)

汇兑中间商

第三特别区

- (11) 兴隆洋行 (Guzdar & Co.)

杂货商

第三特别区

- (12) 景明洋行 (Hemmings & Borkly)

建筑承包

法国租界

- (13) 罗甫洋行 (Lovatt & Byrne)

汇兑中间商、保险

第一特别区

- (14) 永年 (Middeton & Hugh , Ltd.)

保险业

第三特别区

- (15) 三义工程师 (Nilsen & Malcolm)

承包商

第三特别区

- (16) 金迦洋行 (Pearce & Garriock)

家具、汇兑中间商

第三特别区

- (17) 信孚洋行 (Ramsay & Ltd.)

保险业

第三特别区

- (18) 路透电报公司 (Reuters Ltd.)
 通讯业
 第三特别区
- (19) 加拿大永明人寿保险公司 (Sun Life Assurance Co. of Canada)
 保险业
 第三特别区
- (20) 汤笙洋行 (Thomson & Co.)
 会计师
 第三特别区
- (21) 保安 (Union Insurance Society of Canton ,Ltd.)
 保险业
 第三特别区
- (22) 南英商保险公司 (South British Insurance Co. ,Ltd.)
 保险业
 第三特别区

2. 美国

- (1) 美国总保险公司 (American Asiatic Underwriters Feder 1 Inc. U.S.A.)
 保险业
 第三特别区
- (2) 美国保险公会 (American Foreign Assurance Association)
 保险业
 第三特别区
- (3) 人寿保险公司 (Asia Life Insurance)
 保险业
 第三特别区
- (4) 华友药房 (Association Drug Co.)
 化学工业药品销售
 第二特别区
- (5) 北美洲保险公司 (Insurance Company of North America)
 保险业
 第三特别区
- (6) 南星颜料厂 (National Aniline Chemical Co. ,U.S.A. New York China)
 颜料化学工业药品
 第二特别区
- (7) 义隆商业公司 (North China River Assurance)

保险业

法国租界

(8) 宝柏烟草公司 (Shanghai Cigarette Co.)

烟草商

第一特别区

3. 德国

(1) 彭松洋行 (Bahnson & Co., F.W.)

汇兑中间商

第三特别区

(2) 爱礼司洋行 (Deuth Stickstoff Handelsgesellschaft Karanch & Co.)

肥料商

第一特别区

(3) 老古利洋行 (Gold Macher of Linderer)

汇兑中间商

第一特别区

(4) 石格子工程师 (Sachse R.)

承包业

第一特别区

4. 法国

(1) 万国储蓄会 (International Savings Society)

储蓄业

法国租界

(2) 巴黎洋行 (Magasin de Paris Dress & Hats)

西式服饰、化妆品销售

(3) 毕格亚洋行 (Picca A.)

代理业

法国租界

(4) 四平洋行 (P.R. Spire & Co.)

保险业

法国租界

(5) 史璧珥票行 (Spire Pierse R.)

汇兑中间商

法国租界

(6) 飞星公司 (Star Pichsha Co.)

人力车材料商

法国租界

(7) 那嘉利洋行 (Niagara Mineral Water & Co.)

饮料生产、销售

法国租界

(注——此洋行兼营制造业, 参照第一节)

保险业、汇兑中间商、其他一般商业等, 均包含于第五节的一般当中。但要注意的, 此处所列还不包括饮食店和其他小规模个人商店。而这类饮食店和其他小规模个人商店, 在法国租界内很多, 当然其中大部分是由法国人经营的。

三、战后的外国人权益

汉口的所谓外国人权益在形式上并未受到事变的影响, 但在实质上, 因为日军对长江的封锁, 以及除长江之外惟一的海外出口——粤汉铁路也陷入不能通运, 所以租界之外自不必说, 就是法国租界的外国人权益, 也同样不可能有实际的经济活动了。

再者, 汉口陷落后, 除了法国租界外, 其他全都处于日军的军政管制之下, 所以租界外的外国人权益的自由活动更加受到了限制。

以下分制造业、进出口业、船舶业、银行业及一般各方面, 加以详述。

(一) 制造业

制造业者遭受的损害, 可以从出口商品制造业、原料进口加工销售制造业、日用必需品制造业三方面来说明。

1. 出口商品制造业

即为蛋制品、桐油精制、皮革加工、砖茶制造等方面的制造业, 其原料来自湖北、湖南及其他内地地区, 汉口陷落后因为交通断绝而致原料来源断绝, 即使能够得到一些, 也因为其产品不可能运出, 而致全部不得已停产, 现在已没有一家开工。而利用此前储存的原料生产的产品, 也都储存在各个仓库之中。

2. 出口加工销售制造业

即为烟草公司等, 即使在这次陷落后, 靠着储存的原料还可生产并供应市场。不过, 因长江的封锁及其他海外交通的断绝, 原料将不能进口, 其将无法充分展开活动。因为储存的原料有限, 所以只能处于勉强维持生产的状况, 同时其产品的市价也大幅上涨。这种原料的限制、市价的上涨, 可以说给日本烟草的打入带来了很大的余地。

3. 日用必需品制造

即为电气供应、清凉饮料的生产之类，这些都是日用必需品，故电气供应不仅在法租界以内，而且在租界以外地区，都在向市民进行着。

清凉饮料工厂靠着在法租界内储存的原料维持生产和供应市场，然而其储存的原料有限，同时我国的产品又大量打入汉口，现在可以说我国产品占了绝对优势。

（二）进出口业

因为长江的封锁以及各铁路交通的断绝，出口业者、进口业者都不得不停止了业务，其手上的出口货和进口货都堆在仓库之中，而出口货中桐油、棉花、皮革之类，则由日军部着手购买。

（三）船舶业

现在外国船舶只被允许溯航到江阴为止，由此向上游的航行被禁止。事变发生时在汉口停泊的外国船只，因汉口目下成为交战区域，而不被允许向汉口以外航行，迄今还在此地停泊。

另外，就那些外国船舶业者所拥有的船舶来说，因汉口上游非占领区域航行的船只现在依然不少，推想它们正在从事这种航行。

（四）银行业

汉口陷落后，此地外国人与海外的商业交易断绝了，所以各个银行即使开门营业，也无大交易，只不过做些小额的存款和汇款等等，银行本来的业务处于极其闲散的状态。

（五）一般

保险业、汇兑经纪业等在汉口陷落后，都因为客观形势的变化，必然不得已走向业务中止。但是法国租界内的一般个人商店几乎全部开着门，靠储存的商品维持着买卖经营。另外，租界以外在日军军政管制下的外国人商店，得到我军部许可，可以开业，现在也有少数开门了，其中尤以饮食店开业者为多。

最后，为了给了解汉口陷落后各商社的状态提供参考，开列陷落后各商社的存货情况：

德华洋行（德国）

10 Casks——盐渍的猪肠

700 箱——红茶

猪肠 20 小箱 2 281kg

9 大箱 2 768kg

3 大箱 924kg

以上去年 8 月就已通过了出口税关

最美时洋行（美国）

羊 毛 150 担

牛 皮 2 000 担

水牛皮 1 500 担

桐 油 800 吨

蛋制品 55 担

（所有物资皆在其仓库中）

福来德洋行

蛋制品 200 吨

粗 毛 350 箱

桐 油 35 吨

其乐洋行（美国）

桐油 3 200 吨（自己的物资和他人的物资一起）

瑞记洋行

桐油 30 500 担

麻 14 000 担

豆 20 000 担

皮革 1 800 担

猪肠 75 箱

施美洋行（美国）

桐油 1 940 吨

德昌洋行（德国）

盐渍猪肠 30 吨

禅臣洋行（德国）

鹿毛 5 000 担

礼和洋行（德国）

蛋制品 875 箱

牛 皮 3 000 担

水牛皮 600 担

麻 70 吨

隆茂洋行（英国）

棉花 4 760 吨

麻 357 吨

生利洋行（美国）

桐油	339 吨（贮藏在废旧船和平板船中）
----	--------------------

嘉利洋行（德国）

蛋制品	300 吨
-----	-------

桐油	63 吨
----	------

平和洋行（英国）

牛 皮	3 000 担
-----	---------

水牛皮	190 担
-----	-------

山羊皮	1 220 担
-----	---------

骡马皮	45 担
-----	------

麻	3 700 担
---	---------

羊毛	500 担
----	-------

怡和洋行（英国）

棉花（皮棉）	3 140 吨
--------	---------

棉花（籽棉）	极少数
--------	-----

皮革	27 吨
----	------

五倍子	2 117 吨
-----	---------

桐油（管装）	340 吨
--------	-------

桐油（桶装）	173 吨
--------	-------

桐油（装在废船上）	1 232 吨
-----------	---------

桐油	400 吨
----	-------

茶	392 吨
---	-------

麻	120 吨
---	-------

和记洋行（英国）

蛋制品	470 吨
-----	-------

宝隆洋行（丹麦）

出口货

豆类	1 505 担
----	---------

桐油	8 400 担
----	---------

麻袋	25 435 担
----	----------

进口货

钢铁	1 418 吨
----	---------

其他	
----	--

四、外国人权益的前途

如上所述，由于汉口的地理特殊性，外国人权益大部分都在租界之外。现在惟一尚存的法国租界，由于日军对长江的封锁，其租界的特殊性也不得不减弱。由于这些原因，在汉口的所谓外国人权益，在整体上活力大为削弱，现在其中的大部分不得不处于关闭状态，即使开门营业者，其活动范围也极其狭窄。处在这种特殊情况下的汉口外国人权益，其前途取决于日本军部对外国人权益的政策如何，这是因为日军对长江实行了牢固封锁，而汉口也成为占领区域，由日军实行军政统治。

说起日军应讲求何种对策，第一位的工作是：在现今状况下，使在汉口的外国人权益处于彻底孤立的状态。也就是说，在一个时期内，厉行对扬子江的封锁，此乃最为必要的条件。

对长江的封锁越久，在那里的外国人权益将会越衰弱，以至于使租界这一外国人的特殊区域显得没有意义，最终使维新政府有可能收回可称为东洋和平建设之癌的租界。

这样一来，在汉口的外国人权益将不得不日益降低其活力，这同时会导致日本商社活动范围扩大的结果。日本当局也应对日本人的商社活动加以大力援助，以使其巩固地盘，与西方人的地盘对抗，进而凌驾于他们之上，以此对促进中国国民经济作出贡献，同时与中国人融合。

就日本商社来说，也要抓住好机会，不要只为自己的利益奔走，而应当以高度的自觉，着眼全局处理事务，按照日本当局长期建设的方针来进行活动。

像这样，在日本商社与西方人商社对抗取得优势地位之后，才可解除对长江的封锁。

这里事实上的问题是，即使从国际关系的现状来说，也不可能把所有外国人权益从汉口强行驱逐出去，同时也不可愚蠢地重蹈此前日本对满洲政策的旧辙，应该欢迎某种程度的外国投资，以共同努力促进中国国民经济发展。

综上所述，对汉口外国人权益的政策应该推行下去。但不可忘记，这里的当务之急，是有非外国人权益的非正常的所谓伪装权益存在。这一问题的解决，在某种程度上也肯定会影响到外国人权益的活力。

说到这些伪装权益的由来，是蒋介石在日军的迅猛攻击下不得不决定放弃汉口、向重庆迁都后，当时在汉口的中国富豪们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而采取只借用外国国旗、订立事变之后的买卖契约、担保物权管理等方法，将之换成外国人的名义。不言而喻，这是日军进攻汉口时，同时也是汉口攻克后建设之中遇到的一大障碍。

日本当局对此问题的方针，早先已有声明，昭和十二年八月十三日此次事变爆

发之后的买卖契约及其他交易无效，不承认其为外国人权益（此处尚存在的问题是：例如事变以前因交易而产生的担保物权，可否作为外国人权益对待）。

然而，中国人和外国人（特别是比利时的义放款银行，在事变爆发后与中国人之间交易盛行，中国人财产变成这个银行名义之下的极多）的交易尽管是在战后进行，但在领事馆（比利时在当地没有领事馆，他们在意大利领事馆处理这类变更事务）登录时，却写成事变前的契约。他们用这些愚蠢的办法来保护自己不正当的财产。

这就给日本当局解决伪装权益问题带来了困难，在陷落后的工作中这也是一大障碍，到现在仍然摆在眼前。

但如前所述，既然已有声明发出，日军军部也正对此类伪装权益进行彻底的清查，将其作为敌产处置。

一旦这些伪装权益得以解决，对外国人权益的彻底的对策也会得以推行，在汉口的外国人权益会被限制到一定程度，这对于东亚新秩序建设将会发挥重大作用。